

目录

[下卷前言 2](#_Toc58922272)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6](#_Toc58922273)

[農業 7](#_Toc58922274)

[手工業 18](#_Toc58922275)

[近代工業 27](#_Toc58922276)

[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 38](#_Toc58922277)

[行政和經濟 55](#_Toc58922278)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64](#_Toc58922279)

[對外關系發生變化的背景 64](#_Toc58922280)

[1866—1875年的對外關系 65](#_Toc58922281)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團 65](#_Toc58922282)

[蒲安臣使團和阿禮國協定 65](#_Toc58922283)

[1870年的天津教案 68](#_Toc58922284)

[覲見問題，1873年 70](#_Toc58922285)

[馬嘉理事件，1875年 70](#_Toc58922286)

[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和朝貢國擴張的加速 72](#_Toc58922287)

[臺灣和琉球 72](#_Toc58922288)

[伊犁危機，1871—1881年 74](#_Toc58922289)

[爭奪安南（越南）的中法戰爭，1883—1885年 79](#_Toc58922290)

[日本對朝鮮的侵略 82](#_Toc58922291)

[朝鮮的開放 82](#_Toc58922292)

[戰爭爆發 85](#_Toc58922293)

[和平談判 85](#_Toc58922294)

[“瓜分中國”的危險 87](#_Toc58922295)

[三國干涉 87](#_Toc58922296)

[中俄秘密結盟 87](#_Toc58922297)

[割地狂潮 88](#_Toc58922298)

[門戶開放政策 90](#_Toc58922299)

[義和團起義 91](#_Toc58922300)

[義和團運動的背景 91](#_Toc58922301)

[義和拳的起源 92](#_Toc58922302)

[宮廷對義和拳的庇護 92](#_Toc58922303)

[華南和華東的獨立行動 95](#_Toc58922304)

[和平解決 96](#_Toc58922305)

[俄國在滿洲 98](#_Toc58922306)

[義和團暴亂的影響 99](#_Toc58922307)

[英日聯盟的影響與俄日戰爭 100](#_Toc58922308)

[聯盟的起源 100](#_Toc58922309)

[英日聯盟的影響 103](#_Toc58922310)

[俄日戰爭 104](#_Toc58922311)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 111](#_Toc58922312)

[引言 對外關系的傳統觀點 111](#_Toc58922313)

[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1860年 112](#_Toc58922314)

[傳統的經世之學和新的戰略性建議 112](#_Toc58922315)

[誤會和惰性 116](#_Toc58922316)

[西方力量和財富的沖擊，1860—1895年 117](#_Toc58922317)

[中國人承認“變局” 117](#_Toc58922318)

[尋求和平的外交關系 120](#_Toc58922319)

[“把握時機” 122](#_Toc58922320)

[對外政策觀點的矛盾，1860—1895年 125](#_Toc58922321)

[排外主義的興起 125](#_Toc58922322)

[堅持文化主義 129](#_Toc58922323)

[民族意識的出現 132](#_Toc58922324)

[中國對西方關系看法的延續和變化 138](#_Toc58922325)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147](#_Toc58922326)

[太平軍戰爭以后時期的清朝軍隊 147](#_Toc58922327)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151](#_Toc58922328)

[云南 151](#_Toc58922329)

[陜西和甘肅 152](#_Toc58922330)

[新疆 157](#_Toc58922331)

[清朝在陜西和甘肅的勝利 159](#_Toc58922332)

[收復新疆 164](#_Toc58922333)

[李鴻章與海防 169](#_Toc58922334)

[淮軍和它的問題 170](#_Toc58922335)

[建設一支海軍 171](#_Toc58922336)

[中法戰爭及其后果 173](#_Toc58922337)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174](#_Toc58922338)

[劉銘傳在臺灣 177](#_Toc58922339)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182](#_Toc58922340)

[中日戰爭的災難 183](#_Toc58922341)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196](#_Toc58922342)

[背景——西方沖擊的形勢 196](#_Toc58922343)

[康有為和新思想的風云激蕩 201](#_Toc58922344)

[維新運動 205](#_Toc58922345)

[湖南的維新運動 210](#_Toc58922346)

[1898年的災難 219](#_Toc58922347)

[維新時代的遺產 224](#_Toc58922348)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233](#_Toc58922349)

[中國的開放對日本的警告 233](#_Toc58922350)

[中國人心目中的明治時期的日本 235](#_Toc58922351)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237](#_Toc58922352)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240](#_Toc58922353)

[翻譯的影響 244](#_Toc58922354)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245](#_Toc58922355)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256](#_Toc58922356)

[光緒皇帝的改革詔書 256](#_Toc58922357)

[教育改革 256](#_Toc58922358)

[軍事制度的改革 259](#_Toc58922359)

[立憲政體的準備工作 262](#_Toc58922360)

[行政制度的改革 262](#_Toc58922361)

[準備立憲的日程與“憲法大綱” 265](#_Toc58922362)

[咨議局、資政院和自治會 266](#_Toc58922363)

[財政的清理與集中 268](#_Toc58922364)

[其他改革方案 270](#_Toc58922365)

[編纂新法典 270](#_Toc58922366)

[革除陋習 271](#_Toc58922367)

[消除滿漢畛域 272](#_Toc58922368)

[清末改革的特點 272](#_Toc58922369)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1] 278](#_Toc58922370)

[關于商人和現代企業的再評價 278](#_Toc58922371)

[工業化的政治理論基礎 278](#_Toc58922372)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變化 279](#_Toc58922373)

[官方對現代工業的贊助 280](#_Toc58922374)

[李鴻章的領導作風 280](#_Toc58922375)

[官督與商辦之爭 282](#_Toc58922376)

[張之洞對商人合伙的許諾 285](#_Toc58922377)

[幻想逐漸消失 287](#_Toc58922378)

[創辦私人企業的運動 289](#_Toc58922379)

[私營鐵路和經濟民族主義 289](#_Toc58922380)

[私營企業茂新面粉廠 292](#_Toc58922381)

[新的行政章程和法規 293](#_Toc58922382)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領導方面的矛盾 294](#_Toc58922383)

[京師新設的各部 294](#_Toc58922384)

[各省的反應 296](#_Toc58922385)

[辦企業官員的出現 297](#_Toc58922386)

[作為官僚企業家的周學熙和張謇 298](#_Toc58922387)

[一點淺見 300](#_Toc58922388)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306](#_Toc58922389)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307](#_Toc58922390)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1903年 307](#_Toc58922391)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310](#_Toc58922392)

[1901—1905年的學生運動 312](#_Toc58922393)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315](#_Toc58922394)

[革命的聯盟，1905—1908年 318](#_Toc58922395)

[一個新的革命戰線的形成 318](#_Toc58922396)

[意識形態與“革命一改良的辯論” 320](#_Toc58922397)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326](#_Toc58922398)

[清王朝的滅亡，1908—1912年 330](#_Toc58922399)

[大聯合的出現 331](#_Toc58922400)

[新軍 331](#_Toc58922401)

[新紳士和省咨議局 333](#_Toc58922402)

[革命組織 334](#_Toc58922403)

[民國的誕生 334](#_Toc58922404)

[憲友會 335](#_Toc58922405)

[同盟會中部總會 336](#_Toc58922406)

[四川危機 337](#_Toc58922407)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340](#_Toc58922408)

[革命之謎 341](#_Toc58922409)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342](#_Toc58922410)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350](#_Toc58922411)

[特權階級種種 350](#_Toc58922412)

[巨紳：太平天國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350](#_Toc58922413)

[新軍勢力 352](#_Toc58922414)

[接觸西方后的結果 355](#_Toc58922415)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界 358](#_Toc58922416)

[新的社會制度 361](#_Toc58922417)

[分裂的開始 363](#_Toc58922418)

[平民百姓縱觀 366](#_Toc58922419)

[一個新的集團：產業工人 366](#_Toc58922420)

[農村暴發戶和貧苦農民 369](#_Toc58922421)

[手工業的變化 370](#_Toc58922422)

[移民 371](#_Toc58922423)

[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373](#_Toc58922424)

[社會變化的動力 375](#_Toc58922425)

[外因和內因 375](#_Toc58922426)

[土地關系的惡化 376](#_Toc58922427)

[民眾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377](#_Toc58922428)

[參考文獻介紹 389](#_Toc58922429)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389](#_Toc58922430)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390](#_Toc58922431)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392](#_Toc58922432)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393](#_Toc58922433)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394](#_Toc58922434)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395](#_Toc58922435)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397](#_Toc58922436)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 398](#_Toc58922437)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399](#_Toc58922438)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400](#_Toc58922439)

[參考書目 403](#_Toc58922440)

[附：參考書目中著作及報刊簡寫表 407](#_Toc58922441)

# 下卷前言

對歷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對中國歷史進行思考、概括卻成了一個特殊問題。“中國”一詞事實上是現代語言中概括范圍最廣泛的一個概念。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生息之地極其廣袤、歷史記錄最為悠久的最大的人類群體——在這幾個方面，中國是無與倫比的。只要想想“中國”或“中國人”，就會形成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無論從人口、年代或從土地面積來看都是這樣），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歷史領域中幾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諾斯時代以來的歐洲是一個較小的政治實體。我們對歐洲的知識較多，對中國則相對地無知；如果竟因此說歐洲的歷史要比中國還復雜.那就未免自以為是了。直到近代之前，中國的歷史記述要更為廣泛。也許，中國比歐洲更為強烈的統一意識產生了比歐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許部分是由于中國傳統歷史學家首先關注社會秩序、國家及其統治階級，因而造成了這種錯覺。

無論屬于哪一種情況，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向當代各個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國的形象，人們正在對業已高度概括的中國歷史記錄進行研究，以尋求對歷史事實的種種綜合歸納和統一的觀點。這個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難度很大：公眾既需要了解歷史的概貌，往往同時又尋求預定的結論，期望著據以或則揪出壞蛋，加以聲討；或則確認罪責，為之惋惜；或則為某些學說辯誣，重新加以肯定。

這就意味著，研究中國歷史學家對本國史所作出的種種貢獻，必須較平常更加細致，而對外人所寫的中國史，尤其要詳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與中國的關系史，這是外國人特別容易研究的近代中國的一個方面。自然，自1840年（或者說自1514年）以來，外國對中國的多方面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甚至，以鴉片戰爭這場外國入侵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都已成為習慣。但是，所有這些外來影響只形成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風土人情和遺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在這一環境中仍居統治地位，而且變化緩慢。那么，外國勢力對19世紀中國的影響會不會日益顯得不那么大了呢？是會這樣的，但不是由于這些影響本身的規模或重要性有所減小和削弱，而是因為關于中國本土的經歷的知識日積月累，致使它們相形見絀罷了。

本書下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國商業的入侵和鴉片戰爭，而是從北京著眼，即從19世紀初期清帝國在中國和亞洲腹地的典章制度開始。接著便講述19世紀上半葉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會秩序方面日益增長的國內問題。在對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以及對歷盡艱險、來之不易的同治中興的論述中，還可以看到內部失調以及復蘇的跡象。中國的經濟，乃至中國的軍事體制，都顯示了一個雖然古老但卻遠遠沒有停滯的社會內部的活力。面對著這種種史無前例的壓力，千千萬萬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樣奮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滿洲人在亞洲腹地建立的這個帝國在18世紀期間的文治武功，顯然已為漢族人民從中國本部向滿洲、蒙古、新疆和東部西藏這片廣大的邊境地區的擴張打下了基礎——這一長期的大規模移民運動，乃是早在18世紀就已開始的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的結果。

廣州貿易——一條有來有往的渠道——的興起不過是漢族在人數、移民、貿易乃至投資方面的巨大擴張最著名的一例。中國人的這部分擴張活動早已在海外發生，與歐洲人的擴張活動并駕齊驅。它發生在清帝國的疆域以外，參與其事的是中國沿海的人民，從而形成了一個次要的傳統，其歷史之長，大約為在官方歷史上居統治地位的大陸官僚帝國的主要傳統的一半。以帆船從廈門和廣州到東南亞（南洋）進行貿易，這種航海事業的開始大大早于歐洲殖民列強到達同一地區的時間。只要回顧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軍、蒙古人在1292年遠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1405—1433年橫跨印度洋的遠航等事實，就可想象這種情況的一般了。誠然，蒙古勢力于15世紀40年代再次崛起，使明朝無暇南顧，而另一個實行海禁的亞洲內陸型帝國——清王朝取代了明朝，這樣，中國皇帝對沿海一帶的領導權于是告終。但事實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統治者，仍然愈來愈依靠中國的商人和經紀人經營零售業和履行特許專賣戶或小包稅人的職能。華僑成了歐洲殖民地的一個特殊的中間階級；同樣地，他們也成了暹羅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羅，某個華僑建立了卻克里王朝，它直到今天還在曼谷進行統治。中國海上的航海家和企業家盡管得不到北京的賞識，有時甚至還受到申斥，但他們仍然這樣地參加了東南亞的近代初期的商業革命以及從而導致的殖民主義活動。

當這一日益加速增長的國際貿易終于通過廣州南面的虎門而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道路時，或者進行合法貿易，或者進行鴉片貿易的廣州、汕頭和廈門的商人們就成了日后擴大國際接觸的原動力。盡管外文的商業資料過多而中文的商業材料目前尚少，我們仍可以知道，中國的對外貿易顯然是一種中外合營的企業：事實上，通商口岸一旦開放，洋行的買辦便經營著大部分貿易，既從通商口岸入口，也通過通商口岸出口。不管外國僑民怎樣考慮他們的主權、他們的條約權利或者他們的炮艦火力，香港、上海及其他貿易地點都是中國人的城市。既可以說中國人參與了外國人對中國的開發，也可以說外國人參與了中國對它自身的商業開發——這兩種說法幾乎同樣符合事實。東印度公司的大宗廣州茶葉貿易從1784年到1834年前后增長迅速，而茶葉歸根到底是來自中國。與遠在新疆和滿洲的中國農民和商人一起，沿海中國的航海者和企業家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活力；鑒于他們幾乎沒有得到本國政府的什么幫助，他們的表現就更加突出了。

如果說對外貿易是中外人士都積極參加的一種雙邊活動，那么，還有一種考慮可據以評價外國對晚清歷史的影響：在19世紀期間，在幾乎所有各個民族的經驗中，對外交往越來越顯得重要了。與19世紀中葉以后乘外國船只漂洋過海的小規模華僑移民相比較，大批歐洲移民到新大陸的時間要早得多。對英國公眾來說，鴉片戰爭在戰略上不如第一次阿富汗戰爭那么關系重大，義和團之亂也不過是英布戰爭長期磨難中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就大多數民族而言，工業化來自國外；許多方面的變化的重心被認為是在本國以外。國際的科學和技術，如同國際的政治和貿易那樣，越來越對世界社會的全部生活作出貢獻。從這個觀點看來，外部影響對晚清的歷史起了空前重大的作用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現在，中國進入了世界社會，這給本身就深深地受到外國影響的種種歷史事實的闡述提供了依據。這些闡述把中國的經驗與其他民族的經驗聯系起來。首先用“帝國主義”的概念，其次用“現代化”的概念來聯系。其辦法是通過類比，即設法在中國尋求普遍見之于其他各地的現象。

帝國主義和現代化二詞都幾乎屬于超歷史的范圍。歷史學家真要使用它們，就需要加以精確的界說和具體的例證。一般地說，帝國主義指外國的主動行動，現代化則是國內的進程。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還沒有達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地步。還沒有出現外國人只是為了出口貿易而發展的種植業經濟。即令是工業棉紡織品的輸入——馬克思主義經典所歸咎的禍根——也并未摧毀中國的手工織布的生產；手工織布業由于有了價格較廉的機制棉紗而得以延續到20世紀的第二個25年，因為農戶中不如此就無活可干的成員就是用這種棉紗來織布的（織布所入不足以糊口，但仍可以增加他們微薄的家庭收入）。20世紀30年代大約還有70%的棉布出自手工織機。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人的家庭仍然多么需要利用它們的無業勞動力。手工織布固然是貧困的標志。可是，從遏制工業棉布的壟斷這一點看，它也表明整個中華民族怎樣躲過了淪為外國商品的廣大市場（香煙和照明煤油例外）的厄運，而躲過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太窮。這個例子可以提醒我們，關于與外國帝國主義者發生關系時的晚清中國國內的各方面情況，我們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了解。

帝國主義引起的心理影響雖然是緩慢地積累而成，卻是卓然可見的。帝國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主題，在思想和心理方面愈到后來便愈顯得重要，因為它誘發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但是這個主題在計量經濟學的領域中卻未能占這么大的分量。中國人關于受外國剝削的觀念已經比剝削本身更為廣泛和更加容易地形之筆墨，載諸文獻。外國人咄咄逼人地維護特權，作為主要大事記入了歷史，而在這個方面，傳教士是可以與（外國）商人一爭高低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和炮艦外交、條約權利與外國人的存在，當時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今天也仍然是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人們記憶猶新。

后來的局外人的一種觀點——即關于現代化的觀點——在應用到中國時，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羅了主要為近代西方所發展的各種社會學科的思想而受到損害。社會科學力求客觀，不受先入之見的束縛，但這種努力卻可能因它們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而大受影響。如果是這樣，它應該是一個暫時的問題，將會隨著世界性文化的成長而消失。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現代化一詞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我們認為現代化一詞是對各種進步思潮的概括，這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包括歷史在內——都有具體的例證。現時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長，給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領域帶來了復雜性、變化和發展。但是，上述每一領域內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該學科的術語加以界說的。要斷定有一個單一的原則全面地適用于每一個領域，這就是進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這樣做在邏輯上可能是令人滿意的，但歷史資料既然如此混亂，這就不易辦到。把形容詞“現代的”升級而成為“現代化”這一抽象的統一體，真能提高我們的理解嗎？這個術語有可能成為一只方便的籃子，像“生活”這個字眼那樣，用來盛放許許多多基本上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未經譯釋的信息和沒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術語一樣，這個術語一旦被具體化為一種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

隨著當代對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著作的不斷增加和發展，我們應當可以指望，人們對那種為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提供初步結構的無所不包的概括的要求總會減少了吧。晚清時代的具體經驗和思想意識應該成為主要的課題，我們這一卷書的許多部分就是照此辦理的。雖然文學和藝術令人遺憾地不屬于這一卷范圍，但哲學和政治思想這方面的歷史卻使我們大長見識，從而可以洞察當時發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樣發生的。總之，晚清對西方的反應現在開始顯得只是一個次要的主題；主要的過程乃是在新條件——包括西方的影響——下中國繼續對它的過去所作的反應。一句話，刺激就在你發現它所存在之處，有刺激就會有反應，否則就根本不成其為刺激。

例如，經大運河運送漕糧以供應北京的制度日漸敗壞，這使得政府在19世紀20年代作出恢復沿山東向北京海運公糧的努力，這是講求實際的行政官員們在經世學派傳統主張范圍內實行的一項制度興革，但只是在19世紀70年代才采用輪船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樣地，自強運動的理論基礎——即借西洋技術以保衛中國——可以被看作傳統的經世論在新形勢下的應用。只是在經過許多災禍之后的19世紀90年代，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才被夾帶而納入儒家的意識，當作維新運動的必要綱領。最后，改革家的斗爭主要不是直接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反對那些使帝國主義得以實現其野心的中國的傳統。清末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茍齊其家，其誰敢侮之？”中國的力量必定來自內部。對于以古代經典培養出來的學者來說，鼓舞他們寄希望于中國的未來的主要力量仍然來自它的過去。對于研究晚清史的當代歷史學家來說，這就使得理解中國偉大的傳統如同理解19世紀一樣重要。我們必須知道孫中山之前的一代代中國人頭腦里想的確實是什么，這是什么東西也不能代替的。

芮瑪麗（1917—1970年）通過她的學生和朋友以及在兩本分別探討19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頭10年——即本卷的起迄兩個時期——的書中，留下了她對晚期中華帝國史的研究成果。從哈佛大學1952年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同治中興》一書全面地分析了有清一代的問題和政策——這一工作不僅在她以前，而且在她以后都很少有人進行。根據她1965年組織并主持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的成果編輯而成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一書，是第一部全面論述這個問題的研究著作，它匯集了六七個國家的現代學術研究成果。芮瑪麗從1945—1959年為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建立了中文圖書館；從1959年直至她不幸逝世以前她擔任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劍橋中國史》本卷很多地方得力于她的篳路藍縷之功，我們特將本書奉獻給她，以志永念。

費正清 劉廣京識

1977年10月

（張書生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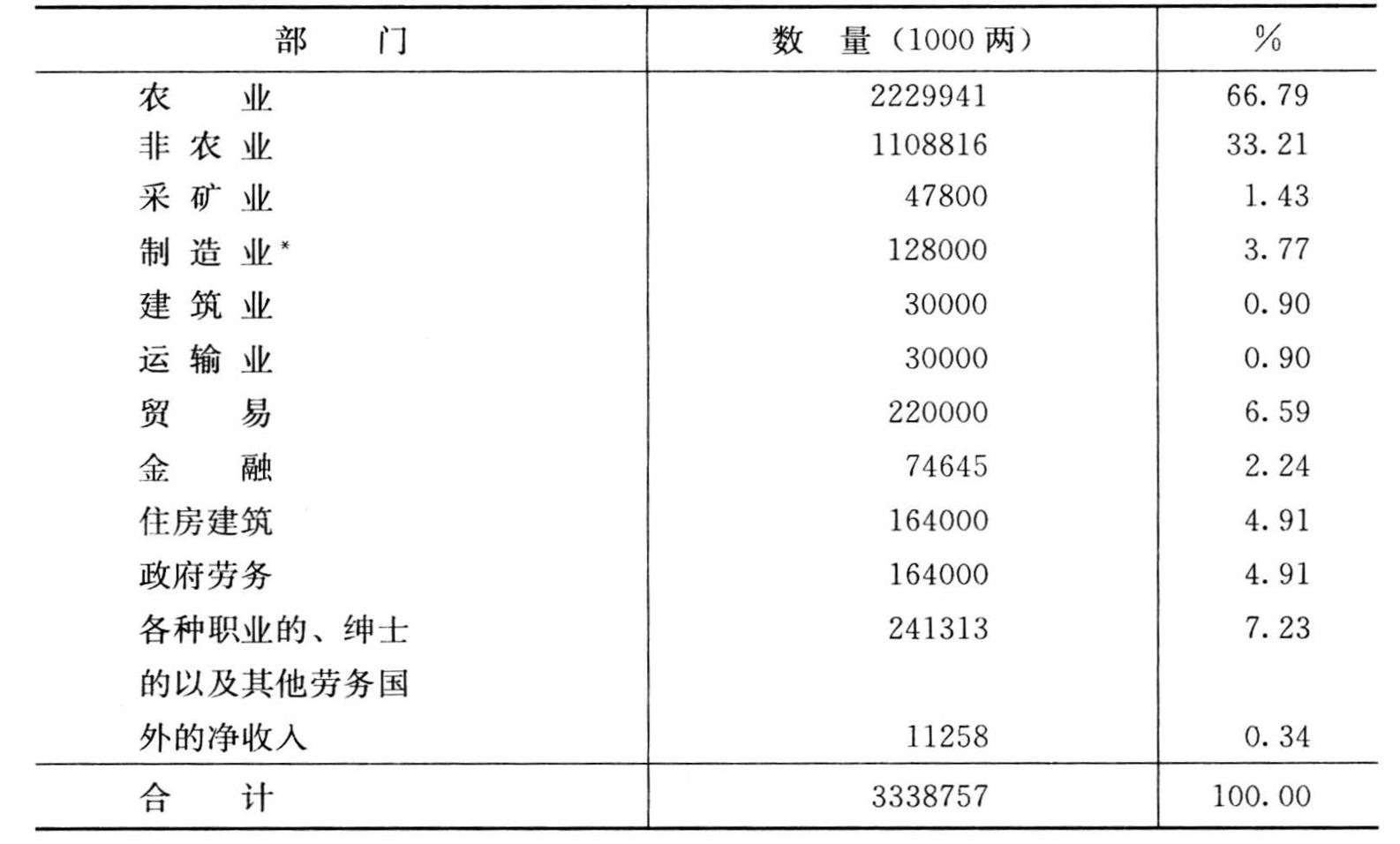
#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在20世紀以前，中國的經濟幾乎沒有不屬于農業部門或不與它發生密切關系的。[[1]](#_1_Ben_Wen_Zuo_Zhe_Gan_Xie_She_H)這篇文章的大部分應相應地對19世紀中國農業的結構和發展以及它對其他經濟成分的影響進行分析。但是在優先討論農業時，我差不多同樣注意到了手工業、近代工業、貿易和商業及財政制度。如果這些區分顯然是老生常談，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個可能的借口來辯護，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數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寫這篇概論所必須依靠的一些中國的近代經濟史著作歷來都是敘述性的。

對以下各部分材料的處理不可避免的是選擇性的。我在各個部分中將集中論述滿洲王朝最后50年內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變化的情況，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這個背景依然是一個在經久不變的社會結構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沒有變化的混合體。這并不意味著中華帝國在最后一個世紀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變化。相反，意識形態的風暴和政治風暴摧毀了這個儒家的帝國。但是基本的經濟變化和近代的經濟發展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在晚清經濟制度中它們自身有這種動能。它們顯然是一種新的、可能仍舊是脆弱的政治組合體的副產品，這個政治組合體本身只有經過了幾十年的政治斗爭、外國入侵和內戰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們在一開始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與相當數量有啟發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還沒有一種全面的精確的計量材料，也不可能為民國以前的中國令人滿意地取得這樣的材料。這種情況再也沒有比像國民收入這樣的基本估量表現得更為明顯了。表1經過修正，反映了對19世紀中國國民總產值估計，就我所知，這是唯一的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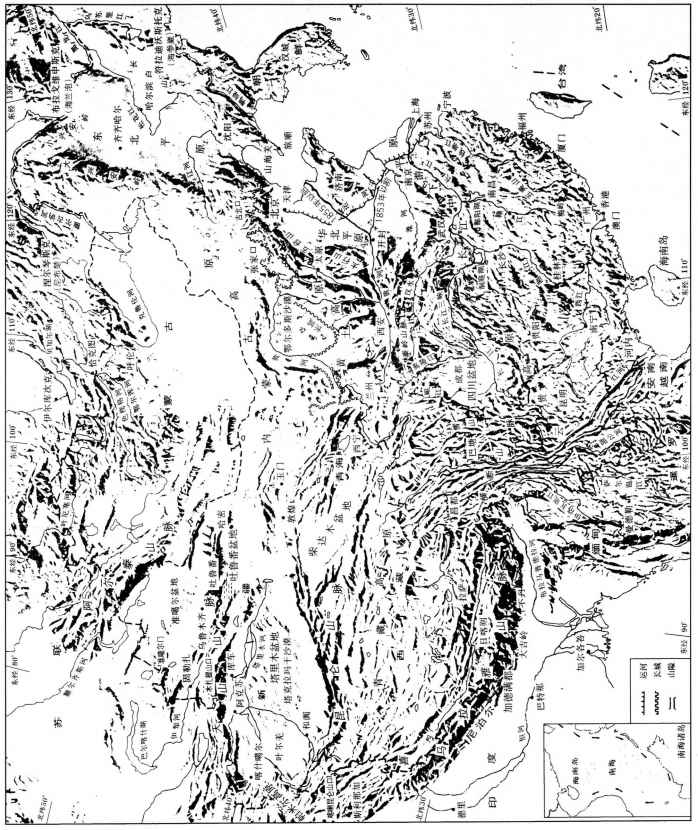
表1 19世紀80年代中國國民總產值估計



\*幾乎全是手工業。  
資料來源：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1962年），第296頁。本表估計數的主要缺點除了公認的有非難的數字問題外，是張仲禮可能夸大了紳士勞務的部分，以及過于認真地依賴1887年關于耕地面積的官方材料。正如我在下一節所提出的那樣，這些官方材料和農業部分都至少應向上調整三分之一。我這樣做了，并且在不改變張仲禮的其他部分的數字的情況下，相應地重新計算了百分比。

表內的個別數字常常是武斷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夠搜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懷疑。這些估計數字大致顯示了19世紀80年代幾個經濟部門的相對規模。

## 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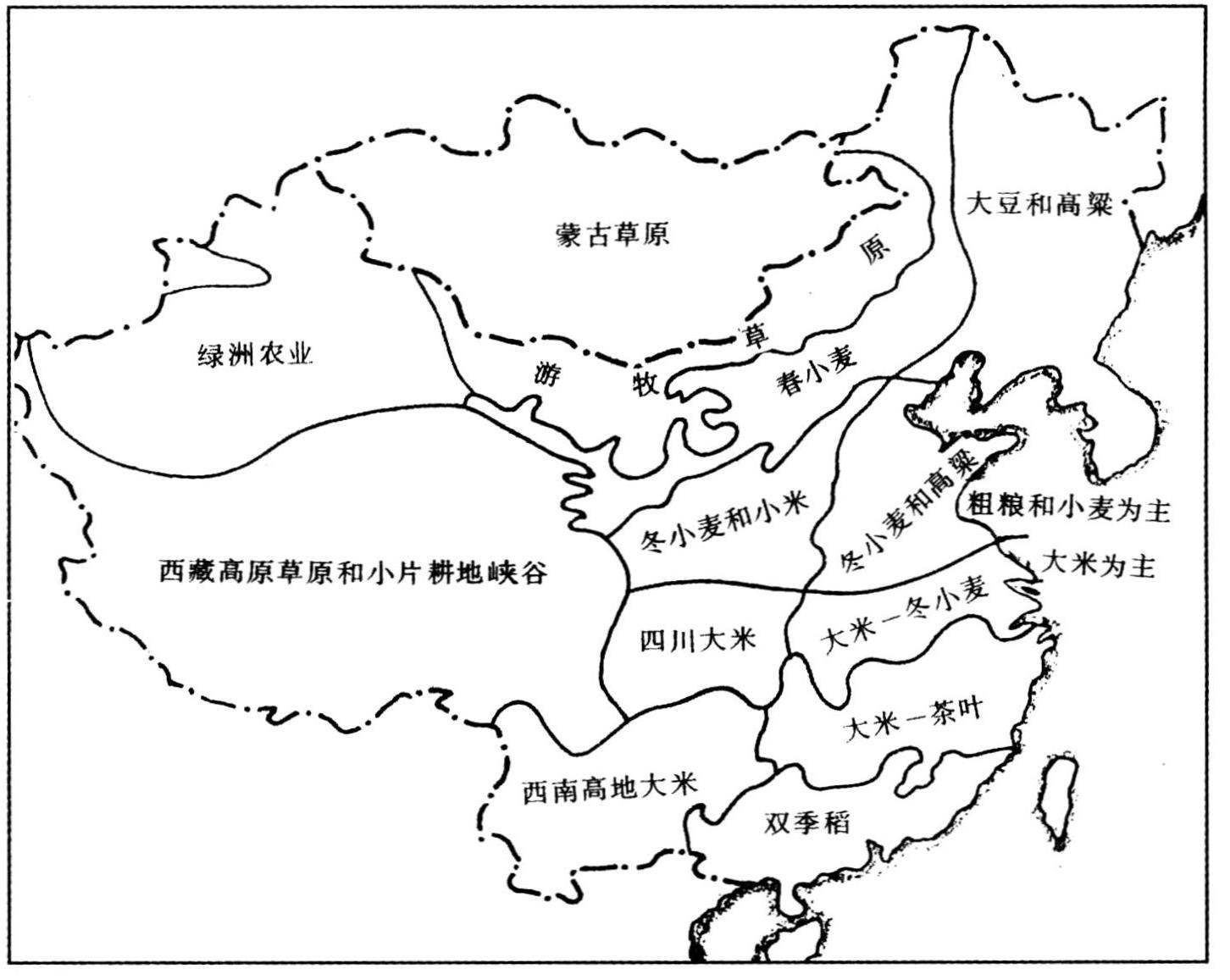


地圖1 中國地形

中國的農業雖然發生了細枝末節的變化，某些部分的規模或質量方面有了改變，但它的技術與組織，1911年與1870年相去不遠（甚至進入20世紀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變）。這段時期的主要變化是：人口有了緩慢的、但是可以覺察到的增長，但耕地沒有相應的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積的縮小，特別在華北更是如此；種植作物類型有了變化，這部分是人與地之比日趨不利所致，部分是對國外市場新出現的機會的反應；作為農民手工業的紡紗業出現了絕對的和相對的衰落，以及為了應付這種衰落而出現了農村非農業收入來源的部分再組合；在發展中的條約口岸附近的內地的土地占有形式，與中國大部分農村內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現了某種差別；把各種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別加以消滅的那種早已在進行的過程已經完成。

有關19世紀后半期人口統計方面的有用的資料當然不可能得到。官方估計19世紀40年代的中國人口略為超過四億人；有人爭辯說，這個估計數雖然不能說十分精確，但相對地說是可靠的。[[2]](#_2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De_Re)太平天國之亂和19世紀中期的其他大起義不但使人口大量減少（特別在華中），而且又造成了經過整頓的保甲制（這項制度曾經收集了1776—1850年期間有關人口的比較可靠的資料）的崩潰。“從1851—1949年這一百年期間雖然可以取得各種數字，但對人口統計學者來說實際上是個空白。”[[3]](#_3_Tong_Shang_Shu__Di_97Ye)

但是，根據足夠的敘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測算出增加的數字，也可以斷定從19世紀70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緩慢地增長。從各省遷到未受嚴重損害的帝國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漸又重新住到飽受內戰之苦的長江流域各省來了。在滿洲王朝的最后40年中，國內是比較安定的，與19世紀中期相比，也是繁榮的。雖然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它們對人口并沒有大的影響。1877—1878年中國北部和西部的大饑荒以及1892—1894年和1900年的幾次較小的但仍很嚴重的饑荒無疑會使人口暫時減少。由旱澇造成的這類危機在過去經常發生，而且在20世紀中也反復出現（例如1920至1921年、1928年、1931年的幾次天災）。它們是許多“不發達”國家人口統計類型中特有的內在組成部分，這種類型中高而動蕩不定的死亡率和高而相對穩定的出生率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緩慢的、但是大量的增長。



地圖2 主要農作物區

但是，增長了多少？喬啟明和J.L.巴克在1924至1925年觀察了四個省的4216家農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計中國的農村人口在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期間每年的平均增長率可能為1.4%。[[4]](#_4_Qiao_Qi_Ming___J_L_Ba_Ke____Z)這樣的增長率如果持續不斷的話，就會使人口在這70年中翻一番；從表面上看，它作為一個實際的長時期的平均數是太高了，不過在短時期內對某些地區可能是正確的。1934年，實業部所屬中央農業實驗所根據它的農作物上報者搜集的回顧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腳的材料，提供了1873—1933年期間農村人口和農田面積變化狀況的估計，我現在將它制為表2。表上顯示，自1873—1913年的40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年的總人口數在3.5億至4億人之間，那么到1913年總數應到4.1億至4.68億之間。如果考慮到以下的事實：人口在19世紀中期略多于四億；太平天國戰爭和其他內戰造成了嚴重的人口損失；經過多年戰爭和內戰之后在中國進行的一次最接近于實際的人口調查算出1953年中國的人口數為5.83億人；那么1873—1913年的上述數字至少不是不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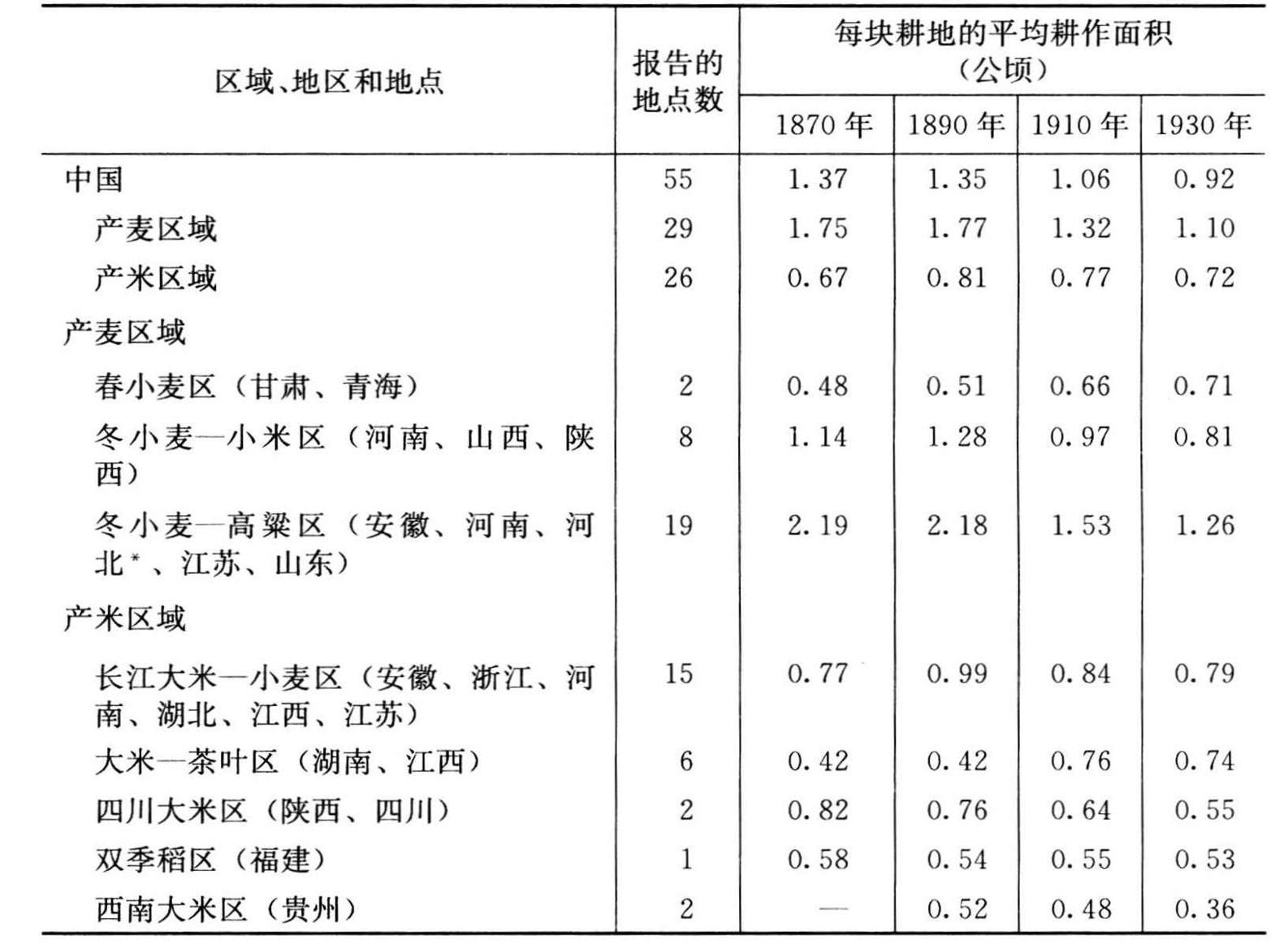
表2 1873—1933年中國農村人口和農田面積變化的指數



資料來源：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業經濟科編《農情報告匯編》，1934年，第48—58頁。

如表2所示，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的答復者報告說，他們所在的幾個地方的農田面積與所發生的緩慢而持續不斷的人口增長相比，并沒有增加的跡象。隨之產生的人—地比例狀況的日趨不利可以從表3所表示的農田平均面積的歷史性資料中反映出來（這些材料是巴克的實地調查員為他的有歷史價值的土地利用研究工作搜集的）。絕大部分巴克的答復者把報告中耕田平均面積的縮小歸因于他們所在地區人口的增加。在華北（巴克調查的冬小麥—高粱產區），農田平均面積的縮小比華中（大米—小麥和大米—茶葉產區）更為明顯。這個差別可以歸因于長江以南各省因太平軍叛亂而造成的嚴重得多的人口損失和隨之產生的華中和華南人—地比例的暫時下降。隨著從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區向這些當時人口相對地說比較少的省份移民，后者的人—地比例又向上升，于是在1900年以后，耕地的平均面積慢慢地縮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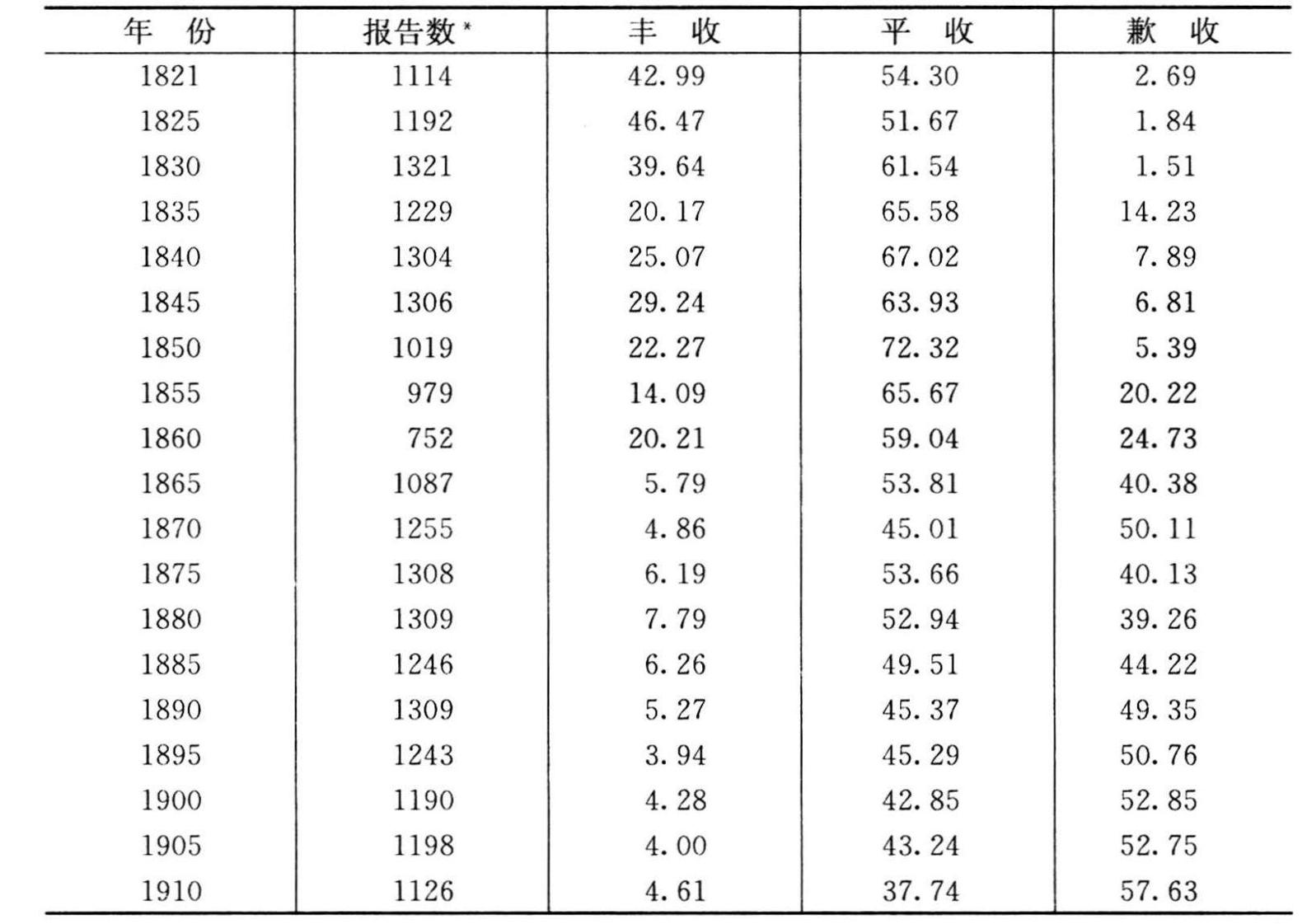
表3 1870—1930年耕地面積的變化



\*在清朝末期，河北省當時被稱為直隸。  
資料來源：巴克《中國土地利用的統計學》，第288頁。

雖然可以肯定1870—1911年期間農村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但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耕地面積的縮小，就出現了農民生活水平急劇而長期的下降。各省向北京呈送的關于夏收和秋收情況的半年報告說明，在整個19世紀的過程中確有下降的趨勢。可以合理地認為，如表4所示，一定程度的惡化發生于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災難性叛亂時期。但根據帝國海關編的《海關貿易報告冊》（簡稱《關冊》）中所列每年地方作物狀況的許多報告，并不能有力地證明1870年以后生活水平繼續在下降。我懷疑，清王朝最后幾十年期間上報的較嚴重的歉收情況，部分地反映了各省在大力抵制北京要求增加上繳稅收額的迫切愿望，并于這種情況，將在下面討論行政和經濟時作詳細的論述。此外，因叛亂引起的人口減少可稱為馬爾薩斯安全閥，它暫時減輕了人口對土地的難以承受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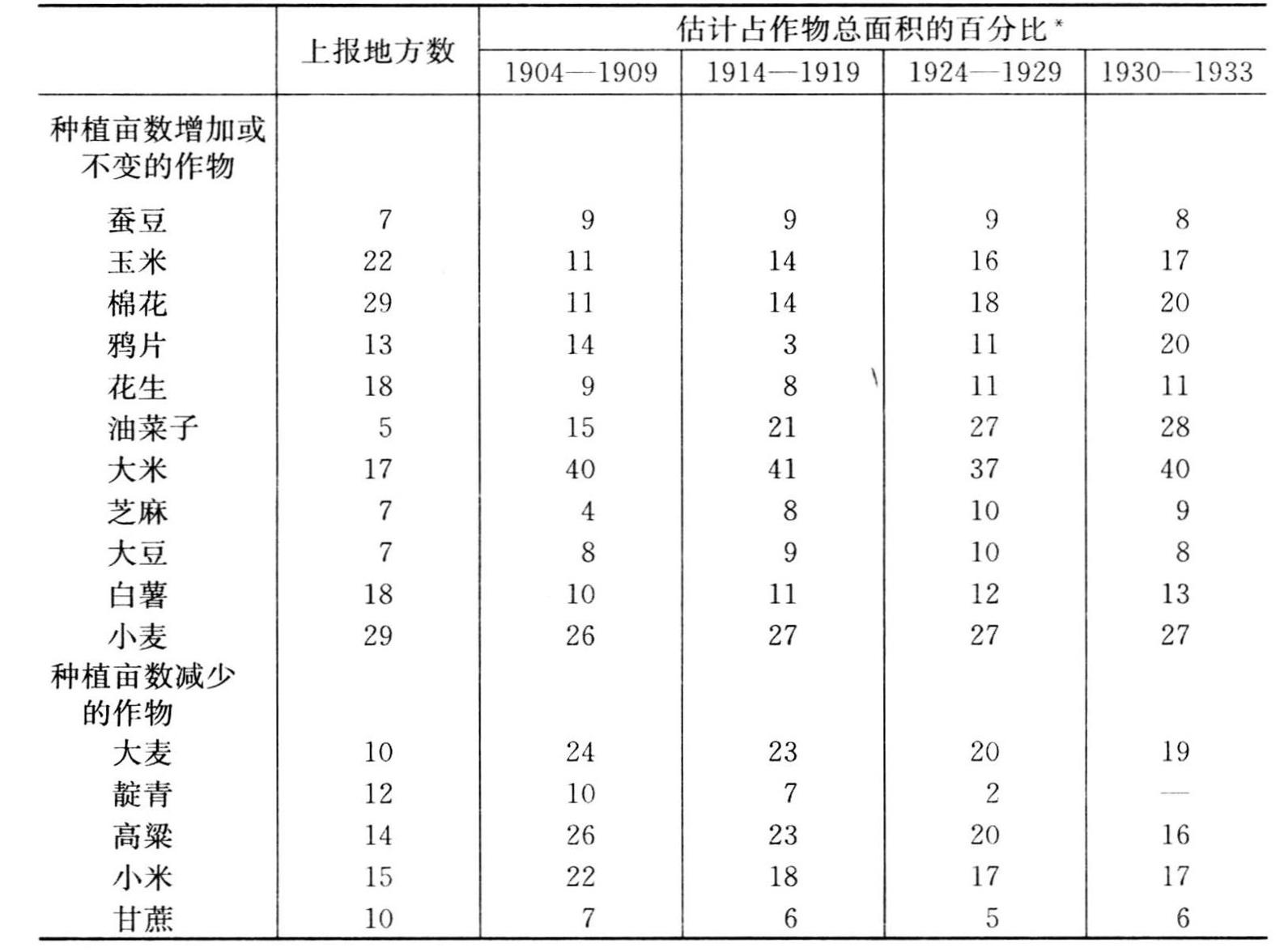
表4 1821—1910年期間九省上報豐收、平收和歉收的州縣的百分比



\*報告數包括了九個省中八個省的夏季報告和秋季報告；因此上報的州縣數約為全年報告數的一半。  
資料來源：根據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761—769頁的材料計算。這些材料的出處是應以下諭旨上報的報告：“諭戶部。嗣后查報各省收成分數，應以八分以上為豐收。六分以上為平收。五分以下為歉收。”見《大清高宗圣皇帝實錄》卷339，第41頁，1749年6月14日。

各個農民的狀況以及各個地點的狀況當然大不相同，而他們有的能生存下來，有的過著苦難的生活，其間的差別往往取決于天時、地方官吏的貪婪以及當地內戰和盜匪的有無。但總起來說，1870—1911年期間的農作物總產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足夠養活更多的人口。但這種增加并不是由于農田技術或組織有了任何重大的變化。在19世紀后半期，沒有引進重要的新作物或新的種子品種（像清王朝在較早時期引進的玉米和早熟稻那樣）。此外在內戰的中期，固定的設備又遭到嚴重的破壞，它們只能逐漸加以更替。灌溉、蓄水和治水以及儲糧設備都沒有擴建或改進到超過它們在18世紀的水平。農作物產量的增加顯然主要是因為農民轉種了能在每個單位土地上獲得更多糧食和收入、同時又需要更多勞動進行耕種的作物。20世紀初期隨著人—地比例繼續日趨不利而出現的這種轉種農作物情況，可在1904—1909年和1924—1929年這兩段時期內關于種植作物畝數趨向的資料中表現出來，這些資料由J.L.巴克的調查員搜集并扼要地在表5中列出。這些數字說明玉米、白薯和芝麻逐漸代替了作為糧食作物的大麥、高粱和小米，還說明像用來供應上海和天津不斷發展的紡織廠的棉花這類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在增加。不幸的是，1870—1911年期間甚至連這種能說明問題、但不完整的資料也沒有；但是如果這類變化能夠在政治不穩定和內戰不斷的民國初期發生，那么在清末幾十年的相對安定的時期中發生同樣的變化也不是不可信的。看一看1870—1911年農產品的輸出趨勢，便可以找到一些不完整的線索。

表5 1904—1909年和1930—1933年期間作物種植畝數變動趨向



\*指的是上報地方的作物總面積。  
資料來源：巴克《中國土地利用的統計學》，第217頁。

按價值計算，茶葉在1887年前是中國最重要的一項出口物，此后，它即被蠶絲超過。茶葉占總出口值的比率從1871年的54%一直下降到1898年的18%，進而下降到1906年的11%。雖然茶葉出口的絕對數量下降得沒有那么猛，但這種情況的確說明了茶葉種植畝數在本文所討論的40年中沒有增加。生絲和絲織品的出口量和出口值在這40年中都增加了。這說明種植桑樹和櫟樹的土地可能擴大。在華北和滿洲用櫟樹葉來養蠶，蠶的絲織成的柞綢，是一種日益重要的出口絲織品。

從1888—1919年，除了1899年一年外，中國原棉的出口大于進口。這完全扭轉了1870—1887年這段時期（1874年除外）的入超。乍看起來，原棉出口的增長可能有力地說明棉花作物總產量在清朝最后20年中似乎大量增加了。但事實上并不那么簡單。與棉花出口增加一起出現的情況是原棉價格的穩步上漲，同時又從印度和日本運進了價格較低的機制紗。把這三種趨向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出：棉花產量沒有增加或增加到足以滿足國內和出口兩者需要的程度；由此引起的國內棉和紗的較高價格促使紡織業者去購買較便宜的進口貨；國內需要的減少隨之又反過來抑制了增加原棉生產的興趣。

有一種作物在19世紀最后幾十年肯定擴大了種植畝數，這就是鴉片。按價值計算，鴉片一項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國最大宗的進口貨。鴉片和棉制品合起來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占中國總進口的三分之二；至1898年就下降到50%左右。下降完全是由于鴉片進口數量減少（鴉片價值沒有下降，仍繼續上升），雖然棉制品進口量仍迅速增加。鴉片進口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國內鴉片的種植逐步擴大。可惜還沒有哪怕是可以大致計算一下因取代進口鴉片而開始種植罌粟花的土地面積的材料。清末民初鴉片單位價格的顯著上漲是因它的數量減少而引起的市場投機造成的，而壓縮數量是在法律上（如果不是事實上）對它查禁的第一步。鴉片的合法進口貿易在1917年底被取締，但是，查禁國內種植鴉片所作努力的結果，往往隨著在其境內種植罌粟花的地方軍閥的道德觀和財政需要而有所不同。

我們再根據1879—1915年期間出口數量和出口價值的材料來判斷，看來大豆、油菜子、芝麻和花生的種植面積可能大量增加。在19世紀90年代以前，這些商品的貿易是微不足道的。從20世紀初開始，豆類產品和植物油的出口值激增，植物油大部分運往歐洲主要供制造肥皂之用，還向日本出口豆類、豆餅以及植物油。主要的生產和出口地區是滿洲；日俄戰爭后人口從華北向滿洲的流動可能與大豆種植的巨大發展有關。此外，華北查禁鴉片作物的措施促使農民增加種植豆類、芝麻和花生，這樣它們就成了代替鴉片的經濟作物。另一方面，國內的消費形式同時也起了重大的變化，這表明，豆類和油類的新的出口與其說是表示作物的增加，不如說是把原來在國內消費的產品轉用于出口。從19世紀90年代起，煤油進口迅速增加，它代替了較貴的、用以制造照明蠟燭和其他用途的蠟燭的植物油。因此，豆類和油類出口的迅速增加很可能夸大了1900年以前種植的作物種類變化的程度；但盡管如此，巴克的材料有力地說明了從20世紀初期起，這些經濟作物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畝數的確增加了。

只可能對19世紀末典型的一年的主要作物產量作出非常粗糙的估計。光緒版（1899年）《大清會典》中關于耕地面積的材料——經過一定的調整，1887年的官方數字為847760554畝——經細致分析是不完整的，從各個方面說都大大低估了實際種植面積。許多地方的基本測量單位是把不同等級的土地折成統一標準的“財政”畝；1712年以后開墾的一些土地仍未登記；地方權貴的財產在稅冊中一直沒有得到充分反映。也不清楚少報土地的精確數字，但根據巴克在1929—1933年農業調查的結果，把數字往上調整三分之一還是很保守的。這樣，19世紀后期的耕地（我假定它相當于作物種植面積）可能為1130344579畝。還沒有19世紀各種作物種植總面積所占比重的詳盡材料。但是，如果巴克作出的1929—1933年各作物百分比的平均數和中央農業實驗所作出的1931—1937年的百分比平均數因表5所列1904—1909年和1930—1933年期間的變化趨勢而被調整，人們就可能對清朝最后幾十年的狀況作出一個近似的估計。根據這些估計，表6至少可以提供一個關于1900年前后主要作物年估計產量的測算。

表6 1900年前后主要作物的年估計產量



資料來源：巴克《中國土地利用的統計學》，第217頁；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表30，第130頁；表A-9，第300頁。

紡紗業是19世紀后期農村最重要的單項手工業，它的命運將在下一節討論。在比較“發達”的長江下游地區（可能還有廣東省），商業和制造業最為先進，外國貿易的沖擊也最為厲害，那里的外居地主所有制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后幾十年中有所發展，這表現在發跡的商人、掮客和買辦的商業利潤投資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外居地主所有制的特點是：絕大部分的農村上層人物當然不住在他們土地所在的農村中；他們通常住在縣城或村鎮中。這種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是租棧的發展，個別商人（主要是城市商人）通過租棧把他們的土地和佃戶委托給租棧主管理，并在繳清賦稅和各種費用后按比例分得收入。不可能估計出這一現象的規模，但村松祐次所發現的事例足以證明，它至少在江南已經不是偶然的現象了。[[5]](#_5_Jian_Cun_Song_You_Ci___Qing_M)租棧主往往是農村上層（紳士）中的頭面人物，他們能夠求得官府的幫助來收租（甚至可以逮捕和拘禁欠租者）。即使在最講仁愛的儒家地主戶下租佃，農村的階級關系也絕不是作田園詩的合適題目，而19世紀后期的外居地主制則更加苛刻，以致在20世紀時已經變得令人不堪忍受了。

1887年清代的官方土地記錄仍然記載，特別在華北和滿洲，除了民田外，還存在著大量旗田、屯田和皇莊。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滿族統治者企圖把適應滿洲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土地制度強加在被征服的中國的土地制度之上。實際上，到了19世紀后期，除了田賦稅率有差別外，早期的區別差不多已不復存在了。人口的增長、微薄的官俸以及土地私有這一中國基本制度的壓倒一切的影響，這三者合起來的影響實際上幾乎把各種各樣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統一起來了。旗地與民田一樣，也分成被漢族佃戶耕種的分散的小塊土地，它們通過種種花招而被自由地租賃、抵押或買賣。

一般地說，某種形式的官地、租棧地和民田通常并不像連成一片的地產那樣雇傭農業勞動力來耕種。“資本主義”的商業耕種方式依然少見，這是晚清農業的幾個特征中的第一個，我在前面已經列舉了幾個變化，但這個特征保持不變。可以舉出在整個19世紀中官吏、富紳和壟斷商人擁地超過一萬畝的例子，但擁有這樣大的產業畢竟是很不尋常的。晚清中國的土地所有是不平均的，但比得上歐洲和亞洲其他地方的大地產或者美國的大牧場和商業農場的農業地產的卻很少。土地擁有者通常包括從在華北擁地大約二三十畝和在南方擁地12—15畝的自耕農起，直到一般擁地也許100—150畝的大約200萬戶縉紳家庭止，后者的大部分土地通常租給佃戶耕種。[[6]](#_6_Guan_Yu_19Shi_Ji_Tu_Di_Zhan_Y)與20世紀一樣，租佃在南方（“產米區”）要比北方（“產麥區”）普遍得多；又像以后幾十年那樣，也許有50%的農戶可以定為佃農和部分自耕農。在遭受長期饑荒的區域和在大商區中心附近的地區，可以看到租佃關系日益增加的某些跡象，但是足以說明在清朝最后40年中土地使用形式發生激烈變化的證據還很少。

地租以貨幣或實物繳付；如果繳實物，地租一般為主要作物的50%。19世紀80年代上報的現金地租每畝從0.6兩到2.66兩不等，這接近當地地價的5%—10%（參照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它算出20世紀30年代的平均現金地租為地價的11%）。這表明在扣除賦稅和其他費用后，土地投資的回收率雖然在政局穩定時還比較保險，但它還只是商業或放債回收率10%—20%的一半。這種較低的回收率很可能限制了使土地所有制日益集中的任何趨勢。租佃的真正負擔在于地租以外租佃契約中的其他規定。可以找到19世紀時期契約中規定條件較好和較差的個別事例（表現在勞務、短期租借和地租押金等方面），但我們還沒有系統的證據作為根據來斷定，19世紀后期的狀況是愈來愈壞，而不是無數窮人在維持著悲慘的生活現狀。

村松教授發現，在1905—1917年期間地主租棧的地租收入激增，這個證據的確提醒了人們，地方上層人物能夠把王朝最后10年因增加稅收而產生的負擔轉嫁給佃農。這些增加的稅收（詳下）在各省征收，因為要籌集庚子賠款的資金。由于有權勢的地主歷來能夠逃避他們按比例負擔的普通稅賦定額（最常見的方式就是不繳或只繳一部分“附加稅”，這種稅隨著時間的推移，已加在名義上的田賦定額之中），所以很可能自耕農和大地主的佃戶最后負擔的增稅中的那一部分會高得不成比例。

最突出的事實是，農業制度自始至終穩定，而不是偏離傳統的標準而上下波動。這種平衡被維持在構成中國人口80%的絕大多數農戶所過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不但有水災、饑饉、疫疬等危害肆虐，而且還缺乏廉價的大規模運輸工具和有效的中央政府，后者本來是可以在余缺地區之間調劑資金和糧食的。很少農民能夠現實地指望過得比其父輩和祖輩更好。但在聲勢浩大的太平軍起義和捻軍起義之后，再沒有大規模的農民叛亂來威脅清政府或紳士統治的農村社會了。有人可能會提出，缺乏巨大的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運動這一事實（遍及各地的秘密會社的作用是不明確的，它往往被地方上層人物所控制或與他們合作）可以作為一種跡象，來說明“中興”和“自強”雖然不能有效地鎮壓反王朝的民族主義和抵制外國的政治和經濟侵犯，但在撲滅國內傳統的反抗形式這一方面卻是很有效的。狹義地說，農業組織和土地利用形式的穩定，與其說是政治保守的結果，不如說是當時掌握的技術和支配民眾的社會價值觀這兩者限制的結果。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擁有巨大地產的情況并不普遍。另外，由個別農戶（自耕農或佃農）實際耕種的土地平均面積是很小的；超過一定的限度，較大的土地所有者寧可出租其多余的土地，而不愿雇工來耕種。20世紀的材料表明，農戶的大小和耕種規模相互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這表示每人耕種的面積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小塊耕作更因以下這一事實而情況不妙：農田容易被分割成若干通常是不同性質并且互不相鄰的小塊土地。農田的大量邊緣土地被浪費，過多的勞動時間用于在小塊土地之間來回奔波，合理的灌溉措施也受到了阻礙。大地產的罕見、小塊的家庭農田以及典型的土地的小型化，都是傳統繼承習慣——特別是沒有長子繼承權——造成的部分結果。因為紳士和農民都一樣，在一家之主死亡后，通常由活著的兒子平分家產，他們普遍自立門戶。分家的活動可能在一代甚或一代以上時期內被抵制，但是縉紳之族幾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常常敵不過不可避免的糾紛。因此，就像原始森林一樣，盡管個別樹木成長、成熟和老朽，森林卻繼續蔚然在農村蔓延擴大。農田小塊化顯然是幾代人連續把幾種差不多大小的土地（稻田、山地、果園等）分給繼承人的結果，這些土地原是他們父輩農田的一部分。

即使在分家之前或以后擁有大塊土地，這也并不意味著把它作為一個單位來經營。地方縉紳之家只雇勞動力來耕種他們的一部分土地。除了農村信用機構不足，管理技術水平低下和經濟作物市場不穩定外，從直接耕種而不是從收租獲取更大利潤的土地的數量也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現存耕種技術大量而又不均勻地需要勞動力造成的。大量雇傭農業勞動力的潛在雇主面臨著高昂的監督費用，并且從非本戶勞動力（被集約使用，但只在農忙季節才如此）那里取得的收益也在減少。只有改良的種子、較好的肥料和擴大的灌溉才能使供應遠地市場的大規模耕作站得住腳，但這些重大的技術改革并沒有發生。

因此，在清朝最后幾十年中，中國經濟的農業部門以這樣一個混合因素為特點：土地和資金不足，過剩的勞動力產生的收益有所減少。但是，如果盡量不用長期的眼光來作任何中期的觀測的話，可以說農業仍處于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中，并沒有內在的經濟理由可以說明它本身不能再繼續生產。那么多的人口和上層階層中那么高的文化得到供養和維持（雖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確實很低），這要歸功于傳統的技術。許多世紀以來，以大量人力通過建設梯田、灌溉和防澇排水等手段來改造土地而進行的基本投資，也許早在17世紀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頃的大米產量達到2.3公噸。這個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它代表現代以前農業技術（即在當時還沒有大量輸入改良的種子、肥料和殺蟲藥等物品的情況下）理論上的最高產量。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每公頃大米產量平均只有2.47公噸，在1955和1956年至1960和1961年的時期只達到2.54公噸。在后一段時期，印度的產量還沒有超過1.36公噸[[7]](#_7_Jian_Shi_Chuan_Zi___Ya_Zhou_R)。但在穩定和停滯之間的區別是很小的。傳統農業的平衡是在每人平均產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產量的很大一部分被農業生產者自己消費掉了。只有少量供應市場的剩余可用作工業原料或供給非農業的部門。反過來，城市產品的實際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廣泛工業化的直接可能或農業發展的直接可能，都被農業部門的無能緊緊地束縛住了。

## 手工業

當今一些中國史學家說“外國資本主義”從19世紀中期起在逐漸“摧毀”和“剝削”國內的手工業，這個過分簡單化的指責與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經濟實際情況不符。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即使在據說是受“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之害最深的紡織工業方面，61%的國產棉布（以平方碼計算；如果以碼為計量單位，應為73%）仍是手工織成的[[8]](#_8_Yan_Zhong_Ping____Zhong_Guo_M)。任何人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湖南或四川農民穿的是日本的內外棉公司出的棉布，抽的是BAT牌紙煙，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么他就有一個手工業是否受摧殘和剝削的大問題需待證實。在1933年，手工業估計達到工業總產值的68%。1870年或1911年的手工業比重當然比20世紀30年代更大，因為1870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小型近代工業部門開始發展之前，1911年是在其早期階段。某些重要的手工業，特別是紡紗業，在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產量急劇下降。可是不論從理論或從實際情況看都有理由認為，手工業的國內需要和出口需要的總產量在20世紀并沒有下降；更有理由認為，整個手工業在1870—1911年期間并沒有受到嚴重破壞。但反駁這些最粗淺的公式化的指責并不是否認手工業部門在這40年中所發生的重大的結構變化，也不是否認由于這些發展而出現的緊張和失調對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的影響。

19世紀中期中國的手工業生產是在絕大部分設于城市、但也出現于農村的手工業工場中進行，或在城鄉的個體戶中進行。這兩種形式的手工業的區別有時是很武斷的，例如農民織布者除了用家中的勞動力織布外，也可能積累足夠的錢購買幾臺織布機，再雇勞動力操作；又例如城市工匠也可能同樣雇傭非親屬雇工來碾米或軋棉以補充家庭勞動力的不足。“手工業工場”是那時尚未配備動力機器的規模較大的工場。這些企業基本上擺脫了一家一戶的格局而使用幾個戶的勞力，它們包括諸如四川的鹽井和制鹽業、云南的銅礦、江西景德鎮那樣的瓷窯、遍布全國各城市的米麥碾坊，以及江蘇的棉布上光和印染業。不可能對這種超出一家一戶的制造業的絕對規模作出估計，在以后也不可能。[[9]](#_9_Peng_Ze_Yi_Bian____Zhong_Guo)但毫無疑問，它不論在雇傭方面或產量方面，都遠不能與個體戶手工業生產分庭抗禮，后者或是中國農村農民的副業，或是城市或半城市工匠全日進行的活計。

中國農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業是紡紗和織布。由于家庭手工業在清末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將先比較詳細地討論棉紡織手工業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手工業生產的歷史一般可以根據棉紡織業的命運來衡量。從元代起，棉花的種植和制造業迅速發展；除了豪富之家外，棉布成了一切人衣著的主要日用品。雖然種植棉花的地方相當廣泛，但主要的產棉區仍在長江流域各省。正是在這一區域，棉花手工業最為集中并且高度發展。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大片地區種棉花比種糧食更為合適，而且江蘇省比較潮濕的氣候，可以紡出抗張強度較大和較均勻的紗來。例如，從江南和湖北沙市的周圍，大批成包的原棉和棉織布匹經由水路和搬運工人肩扛被運到滿洲和華北，或者經過長江被運往四川，還有大批被運往西南的云貴以及南方的沿海各省。對江南的農民來說，他們把生產資源集中在植棉和織布（以及紡織布所需的紗）方面，比由他們自己把所種棉花全部紡成棉紗更加有利可圖。因此中國各地出現了農村家庭在不同程度上用長江流域各省供應的棉花和本地原棉紡紗供自己消費的情況。本地織的土布補充了湖北和江南棉布的不足。

但是，只有在主要產棉區的棉紡織手工業生產，才發展成了不僅僅為附近的本地市場服務的大工業。例如從湖北南部從事織布的地方，農民織布者或小商人把布帶到沙市每天開放的布匹市場出售。批發商在這個市場上購布，按質分等，并給每種等級的布匹貼上名牌標簽（商標），這表明是行銷云貴市場的商品被公認的質量保證。湖北的布匹經過四川運到云南北部，其路線是首先利用長江及其支流的水路；然后由夫子扛運，這些人扛的貨多達117匹，重220磅（原文如此）；最后在云南山路使用馱畜馱載。到達貴州的路線主要是經過湖南，利用洞庭湖及入湖的沅江。按照當時的標準，不論在規模上或所經路程的距離上說，這不是小買賣。到了1895年，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變化，那時有20萬包以上的原棉和30萬包以上的布匹每年運進四川，其中大部分是從湖北運來的。每年從沙市運到云南北部的布匹約有320萬匹。同樣，廈門以南的中國、華北和滿洲則主要由江南供應。此外，大量手工織的棉布從廣州運往英國和美國。在1831年以前，英國每年購買的“本色布”（南京和長江下游其他地方織的布）多于它售給中國的英國制布匹。

大部分產棉區的紡紗與織布是由農村的個體戶進行的，其中少量幾乎是全日紡織，但更常見的則是由農戶在主要賴以為生的糧食生產之外進行。棉紗或是由農戶紡出，或是與購買農民棉布的商人交換而得。占地極少的貧苦農民的手工紡織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大于較富裕的農民的這項比重。例如，小農戶一般在織布以前自紡經紗，以彌補它們微薄的農業收入。但對整個產棉區來說，要維持稠密的農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就非依靠原棉和棉布的市場不可。棉布的上光和印染往往集中在同時也是制成品分配中心的集鎮和城市。最后的制作過程常常被較大的布商控制，由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他們一般在這些商人擁有的“手工業工場”干計件活；或者在包頭所有的“手工業工場”干活（如在蘇州），工人每月向包頭繳付計件工資的一部分，作為使用廠房和設備的費用。總的說來，在19世紀最后25年以前，布商對織布業沒有實施類似的直接控制，織布通常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由農戶自己進行。在城市，手工制造業仍在比較嚴格的行會監督之下；占統治地位的工業組織形式是個體熟練工匠，而不是手工業工場。

鄭觀應這位不同一般的買辦對19世紀后半期手工棉紡織業發生的變化作了如下的描述：

“如棉花一項產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北各省者絡繹不絕。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質美，相率購用，而南省紡布之利半為所奪。迄今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0]](#_10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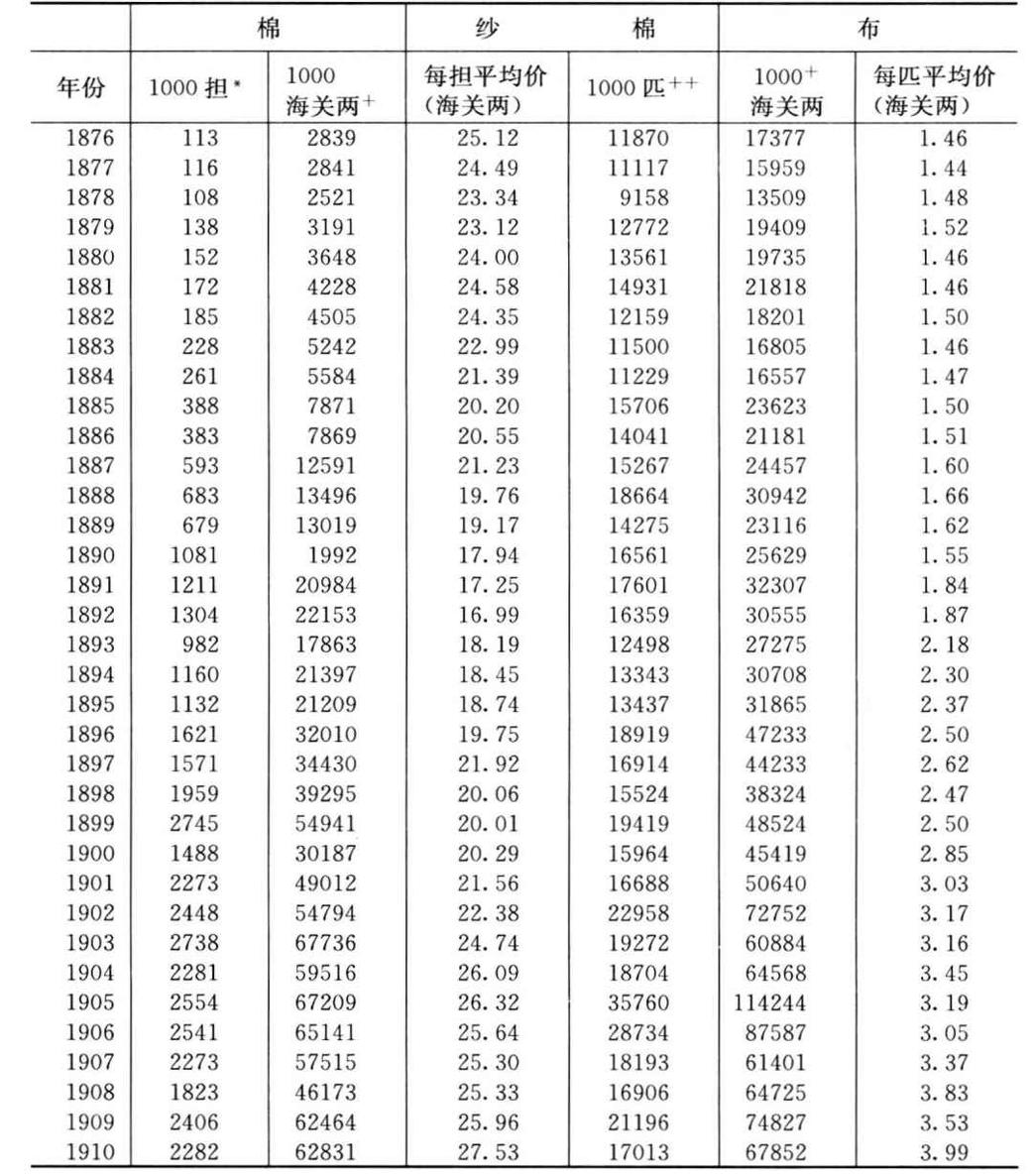
19世紀末年在中國的外國商人和領事官員讀到鄭觀應對其同胞所作的危言也許會一笑置之：因為恰恰相反，他們連篇累牘地在報告中抱怨難以打入中國市場，特別是內地各省的市場。外國商界特別指出了外國人所受的內地居住權的限制和厘金過境稅的負擔。但是領事中的有識之士則認識到，手工織布業的力量是阻止每個中國人穿蘭開夏棉布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鄭觀應和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各有對的一面。在1858—1860年條約增辟了包括長江三個埠的通商口岸后，進口的洋紗和洋布開始大量增加。由于新取得了在中國內地的航行權，新的過境制容許加征外國貨進口稅的半數以代替厘金稅，1869年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又降低了從歐洲來華的航運成本，這就使棉紗棉布進口數量的增長又得到了動力。表7列出了1871—1910年期間進口棉制品每年的數量和價值。在1871年，棉紗和布匹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在以后的幾年它們也圍繞進口總值中的這個比重升降，但從19世紀80年代直到1920年（進口值最高的一年），進口的棉制品大幅度增加。如果把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這兩個年代的年平均進口量進行比較，棉紗的進口量增加24倍——從97451擔增至2363000擔。1913年以后進口量開始下降，因為國內的機紡紗逐步代替了進口紗。雖然棉布的進口值除1898、1899和1903年外都超過了棉紗的進口值，但它的增長并不像棉紗那樣驚人，在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這兩個年代之間只翻了一番，從11463010匹增至21442000匹。但布匹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前確實不斷增長，只是在南京政府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時才急劇下降。自相矛盾的是，在滿洲王朝最后40年棉紗進口方面取得的成績，竟間接地成了使棉布進口同樣迅速發展的主要障礙。棉紗的進口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表7 1871—1910年進口棉布和棉紗的數量和價值



續表



\*每擔重133.33磅。  
＋海關兩在1874年開始使用；1871—1873年的數字是各地海關報表所列銀兩折算成海關兩的估計值。  
＋＋每匹的規格不等，但一般為40碼長，36英寸寬；以打或碼計算（還可能有1%或2%以平方碼計算）而不是以匹計算的棉制品未包括在本表。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材料》的表四和表九；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22—1931年》第1冊，第113、182頁。

表7所列每擔進口紗的平均價值和每匹進口布的平均價值顯示了紗價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幾乎到19世紀末的下跌趨勢。布價在70年代也下跌，但從80年代后期開始回升，并且回升得比后來紗價的漲勢更厲害。出現較便宜的棉紗的主要原因是孟買紗廠的產品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市場，它代替了較昂貴的英國棉紗。從19世紀90年代起，除印度棉紗以外，流入的日本機制棉紗越來越多。紗價是逐漸下跌的，下跌時間約有20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在1871—1910年的整個時期，海關兩本身的黃金價值也在逐步下跌。

雖然進口的機制棉紗逐漸便宜了，中國的原棉價格卻在上漲。原棉價格上漲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紗廠出口的結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和以后中國近代紡織工業驚人發展時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長，也增長得很慢。一方面，支離破碎而且技術落后的農業部門對出口需要的迅速反應能力有限，同時較廉價的洋紗本身的進口減少了對手工紡的土紗的需要，這樣就降低了農民增加原棉種植面積的積極性。蘭開夏的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在1896—1897年報告說：“與土棉工業有關的一個最奇怪的現象是，和其他農產品相比，原棉價格高昂。”[[11]](#_11_Bu_Lai_Ke_Ben_Shang_Hui____1)手工業織布者越來越多地用進口的機制紗，至少把它用作經紗，有時也把它用作緯紗。

在19世紀70和80年代，華南，特別是廣東，是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它吸收了總進口量的一半以上。但這個比重穩步下降至棉紗總進口量的五分之一。到19世紀90年代，兩大地區：即一為華北和滿洲，一為長江中、上游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云南和貴州，這三者各吸收總進口量的30%左右，成了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手工棉紡織業集中的江南地區每年吸收棉紗進口量的10%左右，不過逐年上下擺動的幅度很大。很明顯，進口機制棉紗的主要市場就是棉花種植和手工業最不發達的地區。廉價的進口棉紗使過去從江南或湖北購買棉布或較貴的原棉的那些地區的手工織布業的經濟發展有了可能。產量很低的那種手工紡紗業衰落了，而用進口紗制的經紗和本地緯紗織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區同純手工紗織的布以及外國布匹競爭；例如在那些地方，據報告說：“印度棉紗正在扼殺當地僅有的一些棉花種植業，而印度棉紗一旦織成棉布，就打擊了土布，還程度較輕地打擊了進口的灰襯衣布。”[[12]](#_12___Bu_Lai_Ke_Ben_Shang_Hui_Fa)

所以洋紗流入量增加的最明顯的后果，就是原來在19世紀上半期集中在主要產棉省的手工織布業向各地分散。雖然較老的織布中心在一開始就受到了打擊，但它們為了在原來的市場上競爭，也不得不采用機制紗。從19世紀90年代后期起，日本紗在沙市和漢口地區開始被大量用作經紗。雖然進口棉紗沒有在江南獲得巨大市場，但江南的手工織工在20世紀初期成了上海日益發展的棉紡廠的產品的主要購買者。此外，機制紗的采用加強了整個手工織布業。用進口紗和手工紡紗混合織成的布在價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別適合當時的中國市場。使用國產原棉的家庭紡織業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仍占重要的地位，但相當大的一部分在市場出售的紡紗首先被進口紗代替，后來又被通商口岸的華資和外資紗廠的機制紗代替。

雖然織布業主要仍是個體戶手工業，但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工業組織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現。由于有了較便宜的機制紗的供應，有了能提高織布者日產量的改進的木質織布機和從日本引進的鐵齒輪織布機，這些變化加快了。有一份計算材料記載，在1899—1913年期間共創辦了142家手工紡織工場，其中69家設在江蘇省，以上海制的棉紗供應它們，15家設在山東，14家設在直隸（河北），9家設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廣東各設7家，6家設在湖北，4家設在滿洲，3家設在浙江，1家設在貴州。表8說明了這些工場的規模和設備。

有一種轉手的織布形式，布商把棉紗貸給其中有的已經不干農活的農村織布者，由他們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樣織布，計件取酬；這種形式在許多地方與自己經營的農村織布者一起得到發展。還沒有材料可以說明這種貸放制度的實際規模，但在直隸（河北）的高陽和寶坻、山東的濰縣和浙江的硤石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例子。在前三個例子中，貸放的方式從20世紀第一個10年直到20年代中期發展得相當快。它特別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及其后不久，但隨即急劇衰退。對那些不能再依靠農業收入來緩和需求動蕩不定的沖擊的人來說，這類農村織布業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職業。它是一種為非本地市場生產的工業，缺乏對不可避免的變化作出反應的近代組織和財政設施。

表8 1899一1913年創辦的142家手工業織布工場中有關資本、織機和工人數字



資料來源：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1840—1949》第2冊，第369—37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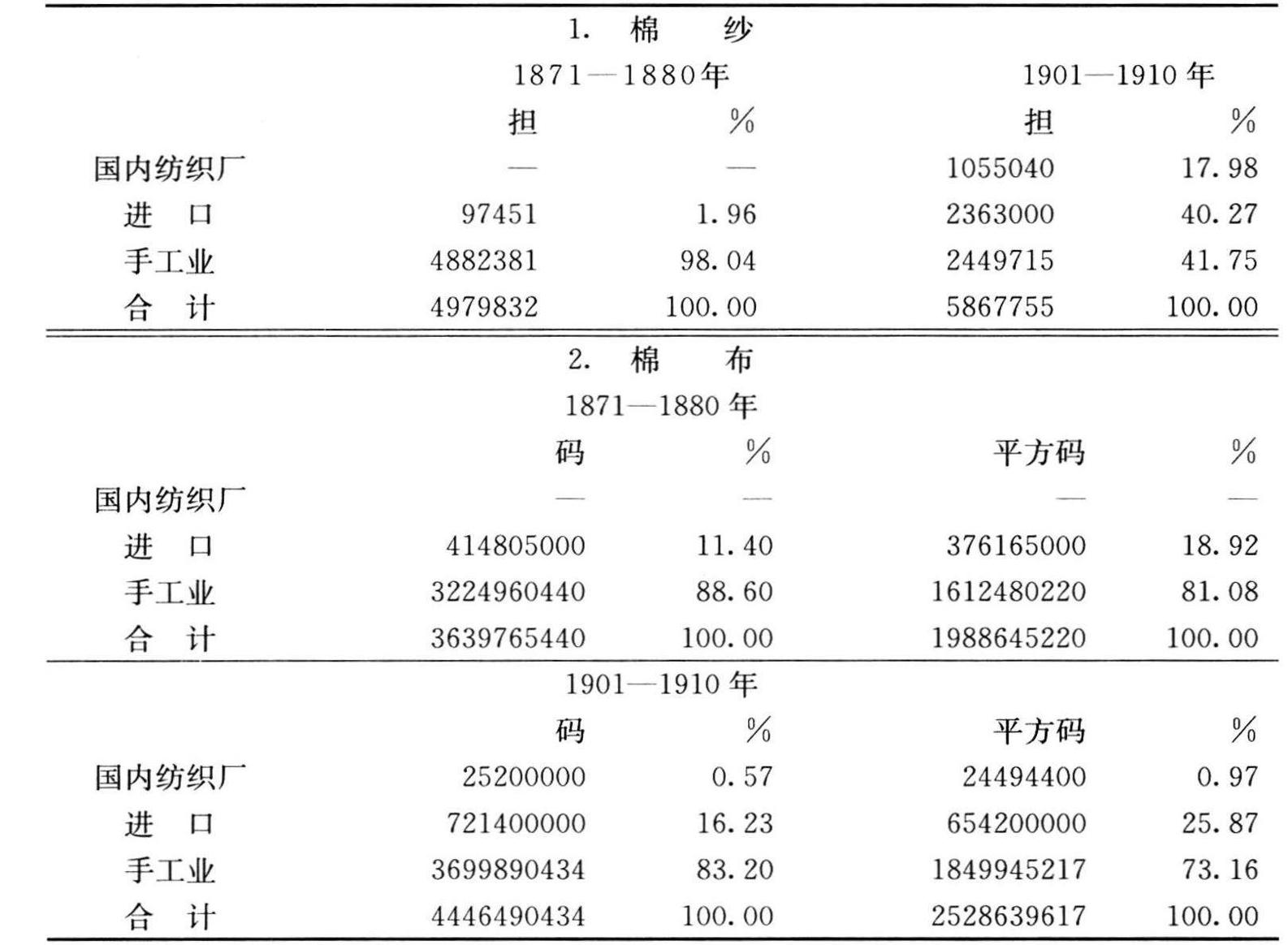
棉布進口的增長速度比棉紗慢得多，這主要是手工織布業的規模和力量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談過，手工織布業因采用了機制紗而得到加強。相對地說，農村地區很少使用進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銷售對象是城鎮較富裕的工匠和商人。駐廈門的英國領事在1886年報告說：

“在18個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千千萬萬下層中國人不穿洋布而穿土布，這個事實早已人所周知了。經詢問一個中國人原因何在時，他回答說：窮人穿土布衣服，因為這種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為它不那么容易穿破，還因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為什么土布比較暖和？他說，因為織土布用的紗與洋紗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因此，當一個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時，工人、農民、腳夫和船夫會對一套較粗糙的、但事實上質地較好的衣服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一定會心滿意足。”[[13]](#_13___Sha_Men_Ling_Shi_Qu_Guan_Y)

機制經紗和手工緯紗結合起來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與外國布匹競爭的、甚至更好的棉布。布萊克本訪華團承認：“毫無疑問，普通襯衣布正在被用進口紗織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對此我們似乎無能為力。”[[14]](#_14___Bu_Lai_Ke_Ben_Shang_Hui_Fa)

根據1871—1880年原棉的年平均產量為700萬擔而1901—1910年的數字與此大致相同這一假設，我曾試圖計算在這兩個10年中年平均消費的紗和布的數字。表9扼要地列出了這個計算。從表上馬上可以看出，棉紗的總消費量從第一段到第二段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了。但是在第一段時期幾乎占壟斷地位的手工棉紗不但在絕對數字上，而且在占棉紗總供應量的比重上，都急劇下降。產量下降了240萬擔，這樣，手工棉紗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產量只有1871—1880年年平均產量的一半。手工棉紗占棉紗總消費量的比重從98%下降到42%。手工棉紗被國內的和進口的機制棉紗代替。在第一段時期，中國還沒有建立近代的紡紗廠，但到1901—1910年期間，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華資紗廠和外資紗廠生產的棉紗將近棉紗總消費量的18%，按絕對數字計算，這個產量約等于1871—1880年到1901—1910年棉紗消費量的增加總數。但遠為重要的是，1901—1910年進口紗的增長數量幾乎與手工紗產量相等。進口紗從1871—1880年占總消費量的2%增加到1901—1910年的40%，按絕對數字計算，后一段時期是前一段時期的24倍。

表9 1871—1880年和1901—1910年棉紗棉布消費量的估計數字



資料來源：費維愷《1871—1911年中國手工業的和機制的棉紡織業》，載《經濟史雜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第338—378頁。

布的總消費量，不論按碼或是按平方碼計算，也都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加。國內織布廠的產量在1871—1880年還等于零，在1901—1910年也依然微不足道；大發展只是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才出現。進口布匹雖然從第一段時期到第二段時期有所增加，但與進口紗比較，增加的程度并不顯著。1871—1880年的年平均進口布為棉布總消費量的11%（碼）和19%（平方碼），而在1901—1910年的年平均數分別增加到16%和26%。與進口紗數量的顯著增加形成明顯對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織布從前一個10年到后一個10年這段期間，在外國競爭的面前頑強地堅持下來了。

手工織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織布的絕對數量從1871—1880年每平均年度的32億碼增加到1901—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億碼。這一增長是值得夸耀的，它顯示了手工織布業的力量，但如果沒有洋布進口的話，肯定會增長得更多。許多過去以紡紗為副業的農民無疑轉到了織布業，以代替他們失去的活計；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紗減少了240萬擔以致無活可干的勞動力與因手工織布增加了6億或7億碼而吸收的勞動力相比，即使最寬打寬算，也只能容納無活可干的勞動力總數的10%—20%。因此人們必然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在紡紗業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區的農戶中，許多家庭或是不能在城市中為它的某些成員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產和經濟作物的上市量。對他們來說，收入和支出之間一貫不穩定的平衡從根本上被動搖了。

這當然是我在本節開始時提到的關于“外國資本主義侵入”這一指責的一個起因。作為農村收入的一個補充，再沒有其他手工業像棉紡織業那樣重要了。雖然其他許多手工業在19世紀后半期還保持原狀，或者有所發展，但是由于手工紡紗業肯定無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腳的主張，說整個傳統的手工業部門被外國的進口貨和本國工廠的制成品破壞了。還有第二個論據有助于說明為什么這個指責有時帶有尖刻的語氣。這個論據是，外國資本主義不但摧毀并剝削本地的手工業，更應受譴責的是，它還使應該發生的標準的進程中斷了；按照中國人對馬克思關于歐洲資本主義理論的理解，這個進程應從個體戶的商品生產經過手工業工場發展到現代工廠工業。在中國，手工業工場和貸放制度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阻礙，以致它們不能作為向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關鍵性的中間階段而起到據說在歐洲已經起過的作用。在中國，手工業工場只有在外國資本直接或間接地促使現代工業產生以后，然后又只有在成為機械化工廠的助手的情況下，才大量出現了——有證據證實這一事實，雖然不一定支持對此事實的解釋。因此，在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期的中國，手工業和近代工業都屈從于外國資本主義。[[15]](#_15_Li_Ru__Jian_Fan_Bai_Chuan)

有些不能與進口貨競爭的手工業，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鋼鐵生產，到19世紀末幾乎已經消失。在1870—1911年的整個40年或其中一段時期，其他手工業有了發展，以滿足出口的需要。從1887年生絲代替茶葉的地位時起，生絲就成為最重要的一項出口貨。雖然絲占總出口貨的比重下降，但它出口的實際數量在整個時期卻增加了。有些生絲是在蒸汽繅絲機上卷繞的，1899年其數量占絲總出口量的40%。蒸汽繅絲的發展比較晚，只是在20世紀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繅絲機的生產無論如何也不能說與手工業工場的生產有什么區別。山東芝罘海關的稅務司在1912年報告說：

“抽繅滿洲野生蠶繭供出口之用的繅絲業是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它在70年代引進后已經大為發展。蒸汽繅絲廠現已有三家，至今證明并不成功；但洋式的腳踩繅絲機早已被普遍用來代替手搖繅絲車，效果極佳。1911年有40家繅絲廠在營業，它們雇傭1.4萬多名工人，年產絲14000擔。沒有關于操作過程的改進可供記載。”[[16]](#_16___Hai_Guan_Shi_Nian_Bao_Gao)

一份對當時文獻進行初步調查的材料記載，在1892—1913年時期，至少有415家手工繅絲廠，主要分設在廣東、四川和山東等省。[[17]](#_17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絲織業全部使用手織機，它是華中和華南的主要工業。絲織品從19世紀70年代起相當穩步地在增長，直到20世紀20年代開始感到人造絲的競爭時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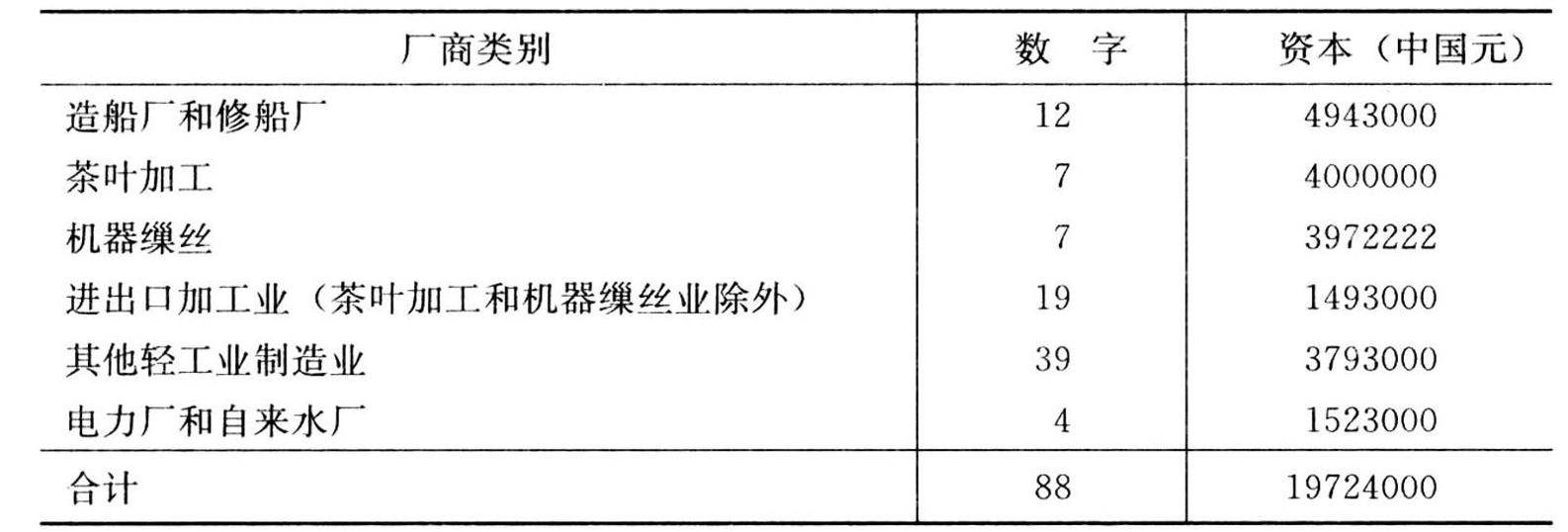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手工進行的茶葉加工業很可能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發展到最高峰，從那時以后，在開辟通商口岸后穩步增長的中國茶葉出口量銳減。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錫蘭茶的競爭造成的；與中國不同，它們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生產的，出口商有足夠的力量控制生產以保持質量標準。只有茶、絲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但是在當時的著作中未見到關于晚清時期國內需要量下降的記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談到的人口增長，也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因此如果把蠶絲出口取得的相對成就與先發展然后又下降的茶葉出口一起進行考慮，雖然不能說手工業有了新的興旺氣象，但可以同樣有力地反駁關于手工業在滿洲王朝末期發生致命危機的任何假設。

在較大的手工業中，榨油、碾米、土法采礦和絲織等行業在19世紀受到進口的和本國的機制品的影響很小。手工的榨油工場實際上從19世紀90年代起開始迅速發展，這是為了滿足歐洲肥皂制造商對豆油的需要以及日本對大豆、豆餅和豆油的需要。照明用的植物油從19世紀90年代起逐步被進口煤油代替。像制造爆竹、扇子、竹制家具、中草藥和農具之類的次要手工業的商品，因為沒有進口貨代替，所以根本沒有受影響。在通商口岸中，用從日本進口的腳踏軋花機軋花以供出口的手工業工場有了發展。還有幾種新工業發展了，例如在手工業工場進行的棉織品制造和火柴生產等行業。在剛入20世紀之際，手工業的發展大部分以設在城市的手工業工場的形式出現。除了前面討論過的織布業有組織的原料貸放形式外，在農村還沒有可與之相比的新的發展。因此在19世紀過程中，被剝奪了大部分紡紗收入的這些逐漸增多的農村人口，也許越來越會看到家庭中有一個或幾個成員離家去城鎮的工場、工廠和店鋪當臨時工或長期工的情景。不過在1911年，這仍是一個次要的趨勢。

## 近代工業

甚至關于19世紀末期逐漸出現的小型近代工業部門的計量材料，能夠搜集到的最多只是一些大概的近似值；例如，在1912年前有關產量的資料幾乎完全沒有。這種情況是令人驚奇的，因為：這些企業主要設在通商口岸；它們或者是外國人辦的，或者在當時是新興事物（如果企業主是中國人的話），所以在英文報刊上都有記載；它們也在創辦許多近代工業的清朝官員的著作中有所反映。最近期的、也許是迄今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計告訴我們，1895年以前在中國創辦了103家外資企業，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它們和下面將要討論的華資企業與手工業常見的差別僅僅在于前兩者使用了動力機器。嚴格地說，按照條約規定，洋人辦制造業是不合法的；但這種制造業仍大部分存在于上海的外國租界內，一小部分則設在其他通商口岸。在19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政府并不干涉這些外資小工廠的建立。但是當李鴻章和其他官員開始提倡他們自己的制造業時，他們能取得北京的支持去阻止洋人進行像棉紡織廠之類的大的冒險活動，直到1895年止。這些外國工廠在1894年的估計數和資本列于表10。[[18]](#_18_Ben_Jie_Suo_Lie_De_Tong_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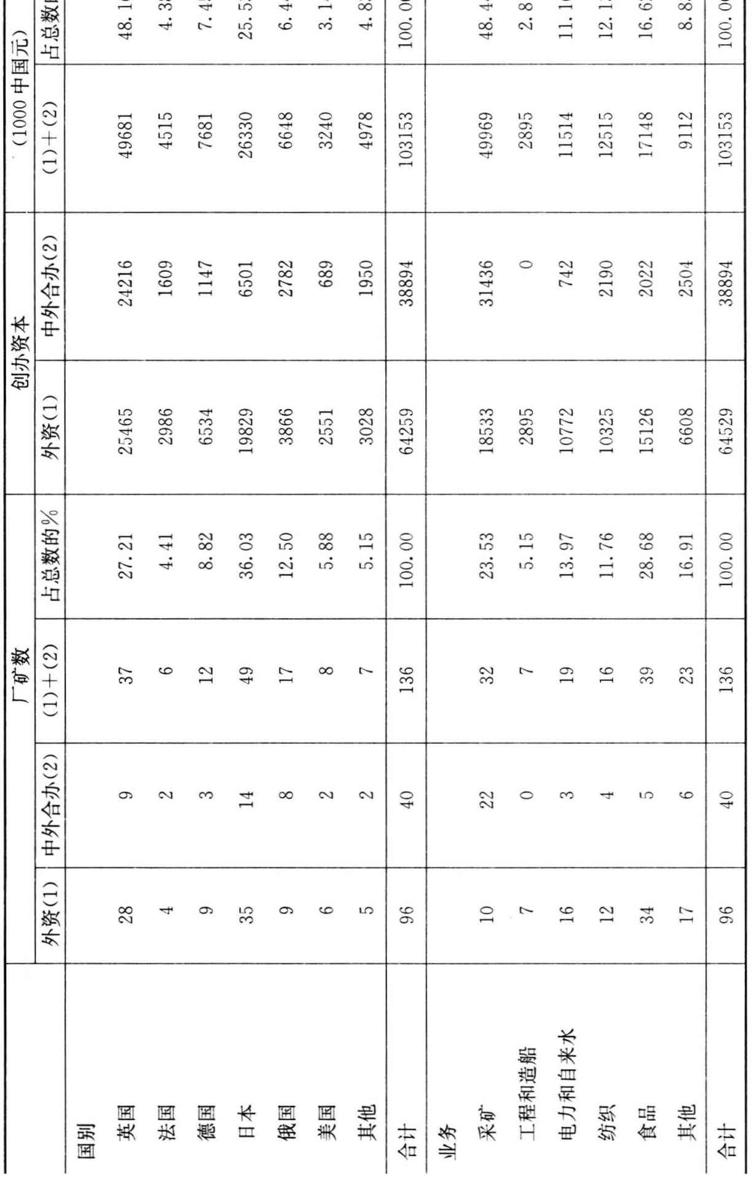
表10 1894年外資工業在中國的估計數和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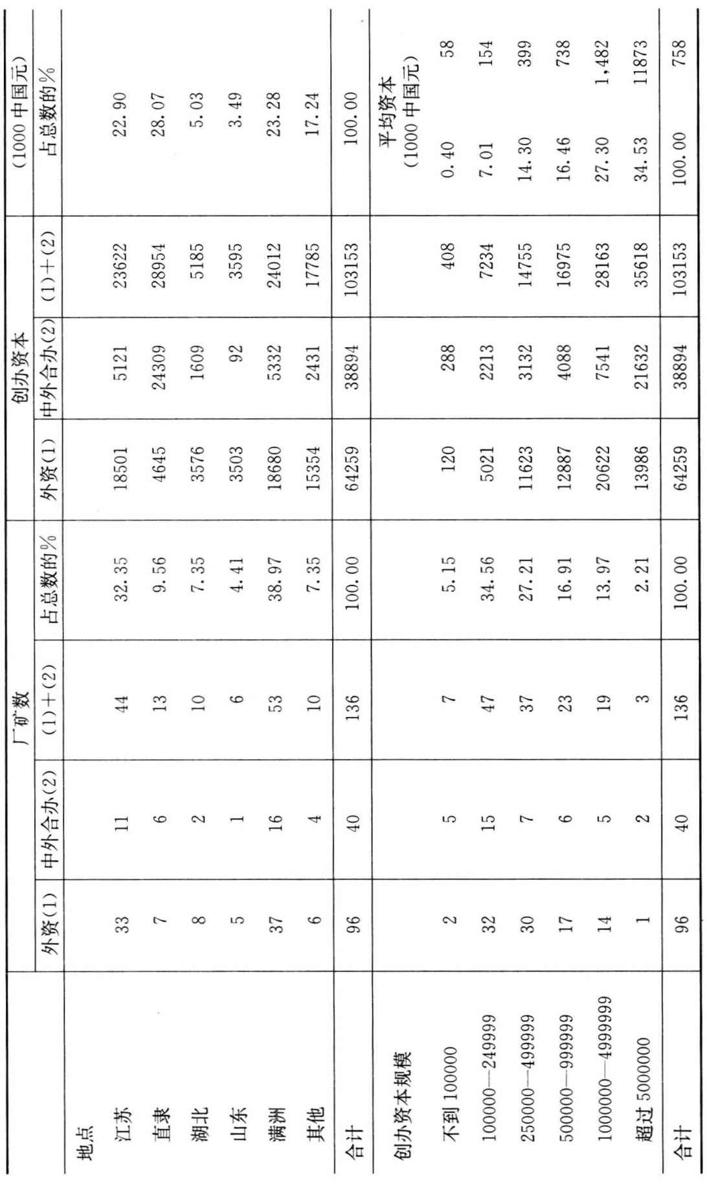
\*包括少數總號設在香港的企業。  
資料來源：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第1冊，第242—247頁。公認是根據不完整的材料編制的。

從1895—1913年，隨著《馬關條約》使通商口岸的外國工業合法化后，至少又有136家外資制造業和采礦企業建立，它們創辦時的資本投資額都超過10萬中國元。這里面包括了40家中外合辦的企業，它們出于一切實際需要，由外國人控制（所有外資的礦不管其資本多少，都包括在上面的數字內）。這些企業創辦的資本總額為103153000中國元，它們的幾個特征分別表現在表11中。英、法、德、俄等國的企業開設的時間在這20年中分布得相當均勻，可是日本的企業除了兩家以外，都是在1904年和更晚的時期開設的，這證明了日俄戰爭以后日本對滿洲的經濟滲透日益加劇。煤礦是投資的最大目標，英國則是最大的投資者。中外合辦的采礦業所占的高比重反映了清政府的開礦章程的影響，在1902年以前它規定在任何采礦業中華人投資者必須提供資本的30%—50%。在32個采礦企業中，有9個是英國人的，資本共達3793萬中國元，而這個行業的總資本為4996.9萬中國元，前者占后者的比重與占英國在（中國）工業中的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相當。英國和日本包了整個“工程和造船”行業，在其他各個行業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兩國企業占全部136個企業中的86個，資本占總創辦資本10300萬中國元中的7600萬中國元。除了煤礦主要位于直隸省和滿洲外，這些外資的和中外合辦的企業集中在上海、北方的通商口岸和滿洲。從1906—1913年，包括采礦在內的53個企業在滿洲開辦，大部分由日本人投資。136家企業的平均創辦資本為75.8萬中國元。

表11 1895—1913年設在中國的外資廠礦和中外合辦廠礦的國別、業務、地點和創辦資本的規模



續表



資料來源：根據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一冊，第2—32頁計算。

關于清末中國人辦的制造業和采礦業（除去上面所列的中外合辦企業）的材料，甚至更不令人滿意。第一類，有大約19個官辦的兵工廠和造船廠，其中最大的設在上海（由曾國藩和李鴻章在1865年建立）、南京（1865年李鴻章建立）和漢陽（1890年張之洞建立）。除了制造彈藥和少量輪船外，官辦兵工廠一般都有生產和修理工具、零件的機器車間。其中幾個廠還訂有訓練技術人員的計劃，并且像上海洋炮局的譯館那樣還為19世紀后期學習科學和工程的中國學生編譯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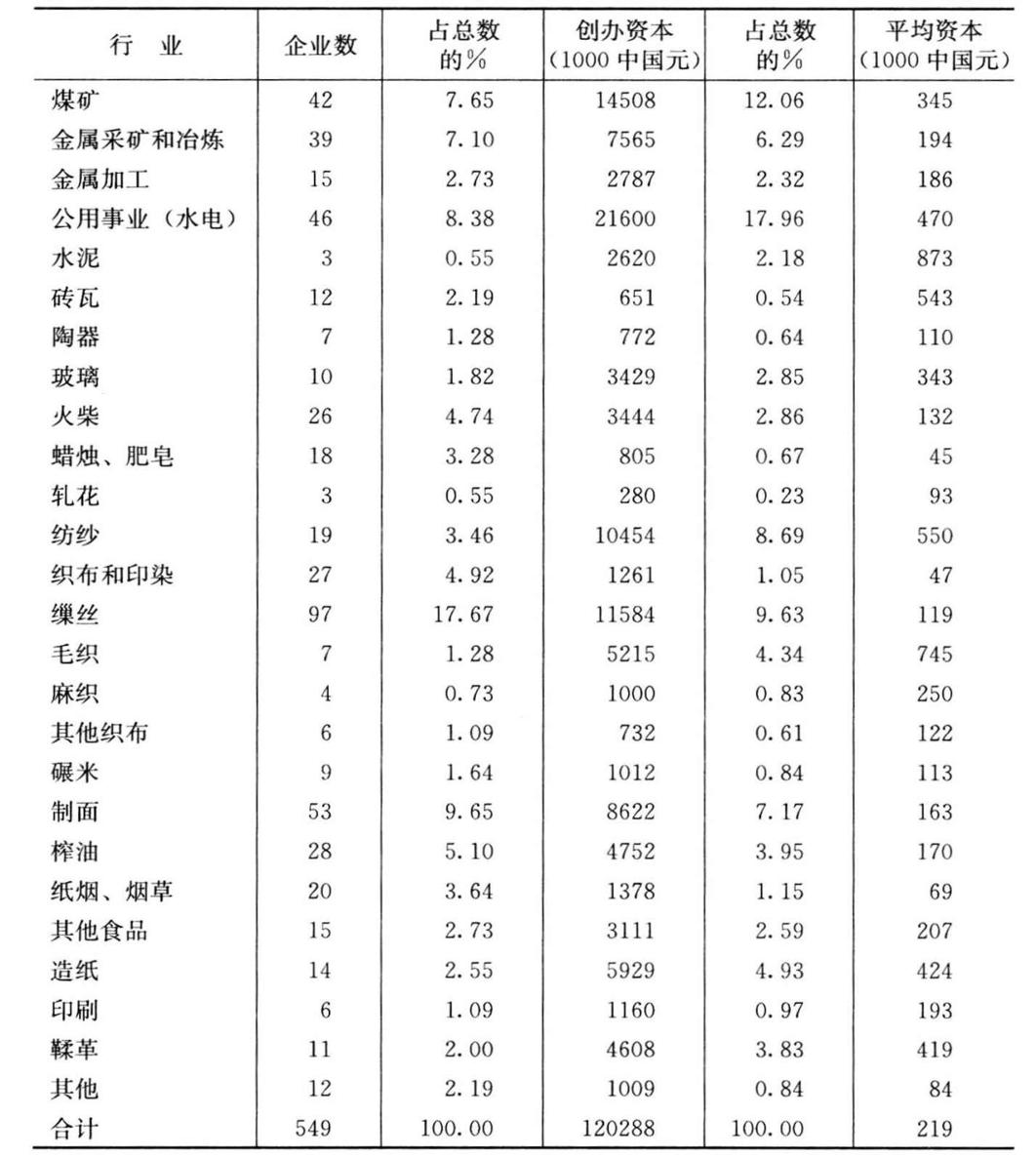
第二類是一批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礦、冶煉和紡織企業，它們早在1872年起就已經在經營了。在這些先驅性的企業中，像開平煤礦、漢陽鐵工廠及其煤礦和鐵礦（漢冶萍）、張之洞的湖北織布局和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最大和最出名的廠礦逐步擺脫了贊助它們的官員的控制而轉到中國私人投資者手中，或者像開平煤礦那樣處于外國的控制之下。還沒有對兵工廠的投資規模作出令人滿意的估計；有關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的官方和半官方企業的材料，不是始終能與試圖分析商辦制造業和采礦業的材料清楚地加以區別。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這種半官方廠礦和私營廠礦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也許是次要的，這點我將在下面加以說明。近來對當時文獻所作的研究，獲得了除上述兵工廠以外的大約75個制造業（例如繅絲廠、軋棉廠、紡紗廠、面粉廠、火柴廠和造紙廠）和33個煤礦、金屬礦的材料，這些廠礦均建于1872年至1894年期間，私人投資在其中或多或少地起著作用。這些企業很多是短命的，往往是小規模的，與手工業工場的區別只是在于它們多少使用了蒸汽和電力。[[19]](#_19_Sun_Yu_Tang_Bian____Zhong_Gu)

從1895年起，華資的制造業數量，像外資企業一樣，有了增加。但按絕對數字說，中國這一早期工業化時期工業部門的總的增長是微不足道的，而與1918—1922年時期開始生產的新企業相對地大量涌現的情況相比也不算多。在甲午戰爭和義和團起義后，清政府采取了在1903年成立商部（后改組成農工商部）和在1904年頒布“公司法”這類措施來提倡工業，這些努力可能有助于工業的這一有限度的發展。當然，各省的商紳迸發的反帝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是一個原因。但是創辦新企業的主要動力是因為最初少數經營最為工業化事業的企業，特別是經營制造行銷于商埠區的消費品的企業，能明顯地賺取利潤。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經營成功的外資企業和華資企業每年回收它們資本投資最初市場價值的10%或者更多。但是總的市場受到大部分中國農村低水平實際需要的有力限制。因此，在第一批少數先驅者之后陸續經營某一工業的企業，都面臨著一種越來越有風險和不穩定的境遇。它們的風險往往有加大之虞，因為這些先驅性企業的創辦或是經過各省重要官員的倡議，或是取得官方的資助，或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稅或壟斷某些市場等形式）。例如，上海機器織布局（1890年投產，1894年改組）和漢冶萍公司（1894年投產，1896年改組）就作為官督商辦企業由盛宣懷管理，并分別依靠省領導李鴻章和張之洞的支持。但是即使像張謇的大生紗廠（1899年投產）和周學熙的最早的啟新洋灰公司（1907年投產）這類名義上的商辦企業，它們最初的成就也要歸功于其主辦人因有官方的關系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如大生得到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支持，啟新得到袁世凱的支持。由于[中國的]市場有限，又缺乏能把儲蓄系統地轉入工業投資的現代銀行體系，其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嚴重不足，以及面臨著進口貨和在華外資工廠的制成品的競爭，所以某些地方大員和與之有關聯的實業家為了共同利益而試圖建立一些有限度的、但受到保護的工業帝國，也許就不令人奇怪了。能指望獲得成功的純商辦企業為數很少。

經濟成就和政治權力的結合曾經是當初公行等壟斷事業或鹽商的特征，并且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又在國民黨中國有其表現，在中國早期工業化時期，這種結合也沒有分裂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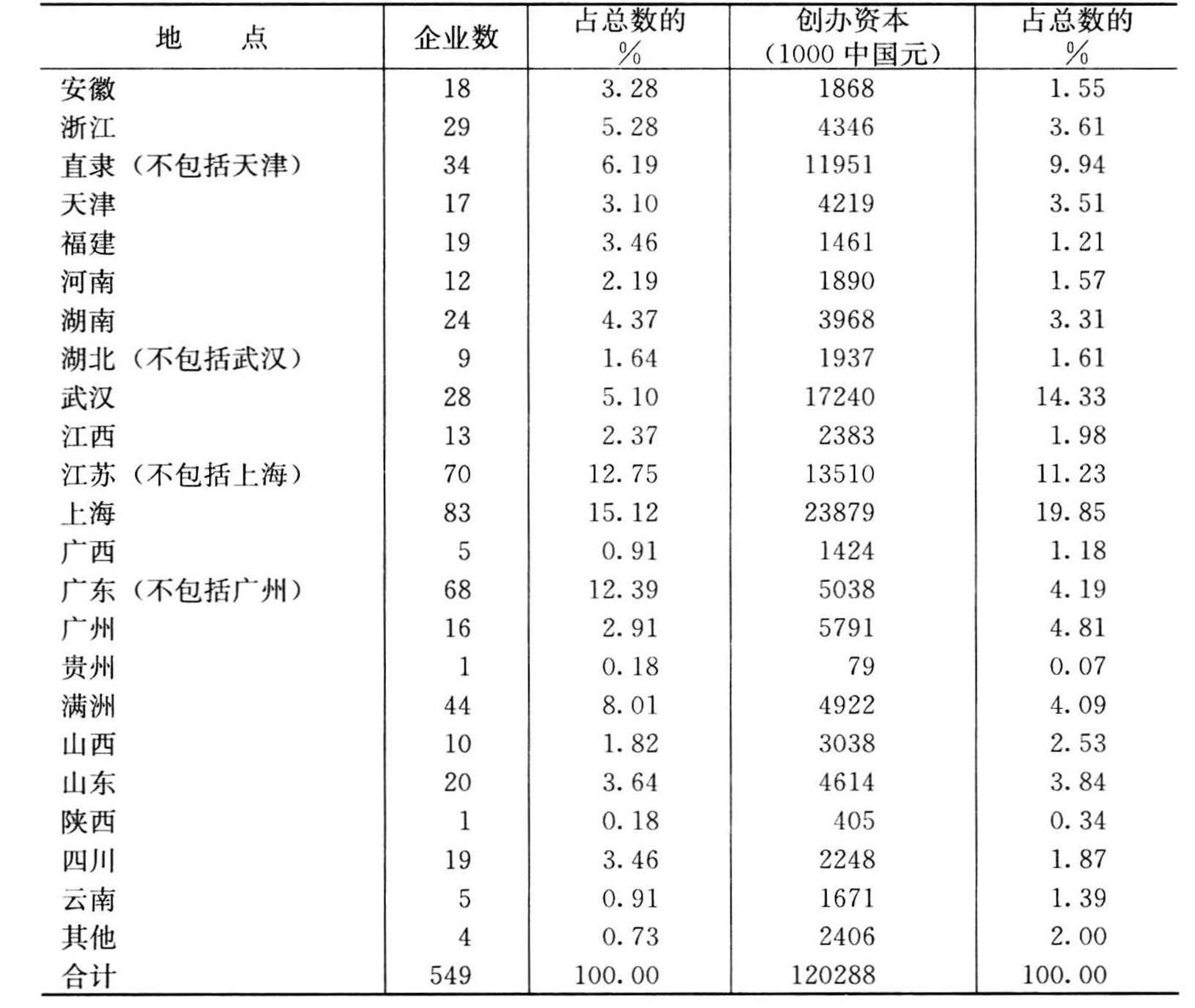
根據最近的一個統計，在1895—1913年期間，至少創辦了549家使用機器動力的中國商辦的和半官方的制造業和采礦業。全部創辦資本是1.20288億中國元。這個統計不包括兵工廠、鑄幣廠和數量顯然較少的一批純官辦事業。這549家企業包括有資料可查的、比在1895年以前開業的企業具有更多資料的、開辦資本又在一萬中國元以上的全部廠礦，它們的一些特征分別列于表12至表14。

表12 1895—1913年開業的華資制造業和采礦業的企業數和創辦資本（按行業）



資料來源：根據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2冊，第869—920頁材料計算。

表13 1895—1913年開業的華資制造業和采礦業的企業數和創辦資本（按地點）



資料來源：同表12。

表14 1895—1913年開業的華資制造業和采礦業的創辦資本



資料來源：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2冊，第1041頁。

在這20年中興辦近代工業最多的幾年是1905—1908年。在這四年中，有238家企業開始營業，其資本總額為61219000中國元。大部分安裝的機器來自國外，這可以從1905—1908年工具和機器的年進口值比1895—1904年的同類年進口值多一倍這個事實中看出。1908年以后機器進口量繼續增長，但開辦的新企業的數字銳減，直到1918—1922年一個大得多的工業化運動出現時為止。這些趨勢也許可以說明，在已開辦的享有特權的企業中的資本投資在增加，而新企業進入有限的市場的困難卻越來越大了。它們還反映了投機資本轉投到地方鐵路工程這一事實，這些工程是在王朝最后幾年受到“恢復利權”的民族主義活動的鼓舞而興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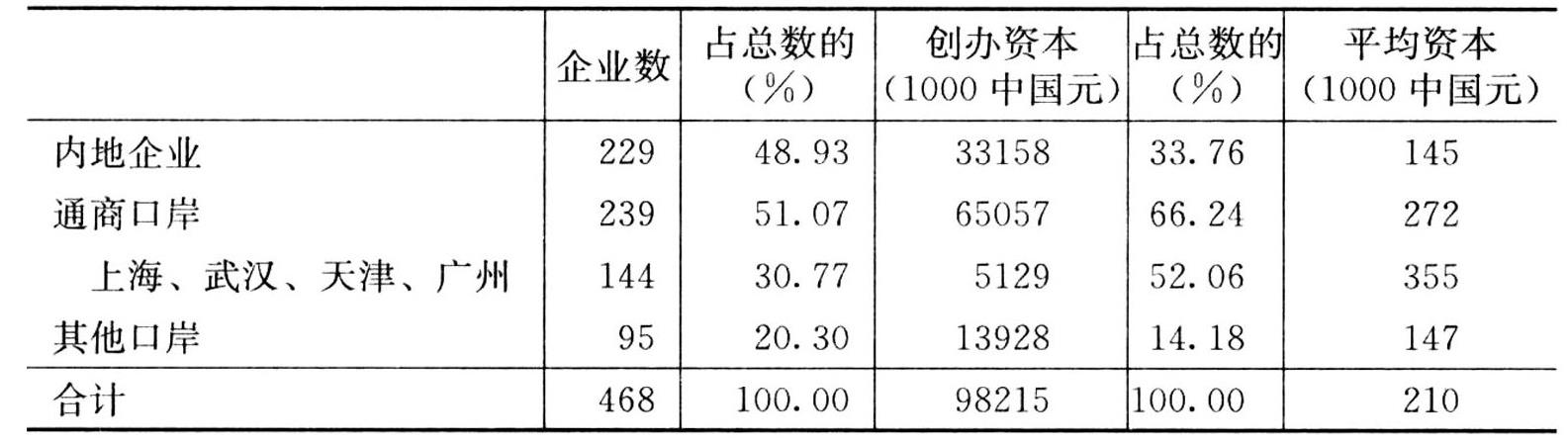
在企業數和創辦資本這兩方面，這些新工業中的大部分集中在紡織業等輕型制造業（計160個，占總企業數的29.14%；資本額共30246000中國元，占總資本的25.14%）和食品加工業（計125個，占總企業數的22.76 %；資本額共18875000中國元，占總資本的15.69%）這類行業。采礦業占總企業數的14.75%%，占總開辦資本的18.35%。采礦業的相對重要地位再次反映了晚清“恢復利權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由于這一運動的成績，得以取消了許多外國的采礦特許權，雖然有時要付出顯然是高昂的補償款項。46家發電廠和自來水廠建立在除陜西、廣西和貴州以外的中國本部各省的較大城市中。它們的規模懸殊，絕大部分設在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各省的通商口岸城市中。

除了繅絲業（它在1900年后日益由蒸汽繅絲廠經營）、向日本出口的大冶鐵礦以及加工業務較小的榨油業外，這些華資近代工業不進行原料加工以供出口。例如，表內只記錄了三家近代軋棉廠。大部分出口加工主要仍舊是手工業進行的，雖然有外資加工廠的產品作補充。甚至在城區的棉織業和印染業也依然處于手工業階段，或者由設在新棉紡廠附近和只有極少動力機器的小廠經營。

事實上，在這些新制造業中，很多都是小廠。屬于紡織一類的160家企業中，有97家是蒸汽繅絲廠，其中54家是設在廣東的很小的廠。設在上海的21家繅絲廠都比南方大幾倍。但97家繅絲廠平均創辦資本只有119000中國元。在549家企業中，303家企業的創辦資本不到100000中國元。剩下的246家華資企業（資本為100000中國元或以上）的平均資本為432000中國元，而表11中136家外資企業和中外合營企業的平均投資為758000中國元。

華資的企業如果愿意，當然可以設在內地，也可以設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在468家非采礦企業中，239家設在口岸城市，229家設在口岸以外的地方。由于外資非采礦企業都設在通商口岸，并主要在這些地方銷售其產品，內地中國企業的存在說明，在華的外資企業市場和華資企業市場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既互相補充，又互相競爭。但是在創辦資本和平均規模這兩方面，設在通商口岸的華資近代制造業要比內地企業大得多，如表15所示。從表13至表15中可以看出，上海、武漢、天津和廣州四個城市是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例如，上海至少在以下幾個行業中占首位：金屬加工、棉紡織、繅絲、面粉制造、榨油、印刷以及蠟燭和肥皂制造。

表15 1895—1913年設在通商口岸和內地的華資制造業數及其創辦資本



資料來源：同表12。

上述材料的價值只在于它們說明了大致的趨勢。可能有些企業不是沒有列入就是重復計算，也可能有一部分企業在所討論的這段時期內經營失敗，也可能對有些企業的創辦資本估計過高（另一些企業的創辦資本或者已迅速增加）。因此，如果把企業的簡單總數和前面討論的幾類企業的資本總額作為19世紀中國工業化的絕對數量，那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最多只能說，到清代末期，也許有五六百個外資的和華資的使用機械動力的采礦業和制造業企業，其資本總額約為2億中國元。

在這些企業中，據估計有116家華資企業和40家外資企業每家雇傭500名或更多的工人，前一類企業的工人總數為130985人，后一類為109410人。當然500名這條界線是隨意作出的，但如果它被采納的話，這240395名工人就可以被認為是1900—1910年中國的“近代”勞動力的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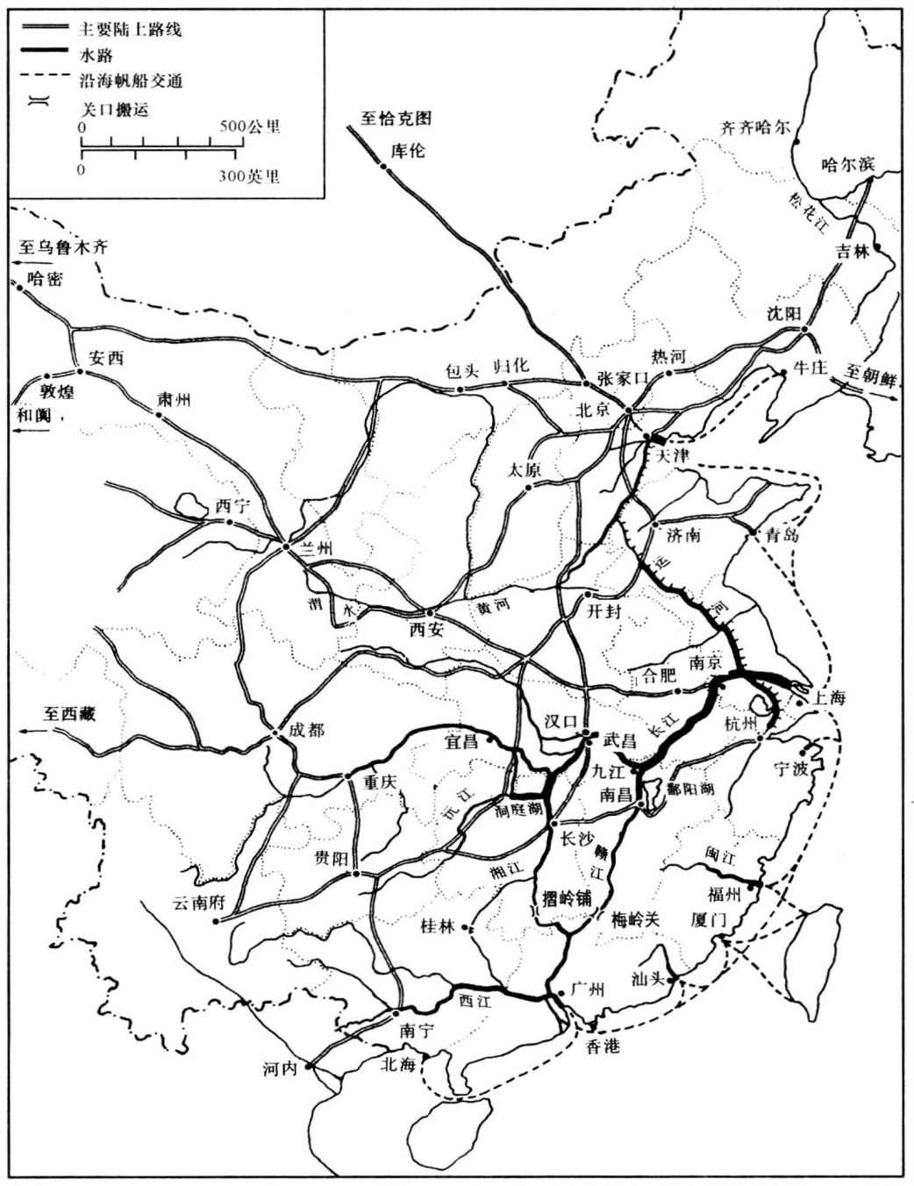
19世紀外國工廠中的部分投資歸住在通商口岸中的中國股東所有，他們主要是洋行買辦或經營絲、茶和進口紗、布的商人。在外資的海輪和江輪公司、保險公司和貨棧業方面情況更是如此，它們沒有包括在表10的制造業企業的數字中。但繅絲業、電燈電力事業和1895年以后新設立的棉紡織廠也有這種情況。最近一份研究材料確定，有130個中國的大股東曾在1860—1900年期間向44家外國企業投資。[[20]](#_20_Wang_Jing_Yu____19Shi_Ji_Wai)另一份材料列舉了1896—1910年間向主要設在上海的17家外資工廠投資的78個中國人和中國企業。在這些外資企業中，6家是棉紡廠，兩家是面粉廠。[[21]](#_21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這兩份材料反映出的中國人在外國企業中的投資總額無法算出。但是這類投資確實證明，如果投資有希望獲得厚利，在通商口岸是能夠獲得資金的（資金往往是參加對外貿易賺取的利潤）。外國人的特殊地位，通商口岸的租界，都為賺錢提供了必要的保證。當中國的實業家也提出有希望賺取利潤的同樣保證時，有些在外國企業投資的人也把他們的“買辦資本”投放到中國人的事業之中。官督商辦企業和形式上屬于商辦但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官方支持的其他企業所擁有的特權，就是專門為了提供這種保證的。

但如上所述，晚清的近代制造業的整個發展前途是受限制的。把非通商口岸的儲蓄納入工業的各種組織——特別是近代的銀行制度——并不存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證一個有法律、商業和教育等制度的體制，而如果沒有這個體制，近代企業就不能繁榮發達。由于沒有關稅自主權，由于外國人已經索取的特權，它也不能保護“新生的”華資企業，使它們能與進口貨和在華外資企業的產品競爭。尤其是它需要對農業部門進行根本的改組，以便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料，為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為增加的產品提供一個足夠容納它們的市場。19世紀后期的中國經濟被公認是貧困的：歐洲工業革命的技術還剛在沿海城市出現；農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趨不利的情況下生活；他們生活中的農業技術的發展潛力在若干世紀中已經消耗殆盡。但是阻礙中國早期工業發展的因素并不是資本的絕對短缺。在1912年，向農商部登記的制造業申報的資本總額為54804000中國元。同年，向該部登記的錢莊和當鋪申報的資本總額為164854000中國元。[[22]](#_22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問題在于事實上本來有限的經濟資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變革才能打破的傳統束縛中一直沒有發揮作用。

## 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

處于當時技術水平的晚清中國經濟，以商業的高度發展為其特點。貨物和商人在全國廣泛地流動，國內的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世界市場發展了聯系。在最基層，每一個農村地區的農民都有規律地在為其周圍村落服務的城鎮定期集市上做買賣。在這里，他們生產的剩余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被用來交換其他地方的土產，或者交換通商口岸城市的制成品或進口貨（后兩種貨物逐級通過交換體系最后到達消費者手中）。施堅雅估計，在20世紀初這種集市多達63000個，[[23]](#_23_Shi_Jian_Ya____Zhong_Guo_Non)這些數以千計的基層集市又與兩種較高級的市場——中間市場和中心市場——發生關系，最后則與像天津、上海和廣州這樣的沿海大貿易城市連接起來。

各級市場居住著行商、本地商人和其他一切市場（基層集市除外）的商號派駐的代理商。在較高級的市場（中心市場以上），市場交換體系與清政府的各級行政機構互相滲透。農村的中心市場、城市以及地區市場是官方控制的中間商和牙行的所在地，官僚上層分子則通過這些中間商和牙行控制帝國的商業并對它征稅。在這些較高級的市場中還可以看到票號（通常由山西省的一些家族經營，因此稱為“山西票號”），它們開出的本票可以把大筆資金從一個高級市場轉到另一個市場。高級市場還設有其他形式的“土銀行”，例如錢莊，它通常通過個人擔保，有時通過指定的貨物擔保，把資金借給本地商人，同時也從事兌換貨幣的業務。在基層集市，以貨易貨的交易是常見的，慣常的金融活動只有本地的放債人和小本經營的貨幣兌換商在進行。



地圖3 貿易路線

這6.3萬個農村基層集市各處一方的狀態和整個市場的等級結構，是與交通工具的發展程度有密切關系的。高級的市場位于主要的水、陸（在華北）交通線上或其終點，以便進行貨運和客運，而基層集市則位于越來越不方便的支線和河道支流附近。錯綜復雜的和高度發展的定期集市結構不但在19世紀中后期，而且在進入20世紀以后很久仍繼續盛行，這是因為相對地說缺乏以下兩個重大的變化：（1）缺乏地方一級的改進的運輸，使農民不能像到達傳統基層集市那樣方便地到達中間市場和更高級的市場；（2）沒有優良的輪船和鐵路交通把高級市場與國內外的工業中心連接起來從而促使商品輸出與輸入增加，而這種增加又會反過來減少在基層集市交易的農戶的自給自足程度。

可以肯定地說，19世紀中國全部貿易的大部分，也許多達四分之三，是由小規模的地方貿易組成的。這種貿易局限于基層集市和中間市場的水平上，這是因為運輸費用高昂，市場各級體系中有著形形色色的中間商的層層盤剝，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大部分農村中的基本糧食相對地保持自給自足的緣故。

龍州海關的稅務司在1892年指出：“在可能時，大部分貿易都經由水路。”[[24]](#_24___Hai_Guan_Shi_Nian_Bao_Gao)這個看法既適用于主要產糧區內的短途糧食航運（例如從靠近洞庭湖的湖南省各縣向湘潭或長沙等大市場的運輸），也適用于從大米有剩余的湖南省運往長江三角洲缺米區的長達千里的運輸。但是像長途航運大米這類大量而低價的商品的總數量是很小的。甚至在20世紀初期，從安徽用帆船運大米到上海的運輸和銷售總成本，幾乎是安徽農村產地大米原價的兩倍。[[25]](#_25_Tian_Ye_Yuan_Zhi_Zhu____Zhon)長途貿易是在高級市場之間進行的，但起訖點歸根結底當然都在基層集市。這種貿易的絕大部分商品每噸價值都較高，它們的生產得益于某個特定產區的資源或氣候：如江南的原棉和棉紡織品；四川的鹽井或江蘇沿海鹽池產的鹽；云南、貴州和四川的鴉片；廣東、福建的糖；云南的銅和鉛；長江中下游的茶葉；浙江、江蘇、廣東和四川的絲。按重量算，這些產品的價值比較高，所以經得起較貴的運輸和管理費用。以茶葉為例，它每擔的價值是每擔大米的10倍，從安徽運往上海的運輸和管理費用可能是每擔價值的15%或20%。這些產品沒有其他供應來源，而且被住在城鎮的富戶（紳士）大量地消費著，對這些人來說，價格問題相對地說是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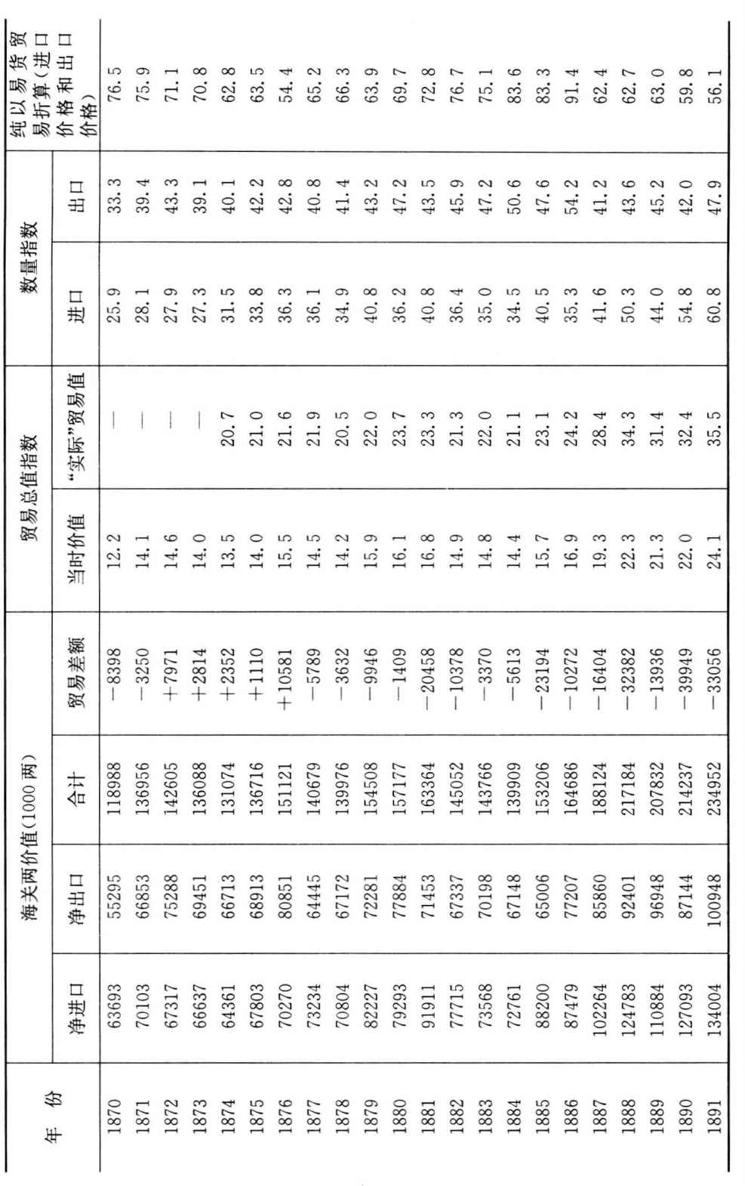
特別在華中和華南，主要河流以及它們的分支小河就是商業的動脈和毛細管。一個也適用于晚清的20世紀的估計提出，至少有4000英里的航道可用于輪船航行，有1.5萬英里可供汽艇航行，另外還有2.7萬英里則一切“土船”都可以航行。也許共有長達2.5萬英里的長江各條河道可供航行：從上海起航的江輪駛至漢口，然后由淺水輪駛至宜昌，在那里把貨物重新打包并裝到帆船上，再由纖夫溯急流直達重慶；[[26]](#_26_Zhong_Qing_Zai_1898Nian_Kai)從重慶經長江上游及其支流到四川北部和貴州的帆船越來越小，最后這些平底小帆船通過小河和由腳夫扛運進入云南。在最小的小河中，使用的船只可能不能大于頭部上翹的竹筏；也許用平底小船，它們滿載時吃水九英寸，常需要船夫在水中抬或推。雖然西江只能從廣州通輪船至廣西邊上的梧州，但西江及其支流上數以千計的帆船卻能深入廣西、貴州和云南，來回運送貨物。第三條主要貿易路線（在開辟上海以前，用這條路線把茶葉和絲綢運至廣州）是從廣州經過北江，再使用搬運工穿過南嶺山脈的摺嶺鋪和梅嶺關分別到達在湖南和江西的湘江和贛江的河源，然后又通過洞庭湖和鄱陽湖直達長江。陸路必須使用腳夫通過南嶺山脈以及寧波、福州和廈門等受限制的內地貿易區的局限性，有利于把上海發展為主要的外貿港口和把長江發展為通向中國內地的主要航道。

從漢口起，帆船可以沿漢水往西北進入陜西。運河在一定程度上仍繼續把長江下游與華北平原連接起來。但華北可供航行的河道要比南方少得多。在這里，華北的大輪車和馱畜在塵土飛揚和泥濘的小道上活動；在河南、山西和陜西等省的黃土區，不斷來往的交通工具把這些小道滾壓得比周圍農村的地面低10英尺以上。從北京出發的幾條主要傳統貿易路線沿著難行的道路，一路在陸上通往山西，一路經張家口穿過蒙古到達蒙古邊境的恰克圖，支路則往西通往陜西和甘肅。像華北大部分地區那樣，在那些地方沒有水路交通，貨物的流通既慢又貴。[[27]](#_27_Guan_Dao_Yi_Zhan_De_Fen_Bu_B)靠大車、手推車、馱畜或搬運工運輸的陸路運費據估計每噸英里是帆船運費的二倍至五倍。

19世紀的商業制度盡管按傳統標準衡量是高度發展的，但當然還不是“近代”的市場經濟。如上所述，雖然少數高價商品可能通過水路被運往全帝國，但說這些商品甚至已有了全國性市場也是不正確的。商業往往局限在大量層層既定的小單位結構內，這是由一些因素產生的摩擦阻力所致。這些因素是：存在著多種地方通貨的銀—銅復本位貨幣制；運輸費用昂貴（既花錢又花時間）；對商品的信用預付款比較少見；缺乏互相清理債務用的商業銀行體系；在傳統貿易結構中享有既得利益的無數小中間商遍及各地。每個小組織忙碌地進行著小商業和索爾·塔克斯所稱呼的“廉價資本主義”活動，但這些組織只是通過半奢侈品交易以及白銀和一部分糧食以納稅形式流向上級行政機關的方式而發生聯系。自從1853年為了資助鎮壓叛亂的太平軍而設立厘金稅以來，19世紀后半期的外國觀察家們習慣地把這種內地貿易稅制（人們公認這種稅制的管理有時變化無常）看成是他們自己的貿易和中國商業一體化的主要障礙。[[28]](#_28_Dang_Ran__Zhong_Guo_Ren_Wei)但是如果與15%—100%的運費和經營費用比較，每個關卡的厘金稅率只有2%的情況似乎不可能對內地貿易的總數量和方向起什么影響。我在前面說過，英國人發現很難在中國內地銷售蘭開夏棉布，因為中國的手工織布業進行了有力的競爭。束縛中國本國商業的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的交通運輸的各種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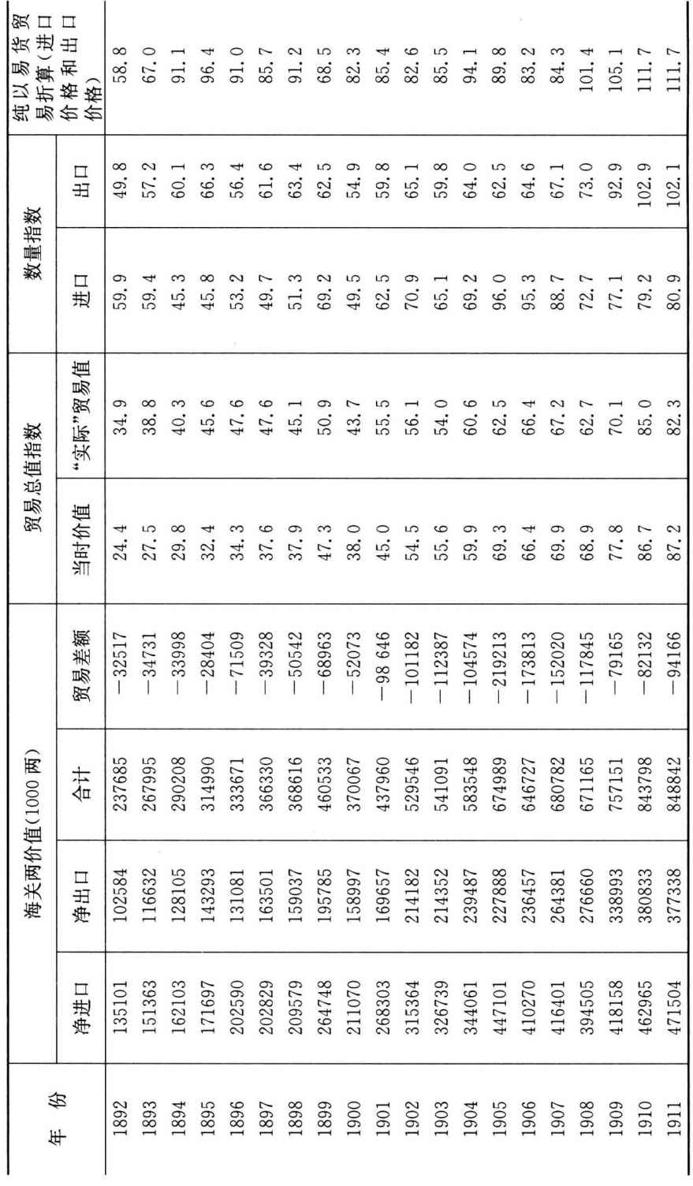
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商業制度表面上起了一個微小但值得注意的變化。雖然我仍將堅持說商業制度基本上保持原樣，但人們畢竟普遍認識到了它受到不斷開辟的通商口岸和擴大的對外貿易的影響這一事實。在外國人管理下的海關編制的貿易數據幾乎是近代中國的唯一有內容的長期歷史統計資料。但是即使這些一般說來是非常好的資料也是有缺點的。到1887年為止，沒有包括從香港進口的數字，也沒有使用離岸價格和成本、保險、運費等數字，因此出口值估計偏低，而進口值則估計偏高。另外，貿易一直以海關銀兩計算，而當時白銀折成黃金的價值一直在下跌，結果貿易的記賬價值如與其黃金價值或其實際數量比較則被夸大了。表16列出了1870—1911年期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價值（以當時的海關兩為單位）和指數。

表16 1870—1911年中國對外貿易價值和指數（一切指數：1913=100）



按當時的海關兩計算，總貿易量從1870年到1911年增至七倍多。如上所述，銀的價值夸大了貿易的實際增長：按貿易量計算，在這40年中進口增至312%，出口增至307%。貿易的總增長率以當時的價值計算，在19世紀90年代前是比較慢的，而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增加得最快。數量指數表明進口的增長相當穩定（1905—1906年的猛增是日俄戰爭的直接結果，不應把這兩年當作典型），而出口在19世紀90年代比較呆滯，但在清朝最后幾年迅速增加。出口猛增的原因是主要從滿洲輸出了大豆和豆制品。如果把1888年前的貿易數據加以調整，進口以成本、保險和運費之值計算，出口以離岸價格之值計算，并且把鴉片和其他商品從香港“走私”入境的情況考慮在內，1870—1887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很可能出超。1888—1900年，進口有限地超過了出口，每年平均入超40876000海關兩。1900年以后入超大大增加，1901—1911年每年平均達121377000海關兩。一部分逆差被華僑的僑匯所彌補，到1900年為止還被少量凈出口的金銀所彌補。其余部分則被流入的資本所彌補，這部分資本包括上述1895年以后的工業投資和下面將要討論的清政府借的貸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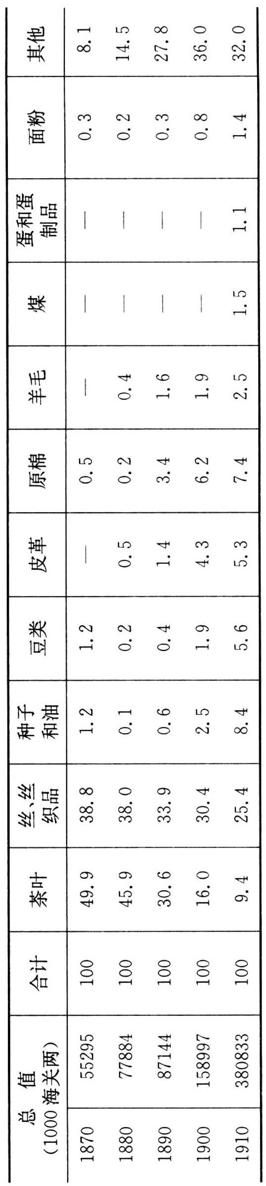
續表



當時貿易總值除以批發價指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1—3；南開經濟研究所；《南開指數，1936年》，第37—38頁  
關于1904年以前貿易材料，見侯繼明德的《1840—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第194—19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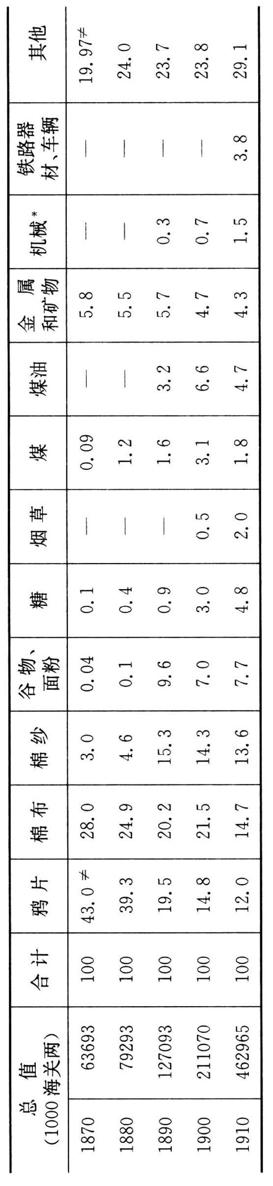
鴉片主要來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是輸入中國的最重要的一項進口貨，以后則被棉布所超過。按價值算，棉布和棉紗一起在1890年以后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棉花貿易和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已在上面與手工業合并討論了。糧食和其他食品的進口主要是為了供應沿海的大城市，進口多少似乎視地方收成后的供應情況而不是視收成的一般好壞而定；這一貿易既反映了沿海城市的發展，也反映出在供應沿海城市的外圍貿易區外面種植的本國糧食面臨著擁擠的交通和高昂的銷售成本的狀況。中國主要進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7，出口貨的百分比列于表18。

表18 1870—1910年中國主要出口貨所占百分比



資料來源：楊端六和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表四，第4—14頁；表八，第32—42頁。鄭玉貴，同上著作，第19頁。

表17 1870—1910年中國主要進口貨所占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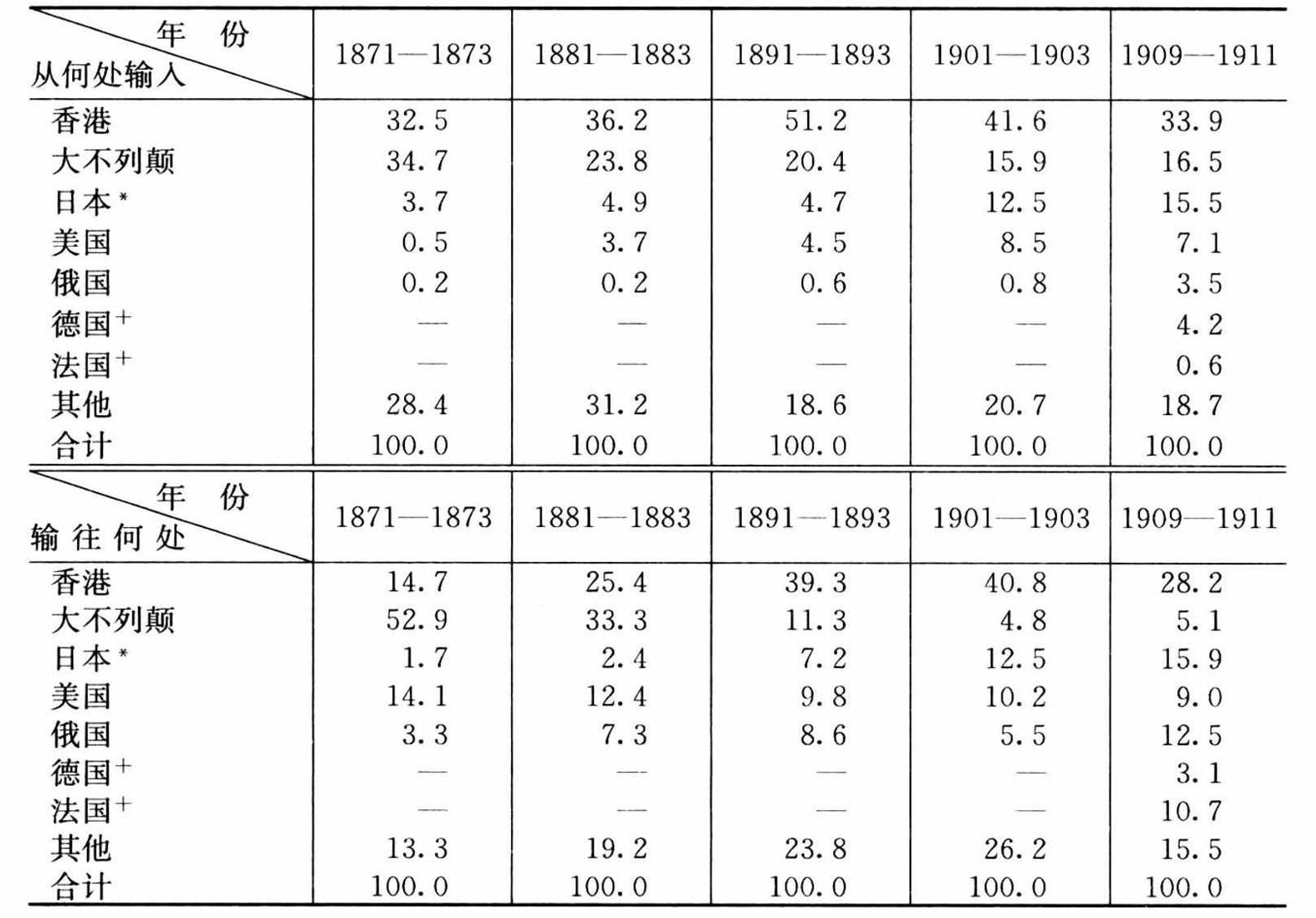


\*1886年前末單獨記錄。＋1903年前末單獨記錄。≠估計數。  
資料來源: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表五，第15—25頁；表五，第43—48頁；鄭玉貴（音）；《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9頁。

絲和茶在南京條約之前已經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貨，在清朝滅亡之前這兩項商品繼續保持這個地位。但是它們合起來在出口貿易中的相對地位是在不斷下降。茶葉出口的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商面臨著日本和印度日益激烈的競爭而又不能在產茶者和中間商內部貫徹質量標準。絲織品出口的龐大的絕對數量說明了這一主要的農村手工業還繼續有力量；同時，豆油、皮革、面粉、蛋、蛋制品和出口增長程度稍小的皮棉卻脫穎而出，這反映了進入20世紀之際在大、中城市建立了許多小工業工場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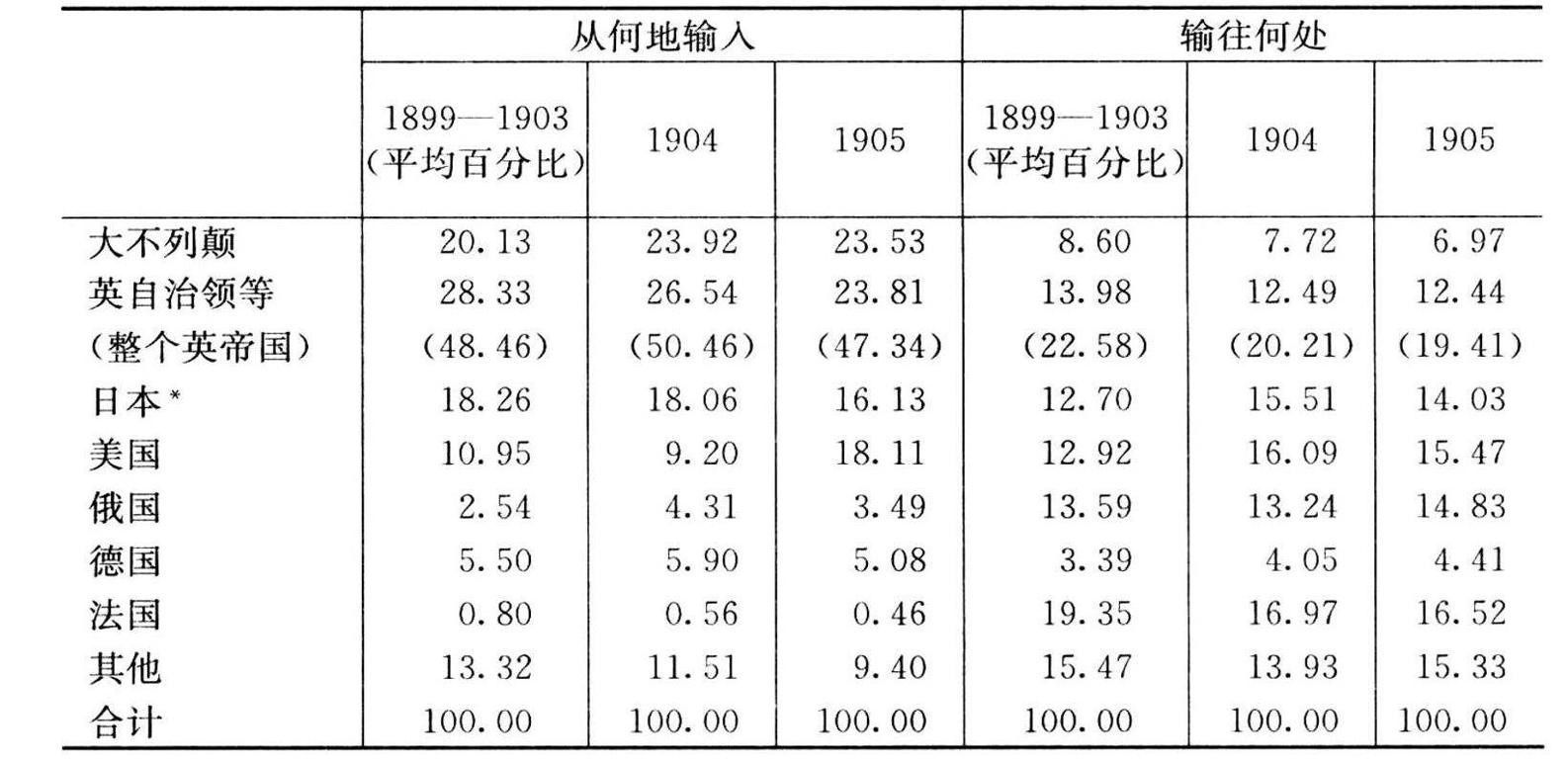
香港名義上占中國對外貿易數量的很大部分，卻又缺乏1932年前從香港輸入和輸至香港的貨物的數據，這樣就不能精確說明與各國進行貿易的比重。表19提供了1871—1911年期間選擇的主要貿易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未經調整的百分比，而表20則顯示了馬士為帝國海關計算的主要貿易國的百分比，他的計算把香港作為一個中國港口，它的進口數和出口數分別被列入表內幾個主要貿易國家的數字中。聯合王國在19世紀末之前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如果拿整個英帝國來考慮，那么在進入20世紀后它仍是最重要的。英國在中國進口貿易中的優勢最為顯著，如上所述，這是因為從蘭開夏進口了棉布，從印度進口了棉紗和鴉片。雖然英國的總的比重依然是最大的，但也在減少。從19世紀90年代起，日本的貿易由于受到了《馬關條約》的條款和1905年以后它在滿洲所起作用的推動，發展很快。美國和俄國在中國的貿易中所占的比重總的說是在增加。

表19 1871—1911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百分比



\*1895年起包括臺灣在內。＋1909—1911年前包括在“其他”項中。  
資料來源：嚴中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表7—8，第65—66頁。

表20 1899—1905年中國與主要貿易國進行的對外貿易（包括香港）的百分比



\*包括臺灣在內。  
資料來源：根據馬士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1906年海關貿易報告冊》（第1部分，第46頁）中的數據計算。

有兩種有關上面敘述的對外貿易的普遍意見涉及這里談到的內容。第一種是，雖然中國的世界貿易是在發展中，但到1913年，它按每人計算（進口合0.94美元；出口合0.67美元；合計1.61美元），在國聯為之編制材料的83個國家中是最低的。可能在這些計算中，1913年的中國人口數估計偏高；但即使在每個人的對外貿易值是上面數字的兩倍這一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中國仍接近所列83個國家的末位。庫茲尼茨教授的研究著作已經指明，一國面積大小與該國對外貿易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會成反比。[[29]](#_29_Ku_Zi_Ni_Ci_Jiao_Shou_Ren_We)就中國而言，國家面積的因素更起著作用，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著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微小的經濟組織，它們由一種相對地說未發生變化的運輸體系維持著。

第二種普遍的意見是，外國貨在內地的銷售基本上是由華商控制和通過傳統的貿易渠道進行的，出口貨的收購也是如此，不過程度稍輕而已。1896—1897年蘭開夏訪華代表團報告說：“在整個長江流域目前還沒有一個西方商人從事棉制品的進口貿易，只有上海除外。英國資本已經從漢口等口岸撤出，并且一直沒有向重慶等新口岸投資。”[[30]](#_30___Bu_Lai_Ke_Ben_Shang_Hui_Fa)漢口11個大華商定期在上海通過其代理人購買進口的布和紗，然后把貨物轉售給漢口的零售商和從湖南及河南低級市場前來漢口購貨的商人。在1896年，重慶有五家歐洲洋行，其中只有一家經營在中國進口貨中最為重要的進口棉制品，而且營業很小。重慶的棉花貿易掌握在27家中國商號之手，它們與三家成都商號及一家嘉定商號一起，每年8月份派它們的代理商（他們往往是這幾家商號的合伙人）去上海，住在那里采購和裝運布、紗到重慶，直到次年5月。地方的商人則向重慶商人賒購，以供應四川的低級市場。在華南，像云南省臨安府等較小的貿易中心的商號代理商或合伙人則直接向香港的英國進口商購貨，航運的貨物經過海防，在蒙自進入中國境內。在19世紀60年代和進入70年代以后，外國洋行（特別是英國洋行）的分行把大部分棉制品運進漢口等商埠，但位于較小通商口岸（它們是大貿易區的城市市場）的這些分行甚至不能與中心市場一級的中國銷售商發生長期的直接聯系，當然更談不上與中間市場或基層集市發展聯系了。與這些分行在鎮江和漢口打交道的中國商號高居于傳統市場結構的最上層，它們具有了解地方情況以及與低級市場發生長期關系的有利條件。像上述設在重慶的那些商號越來越愿意直接向上海或香港采購，因為這些地方選擇貨物的余地較大，它們還可以從進口商之間的競爭和經常舉行的拍賣中獲益。長江的中、外輪船公司進行著激烈的競爭，使中國商人同洋商一樣獲得了有利條件。此外，1876年的煙臺條約正式規定，發運進口貨的中國商人有權取得通行證（單照），這樣，名義上取得了與洋人平等納稅的權利。在進口和銷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如果說在華的洋行逐漸變成了設在上海和香港為當時已有的中國商業體系服務的代理商，也許并不算夸大其詞。至于有些專利商品或體現先進技術的商品，從20世紀開始時起已為它們建立了由洋人監督的中國代理商銷售網。甲午戰爭后，一部分日益發展的日本貿易還采用直接銷售的辦法。但進口貨的大部分銷售業務仍操在中國人手中。

由此可見，中國人對進口貨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通商口岸以外，這種需求幾乎完全通過傳統的中國市場體系來滿足。出口方面的情況與此相似，但有跡象表明外國人參與的程度稍大。通商口岸的外國出口商在每年收購新茶時不能進行任何質量控制，這是中國茶葉在面臨印度、錫蘭和日本競爭的外國市場上相對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早期增加諸如豬鬃、皮革、蛋和蛋制品等新出口貨的供應方面，外國人至少起了直接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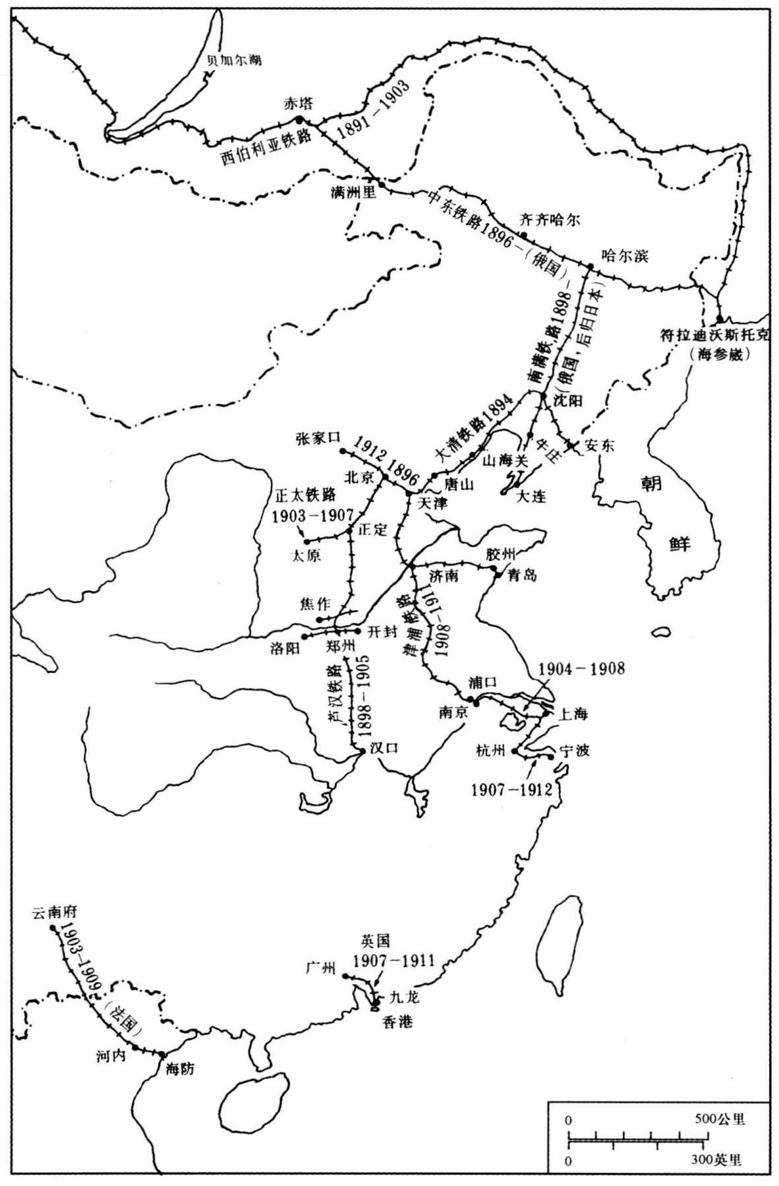
我在前面說過，傳統市場體系的穩定是與技術及運輸成本直接相關的。到1911年，輪船、汽艇以及鐵路深人中國內地的程度極其有限。在1865年，清政府禁止了曾經在太平軍叛亂時期容忍過的外國汽艇在內河的航行。但是洋人辦的和華人辦的通商口岸（包括長江各商埠）之間的輪船運輸業得到條約的準許，在19世紀70年代有了發展。在1874年，有17艘美國輪船、11艘英國輪船和6艘中國輪船在長江上和在上海與其他通商口岸之間運送貨物。到1894年，輪船招商局的26艘輪船以及兩家英國公司的至少51艘輪船在這些航線上營業。較小的華資蒸汽客艇也開始往返于通商口岸與未對外國運輸業開放的內地城市之間。蒸汽客艇的普及明顯地可以從在帝國海關注冊的華資輪船平均噸位的下降中看出：1882年為737噸；1892年為247噸；1900年為35噸。由于中國政府拒絕了英國提供的一筆借款，英政府在1898年索取“賠償”時強迫北京準許掛外國旗幟的輪船在1865年以后已被禁止前往的內地港口通商。到1903年，共有614艘華資和外資輪船已經登記要在內地通商，在1909年此數增至977艘，1910年增至1030艘，1913年又增至1130艘（華資的936艘，外資的194艘）。這些小江輪給長江和西江兩江的支流上的傳統貿易航線帶來了較便宜和較迅速的運輸工具（在1909年，總數中的360艘在上海注冊，72艘在漢口注冊，277艘在廣州注冊），但它們與仍繼續進行大部分內地貿易的所有大小帆船和木筏相比，在數量上和噸位上依然大為相形見絀。[[31]](#_31_1900Nian_Hua_Zi_Lun_Chuan_De)

同樣，到1912年雖然已經興建了9244公里的鐵路干線和支線（包括1895年以前的288公里），但對清末的經濟和商業體系只起了有限的影響，這與鐵路對清朝最終命運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的情形相反。1912年以前的中國鐵路對經濟和銷售體系影響甚小，這不但是因為鐵路的總里程畢竟是非常小的，而且是因為鐵路只是在清朝的最后幾年才通車。此外，在民國開始的幾年鐵路確實起過的作用，也被地方性的內戰弄得嚴重地變了樣，因為內戰征用鐵路運兵，把收入轉用于維持軍閥的軍隊，并且忽視了對路基和車輛的維修工作。

北京至張家口的199公里鐵路是中國的工程師主要用北京—沈陽鐵路線的利潤建造的，除了這個不重要的例外，民國以前的中國鐵路主要受外國貸款的資助和由外國特許權持有者建造。滿洲的中東鐵路（1481公里）和哈爾濱至大連的南滿鐵路干線（944公里）完全是俄國人辦的企業，只是以中國人的合股稍加掩飾而已；山東省的膠濟鐵路（394公里）則由德國人投資和經營。在1912年，鐵路總里程的三分之一稍多一些在滿洲；毫無疑問，鐵路對在20世紀最初10年中增加滿洲大豆出口和穩步發展棉制品進口是很重要的。哈爾濱實際上是中東鐵路建立起來的，而像位于其內地貿易區缺乏水路的牛莊和秦皇島等港口，就要依靠鐵路。中國本土的主要干線京漢鐵路（1215公里）和津浦鐵路（1009公里），從北向南，把華北平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而在此以前，其間只有運輸能力不足的運河可供使用。雖然這兩條平行的鐵路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種不經濟的重復建設，但總的說來，這兩條在第一個鐵路建設熱潮中完成的鐵路路線位置良好，可以像在滿洲那樣開發新的領域，還可以彌補華北缺乏可供航行的河道之不足。也許會認為以漢口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鐵路網在理論上是更加可取的，但在1906年京漢鐵路建成時，人們不可能預見：因政治原因而像20世紀20年代滿洲那樣會重復建線；漢口和廣州拖延了幾十年才接通；在1949年以前還不能往西向四川省建線。清末湖北沙市海關稅務司的評論適用于除華北和滿洲少數被鐵路連接的大城市以外的一切地方，他說：“沙市沒有鐵路交通，但是由于它是最龐大的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體系的中心，所以在許多年內可以用不著任何鐵路。”[[32]](#_32___Hai_Guan_Shi_Nian_Bao_Gao)

看來在晚清中國的外國商人的確是在日益為中國商業體系服務，而不是進行控制，雖然這一說法與較為普遍的觀點相反。但是主要在上海和香港經營的進出口業務幾乎完全操于外國人之手，直至20世紀20年代。在不會講中文的洋商與來自重慶、漢口而不會講英語的顧客或供貨者之間，買辦為主要聯系人。許多買辦雖然名義上受雇于洋行，但自己也經營其雇主所經營的貨物的貿易。他們向中國商人購買出口貨，同時對購進口貨的商人提供信貸，這種作用使他們能得天獨厚地影響進出口貿易和從中獲利。許多華資的航運、金融和制造業的最初投資者，都是在上海大洋行中當買辦致富的。1911年以后增加了許多華人辦的和日本人辦的進出口行（顯然，日本人比英美人士更下工夫去掌握一些漢語），這個情況降低了買辦在對外貿易與中國銷售體系之間作為聯系人的包攬一切的地位。但是，買辦制度經過一些改頭換面，還是延續了下來。

外國人在通商口岸繼續占有的進出口業統治地位，得到了資助對外貿易的在華外國銀行的支撐。從1848年東方銀行（又稱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辦事處起，英國人在中國實際上壟斷了近代銀行業務達40年之久。兩個英國控制的最重要的企業之一是麥加利銀行，其第一個在華的分行于1857年開業；另一個是建于1865年的匯豐銀行。德、日、俄、法、美等國的競爭者在19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外國銀行資助進出口的大部分貸款是借給洋行的；給華商的直接貸款有限。但也向“錢莊”提供短期信貸，后者又貸款給中國商人。實際上，外國銀行通過壟斷對外貿提供資金，也控制了外匯市場。它們是白銀流入和流出中國的渠道，并且決定白銀的黃金價格的漲跌。在1935年前，上海市場的官方外匯匯兌率是根據匯豐銀行每天的行情作出的。



地圖4 晚清鐵路建設

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是1896年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但是直到1904年創辦的戶部銀行發展為民國時期的中國銀行后，中國的銀行在資助對外貿易方面才起了重要作用。在1896—1911年期間，有16家近代的中國的銀行開業（其中只有七家繼續營業到30年代）。它們的總行和分行都設在大城市；它們以向內地“錢莊”提供短期貸款的方式，只與內地貿易維持小規模的間接聯系。近代商業銀行的業務直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才開始打入傳統的市場體系，但總的勢力即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充其量也是微弱的。晚清中國的大部分達到全部依靠外界貸款程度的地方商業繼續由老式銀行提供資金，這進一步證明，到了1911年，除了主要的通商口岸以外，貿易結構和促進貿易結構的各種制度設施與半個世紀以前相比，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33]](#_33_Dan_Shi_Ying_Zhu_Yi_Dao__Sha)

## 行政和經濟

人們經常用沉重和隨意開征的稅賦、到處出現的貪污和對商業及商人的普遍藐視等現象，來說明清代政治制度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后果。這些現象不能輕易忽視，思想意識上“重農輕商”的態度特別需要探討，這里不予贅述（詳見第八章）。但事實是，如本章前面所述，晚清在傳統技術的種種束縛內，已經具有一種復雜的、商業化的“發達”經濟。在兩個世紀中，這個經濟曾經養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曾經推動了對中國本部以外的廣大領土的“剿撫”，并且在18世紀后期以前（除了1673—1681年的三藩之亂外）已經度過了非常漫長的國內安定、相對繁榮和強有力的統治的時期。以近代標準來衡量，加在民眾身上的稅賦負擔還是輕的，雖然稅政有時是隨心所欲的。中國也像其他社會一樣存在著腐敗墮落行為，但是通商口岸觀察家眼中的大部分“貪污腐化”卻反映了外國人無法理解的那種非正式但又是制度化的陋規的情況，這種陋規已滲透到了清朝官方法典規定的高度合理化的財政制度里面。即使商人在官方意識形態中地位低賤，有時還過度地被迫向政府進行“捐獻”，但這不能抹殺他可能發財致富的事實。18世紀包攬兩淮鹽運的業務每年平均利潤也許可達500萬兩，此數由30個大運輸商和約兩百個較小的商人分潤；另外有200萬兩利潤每年在大約30個行號之間分配。商人還可能很有勢力，特別在農村市場結構中更是如此，因為農村中當官的和不當官的地方上層人物都通過商人之手向商業投資或放高利貸。此外，商人還可能很幸運，他的兒孫因為有許多余閑工夫并受到嚴格的教育——也許還捐納了初級功名——而可能進入政界。總之，對按人口計算產量相對穩定的傳統經濟的維持、擴大和繁榮來說，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行政至少是不起作用的因素，除了在重復出現的王朝衰敗時期外，它們幾乎從來不是主要的障礙。

但是，如果討論的出發點是經濟發展，即或是從增加每人的國民產值的意義上說，或是從工業化（就是近代制造業部門有了迅速發展，不管有沒有按人頭直接增加產量）的意義上說，19世紀后期的中國政府肯定是沒有能力提供積極的支援的。意識形態、傳統的財政措施以及收支的格局，都是對采取順應形勢的行動的障礙。

格爾申克龍教授曾經指出，[[34]](#_34_Ya_Li_Shan_Da__Ge_Er_Shen_Ke)在歐洲“落后”國家的最初的工業化熱潮中（例如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國家預算代替了受到貧困的農業部門嚴重限制的微弱的市場需求和資本供應。在德國和法國等不那么“落后”的國家中，工業銀行提供信貸的業務也起了同樣的作用。但在清末，中國卻一樣也沒有。如上所述，除了近代外國銀行在為國際貿易提供資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外，1911年以前的中國的銀行體系幾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號式的匯兌銀行和地方性的“錢莊”的范圍。中國第一個近代銀行——即半官方的中國通商銀行——的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匯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當這項業務失敗后，他們就把力量完全轉到常見的商業銀行業務方面。以后創辦的兩個較小的官辦銀行（1908年創辦的交通銀行；1904年成立并在1908年改組為大清銀行的戶部銀行），都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

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產生工業投資的近代銀行體系的原因，歸根結底與使它不能以自己的預算資金投資于經濟發展的原因相同。簡言之，與其行政的其他方面一樣，中央政府的財政制度是相當地浮在表面上的。甚至在正常時期，帝國官僚政治的組織雖然在形式上是高度集中的，仍不能深入到中國的社會（包括這個社會中那些構成經濟的方面）中去。中央政府通常將其經濟作用只限于要求分享一部分生產中比較固定的經濟所得，以及保持國內安定和防御外患以確保下一年的再生產。這個作用當然符合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在帝國長達兩千年的不同時期中，為了擺脫經濟中的消極無為狀態，曾利用過在支撐帝國制度的儒—法思想混合體中較為活躍的法家體系，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就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極為保守的清朝也許是特別難以擺脫經濟上的消極無為的狀態的，因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異族，所以決心通過維護儒家的正統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隨著土地耕種面積的增加（直到1800年前后）和人口緩慢而不均勻的增長（除去19世紀中期叛亂時可能有所減少外），總的經濟產量當然是發展的。但對中央政府來說，由于增加了大致是上述的兩種生產因素而引起的生產發展，并不能使它取得增加收入和增加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帝國最重要的收入（田賦）的官方稅率被康熙帝在1712年永久固定以來，各省上繳北京的份額只有在新地得到開墾和納入稅冊的情況下才有所提高，但這些增加的情況各省是很少上報京師的。

但我們還會看到，各省和地方的稅收顯然仍保持著它們的適應能力，并且隨著全國產量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從促使經濟可能取得發展而不是僅僅維持經濟平衡的觀點看，這些新資源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中央政府的官僚集團內部依然存在著出現一種意識形態的可能性（雖然很渺茫），使法家式的“經國之道”又能夠東山再起，去推動各種經濟發展的規劃。在一定程度上，這項工作由19世紀后期如李鴻章、張之洞和盛宣懷等“自強主義者”，以及1898年的“維新派”和1901年以后清末的維新運動去做了。但是，地方的行政直到清朝快要滅亡時明顯的是儒家式的“濟民之道”的發源地。這種“濟民之道”比官僚國家的利益本身更廣泛，更普遍，并且反映了地方上層人物要竭盡全力使一個真正屬于他們的社會保持固定不變的愿望。這些人接受的是以道德典范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并且賴以支撐自己的也是這種思想。雖然儒家式的“濟民之道”在1900年以后日益被摻入了反帝的民族主義，但它還沒有發展到愿意在財政上負擔經濟發展的程度。在這里，不能指望有主動進行變革的有力的活動。因此，我的注意力將放在因中央政府的無能而出現的種種情況上——它肯定是弱的，但什么也不能代替它。

在1712年至19世紀第三個25年的期間，北京政府記載的法定收入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政府在下列年份中的歲入總數分別是：1725年為36106483兩；1753年為39767292兩；1812年為43343978兩；1841年為38600750兩。田賦提供了總收入的75%—80%）。雖然康熙帝凍結了田賦稅率，但各省和地方的稅收仍繼續增加。除了上繳中央政府為數很少的稅收定額外，它們用三種辦法來增加實際稅收。第一種是“耗羨”，在理論上，這是為了彌補上繳白銀成色的不足和熔鑄銀錠時的損耗而開征的。實際上，這些損耗微乎其微；耗羨事實上就是在康熙規定的稅率以外增稅。在1724年，這項附加稅得到清帝的正式批準，其中的一部分上繳北京作為每年付給官員們的“養廉”津貼，以補貼他們微薄的官俸。但是這項附加稅的大部分收入仍不受北京的控制。第二種辦法是地方官員向納稅人加征成為慣例的各種名目的征稅花銷。第三種辦法是州縣官員可以比較自由地在名義上應征的糧或銀與每擔糧或每兩銀的銅錢值之間規定折換比率，然后按此比率十足征稅。

在19世紀中期，在傳統的田賦、鹽稅和關稅以外又增加了兩種重要的收入來源。1854年以后成立的外國人管理的帝國海關正式規定向對外貿易征收關稅，并把收入上繳給北京政府而不歸各省掌握。第二種新稅制則相反，它幾乎完全脫離了北京的控制。這就是厘金稅，它原來是各省官員為了籌資鎮壓太平軍而設立的。作為向通過運河的糧食征收的內地過境稅，厘金稅1853年首先在江蘇省開征。到1862年，它幾乎適用于一切商品，并且差不多各省都已征收。在有些情況下，不但在運輸線沿線征收，而且還在出發地作為生產稅或者在目的地作為營業稅征收。稅率懸殊，從貨價的1%到10%不等，而最普遍的稅率是每個厘卡收2%。在各省每年向戶部上報的商品厘金稅中，中央政府只能處理約20%，其余的實際都歸各省掌握。未上報的數量不詳的稅收當然也歸地方留用。

此外，為了支付中亞叛亂、與俄國的伊犁爭端、中法戰爭以及水災饑荒等連續發生的一系列危機的費用，經戶部在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經常的督促，最后通過提高鹽稅和雜稅而使收入少量地和暫時地增加了幾次。80年代和90年代帝國的收入與19世紀中期收入相比幾乎增加了一倍，但這幾乎要歸因于關稅和厘金稅。對及時資助左宗棠軍隊遠征和“平定”西北這類緊急要務來說，傳統的財政制度是無力迅速作出反應的，政府被迫只能向外國貸款求助（見第四章）。在1894年前，簽訂了總數為4000萬兩的九筆貸款，其中大部分用于軍費。這些資金是由通商口岸的外國企業而不是由外國政府借給。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已經償還了本利3300萬兩，錢大部分來自海關收入。

表21所列為19世紀90年代初期典型的一年北京一切來源的收入和主要開支項目的估計數。各項收入數字并不表示實際解交京師的稅收數；它們是每年（分兩次）上報戶部的數額。這些上報的收入那時以貨幣或實物分存于幾個省，等待戶部的調撥。中央的國庫不編制收支綜合預算（維新派未實現的計劃之一就是要編制正規的全國預算）。相反，不斷發生的開支項目逐漸在某些特定省的特定稅收中一筆一筆地支用。結果，上報總數中的一部分由各省留用，以支付以后地方上的民政和軍費開支，第二部分上繳北京（或根據戶部的指示解交其他地方），在某種情況下，還有第三部分作為協助款項轉撥他省。這種財政制度適合于短程的運轉，而傳統慣例的壓力使它不能對緊急的需要作出迅速反應。由于太平軍叛亂和19世紀中期其他的叛亂，北京對帝國各項收入來源的控制已被削弱，財政制度也嚴重地被打亂。但是與清朝的最后17年相反，由于有了新收入的支持，政府的民政和軍費開支在1894年以前可以得到解決而不用向國外大舉借債，正常的收入還進而被用來分期償還已經借入的數目不大的外國貸款。當然，對現代化海軍和洋式軍隊的大量投資收益甚少，這可以從1895年以前洋務運動的軍事和工業項目所取得的微小的成績中得到證明。

表21 19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年收支的估算數



資料來源：賈米森《中華帝國財政收支報告》。

上面已經說過：每年上報北京的收入只表示帝國稅收總數的一部分。中央政府能夠控制的全國潛在的財政資源部分，基本上無伸縮余地。它沒有機會從發展的對外貿易中增加收入，因為關稅率未經條約列強的一致同意，不得變動，而且它控制鹽稅和各種次要稅收的能力也有限。對全國的稅收總收入已經作出了幾個估計數，就絕對數字而言，各個數字最多也只能說是合理的猜測，但合起來看，它們有力地證明了在清朝最后10年中各級每年稅收總數是上報北京數額的兩倍多。最近對省一級《財政說明書》（1909年根據帝國法令在各省成立的清理財政局的報告）的考察，表明1908年的稅收總額為2.92億兩。[[35]](#_35_Wang_Ye_Jian____1750__1911Ni)馬士在其《中華帝國的貿易和行政》一書關于收支情況的論述中提出，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初期年收入總數至少為284154000兩，各級收入如下：帝國政府99062000兩；省級政府142374000兩；州縣政府42718000兩。最后，資政院編的1911年帝國“預算”估計中央和各省的收入總額為301910297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厘金稅44176541兩，而以往每年各省上報數為1200萬至1500萬兩；非稅收的收入9200萬兩）。與明治時期的日本相反，日本在1873年修改土地稅后，把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直接置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晚清的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沒有能力擴大它對收入的控制。

如果我們假定清朝后期的收入總額約為2.5億兩，北京分得1億兩，那么國民收入有多大部分可用于政府的支出呢？由于缺乏可靠的國民收入資料，當然只能作出最粗略的估計。如果張仲禮的“19世紀80年代每年國民總產值的初步估計”因對農業產值估計偏低而這里對它進行了調整，那么19世紀后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可能為3338757000兩上下（見前面表1）。政府收入總額就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5%，而北京所得的那部分款項就占3%。[[36]](#_36_Wo_Ji_Suan_De_Zheng_Fu_Shou)我已經承認，這些比例有著很大的誤差。記住了這一點，那么注意到以下事實是有意義的：在國民總產值中政府消費量所占的比重在19世紀中期西歐各國和美國也可以找到。[[37]](#_37_Xi_Meng__Ku_Zi_Ni_Ci____Jin)不過，這些不太“落后”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用不著從政府預算中直接取得重大幫助就可以進行下去。

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把總消費量中的較大部分高質量地用于健康、教育和總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服務（其中包括商業服務和市場銷售服務）方面，這些服務工作可以形成一種環境，使私人在向新企業投資時能夠獲利。中國的問題不但在于國民生產總值中受政府控制的部分特別小，而且即使對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總額的40%。同樣重要或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部分幾乎全部用于軍事目的，主要是鎮壓國內叛亂，同時也用來對付若干較小的外來危機。即使在整個19世紀期間中央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情況依然如此；可將表21與所選以前幾年每年收入的例子作一比較。政府的各項勞務與原來一樣，沒有顯著的擴大；也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擺脫這些勞務的傳統局限性，即限于維持秩序和征收稅賦以支撐清帝和他的官僚機器。也許在1900年后清政府受到反帝的民族主義的激勵，在思想上準備有些作為，但是政治上的軟弱和財政上的緊缺，使實際的支出只能限于如創辦新的學校體系和促進工業低水平發展等方面。

1895年以后，由于三倍的賠款要求、巨額外債的償還以及軍費支出等情況，到那時為止北京朝不保夕地大致維持的收支平衡遭到破壞。雖然意識形態上的流行調子從“重農輕商”轉到了“富國強兵”，但帝國政府仍沒有方便條件去改變它到那時為止基本上是消極的經濟的作用，甚至它曾想要有所轉變也無能為力。盡管有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保守派對包括發展近代經濟等變革的抵制直到清王朝滅亡時仍是強有力的。

在1894—1911年期間，清政府與外國人簽訂的貸款達746220453兩庫平銀。其中330587160兩貸款用作興建鐵路之用，以后用鐵路本身的收入償還。雖然有幾項借約給予承受抵押的外國人以實際經營特權和采購材料時的豐厚傭金，但鐵路貸款本利的償付并不意味著給中央政府的正常收支直接增加負擔。為工業目的而借的借款都比較少，共25517349兩，其中為架設電報線和購置設備而借入的資金為5452783兩，雜項用途的借款為647812兩。工業借款主要包括日本債主借給半官辦的漢冶萍公司的貸款。漢冶萍公司無力償還這筆債款，債務越陷越深，于是就給日本提供了借口，把正式承認日本控制該公司的內容列入1915年的“二十一條”要求之中。

除了鐵路建設的巨額借款外，借款主要用作中日戰爭的軍費（119838648兩）以及中國必須支付這個戰勝國的巨額賠款（263176701兩）。這些借款總額中包括幾筆短期貸款，表22列出七筆主要的軍事借款和賠款借款。這些借款本利的償還需要在表21所列的正常歲出外增支2000萬兩。這些資金來自何處呢？在表22所列借款中，除了兩筆，全部以海關收入作擔保。1895年的瑞記借款是以江蘇省的鹽厘為第一擔保，以關稅為第二擔保。1898年的英、德借款則以關稅中未抵押部分（由于以前幾次借款，這一部分在1898年數額甚小）以及在海關總稅務司監督下的長江流域七個關卡的鹽厘和貨厘收入作擔保。但是，這還只是事情的開始。1890—1900年每年的關稅收入相當穩定地保持在二千二三百萬兩上下。以關稅償還外國借款就使戶部的固定收入項目大量虧空——根據戶部的計算，1900年至少虧空1670萬兩。最后，就靠以下的辦法來償還外國借款：幾次提高鹽價，減少某些官俸和津貼，提高國內鴉片的稅率，增加銷售稅和其他雜稅，稍微增加上繳北京的厘金稅數額等等。這些都是傳統的措施，但每個措施都是與各省當局長期磋商的結果。借款能如期償還，但在1902年前，財政制度一片混亂。較為有趣的是，中國在1898年第一次籌備發行國內公債：共1億兩“昭信股票”，年利五厘，20年內還清。在地方紳商抱怨這是勒索行為的一片叫嚷聲使這一試驗壽終正寢以前，也許有價值1000萬兩的債券已經售出。公眾對清政府的“誠信”沒有信心，也沒有銀行體系能像民國時期經常實行的那樣，以高折扣來收購政府公債。

表22 1894—1898年軍事借款和賠款借款



資料來源：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年》，第28—31頁。

除了每年需要償還表22所列的借款外，從1902年起至少要籌措同樣多的款項以償還每年的庚子賠款。在清朝的最后幾年，歸還各項借款和庚子賠款的數額每年合計達四千六七百萬兩。增加支出的一部分來源來自1902年修改關稅率以后增加的關稅收入和辛丑各國和約規定的由海關各署監管的地方關卡收入。但是在清朝滅亡以前，四分之三的庚子賠款是用各省在表21所列的份額以外每年多上繳給北京的田賦、鹽稅和厘金稅收入支付的，這件事頗給人以啟發。北京每年向各省索取以前不歸它控制的1800萬兩以上的收入當然只有在外國軍隊實際占領華北的特殊情況下才有可能（盡管此舉仍引起了強烈的抗議，并且仍經過了1895—1901年反復的討價還價才定了下來）。但從這筆資金和其他更屬臨時性的籌款可以得到證明，清末的經濟有著一定的儲備潛力。問題在于缺乏意識形態的支持和政治力量這兩種因素去動員這一潛力進行生產性的投資。

在1895—1911年期間，因庚子賠款和三筆借款共償還本息476982000兩；后面三筆借款（一筆俄法借款、兩筆英德借款）是給日本戰爭賠款才借入的。這個事實意味著中國的可用資源大量枯竭（如果把其他四筆軍事借款也包括在內，清償款項將增至547552066兩，但我們要考慮到軍費是必不可少的項目，并不是賠款所表示的資源凈損失）。476982000兩的總款項相當于1912年前向外國人借進的全部鐵路建設款的一倍半。它又相當于1895—1913年期間建立的一切外資的、中外合辦的和華人自辦的企業全部創辦資本的兩倍以上。中國經濟中的資金大量外流，其來源除了靠清朝最后10年增加的海關收入外，最終還是靠增加地方稅吏向民眾征收并上繳給中央政府以償還外國債主的稅收。

但是清朝沒有垮臺，主要原因是民眾只反對過分沉重的捐稅。可是以后的情況恰恰相反。到了1911年，不但它的財政資源，而且它的政治力量都成了沒有根基和不起作用的因素。當北京政府在1900年后慢慢地開始打破思想上的抵制而在各個方面進行“全國的開發”時，它不但缺乏必要的政治控制（雖然它打算取得這種控制），而且還負著外債，這些外債又優先拿走了它借以開始進行發展的財政資源。但是取得這些外債的過程已經成了一種不客氣的教育工具，它促使政府開始去擴大其開發目標。也許這樣就孕育了一種必然要發生悲劇的因素。

在19世紀后半期，“傳統”的中國經濟已經開始緩慢地和很小規模地起變化了。但是這些變化并不會促使人們抱奢望，以為只要經過短短幾十年，經濟制度就會激烈地被改組（即“現代化”、“工業化”）；也不會叫人們去幻想，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的經濟能夠繼續沿著傳統路線（清朝約在1800年以前曾以此夸耀于世）發展下去。明擺著的事實是，到19世紀中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中國的經濟已經達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術（機械的和組織的）進行發展的極限；而且到1911年時，很少新技術（“先進的”、“現代的”）被引進和采用，也沒有從內部產生。此外，不論是國家部門或是私營部門，在思想上和財力上都無力把“經濟發展”作為一項優先政策來倡導。

但另一方面，盡管各部門和地方出現了緊張狀態，但到清朝滅亡之時，還沒有大量材料可以說明這個經濟制度已經病入膏育，所以不能說推翻和拋棄它的時機已經成熟。大部分人的生活接近最低水平，但要著重指出的是，仍離最低水平有一段距離。社會動亂和階級沖突是地方性的。但是，這種騷亂并不體現為基本的、危及全局的惡性弊病，而似乎是隨著出現的那些臨時的、基本上是無規律的危機的范圍和激烈程度而起伏，而這些危機（例如旱、澇、歉收、盜匪和內戰、外國的侵略和官吏的貪污腐敗等）并非產生于經濟制度本身。最后，由于技術沒有進步，可以料想人口對土地的無情的壓力威脅著整個經濟的生存能力。但是在20世紀開始時，怎樣對付這個大問題還沒有提上日程。在“平年”，城鄉人口都能有衣有食，盡管很貧困。

事實上，舊制度的意識形態因素和政治因素比我們恰切地解釋為經濟性的因素垮得更早，被拋棄得更早。當新的政治力量有意識地轉向經濟發展的任務時，它們也許過分自信地認為，傳統的經濟在1949年前革命的一個世紀中也已被破壞無遺。它們認為一旦加給人民力量的沉重枷鎖被打開后，在中國經濟的基本價值觀或結構中就沒有內在的東西會阻止經濟的迅速發展了。這種希望仍像幽靈那樣繼續附在北京的身上。

（楊品泉 譯）

[[1]](#_1)本文作者感謝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經濟委員會和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所在作者準備這篇文章時給予的支持。

[[2]](#_2)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47—64頁。

[[3]](#_3)同上書，第97頁。

[[4]](#_4)喬啟明、J.L.巴克：《中國農村人口集團的組成和增長》，載《中國經濟雜志》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第219—235頁。

[[5]](#_5)見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的文獻研究》，載《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1966年），第566—599頁，以及其中所引村松教授關于租棧的許多論著。

[[6]](#_6)關于19世紀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類型的情況，甚至還沒有任何調查材料可與各種公認還很不夠的20世紀的報告相比。我的論述的部分根據是地方通訊員答復1888年調查表的數字，見賈米森《中國的土地占有和農村的人口狀況》，載《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第23期（1889年），第59—117頁。

[[7]](#_7)見石川滋《亞洲人眼光中的經濟發展》，第69—77頁。

[[8]](#_8)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第311頁。

[[9]](#_9)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2冊，第382—390頁。上面列有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著作中132種有關手工業工場的參考資料；這當然不是能予檢驗的典型部分，也不是詳盡無遺的全部材料。

[[10]](#_10)鄭觀應：《盛世危言》卷7，第20頁。

[[11]](#_11)布萊克本商會：《1896—1897年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報告書》內維爾和貝爾部分，第212頁。

[[12]](#_12)《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報告書》，F.A.S.伯恩部分，第5—6頁。

[[13]](#_13)《廈門領事區關于土布使用的報告》（英國外交部檔案，雜項，1886年第19號），第4頁。

[[14]](#_14)《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報告書》，F.S.A.伯恩部分，第36頁。

[[15]](#_15)例如，見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頁。

[[16]](#_16)《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年》第2冊，第229—230頁。

[[17]](#_17)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2冊，第356—366頁。

[[18]](#_18)本節所列的通貨單位中國元就是“洋元”，它一般指已經大量流通于通商口岸的墨西哥銀元。這些通貨逐漸被中國銀元所取代。在1933年以前，銀元和銀兩都被用作記賬單位。一塊銀元約值銀0.72兩。

[[19]](#_19)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第2冊，第1166—1169、1170—1173頁。

[[20]](#_20)汪敬虞：《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頁。

[[21]](#_21)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2冊，第1065頁。

[[22]](#_22)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2冊，第1017頁。

[[23]](#_23)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第二部分，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2期（1965年2月），第227頁。

[[24]](#_24)《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年》，第661頁。

[[25]](#_25)天野元之助：《中國的農業問題》第2冊，第241—247頁。他在這一部分謹慎而詳盡地記述了每項貨物從安徽運往上海的費用。

[[26]](#_26)重慶在1898年開始有小輪船到達。正規的班輪始于1908年。

[[27]](#_27)官道驛站的分布表明，大部分官員外出是陸路騎馬行進。清代典制規定全國設立1634個陸路站、92個水路站、54個水陸站以供官員旅行之用。在每段路程中，這些站提供需要的馬匹、大車、轎子或船只和膳宿。公文在1.5萬個郵站之間遞送。見河野通博《清代山東省的官辦陸上交通路線》，載《史林》第33卷第3期（1950年5月），第317—336頁。

[[28]](#_28)當然，中國人為以下的事而惱火：外國人如果取得了“過境證”（只要付相當正規進口稅一半的費用就可以取得）的掩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逃避厘金稅。但是應該記住，只有在貨物仍保持原裝并運往證件注明的目的地的情況下，這種證件才有效。實際上，對過境貨物的征稅可能只是拖延到它們到達最后的消費者之前為止。

[[29]](#_29)庫茲尼茨教授認為，許多小國（即使是不發達的小國）的面積因素相對地說是造成對外貿易在國民收入中占高比重的基礎。見庫茲尼茨《近代經濟的發展：速度、結構和范圍》，第431頁。——譯者

[[30]](#_30)《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報告書》，F.S.A.伯恩部分，第70—71頁。

[[31]](#_31)1900年華資輪船的平均噸位為35噸，所以即使在1913年1130艘內地輪船平均噸位高達100噸這一極不可能的情況下，它的總噸位也只有113000噸。1941年9月，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有118292條大小民船（共計850704噸，船員459178人）在汪精衛政府成立的船員協會中登記。我沒有清末民船數和民船噸位數數字的資料，但絕不可能小于上述僅僅三個省的數字。見滿鐵調查部《華中的民船業》，第134—135頁。

[[32]](#_32)《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年》第1冊，第292—293頁。

[[33]](#_33)但是應注意到，山西票號的地位從1900年前后大大地下降了。在1896年后建立的一些半官方的近代銀行吸收了票號所依靠的大部分匯款業務和公眾存款。

[[34]](#_34)亞歷山大·格爾申克龍：《從歷史角度看經濟的落后性》。

[[35]](#_35)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73—83頁。

[[36]](#_36)我計算的政府收入或支出數中包括張仲禮予以歸入紳士勞務的一部分數字。

[[37]](#_37)西蒙·庫茲尼茨：《近代經濟的發展：速度、結構和范圍》，第236—239頁。

#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 對外關系發生變化的背景

1861年以后，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開始出現了一個新時代。西方的好戰性已有所節制，而中國的反抗也為和好所代替。在兩次戰爭中遭受到的失敗以及英法聯軍于1860年占領北京竟至焚燒圓明園的事實，都使得清廷比較講求實際的官員們在震驚之余認識到一種新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并認識到現代的西方人與早先騷擾中國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當時，越來越感到“西風東漸”以及此風的勢不可遏。因此，中國接受這種現實乃是當務之急，盡管這樣做是不愉快的。一些先進的學者和政治家們決心履行中國的條約義務，使它的外交活動現代化，建立起西式的工礦企業，并且聘用外國人協助他們處理這一新的形勢。其結果是，1861年設立了一個類似外事署的機構，1864年翻譯出版了一本關于國際法的教科書，1873年清帝接見一批外國外交官時準予免行叩拜禮，并且在1876年以后還向國外派駐了外交使團。到1880年時，中國已在國際大家庭中取得了它的地位，并且也像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學會了在一個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行事的世界中搞生存競爭。從形式上看，儒家的“天下”已經演變成“國家”，但是在精神上，昔日的“中央帝國”的世界觀依舊沿襲未改。在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被弄得進退維谷的情況下，中國于19世紀80和90年代投入了保衛越南和朝鮮的戰爭，其原因部分是為了履行它對藩屬的義務，部分則是向西方殖民列強效尤執行宗主權。由于戰爭連遭失敗，藩屬制度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被粉碎，這標志著帝國與外國交往的傳統的徹底崩潰。

從西方來說，一些大國之間也出現了態度、政策和力量對比等方面的變化。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外國政府和商人對新訂條約中規定的特權，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特別是英國，它這時已經斷然要制止住其國民的冒險性和擴張主義的傾向，因為擔心它會陷入管理一個搖搖欲墜的清帝國的境地。1857年印度的大暴動說明統治印度人和穆斯林是極其困難的，這個教訓足以使倫敦認識到，英國不應再在東方追求領土。今后的側重點應該是在不增加取得一個殖民地所需的負擔和費用的情況下發揮政治影響，以取得經濟特權和戰略上的安全保障。[[1]](#_1_Lu_Bin_Xun_Deng____Fei_Zhou_H)因此，1861年以后英國的政策是用和平的方式支持中國的政治穩定和保持英國在商業上的優越地位，這就明顯地擺脫了早先的以對抗狀態為特征的強硬做法。這一溫和政策，再加上其他列強不斷抬頭的自信力以及別國駐北京外交官們日益增加的獨立行動，標志著英國在西方對華關系中的統治地位逐漸衰落的開始，盡管這個變化是難以覺察的。雖然英國在19世紀末以前仍然居領先地位，但是它已逐漸失去一度享有的那種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在1870年以后的約一代人時期中，英國的利益實際上受到了種種威脅，其中有日本勢力向臺灣擴張以及它獲得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俄國在新疆活動，法國并吞印度支那，最后，還有日本使朝鮮脫離（中國）——所有這一切都為1898年在中國“爭奪租借地”之舉打開了門戶。[[2]](#_2_L_K_Yang____1895__1902Nian_Yi)

研究晚清的對外關系必須從兩方面加以考察，這就是既要根據帝國主義力量的加強以及西方主要國家和日本之間勢力結構的改變這一全球背景來看，又要根據滿洲統治日益衰微和清帝國對外交往的舊傳統徹底破產這一背景來看。

## 1866—1875年的對外關系

當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實行現代化時，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年輕的赫德和供職于英國公使館的代辦威妥瑪提出了“進步”的主張，并且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國向外國派出了第一個外交使團。

###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團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題為《局外旁觀論》的備忘錄，他著重說明了鐵路、輪船、電報、礦業以及西方外交活動的種種好處。他機智地暗示，他的勸告如果得到采納，中國將會變強，而如果不加理會，中國就要淪落到在國際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觀所論，并非恐嚇之輕語。而外國日后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國。各國所欲，惟愿中國能守和睦。”赫德認為委派大臣駐扎外國，于中國“有大益處”，因為它可以使中國越過駐在北京的那些剛愎自用的外交官們，而和比較沒有偏見的那些外國政府直接打交道。這一步驟將有助于中國的獨立，有助于“使中國和西方建立起一種十分牢固的聯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從事革新事業，而不致有倒退之虞”[[3]](#_3_Zhong_Wen_Jian___Qing_Dai_Cho)。恭親王覺得赫德“于中外情況尚能留心體察”，但覺得他的主意“亦非急切能辦之事”[[4]](#_4___Chou_Ban_Yi_Wu_Shi_Mo__Tong)。

繼赫德備忘錄之后，威妥瑪于1866年也向總理衙門提交了題為《新義略論》的建議書，闡述興辦鐵路、電報、礦業、辦學、西法練兵以及派駐外交代表的好處。威妥瑪告誡說，今日之外國人與昔日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國若不承認這一事實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尋求進步，那么它的前途肯定多災多難。特別是，在國外派駐外交代表會帶來許多好處，因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間感情融洽，還能預防發生糾紛。“抑或適與某國因事較論，中華果為有理，其余各國必須幫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勸。”威妥瑪敦勸中國在尋求指導時，不應向過去看，而要向將來看。[[5]](#_5_Zhong_Wen_Zi_Liao_Jian___Qing)

由于這些推動，總理衙門決定于1866年派遣一個由正在休假的赫德為向導的、非正式的赴歐考察團。該團由斌椿率領；63歲的斌椿曾擔任過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書。雖然斌椿被授予臨時三品文官銜以提高考察團的身價，但恭親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該團不是正式外交使團，而只是派往西方搜集情報的一個公費觀光團體。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外交禮儀上的問題，同時也無需像正式使團那樣花很多費用。該團遍游了倫敦、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巴黎，它的新穎面貌使它到處受到了有禮貌的歡迎。考察團回國以后不久，團員們詳細記述了他們的所見所聞。不幸的是，他們的觀察主要以西方的社會風俗習慣、高樓大廈、煤氣燈、電梯和機器為限，對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筆帶過。雖然如此，該考察團仍然體現了中國第一次向國外派遣外交使團的努力，不過正式的公使館必須等到1877年才予設置。

### 蒲安臣使團和阿禮國協定

當19世紀60年代西方各國政府在北京執行一項“合作政策”之際，駐在條約口岸的外國商人和中國通們卻日益喧囂地要求執行一項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開放中國全境以與西方通商，并通過修筑鐵路，設置電報，興辦礦業和其他現代企業來促進“進步”。他們的表現以及赫德和威妥瑪的備忘錄引起了總理衙門的恐慌，使它以為英國人在定于1868年進行的修約過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總理衙門焦灼地就這些可能會發生的爭端征詢一些權勢督撫們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駐南京的總督曾國藩主張中國應當委婉而又堅定地拒絕外國人在修筑鐵路、設置電報、內地通航、在中國水域運鹽以及建立貨棧等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為這些活動將有損于中國國民的生計。不過，礦業卻是潛在的利源，中國在草創階段可以利用外國的開采工具。他認為中國在得到適當人選和資金的時候，應在國外設立外交使團，但是他并不關心外交使團的活動內容，因為他認為，它們的活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這取決于所得經費的多少——的情況使它們相對地說既無用也無害。[[6]](#_6_Can_Jian___Qing_Dai_Chou_Ban)當時和曾國藩保持聯系的湖廣總督李鴻章也表示了類似的看法。李鴻章為了消除朝廷的憂慮，他指出修訂條約與和平談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著相互討論，而不是將一國的要求強加給另一國；意見不能取得一致時也不會招致戰爭，而在后一種情況下，談判失敗就有戰爭的可能。因此，在快要進行的修訂條約過程中可以心平氣和地交換觀點，而不會冒戰爭的風險。[[7]](#_7_Can_Jian___Qing_Dai_Chou_Ban)

其實，總理衙門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倫敦當局并不贊成中國通們力圖在中國倉促實現“進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勛爵要駐北京的阿禮國公使確信：“我們決不要對中國人——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中國人民——抱這樣的希望，以為他們會和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待事物；……我們必須引導中國人，而不是迫使中國人采用優越的制度。”[[8]](#_8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5H)

總理衙門在倫敦沒有外交代表，因此對英國的政策一無所知，但是常識告訴他們仍須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辦法。恭親王和文祥邀請美國退休公使蒲安臣參加一個巡回外交使團去歐美勸說各國政府不要催迫中國加快西化速度。蒲安臣過去曾表示在有需要時愿意充任中國的使節，于是他立即接受了這個邀請。他說：“當世界上占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關系，并請求一個最年輕的國家（通過它的代表）在這一變革中起中間人的作用時，我認為這樣的任務是義不容辭的。”[[9]](#_9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8)

1868年5月，蒲安臣和隨行的滿、漢副使各一名[[10]](#_10_Ji_Zhi_Gang_He_Sun_Jia_Gu)率領使團來到美國。他的口才和魅力感染了美國人；在和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作了一次討好的會談以后，他和西華德國務卿于1868年7月28日簽署了一項條約。條約使美國保證對中國的發展執行不干涉政策，規定中國派使領人員和勞工前往美國，同時保證彼此有權在對方國家居住、傳教和留學。雖然蒲安臣是自作主張，事先并未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但是北京當局對此很滿意，并沒有否認這個條約的合法性。

在倫敦，維多利亞女王接見了使團。外交大臣克拉蘭頓勛爵于1868年12月28日向蒲安臣保證：只要中國恪守各項條約義務，它“可以指望得到外國方面的克制”；英國“既不愿也不打算不友好地對中國施加壓力去促使它的政府加速發展它和外國的關系，倒是愿意促使它持續穩妥地來發展，并且在發展時英國愿意適當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該國臣民的情緒”[[11]](#_11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1)。當時曾將這項保證通知了阿禮國，而且還訓令他在即將進行的修約談判中本此精神行事。[[12]](#_12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2)

在取得英國方面的承諾以后，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麥的一項保證，即北日耳曼聯邦將根據北京所認為的最高利益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在取得這些成就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去世。但是，該使團繼續前往布魯塞爾和羅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國。

蒲安臣使團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為它的確促使西方列強允諾在即將舉行的修約談判中執行一項克制的政策；可是，從長遠來看，這一成就卻助長了中國的保守主義。為這次出使花費了16萬兩銀子的滿洲官員，結果卻認為外國人是可以用高價來進行控制的，于是他們變得更加自負，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更加遲緩了。

在就修約問題進行漫長的談判時，英國商界人士卻不遺余力地鼓吹開放全中國，并要求在設電報、修鐵路、開礦、內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多的特權。阿禮國堅決頂住了他們所施加的壓力，以溫和及和解的精神進行談判。在這件事情上，阿禮國曾得到克拉蘭頓和有影響的貿易部常務次長馬萊特的有力的支持；后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長意見書中，表示擁護在中國執行一條“穩妥的路線”，以便鞏固業已取得的地位，同時采取道義上的影響和溫和克制的態度以求得將來的發展。[[13]](#_13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5)1869年6月4日，克拉蘭頓實際上授權阿禮國接受中國當局感到滿意的無論什么樣的協定，而等到將來“再對各項條約進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徹底的修訂”。指令說：“你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東西，女王陛下政府對此表示滿意。”[[14]](#_14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1)

雙方以對等的地位進行實際的談判，沒有軍事威脅，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根據談判結果，1869年10月23日簽訂了阿禮國協定：它準許中國在香港設立領事館；鴉片的進口稅按價提高2.5%，生絲的出口稅提高1%強；并且確定了最惠國待遇的規定，這樣英國就必須同意，如果其他列強希望取得某些權利的利益，那么就可把這些權利授予它們。其他條款包括開放溫州和蕪湖，同時關閉海南島沒有用處的瓊州；在進口港對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增收2.5%的通行稅；外國人可用自備的中國式木船在內河航行；準許汽輪船在鄱陽湖航行；外國人有條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國內地有臨時居住權；中國方面同意采用一項成文的商業法法規。總而言之，該協定的各條條款表現出彼此都有所讓步。

總理衙門對于這樣一個最先出現的平等的協定當然很得意，并且以為只要雙方簽了字就成為定局了。倫敦的批準被看作一種形式，因為它與外國列強前此訂立的條約從來沒有不被批準的。所以，總理衙門竭力促使朝廷迅速通過該協定，特別是由于英國商界反對該協定的情緒在日益增長。[[15]](#_15_Can_Jian___Qing_Dai_Chou_Ban)

阿禮國本人對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滿意。他在致克拉蘭頓的信中自豪地說：“我相信人們將會發現它 [該協定]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條約第二十七款（或修訂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標。”阿禮國承認他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應歸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說：“我認為主要是由于他的積極干預才終于使得他們 [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放棄以前堅持的許多條款和向我提出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那些條款，這樣做即使沒有好處，至少也是一種可行的權宜之計。”[[16]](#_16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1)阿禮國得意地聲稱：“我們不再是將和平的條件強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為相互的利益進行談判。”[[17]](#_17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5)

可是，英國的商界，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在香港和中國的，都對阿禮國的外交政策抱藐視的態度，嘲笑他關于把中國“當成一個有資格享受文明國家權利和特權的國家”的思想。[[18]](#_18_Lai_Te____He_De_Yu_Zhong_Guo)他們竭力反對協定中的各項條款，特別反對在香港派駐被認為是一名稅務官和密探的中國領事。國會收到無數的備忘錄，說明反對批準該協定的理由。[[19]](#_19_Guan_Yu_Zhe_Xie_Bei_Wang_Lu)外國所采取的不贊成態度更加強了商界的反對立場。除了美國的代辦衛三畏博士贊揚該協定是“和平的勝利”外，絕大多數其他 外交官們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阿禮國還是竭盡全力地維護這個協定，他指出，“在此以前，沒有一個國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對外貿易中作出過這樣慷慨的讓步”，同時指出，中國給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多，所征收的關稅也較輕。[[20]](#_20___Zhong_Guo_Tong_Xun____Di_1)然而，這些論證所起的作用都敵不過商界強有力的反對立場和外國的冷淡態度聯合起來的力量。繼克拉蘭頓擔任外相的格蘭維爾勛爵斷定：批準該協定將會擴大而不是減少誤會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月25日將它否決。毫無疑問，這一行動對中國和外國雙方的利益都有損害。

總理衙門覺得，它對外國的善意和對友好的國際關系這兩方面的信任被出賣了。參加談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國人只取而不給，談判的條約稍不如意就立刻不認賬。繼阿禮國為公使的威妥瑪認為，文祥“渴望著報復，因為我國否決協定一事使他丟了臉和帶來不便……由于1869年的協定被推翻，使館的困難大大地增加了”[[21]](#_21_Jian_Pei_Er_Ke_Wei_Ci___Zhon)。然而，總理衙門在報告英方推翻協定一事的奏折中，措辭卻出人意料的溫和，毫無怨恨之意：

而外國政令，國家柄輕，商人勢重，亦其實情……隨由臣等盡情駁復，仍告以如此項新約不行，則今后辦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語，峻詞直斥……窺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銅線、鐵路、運鹽、挖礦諸大端，中國已經拒絕。即已允之條，復覺得不償失，借此遲回。[[22]](#_22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總理衙門表現出的這種克制顯然是它一箭雙雕策略的一部分。對于中國人，這樣做便貶低了拒絕批準協定的重要意義，[[23]](#_23_Chu_Le_Qian_Yin_Zong_Li_Ya_M)對外國人，則宣揚了英方背信棄義的嚴重后果。顯而易見，總理衙門對它在國際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敗是不會大事宣揚的，而對外國人表示失望則是為了使他們處于守勢。

認為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之事使中國和外國列強間十年來的親善關系毀于一旦，從而引起了19世紀70年代的一場排外主義浪潮，這是夸大其詞。排外的騷亂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經出現，中國方面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于一小批官吏，絕大部分民眾并不知情。講求實際的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在處理對外交往事務中，仍表現得認真負責。排外的暴亂主要是由那些對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一事不知底細的小士紳們煽動起來的。因此，很難把英方拒絕批準協定之事和排外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過英方的行為肯定加深了中國人關于外國人本性貪婪、行動捉摸不定的看法。如果說，蒲安臣的出使助長了中國方面的自滿，那么，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則又一次加深了中國人對外國人可信賴的程度的猜疑。這兩件事對中西關系同樣都造成了不利的影響。[[24]](#_24_Rui_Ma_Li_De___Tong_Zhi_Zhon)

###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國游歷并邀請傳教士“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上”時，反基督教的活動已在全中國境內爆發了。作為一種異端信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學說相對立的，它讓男女教徒混雜集會禮拜的做法又和中國的習俗背道而馳，因此關于教堂傷風敗俗的謠言四起（見上卷第十一章）。教會偏袒中國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時不顧歷來尊崇的風水觀念，這都激起了中國人的反感。[[25]](#_25_Guan_Yu_Jiao_Hui_Wen_Ti_De_Y)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屢見不鮮，而由紳士們煽動的反教活動也時有所聞。這些活動招來了外國外交代表們即時的報復。他們（包括阿禮國）覺得，如果不采取行動，其后果必然是“嚴重喪失在東方不得不賴以辦事的威信和影響”。于是在1868年8月，當揚州的一群暴民搶劫并焚毀了中華內地會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禮國便派領事麥華佗和四艘兵船前往南京，迫使總督曾國藩將揚州的地方官撤職，并賠償損失。此外，1868年11月當臺灣暴民蓄意打破外國商人對樟腦的壟斷而對他們發起攻擊時，英國的譯員吉必勛和海軍上尉格登便炸毀了中國設在安平的一座軍事設施，并索取賠款4萬兩白銀。這類行動奏效迅速，但總是更加激起公眾的情緒，引起仇外心理。就連倫敦當局也認為阿禮國—麥華佗的行動違背了英國的政策，宣稱吉必勛—格登的行為“應受指摘”，是“輕率的和不可原諒的”[[26]](#_26_Fei_Zheng_Qing____Tian_Jin_J)。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亂的發難地。天津成為這次事件爆發的現場并不偶然，因為它曾兩次為外國軍隊所占領：一次為1858年談判天津條約時，另一次為1860年談判北京條約時。甚至在和約簽訂之后，一部分英法軍隊仍駐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國軍隊的存在總是引起憤激的原因，加上法國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據了天津的皇家離宮[[27]](#_27_Ji_Wang_Hai_Lou)作為領事館。1869年，在一座破廟的舊址上建立了維多利亞圣母院的教堂和育嬰堂。由于中國人很少把孤兒送到這所外國人辦的機構，修女們便訂出辦法，為每名收養兒童付出一筆獎金，這樣就鼓勵那些稱為“兒童販子”的壞蛋去拐騙兒童。這種獎金規定以及高死亡率（因為修女們特別愿意為生病和垂死兒童行洗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們的猜疑。謠言廣為傳播，說外國人在他們的深宅大院內對兒童施行魔法，砍掉他們的四肢，并將他們的心臟和眼睛挖去制藥。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對該育嬰堂進行了調查，查明這些不著邊際的指控并非事實。后來，好斗的法國公使豐大業和他的一等秘書突然持槍而至，要求為修女們平反。當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無力驅散時，他一怒之下開了一槍，雖未擊中該地方官，卻擊斃了他的侍役。這群暴徒為了報復便殺死豐大業和他的助手，焚燒了教堂和育嬰堂。被殺死的有十名修女、兩名牧師、兩名法國官員和三名俄國商人，還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搗毀。這次危機使十年來的親善和合作頃刻付諸東流。外國炮艦迅速開到天津，同時七個國家的公使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和懲兇。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徹查這一案件。年邁多病的曾國藩接受這項艱巨任務后，不料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棘手。法國代辦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都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子文人則吵嚷著反對作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曾國藩表現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不是一心求穩以迎合公眾的情緒，而是甘冒政治風險提出一個必須弄清該案是非的無所偏袒的意見，他勸說清廷必須首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它們不致被卷入到法國的案件中去。曾國藩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他們并非拐騙而來，而是由他們的家庭自愿送來的。他請求清廷發布辟謠聲明，證明并無虐待兒童之事，以此恢復修女們的名譽。

為了解決這一糾紛，曾國藩建議將道臺和天津的知府、知縣撤職；將十五名元兇處死，另外21人流放。曾國藩主張，如果法方仍不滿意，還可考慮加重處罰。

保守派當即譴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將裝飾在墻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大學士倭仁嘲笑曾國藩在處刑問題上和法方討價還價的思想。清廷也認為曾國藩的建議難以接受。正當這時，駐武昌總督李鴻章提出了一個比較合意的解決辦法，即建議將8人處死，12人充軍。李鴻章被調來天津接辦此案，曾國藩則被派為駐南京總督。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又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因而灰心喪氣。他在致友人書中說，他“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幸運的是，法國在中國表現的好斗精神因歐洲爆發了普法戰爭而得到緩和。李鴻章迅速將此事予以解決，他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往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邊疆服苦役。崇厚率領的賠罪使團來到法國后，不料發現法國政府因忙于對普魯士的戰爭而顧不上接待該使團。總理衙門于是命令崇厚回國。可是，當他行抵紐約時又被召回法國，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爾賽宮接見他時宣稱：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隨著梯也爾接受了中國皇帝的道歉信，這一事件便告正式結束。[[28]](#_28_Bi_Nai_De____1870__1871Nian)

### 覲見問題，1873年

雖然外國的外交使節1861年時駐在北京，但是他們仍被拒絕覲見幼帝。恭親王曾以半攝政者的資格接見他們，并表示皇帝尚在沖齡，不宜覲見。雖然外國代表們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沒有理由非要和一個年齡才五歲的皇帝見面不可，但他們仍爭辯說，一再推遲覲見乃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當然，中國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國人不肯行叩頭禮，而這是和中國之為天下共主的神話以及古已有之的納貢制格格不入的。

總理衙門的策略使覲見問題延了期，但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當1867年秘密討論修約問題時，總理衙門就該問題征求過幾個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見。絕大多數人主張在皇帝成年以前應回避這個問題。李鴻章聲稱，與恭親王接觸就足以上達天聽，直接覲見并不會使外交代表另有所獲。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覲見儀禮問題，他主張可以允許外國公使沿用晉見本國統治者的禮節。曾國藩則堅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經把俄國看成是一個平等的敵國，而不是一個下屬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國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敵國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國的習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員爭辯說，中國不應為了外國人的方便而改變它的制度規矩。

1872年，皇帝已經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們都未被邀參與盛典，這便回避了禮賓問題。1873年2月新帝宣布親政，外國代表又一次提出覲見的要求。總理衙門看到不能將這個問題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們專就履行適當禮節問題反復討論，最后同意外國代表入覲時可以行鞠躬禮而不必叩頭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國的外交官們在這天上午五點三十分鐘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點鐘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此時在北京交換1871年條約批準書的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乘機顯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才能，同時堅持他是大使級，接見時理應先于西方的公使，這樣才能維護日本和西方列強之間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個受到接見，隨后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公使以及德國的翻譯官按資歷依次晉見。他們都將本國的國書放置御案上；皇帝通過恭親王之口對使臣們所代表的各國元首表達了他的敦睦之誼。西方外交官們等待了12年之久的這次覲見禮的全部過程只用了半小時。[[29]](#_29___Ying_Guo_Yi_Hui_Wen_Xian_J)這次覲見有負厚望，尤其是當外國代表們后來得知他們被接見的那個紫光閣就是接見貢使之地的時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30]](#_30_Li_Ru_1839__1843__1845__1848)

### 馬嘉理事件，1875年

19世紀70年代初期，歐洲部分地由于關稅戰而造成的大蕭條，給1872年以后一直衰退的對華貿易帶來了不利的影響。為了打開貿易局面，英國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過建筑和開辟一條由緬甸通往云南和長江上游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通往中國內地的后門的老方案。

一位從印度軍隊中退休的軍官理查德·斯普萊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出這個主張，以抗衡俄國從西北及美國橫渡太平洋而來的競爭。倫敦方面反應冷淡，但是斯普萊不屈不撓地向每一屆新任外相提出這個建議。1859年任外相的魯塞爾勛爵指出，“斯普萊是一位喜歡胡思亂想的空想家……他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的興趣，然而不切實際”。[[31]](#_31_Jian_Pei_Er_Ke_Wei_Ci___Zhon)外交部門確信，這樣從后門闖入的做法只會制造麻煩，不會帶來商業上的好處。1874年，高級官員中唯一對該計劃抱有幻想的索耳茲伯里勛爵執掌了狄斯累里外交部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對提議的這條路線進行勘查，并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的公使爭取中國的許可，以便從緬甸派遣一個探路隊進入中國。

雖然采取這條路線進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懷疑，但是威妥瑪發現中國政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請求，并允許英方副領事、28歲的馬嘉理沿長江上溯，前往迎接該探路隊。馬嘉理雖然知道中緬邊界有一幫出沒不定的人對外國人懷有敵意，同時盡管有中國當地官員對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險前往邊境上的八莫，等待來自緬甸的探路隊。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就在該地遭到伏擊而被殺害。

雖然根據國際法準則，一個外國人由于自己冒險而置身于危險之地，所在國是沒有責任的，但是英國政府卻執拗地要中國方面負責，并指令威妥瑪向中國索取賠償。奉令后勁頭十足的威妥瑪要求徹查這一謀殺案，撫恤死者家屬，另派一個勘路隊，并對署理云貴總督（肇事地點即在他的治下）進行懲處。他還就覲見的程序、過境稅、對外國外交官的禮遇以及派使團前往英國道歉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節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應調查此案并同意賠款，但對其他問題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將使館人員撤到上海；這時盛傳他已和俄國公使達成一項盟約，說英國要從印度調來軍隊，而俄國將從伊犁出兵，威妥瑪則在謠言聲中以斷絕外交關系相威脅。

為了避免關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燾率領使團去英國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勸說威妥瑪恢復談判。赫德機靈地嚇唬威妥瑪說，郭嵩燾可能在倫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取消威妥瑪一切邀功請賞的機會，這時英國公使才同意和李鴻章在煙臺的避暑地會晤。1876年9月13日，煙臺條約的締結使馬嘉理事件獲得解決。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派遣一個使團前往英國道歉，并向死者家屬賠款20萬兩白銀。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有關中國政府和外國外交官交往的禮節條款。第三部分規定開辟四個新的通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應為豁免厘金稅的區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對，直到1885年英國政府才批準這個條約，反對來自以下幾方面：（1）美、德、法、俄各國，它們都批評英國采取單方面行動；（2）英國商界，它爭取全部取消厘金稅；（3）印度政府，它反對提高鴉片稅。

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團赴英國道歉，使團變成了中國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中國使館。郭嵩 燾是李鴻章的朋友，時年60，思想開明，他在赴英國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職。當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維多利亞女王呈遞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倫敦設立了中國公使館。兩年后，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圣彼得堡也設立了使館。到1880年時，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中國對西方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遲遲作出對等的反應，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原因。從制度上說，它從不向國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駐使團，而只派遣過負有特別使命的使團：它們在國勢強盛時出去宣揚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為朝貢國，而在國勢衰弱時出去向夷狄種姓求和或與之結盟。從心理上說，大多數滿洲官員都自抬身價，回避涉外事務，而把到國外任職視同流放。蒲安臣的兩名助手返國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國西部擔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則被派往蒙古邊境任職，似乎他們都因為這次國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當一位大學士被問及“當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長辦理外務”時，他回答說：“豈有正直之士熱心于外務者？”[[32]](#_32_Xu_Zhong_Yue____Zhong_Guo_Ji)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紳士和官吏們總是反復強調，歷史上總是用夏變夷，沒有用夷變夏的。他們鼓吹保守主義，反對現代化，指責對外交往為有失體統。這種保守的氣氛和心理上的惰性是如此強大，致使中國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來克服這種阻礙和對西方所實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對等的反應。

## 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和朝貢國擴張的加速

19世紀的最后30年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加緊擴張的時期。經歷了“實利主義的一代”的歐洲，受著民族主義、福音傳道派和資本主義的推動，在亞洲、非洲和中東更加活躍了。工業化引起了對原料和海外市場的需求，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承認擴張是國與國之間的生存競爭。宗教熱情激發了信徒們向異教徒傳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這一切，更有表現為“白種人的義務”[[33]](#_33_Hai_Si____1871__1900Nian_Shi)的那種妄自尊大和自以為是的種族優越感。

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劃時代事件——即美國內戰的結束、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第三共和國的興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解放了向國外活動的能量。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建成進一步助長了歐洲的擴張，新近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國——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與此相反，慈禧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在自強和復興方面的進展甚小；經過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暫的振興之后，清王朝的國勢則是江河日下。外國列強便利用中國的衰弱，對邊疆地區和朝貢國進行蠶食。

### 臺灣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過中國的朝貢國，那時的將軍足利義滿為了通過經商來增加他的國庫收入，接受了朝貢國的地位。但在16世紀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本政治家們覺得這種關系不體面，便中斷了與中國的官方來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關系仍未恢復；滿洲統治者與明代諸帝不一樣，從未想過要把日本納入朝貢制度中。

隨著19世紀中期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國和荷蘭的船只來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決定和清王朝之間建立官方關系，便派遣柳原前光來北京，要求訂約。總理衙門雖然有意通商，卻不愿簽訂正式的條約。保守的官吏們反對與一個先前的朝貢國結成條約關系，因為這樣做會為朝鮮、安南等朝貢國開了先例。他們還引用日本人在中國沿海進行過海盜活動的歷史事實，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間的到來作為證據，說明他們想在中國撈取好處。與此相反，進步的官吏們如李鴻章和曾國藩贊同建立條約關系。李鴻章說，雖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貢國，但它從來不是清朝的朝貢國；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鮮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關系并未受某一個西方強國的指使或幫助，這就表明了它的獨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國不應當對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況，在日本有眾多的華僑，中國每年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銅，而且日本又是近鄰：這些情況又促使李鴻章提出應與日本建立平等條約關系的建議。曾國藩贊同他的上述觀點，并且著重指出中日貿易的互利性質，它與中國—西洋之間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貿易相反。他贊成建立條約關系，但是建議不要給予最惠國待遇。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準與日本締結一項通商章程，其中規定的部分內容是：（1）不侵犯對方領土；（2）在和第三國發生沖突時互相給予幫助；（3）彼此享有領事裁判權；（4）只準在通商口岸，根據海關稅則進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國當領事。

1873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到北京，表面上是為了交換批準書，實際上是參加覲見同治的活動，并探測中國在臺灣事件上的態度。1871年后期，有54名航行遇難的琉球水手被臺灣土著民殺害，日本想借機試圖維護它代表琉球人發言的獨占權利。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琉球的地位問題，便這樣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從1372年以來，琉球一直是中國的正式朝貢國。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與朝鮮和安南，同為最重要的朝貢國。1609年，日本的薩摩藩背著中國征服了琉球，將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轄之下，南部則仍由琉球國王治理。琉球作為一個藩屬，每年向薩摩藩主納貢，還定期向設于江戶的幕府納貢。但是薩摩藩主渴望在與大陸的貿易中獲得好處，所以他還是讓琉球繼續當中國的朝貢國。薩摩藩主決定琉球的王位繼承權，但又允許中國派使去執行冊封典禮。清代共有八批這樣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當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間，薩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讓島上的日本人被發現。雖然中國使者也能覺察到有日本人影響的跡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雙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34]](#_34_Jing_Jian_Ci_Lang____Zuo_Wei)

因此，當副島種臣在1873年說他有為琉球代言的權利時，總理衙門便直截了當地告訴他：由于琉球群島是中國的朝貢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臺灣土著民的殺害一事與日本毫無關系。何況，中國從來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內部事務，因此，中國不能對土著民的行為負責。副島種臣爭辯說，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是以對這一領土的有效控制為根據的；既然中國未曾控制過臺灣的土著民，他們就不受中國管轄，日本懲罰他們的一切行動也就不會侵犯中國的管轄權。隨后，日本政府便決定派出遠征軍，并于1874年4月成立遠征軍統帥部，由大隈重信任統帥，西鄉從道為遠征軍總指揮。這一行動與效尤西方帝國主義路線的明治時代對外擴張的外交政策是緊密配合的，它轉移了國內提出要實行代議制議會的要求，并且滿足了原來的武士們吵嚷著要遠征朝鮮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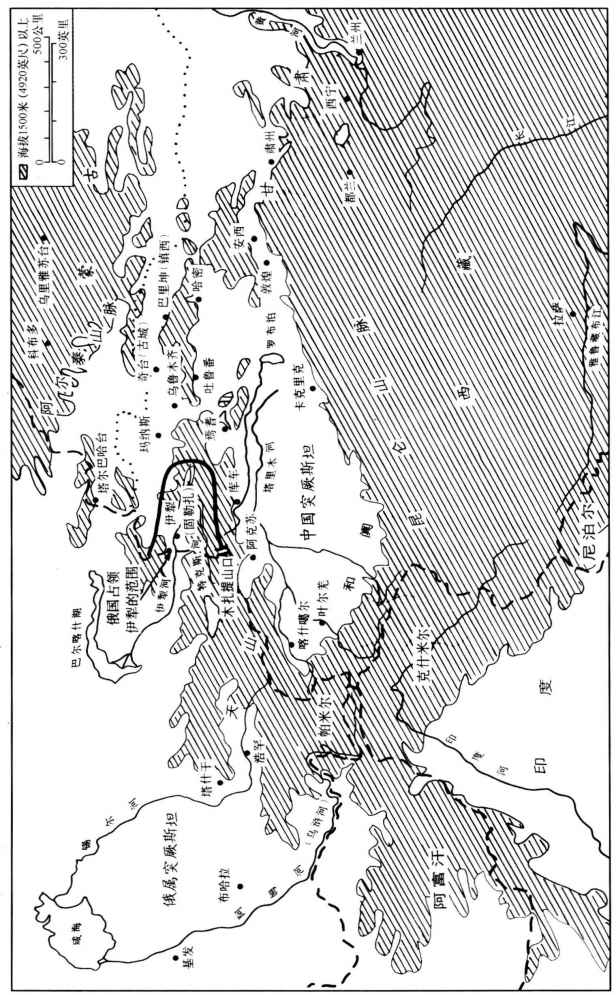
面臨著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防守臺灣。沈葆楨明白不可能進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鑄造的大炮只能鳴禮炮，如果實彈射擊就會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試圖和平解決，但是由于西鄉從道拒不遵守協定，這一企圖失敗了；1874年9月10日，內相大久保利通抵達北京主持這項談判。

大久保一再爭辯說，中國在臺灣島上沒有實行有效的治理，這便證明中國沒有主權，因而日本人在臺灣登陸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國的領土。恭親王堅持，中日關系不應以國際法的總的準則為依據，而應以規定彼此不得侵略對方擁有的領土的1871年條約為依據。大久保反駁說，1871年條約談到的只是中日關系，而不是不受中國管轄的臺灣土著民。接著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國公使威妥瑪表示愿意出面調停。這事的最后解決辦法是中國同意賠款50萬兩（合75萬美元），其中以10萬兩賠償琉球的受害者，以40萬兩用來收買日方在臺灣島上構筑的營房。此外，中國還同意對日本的行為不加譴責。這一讓步含蓄地承認日本對琉球的主權。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愿地對它受的侵犯付出報酬。這件事明顯暴露了中國的軟弱，并招致了外國的進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將它更名為沖繩縣。

### 伊犁危機，1871—1881年

伊犁，俄語稱作固勒扎，是中國的一個府，下轄與俄屬突厥斯坦邊界相鄰近的北部新疆境內的九個城市（參見上卷第二章）。伊犁河谷不僅農業發達，礦藏豐富，而且在戰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個新疆，因此，西方的軍事專家們將伊犁說成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堡壘。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會引起所有強鄰的注意。1851年，俄國人如愿以償地締結了伊犁條約，他們獲準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邊境上的楚呼楚（塔爾巴哈臺）建立領事館和進行免稅貿易。伊犁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同時俄國人在中亞的不斷擴張使他們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國人利用了19世紀60年代在新疆發生的一次回民暴亂，準備進入這一重要地區。

新疆回民之亂的根源在于清帝國地方行政當局的腐敗（參見第四章）。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像一個軍事殖民地那樣由駐在伊犁的將軍統轄，輔以一些副將軍、皇室代理人以及駐在各重要據點的大約21760名士兵。擔任高級文武官員的幾乎全是滿洲人和旗人，他們通過稱之為伯克的當地首領統治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大都是講突厥語和纏頭的維吾爾族穆斯林。滿洲征服者將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開化的土著，對他們征收重稅，強迫他們交納貢品以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滿釀成了叛亂，而那些被清帝國驅趕到浩罕去的、原為世襲并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統治者（和卓）則一直熱衷于恢復他們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國征服以前，瑪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們曾一度統治過喀什噶爾（新疆南部）。他們慫恿新疆境內同一宗教的教民發動叛亂，他們自己則組織入侵。在清帝國征服以后的一個世紀，起義和入侵不下12次之多。1864年，當清王朝衰落和中國西北部發生一次回民之亂之際，新疆境內的穆斯林再度發起了攻擊。清政府的地方當局過分軟弱，無力將它鎮壓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這時又正全力對付太平軍、捻軍和其他一些叛亂，騰不出手來采取懲罰性的措施（參見上卷有關章節以及本卷第四章）。[[35]](#_35_Xu_Zhong_Yue____Yi_Li_Wei_Ji)



地圖5 中亞

在這動亂之際，浩罕的一個將軍——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經過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后于1870年自立為喀什噶爾以及部分北疆的統治者。印度境內的英國人為了遏制俄國影響的擴張，便鼓勵他建立帝國，并派遣使團前往修好和提供武器。

俄國人對這些事態的發展表示關切。他們認為阿古柏建立的帝國意味著英國勢力的擴張，而如果從英、俄在近東和東亞對抗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一擴張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了。不僅如此，新疆境內的騷亂已經對俄國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不利，并在俄國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中造成了動亂。俄國的軍人、官僚和資產階級報刊全都吵嚷著要求長期占領伊犁，但是政府決定占領它到中國在新疆恢復政權時為止，然后把它交還給中國，以換取通往中國西部的幾條新商路和某些“邊界的調整”[[36]](#_36_Na_Luo_Qi_Ni_Ci_Ji____1860)。1871年7月，俄屬突厥斯坦第一任總督考夫曼將軍派兵占領了伊犁。

圣彼得堡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國人在這動亂之際監管伊犁是對中國的一種友好行動，但是，俄國顯然認為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再也不會恢復它在新疆的統治了。為了使動亂持續下去，同時也為了使他們能無限期地占領伊犁，俄國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簽訂了一項商約；一年后，英國人也起而效尤。俄、英兩國都承認了阿古柏的政權，由此換得了一些商業特權。

清政府必須先將陜、甘兩省回民之亂平定以后，才能過問阿古柏的問題。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為陜甘總督以鎮壓陜、甘的叛亂者。可是在他率軍出征之前又被調去平定捻亂。1868年捻亂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負起了這項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練的領導、巧妙的戰略和艱苦的戰斗撲滅了這兩省的叛亂。當左宗棠的軍隊正準備進擊新疆時，上面提到的與日本之間的臺灣危機突然爆發；中國從事變結果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它亟須加強海防。中國這時面臨著一個傷腦筋的問題：它是否能夠既實行一項大膽的海軍計劃，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高昂的新疆戰事。緊接著便展開了一場大爭論。

海防與邊防之爭

經過了10年自強運動之后，恭親王和文祥首先對海防力量不足的狀況感到驚慌。他們發出警告說：“如果我們還是這樣隨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則更難對付將來的麻煩。”沿海的高級官員們提議建立一支擁有48艘艦只的海軍，編為三個海軍中隊，分駐在中國的北、中、南部海岸。他們認為日本的威脅比俄國的更為直接。這個集團的領袖人物李鴻章大膽地請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計劃，將它的費用轉移到海防上來。

海防派的論據有五：（1）邊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緊迫，因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則離京師遠；（2）由于財政拮據和新疆之役的勝算毫無把握，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貧瘠，不值得花這樣高的代價去收復它；（4）新疆的周圍都是強鄰，不能長期固守；（5）緩期收復新疆并不是要放棄這片列祖列宗經過百戰所得的土地，只不過是保存實力以待他日大舉的一項明智辦法。

另有許多官員雖對海防的重要性不表異議，但他們力主不應當用犧牲邊防的辦法來辦海軍。如果中國不能將新疆的叛亂者平定下去，俄國人就會繼續前進，西方列強也會從沿海進攻作為呼應。俄國與日本或西方列強相比，其威脅更大，因為俄國和中國有共同的邊界線：俄國既可由陸路，亦可由海路進入中國，而日本和西方國家卻只能由海上進入中國。他們將俄國的侵擾喻為心腹之患，而西方國家的威脅只是肢體之病。該集團的領袖人物左宗棠強調說，西方列強通常為了商業特權而開仗，而俄國除了追求商業的讓步外，還有領土要求。

邊防論者也提出了五點論據：（1）新疆是西北防務的第一線，它守衛著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強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險，而俄國人在新疆的推進已經成為主要的威脅；（3）不應將邊防軍費轉用于沿海防務，因為對沿海防務已經撥給固定的軍費；（4）列祖列宗百戰經營的土地不應放棄；（5）像烏魯木齊和阿克蘇這樣的戰略要地應首先收復。左宗棠警告說，如果現在中輟此役，就會招致外國人對新疆的統治。[[37]](#_37_Xu_Zhong_Yue____1874Nian_Zho)

這兩個集團提出的論據都剴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時沿海還未有直接的糾紛，新疆卻正在經歷著一場叛亂，同時伊犁為俄國人所占據。因此，雖然沒有放棄辦海軍的計劃，清廷卻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左宗棠為準備這次戰役而殫精竭慮，最后采取了“緩進速戰”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做好了出擊的準備，3月間便移節肅州。劉錦棠將軍在猛攻之下迅速進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這時還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來越驚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倫敦以尋求英國的調停，同時表示愿意接受中國屬國的地位。但是，左宗棠軍隊的前進速度比在倫敦進行的討論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徹底失敗，于1877年5月29日自殺身死。他的兒子們繼續作戰，但是，鬩墻之爭使一切抵抗歸于無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這塊小飛地仍為俄國人占領外，整個新疆已被收復。

清帝國既然恢復了新疆的統治權，中國就具備了俄國所答應的歸還伊犁的條件。但是，由于駐北京的俄國公使一再拖延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總理衙門便責成它新近派駐在俄國的公使館就歸還伊犁問題進行交涉。率領使團的崇厚被授予一等欽差大臣銜，也就是說這個使節有便宜行事的權力。

崇厚和里瓦幾亞條約

俄國人決心要從伊犁局勢中撈取最大好處。俄國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烏拉爾的工、商業者的壓力，他們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肅和陜西的新商路；這些地方還沒有英、美的貨物和競爭。這種貿易前景以及在中國西部（這里盛產貴重金屬）的采礦權，據說足以解除1873—1876年間業已明顯暴露的俄國經濟危機。在陸軍大臣的指導下，一個制定俄國對華政策的特別委員會組成。它決定提出下列要求作為交還伊犁的代價：俄國商隊有權進入中國的內地；割讓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給俄國；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幾條要求。不過考夫曼將軍索賠一筆巨款以抵償中亞鐵路建筑費用的建議還是被否決了。[[38]](#_38_Na_Luo_Qi_Ni_Ci_Ji____Lie_Qi)

崇厚（1826—1893年）是一個顢預無能的滿洲貴族，他對于這次出使全然沒有準備。他抵達圣彼得堡時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復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而這里的俄國人的阿諛逢迎顯然把他弄得暈頭轉向，失去了戒備。此外，他看來還有點畏懼那些可怕的俄國人，并且急于回國以料理緊迫的家務。崇厚匆匆地就締結了里瓦幾亞條約，名義上是將伊犁交還中國，實際上卻將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給了俄國，其中包括具有戰略意義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國得到500萬盧布賠款，有權在七個重要地點設置領事館，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滿洲的伯都訥。當這些條款電告北京時，驚訝的總理衙門電令崇厚不要在條約上簽字。崇厚荒謬地回電說該條約已經締結，文本業已謄清；改訂或重新談判條約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條約上簽了字，未經奉旨就擅自回國。

這消息使中國官場驚愕莫名。總理衙門認定，用這種方式將伊犁交還中國還不如不交還為好。左宗棠則擔心他辛苦經營新疆的戰果會因崇厚的愚蠢行為而付諸東流。他竭力說服朝廷：“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39]](#_39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另一方面，李鴻章無論是對新疆的戰事，或是對迫使俄方交還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評一下這一條約，但并不主張將它撤銷，他說：“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諭，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40]](#_40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

李鴻章當時是少數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戰雪恥之心，毫不計及國家是否有備。無數奏疏像雪片飛來，要求嚴懲締約人和撤銷條約。這些奏議中的佳作是年輕的詹事府洗馬張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稱：“俄人索之，可為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謬至愚……然臣以為不足懼也。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他要求將崇厚處斬，以示中國拒不承認該約的決心，縱然訴諸戰爭亦在所不惜。因為張之洞說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員們心里的話，他馬上便出了名。[[41]](#_41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

清廷任命曾國藩的兒子、當時駐英駐法公使毅勇侯曾紀澤，作為第二次出使俄國重新商訂條約的首席代表。與此同時，判處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國外交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對這樣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聞。后來維多利亞女王親自給慈禧太后寫信求情，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暫緩執行，不過在第二次出使未獲結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國對這局部的讓步仍表不滿，聲稱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與曾侯談判。

被中國的行動所激怒的俄國派了23艘戰艦駛往中國沿海炫耀海軍威力。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人們擔心俄國海軍在沿海發動進攻，來配合從西伯利亞派兵通過滿洲直逼北京的行動。清廷并不想加劇沖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動下，只好違心地采取了強硬立場。為了預防萬一發生戰爭，清廷起用了幾名有平定太平軍戰功的湘軍軍官充任要職，另外又通過赫德請戈登來中國幫助御敵。

戈登曾擔任過前常勝軍的首領，自1880年春一直擔任印度總督的秘書；但是他發現文牘生涯是“活受罪”，便辭去該職，不料兩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請電。戈登抓住了這一機會；他在天津和李鴻章會見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認為中國不應輕啟戰釁。他提出警告說，只要政府設在北京，中國就不能和任何頭等強國開戰，因為大沽炮臺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門戶洞開。他說，如果中國一定要打仗，朝廷就應當遷往內地，準備進行長期的消耗戰。這種直言無隱的勸告在充滿好戰氣氛的北京是不受歡迎的，但戈登卻立論有據，認為戰爭不可取。李鴻章則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戰派潑冷水，要他們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顯示，中國在危難時刻并不是沒有朋友的。[[42]](#_42_Xu_Zhong_Yue____1880Nian_Ge)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條約

當戈登勸告中國采取和平解決辦法時，曾侯則在為出使圣彼得堡進行準備。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錯誤，他通盤地籌劃了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詳盡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圖。他決定在邊界爭端上絲毫不讓，在貿易問題上討價還價，在賠款方面妥協；曾侯啟程赴俄時，又從英國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協助的保證，倫敦還指令英國駐圣彼得堡的大使幫助他出主意。

俄國人內心里實在也害怕在此時引起戰爭，但表面上拒絕在圣彼得堡開談判，而堅持將談判地點移到北京，作為對中國好戰態度的懲罰。清廷命令曾侯無論如何要使談判在俄國進行。俄方終于默許，但談判進展緩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戰爭后的經濟困難和1878年柏林會議以后俄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俄方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爭。圣彼得堡政府還害怕國內會爆發革命，同時擔心戰爭對貿易帶來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歐美站在中國一邊，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報刊以及一批漢學家都主張采取和平解決的辦法。[[43]](#_43_Na_Luo_Qi_Ni_Ci_Ji____Lie_Qi)政府愿意和平解決，但是未能從困境中找到一個體面的出路。經過近半年的毫無效果的談判以后，沙皇終于決定同意將伊犁全部交還中國以結束這場糾紛：交還中國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幾個村莊因收容不肯回中國的穆斯林難民，才不在此限。俄國領事館減為兩個（設在吐魯番和肅州），而賠款則美其名曰“兵費”，增為900萬盧布（約合500萬兩白銀）。這些條款全都載于1881年2月24日簽訂的新條約——即圣彼得堡條約中。

這次和平解決通常都被說成是中國的外交勝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盡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滿、樂觀和傲慢，但是，從西方一個強國那里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的想法激發了中國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發清議的文人更加相信，這項勝利是靠他們的戰爭喊聲得來的，因而對他們解決中國對外關系問題的能力產生了過分的自信。

第二個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新疆歷來被看成西域，從來不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一直是邊疆地區，當中國隆盛時便領有它，衰落時便喪失它。圣彼得堡條約以后清廷采納左宗棠的建議，于1884年將新疆改為行省，并任命在收復新疆中功績卓著的年輕杰出將領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國邊疆史上的里程碑。[[44]](#_44_Xu_Zhong_Yue____Yi_Li_Wei_Ji)

### 爭奪安南（越南）的中法戰爭，1883—1885年

伊犁危機解決之后接著出現了法國侵略朝貢國安南的問題。安南古稱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國影響的時期是在公元前3世紀，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漢武帝時（公元前140至前8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來源于唐代（618—907年）所設的安南都護府。雖然唐王朝滅亡后越南獲得了獨立，但它仍然受到強大的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而在明清時期它是一個重要的朝貢國。

西方的影響是1615年由耶穌會士帶進越南的，但是在這個以儒教為主的國家里，教會的活動進展緩慢。法國東印度公司企圖與越南進行貿易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到18世紀末法國的影響開始抬頭，因為阮福映（1788年舊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時在法國軍官的幫助下，重新控制了這個國家。他被立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統治從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繼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們支持仇洋暴亂，以反對傳教士和本國教徒。路易·拿破侖因急于要建立一個法屬印度支那帝國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傳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軍前往西貢去懲罰反教會的越軌之徒。1862年強使越南接受的條約使法國獲得賠款400萬美元，同時獲得貿易權、傳教權和控制越南對外關系權，另外還獲得了稱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個省。1874年簽訂的新約又確認法國對交趾支那的占領和對越南（這時已稱為法屬安南）對外關系的指導，并批準法國在北部東京的紅河的航行權。這項條約表面上承認安南獨立，實際上已把它降為法國的保護國。這時中國正全力對付臺灣危機和處理馬嘉理謀殺案，沒有采取積極措施阻止法國前進，只是根據安南是中國的附屬國這一理由，拒絕承認1874年的條約。[[45]](#_45_Guan_Yu_Fa_Guo_Jin_Xing_Huo)

法方在安南加緊其活動，到1880年已在河內和海防港駐上了軍隊，并在紅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為了抗拒法方的推進便加強同中國的聯系，既向中國進貢，又請求駐在中國和安南邊界上的非正規中國軍隊——黑旗軍——給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軍已開始與法軍作戰，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規軍進入東京。這時天津總督李鴻章反對在完成中國海軍建設和沿海防務計劃以前和法國開戰。他極力主張中國只有在遭到進攻時才可應戰，而且即使如此，其為害也不可勝言，因此他主張以談判促解決。當時還是總理衙門首席大臣和首輔軍機大臣的恭親王也表示同意，認為中國不應在時機未至時向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挑戰。

清流黨的興起

李鴻章和恭親王的審慎態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官吏的攻擊和嘲笑，這些人雖然是些優秀的學者，但在外事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驗，也無真知灼見。他們在奏疏中慷慨陳詞力主好戰的行動路線，因而博得了公眾的擁戴和皇帝的注意。他們自稱為清流黨，藐視法國為“強弩之末”，譴責姑息的態度會縱容貪得無厭的敵人提出日益眾多的要求。他們堅持說，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質，而不是取決于武器，因而將李鴻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檜（1090—1155年）。[[46]](#_46_Yi_Si_Te_Men____19Shi_Ji_Qin)

清流黨強調中國的道義力量，李鴻章卻著重指出了它的物質上的弱點。而曾侯則表現出他全面了解當時的形勢的能力。他根據對法國國內政治和國際地位的了解得出結論說，法國是經受不住一場勞師遠襲的戰爭的。他提醒李鴻章和法國人打交道時不能示之以弱，因為：（1）他們欺軟怕硬。中國備戰的決心越大，爭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優柔寡斷、拖延不決以及妥協退讓都只會給法國人帶來好處，并使中國在以后難以收回這些利益；（2）法國垂涎于廣東的煤礦和云南的金礦，放棄安南并不能滿足它的胃口，反而會削弱中國南部的邊防；（3）喪失東京會縱容英、俄兩國覬覦西藏和朝鮮；（4）法國國內的政治不穩以及在歐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許它對外作戰。根據這種種理由，曾侯告誡他不要過分謹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強硬態度。[[47]](#_47_Can_Kan_Xiao_Yi_Shan___Qing)

清廷在和、戰之間舉棋不定。榮譽要求捍衛一個朝貢國，可是畏懼心理卻不允許它去和一個西方頭等強國打仗。赫德駐倫敦的代理人金登干發來的一份報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國軍隊不會貿然投入大規模戰爭，只要開放河內和紅河的貿易和航行便可消除爭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鴻章和法國公使進行談判。第一次達成的協議規定安南為中、法兩國的共同保護國，但巴黎反對，接著法國便派遠征軍來安南。由于中國軍隊在東京吃了敗仗，同時又害怕法國進攻中國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親王和其他四名軍機大臣之職，并命令李鴻章尋求解決辦法。隨后，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上校福祿諾于1884年達成協議，它要求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所簽訂的全部條約，撤退中國在東京的駐軍；而法國則應允不要求賠款，不侵犯中國，并同意在將來與安南締結任何條約時不使用有損于中國威望的字眼。這一協定激起了清流黨的憤懣、，朝廷收到47份要求追究李鴻章的責任的奏疏。處于困境的李鴻章因此不敢將李—福協定中關于中國軍隊撤離安南的日期奏報朝廷。[[48]](#_48_Yi_Si_Te_Men____1880__1885Ni)



地圖6 法屬印度支那

駐東京的中國軍隊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絕了法國要他們撤離的要求，于是重新爆發敵對行動。巴黎譴責中國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發出最后通牒，索償大筆賠款，并要求立即執行李—福協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國發動進攻，將清流黨的兩位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分別調往防御要地：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國海軍將領孤拔率船艦襲擊福州，在一小時內沉毀11艘中國兵船，將1866年以后由法國幫助建造的福州馬尾船廠全部摧毀，張佩綸率先脫逃。他向朝廷謊報軍情，致使北京還以為中國曾在這場海戰中取勝，可是后來弄清真相后張佩綸被充邊，清廷則向法國正式宣戰。

和平解決

慈禧太后從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個月的戰爭，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幾件事而心煩意亂，最后又產生了動搖：東京戰局的勝負難料，法國對臺灣的封鎖，以及法國有阻撓中國南方漕運的企圖。預期英、德兩國的援助并未兌現；同時還出現了俄國在北部邊疆卷土重來和日本在朝鮮發動侵略的威脅。法國也同樣希冀和平，因為法國的政局的不穩和打遠距離戰爭的困難，也開始使法國政府不勝負擔。赫德駐倫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國在諒山大敗，這些事實給北京提供了一個體面的爭取和平的機會，也對法國的好戰精神潑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鴻章和法方駐中國公使簽訂了一項正式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和安南締結的一切條約，法國則將撤走在臺灣和澎湖的軍隊。中國不付賠款，但它為戰爭花費了一億多兩白銀，并欠債約2000萬兩。[[49]](#_49_Can_Kan_Shao_Xun_Zheng___Zho)

事實證明，清廷的優柔寡斷和舉棋不定造成了災難。堅定的作戰政策本來可能制止法國的侵略；如果堅持和平政策，本來也可以保住福建艦隊和馬尾船塢。可是，庸碌無能的領導層卻毀了這二者，而且還喪失了安南這一朝貢國。清流黨意氣用事，無補于實際，因此它對這些后果應負大部分責任。

安南的喪失標志著經營了20年之久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外交、政治和技術上有限的現代化，未能使這個國家強盛得足以抵御外國帝國主義。中國的軟弱無力誘使英國起而效尤法國，于1885年入侵緬甸，使緬甸脫離了中國。1886年它迫使中國訂約讓緬甸淪為自己的保護國，不過條約允許緬甸繼續向北京每十年納貢一次。隨著南方的這些朝貢國的喪失，中國東北的主要屬國朝鮮的命運，現在也跟著處于千鈞一發之勢。

## 日本對朝鮮的侵略

朝鮮被中國人看成中國北部極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兩代又是中國的頭等朝貢國。朝鮮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貢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貢使前往清廷，另外還有許多小規模的遣使。從1637—1894年，有507個朝鮮使團到過北京，也有169個中國使團出使到朝鮮。[[50]](#_50_Quan_Hai_Zong____Qing_Dai_He)由于受中國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朝鮮人模仿中國人的各種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與中國的關系說成是“事大”，以區別于與日本之間的較為平等的“交鄰”關系。實際上，自1637年以來，朝鮮除了和中國有藩屬關系以及偶爾和日本交換使臣外，它和其余國家并無交往，西方人稱它為“隱士的王國”。

### 朝鮮的開放

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開放，朝鮮日益受到西方國家要求貿易、傳教和建立外交關系的壓力。但是，朝鮮宮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當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對航船遇難給予方便外，宮廷拒絕與西方建立任何聯系，這一毫不通融的立場，在幼王高宗的父親大院君于1864年攝政以后變得更加僵硬。1866年2月，大院君又對基督教徒進行迫害，并造成了對外國教士們的一場屠殺。10月份，法國駐華公使未獲巴黎批準，徑自派討伐隊前往朝鮮。法國軍隊占領了漢城南面江口的江華島，可是在城外戰敗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國商船“謝爾曼將軍號”駛抵平壤，以炮轟相威脅，要求通商。這艘船的行徑如同海盜，它在退潮擱淺后被焚毀，水手也被殺。1871年，美國國務院命令駐華公使鏤斐迪調查此案。他隨帶五艘兵船前往。美國討伐隊要求在江華島附近進行談判被拒絕后，就強行駛入通往漢城的漢江。當朝鮮的海岸炮臺開火轟擊時，美國人也還擊，大肆轟擊江華島。美國人由于沒有受權作戰而隨即撤離。朝鮮人由此得出結論：他們既打贏了法國人，也打贏了美國人。

總理衙門自知中國無力保衛朝鮮，在1867年開始勸告朝鮮和西方國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時，中國人力促朝鮮和西方國家建立條約關系，以抗衡日益增長的日本的影響。[[51]](#_51_Ru_Yao_Yan_Jiu_Gai_Bian_Zhon)日本對朝鮮的關系在德川時期（1603—1867年）由對馬地方的封建領主處理，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便改由東京直接掌管了。日本為了宣布這些政治變化和修訂雙方關系而派往朝鮮的使團，都被大院君拒之門外，因為他藐視日本所實行的現代化，而且認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稱號是不合體統的。

為了報復這次冷遇，日本領袖們決定于1873年派一討伐隊前往朝鮮。這一行動將起到這些作用：（1）為心懷不滿的武士提供泄憤的機會，轉移他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2）對中國在朝鮮的君臨地位進行有力的挑戰，以謀取日本在亞洲的領袖地位；（3）阻止英國和俄國的前進；（4）為1592和1597年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失敗雪恥。但是從西洋回國的日本領導人取消了這個決定，他們認為日本國內的落后狀況不允許進行一次對外冒險。

不過，在1875年還是派遣了一支配備有炮艇的巡邏隊。當日本人在江華灣遭到襲擊時，他們便進行還擊，并摧毀了朝鮮的防守要塞。這次勝利以后東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鮮，同時派了一個使者前往北京[[52]](#_52_Ci_Ren_Ji_Sen_You_Li)探聽中國的反應。這時，總理衙門正窮于應付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復說，朝鮮雖是中國的藩屬，但其內政外事從來悉聽自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開放朝鮮，清廷因一心避免沖突，便指令朝鮮進行談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華島條約簽字。條約載明：（1）承認朝鮮為自主之邦，享有與日本平等之權；（2）互派使節；（3）開放三口對日通商；（4）日方在這些口岸享有領事裁判權。由于不能維護朝鮮的獨立，中國沒有履行其宗主國的權利。

日本繼在朝鮮的行動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島，這更使中國決心向西方國家開放朝鮮，以抵消日本的影響。北京責令李鴻章主管朝鮮事務，以便在商業上和外交上著手對西方開放朝鮮。1882年，他派遣馬建忠和海軍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鮮，目的是介紹美國海軍準將舒斐爾特進行締約談判。1882年5月22日簽訂了美—朝條約：兩國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設領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國承認朝鮮獨立，但是朝鮮另發單獨的聲明，自稱為中國屬邦。[[53]](#_53_Yin_Wei_Ru_Guo_Jiang_Zhe_Xia)此后數年朝鮮和英、法、德各國都簽訂了協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國模式著手進行了一些現代化的工作，盡管步子很慢。

國內暴亂和國際政治[[54]](#_54_Guan_Yu_Zhe_Yi_Shi_Qi_Zhong)

高宗于1873年開始親政以后，他的“閔妃”（出身于有影響的閔氏家族）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她借此權力實行改革，而且還雇用了一些日本軍官來訓練朝鮮軍隊。大院君決心削弱她的影響，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滿情緒，于1882年煽動他們攻打王宮和襲擊日本使館。閔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館則被焚，七名日本軍官被殺，日本公使逃回本國；大院君重新掌權。丁汝昌提督和馬建忠到朝鮮調查此案；為了防止日方采取懲罰性行動，他們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將他送往中國監禁。按照馬建忠的勸告，朝鮮國王同意向日本賠款55萬美元，派使團道歉，并允許日方在使館內駐軍和筑兵營。日本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標志著日本外交的重大勝利。

1882年暴動以后，李鴻章率先積極行動，以加強中國在朝鮮的地位。中國和朝鮮締結了一項商約：朝鮮給予中國以治外法權，中國人則提供貸款，并送給朝鮮政府一批洋槍。李鴻章任命一名中國的商務代辦以監督朝鮮的貿易，并指令袁世凱負責訓練朝鮮軍隊。原在中國海關任職、后又充當德國駐天津領事的穆麟德擔任了朝鮮的海關稅務司和外交顧問。中國的六個營軍隊駐在朝鮮以維持治安和防備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鮮人中的親華派和親日派之間的斗爭愈演愈烈。袁世凱和親華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卻竭力鼓吹朝—日友誼，并操縱金玉均所領導的親日派。1884年，中國因中法戰爭從朝鮮撤回了三個營的兵力，親日派便試圖在12月4日發動政變。他們的軍隊突然沖進王宮，逮住了國王，并殺死了一些親華的官員。袁世凱的軍隊當即平定了叛亂并救出了朝鮮國王，但是主要煽動者金玉均卻逃往日本。

東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討伐部隊和一名特使（井上馨）前往朝鮮索取賠款，要求道歉和索資重建日本使館。與此同時，另一位專使伊藤博文也前來和李鴻章商談，當時李鴻章正忙于中法戰爭，因此迅即妥協，于1885年4月18日同意締訂中日天津會議專條，此約規定：（1）中、日兩國應于四個月之內各將軍隊盡數撤出朝鮮；（2）雙方應勸朝鮮聘請別國人為教練，中、日兩國人員均不得訓練朝鮮軍隊；（3）任何一國如欲派兵前往朝鮮平亂，應先行文知照對方，一俟事定，應即撤兵，不得留防。這一協定實際上使朝鮮變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保護國，取消了中國聲稱它為唯一宗主國的權利，并且確認了日本具有向朝鮮派兵之權。

與此同時，俄國占領了朝鮮東北海岸的元山港，英國奪得了朝鮮南部的巨文島，國際紛爭因而加劇。日本看出了西方國家對它在朝鮮利益的威脅，便采取了鼓勵中國加強控制的政策，借此來抵消別國的影響和確保日本在將來的朝鮮事務中只與中國打交道的局面。李鴻章不懂得日本的這一用心，果然通過任命袁世凱為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和外交事務和監督其內政的駐朝鮮大臣，來加強中國的控制。袁世凱很快控制了朝鮮的宮廷、海關、貿易和電報業務，在1885—1893年期間成了朝鮮國內權力最大的人物。正當中國在朝鮮盛極一時時，日本的經濟和軍事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而到1894年時，日本的現代化程度已足以與中國角逐了。使原已緊張的局勢更為加劇的是：1894年3月，朝鮮的親日派領袖金玉均在上海被另一朝鮮人刺殺；死者的尸體運回朝鮮凌遲示眾以為叛國者戒。日本人認為這一事件是直接的冒犯；雖然外相陸奧宗光聲辯說，一名朝鮮人在中國被另一名朝鮮人殺害，在法理上與日本無關，但是仍然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組織則為戰爭推波助瀾。這些組織慫恿東學黨叛亂，使之成為向朝鮮派兵的借口。

東學黨叛亂，1894年

東學黨運動本來是宗教性質的，由于官方的迫害才變成了政治運動。東學黨的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年）是一個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于官方的壓迫和基督教的擴張，創立了號稱集儒、道、釋精髓而為一的“東學”信仰。朝鮮政府視它為邪教而加以取締，并于1864年將崔濟愚逮捕、論罪和斬首。這一教派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后，逐漸吸引了一些胸懷政治野心的人士。1892年，東學黨人要求開禁，但被拒絕，他們的組織奉令解散。

此后不久，在玄洋社日本人的幫助下，東學黨人利用群眾性抗議官僚貪污的機會，策劃了一次暴亂。當朝鮮宮廷要求中國出面援助時，日本公使慫恿袁世凱采取積極行動，并暗示日本無意干預此事。李鴻章信以為真，認為日本不會進行戰爭；但東京卻作了充分行動的準備，因此中國人剛剛協助撲滅東學黨人，8000名日本兵馬上就出現于朝鮮。日本方面要求朝鮮改革內政，但是朝鮮政府根據李鴻章的指令答復說，只有在日本軍隊撤出朝鮮后，它才能進行改革。

### 戰爭爆發

李鴻章決心尋求外交解決，他希望爭得西方各國的同情，迫使日本同意和平解決。當俄國沒有遵守替中國調停的諒解時，李鴻章就轉而請求英國調停。倫敦事先未曾料及事態發展如此之快，所以沒有適當的對策而左右為難。3月間接替格蘭斯頓當政的羅斯貝利勛爵“很不愿意看到遠東出現動蕩局勢”[[55]](#_55_L_K_Yang____1895__1902Nian_Y)。最后他提出了一項溫和的、雙方都不得罪的建議：呼吁中、日雙方同時撤軍，并在朝鮮京城周圍建立一個中立地帶。日本曾對美國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現在又拒絕了英國的建議。李鴻章的外交努力使中國延誤了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直到和平解決的希望全告破滅時，他才下令向朝鮮增援。日本方面得知這一護送援軍的消息后，便在1894年7月25日將中國向英國租用的“高升號”輪擊沉，使950名中國士兵落水而死。[[56]](#_56__Gao_Sheng_Hao__Shi_Zhong_Gu)8月1日，中日雙方同時宣戰。

這場戰爭實際上成了兩個從事現代化歷一代人之久的國家所作的一次較量。在陸上，日方在平壤打敗了李鴻章的淮軍，成立了以大院君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鮮獨立。在海上，雖然中國夸耀它有一支較大的艦隊，但是并非所有船艦都被動員作戰。和日方作戰的只有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以及駐在廣東和福建的兩支地方海軍中隊則守“中立”以圖自保。不僅如此，中國艦隊雖然噸位超過日方，可是它們都陳舊過時，速度也較慢，無法與日方新式和快速的艦隊匹敵。這兩支海軍于1894年9月17日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上展開了激戰。戰斗一開始，中國海軍就陷于混亂狀態，當時旗艦管帶取消了其上級——海軍提督丁汝昌——關于戰斗隊形的命令。當旗艦因第一發炮將飛橋震塌而使丁汝昌及其英國顧問受傷時，艦隊便群龍無首，失去領導。一位當過陸軍軍官的德國顧問擔任指揮，可是很不得力。在五個小時的交火中，中國方面損失了四艘船艦，傷亡一千余人。而日本方面只損失一艘船艦。

殘存的中國船艦撤退到旅順口，然后又撤到海軍基地威海衛。11月，日方由陸路攻占了大連和旅順口，使要塞的大炮失去了作用。1895年2月，當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衛并用要塞的炮火轉而轟擊停泊在港內的中國船艦時，中國的失敗便已成定局。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殉職，他的僚屬紛紛投降（見第四章）。

經過30年自強運動，卻落得這場恥辱的失敗，這使李鴻章無法逃脫嚴厲的指責。他辯解說，單靠北洋艦隊和淮軍對抗日本全國的力量自然無法取勝，但是這種托詞未能使他免于撤職和丟面子。

### 和平談判

1894年11月，重新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首先采取和平行動，要求美國公使出面調停，提出中國愿意賠款和承認朝鮮獨立。日方這時已占領了旅順口和大連，正在威脅滿洲和遼東，覺得這樣的讓步尚嫌不足，但卻表示愿意進行和談。清政府于1895年2月派總理衙門的大臣兼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前往廣島，要求會見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但是日方拒絕接待，堅持說他無議和的“全權”。清政府在北洋海軍戰敗以后，求和心切，即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議和。

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包含日本國內各界人士的要求。陸軍堅持要割讓遼東半島；海軍要求將臺灣作為日本在南亞作戰的軍事基地。進步黨主張日本應控制山東、江蘇、福建和廣東，自由黨人則力主割占滿洲。財政當局要求巨額賠款。最后提出的方案把重點放在朝鮮自主、賠款、割讓領土和取得通商通航特權這幾個方面。

在馬關議和期間，李鴻章強調中日兩國應該承認有同文同種的關系，作為西方帝國主義時代的亞洲人，他們也有相同的利害關系，因此不應互相拆臺。李鴻章想利用他七十三虛歲高齡這一點在他的年輕對手面前贏得某種心理優勢，但未能收效。[[57]](#_57_Li_Hong_Zhang_De_Ce_Lue_Ju_J)就在這關鍵時刻，李鴻章遭到一個日本狂熱分子的狙擊。雖然傷勢不是致命的，但是這件事使日方很尷尬，因為日本政府擔心此事會促使西方列強進行干涉并站在中國一邊。日本天皇派御醫為李鴻章診治，日本政府主動宣布休戰，并將賠款從所索取的3億兩減至2億兩。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指出，“李氏的不幸倒成了大清帝國之幸事。從現在起，議和條款的商定將較前容易了，中日戰爭亦將停止進行”[[58]](#_58_Li_Shou_Kong____Zhong_Guo_Ji)。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條約規定：（1）清政府承認朝鮮國獨立自主，不再向中國朝貢；（2）向日本賠款2億兩；（3）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4）開放重慶、蘇州、杭州和沙市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開設工廠，從事工業和各項制造業。

中國方面的反應十分強烈。李鴻章被指責為賣國。當時駐南京的總督張之洞反對批準條約，一些聚在北京應試的舉子幾次上書，要求清廷廢約，繼續戰斗（見第五章）。[[59]](#_59_Zai_1895Nian_4Yue_30Ri_De_Qi)但是清政府不顧這些反對意見，還是在1895年5月8日交換了條約的批準書。臺灣島上的中國領導人強烈地抵制割讓他們的島嶼；這個島嶼自中法戰爭以后已改為行省，而且經過首任巡撫[[60]](#_60_Ji_Liu_Ming_Chuan)的努力經營已在現代化方面有了相當可觀的進展（見第四章）。5月25日，島上的領袖們宣告獨立，并宣布臺灣為共和國，改現任巡撫為總統。在清政府的代表——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的壓力下，再加上日軍的行動，這一地方性運動終于在1895年10月被鎮壓下去，臺灣轉歸日本統治。

今天再來估計這場戰爭，不管怎么說，中國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戰爭的一方日本這時已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民族主義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標下團結起來對付中國，而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實體。日本的戰爭努力動員了舉國一致的力量，而中國人民幾乎沒有受沖突的影響，政府幾乎全部憑借北洋水師和李鴻章的淮軍。

其次，中國方面事權不明確，指揮不統一，沒有全國范圍的動員。總理衙門、地方當局以及不負責任的清流黨官員各執一詞，主張互異，使得清廷難下決心。李鴻章掌管外交和朝鮮的軍務，卻無權決定政策性事宜，也無權控制他所轄范圍以外的艦只和軍隊（見第四章）。

第三，清廷的腐敗和北洋水師指揮的昏庸，從戰爭一開始就注定了中國的命運。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數百萬兩建造頤和園的行徑，她對太監的信任以及世風普遍敗壞，都是造成這次失敗的原因。李鴻章在北洋水師中選用僚屬只憑與他個人的親疏關系和是否為他私人效勞，而不管他們方正與否，因此在北洋水師指揮部中不正之風盛極一時。許多將領都向閹宦總管李蓮英討好，用貪污的公款給他送禮，李蓮英又轉而庇護他們的不法行為。盡管北洋水師貌似強大，實際上已不堪一擊了。李鴻章深知北洋水師的弱點，所以他在決心作戰以前曾使盡了外交手段。

第四，李鴻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國際上的政治形勢；迷信個人說服本領；想依靠那套陳舊的以夷制夷政策。當俄國沒有出面替中國斡旋時，李鴻章便轉向英、美求助，但是它們誰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 “瓜分中國”的危險

### 三國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國聯合照會東京提出警告說，日本占有遼東半島將直接威脅北京的安全，使朝鮮的獨立成為欺人之談，并且還威脅著整個遠東的和平。俄國對日本登上亞洲大陸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覬覦大連和旅順這兩個不凍港，所以就鼓動了這次干涉。俄國的財政大臣維特伯爵強調指出，“當務之急是制止日本滲入中國心臟和在遼東半島取得立足點”[[61]](#_61_Wei_Te____Wei_Te_Bo_Jue_Hui)。因此，俄國決定要使遼東半島保持“戰前原狀”，并決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包括轟擊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參加俄國這一行動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國，還有很愿俄國繼續忙于東方事務以期減緩它對歐洲的壓力的德國。為了使這項勸告更為有力，俄國召回了它駐在中國和日本港口內的艦只，宣布海參崴為戰爭地帶，并在該地集結軍隊。英國執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為遼東地區與英國沒有直接利害關系，而且英國首相羅斯貝利害怕對日本用兵。[[62]](#_62_L_K_Yang____1895__1902Nian_Y)

早在和約簽訂以前，伊藤和陸奧宗光就已認為歐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應克制對大陸的領土要求。然而日本的軍界卻堅持割地是戰爭勝利的主要標志。這時，日本在三國干涉面前有三種選擇：（1）拒絕警告，不惜一戰；（2）就遼東問題召開一次國際會議；（3）接受三國提出的主張。1895年4月24日，御前會議贊成第二項行動方案，但是外相陸奧宗光反對，因為他擔心西方列強可能乘開會之機改動和約的其他條款。最后，日本政府決定由中國付銀5000萬兩贖回遼東。列強將贖款減為3000萬兩，于是李鴻章便與日本駐中國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簽訂了正式的贖遼協定。

俄國人由于進行這次干涉，并且應允在還債第一年借銀1億兩給中國償付對日賠款，因而贏得了中國人的感激。當時清政府的歲入為8900萬兩，在此情況下它幾乎不能償付這樣一筆巨額賠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銀行財團借款4億法郎，利息為四厘。隨后于1896年和1898年，又向德—英銀行總會借款兩次，每次1600萬英鎊，利息分別為五厘和四厘五。

### 中俄秘密結盟

由于俄國表現的友誼給人留下了好感，中國的高級官員們紛紛贊成聯俄，以保證將來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國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爭論和1878—1881年的伊犁危機中已表現出親俄傾向的李鴻章，對英國在中日戰爭中沒有幫助中國頗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聯俄看成未來中國外交的主要原則。結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聯俄方針。

就俄國來說，維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國取道滿洲把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到海參崴，所以他是歡迎中俄結盟的。這條取道滿洲的線路可以使鐵路縮短350英里，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金錢，還可以促進維特提出的向中國和平滲透的政策。維特遭到外交部亞洲司以及阿穆爾省省長的反對，反對者覺得這一計劃會引起其他列強的反對，同時可能加速對中國的瓜分。可是，維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駐中國公使喀西尼向李鴻章解釋，說這條大鐵路將便于調動俄國軍隊以保衛中國。雖然進行了幾次討論，但是雙方并未形成正式條約，盡管英國的《字林西報》曾作過“喀西尼協定”的報道。

有關鐵路修筑權以及中俄結盟的談判終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實現了。原先一名中級官員奉命參加加冕典禮，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滿，認為換一位與李鴻章品級相當的人赴此盛典似更為合適。據說沙皇曾給慈禧太后發電，表示寧愿中國派李鴻章前往。這位已經失寵的七十四虛歲的李鴻章便被任命為一等欽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參加俄皇的加冕典禮和歷訪英、法、德、美各國的統治者。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曾就此事寫道：“……我希望在他到達俄國以前，勸阻他訪問其他歐洲國家，因為我很清楚，李鴻章在歐洲必然會成為歐洲政治家們施展種種陰謀的對象。”[[63]](#_63_Wei_Te____Wei_Te_Bo_Jue_Hui)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親信大臣烏赫托姆斯基親王前往蘇伊士“邀截”李鴻章，并將他護送至敖得薩。

在圣彼得堡期間，維特竭力使李鴻章相信，為了在緊急情況時能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俄國需要有一條從歐俄部分直達海參崴的最短的鐵路線。這條鐵路線由于橫貫蒙古和滿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過的土地的生產能力，也不會遭到日本反對，因為它能把日本和歐洲連接起來。李鴻章暗自欣賞這個計劃，他向北京奏報說，該計劃可阻止英國和日本日后的擴張，所以對中俄雙方都有利。維特和李鴻章就下列三項原則達成了一致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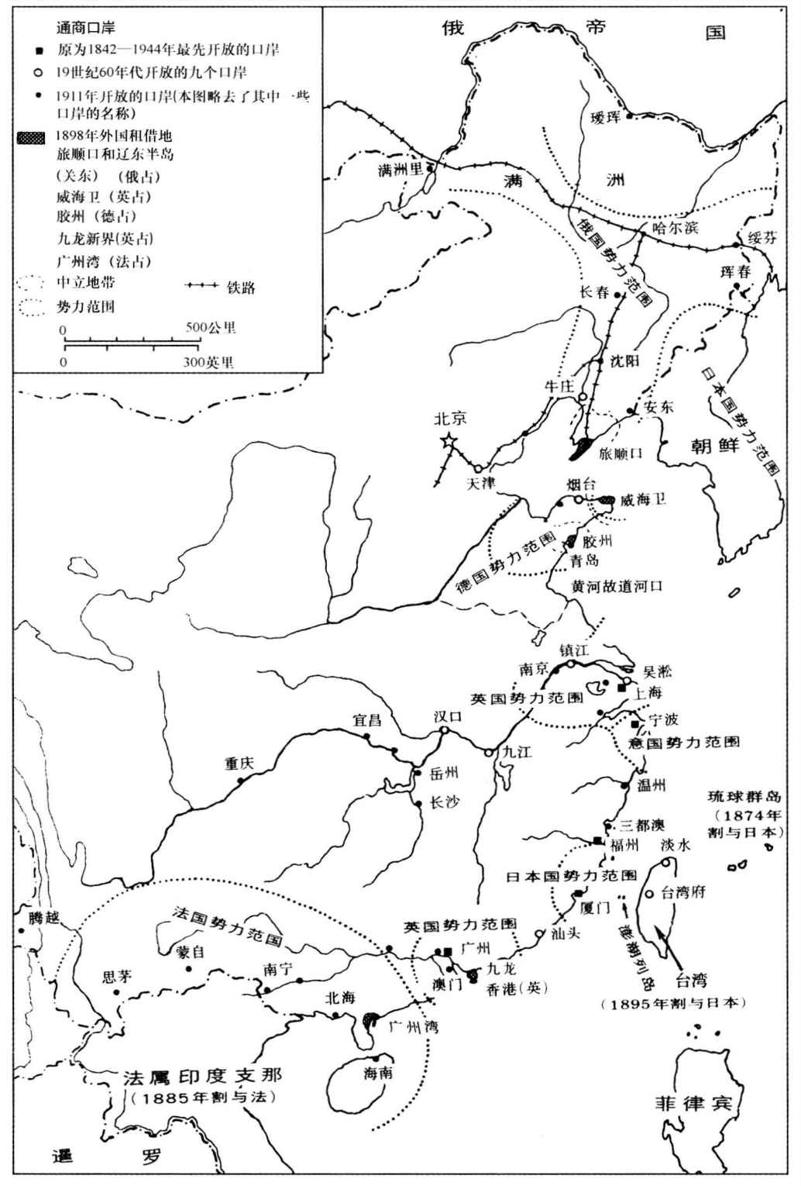
（一）中國允許俄國自赤塔修筑一條鐵路到達海參崴，鐵路可交由一商辦的中東鐵路局管理。

（二）中國劃出一片土地足夠供鐵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該地區內擁有全權，包括設置警察權。滿36年后中國可用七億盧布贖回該鐵路；如滿80年則可無償地交還中國。

（三）日本如進攻中國、朝鮮或俄國在遠東的土地，中、俄兩國應互相援助。

據傳說，李鴻章曾從俄國受賄150萬美元，至少第一筆報酬似已付清。維特否認有此事，不過即使此事屬實，這筆賄賂在李鴻章思想中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為他來到俄國的明確目的就是要締結一項密約。李鴻章熱衷于以夷制夷的政策——這一次是利用俄國對付日本。他自鳴得意地宣稱，該條約將使中國20年無事。但是，和平維持不到兩年。

### 割地狂潮



地圖7 19世紀90年代的帝國主義

在三國干涉以后，德國要求在中國取得一處海軍基地作為酬勞，它列舉了所有其他列強都在東亞擁有基地的事實，如英國之在香港、法國之在東京、俄國之在海參崴等。中國拒絕了這個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訪問俄國時，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辭的諾言，即讓德國占領山東省的膠州。德國人隨后便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被殺害（在1897年11月）為理由占領了膠州，迫使中國當局簽訂一項為期99年的租借條約，并取得了在山東境內建造兩條鐵路的特權。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受此事鼓舞，爭取到沙皇對占領旅順口和大連計劃的支持（維特對此舉持異議，但被駁回）。1897年12月，俄國借口保護中國不受德國的侵略，將這兩個港口強行占領，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國租出旅順和大連（為期25年），同時強迫中國讓它從中東鐵路修建一條南滿鐵路抵達這兩個港口，然后向西通至營口，向東通至鴨綠江。維特事后承認曾付給中國方面的談判人李鴻章和張蔭桓一筆酬金，以酬謝他們與俄國人的勾結。這時俄國人占了遼東半島，而這是三年前中國花了3000萬兩庫銀從日本贖回來的！

割地的狂潮這時正式開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衛，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為期99年；[[64]](#_64_L_K_Yang____1895__1902Nian_Y)從清政府取得了不將長江流域讓與他國的諾言，使這一地區成了英國的利益范圍。[[65]](#_65_Tong_Shang_Shu__Di_91Ye___Yi)日本則得到了不將福建省讓與其他國家的同樣保證。法國以99年為期租借廣州灣，并在兩廣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勢力范圍。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沒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國，當時正因對西班牙戰爭和菲律賓革命而忙得不可開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動。瓜分中國的危險加速了國內的戊戌變法運動（這本身是一個大題目，參見第五章），同時也導致美國宣布其“門戶開放”的政策。

### 門戶開放政策

雖然英國聲稱它在中國有特殊利益范圍，但它還想提出在其他列強享有特殊勢力的地方進行貿易的門戶開放政策。由于英國是割地狂潮的參與者之一，不便單獨提出這一想法，于是轉而請求美國支持，因為美國在這方面是歷史“清白”的唯一大國。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國駐華盛頓公使提請美國國務院聯合發起一個在中國實現商業機會均等的運動。但是，美國人直到結束對西戰爭和兼并菲律賓后才對此事感興趣。當時，中國海關的一位英籍稅務司賀璧理使他的美國朋友柔克義相信這個主意是明智的。美國前駐華公使柔克義是國務卿海約翰的遠東事務顧問。海約翰于1899年9月將柔克義起草的照會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商業機會均等的主張。它包括三個要點，總而言之是要維護條約制度，其內容有如下述：

（一）一國在其利益范圍或租借地內，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國在其勢力范圍內不得在港口稅或鐵路運費等方面歧視他國國民。

（三）在各國的勢力范圍內，僅由中國政府征收關稅，并依照中國協定稅則辦理。

對于這個照會，沒有一個國家明確表態，每個國家都觀望著其他國家的態度，可是海約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稱，各國都已“斷然而明確地”同意了照會的內容。只有日本對這項聲明提出了異議。當義和團起事時期“門戶開放”原則似乎受到威脅時，美國在1900年7月3日發送了第二次照會，補充了包括保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權力完整的條款。這完全是一項表態的聲明，并不要求其他國家作出響應。

“門戶開放”只是關于一些原則的宣言，不是美國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國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力量強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這項政策之后，瓜分中國的趨勢確實緩和了下來，這倒不是因為列強響應了美國的呼吁，而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害怕他們之間會造成對抗和沖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勢挽救了清帝國，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運。

## 義和團起義

在百日維新的最后時期（參看第五章），發生了1898年9月的宮廷政變，它一舉削弱了漢人激進派和穩健派，恢復了反動的滿人政權。榮祿和裕祿及啟秀等其他保守派都進人軍機處，大學士剛毅日益得到太后寵信。這些人主張搞強硬政策，太后在他們的影響下也決定不再向外國列強讓步。1899年2月當意大利人要求割讓福建省的三門灣時，太后命令拒絕這一要求；當10月份意大利人改變原意時，太后就把這項新政策看成是正確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訓令各省當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說：“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以中國地大物博……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沖尊俎也。”[[66]](#_66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

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宮廷逃到熱河，隨后又敗于法國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國又競相向中國要求割地：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國人。外國人同情1898年變法的嘗試，他們的干涉又使康、梁維新派得以脫逃，再加上他們在日本逃亡時仍在繼續搞維新活動：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時外國駐北京的公使們公開反對她廢黜光緒皇帝和立端王之子為大阿哥的計劃。太后和端王因無力反對外國對他們的計劃的干涉而感到丟臉和沮喪，便轉而支持義和團運動這一排外的大暴亂。

### 義和團運動的背景

排外情緒不僅充滿朝廷，也滲入到學者、官員、紳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國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日益增長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釀成了一場廣泛的排外運動。

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但是他們很難在中國人中贏得信教者，因為中國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艦保護下的入侵。有些傳教士對中國皈依者提供金錢補助或其他舒適環境，甚至在訴訟中也為他們的教徒向縣官說情。總理衙門在一份奏章中將傳教士的保護權總括為這樣一句話：“十年來總理衙門辦理教案，從未見有教士責罰教民之事。”[[67]](#_67_Can_Jian___Zong_Shu_Zun_Yi_J)

紳士是排外最烈的，他們把基督教看作敗壞社會的異端邪教。他們自封為儒家禮儀的衛道者，痛恨任何外國宗教或哲學的侵蝕，特別對中國教徒不舉行傳統儀式和不參加地方節日活動的行為感到憤恨。紳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動的秘密煽動者。民間的傳說和謠言描繪外國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墻深院內為非作歹，這更激起中國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參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愛國的中國人意識到民族正瀕于滅亡的境地。康有為發出警告說，中國有成為第二個緬甸、安南、印度或波蘭的危險，進步分子則提出要通過根本的制度改革來拯救民族。然而，反動派和愚昧無知之流則主張消滅洋人。德國占據膠州之后，山東發生的事件估計有上千起，國內其他地方爆發的事件更是不可計數。所有這一切表明了廣大民眾對外國侵略的無比憤怒。

外國進口貨的涌入和固定不變的海關稅率，看來已經使中國的經濟凋敝。隨著饑饉驅使許多人成為匪盜，19世紀中葉的生活就更加艱難了。很多貧民最初把他們的不幸歸罪于太平軍，最后卻把怨恨轉到外國人身上，因為叛亂者是外國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識鼓動起來的。在太平天國以后的時期，外國貨在中國城市的市場上顯著增加，而到了自強運動時期（1861—1894年），洋式企業和工業以及外國資本都被引進了中國。

外國鐵路也威脅著傳統的運輸體系。運河和從漢口到北京的陸路不能與當時正在修建的鐵路競爭，成千上萬依靠這些運輸體系為生的人擔心失業。到19世紀末，中國似乎被農村的貧困、日益嚴重的失業以及老百姓普遍艱苦的生活所困擾。很多中國人因把這一切歸咎于外國的影響及其經濟控制而對洋人產生刻骨的仇恨，這就不足為怪了。

經濟上的困難又伴隨著天災：1898年，黃河決口，淹沒了山東幾百個村莊；在四川、江西、江蘇和安徽也發生了水災。此后，1900年在華北又發生了嚴重的干旱。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學者、官員們譴責外國人，他們堅決認為，這是洋人傳布異端邪教觸犯神靈的結果。加給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說他們在陸地上建造鐵路傷了“龍脈”；他們開礦放走了山中的“寶氣”；普遍地破壞了風水（雖然這很神秘），打亂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在迷信、極端的經濟蕭條以及對外國人到來的普遍不滿的總氣氛下，一場排外的大運動在1900年爆發了。

### 義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國秘密會社“義和拳”，這種組織因其成員都練傳統的武術而得名。義和拳是與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蓮教（曾煽動1796—1804年的起義）有聯系的八卦教的一個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諭首先提到了義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顧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和直隸各省繼續活動。19世紀90年代，這個傳統的反清組織也表現了排外性質，立誓要殺掉洋人及其中國的幫兇。

義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統屬的團體，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團體都有它自己的頭目。這些團體一般被組成有25人的小隊，每小隊由一個具有十足權威的頭目領導。教練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個來說是簡短的，一天之內就可完工。義和拳稱頭目為“老祖師”，小頭目為“大師兄”和“二師兄”。稱洋人為“大毛子”，中國基督教徒或那些從事“洋務”的人為“二毛子”，那些用洋貨的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滅干凈。[[68]](#_68_Dui_Yi_He_Tuan_De_Jie_Shao_X)

義和拳信奉的眾神包括傳說的和歷史的人物。義和拳的綱領和最能吸引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術。他們聲稱，通過巫術、符咒和儀式，他們能召喚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槍不入，飛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將助戰。因為他們排外，他們寧可用舊式刀矛，而不要槍炮。

雖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義和團頭目變得親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組織都具有這種思想。有一個組織仍堅持“反清復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組織則大部分是些歹徒，對此事并無一定的看法。當義和拳拳民于1900年夏被朝廷傳喚到北京時，親明的一隊人襲擊了外國使館，但又秘密地集結力量妄圖推翻滿洲朝廷。[[69]](#_69_Li_Shou_Kong____Zhong_Guo_Ji)然而，在決心消滅洋人及其中國幫兇時，各派義和拳組織又結合在一起了。

### 宮廷對義和拳的庇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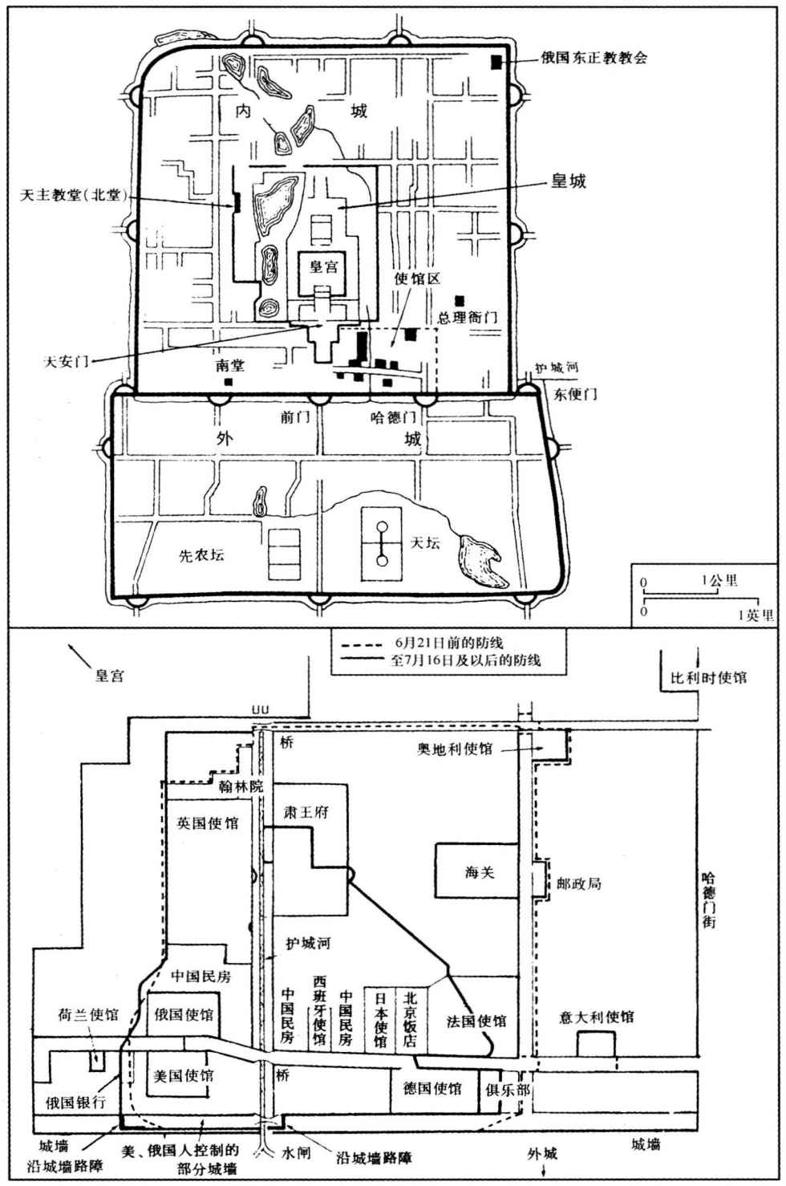
19世紀90年代，義和拳中的一支——“大刀會”——在山東巡撫李秉衡秘密鼓動下，在山東特別活躍。李秉衡認為，基督教徒要對義和團正在挑起的騷亂負責。他一直認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壓百姓”。他建議對拳民進行招撫而不要鎮壓。當兩名德國傳教士在1897年被殺害（德國人就以此為借口占領膠州）時，李秉衡便在外國人的壓力下被撤職。毓賢后來于1899年3月被任命為巡撫，他也是袒護義和拳和大刀會的：他命令他的下屬對傳教士及教民的申訴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護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滅洋”的旗號。巡撫資助拳民，邀請他們來訓練士兵，而且將他們改名為義和團，作為官方支持的“團練”的一種形式。官府的支持給他們壯了膽，拳民對傳教士和教民的襲擊便日益頻繁起來，但毓賢卻繼續向朝廷奏報，說“斷無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這一判斷，而且在它的多次聲明中排外的腔調愈唱愈高。[[70]](#_70_Tan_Chun_Lin____Quan_Luan)

當1899年12月外國的壓力迫使朝廷撤換毓賢時，他前往北京勸說端王、莊王和大學士剛毅，以支持義和團的武裝為宜。這些反動之士把他們的思想稟告給慈禧太后，灰心喪氣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賢被調任山西巡撫，而繼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曾被告誡不要懲處拳民。但是袁世凱拒絕照辦，并成功地將山東的義和拳運動鎮壓了下去。

朝廷繼續偏袒拳民，并于1900年1月12日下令宣布，練武自衛的百姓不得被視為歹徒。“各省鄉民設團自衛，保護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義。果能安分守法，原可聽其自便。”[[71]](#_71_Tan_Chun_Lin____Quan_Luan)這道上諭和4月份另一同樣性質的上諭進一步助長了拳民的活動；5月，拳民在直隸省高洛村搞了一次大暴亂。總督裕祿得知太后暗中庇護拳民，就沒有要求懲罰他們，朝廷也未采取懲治措施。拳民越來越膽大，他們毀壞鐵路和電線，把這些東西當作外國人奴役中國的象征。

1900年5月，朝廷考慮把義和拳辦成民團武裝，但遭到裕祿和袁世凱的阻撓。然而，慈禧太后對拳民具有神通的報告印象頗深，便把他們召到了北京。他對義和拳的頭目們嘉勉備至，并命令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宮廷侍從學習他們的武藝。王公貴族當時都聘請拳民守衛住宅，而且有些正規軍也加入了義和拳。高漲的排外主義浪潮，促使外國使節于5月28日從大沽口外的艦只上調來軍隊。總理衙門企圖限定每個使館只能有30名衛隊，但在6月1日和3日，到達北京的第一批隊伍卻包括了俄、英、法國人各75名，美國人50名，意大利人40名，以及日本人25名。

5月29日，朝廷再降旨嘉許，拳民受到鼓勵之余，便在6月3日切斷了京津鐵路線。駐武昌的總督張之洞和掌管鐵路電報的盛宣懷奏請鎮壓這類活動，但未收效。當朝廷完全為反動人士所控制時，外國使節開始擔心在京外國人的安全。英國公使向天津的西摩爾海軍上將請求援助，于是一支有2100人的各國聯軍在6月10日乘火車離津。在京津之間的中途，義和拳襲擊了外國遠征部隊，阻止他們向北京行進。京津兩市之間的電線被切斷，使北京的外國人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同一天，拳民縱火燒了英國使館在西山的避暑山莊。6月11日，日本使館書記被反動的回族將軍董福祥的軍隊殺害。



地圖8 1900年的北京

6月13日朝廷聲明，各國公使已受到充分保護，在北京無需駐扎更多的外國軍隊。總督裕祿和提督聶士成奉命抵擋西摩爾海軍上將的推進。大沽炮臺的指揮官嚴陣以待，防止突然襲擊。從6月13日開始，大批拳民麇集于北京，放火燒教堂和外國人寓所，殺中國教民，把官員拖到大街上當眾侮辱。他們對已死的傳教士掘墓挖尸（甚至對早期耶穌會士的遺體也不例外），襲擊使館的衛隊，并于6月20日殺害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拳民們在天津全市區橫沖直撞。面臨如此混亂的局勢，外國軍隊在6月17日占領了大沽炮臺。與此同時，西摩爾的遠征部隊又打回天津。

端王、剛毅和太后當時都同意，全力攻擊各國使館對洗雪半個世紀的屈辱來說是必要的。6月16日在就此問題進行第一次廷議（為此前后共舉行四次）時，太常寺卿袁昶反對策劃襲擊外國人，指出拳民所稱槍炮不入之不可信。太后反駁說：“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這次廷議并未作出決議，但發布了招募“年力精壯”的拳民入伍的上諭。

在6月17日第二次廷議時，太后透露了列強提出的所謂四點要求：規定一特別地點供皇帝居住；允許外國公使征集地方稅收；以及允許他們指導中國軍事。至于第四點，她秘而未宣，據說是要求“恢復皇帝的權力”。這四點要求，實際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國應為反抗任何外國的行動而“決一死戰”。6月18日的第三次廷議仍未作出決議，但于6月19日傳來的消息說，外國人已要求大沽炮臺投降。6月19日太后召集第四次廷議宣布斷絕外交關系。她決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國作戰，并駁回了光緒帝延緩執行此一決定的嘗試。6月21日，北京收到一份關于大沽和天津戰況的含糊不清的所謂捷報，于是清廷蠻有把握地與各國宣戰了。[[72]](#_72_Xiao_Yi_Shan____Qing_Dai_Ton)

當時朝廷正式命令各省當局組織拳民反抗外國侵略。在北京，拳民公開受到官方資助，莊王、剛毅和端王擔任義和團各團隊的官方指揮。這些團隊和董福祥將軍指揮的官軍一起對各國使館和北堂（羅馬天主教）發起進攻。莊王懸賞捉拿外國俘虜，而剛毅則宣稱：使館一旦被攻克，則外夷不復有存身之所，國家亦將永享太平。反動人士企圖通過太后完全批準的這些攻擊，來達到以下目的：向外夷發泄憤怒；解除外國對京師的威脅；毀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證據，并在百姓之中進行煽動以取得支持。在使館區，有450名衛隊、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節）和2300名中國的教民在頑強地抵抗拳民；拳民們卻衣著不整，披頭散發，手執“法寶”，禹步而行，極像傳說中的巫師。北京完全成了一個妖魔鬼怪活動的活地獄。

列強被這種發展弄得驚慌失措，它們決定派遣軍隊到中國。英國尤其關切它的利益范圍——長江流域——的命運。在7月初，英國外交部就已收到許多主張采取適當的行動方針的建議。后來成為歷史學家的馬士便曾建議：“英、德兩國軍隊應在長江流域和叛亂地區之間設下一道屏障。”當時在倫敦休假的上海總領事璧利南就建議說，如果聯軍的干涉行動把朝廷逐出京師以后而使國家處于無政府狀態，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選為皇位的繼承者。[[73]](#_73_L_K_Yang____1895__1902Nian_Y)

### 華南和華東的獨立行動

甚至在正式宣戰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著一條災難性的路線行動。當時駐廣州的總督李鴻章可能是唯一能夠力挽狂瀾的人，他拒絕行動，宣稱掌握大批軍隊的榮祿應該不讓反動派控制政局。[[74]](#_74_Can_Jian_Xiao_Yi_Shan___Qing)各省當局雖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卻急于要保護他們的轄境不受拳民的破壞和外國人的懲罰。

朝廷在6月21日宣戰時，主要的省級官員——如廣州的李鴻章、南京的劉坤一、武昌的張之洞和山東的袁世凱——都一致拒絕承認這個行動，堅決認為它是未經皇帝正當授權的“亂命”。他們封鎖了宣戰聲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閩浙總督同各國駐上海的領事非正式地約定，他們愿在管轄區內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和鎮壓拳民，而列強則要制止其軍隊進入他們的地區。因此，整個中國東南半壁避免了義和團的災難和外國人的入侵。

這些督撫為他們的行動辯護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動派已控制朝廷，所發純系亂命；與幾個外國列強同時開仗是件蠢事；各使館中的外國人生命必須予以救護。他們敦促朝廷指派紀律嚴明的軍隊護衛各國使館，并要繼續承認和如期支付外國債款。他們向榮祿發出呼吁，但后者拒絕給予合作。

盛宣懷建議袁世凱從山東調兵進京營救太后與皇帝，使之擺脫這些壞人的控制。袁世凱謝絕了這一建議，他說：“并未受命，若我率軍北上救護各國公使，恐愿未遂已為匪挫敗于途中，故實難從命。”劉坤一打算為太后的罪過開脫，因此通知各國公使，說戰爭行動“并非朝廷本意”。而與此同時，朝廷在7月3日的上諭中卻告誡說，各省當局不得擅言“和議”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國軍隊攻占了天津，并以進軍北京相威脅；同日，東南十三省當局敦促朝廷鎮壓拳民，保護外國人，賠償他們在騷亂中蒙受的損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國道歉。在這種壓力之下，朝廷態度暫時有所緩和。總理衙門請外國使節及其家屬為了安全遷進總理衙門，以便安排他們回國。李鴻章奉命要中國駐外代表通知各該國政府，說它們駐北京的代表都平安無事。7月19日，總理衙門再次表示愿意武裝護送外國使節去天津，但是外國人覺得總理衙門不能確保安全，所以寧可留在使館等待援救：在這短暫的緩和時期（7月14—26日），總理衙門向使館送去了生活供應品，攻擊也暫時停止了。

可是，當反動的李秉衡于7月26日到達北京時，開戰和消滅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來。五位敢于勸告議和的高級官員被處死，袁世凱慨嘆說，大局已告“無望”。

外國增援部隊于7月末到達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見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進發。這支聯軍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國人，3000名英國人，2100名美國人，800名法國人，58名奧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們徹底打敗了拳民和清政府軍，并于8月14日到達北京，解救了被圍困的各國公使館。這些使館堅守了將近兩個月，這主要應感謝北洋大臣榮祿，他不敢違抗太后的命令，卻只對使館區作了一次虛張聲勢而非實心實意的攻擊。

正當聯軍前進之際，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從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來談判解決，但是太后強迫他一起同行。經過長途的艱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來了。席卷華北、內蒙古和滿洲，并使231名外國人和成千上萬中國教徒喪命的這場義和團災難這時終于結束了。

### 和平解決

為了收拾義和團暴亂以后的局面，李鴻章應召去進行和談。在此以前，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進京，但是太后對拳民的庇護使他惶懼，所以遲遲未從廣州啟程。7月8日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從1870—1895年任過這兩個職務），只是到了此時，他才乘船前往上海。[[75]](#_75_Ta_Zhe_Yang_Zuo__Bing_Mei_Yo)7月21日到達上海時，他對北京的形勢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絕北上。8月7日，朝廷任命他為全權議和大臣與外國進行談判，但李鴻章仍對北京之行猶豫不決，因為他認為，朝廷是不會同意那些他認為實現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這些措施就是鎮壓拳民和保護在北京的外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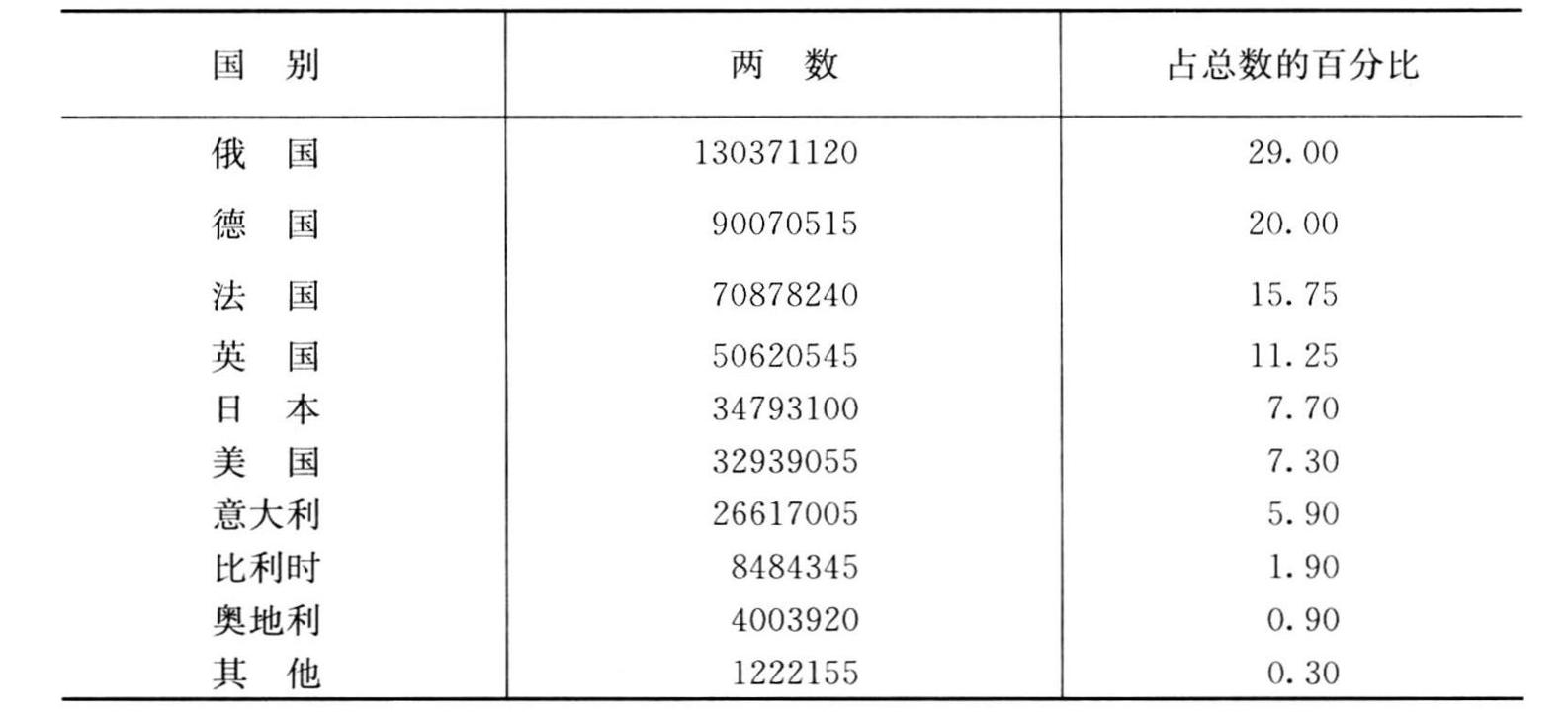
李鴻章稍感寬慰的是，列強并未與中國宣戰，只是為了鎮壓叛亂才派了遠征軍。此外，這時俄國提出把它的軍隊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準備談判，而且為了不讓其他國家提出過分的要求，它在會議上定下了比較溫和的調子，李鴻章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慶親王和榮祿與他一起去進行談判，當朝廷同意照辦后，他便在俄國人的保護下北上，9月18日抵達天津。當列強聲明榮祿因參加過攻擊使館的行動而不能被接受為談判者時，李鴻章便請求讓榮祿去西安。李鴻章希望榮祿（他在11月11日參加了軍機處）將能遏制端王和剛毅當時仍然強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聯軍代表們提出，在“朝廷還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絕開始談判。他們希望利用此要求作為手段來滿足他們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絕了，因為她擔心會把不能接受的條款強加于她；她還指出，只有在和平解決之后，朝廷才會還都北京。東南各省的督撫此時企圖把聯軍的注意轉到懲罰犯罪的大臣們的問題上來。他們對清廷施加壓力，要求它懲辦九名贊助義和團的大臣、巡撫毓賢和董福祥將軍。朝廷勉強地同意懲罰這些大臣，但未對董將軍審判。列強堅持必須懲辦董福祥，而劉坤一和袁世凱則迫使榮祿采取行動，他們強調明智的政治家“皆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尤不愛一人以救萬民”[[76]](#_76_Tan_Chun_Lin____Quan_Luan)。1900年12月3日，清廷態度終于緩和了。當追究罪責時，卻沒有提到慈禧太后和榮祿這兩名主要罪犯。

在北京，聯軍的談判者內部很難磋商出一致的條件來。德國要求予以嚴厲懲治，德皇甚至揚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讓中國人再不敢對德國人側目而視”[[77]](#_77_Ma_Shi____Zhong_Hua_Di_Guo_D)。由于克林德的被殺，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伯爵被任命為在中國的聯軍總司令。英國支持德國以圖遏制俄國，而俄國正在討好中國，它希望把乘騷亂之機占據的滿洲割讓給它。日本不甘落后，也想巴結中國人；法國聲明它對中國沒有什么企圖，而美國發表了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第二個照會，支持“中國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在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之后，在1900年12月24日公布了一項有十二條款的聯合照會，照會在1901年1月16日被清廷勉強接受下來。最后的解決辦法包括下列主要各點：

（一）懲辦罪犯。聯軍最初要求定十二名官員死罪，包括莊王、端王、剛毅、毓賢、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將軍。最后解決的辦法是賜令莊王自裁；端王充軍新疆，終身監禁；毓賢即行正法。董將軍被革職；剛毅、徐桐和李秉衡已死，均追奪原官。在各省，從判處死刑直到僅僅加以譴責的官員共有119名。

（二）賠款：賠款6750萬英鎊，合銀4.5億兩，在39年內償清，年利四厘，并以海關、厘金、地方關卡稅收及鹽務稅作保證。為了幫助籌措賠款，現行關稅應予提高，而且對在此以前的免稅貨物征稅。賠款的分配如下表。[[78]](#_78_Shi_Ji_Shang__Pei_Kuan_Shu_M)



（三）其他重要條款：

（1）派代表團赴德國和日本道歉。

（2）各國設置常駐衛隊以保衛使館。

（3）拆毀大沽炮臺，以及北京與沿海之間的其他炮臺。

（4）兩年以內不得輸入武器。

（5）北京至沿海的關鍵地點駐扎外國軍隊。

（6）在拳民曾經肆虐過的45城鎮，停止考試五年。

這些內容具載于十二款的《辛丑各國和約》和十九件附件中，并由李鴻章、慶親王和十一國代表于1901年9月7日簽署。聯軍部隊于9月17日撤出北京，但清廷直到1902年1月7日才還都北京。

### 俄國在滿洲

議定和平并未解決俄國人占據滿洲的問題。在鎮壓“騷亂者”和恢復秩序的借口下，20萬俄國軍隊全面侵入滿洲；1900年7月23日占瑗琿，8月30日占齊齊哈爾，10月1日占領沈陽（清代的陪都盛京）。遼東半島的俄國軍事長官、海軍上將阿列克塞也夫強迫盛京將軍曾祺簽署一項“臨時協定”，實際上攫取了中國人在滿洲的統治權。清廷拒絕承認此項協定，它堅持曾祺無簽約權。后來雙方在圣彼得堡開始談判，并于1901年2月16日，由俄國人建議締結一項有十二款的條約以代替阿列克塞也夫—曾祺協定，它名義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實際上，俄國軍隊在“保路兵”的掩飾下把占領滿洲合法化了。協定規定，未經俄國人同意，中國人不得向滿洲運送武器或授予任何人在該地興建鐵路和開礦的特權。它規定中國擔負占領費和賠償中東鐵路的損失，并允許俄國建筑一條由中東線直達長城的鐵路。

俄國人的行動引起其他列強的憂慮。日本駐北京公使警告慶親王說，對俄國占領滿洲作出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對中國的瓜分。英國和德國告誡清廷，要求它在與聯軍在北京達成總的協定之前不得與俄國單獨締約；美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力促中國反對俄國的要求。可是，維特伯爵此時威脅說，拒絕此建議將導致俄國人吞并滿洲。清廷由于幾位大員的意見相互抵牾而進退維谷。李鴻章的親俄傾向此時表現得明顯起來，他建議簽約以避免與俄國的關系發生危險的破裂，而張之洞和劉坤一則堅決反對這個條約。

清廷因這些互相對立的意見和各種國際壓力而左右為難，始終不能作出決斷。但是，由于中國駐倫敦和柏林的公使，尤其是駐東京的公使再三提出反對締約的勸告（駐日公使強調指出，在英國與日本的聯合反對下俄國不敢在滿洲采取行動）之后，清廷終于在3月23日拒絕了俄國的條約。面臨國際上的反對，俄國人沒有直接采取行動，僅發表聲明說，他們雖然很愿意撤出滿洲，但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不允許他們立即這樣做。李鴻章仍然主張，通過直接談判與俄國單獨解決，并打算給予俄國在滿洲的某些特許權以換取它撤軍，但維特伯爵拒絕了他的建議。在遭到這樣的拒絕以后，又老又弱和羞慚交加的李鴻章，突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終年78歲。

李鴻章的工作由慶親王和軍機大臣王文韶接辦。由于國際局勢不利于俄國，它終于在1902年4月4日與中國簽約，答允分三個階段（每階段相隔六個月）從滿洲撤軍。至于中國方面，它同意保護俄國控制的中東鐵路。第一批撤軍按期執行，但到1903年4月該撤第二批俄軍時，俄國人又玩弄花招，把軍隊偽裝成“保路兵”而沒有撤離。此外，他們還要求取得一些新的壟斷權，并重新占領了已撤出的城市沈陽和牛莊，這便為對日戰爭播下了火種。

### 義和團暴亂的影響

義和團運動是由反動的滿洲朝廷、保守的官員和紳士以及愚昧迷信的百姓的聯合力量發展起來的。它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情緒和怒火的非理性的爆發，本身具有愛國主義的因素。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歷史學家都認為它是一次原始形式的、愛國的農民起義，它具有正確的動機，但采取的方法卻是錯誤的。義和團暴亂及其最后的解決有這樣一些意義重大的后果：

（一）聯軍之占領北京和俄國之進犯滿洲加劇了國際對抗，使各國擔心它們之間會相互發生沖突，從而最后結束各國在中國經濟機會均等的局面。國際間普遍出現了一種愿望，即寧愿緩和緊張局勢和維持中國現狀。1900年7月3日美國發表第二個“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目的即在力圖“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并維護在中華帝國全境實行貿易均沾原則”。接著，英國與德國于10月16日簽訂了一項協定（其他列強被要求支持），規定署約國不得攫取中國的領土。帝國主義活動的這種對峙局面使清帝國免于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國際地位卻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辛丑各國和約》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武器輸入被禁止，大沽及其他炮臺被拆毀，外國在使館區內駐扎軍隊，外國有權從北京到沿海派駐軍隊：所有這一切都損害了中國的自衛力量。有關中國國內許多地方暫停科舉考試的條款，則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三）4.5億兩賠款加上利息，如要全部付清，總數達982283150兩，比原數多出一倍以上。由于支付必須用外國貨幣，尤其在銀價猛跌的那幾年，中國在折算中又遭受額外的損失。這樣大量資本的外流即使不致使中國的經濟完全不能增長，也使它受到了抑制。

（四）駐北京的外國公使們從此組成一個有力的外交使團，有時其作用超過了滿洲朝廷而成為太上皇政府。

（五）義和團的野蠻行徑使世界認為中國不是文明國家，而外國列強的殘暴表現卻造成了一種不可戰勝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損害了中國人的自信和自尊心。中國人對外國人原來抱有的輕蔑和敵視態度，現在往往一變而為恐懼和奉承的態度。

（六）盡管清廷為了茍延殘喘，企圖在實現立憲政治方面作一些三心二意的改革，但是，許多中國人看到滿族的力量在崩潰，便轉而向往革命。孫中山主張用暴力推翻清朝的活動日益得到同情和支持。隨著革命脈搏的加速，他的形象也從一名大逆不道的叛亂者一變而為一個愛國的革命家，從而在1911年最終促使滿洲王朝覆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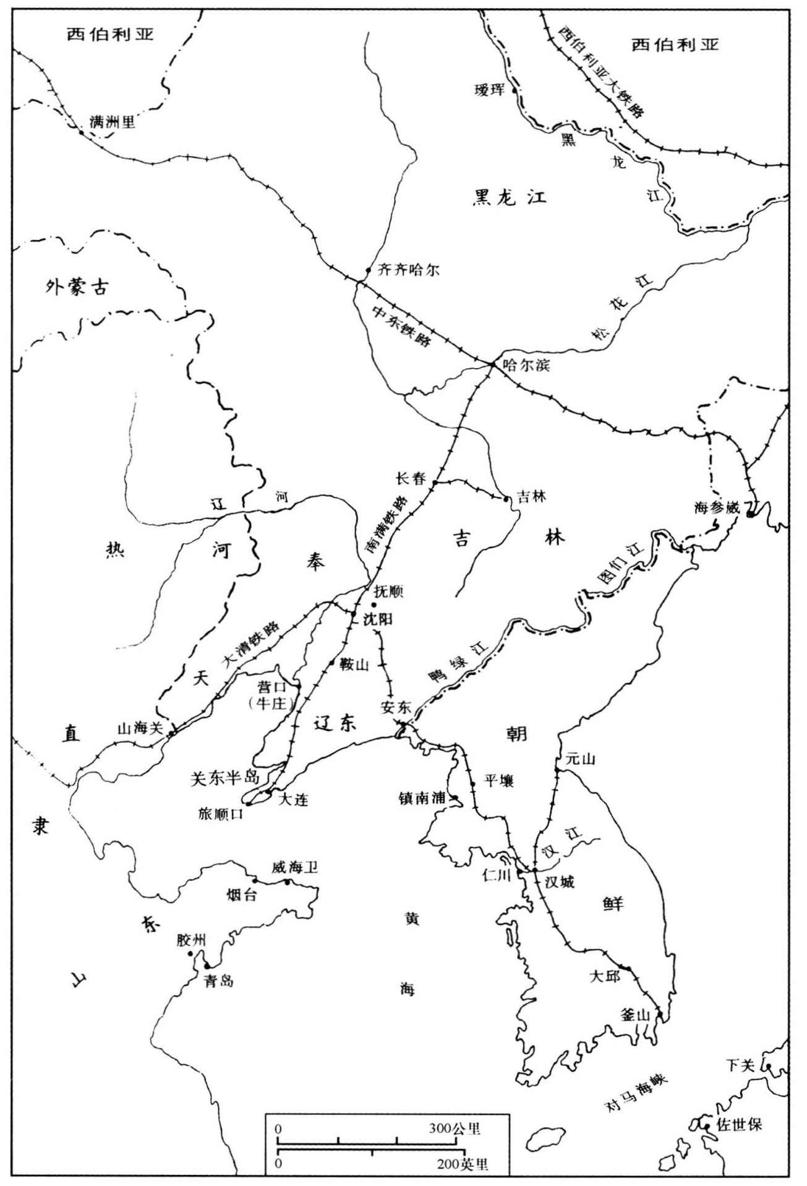
## 英日聯盟的影響與俄日戰爭

### 聯盟的起源

俄國人占領滿洲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嚴重國際后果，必須從更廣泛的歐洲強權政治的背景來加以考察。在剛剛進入20世紀時，隨著英國執行“光榮的孤立”政策，歐洲在三國同盟（德、奧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間保持著一種不穩定的均勢。由于這兩大陣營之間的競爭造成緊張狀態，以及害怕這兩個防御性同盟會聯合成一個大陸聯盟來反對英國，于是強國之間形成了僵持局面，這種形勢促使它們把注意力指向亞洲和非洲。從這種觀點看，俄國侵占滿洲并不僅僅是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孤立事件，而且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嚴重破壞。尤其是日本，它關心自己在朝鮮和滿洲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門戶開放的前途。英國感到它在北京的影響和在長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法國支持俄國前進，德國也暗中鼓勵俄國向東擴張，以使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出去。顯然，一個國際關系的新世紀展現于世，從而使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方結盟得以形成。

英國處在十字路口。它的“光榮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爾戰爭又牽制了25萬名英國士兵達兩年半之久（1899年10月至1902年5月），這暴露出英國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險。為了保護它的帝國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英國被迫放棄孤立政策，拼命尋找同盟者。最初它選了德國。倫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協定（它曾保證維持中國現狀）會阻止俄國向滿洲推進，但德國后來把滿洲排除在協定之外，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開罪俄國。英國再三企圖與德國結盟而未獲成功，這便迫使倫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國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隨英國；美國則堅持傳統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剛打過西班牙戰爭，所以它無心在海外進行冒險活動去保衛“門戶開放”政策。這樣一來，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軍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緒。

1901年，根據英國海軍部計算，“中國海域”上的俄法聯合海軍力量，在戰艦數量上以九比四超過英國，但英國若與日本結盟便會使它在戰艦數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風，而在巡洋艦方面也占有優勢，這就無需從它的歐洲艦隊調來艦只了。除軍事考慮之外，英國人還關切俄國人可能通過他們控制滿洲來支配北京，關切俄國的經濟影響（通過比利時的資金興建京漢鐵路）滲入長江流域——這里卻是傳統的英國的利益范圍！再有一點使人不安的是，俄國在西藏活動的加強導致達賴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兩個使團前往俄國。[[79]](#_79_Liu_Yan____Zhong_Guo_Wai_Jia)如果不加制止，俄國人的南進可能威脅印度的安全。因此傳統的恐懼心理又再次閃現，英國人覺得當務之急是與日本人結成聯盟以阻止俄國人前進并維持英國在亞洲的優勢。英國是個遼闊的帝國，孤立于歐洲政治之外，現在又面臨著俄國人的新威脅，所以它是舍此別無其他辦法了。為了阻止日本與俄國可能達成將會嚴重危害英國在亞洲利益的任何協定，英國與日本駐倫敦公使的談判進行得很快。



地圖9 滿洲和朝鮮的國際關系

至于日本，自從1895年三國干涉以來，它對俄國一直抱有強烈的敵對情緒。與英國這個最重要的西方大國結盟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這將頓時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意味著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時代的來臨，而且可以用這作為對付俄國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縣有朋的一位門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繼任小村壽太郎、駐英國公使林董領導的一個強有力的集團堅決贊成這一行動方針，而他們又有政界元老山縣、西鄉從道和松方正義的支持。但是，頗有影響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則懷疑英國在拋棄傳統孤立政策方面的誠意，并害怕日英結盟會使日本在對俄作戰中充當先鋒（他認為這對他的國家來說是力難勝任的）。所以他寧愿與俄國修好，因為朝鮮與滿洲的問題主要關系到日本與俄國，并不涉及英國。他的論點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縣和他的軍事集團認為，與俄國修好只能是暫時之策，而勢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須為爭奪在朝鮮和滿洲的霸權而與它作戰。不用說，日本領導層在外交事務中的對立觀點是與國內政治的傾軋有關的：伊藤想阻止軍界支配國家事務，軍界則不愿讓伊藤有機會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對內閣的立場，所以桂太郎討厭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敵，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現了這個機會：當時正值耶魯大學二百周年校慶，伊藤應邀前去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事畢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勵下，前往歐洲企圖以私人身份訪問俄國，倡議談判。在伊藤出國時，桂太郎命令林董在倫敦盡快進行結盟談判。當伊藤到達巴黎時，林董也帶了結盟草約露面了。伊藤十分沮喪，甚至想回國；但最后還是決定按計劃前往俄國。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后退余地。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他的俄國旅行。到達俄國后，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于戰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俄國政府不愿接受這些條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80]](#_80_Chen_Fu_Guang____You_Qing_Yi)伊藤離開俄國時并未達成協議，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并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然而，內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確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準了英日聯盟。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滿韓交換”的原則為基礎的協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簡言之，這就是“滿韓交換”。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狀和全面和平。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內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采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生戰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爭；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爭，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 英日聯盟的影響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范圍，使之適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行動。美國同情日本。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81]](#_81_Zhan_Sen____Ri_Ben_Yu_Zhong)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凌，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征。“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么荒唐可笑啊！”[[82]](#_82_Heng_Te____Bian_Fang_He_Men)羅斯福總統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并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于維護中國和朝鮮。接著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并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后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于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盟，因此，“近日英日聯盟，專為東三省事”。可是，他們又告誡說：“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若墮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于我。”[[83]](#_83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兩天以后，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于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內的騷亂進行干涉時，他對“騷亂”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這是否意味著像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隨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至賴人保全，清韓并列，令人痛心。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84]](#_84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據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只要中國一放松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于別國聯盟之余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于此者！”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資源和創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85]](#_85_Wang_Yan_Xi___Wang_Shu_Min_H)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于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致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將是受害者；但如果導致戰爭，中國領土將成為戰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布。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86]](#_86_Li_Guo_Qi____Zhang_Zhi_Dong)張之洞發現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口蜜腹劍”的心機。[[87]](#_87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于“門戶開放”的虛偽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此中國應“以結近援御遠患為歸宿”[[88]](#_88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定，但是它應隨時被告知談判的內容，而且協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定的條款。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爭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后，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討了東亞的政策。財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適當地預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干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采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拋棄。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采伐特許權，并停止將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黃色俄國”[[89]](#_89_Chen_Fu_Guang____You_Qing_Yi)，圣彼得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國軍隊根據1902年4月的協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討任何新的條件。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后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別訂立了《通商行船續約》，開放沈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做居留地。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復，俄國人重新占領了沈陽。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畀以戰爭和外交全權，就像把這些權限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并吞的領土了。[[90]](#_90_Wu_Xiang_Xiang____E_Di_Qin_L)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內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內部改革方面有獨占的權利。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干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討論，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議。在俄國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討論范圍之內。至于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不在南部海岸設防。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干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雖然俄國后來放棄了中立區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日本人已斷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 俄日戰爭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財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后，東京作出了戰爭的決定。人們認為，日本將贏得頭幾個戰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后再著手和平解決。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這是一次日本在戰場上將十戰六勝的良機。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91]](#_91_Zhan_Sen____Ri_Ben_Yu_Zhong)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于公眾的漠不關心而不愿去做的。[[92]](#_92_Heng_Te____Bian_Fang_He_Men)為了充分利用總統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

戰爭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爭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甚至在出現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93]](#_93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爭中嚴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爭在它的領土上進行。他指出，保衛滿洲將需要數10萬人，即使保衛幾個重要據點也需要6萬至10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只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丑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94]](#_94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收復滿洲。[[95]](#_95_Tong_Shang_Shu__Di_16__17Ye)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戰爭一爆發，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96]](#_96_Tong_Shang_Shu__Di_18Ye)。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表聲明，同時呼吁交戰雙方要尊重在沈陽和盛京的陵寢，并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日本同意尊重中國的中立，并否認在戰后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也不愿討論它的未來地位。[[97]](#_97_Tong_Shang_Shu__Di_27Ye__Jua)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福總統，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一”。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爭本身在這里不用贅述了。只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并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日本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和談。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98]](#_98___Qing_Guang_Xu_Zhao_Zhong_R)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復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總之，此次日本若于東三省所占最優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于俄人遠甚。”[[99]](#_99___Qing_Ji_Wai_Jiao_Shi_Liao)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爭之后的“反日親俄”的立場，改變為俄日戰爭之后的“親日反俄”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致保持舊日的統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100]](#_100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雙方在18個月內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將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俄國同意將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準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此外，此約規定開放16個港口，并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森林。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次茅斯條約中所規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并不苛刻”的補償。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系揭開了新的一章。這一情況并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爭，但確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著它。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干，在那里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舞臺忙于布景。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了腳跟，最后將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結束滿洲——滿洲人的邊疆故鄉——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101]](#_101_Guan_Yu_Man_Zhou_De_Di_Wei)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爭的沖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后來成為實業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隨著清朝的衰落而每況愈下。

（王瓘 譯）

[[1]](#_1_1)魯賓遜等：《非洲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帝國主義的最高峰》，第6、8、10—11、471頁。

[[2]](#_2_1)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5、7—13頁。

[[3]](#_3_1)中文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4—22頁。另見赫德《有關中國問題的札記》，載衛斐列《蒲安臣和中國第一次對外國的出使》，第285頁。

[[4]](#_4_1)《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頁。

[[5]](#_5_1)中文資料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2—31頁。英文原件已遺失，但H.E.沃德豪斯根據中文翻譯了其中大意；見他的《威瑪先生論中國》，載《中國評論》卷1第1期（1872年7—8月），第38—44頁以及卷1第2期（1872年9—10月），第118—124頁。

[[6]](#_6_1)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4，第1—4頁，1867年12月18日。

[[7]](#_7_1)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第6—10頁，1867年12月31日。

[[8]](#_8_1)《中國通訊》第5號（1871年）第2號文件，第8頁。

[[9]](#_9_1)《美國對外關系，1868年》第1卷，第494頁。

[[10]](#_10_1)即志剛和孫家榖。

[[11]](#_11_1)《中國通訊》第1號（1869年）有關不列顛和中國之間關系的通訊，第1號文件：克拉蘭頓致蒲安臣的信，1868年12月28日。

[[12]](#_12_1)《中國通訊》第2號文件：克拉蘭頓致阿禮國信，1868年12月30日。

[[13]](#_13_1)《中國通訊》第5號（1871年）：關于修訂天津條約的通訊，第107號文件，第355頁。

[[14]](#_14_1)《中國通訊》第117號文件：克拉蘭頓給阿禮國的信，1869年6月4日。

[[15]](#_15_1)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68，第14頁，1869年10月23日。

[[16]](#_16_1)《中國通訊》第1號（1896年）：阿禮國致克拉蘭頓信，1869年10月28日。

[[17]](#_17_1)《中國通訊》第5號（1871年），第360頁：阿禮國致麥華陀信，1869年4月1日。

[[18]](#_18_1)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82頁。

[[19]](#_19_1)關于這些備忘錄的原文，可以查閱《中國通訊》第4號（1870年）和第6號（1870年）。遞呈詞者是對中國貿易歷史感興趣的倫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愛丁堡、丹地、曼徹斯特、麥克萊斯斐爾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會。

[[20]](#_20_1)《中國通訊》第10號（1870年）：阿禮國爵士對有關中國條約協定進一步意見的備忘錄，1870年5月3日，第9頁。

[[21]](#_21_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04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645，1873年5月16日。

[[22]](#_22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9，第40頁，1871年1月21日。

[[23]](#_23_1)除了前引總理衙門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一事在《實錄》、《東華錄》這些清廷文獻中并無記載，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文祥、倭仁、沈葆楨、馮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的著作中也付之闕如。

[[24]](#_24_1)芮瑪麗的《同治中興》（第299頁）指出：“如果說收復安慶和設立總理衙門標志了中興的開始，那么，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和天津教案則標志了中興的結束。”

[[25]](#_25_1)關于教會問題的優秀著作，可參閱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3—7章。

[[26]](#_26_1)費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0第3—4期（1957年12月），第482—483、488、501頁。

[[27]](#_27_1)即望海樓。

[[28]](#_28_1)畢乃德：《1870—1871年崇厚出使法國》，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卷8第3期（1935年10月），第633—647頁。

[[29]](#_29_1)《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第1號（1874年）：《有關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國代表在北京覲見中國皇帝的通訊》。

[[30]](#_30_1)例如1839—1843、1845—1848以及1864年的貢使接見都是在這里。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第262頁。

[[31]](#_31_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15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470，1859年11月22日。

[[32]](#_32_1)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第202頁。

[[33]](#_33_1)海斯：《1871—1900年實利主義的一代》；蘭格：《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

[[34]](#_34_1)境健次郎：《作為薩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島》，陳大端：《清代對琉球諸王的冊封儀式》，均載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112—134、135—164頁。

[[35]](#_35_1)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第18—22頁。

[[36]](#_36_1)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頁。

[[37]](#_37_1)徐中約：《1874年中國的海防與邊防政策大論戰》，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5（1965年），第212—228頁。

[[38]](#_38)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頁。

[[39]](#_3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頁。

[[40]](#_40)《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頁。

[[41]](#_41)《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頁，1880年1月16日。關于張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又見貝斯《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

[[42]](#_42)徐中約：《1880年戈登在中國》，載《太平洋歷史評論》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166頁。

[[43]](#_43)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頁。這些漢學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維紐科夫和V.拉德洛夫。

[[44]](#_44)徐中約：《伊犁危機》，第189—196頁。

[[45]](#_45)關于法國進行活動的詳情，可看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第十六章。

[[46]](#_46)伊斯特門：《19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頁。

[[47]](#_47)參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1070—1071頁。

[[48]](#_48)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49]](#_49)參看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50]](#_50)全海宗：《清代和朝鮮的藩屬關系》，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90—111頁。

[[51]](#_51)如要研究改變中的中國方面的立場，可參見芮瑪麗《清代外交的適應性：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經過》，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頁。

[[52]](#_52)此人即森有禮。

[[53]](#_53)因為如果將這項聲明載入條約，美國參議院就會拒絕批準該約。

[[54]](#_54)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情況，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55]](#_55)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6頁。

[[56]](#_56)“高升號”是中國當局租用的一艘英國輪船。它被擊沉之事曾激起英國國內某些憤慨，由于日本允諾負責賠償該輪，并保證英方在華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見L.K.楊前引著作，第16頁。

[[57]](#_57)李鴻章的策略具見于馬關和談的會談記錄中。參見《馬關議和宗旨談話錄》，載程演生《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5冊。

[[58]](#_58)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464—465頁。

[[59]](#_59)在1895年4月30日的請愿書中，簽名的人數有1200—1300人。

[[60]](#_60)即劉銘傳。

[[61]](#_61)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亞莫林斯基翻譯并編輯的英文譯本，第83頁。

[[62]](#_62)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18頁。

[[63]](#_63)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第87頁。

[[64]](#_64)L.K.楊：《1895—1902年英國對華政策》，第70—71頁。在作出決定以前，內閣曾舉行五次長會進行討論。

[[65]](#_65)同上書，第91頁。英國只愿承認它在中國有利益范圍，不承認有勢力范圍。

[[66]](#_66)《大清德宗實錄》卷543，第5頁；英譯文載譚春霖《拳亂》，第32頁，譯文略有刪節。

[[67]](#_67)參見《總署遵議教案章程奏》，光緒二十二年。——譯者

[[68]](#_68)對義和團的介紹系根據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載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4冊，第433—439頁；參看徐中約《近代中國的興起》，第465—467頁。

[[69]](#_69)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589頁；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70]](#_70)譚春霖：《拳亂》，第46、59頁。中文原文載《大清德宗實錄》卷439，第23頁。

[[71]](#_71)譚春霖：《拳亂》，第60—61頁，英譯文略有改動；原文載《東華續錄·光緒朝》卷157，第11頁。

[[72]](#_72)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196—2198頁。

[[73]](#_73)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1頁。

[[74]](#_74)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203頁。

[[75]](#_75)他這樣做，并沒有聽從英國人強烈要求他留在廣州的勸告。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5頁。

[[76]](#_76)譚春霖：《拳亂》，第139、141頁。

[[77]](#_7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309頁。

[[78]](#_78)實際上，賠款數目遠遠超過了聯軍所蒙受的損失。美國人私下提出的實際要求只為200萬美元，此數已于1905年付清。1908年，美國政府退還中國10785286美元；同時保留200萬美元作為以后機動之用，而于1924年，把其余賠款也放棄了。退還的款項由華盛頓當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為了預備這些學生留學美國，在北京建立了清華學校（即后來的清華大學），該校聘用了許多美國教師。隨后其他國家也紛紛豁免了賠款：英國在1922年；俄國在1924年；法國在1925年；意大利在1925 和1933年；比利時在1928年；荷蘭在1933年。許多中國學者把退還庚亂賠款之舉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這顯然是一個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

[[79]](#_79)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第268—269頁。

[[80]](#_80)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1頁。

[[81]](#_8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爭到和平的時期》，第79—82頁。

[[82]](#_8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83]](#_83)《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頁。

[[84]](#_84)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頁。

[[85]](#_85)王延熙、王樹敏合編：《皇清道咸同光奏議》卷16，1968年臺北重印版，第18頁。

[[86]](#_86)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頁。

[[87]](#_87)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頁。

[[88]](#_88)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頁。

[[89]](#_89)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8—339頁。

[[90]](#_90)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20頁。

[[91]](#_9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爭到和平的時期》，第81頁。

[[92]](#_9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93]](#_93)《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頁。

[[94]](#_94)《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頁。

[[95]](#_95)同上書，第16—17頁。

[[96]](#_96)同上書，第18頁。

[[97]](#_97)同上書，第27頁；卷182，第5、7頁。

[[98]](#_98)《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頁，1904年6月24日。

[[99]](#_99)《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頁。

[[100]](#_100)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頁。

[[101]](#_101)關于滿洲的地位及其改組的細節，參見羅伯特·H.G.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52頁以下。

#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_1_Ben_Zhang_De_Zuo_Zhe_Men_Fei)

## 引言 對外關系的傳統觀點

19世紀末入侵中國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們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廣泛的記載。勝利畢竟使他們寫出了大量的報道。西方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現時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傳教士、記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書籍，對于日益擴大的國際貿易的開拓和影響，從許多方面作了記載。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國人除了講述一些海外奇談、恐懼和災難外，就沒有什么其他記載了。總的來說，外國入侵的歷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恥辱的歷史。此外，直接了解這種情況的只是統治階級、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數人物，至于平民，特別是與外國人共事的人，則不習慣于把他們的看法和經歷記錄下來留給后世。所以我們在考察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時，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會學者們的著作；這些人受過中國經典學說的徹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離對待外國人的傳統態度。

另外，清代中國對待西方關系的觀念，受到了占統治地位的、來自與中國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區的滿人所特有的某些考慮的影響。例如，滿洲的經濟本來是以漁獵和畜牧業相混合為基礎的半游牧業，這與中國定居的和農業的經濟根本不同。因此，滿人在戰略上特別重視與滿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會。雖然從海上來的西方沖擊對于任何一個中國朝代都會是嚴重的挑戰，但因滿人專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區，這便妨礙他們努力去對付從東南來到中國的西方人。此外，滿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漢人。在滿人統治中國的整個期間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和漢人的差別。滿人因為是異族，所以當19世紀中葉中國面臨西方的入侵時，他們并不樂意提倡民族主義。相反，他們心目中有他們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隨著19世紀的流逝，由于滿人漸漸漢化，這種滿人特征便日益變得無關緊要了。他們在17世紀已經日益采用傳統的漢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開始統治以后，他們的漢化加速了。這種傾向在乾隆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現得很明顯，他在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駐在中國國內，并且告訴英國人，我們是“無所不有”的。[[2]](#_2_Deng_Si_Yu___Fei_Zheng_Qing)因此，19世紀滿人在對付西方入侵問題時極力依靠中國的文化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到1800年，滿人已堅定地采取中國人關于世界的觀點。中國人所建立的這種世界制度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許多世紀中精心制定和流傳下來的一整套思想和慣例。[[3]](#_3_Guan_Yu_Zhe_Ge_Wen_Ti__Wo_Men)這種制度的核心是統治天下（天下一訶常常用來指包括中國外部任何地方的整個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不是亞洲的一部分，更不是“遠東”的一部分；它是指體現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國。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這一事實：中國幅員遼闊，力量雄厚，歷史悠久，而又資源豐富；這一切使得它成為東亞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關系便被染上了這種中國中心主義的思想和中國人優于其他民族的偏見。

中國人往往認為，他們的對外關系是表現為中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諸原則的擴大。因此，中國對外的關系是等級森嚴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國的社會和國家一樣。在理論上，中國的世界觀點在幾個方面必然是等級制度的：中國是內部的，又崇高又偉大；非中國的“蠻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賤。同時，關于無所不包和一視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為天下之主，應該對所有的人寬厚，以示“王者無外”之意。這樣一來，便應該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國人，不分遠近，應一律平等對待。在理論上，非中國人被指望通過謁見天子時遵守適當的禮儀，來加入中國的世界秩序。這種實踐便是外國人所稱的朝貢制度。

當然，中國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國人拒絕遵守這種制度，便可能采用強制手段。的確，在古典的儒家傳統中很容易發現尚武精神。《左傳》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說道：“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4]](#_4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__C)后世諸朝代繼續保持這種好戰態度，明朝永樂帝想把當時已知的整個世界納入中國體系，這一雄心勃勃的決心便是明證。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要務是搜集情報，分析情報，檢查分析的結果，以便弄清對方的力量和意圖，這與古代論兵法的經典著作《孫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孫子》緊接著又說，百戰百勝，不是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實際上，在中國與非中國種族集團關系的漫長歷史中，和平主義一般都占上風，因為不注重肉體的強制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傳統之中。孔子說：“柔遠人，則四方歸之。”[[5]](#_5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__Z)孟子更深一層地宣稱：“故善戰者，服上刑。”[[6]](#_6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__M)前面一句話是形成中國綏靖政策的術語“懷柔遠人”的依據，同時，在與強大的“蠻夷”打交道時則往往兼用“羈縻”政策（19世紀中葉條約制度初期的幾十年便可作如是觀）。漢、唐時代，儒家文人學士常常警告說，軍事擴張會把國力和民力耗盡。這種和平的對外政策是中國從漢代以來重文治、輕武功的這種既定制度的反映。雖然總的說來，儒家的傳統在對外政策上側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這絕不是只顧一面的。這種矛盾態度表現在1840—1895年間中國對與西方關系的看法上。

## 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1860年

### 傳統的經世之學和新的戰略性建議

19世紀出現了對于“經世致用”重新感興趣的現象。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空”；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這個學派在17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鎮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18世紀被經院學派所取代了。[[7]](#_7_Guan_Yu_Qing_Chu_Xue_Pai_De_J)

經世學派在19世紀的重新抬頭，有今文經學派的復蘇可資證明。今文經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寧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這一思想復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1788年）。通過從他學習經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年），經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19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產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后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出現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系特別密切。

在《皇朝經世文編》的序言中，魏源闡明了經世派的兩個基本態度：強調現在和強調致用的重要性。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么？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經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內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于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這些問題涉及鎮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1830年，他計劃與楊芳將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但是，他繼續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8]](#_8_Wang_Jia_Jian____Wei_Yuan_Dui)另外一些經世派學者繼續進行這種研究，如19世紀50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70和80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確實常常令人憂慮。16世紀中—日海盜船只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17世紀臺灣國姓爺的武力威脅，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但是，隨著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中國經世派注意的焦點發生了重要變化——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夷人”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將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后矛盾；后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關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鴉片戰爭中戰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后匯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爭以后，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9]](#_9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n)

某些經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后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郭嵩 燾 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10]](#_10_Guo_Ting_Yi_Deng_Bian____Guo)（19世紀50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采取這種態度）。除報紙外，西方的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搜集之列。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后來，梁廷枬寫了《合眾國說》，書中高度贊揚美國的政治制度。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于整個世界的知識。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爭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尋求正確的答案。在這種壓力下，出現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歷史著作中關于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就19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書附有插圖。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林則徐為了了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11]](#_11_Zhong_Yang_Yan_Jiu_Yuan_Jin)

1840年以后，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22部以上的著作。[[12]](#_12_Zhe_Er_Shi_Er_Bu_Zhu_Zuo_Zho)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于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于林則徐。林則徐將搜集到的外國資料于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于1842年將它們編成一部50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這是關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13]](#_13_Guan_Yu_Lin_Ze_Xu__Jian_Qi_S)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爭期間他任臺灣道臺時俘虜的英國戰俘那里得到的。關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于1848年出版。

至于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并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了解外國人的情形。不論是論述戰爭的發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徐繼畬的《瀛環志略》比較系統。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這樣，他每天寫作，歷時五年，根據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于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最后，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并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14]](#_14_Yao_Ying____Dong_Ming_Wen_Ho)

這些學者，特別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于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中心王國”，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于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在“船堅炮利”這一口頭禪上。1821—1861年，至少有66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15]](#_15_Wang_Er_Min_De___Qing_Ji_Bin)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劃。他采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并命令翻譯西方制造槍炮的手冊。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態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只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16]](#_16_Hun_Yuan____Hai_Guo_Tu_Zhi)

除掉重印關于武器和彈藥的傳統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22部關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于制造槍炮，六部是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產。其余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術。這22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17]](#_17_Ding_Gong_Chen___Gong_Zhen_L)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于西方軍艦的著作。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18]](#_18_Wei_Yuan____Hai_Guo_Tu_Zhi)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出來的。它們終于使中國人自己產生了真正的需要。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一種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系和通商當作一回事。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系，而只存在“夷務”，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易的別稱。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系的需要。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中國的用意并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并不經常采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19世紀40年代，中國官員有著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采用這種政策。同時，他們由于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的估計，因而招致了戰爭的災難。徐廣縉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后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采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19]](#_19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20]](#_20___Shi_Liao_Xun_Kan____Di_36Q)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么呢？現代主權國家經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布夷人的一種手段。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沖突。在鴉片戰爭和開埠以后，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爭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因此，對于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21]](#_21_Pu_Ling_Yu____Yue_Dong_Shi_B)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19世紀中葉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這一觀念回到了“天視自我民視”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最明確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欽差大臣勝保，[[22]](#_22___Shi_Liao_Xun_Kan____Di_36Q)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眾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后來，在內地也逐漸采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23]](#_23_Xu_Ji_Yu____Song_Kan_Xian_Sh)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于受人調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24]](#_24_Wang_Er_Min____Qi_Ying_Wai_J)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國人已經發揮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這一概念很容易導致以夷制夷的思想。[[25]](#_25_Lei_Hai_Zong____Gu_Dai_Zhong)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卷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系的實際行動都證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鴉片戰爭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戰爭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對。在戰爭之后的討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合攻勢。直到后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反對派所依據的論點有兩個。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26]](#_26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在這個時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這種政策的目標只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這種政策所憑借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爭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這三種政策中，最后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 誤會和惰性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所以毫不奇怪，對于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勛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勛爵赴華。中國人不真正了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格。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系的機會。根據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易往來，這種政策終于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發、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胡子、高個子和穿著緊身衣服。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致誤會，這在鴉片戰爭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寫的英國人有著鷹鉤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胡子和頭發，他們的長腿不能彎曲，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27]](#_27_A_Ying_Bian____Ya_Pian_Zhan)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確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曲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28]](#_28___Shi_Liao_Xun_Kan____Di_38)應該承認，有少數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29]](#_29_Xiao_Ling_Yu____Ying_Ji_Li_J)盡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別，的確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產品。因為對于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產品也是很明顯的。鴉片戰爭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后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于極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30]](#_30_Huang_En_Tong____Fu_Yi_Ji_Lu)但是關于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20處表現這種過于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31]](#_31_Huang_Jun_Zai____Jin_Hu_Qi_M)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永杜后患”的方法。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寯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后于1849年隱退。的確，鴉片戰爭以后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里看到“免談時事”的告白。[[32]](#_32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著重訓練士兵游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復戰爭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1100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略論文。另外一些沿海總督如琦善、楊國楨、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只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這種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將領們身上。[[33]](#_33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系被普遍認為只是經濟關系，不是政治關系，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還有，1846年5月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渠道。[[34]](#_34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在外交上，這確確實實是“關門”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的政策。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并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爭，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寯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舉人臧紓青，鴉片戰爭期間在家鄉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勇。由于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后被授予“同知”官銜。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后得獎是一種恥辱。[[35]](#_35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在1840—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于西方關系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由于拒不考慮外國的現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最后結果是，中國在為現代化防務的奮斗中，基本上“喪失”了鴉片戰爭以后的二十年時間。

## 西方力量和財富的沖擊，1860—1895年

### 中國人承認“變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局”。不過最通常的術語是“變局”；夏燮、薛福成、王韜、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在19世紀60年代，鄭觀應在70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80年代，都使用這個術語。

雖然后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爭是劃時代的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覺察到這種變局。現有的史料表明，1840—1860年之間只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36]](#_36_Huang_Jun_Zai____Jin_Hu_Qi_M)但是在1861年以后，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現，從1861—1900年至少有43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產作家王韜，他在1864年對于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37]](#_37_Wang_Tao____Tao_Yuan_Chi_Du)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過去的經驗來認識。確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致沈葆楨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兩年以后王韜以同樣語氣寫道：“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他后來斷言，這種變局將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后已。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70年代初期對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國這一事實已經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對于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于其輪船的往來而終于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38]](#_38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燾，在60和70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致了各方面的大變。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改良派馮桂芬在60年代初期曾經恰當地指出，雖然中國不久將把國內叛亂鎮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60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中國在隨后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系，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歷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39]](#_39_Xia_Xie____Zhong_Xi_Ji_Shi)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在西方軍事的優勢上。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爭辯的軍事力量。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爭奇斗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李鴻章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軍事威力表現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內地的要塞都無法防御。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勢。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西方是中國數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40]](#_40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在于這一事實：西方不是游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1874年李鴻章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統領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41]](#_41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于政治帝國主義。1865年黃恩彤寫道：“迨英吉利互市開關，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國亦竊睨其旁，茭生覬覦。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42]](#_42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許多人認為，往后局勢會越來越壞。恭親王和李鴻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43]](#_43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隨著19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鄒誠敏銳地發現，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據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只需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只需特別重視東北邊界。但是到19世紀后期，中國發現自己處于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云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后，威脅四川和云南。俄國赫然聳立于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陜西和滿洲。東南沿海七省經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他作出結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44]](#_44_Wang_Er_Min____Wan_Qing_Zhen)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變局”的特點還表現在西方的經濟侵略上。60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討論過中西貿易的重大結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貿易是中國歷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跡表示驚訝。70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云都強調，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隨后十年間把引進技術看作變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的到來，“實開千古未創之局”[[45]](#_45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歷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他們意識到，中西關系的發展是可與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轉折點相比擬的新的起點。70年代后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張裕釗在80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常快，變化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46]](#_46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呢？由于他們都出身于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中去尋找答案——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實際上，傳統思想并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關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典是《易經》。王韜、丁日昌、鄭觀應和郭嵩燾等西洋通都經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窮則變，變則通”。從1860—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自強”一詞，實際上就來源于這部經典。曾國藩注釋說：“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47]](#_47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

“運會”一詞來源于邵雍所闡發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它認為存在著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見地要表現出來，并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由于所有巨大的歷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適用于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勢描繪成“運會”。有些人主張，“運會”可以被看成天意的表現，因此是不能抗拒的。嚴復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他說，中國正經歷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運會”。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圣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韜、鄭觀應和湯震都曾預言，“運會”很快將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48]](#_48_Quan_Zu_Wang_Bian____Song_Yu)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只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圣人如果生活在19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在這方面，郭嵩燾提到了古代圣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顥和程頤；王韜、李鴻章和鄭觀應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19世紀，他本人也會隨著時代而轉變；嚴復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圣人也是“運會”的產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圣人因為能夠預見“運會”的趨勢，故能適應時勢而行動。[[49]](#_49_Guo_Song_Dao____Yang_Zhi_Shu)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但什么是變化的信息呢？他們強調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1864年王韜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礪中國，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后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燾的意見，新形勢就像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60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70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在內，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50]](#_50_Wang_Tao____Tao_Yuan_Chi_Du)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的機會。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作出什么樣的反應？郭嵩燾說，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51]](#_51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o)那么，中國怎樣才能了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 尋求和平的外交關系

據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了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燾堅持說，中國不論防御性的或進攻性的戰備努力，都無補于時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韜都認為，中國必須拋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系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52]](#_52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o)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就予以注意了。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燾就奏請設立通譯學堂，著重教授西方語言。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名奏準成立的，他們在奏折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同文館設有英、法、俄、德文課程。為了提倡忠于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了解西方。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燾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里面開設天文學和數學；到1879年，又增設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53]](#_53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o)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涌現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50和60年代擔任上海道臺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寶時。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上卷第五章），他們比較了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70和80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燾、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于西方的直接知識。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立正式公使館。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代武器技術知識的西方人。10年后，中國在倫敦設立了郭嵩燾率領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郭嵩燾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標。第一，他應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國。第二，應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系。[[54]](#_54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改革派人士認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爭。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易，而不在領土。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特權安撫侵略者，用物質的誘餌來控制他們。這符合由來已久的“羈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燾（1818—1891年）。咸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于是先打豫東的捻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燾說：因為捻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予討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爭。次年，當這位將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軍作戰時，郭嵩燾 17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將領戰敗后，郭嵩燾越來越反戰。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爭而不顧現實的那些學者。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燾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他隱退以后反復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中法戰爭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政策。[[55]](#_55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Dao)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李鴻章在后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爭。1870年，他聲稱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爭。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爭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致清朝滅亡的對外戰爭而痛惜不止。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關于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56]](#_56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 燾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700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爭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的最好方法是“羈縻”，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他主張，處理對外關系的指導方針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的政策。[[57]](#_57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其他許多關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于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里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為什么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愿的原因。同樣地，1866年郭嵩燾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郭嵩燾在一封致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助郭嵩燾處理這次危機后，他在1866年寫道：“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58]](#_58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根據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購買房地產，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丁日昌明確宣布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上，條約上的條款應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予禁止。[[59]](#_59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根據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60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孔子說過：“言忠信，行篤義，雖蠻貊之邦行矣。”[[60]](#_60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這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后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歷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義使他們就范，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61]](#_61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曾國藩1862年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無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該是忠、信、篤、敬。他進一步解釋道，“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著又說：“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62]](#_62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不只曾國藩一個人強調孔子的這四個字。1864年王韜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1876年郭嵩燾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63]](#_63_Wang_Tao____Tao_Yuan_Chi_Du)后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后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曾國藩繼續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于外，否則就是不誠。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復了和平，中國應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64]](#_64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e)

郭嵩燾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他斷言，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關鍵之點在于誠篤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這種誠篤外交是郭嵩 燾在余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60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成功，中國人就應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70年代繼續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65]](#_65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o)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成了中國人經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 “把握時機”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變局”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這種觀點導致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上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強的倡議者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劃。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首先，由于他們一開始就設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討論彈藥生產和造船業時，都極力強調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別人的懷疑和不滿。[[66]](#_66_Zhong_Yang_Yan_Jiu_Yuan_Jin)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劃時，應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這種態度表現在1862年李鴻章對于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30年后，李鴻藻和榮祿由于擔心中國不能繼續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最后，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60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于選拔具有現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內。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67]](#_67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系中出現的危機的反應。“自強”一詞最初見于《易經》，它把天的本質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協調一致。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系上。他爭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68]](#_68___Yi_Jing____Juan_1_Di_5Ye)自強的現代含義便是基于這一總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39位作者討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洋務”。“洋務”的含義與時俱變。1840年7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夷務”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和對外貿易有關的事務。[[69]](#_69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系方面的事務。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系以及有關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內的政府事務。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采用西洋技術知識。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劃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這可以稱為“洋務運動”，或西化運動。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標，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計劃。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內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著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

1860—1880年期間，出現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這促進了較多地著重于思想、態度甚至制度的討論。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和經濟挑戰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內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整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以自強的名義設立的新機構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為應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立的暫時性機構。“局”這個名稱現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果。但“局”還未具有正規官僚機構的穩定地位。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變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世之學的少數傳統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19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了比較帶根本性質的改革思想。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起，“變法”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適時而積極的適應。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確是一個嚴肅問題。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墮落，而且也操之過急。可是像科舉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官員的初衷。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于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變法”，雖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詞匯，如“順應”和“變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張神圣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適應西方技術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他設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有關，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70]](#_70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折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他作出結論說，“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闿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確，即“內須變法”[[71]](#_71_Liu_Guang_Jing____Ru_Jia_Ai)。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燾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韜在19世紀80年代初，都專門討論過改革問題。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在70年代和甚至80年代這20年間，中國的領袖人物和作家們只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不過他們仍然力圖把握住“變局”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西學”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只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西學”和“新學”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新學”一詞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來。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因為它不同于中國古老的傳統學識，它便被稱為“新學”，以示區別。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別和選擇的態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內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后有明顯進步。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1851年以后，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即使我們只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韙良的成果。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談。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邇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將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臺鄧隨帆等人。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楨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72]](#_72_Ba_Ni_Te____Wei_Yuan_Yu_Xi_F)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98部著作，另外45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13部則尚未譯完。銷售量已達31111部。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電報、采礦、造船、海戰和陸戰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平。中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致《格致匯編》（1876—1892年）雜志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73]](#_73_Zhang_Jing_Lu____Zhong_Guo_J)

最后，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行外交任務，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劃，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了一個好傳統，從此以后，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從1866—1900年，由66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超過158部。[[74]](#_74_Zai___Xiao_Fang_Hu_Zhai_Yu_D)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于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對于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雖然變法計劃在60年代和70年代只是偶然的現象，但到1885—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工業和農業在70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視。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于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用”應為商業，但其“體”應為工業化。[[75]](#_75_Xue_Fu_Cheng____Chou_Yang_Ch)工業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19世紀最后25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民用工業，如海運、采礦、紡織、鐵路、鑄幣和鋼鐵生產：所有這些都要采用西方機器。也有人討論農業的現代化，鄭觀應在70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1892—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著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和灌溉技術、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村集市的好處。1895年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倡導下，分別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討論現代農業的雜志。[[76]](#_76_Zuo_Zong_Tang____Zuo_Wen_Xia)

努力學習西方經濟的中心思想在于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60和70年代廣泛流行“富國強兵”的口號。不過從70年代中期起，卻出現了強調“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燾在致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該鼓勵人民從事現代航運業和制造業，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鄭觀應、王韜和李鴻章也討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和最有說服力。[[77]](#_77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o)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的范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施。這種傳統思想僅僅成為現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但是這種“富民”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眾有密切關系，民富是國強的根基。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聯的。

## 對外政策觀點的矛盾，1860—1895年

中國人對西方的某些觀點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設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這些觀點常常是好戰的，情緒激烈，偶爾還是排外的。這種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態度，主要歸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抱有深信不疑的態度，雖然正是西方帝國主義促成了這種態度。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種認識（盡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現的），即中國是一個應予珍愛的實體——這種認識與其說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見的，不如說是理性的和民族主義的。

### 排外主義的興起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系的早期歷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排外主義的范圍廣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代技術也好。

對西方技術的抵制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討論過（見上卷第十一章），我們在這里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無須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于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并無益于戰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眾支持政府的熱情。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眾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他堅決認為，歷史明確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78]](#_78_Zhong_Guo_Ke_Xue_Yuan_Deng_B)

某些官僚學者特別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美國之戰勝英國，并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征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79]](#_79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別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們繼續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歸根到底，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將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么精通西法。[[80]](#_80_Lu_Bao_Qian____Wei_Ren_Lun)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別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義利之別一講，就使得70和80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劃，特別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劃。[[81]](#_81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h)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么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他們問道，為什么在19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內部尋找這樣的人才。[[82]](#_82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別。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只會加重失業。另一個例子是鐵路。建筑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中國因為在戰時不能保衛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于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83]](#_83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爭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由于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只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只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84]](#_84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代技術沒有用處。著名湖南學者王闿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此外，它們在內河不大靈活，在陸戰中完全無用。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于移動。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財政拮據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于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保守派聲稱，引進采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風水”——它對五谷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內的宇宙的常態。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干擾。[[85]](#_85_Wang_Kai_Yun____Xiang_Qi_Lou)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點。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70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代采礦業。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于社會政治問題。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采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于失業會愈貧。[[86]](#_86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人的政治后果。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在失業者中間，弱者將成為竊賊，強者將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于為中國謀利益的“洋務”活動，將導致公開的叛亂。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87]](#_87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對帝國主義的畏懼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鏞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采用“蠶食”政策。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將首先從經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干擾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淪喪。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么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里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16年后的天津條約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們在60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后續修條約期間將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于沿海地帶，內地廣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嘆中國將很快步其后塵。60和70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現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態度與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將會用于軍事情報目的。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筑堡壘式的教堂和過著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的支持。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分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榨取”中國經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后，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將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于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于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88]](#_88_Lu_Shi_Qiang____Wan_Qing_Zho)

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這是17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后，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系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后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89]](#_89_Qi_Si_He_Deng_Bian____Ya_Pia)

另一些知識分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將導致中國產生更多的內部騷亂。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產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出來了。50和60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國內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90]](#_90_Lu_Shi_Qiang____Zhong_Guo_Gu)

因此，排外人士呼吁中國應盡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如果中國繼續允許外國人滯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圣人也無能為力。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91]](#_91_Lu_Shi_Qiang____Wan_Qing_Zho)

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92]](#_92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因此，外國人被稱為“鬼子”，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譞）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劃。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以后，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但是在他被獲準辭職以后，他的傷勢突然完全“痊愈”。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寧愿戰死疆場。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據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筑物，他說他寧愿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愿它改革。因此毫不奇怪，他后來成了應該對爆發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93]](#_93_Guan_Yu_Wei_Ren_He_Xu_Tong_D)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歷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寧愿使用傳統的刀矛。

主戰的對外政策觀點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不負責任的主戰論曾經十分盛行于南宋時期（1127—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臨著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軍事現實主義和唐朝（618—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精神了。這個傳統在19世紀下半葉再度抬頭。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這種態度使人聯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空洞的主戰論”，他們只會揮動筆桿子，但毫無實戰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精神部分的是出于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爭的憤怒。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當1860年中國與英法聯軍作戰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政策。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贏得這場戰爭的五個原因。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爭。勝保將軍設想得更簡單。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干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只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將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陜西，以便繼續進行戰爭。[[94]](#_94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別是御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精神十足。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地情形，應該允許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并且在數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西方軍艦發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95]](#_95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鴉片戰爭以后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精神，但它直到70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的對外政策的“清流黨”。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1897年），如郭嵩 燾所指出，此人在80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96]](#_96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Dao)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在70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采取強硬的戰斗立場。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后，他力主積極進行戰備，包括招募西方雇傭兵。當1883年中法戰爭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為什么？他指出，因為“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97]](#_97_Zhang_Zhi_Dong_Zhi_Zhang_Pei)。同樣地，清流黨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采取主戰的行動路線，特別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后，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的“清流黨人”相同的觀點。例如，80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他繼續說道，至于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爭的詳細的軍事戰略。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但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98]](#_98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h)

應該承認，主戰派觀點并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爭中的勝利者。而且某些主戰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場上出了丑。然而主戰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歸根到底，他們促使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戰爭爆發。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 堅持文化主義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遵奉中國文化——特別是儒教正統——的影響。曾國藩在其聲討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號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孔孟傳統的中國文化遺產。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王闿運在獲悉郭嵩燾出使倫敦以后，于1876年致函郭嵩 燾，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99]](#_99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n)那么，為什么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復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別與這個問題有關。

華夷之辨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標準來考慮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只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100]](#_100_Wa_Di_Mei__Yi_Li_Xi_Fu____Z)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孔子在論及齊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里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贊譽管仲保衛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101]](#_101___Li_Ya_Ge_Ying_Yi_Qi_Jing)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議論說，漢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著堯舜禹湯等儒家圣賢教導所體現的文明本身的毀滅。[[102]](#_102_Lu_Shi_Qiang____Zhong_Guo_G)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國歷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圣化的人。中國人關于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于中國與其北邊諸游牧民族的長期沖突的經驗。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復無常。由于這是中國與西方發生關系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60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捻軍時，王炳燮稱這是“回紇助順”，即比之于8世紀中葉回紇人幫助唐朝鎮壓安祿山叛亂之事。由于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就像10—12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系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著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103]](#_103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李慈銘在得知即將設立總理衙門以后，硬說這不合體制。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內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系。[[104]](#_104_Li_Ci_Ming____Yue_Man_Tang)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系，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份。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處理外交事務。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后，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里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105]](#_105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在70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著文明的存在。允許傳教士到內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例如，夏燮擔心這是圣人教誨完蛋的開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嘆說：中國數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將淪為夷狄之國。嗚呼！[[106]](#_106_Yin_Zi_Lu_Shi_Qiang___Zhong)

王炳燮在60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107]](#_107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

人禽之辨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特別是他應該遵行圣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內。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著的真諦。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機詐的，一心只求滿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于文明的范圍，這兩個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種動物。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中國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關系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羈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遵奉“名教”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系。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確的親子關系作出了榜樣。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他向朝廷請假27個月，以便遵制丁憂。8月18日，兩位皇太后鑒于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準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隨后他必須復職，但不必參加規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別應該遵守圣人的教誨。李鴻藻繼續說，如果他背離了圣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后的27個月內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日典禮。三天后，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損于朝廷聲譽。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100天假期屆滿后，他便借口養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27個月丁憂期滿以后，他的所謂疾病也“痊愈”了，并開始上班。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只是他的養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27個月。[[108]](#_108_Li_Zong_Tong___Liu_Feng_Han)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御史都普遍贊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他們爭辯說，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于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圣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于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于禽獸。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的確，他們的著作經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109]](#_109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穌甚至不認母親。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總而言之，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闿運便把他們比作“物”，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60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盡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墮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劃。[[110]](#_110_Wang_Bing_Xie____Wu_Zi_Qi_S)

保守主義的影響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士大夫卻以道德—意識形態的考慮為依歸。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著學究式的主戰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比較大膽的自強計劃最后都受到滯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納，甚至像王闿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標，但不愿意“改制”。1884年以后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態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劃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這一歷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出保守主義。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楨、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采取非常冷淡的態度。李鴻章以前的將領之一劉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在一些關于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經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覽。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準。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111]](#_111_Wang_Jia_Jian____Wei_Yuan_D)

保守派官員，特別是御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訐。例如，李慈銘大肆詆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小人”。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55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代化計劃，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像郭嵩燾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1876年他到英國擔任公使時，文人學士們諷刺他離開圣人的國度去為洋鬼子效勞。他的同鄉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他本來計劃寫一部關于自強運動和現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后來放棄了這個打算。1877年總理衙門發表他的贊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郭嵩燾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贊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他終于向壓力屈服，于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國以后，他引退，徑返湖南故鄉。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燾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于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112]](#_112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劃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歷史所證實。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鐵路建筑計劃，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筑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但是滿腦子傳統思想的御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于放棄了這個計劃。修筑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爭論的計劃，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113]](#_113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其他一些自強計劃，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114]](#_114_Li_Ru_Can_Jian___Weng_Tong)

### 民族意識的出現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90年代才在中國出現，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卻早在60和7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許多開明人士，特別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韜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既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方面。在官場中，對于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征。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的思想，是商業民族主義的基礎。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隨著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產而開始出現的。

中國中心主義的崩潰

19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其最初的跡象是大多數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像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內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70年代以后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除了像羈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燾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跡象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夷”字愈到后來就用得愈少。（與英國續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50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夷”。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遠”（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外國”，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西洋”。40和50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夷”，但是在70和80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洋”了。[[115]](#_115_Wang_Jia_Jian____Wei_Yuan_D)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在關于歷史上同類事件的討論中。1861年馮桂芬明確地把東周（公元前770—前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韜、彭玉麟、陳虬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他們斷言，在春秋（公元前772—前481年）戰國（公元前403—前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像19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116]](#_116_Feng_Gui_Fen____Xiao_Bin_Lu)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這種類比盡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別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鑒諸國”。這些在平等基礎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歷史的循環性質便是如此。中國過去強大，它現在變弱了。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后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117]](#_117_Li_Guo_Qi____Zhang_Zhi_Dong)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詞。鄭觀應爭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只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118]](#_118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

經濟民族主義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系中產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貿易政策是中國從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度，現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經失去價值。取代它的是關于政府經濟特權的新觀念和“用貿易為武器”的新策略。傳統名詞“利權”（必須與現代名詞“權利”區別開來）最初用于像稅收、鹽業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里以后，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于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濟和財政事務的行政權力。[[119]](#_119_Liu_Guang_Jing____Ru_Jia_Ai)后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要恢復“利權”，即恢復經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后，在60和70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辭堅持說，這種現代企業應該由中國經營。1877年郭嵩燾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利權”。鑒于外國銀元對中國經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利權”。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采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120]](#_120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

根據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于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利權”也已經喪失給他們了。為了收回這種“利權”，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內取代洋員稅務司。鄭觀應繼續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在鄧承修看來，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陳熾在90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地保護外國商人和干涉中國的關稅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121]](#_121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

鑒于西方在經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商戰”。“商戰”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臺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爭。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中國商人配備了現代化的海運工具后，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丁日昌繼續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這樣，中國不需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里便使用了曾國藩的“商戰”一詞。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競爭是不可避免的。[[122]](#_122_Ceng_Guo_Fan____Ceng_Wen_Zh)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的活動，表現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競爭的志氣。容閎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并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雖然這個計劃由于缺乏資金而流產，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于1873年辦了起來。創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爭。招商局兩位經理唐景星和徐潤對于“商戰”有極其清楚的認識。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爭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123]](#_123___Jiao_Tong_Shi__Hang_Zheng)

在論述“商戰”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到19世紀70年代末，鄭觀應已經詳細論述了商業和海運方面的競爭。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來的諸版中（1884—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作為武器的必要性。當高級官員專心致力于軍事自強計劃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和工業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于富，而富又發源于商業和工業，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商戰”，要比“兵戰”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作武器。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后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沖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擴大貿易。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因此，中國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濟蠶食則反應慢。實際上，中國由于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關系的嚴重傷害。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既然外國經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為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學校。為了利用自然資源，采礦和農業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為了促進商業，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在商戰方面，它將在兩條戰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制造現代商品和種植罌粟。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產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繅絲廠。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于現存社會結構的底層。特別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爭，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與有爭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劃相比，“商戰”是一條同西方競爭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和工業并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爭以后，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競爭的世界；[[124]](#_124_Liu_Guang_Jing____Zheng_Gua)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從經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歷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125]](#_125_Guan_Yu_Zheng_Guan_Ying_Shi)

“商戰”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戰”的政策相類似的戰爭策略。為了達到利用商業作武器的目的，在19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國家主權觀念

經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后者最明顯地表現在關于國家主權的意識上。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因為1860年以后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人們有感于此，終于產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爭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自19世紀40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樣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么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內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將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內。郭嵩燾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盡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里勛爵討論過這個問題。80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后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盡快取消治外法權。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126]](#_126_He_De____Zhong_Guo_Wen_Ti_L)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王韜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額外權利”這樣的說法。但是，黃遵憲使用的“治外法權”成了它的標準名詞。90年代初期，陳熾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127]](#_127_Wang_Tao____Tao_Yuan_Wen_Lu)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郭嵩燾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此外，由于權紳的干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爭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國法律。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禁。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128]](#_128_Guo_Ting_Yi____Guo_Song__Da)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定的關稅稅率問題。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確定以后33年，御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80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干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討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復國家主權的第一步。1884—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他明確地主張中國應該采取保護關稅方針。[[129]](#_129___Yang_Wu_Yun_Dong____Di_1C)

另一個涉及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從此以后，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一文中討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他認為它們是條約里最有害于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130]](#_130___Yang_Wu_Yun_Dong____Di_1C)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雖然在鴉片戰爭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1862年丁韙良著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后予以出版。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300本給地方當局參考。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后，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水的丹麥船只。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131]](#_131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

1869年丁韙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后，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匯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爭法手冊》。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產生了影響。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燾，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戰爭，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132]](#_132_Li_En_Han____Ceng_Ji_Ze_De)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產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里得到國際法知識。一個恰當的例子是改革派買辦鄭觀應。[[133]](#_133_Guan_Yu_Zheng_Guan_Ying_De)19世紀70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致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在后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70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后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1884年中法戰爭正式爆發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爭期間沒有受損失，戰后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虬和涂儒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134]](#_134___Jiao_Tong_Shi__Hang_Zheng)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虬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內的世界性組織。他預言他的建議將在30年內成為事實。[[135]](#_135_Chen_Qiu____Jing_Shi_Bo_Yi)

均勢論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弱國——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于恰當地利用均勢的原則。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于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小小的燕國。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采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展史和實際價值。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勢”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70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80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間繼續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136]](#_136_Ma_Jian_Zhong____Shi_Ke_Zha)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這一原則。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和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李鴻章在致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歷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李鴻章繼續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將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137]](#_137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138]](#_138_Zhao_Xian_Gong_Shi_Jin_Hong)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采用，以適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標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內，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于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139]](#_139_Li_Guo_Qi____Zhang_Zhi_Dong)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加劇但還沒有爆發軍事沖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勢政策。曾紀澤指出，這種“開門”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斗。[[140]](#_140_Tong_Shang_Shu__Di_134Ye)因為沒有哪一只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少數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爭。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系卻靠均勢來維持。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復是肯定的。70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141]](#_141_Ma_Jian_Zhong____Shi_Ke_Zha)

## 中國對西方關系看法的延續和變化

中國對西方關系的觀點在1840—1895年期間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變化的速度加快了。總的來說，對外政策觀從40年代的“閉關”政策變成60年代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守信”政策。但是，現代的外交技術，特別是國際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間才被重視起來。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強權政治，特別是均勢觀念以及同強國結盟的觀念，風靡一時。同時，60年代中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1840—1860年期間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則，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讓位于“商戰”這一更加有力的觀念。總而言之，對外政策觀點的這些變化體現了從儒家理想主義的態度到實用主義態度的變化。

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了解和學習西方時，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定地變得成熟起來。它開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繼畬對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變成了以自強名義在軍事上進行模仿的活動。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像鄭觀應和唐景星等商人企業家強調的是商業和工業的重要性，郭嵩燾和馬建忠等外事專家則討論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個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們設想它的影響可以觸及中國的政體和社會制度，而不會改變中國的根本體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當作應該拂拭的塵垢。但結果，西方事務終于成了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鍵性術語使用的變化雄辯地證實了在對西方理解過程中的這種進步。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60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夷務”，在70年代和80年代稱為“洋務”和“西學”，在90年代就稱為“新學”。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個名詞不褒不貶；而最后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贊許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態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142]](#_142_Hao_Yan_Ping____You_Shou_Ji)

盡管有這些變化，保守勢力仍然強大。把西方事物引進中國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們適應這一傳統的程度。因此，軍事工業容易被接受，而采礦和鐵路建設由于破壞風水，便遇到了困難。基督教因向儒教權威挑戰，所以最受反對。除保守分子以外，許多擁護西學的士大夫同時也反對基督教。這些人中有魏源、徐繼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楨等人。這種文化主義，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對儒家學說的強烈信念，顯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義，因為后者部分地是產生于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貌上的差別。因此很難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西洋化。許多士大夫贊成“洋務”運動，因為它是現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國免于滅亡。不過當時也有些人反對“洋務”運動，因為它是西洋的，所以擔心它會取代儒家學說。他們面臨著如何既能拯救中國而又同時仍然保持中國方式這一問題，所以他們表現了矛盾的心理狀態。

某些有志革新的紳士們在確定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系時所采用方法，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矛盾心理。在他們看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西學從根本上來說并不重要。他們在試圖弄懂西學的意思時，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道”與“器”的兩分法。例如，王韜和鄭觀應把西學的技藝歸入“器”一類，而專門把中學歸入更有價值的“道”一類。70年代以后，采用了更為有力的兩分法。這就是著名的“體”和“用”的概念，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應該說，張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論上誤用了理學的二元論，因為“體”和“用”作為一個統一體的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過這種說法具有心理意義，因為它便于中國實行現代化，而不致喪失其文化特性。盡管其效力令人懷疑，但它象征著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態度。

同樣的態度也表現為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支持現代化的依據，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辦法。主張改革的人辯論說，他們的自強計劃是符合強調變化、技藝和使用有才華的外邦人的中國古代傳統的。他們進一步斷言，西方的科學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國。因此，中國愈是進行變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傳統。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經久不衰。

（一山 譯）

[[1]](#_1_2)本章的作者們非常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極其有用的資料，但在引用時并沒有全都特別注明。他們也感謝張灝教授和理查德·賴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議。

[[2]](#_2_2)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9頁。

[[3]](#_3_2)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大量利用了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中的材料。關于這種世界觀在現代中國的變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

[[4]](#_4_2)《李雅各英譯七經·春秋·左傳》，第196頁。

[[5]](#_5_2)《李雅各英譯七經·中庸》，第409頁。

[[6]](#_6_2)《李雅各英譯七經·孟子》，第305頁。

[[7]](#_7_2)關于清初學派的簡單敘述，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8]](#_8_2)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6頁。

[[9]](#_9_2)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4冊，第461頁；第6冊，第491、535頁。

[[10]](#_10_2)郭廷以等編：《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2—134頁。

[[11]](#_11_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145頁。

[[12]](#_12_2)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單行本出版。有七部現已遺佚，僅存書名。

[[13]](#_13_2)關于林則徐，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6冊，第506頁。關于魏源，見倫納德等在《現代亞洲研究》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頁。

[[14]](#_14_2)姚瑩：《東溟文后集》卷8，第10—11頁。徐繼畬：《瀛環志略序》。魏源：《海國圖志序》。也可參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15]](#_15_2)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35頁列舉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員為：道光帝、盧坤（兩廣總督）、怡良（兩江總督）、吉爾抗阿（江蘇巡撫）、何桂清（兩江總督）、周天爵（漕運總督）、桂良（大學士）、花沙納（吏部尚書）、沈兆霖（兵部尚書）、金應麟、薛書堂、劉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紳湯彝、方熊飛、蕭令裕、夏燮、梁廷枬、吳敏樹、徐鼐、馮桂芬等人。

[[16]](#_16_2)魂源：《海國圖志》卷2，第2頁。

[[17]](#_17_2)丁拱辰、龔振麟（兩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鉅（兩部著作）和西拉本關于槍炮的著作；黃冕（兩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則徐和高邦哲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黃冕和葉世槐關于炮兵炮陣的著作；丁守存和陳階平關于黑色火藥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為金應麟、張煥元、俞昌會、許乃濟和祈元輔。關于這些著作的全面敘述，見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206—208頁；魏源：《海國圖志》卷87，第2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頁。

[[18]](#_18_2)魏源：《海國圖志》卷84，第1—6頁；卷85（這一卷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謝清高和楊炳南：《海錄》卷1，第75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48—249、860頁。《史料旬刊》卷38，第398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頁；卷63，第38—39頁。汪文泰：《紅毛蕃英吉利考略》，載王朝宗編《海外番夷錄》，第6頁。王大海：《海島逸志》，載《海外番夷錄》，第7頁。徐繼畬：《瀛環志略》卷17，第48—49頁。

[[19]](#_19_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頁。

[[20]](#_20_2)《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頁。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6頁。

[[21]](#_21_2)蒲令裕：《粵東市舶論》，第2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九帙。

[[22]](#_22_2)《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4，第22頁。

[[23]](#_23_2)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1—32頁。

[[24]](#_24_2)王爾敏：《耆英外交》，載《大陸雜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頁。

[[25]](#_25_2)雷海宗：《古代中國的外交》，載《社會科學》卷3第1期（1941年），第1—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1，第19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26]](#_26_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頁；卷24，第36—37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1頁。王爾敏：《耆英外交》。

[[27]](#_27_2)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第191頁。

[[28]](#_28_2)《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頁。

[[29]](#_29_2)蕭令裕：《英吉利記》，第1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 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10頁。阿瑟·韋利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則提供了中國人對這次戰爭所做的動人心弦的報道。

[[30]](#_30_2)黃恩彤：《撫夷紀略》，第2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5頁。

[[31]](#_31_2)黃鈞宰：《金壺七墨》卷2，第2頁。《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頁；卷5，第25—26頁；卷9，第6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2，第4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3，第21—22頁。金應麟：《豸華堂文鈔》卷12，第3頁。湯彝：《柚村文》卷4，第13—14頁。蕭令裕：《粵東市舶論》，第1頁。葉鐘進：《英吉利夷情紀略》，第3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 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9頁。

[[32]](#_32_2)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5冊，第529頁；第6冊，第240、459—462頁。

[[33]](#_33_2)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6冊，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頁。

[[34]](#_34_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頁；卷75，第28頁。

[[35]](#_35_2)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2冊，第569頁；第5冊，第531頁；第6冊，第543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頁。

[[36]](#_36_2)黃鈞宰：《金壺七墨》卷4，第3頁。郭嵩燾也認為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折點，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寫出他的這一意見。郭嵩 燾：《養知書屋文集》卷11，第1頁。

[[37]](#_37_2)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5冊，第409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3，第1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15頁。

[[38]](#_38_1)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頁。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17—18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頁。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編》卷3，第8頁。

[[39]](#_39_1)夏燮：《中西紀事》卷17，第1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5冊，第409頁。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5，第6頁。

[[40]](#_40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頁。

[[41]](#_41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頁。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1，第1頁。

[[42]](#_42_1)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5冊，第409頁。

[[43]](#_43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頁。

[[44]](#_44_1)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0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33頁。

[[45]](#_45_1)鄭觀應：《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2，第41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吳云：《兩罍軒尺牘》卷8，第18—19頁。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16，第5頁。薛福成：《海外文編》卷3，第8頁。

[[46]](#_46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0頁。張裕釗：《溓亭文集》卷2，第5頁。

[[47]](#_47_1)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8，第25頁。

[[48]](#_48_1)全祖望編：《宋元學案》卷9，第5—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39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7，第16—17頁。鄭觀應：《易言》卷1，第1—2頁。湯震：《危言》卷1，第13頁。

[[49]](#_49_1)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28，第12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11，第11—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頁。鄭觀應：《易言》卷1，第2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

[[50]](#_50_1)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3、34頁。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12，第20頁。

[[51]](#_51_1)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4頁。

[[52]](#_52_1)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卷5，第528頁。薛福成：《籌洋芻議》，載《庸盫全集》，第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8頁。王韜：《韜園義錄外編》卷3，第25頁。關于西方影響使中國在處理外交關系時發生變化的敘述，見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

[[53]](#_53_1)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3—134、234—235頁。

[[54]](#_54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3頁。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714頁。

[[55]](#_55_1)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0、139頁；第2冊，第624、851、863—864、898—900頁。關于郭嵩 燾論述安撫的原稿，見楊聯陞《關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23頁。

[[56]](#_56_1)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頁；卷11，第10頁。郭嵩燾：《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頁。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

[[57]](#_57_1)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3，第1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頁。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900頁。

[[58]](#_58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5—68、98頁。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397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頁。

[[59]](#_59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9—79頁。

[[60]](#_60_1)《李雅各英譯七經·論語》，第295頁。

[[61]](#_61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7—18頁。

[[62]](#_62_1)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8，第17頁。

[[63]](#_63_1)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16頁。《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卷8，第16頁。

[[64]](#_64_1)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0，第49頁。

[[65]](#_65_1)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87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9頁。

[[66]](#_66_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6頁。我們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下文關于論述改革的許多材料。

[[67]](#_67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41—45頁。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2，第711—713頁。

[[68]](#_68_1)《易經》卷1，第5頁。《宋史》卷414，第10頁。關于19世紀60年代清代政策較重要的研究，見芮瑪麗《同治中興》。

[[69]](#_69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22，第29頁。

[[70]](#_70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7頁。

[[71]](#_71_1)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頁。

[[72]](#_72_1)巴尼特：《魏源與西方人：關于〈海國圖志〉源流考》，載《清史問題》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頁。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卷1，第10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李宗羲：《開縣李尚書政書》卷6，第56頁。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卷11，第11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頁。關于嚴復對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想家著作的翻譯有一本嚴謹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這是一部論述晚清試圖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73]](#_73_1)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23—25頁。李三寶：《致傅蘭雅的〈格致匯編〉（1876—1892）編者的書信：一個分析》，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729—777頁。

[[74]](#_74_1)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這158部著作除大約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75]](#_75_1)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76]](#_76_1)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9，第59—60頁。陳熾：《庸書·內篇》卷2，第2—3頁。孫文：《國父全集》第5冊，第4—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6—137頁。

[[77]](#_77_1)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0—48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1，第1頁。

[[78]](#_78_1)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34、277—283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頁；卷79，第1—2頁。

[[79]](#_79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頁。

[[80]](#_80_1)陸寶千：《倭仁論》，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頁，特別是第260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頁。

[[81]](#_81_1)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頁。

[[82]](#_82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

[[83]](#_83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1—353頁。

[[84]](#_84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3頁。

[[85]](#_85_1)王闿運：《湘綺樓文集》，第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575頁。

[[86]](#_86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8—35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頁。

[[87]](#_87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

[[88]](#_88_1)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年》，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頁。

[[89]](#_89_1)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6冊，第383頁。

[[90]](#_90_1)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頁。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8—9頁。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頁。

[[91]](#_91_1)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第148—149頁。

[[92]](#_92_1)《李雅各英譯七經·春秋左傳》，第355頁。

[[93]](#_93_1)關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見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頁。

[[94]](#_94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1，第48、56頁。

[[95]](#_95_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頁。

[[96]](#_96_1)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89頁。關于這個官僚團體的總的看法，見郝延平：《清流黨（1875—1884）研究》，載《中國論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頁。

[[97]](#_97_1)張之洞致張佩綸的一封信，見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第4冊，第518—519頁。關于張之洞對伊犁危機的觀點，見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頁。

[[98]](#_98_1)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頁。

[[99]](#_99_1)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57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75—76頁。

[[100]](#_100_1)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國，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載《提奧奇尼斯》雜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頁。

[[101]](#_101_1)《李雅各英譯七經·論語》，第282頁。

[[102]](#_102)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15頁。

[[103]](#_103)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頁。《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95頁。

[[104]](#_104)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三日的記載，文中回顧了他在1861年的這條建議。

[[105]](#_105)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99、526頁。閔爾昌輯：《碑傳集補》卷13，第15頁。

[[106]](#_106)引自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21—22頁。關于夏燮的觀點，見他的《中西紀事》卷16，第6頁。

[[107]](#_107)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頁。《洋務運動》第6冊，第153—154頁。

[[108]](#_108)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7—154、241頁；卷2，第414頁。

[[109]](#_109)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頁。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第31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第24頁。

[[110]](#_110)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頁。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第51頁。《海防檔·天險》，第212頁。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57頁。

[[111]](#_111)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頁。王家儉：《魏源年譜》，第82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630頁。

[[112]](#_112)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07、554、665、666、865頁。

[[113]](#_11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37—45、54—56、76—78頁。

[[114]](#_114)例如參見《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2，第992頁。《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49、18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2—23頁。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844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頁。

[[115]](#_115)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3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5冊，第409頁；第6冊，第508—509頁。《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4頁。

[[116]](#_116)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66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9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5，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4，第21頁。彭玉麟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1，第9頁。陳虬：《經世博議》卷4，第8頁。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頁。陳熾：《庸書》卷8，第1—2頁。

[[117]](#_117)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頁。

[[118]](#_118)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

[[119]](#_119)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9頁。

[[120]](#_120)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52—25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45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散見書內各處。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第112—120頁。《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47頁。

[[121]](#_121)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4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6、318頁。

[[122]](#_122)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7，第44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56—62頁。《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4—5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65頁。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123]](#_123)《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39、144、147頁。

[[124]](#_124)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載《清華學報》第8期第1—2冊（1970年），第373—425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2，第35—43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第1頁；卷2，第37頁；卷4，第56—57頁；卷7，第19頁；卷8，第32、53頁。

[[125]](#_125)關于鄭觀應時代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背景，見郝延平《中國商埠的“新階級”：買辦商人的興起》，載《商業史評論》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頁。

[[126]](#_126)赫德：《中國問題論文集》，第68—69頁。王家儉：《文祥對于世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1期（1973年），第219—239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4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82、758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6頁。

[[127]](#_127)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5—26頁。黃遵憲：《日本國志》卷7，第21—23頁。陳熾：《庸書》卷7，第4頁。

[[128]](#_128)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683—684頁。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第11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第8頁。宋育仁：《時務論》，第3、8—9頁。

[[129]](#_129)《洋務運動》第1冊，第11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04、306—307頁。鄭觀應：《盛世危言》卷3，第1—3頁；卷4，第9頁。

[[130]](#_130)《洋務運動》第1冊，第16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手寫日記》，第2156—2157頁。薛福成：《籌洋芻議》序，和第1—2頁。

[[131]](#_13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13頁。

[[132]](#_132)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5頁。郭廷以：《郭嵩 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574、863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頁。

[[133]](#_133)關于鄭觀應的改革思想與他作為買辦商人背景的對照，見郝延平《改革派買辦鄭觀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頁。

[[134]](#_134)《交通史·航政編》第1冊，第154—15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95、208頁。1898年畢永年和唐才常在長沙成立了國際法研究協會。

[[135]](#_135)陳虬：《經世博議》卷4，第17頁。

[[136]](#_136)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2，第10—11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頁。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頁。

[[137]](#_137)李鴻章：《李文忠公遺集》卷5，第18—19頁。

[[138]](#_138)朝鮮公使金弘集回答說，他在《萬國公法》（ 沃頓原著，丁韙良譯）一書中見到了“均勢”一詞。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修信使記錄》，第177頁。

[[139]](#_139)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頁。

[[140]](#_140)同上書，第134頁。

[[141]](#_141)馬建忠：《適可齋記言》，第13—14頁。鄭觀應：《易言》卷2，第13頁。張煥綸的建議見之于曾紀澤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記》卷1，第8頁。也可參看坂野正高《留法時期的馬建忠——對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兩份意見書》，載《國家學會雜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頁。

[[142]](#_142)郝延平：《由守舊到革新》，載《大陸雜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頁。

#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 太平軍戰爭以后時期的清朝軍隊

到1868年捻軍之戰結束時為止，一種新的軍隊已經作為捍衛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現。這種軍隊往往被歷史學家稱為地方軍，在當時則通稱為勇營。在19世紀60年代末期，全帝國的這種軍隊統逾30萬人。其中包括曾國藩所建立的湘軍的全部，重新恢復活動的左宗棠所部楚軍，以及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還有一些性質相同的較小的部隊，如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1]](#_1_Guan_Yu_Ba_Qi_Jun_He_Lu_Ying)比起其他的軍隊，這些軍隊的總的特色就是它們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維持它們的費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點是它們出于軍事目的而利用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派集團的感情。勇營的優點和缺點都表現在它們的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緊密的個人聯系方面。在這方面，它們確實不同于清帝國的傳統軍隊，即八旗軍和綠營軍。

清代的八旗軍原來由每單位300人的佐領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祿和賜予田產。但是為了防范滿族親王和清朝官員擁兵自重，清帝在18世紀初年便定下了這樣的制度：佐領以上的八旗軍高級將領每隔三年至五年須在各駐地之間調防。[[2]](#_2_Can_Zhao_Luo_Bo_Te__Li___Qing)19世紀中葉總數約60萬人的綠營兵則作為保安部隊編成小分隊派駐各地，或是作為省一級文武長官所統率的較大的標派駐各地。但是，這些標之大只是相對而言的。例如在陜甘這個軍事戰略要地的4萬士兵被分編成十三個標，在北京以外的直隸省的1.2萬名士兵分屬于七個標。[[3]](#_3_Luo_Er_Gang____Lu_Ying_Bing_Z)雖然綠營兵的兵士是世襲的，但一到中級帶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個部隊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據回避法又不準在本省任職。這就防止了官兵之間會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特別是防止了統領與地方小分隊的下級軍官形成長期的私人關系。由幾支綠營兵部隊調集組成以執行特殊任務的特遣部隊，往往不能很好地執行任務，因為“兵不習將，將亦彼此不和”。[[4]](#_4_Tong_Shang_Shu__Di_179__181)

勇營的長處是官兵之間有緊密的個人聯系。統領個人選擇他統馭之下的各營的營官。每個營官帶兵約550名，他們可以挑選自己屬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選他所統率的什長。約10個人組成一個什，這10個人通常也由什長自己挑選。曾國藩于1868年曾極口稱譽這種遍及全勇營的私人關系的制度，他寫道：“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5]](#_5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i)只要清帝對任命文武官員的大權（包括控制省一級的高級職位以及授予值得艷羨的綠營兵官銜和勇營的各級職務）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夠使這些新式軍隊在中國境內實現它的目標（見上卷第九章）。在一個武器、戰術和輔助兵種不斷進步的時代，這種其主要力量來自宗派集團效忠精神的武裝部隊，能應付中國的新的國外挑戰嗎？

在19世紀60年代，北京批準了（甚至是倡導了）一系列訓練計劃，這些計劃通常都得到歐洲列強的支持，因為它們希望看到清朝能夠強大到足以保衛通商口岸和貿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卻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棄八旗軍和綠營兵。雖然它們用處不大而又花費不小，但維持這兩種部隊似乎比改進勇營更重要。例如，對北京的八旗軍就曾經做過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裝起來的神機營是文祥等人1862年創立的，它由約五百名旗人訓練，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過英國軍官的使用現代化小型武器的訓練（見上卷第九章）。神機營最初只有約3000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親王于1865年被任命為主管神機營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擴充。按照清帝的命令，從北京的八旗各部隊抽出總數達3萬人跟這支新式軍隊一起接受訓練。對官兵的考績權也從原來的統領手中移交給了醇親王。[[6]](#_6_Xi_Yu_Fu_Deng_Bian____Huang_Z)

但是，神機營沒有進一步擴大隊伍。醇親王也沒有充分利用機會來進行西式練兵。1865—1866年，他同意從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隊約五百人的兩隊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訓練，但他拒絕了恭親王的被保護人崇厚關于八旗騎兵也要接受西式訓練的建議。他唯恐這些兵士會玩忽其所素習的技藝，所以只讓很少的騎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訓練。1869—1870年英國人的訓練計劃只有三位外國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勝軍中服過役的薄朗統領）在實施，但這時已不得不終止下來。擁有3萬人的神機營守衛著京師，[[7]](#_7_Zhong_Guo_Ke_Xue_Yuan_Deng_Bi)但在1870年當緊接天津教案之后對法戰爭似乎迫在眉睫之際，李鴻章勇營中的2.5萬人不得不被調集來加強直隸的防御。李鴻章的部隊奉命駐守在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中間一段，遠至諸如楊村和河西務等城鎮。[[8]](#_8_Wang_Er_Min____Huai_Jun_Zhi)北京的安全現在只能指望漢人的忠誠了。

在清帝國的其他地方，八旗戍軍雖已聲威大遜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們招兵買馬，聚草屯糧。但是顯而易見，滿人的力量已無恢復之望。在廣州，清帝國官員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別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訓練清軍使用現代武器。從1863年開始，用廣東省當局購買的裝備，360名八旗軍由英國人進行訓練，300名八旗軍由法國人訓練。在滿族軍官的統一安排下，還有531名地方綠營兵接受英國人的訓練。廣州的這項訓練計劃只實行了3年便停止下來，因為那時滿懷失望的外國領事們要求撤回歐洲教官。[[9]](#_9___Yang_Wu_Yun_Dong____Di_3Ce)

與此同時，滿族官員已很難在法定守衛地點恢復八旗戍軍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個中心地方，回民之亂后只有150名八旗軍幸存下來，他們最后不得不被轉往內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國本部的12個駐防城市內，八旗兵及其家屬住在被隔絕的地區，士氣低落，和在滿洲的所有八旗軍一樣：又窮；又吸食鴉片；還總是被上司克扣帝國發放的薪餉。[[10]](#_10___Huang_Zhao_Zheng_Dian_Lei)

由于八旗軍的力量已很難恢復，清廷想繼續加強仍被兵部和戶部所控制的綠營兵。崇厚關于讓英國人在天津施行訓練的計劃，事實上訓練的綠營兵多于訓練的八旗軍，而從受訓的綠營兵中產生了500人的“洋槍隊”，它在對捻軍的作戰中證明是管用的。在這同時，在1863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的前湘軍將領劉長佑，則建議重新訓練約15萬名直隸綠營兵，而不用對原來的軍隊編制大事更張。汛兵每500人組成“營”，以便在全省的七個中心地點施行定期訓練，但兵丁被準許在兩次訓練的長期間隙中返回原汛。[[11]](#_11_Wang_Er_Min____Lian_Jun_De_Q)

1866年，恭親王奉旨批準給予劉長佑總督以更多的財政支持。從各標抽調出來的兵就被編入劉長佑所指揮的六個中心。這種新編軍隊稱為“練軍”，即經過重新訓練的[綠營]兵。戶部最初從：天津海關撥款10萬兩充新訓練計劃中的軍火費用。但在1867年1月，恭親王的反對派、戶部尚書羅惇衍上疏攻擊這個計劃，而這一批評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歡迎，因為一道上諭急劇地削減了這個新計劃的開支。[[12]](#_12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直到1868年捻軍騎兵進犯直隸使政府創巨痛深，接著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才又為練軍制定了新計劃。當清廷內部因中英修約引起外交政策大辯論時，曾國藩剛好來到北京，他致函李鴻章說：“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醇者較多。”滿族兩派人士都信任曾國藩，使他能對綠營制度的調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國藩討論過這個問題。[[13]](#_13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曾國藩把勇營的方案應用到綠營兵中來，雖然他還沒有獲準放開手來從更根本的問題上大搞革新（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義和政治立場之故）。1869—1870年，他建議對新成立的營不予更動，它們的官兵可以從各省較大的綠營標里挑選。此外，這樣挑選出來的兵丁和下級軍官的品質和表現應受新的營官的考核，和勇營的辦法一樣，這些營官每人負責550人左右。與傳統辦法最大的不同之點是，曾國藩想使營官有權替換不合意的兵丁，而從直隸省的老鄉（包括那些沒有注籍在世襲綠營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14]](#_14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營官本人也是由綠營兵高級軍官——即將軍或總兵——挑選的。由于要貫徹回避法，將領們——以及事實上綠營的各級軍官直至把總——都必須是外省人。雖然這些新訓練出來的綠營官兵不像勇營那樣有同鄉的關系，但曾國藩希望練軍的中級軍官至少能夠服役較長時間，并能夠與練軍的統領建立親善關系。關于支付練軍官兵薪餉的條例由曾國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準，它規定的薪餉比一般綠營兵的同級官兵的薪餉要優厚一些。但曾國藩避而不談要修改整個綠營兵制，以淘汰軍隊中無用的人數。他希望為練軍開辟新財源。[[15]](#_15___Ceng_Wen_Zheng_Gong_Quan_J)

事實上，清帝在前四年內就已批準其他一些省的官員的建議，即某些綠營兵撫標可以裁減，把節省的經費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綠營兵的薪餉和武器上來。1867年以前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就已經在這個基礎上改編了福建的綠營兵，江蘇巡撫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撫標從1600人減為1000人。[[16]](#_16_Zuo_Zong_Tang____Zuo_Wen_Xia)（見上卷第九章）。丁日昌還很認真地想把他這直接指揮的1000人變成普遍改革江蘇綠營兵的核心，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因為他在1870年離職丁母憂去了。

清帝從曾國藩的建議中看到整個綠營兵制有可能保存下來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須把各該省勇營兵力裁汰到8000人以下，只有江蘇和直隸這兩個戰略省份除外。[[17]](#_17_Liu_Jin_Zao_Bian____Qing_Zha)關于勇營的這一主要方針雖未嚴格執行，但那些緊跟詔旨的省一級官員們現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來迎合每個省的綠營兵的既得利益集團。有些省份（如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以左宗棠和丁日昌為例，裁減了一些標的兵力，這樣至少從理論上說籌措到了留下來的綠營兵的薪餉。其他一些省份（如山東、河南、山西及湖南）則完全照搬曾國藩在直隸的辦法，從綠營編制中抽出人員來組成練軍各營，而這個辦法在1873年被兵部認為是應予優先考慮的。[[18]](#_18___Huang_Zhao_Zheng_Dian_Lei)清廷并不反對勇營軍官進入綠營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給予承認的制度，作為它的組成部分，許多勇營軍官自19世紀50年代以來就被授予了綠營軍官的榮譽銜。他們中間更多的人現在獲準填補綠營中的實缺，從把總直至省的將軍都可補缺，這些職務仍歸兵部控制，而高級將領的職務則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國藩的練軍條例給各級綠營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員當然仍舊留職未動。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綠營兵總數仍在40萬人左右，每年需費六百余萬兩銀子來維持這支軍隊。[[19]](#_19_Jian_Gong_Qin_Wang_1884Nian)從朝廷的觀點來看，這一巨額開銷也不是全然付諸東流，因為得到重新訓練的綠營兵裝備了比較現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亂子的地方，因此它在19世紀的余年中維持住了一般的國內安寧。[[20]](#_20_Jian_Luo_Er_Gang___Lu_Ying_B)但是如果發生大戰役，例如反對陜、甘、新疆的回民戰爭（更不用說對歐洲列強或對日本的沖突），勇營可能繼續是能夠發揮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營的組織原則依然不適應現代的軍事實踐。盡管官兵之間存在著個人的親睦關系，但勇營等級制使中、上級軍官能獲得不直接參加戰斗的特殊身份。要使營官——甚至哨官——參加嚴格的軍事訓練，特別是參加西式訓練，是極端困難的。自從1862—1863年以后，李鴻章曾經希望他的軍官們能從西洋人那里學到一二秘密方法，[[21]](#_21_Deng_Si_Yu___Fei_Zheng_Qing)但除了給予原在常勝軍中接受外國教官訓練的少數士兵以軍官身份（如羅榮光和袁九皋）外，李鴻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訓練他的洋槍隊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軍中的少數西方人，包括變成了清帝國臣民的法國人畢乃爾在內，都不能對軍官或士兵進行廣泛而系統的教練。很明顯，中國人對西方戰術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態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軍官們很贊賞外國式的步兵方陣，“但認為他們的士兵未必會排成這種陣勢”。中國人“承認我們的炮兵是優越的，但卻認為他們的步兵要先進得多”。除此以外，勇營軍官雖然承認西方炮兵的價值，但不想學習炮兵操練。戈登說，他們甚至不想學習“喊口令”。[[22]](#_22_Ge_Deng_Dang_An__Ying_Bo_Wu)

中國人能夠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國的訓練，勇營兵也能學到現代戰術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鳳凰山（距上海25英里）訓練計劃的始末就暴露了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鳳凰山訓練計劃是常勝軍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來的。[[23]](#_23_Xiang_Jian_Shi_Mi_Si___Wai_G)英國公使和上海領事很熱心地贊助鳳凰山訓練計劃，它也得到總理衙門“口頭保證”的支持，李鴻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對此表示歡迎。李鴻章在1864年6月撥了1300名淮軍（由兩三名最好的軍官帶領）給戈登。

英國人對這個計劃感興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認為已經衰敗的滿人政府不可能進行集中領導的戈登，主張英國人應該幫助發展一支中國軍隊，但要“通過撫臺，而不是通過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24]](#_24_Ge_Deng_Dang_An__Add_MSS_52)。英國公使卜魯斯雖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對清政策，但也相信應該給予中國人以軍事援助。但是，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的態度，使李鴻章警惕起來。巴夏禮本來只希望所訓練的中國軍隊能夠保衛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繼續出現騷亂。他也嫉妒法國人，因為法國人還在上海附近保持著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小小訓練營（這些中國軍隊直到1865年中才歸還給中國當局）。所以李鴻章責怪巴夏禮想“攬我兵權，耗我財力”[[25]](#_25___Qing_Dai_Chou_Ban_Yi_Wu_Sh)。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棄了這項訓練計劃而返回英國。李鴻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禮的提名，任命英軍的杰布中尉為鳳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標明日期為1864年11月的一份協議中，巴夏禮接受了李鴻章的交換條件，即淮軍將領潘鼎新應對中國官兵的任免、薪餉和裝備享有完全的控制權。訓練計劃應從海關收入中撥款。杰布的職責只限于訓練和教課，包括監管也由中國人支付薪金的15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證明是一個不好的人選，他經常離營外出，而當他上班時他又死扣《英國步兵操典》，毫不通融。[[26]](#_26_Ding_Ri_Chang____Ding_Zhong)1865年6月，李鴻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隸邊境防止捻軍的進犯，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命令潘鼎新從鳳凰山帶領一整營軍隊（外加在那里受訓的300名炮兵）北上。巴夏禮領事提出強烈抗議。雖然李鴻章同意以其他淮軍部隊代替鳳凰山的這850人，但他這時已不再相信鳳凰山的訓練計劃，一再駁回了關于擴充此計劃的要求。

鳳凰山訓練營后來的事態的發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國教官與淮軍本身這兩方面的弱點。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調回英國，上海道丁日昌馬上設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茲坦利取代了他。英國領事堅持應任命一位英國現役軍官，但被駐北京的公使館駁回。文茲坦利的為人通情達理而小心謹慎，但他缺乏足夠的權威，他的平庸的洋員教官們也未能獲得士兵的愛戴。至于勇營軍官們的行為則很遭人非議。雖然哨官們在閱兵和顯示軍容時總是在場，但他們平時很少參加實際訓練。不僅如此，他們和他們的上司還在發餉之日從各哨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薪餉中克扣50塊墨西哥鷹洋以中飽私囊。文茲坦利很贊賞士兵們在步兵、榴彈炮和火箭炮訓練中的熟練動作。但是，與八旗軍和綠營兵中的情況一樣，鳳凰山勇營的許多官兵也都有鴉片煙癮。士兵們還是一些桀驁不馴的人。[[27]](#_27_Ding_Ri_Chang____Fu_Wu_Gong)他們不時對外國人表示不滿：訓練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響而被擱置了起來。但在恢復了例行訓練以后，士兵的憤怒又轉向腐敗的勇營長官，這表明勇營制度官兵的融洽關系還是存在著局限性的。由于軍官濫用權力，包括一位營官施行過不公正的懲罰，1872年爆發了兩次兵變。[[28]](#_28_FO228_54_Wen_Zi_Tan_Li_De_Be)1873年5月，在經過了9年并且花費了大約150萬兩銀子之后，這個計劃突被停止執行，盡管英國領事提出過強烈抗議。鳳凰山曾被一英國軍官形容為“中國的奧爾德肖特（位于英國的漢普郡，為著名的陸軍訓練營地。——譯注）”，事實上那里從來沒有訓練軍官的計劃，不過它確實訓練出了一大批淮軍士兵來使用現代武器。

19世紀70年代之初，清軍確已獲得了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地區鎮壓叛亂的能力。但他們是否能夠對付沿海的外國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夠對付西北或中亞那些艱險地帶的叛亂，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清帝國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所發生的回民大叛亂特別難于研究，因為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這幾次回民叛亂不論就種族—宗教覺悟程度，或者就所處環境及地理位置來說，都各不相同。在中國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亂（1856—1873年，又稱為班賽[Panthay]叛亂）和陜甘的回民叛亂（1862—1873年，又稱為東干之亂）都有其種族世仇的背景。它們起因于回民這個少數民族不論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鎮，都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保持著他們的宗教習慣和特殊習俗。但新疆回亂的特點主要是外國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區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后裔瑪赫杜姆和卓從浩罕打回了新疆；因為在六城地區喀什噶爾附近，此人的祖先墳塋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亂也引起了俄國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爭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

雖然中國本部的回民從來沒有明確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礎，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權威矢志效忠，但他們已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個世紀。他們的典籍里雖然保持著對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贊助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29]](#_29_Te_Bie_Jian_Jin_Tian_Zhu___Q)在傳統上，回民也受到歷代清朝皇帝的相當優遇，回民能參加科舉考試；許多人也能在文武兩途出仕，盡管其職位通常并不很高。但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例如，陜西和甘肅的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云南和貴州，有時還處以終身戴枷，這比其他中國人在犯同類案件時輕科的笞刑要重得多。[[30]](#_30_Wang_Shu_Huai____Xian_Tong_Y)這種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亂早約20年；當然，這些回民叛亂又加劇了清朝官員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疑懼。漢民由于19世紀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難，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貿易方面的對手。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持平正態度。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

###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亂爆發于1856年，是19世紀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但是，這一叛亂決不能單純看作回民之亂，而應看成中國這一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它發端于漢民與回民為爭奪云南中部一個銀礦的控制權所進行的長期斗爭。漢民多數民族與回民少數民族的械斗開始蔓延開來。1856年，在患偏執狂的滿人按察使的慫恿下，至少有兩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殺。在云南的許多縣里，漢人紳士現在辦起了團練來“屠滅”回民，回民也自己組織起來，攻占州縣，殺害官吏。在這次大動亂中，有漢文修養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國，設立了包括回、漢民族出身的人在內的文武官制，并自任為大元帥和蘇丹。另一支旗鼓相當的回民隊伍由馬如龍（1832—1891年）率領，此人的幾個先祖都當過綠營兵的軍官，他本人是武生員；他占領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幫助清軍來打杜文秀。[[31]](#_31_Tong_Shang_Shu__Di_136__184Y)

馬如龍的投降是得到了備受尊敬的宗教領袖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過麥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寫了三十多種關于伊斯蘭教的書。在教義方面，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蘇思》（智慧的珠寶）經——13世紀蘇菲教派的經典。這部經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為頂峰的先知們的教訓，并且著重闡述了尋求真宰“全體大用”這一神秘的理論。但馬德新還論證說，伊斯蘭教對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與理學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32]](#_32_Ma_De_Xin____Da_Hua_Zong_Gui)馬德新曾在1863年暫署駐昆明的總督，使許多回民歸順了清朝的統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亂結束時因清朝官員的唆使而被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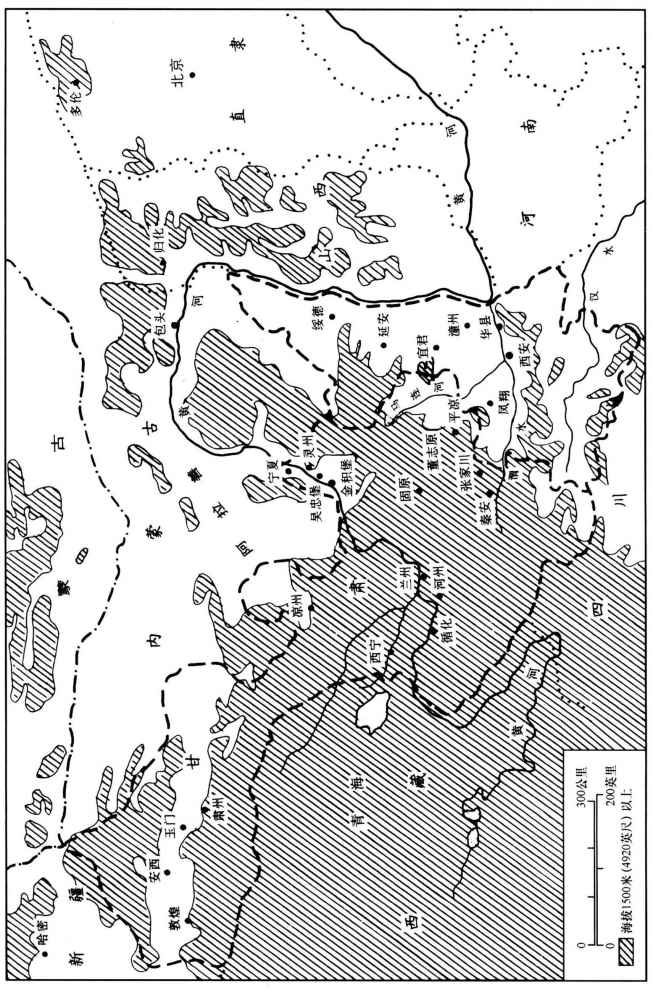
杜文秀的“班賽王國”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興趣，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國人在下緬甸分別站穩了腳跟。1867年法國海軍軍官特拉格來率領一個法國使團拜訪了變節者馬如龍（他那時在昆明當總兵），他發現已有一位法國牧師在幫助清軍制造馬如龍所擁有的現代武器的彈藥。特拉格來的助手賈尼埃在1868年2月到達叛軍首府大理，但他想會見蘇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派遣了由斯來頓上尉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準備從陸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賽王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邊境城鎮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斯來頓，并且談到了和緬甸的通商問題。但是，斯來頓希望訪問大理的要求卻被拒絕了。[[33]](#_33_Huang_Jia_Mo____Dian_Xi_Hui)

關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現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國式的官僚政治，他曾聲稱：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蘭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視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統治了云南近半數領土。他委任漢人充任大部分文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漢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隊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練巡撫岑毓英，因為岑毓英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還有法國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1872年4月，他的使節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女王獻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愿。杜文秀的事業到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只能把這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34]](#_34_Bai_Shou_Yi____Hui_Min_Qi_Yi)

### 陜西和甘肅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時期清帝國的回民叛亂，都應數陜甘的回民叛亂最為重要。因為這一片黃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隊通路，它管鑰著通往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是歷代清帝全力征戰才獲得的邊境。其次，通過多風的甘肅走廊，回民享有比較容易同外面廣大伊斯蘭世界聯系的機會，并且特別能對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響。人口過多而資源不足，賦稅繁苛，很多綠營兵被征調去應中國東部的急需：這種種原因都削弱了19世紀60年代陜甘兩省作為防衛中國西北的堡壘的作用。而且自從18世紀后期以來，甘肅已成為有力的中國蘇菲教團的活躍中心。這最后一個因素，加上馬術及與此相關的武術所產生的剛強民風，使得東干人（陜西和甘肅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內）變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頑強的叛亂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樣，東干人也說漢語。他們原來的中亞血統由于準許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婦女及撫養漢人兒童以擴大伊斯蘭教社會而被沖淡了。可是與云南不同的是，這里同中亞有更多的聯系，能不斷地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又被每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自治社會的阿訇所捍衛。像納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亞教派等蘇菲教團中的派別都從中亞傳入了中國的西北。它們的謝赫們宣稱自己與真主有特殊的聯系，他們有時實施一些“奇跡”（kirāmāt），像治病，恢復人們的生育能力，預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們認為是圣者（walī）的話，這位宗教領袖的權威就變得是不可爭議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會變成一處圣地。19世紀70年代，英國旅行家貝柳訪問過喀什噶爾附近納赫什班迪一個支派白山派的創建者圣哲的墳墓。在阿法其和卓們于18世紀中葉被清軍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師的墳墓仍然吸引著眾多的香客。[[35]](#_35_Zuo_Kou_Tou____18He_19Shi_Ji)阿法其和卓們以浩罕為避難所，從那里接連三代人都挑起暴亂，并發動圣戰想恢復六城地區（見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紀60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地圖10 陜甘回民之亂（1862—1873年）

與此同時，蘇菲派的一種以“眾禮時高聲念經”（dhikrijabrī）著稱的教儀被馬明心傳入甘肅的納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馬明心是18世紀的回民，曾旅行去過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島。馬明心信奉一種口頭的精神鍛煉，意在摒除一切心中雜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鄉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極東部，距甘肅首府蘭州不遠處）的撒拉族中傳教。他的徒眾中間彼此通用“者赫雷葉”一詞作為認宗的標志，此詞幾乎可以肯定為gahriyya（高聲唪經派）的音譯，在20年內，這一新教（與先前中國的納赫什班迪派的舊教發生爭執，后者主張聚禮時低聲念經以示虔心默祝）起來造了清朝的反。馬明心被打敗并被處決，但被他的被迫轉入地下的徒眾奉為圣人。到陜甘回民大叛亂于1862年爆發時，他的衣缽傳給了金積堡（屬甘肅省轄治的寧夏部分）的馬化龍。馬化龍是高聲唪經派的信徒，給人預言吉兇，治病，并幫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個孩子”。他的徒眾們在懺悔了錯誤行為后甘愿受鞭打。馬化龍據說曾派遣了—些代表（海里飛，即哈里發）和教師（滿拉，即毛拉）去新疆的烏魯木齊，甚至遠到滿洲的寬城子。[[36]](#_36_Dan_Hua_Pu____Xia_Gan_Jie_Yu)

但是，陜甘回民叛亂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運動。和云南的暴亂一樣，東干叛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沖突——以清真寺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會聯合起來掙扎圖存。1862年4月太平軍遠征到陜西并于5月中旬到達西安附近，這就成了陜西省暴亂的催化劑。太平軍被清軍阻截于西安后迅速東移，于5月底進入河南，讓渭水兩岸處于混亂之中。漢民在官方鼓勵之下組成了地方武裝隊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縣，做過縣衙衙役的回民洪興組織了一支據說有3000人的回民部隊。[[37]](#_37_Zhu_Wen_Chang____Tan_You_Gua)5月底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沖突。漢民和回民之間的武裝仇殺沿渭河流域迅即展開。欽命團練大臣張芾被東干領袖殺害以后，宣布對所有回民“格殺勿論”的通告就張貼了出來。不管這種告示是否經過官方授權，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組織的叛亂的道路。[[38]](#_38_Dong_A_Ju_Shi____Qin_Nan_Jia)

回民的傳統是擁護陜西“十八大營”的領袖們。至少其中的三位領袖是阿訇（宗教領袖）。叛亂者最初發展了三個中心：一是渭河流域東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華市鎮；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與甘肅接境的鳳翔附近。[[39]](#_39_Dan_Hua_Pu____Xia_Gan_Jie_Yu)叛亂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清朝積弱得令人難以置信。陜西巡撫訇瑛帶著綠營兵和團練駐扎在西安城內，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該城市糧食供應幾乎完全切斷的封鎖。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勝保（見上卷第九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援西安。但是，勝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軍行遲滯和嚴重的貪污行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職。

只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達以后，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將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40]](#_40_Chu_Fei_Ling_Zhu_Chu_Chu__Wo)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復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陜西東部作為東干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陜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對侵犯陜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陜西省的回民叛亂。可是大批陜西回民卻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里早已起義的人數眾多的回民部隊。

陜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將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于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沖要城市。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只有和為上，別無他法。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但是甘肅與陜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沖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內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馬化龍的軍事—宗教網絡以四個地區為基地：金積堡本身；青海東部的西寧，這里有許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肅南部的兩塊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陜西不遠，在新教中心張家川附近）。[[41]](#_41_Te_Bie_Ke_Can_Kan_1863Nian_G)寧夏道一位能干的漢族道臺侯云登糾合了足夠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以及團練，保衛靈州達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馬化龍的軍隊在他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教的信徒率領下，不僅攻占了靈州（據說有10萬漢民在這里被屠殺），而且攻占了寧夏府的各漢城和滿城。馬化龍這時顯然已用漢人的稱號，自稱為統領寧夏府和兩河諸地的“大總戎”；這個“兩河”指黃河和（它的）一條主要支流。[[42]](#_42_Luo_Zheng_Jun____Zuo_Wen_Xia)馬化龍有了這樣的權威，就能任命管區下的府縣官員，而對于日益增多的徒眾來說他卻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聯系，能行諸般奇跡。

當然，甘肅也有許多叛亂首領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間活躍在甘肅而其名字見于歷史著作[[43]](#_43_Zhe_Liang_Zhong_Zhu_Zuo_Jun)中的七十多個回民頭目中，有20個人被認為是馬化龍的黨羽。這20人中包括了伊斯蘭新教傳教士和許多綠營兵的中級軍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從陜西來的11位首領）中，有些已與馬化龍結盟，或者從他那里接受接濟。比起云南的造反者來說，陜甘的回民領袖中很少有馬如龍那樣死心塌地的變節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證明是詭計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隨多隆阿來到陜西的湘軍軍官雷正綰正轉戰于甘肅，他攻克了固原和平涼，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肅中、西部之間的政府驛道被重新打開。一位陜西的叛亂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綰，但在9月當陜西回民重新包圍固原時，赫明堂做內應打開了城門，使他的教友贏得了勝利（而且連帶地趕跑了已經投降雷正綰的一支甘回人馬）。一份現存的回民材料敘述說，赫明堂在每次戰役前都要朗誦經文并大聲祈禱說：“我們托靠主，我們一面保守教門，一面打仗，一總是真主襄助。”[[44]](#_44___Ji_Shi_____Yuan_Xi_Yong_Zh)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軍之手，但陜西叛亂分子在赫明堂的領導下于10月又奪回了它；還奪回了靠近陜西的東南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勢力的變節者的幫助，清朝官員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辦法，這實際上是把領土交到叛軍手里。最顯著的事例是馬化龍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兩位最好的滿族將領去攻擊馬化龍在甘肅和寧夏交界地帶的基地。這兩位將領一為都興阿，主要負責甘肅的軍事；一為穆圖善，原是多隆阿屬下的一名騎兵軍官，現為寧夏將軍。對寧夏府兩個城市的圍攻長達一年之久，但并不順利，穆圖善也贊成接受馬化龍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議。都興阿非常反對這個計劃，所以只是在他調任為沈陽將軍后，穆圖善才貫徹了他的接納馬化龍的方針。馬化龍移交給清軍26門大炮，1000多支洋槍，1萬多件刀槍。作為報償，穆圖善奏請除去馬化龍的叛民名籍，他說：“馬化龍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勸說回民……即可不戰而使諸地聞風歸順。”[[45]](#_45_Yin_Zi_Zhu_Wen_Chang___Zhong)1866年5月一道上諭批準了馬化龍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個保皇派的名字——馬朝清。可是，他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影響，而用不著擔心清軍對他的攻擊了。與此同時，清朝在甘肅的有效統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亂蔓延到了黃河以西甘肅省那個狀如鍋柄的地帶。1865年2月，涼州（今武威）一名綠營兵回族軍官粉碎了一次叛亂而控制了該城，3月份玉門又發生了回民叛亂，它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肅回民曾于4月暫時占領了戰略要地肅州，在12月份又占領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陜西，使該省再次出現危險。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陜甘事變的影響，現在也處于內（因內部幾個地區有好多叛亂）外（即清帝國有來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 新疆

中國回民舉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多樣化的程度猶如該地區的人種和語言那樣復雜，也如它的地理和歷史傳統被割裂分割的狀態那樣互不相關。那里的清政府有許多弱點，而且直到1860年為止，清王朝在反對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語的追隨者的定期圣戰中只是勉強維持住了六城地區的秩序（見上卷第二、八章）。漢人到新疆的移民越來越多，但這種發展也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語的居民看來，中國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構成了少數民族，而且也往往會變成反對新疆的清朝統治者的顛覆分子。在清帝國的這一極西北領土上，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也都面臨著俄國在中亞貿易和政治中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現的事實。與此同時，通過帕米爾和喀喇昆侖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屬印度認為過于靠近它的北部邊境了。[[46]](#_46_Wo_Men_Dui_Zhong_Guo_Yi_Si_L)

中國本部回民叛亂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區的一次回民騷動，但清軍還能夠很快把它鎮壓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漢民在新疆東北的奇臺爆發了戰斗，那里的漢族農民和商人人數眾多，而且那里鼓勵新移民的清朝當局對回民的課稅采取了高壓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區北部的庫車爆發了另一場叛亂，其領袖是與瑪赫杜姆家族非親非故的熱西丁和卓。這場叛亂東邊遠及喀喇沙爾，西邊到達了喀什噶爾。熱西丁和卓在阿克蘇建都，稱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熱西丁家族未贏得葉爾羌的尊敬，一個當地叛亂分子攫取了該城的權力，緊接著，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爾以南僅約30英里的英吉沙爾；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語的領袖自立為和田王。

正在這時，在新疆東部作為清朝堡壘的烏魯木齊，一位從甘肅來的東干族阿訇妥明[[47]](#_47_Tuo_Ming__Tuo_De_Lin__Ju_Xin)（據說是馬化龍的黨羽）在清朝戍軍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肅回亂的榜樣，他博得了烏魯木齊綠營兵參將索煥章的效忠。索煥章的隊伍曾經打過與奇臺回民發生械斗的漢族移民武裝團隊。索煥章在1864年7月發動一次兵變，殺死了滿族將軍并控制了烏魯木齊漢城。妥明號為清真王，而以索煥章為大元帥。妥明的部隊攻占了沿瑪納斯河的幾座城市，在10月，烏魯木齊的滿城也投降了。新疆的東干人既不見信于清朝，也不見信于突厥人，他們的反應是在庫爾喀喇烏蘇與吐魯番同時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將軍攻占了吐魯番城。

1864年11月，統率整個新疆的滿洲將軍駐地伊犁也發生了暴亂。塔蘭奇人邁茲木汗曾當過阿奇木伯克，他領導的叛亂分子（多數是操突厥語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爾人）包圍了伊犁的兩個主要城市，即惠寧和惠遠。伊犁戍軍統領明誼在塔爾巴哈臺與俄國人簽訂了邊境條約，他剛從那里回來。他與伊犁將軍明緒一起向俄國的西伯利亞總督求援。[[48]](#_48_Xu_Zhong_Yue____Yi_Li_Wei_Ji)他們準備長期被圍，因此他們甚至把要求通過總理衙門轉交給俄國駐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費。清軍英勇地守衛了這兩個城市達18個月之久后，終于在1866年3月被壓倒。塔爾巴哈臺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領并得到哈薩克人幫助的當地回民的圍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區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這個地區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擾。

與此同時，在新疆南部，張格爾的圣戰（見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這只造成了一位也許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奪者的崛起。滿人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對喀什噶爾的控制權，但有另外兩支人馬在爭奪這個城市。其中一支人馬的頭頭是柯勒克孜人頭目西迪克伯克，他為了爭奪控制喀什噶爾的權力，在1865年初訪問過浩罕以吁請援助。但結果并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預，而是張格爾的一個兒子——布素魯汗——的卷土重來。他只帶了約60個人，由曾在浩罕軍隊中服過役的一位將軍阿古柏（約1820—1877年）率領。盡管這支部隊人馬不多，但喀什噶爾地區有大批人糾集在布素魯汗的麾下，因為大多數人仍然自認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魯汗不久就強大起來，足以消滅企圖在喀什噶爾建立控制的另外兩支敵對人馬。后來，當阿克蘇的熱西丁和卓與葉爾羌的一位新統治者攻打這座城池時，這兩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組織的軍隊打敗。在阿古柏于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爾并且打敗了一支孤立的滿洲部隊之前，布素魯汗不失時機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僅是一位干練的將領，而且是擅長弄權和用宗教來支持權術的一位大師，而這二者在伊斯蘭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魯汗馬上感到有這樣一位野心勃勃的將軍在身邊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設法要搞掉他。但是，阿古柏那時卻與那位虔誠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謝赫很友好，所以后者拒絕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門的要求。這位富于心計的將軍現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爾，使和卓在那里實際做了18個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說服）離開六城，表面上是去麥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爾的權力，稱號為巴達吾來特（洪福之王）。同時他宣稱，他已下定決心要對妥明領導下的東干人發動宗教戰爭；因為東干人雖然也是遜尼派（正統的穆斯林），但他們據認為是沙菲伊法學派，而不是喀什噶爾地方宗教當局所信奉的哈納菲派。[[49]](#_49_Yuan_Qing____A_Gu_Bai_Yu_Hui)由于妥明的王國已把它的勢力從吐魯番向西擴張，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闐的統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蘇和庫車的統治者熱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年大力鞏固喀什噶爾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為這兩個統治者曾征召東干人加入他們的軍隊，并且在其他城市歡迎過東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讓布哈拉的艾米爾封他以宗教的稱號：阿塔拉克哈吉（護法神）。他因此擁有合法的身份；在他所統治的城市中他著手嚴格地解釋伊斯蘭法律以加強這種地位。他還創辦了許多附有捐贈土地的新的經文學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誠的武士，因為他敢于到東突厥斯坦去攻擊東干人控制的城市，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他是這樣的人。看來他在1869年只在庫爾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連攻占了喀喇沙爾、吐魯番和烏魯木齊本城。在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學功的幫助，后者是新疆東部漢族移民的一位“團頭”。借助于徐學功和妥明的心懷不滿的過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隊才在12月奪取了烏魯木齊。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馬納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可是，阿古柏的勝利是付出了很高代價的。據一條材料記載，他的遠征隊伍在1867年有2萬人，經過新疆東部之戰后只剩下了半數。[[50]](#_50_Ma_Xiao_Shi____Xi_Bei_Hui_Zu)但是，這次遠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871年6月，俄國軍隊沖過邊境占領了伊犁，從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準噶爾的任何計劃。

俄國侵占伊犁一事，要從更大的方面來看。因為它表明，新疆不再像張格爾時代那樣只是中亞的一部分了。新疆現在已處于清、俄、英三個帝國相交的三岔路口上。特別是中、俄兩國因有自己的利害關系而對新疆的前途非常關注，而當時俄國正力求得到保證，阿古柏的伊斯蘭教熱情不會使他去支持俄國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國家。在阿古柏取得權力的時候，浩罕、布哈拉和基發都在為獨立作最后的掙扎。俄國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干，1868年拿下了屬于布哈拉艾米爾國的撒馬爾罕。這一并吞趨勢還在發展之中：基發最后于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變成了俄國城市。與此同時，英國人雖然跟新疆的貿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對俄國人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國人憂慮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俄國人也同樣確實不知道——通過喀喇昆侖山脈的大規模軍事調動是不可能的。但英國人對印度兵變記憶猶新，他們更擔心因俄國人的煽風點火——通過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爾與阿富汗之間心懷不滿的邊境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勢可能不穩。英國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寧愿它成為對付俄羅斯帝國的緩沖地帶。[[51]](#_51_A_Er_De____1865__1895Nian_Yi)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處境的危殆，但他對他本人和對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節去印度和俄國討論貿易的前景，并且吁請承認他的國家。1872年俄國軍隊已駐在伊犁，他認為有必要同俄國官員簽訂一項不給予外交承認的商務協定。俄國貿易就在所規定的值百抽二點五的低進口稅率下繁榮了起來，這時阿古柏卻表示不滿，把行為不軌的俄國商人收監，并斷然沒收了他們的貨物。為了防備萬一，他開始努力爭取英國和中亞以外諸伊斯蘭國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19世紀60年代后期已與奧斯曼蘇丹國有接觸，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國政府才公開承認他的王國。他被封為艾米爾，也就在那一年蘇丹—哈里發給他送來了一份禮品，計3000支來復槍、30門大炮和三名土耳其軍事教官。與此同時，探險者紛紛來到喀什噶爾，1868年有R.B.肖的到來，1870年有福賽思等人的到來，這些訪問引起了英國人對阿古柏國家的熱情。福賽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來喀什噶爾，他送給了阿古柏幾千支英屬印度兵工廠制造的舊式滑膛槍。1874年初，他同艾米爾簽署了一項商約，并且對這個新興的喀什噶爾國家給予了外交承認。在倫敦，亨利·羅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國與俄國在東方》一書中寫道：英國“要在奧克蘇斯以北挑起大規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運動”，比俄國挑動印度的穆斯林會容易一些。[[52]](#_52_Yin_Zi_V_G_Chu_Er_Nan___Ka_S)但亨利爵士的建議未能付諸實施。不是俄國，而是中國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國。

## 清朝在陜西和甘肅的勝利

在清帝國軍隊能夠開進新疆以前，他們必須先打敗陜西和甘肅的回民。1867年當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國的時候，左宗棠還在征募新湘軍（楚軍），在為打敗中國本部的東干人而籌措軍費和安排交通運輸事項。陜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時間（1867—1873年），而他的部隊參加新疆的實際戰斗只不過用了兩年時間（1876—1877年）——不算漫長的準備時間在內。

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達陜西以后，他又不得不為了捻軍之戰而離開陜西十個月。在此期間，左宗棠的助手劉典作為欽命陜甘軍務大臣，已清除了從甘肅折返的陜西南部回民叛亂分子。陜西回民現在在董志原筑壘自固，此地是甘肅東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們的“十八大營”從這里繼續派人馬四出侵擾。與此同時，在它的北邊一些地方，新教領袖馬化龍自從1866年投降清朝以來，已把金積堡建設成為經濟和軍事基地。馬化龍的徒眾包括長期在甘肅和內蒙包頭之間做買賣的回民商人，他們做買賣時使用商隊驛道以及向東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馬化龍本人擁有兩家字號，而且在他的許多徒眾的企業中有投資。他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夠控制蒙古和甘肅南部之間的整個貿易。[[53]](#_53_Zhong_Tian_Ji_Xin____Tong_Zh)可是，他的興趣是在宗教和軍事方面。他甚至從歸化城（今呼和浩特）購買軍火，并且把它們送到甘肅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馬化龍也同董志原的陜西回民做生意，他賣出馬匹和軍火，購進糧食。當左宗棠1868年11月返回陜西任所時，他相信馬化龍不僅與新疆有聯系，而且對“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54]](#_54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左宗棠在甘肅的進攻準備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軍官已經從湖南給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隊，總數約5.5萬人。此外，曾國藩已在1867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軍隊伍約1萬人調來陜西，由他最優秀的將領之一劉松山率領。清帝還調撥了另外一些軍隊供左宗棠指揮：即黃鼎統率的川軍1萬人，郭寶昌統率的皖軍7000人，張曜統率的豫軍6500人。這些軍隊都有對太平軍和捻軍的實戰經驗，其中有7500名騎兵，他們加強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5000匹馬。[[55]](#_55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滿洲軍官來訓練他的騎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練他的部隊。他很欣賞劉松山的部隊擅長隊形操練和精于射擊。但左宗棠根據自己在太平軍叛亂時期的經驗，深信取勝的兩個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給養。他只是在叛亂的后期在他的軍隊中一度試行過西洋操法，但他覺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隊形。左宗棠雖然用西洋火器裝備了他的軍隊，不知何故他卻認為，練習打靶10天，一天兩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隊去打仗了。[[56]](#_56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幸運的是，在他即將在甘肅展開的攻勢中，他所進行的戰爭也恰恰是這樣一種情況：即雖然地形比較險要，但主要仍是進攻柵寨和城池——這與對太平軍的作戰毫無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視攻城大炮，他有幾位老軍官曾學過如何使用它們。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決他的財政和后勤問題的保證。在飽受戰禍的陜西和甘肅兩省，食品匱乏，物價騰貴。左宗棠定下了一條規矩：必須有三個月的糧餉在手，他的部隊才能打大仗。[[57]](#_57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不僅軍火，甚至大量糧食也得從其他省份運入陜西和甘肅。左宗棠為了籌措給養，明確地要求北京同意從古以來歷代王朝所通用的一個慣例：即以東南之資源，供西北之軍需。1867年，清帝要求東南沿海五省對“西征餉項”每年助銀324萬兩。這款項在清代財政上稱為“協餉”，但只實行于這些省份已經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種捐助餉額之后。[[58]](#_58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謀劃促使各該省提出滿足其軍事需要的定額。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準他從外國商號得到一次總付的貸款安排；這筆貸款由通商口岸各稅務司擔保，并經各該省巡撫加蓋印信批準，限期由各該省還款給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駐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約1825—1885年）就以這種方式獲得了120萬兩的洋商貸款。但是，在同年12月當左宗棠要求在同樣安排下再次借貸外債200萬兩時，清廷反對胡光墉所開出的高利息，而只批準了此借款的半數。四個口岸的稅務司奉命借給左宗棠要求的余下的100萬兩，不付利息。[[59]](#_59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因此，左宗棠暫時不得再向外商謀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為了應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籌措了每年總數達624萬兩的“西征餉項”，增攤了原來五省承擔的定額，還要求另外兩省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數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們的餉額。但是，左宗棠確從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400萬兩（從左宗棠最初于1866年9月被任命來陜甘就職起到1874年2月止）。[[60]](#_60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

1867年，甚至在他抵達陜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漢口設立了兩個局，承辦軍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個衙署向各戰區分配給養，設立了另一個衙署以保持與其他省份的通訊聯系。在上海弄到的軍火是用外國人的汽輪運往漢口，再用帆船把它們和其他給養溯漢水運往陜西邊境，然后經陸路運往西安。在四川購買的大米則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陜西的兵站。供應給陜北山區部隊的糧食則來自山西或內蒙古的歸化。給陜北和寧夏的軍火是經由天津首先運到歸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運輸系統成為沿路地方當局的負擔。他的代理人和護航隊押送著每一起貨物，而每一個搬運工或車夫都應該是車資照付的。一旦進入陜西境內，縣長們就準備足夠的夫役車輛逐縣撥運。縣長所付的這些費用將予以清償。[[61]](#_61_Qin_Han_Cai____Zuo_Wen_Xiang)這一整套供應系統充分顯示了左宗棠的組織才能，而它也一定運轉得相當不錯，因為甘肅的戰事確確實實進行下去了。

左宗棠早些時候曾宣布他對回民戰爭的一條原則。他將樂于接受一個叛亂首領的投誠，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誠，即投誠者應交出武器、馬匹和糧食，另外，還要接受左宗棠關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隨者的計劃。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廣為曉諭，即只問其為良或逆，不問其為漢與回。但左宗棠還有一條原則：決不姑寬新教的任何積極的追隨者，因為他把新教比做企圖搞顛覆的白蓮教異端。[[62]](#_62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在種族戰爭、官軍的暴行和饑饉后的疾疫流行使得漢人與回民大批被仇殺的省份里，左宗棠對東干人的戰爭是一場在儒將和阿訇\_軍閥之間所進行的嚴酷的意志較量。左宗棠不久就發現，他的勇營并非總是忠誠可靠的。他幾乎沒能保持他們的士氣。士氣之提高僅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給養；允許擄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據點；此外，整個軍隊還意識到，左宗棠的精銳勇營所用的歐洲來復槍和攻城大炮最終會有殺敵致果之效。

從陜西往西開拔時，左宗棠有兩大目標，即金積堡附近的馬化龍據點以及位于甘肅東南董志原的陜西回民的農村基地。要在后一個地方取得勝利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陜西回民的18大營既無統一領導中心，又無可資防守的據點；在他們的4500平方英里的富饒土地附近的少數大城市又已被甘肅回民盤踞，而且甘回并不總是援助他們的陜回教胞的。1869年2月中旬到4月初，左宗棠的部隊橫掃了董志原，據說斬殺兩萬余人。大股大股的陜回現在四散逃遁。有幾位首領暫時往北占領了靠近金積堡的一些市鎮。馬化龍收編了其中的幾個人及其部隊。他給其余一些人贈送了駱駝，勸說他們另投他處。[[63]](#_63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陜西的一股回民越過黃河，進入寧夏。他們到達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領地，洗劫了他的村莊和祖塋，使得北京匆匆忙忙從內蒙其他地點調兵來此。[[64]](#_64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可是，大部分陜西首領則帶著各自的人馬滯留甘肅，主要聚集在蘭州東北和西南諸市鎮，或者聚集在這些市鎮的附近。

雖然攻占董志原比較容易，但是，征服甘肅回民自己的據點則困難得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肅地區四個主要叛亂中心（金積堡、河州、西寧及肅州）所遇到的復雜問題，從金積堡戰役的歷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戰計劃是1868年后期制定的。[[65]](#_65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三支主力部隊計劃聯合進攻。自直隸捻軍之戰前線返回甘肅的劉松山預定從河南橫穿陜北，從東面進逼金積堡；在山西保衛包頭地區的張曜的豫軍應穿越內蒙，沿黃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隊預計占領甘肅的平涼和固原，從南直趨金積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隊經歷了危機和挫折之后，這一作戰方案才最后得以貫徹。

最嚴重的危機是內部危機，因為從1869年3月到4月，即正當董志原之戰取得勝利的時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銳部隊中發生了兩次驚人的嘩變。3月后期當劉松山已橫穿陜北而抵達甘肅寧夏邊境時，綏德（在延安東北約七十五英里）發生了一次兵變，劉松山原在這里留下了4500名士兵守衛著供應站。包括后來承認是哥老會會員在內的幾百名士兵搶劫了糧站，并占據了綏德城。叛兵中有多達四名哨官在內，據說也都是哥老會會員。[[66]](#_66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劉松山本人于4月初趕回綏德后，兵變迅即被平定，但顯然與綏德兵變并無牽連的另一次兵變同時又在陜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發，殺死了一位統領。這一次的幾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會的會員。參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一名營官據說也是哥老會的成員。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隊抓起來了。左宗棠親自處死了五名為首分子。他認為哥老會起源于四川和貴州，是通過投誠的太平軍（他們都是川、貴兩省的土著），或者通過其他省份的“散勇”（他們來到陜西是為了搞投機冒險活動）而使湘軍受到影響的。他希望這些梟蝮鬼蜮之輩在他的部隊中只是極少數。[[67]](#_67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可是，哥老會作為進行合法和非法活動的地下互助組織，卻長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隊之中。

進攻金積堡之役被兵變及其善后問題所中斷，直到8月中旬才恢復。從陜北進軍的劉松山在9月初抵達靈州附近。經與左宗棠的兵力進行對比，馬化龍對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書給左宗棠想談判和平，但他的倡議被嚴予拒絕。[[68]](#_68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在11月，靈州被劉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邊的部隊已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繼續向北挺進。可是，抵抗也越來越厲害，因為有越來越多的馬化龍的甘肅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陜西回民在內——參加了戰爭。左宗棠不久就要面臨一位景慕他的傳記作者所稱述的“他整個事業中最大的一場災難”了。[[69]](#_69_Bei_Er_Si____Zuo_Zong_Tang)

劉松山在從靈州南下途中必須打通數以百計的設防村寨——這些村寨都三面環山，西瀕黃河。擁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們又都是馬化龍最堅定的信徒。劉松山不得不緩緩前進，但他在1870年2月14日死于炮火之中。[[70]](#_70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雖然他的能干的侄兒和前參謀軍官劉錦棠（1844—1894年）設法保住了他的部隊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隊的前進停頓了下來。剛巧就在這個時刻，馬化龍發動的一次戰線遼闊的攻勢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馬化龍使用了他曾經窩藏或幫助過的陜回，已于1月初在陜西的幾個部分發動了騎兵突襲。在劉松山戰死之前幾天，陜西的東干人陳霖切斷了劉松山在陜北的供應線。另一陜回馬正綱現在也率領他的騎兵馳抵渭河流域。[[71]](#_71_Guan_Yu_Xia_Hui_Cong_Gan_Su)2月15日他通過西安以東，渡過渭河，回到了東干人八年前發動叛亂的老地方。

在甘肅，在金積堡南邊，已進抵距金積堡不足50英里之處的左宗棠部隊，也在劉松山戰歿之前兩天吃了敗仗。敗仗又變成了潰退，清軍不得不撤退到固原。這一連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月降旨命李鴻章從湖北率領其有名的精兵赴陜，接管該省的戰爭事宜。[[72]](#_72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

可是，左宗棠的軍事態勢還可以僥幸地立于不敗之地。因為盡管事實上他需要遠離供應地作戰，盡管他的軍事體系有許多弱點，但幸虧有他的運籌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肅所得到的資源足與馬化龍的資源相匹敵。突破左宗棠警戒線而返回陜西的東干人總數似不足4000人，他們被左宗棠派回陜西的騎兵及該省的其他部隊所遏阻。[[73]](#_73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劉松山的死是一大打擊，但只要將帥之間和官兵之間的融洽關系還未受到損害，勇營體系——盡管它有不公正和貪污受賄現象——的團結還仍然保持著。幸運的是，劉錦棠得心應手地接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馬上任命劉錦棠為“老湘軍”的統領，而且在1870年3月得到恩準，這又增加了這位年輕將官的聲望。他的陜北供應線仍被切斷而不通，但軍糧問題因有了用木筏沿黃河而下運到吳忠堡的糧食而得到了解決。這條路是由張曜打通的。[[74]](#_74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

早在3月10日，劉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積堡。與此同時，甘肅東南的左宗棠部隊在有騎兵作戰經驗的川軍將領徐占彪的率領下，甚至在李鴻章于6月份到達陜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務去直隸省），就已返回到金積堡周圍。到了9月份，已有幾支清軍包圍了馬化龍的據點，與劉錦棠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劉錦棠此后取得保證，可以從左宗棠在甘肅的總部獲得糧食和軍火。

曠日持久的消耗戰終于弄得馬化龍的基地糧秣告盡。到1870年9月，在金積堡周圍500來個碉堡中劉錦棠蕩平到只剩下一二十個了。克虜伯的攻城炮從上海運到甘肅給劉錦棠，還送來一個給曾國藩當過炮手的軍官。炮彈沒有能夠炸開金積堡的厚厚的城墻（據說有35英尺厚），但劉錦棠在10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陣地，居高臨下，飛過城墻直接打入城內。[[75]](#_75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金積堡的居民死亡相繼，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饑。馬化龍終于在1月份向劉錦棠繳械投誠；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門大炮、293門土炮、1030支獵槍，以及180支洋槍。左宗棠暫緩處決馬化龍，命令他勸說其他地方的甘肅回民也投降。可是，沒有一個重要的首領出來降順；當嚴密隱藏在金積堡的1200多支洋槍被清軍查出來后，左宗棠下令處決了馬化龍及其成年男性親屬。馬化龍的大約800名參謀和軍官及1000名士兵被屠殺。幸存下來總數達1.4萬名的壯健居民（包括多達11萬名的陜西回民）被遷往平涼附近。那些衣食無著的2萬名婦孺老人則被送往甘肅南部的難民營。清兵獲準盡量搜括財物。1869年已投降劉松山的那些漢族血統的陜北劫掠者，則被鼓勵攜帶家口遷居金積堡，使它變成一個漢民城市。[[76]](#_76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馬化龍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沒有其他東干人領袖能夠把出身各異的回民叛亂者糾集起來組成一個大運動了。可是，在甘肅省的幾個地方和毗鄰的青海省還存在著一些強大的叛亂中心。正在這時，北京又因內外蒙古傳來的消息而深為困擾。7月份，幾百名來自甘肅的回民騎兵侵襲了多倫附近的內蒙古。與此同時，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隊（他們發端于甘肅走廊，在前一年曾搶掠和焚燒烏里雅蘇臺）穿過沙漠，于10月初來到了距庫倫僅幾天路程的部落領地上。蒙古族軍隊和滿洲軍隊穿越草原來保衛多倫和庫倫。甚至直隸省的綠營練軍也奉旨被調到庫倫。這兩股回民隊伍似是在1871年11月——即在俄國占領伊犁后四個月——被擊潰的。[[77]](#_77___Da_Qing_Mu_Zong_Shi_Lu)

左宗棠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清除甘肅余下的叛亂中心。他利用對馬化龍取得的勝利，散發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許寬赦被新教煽動而誤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圍不包括哈里發和毛拉們。清帝批準的這一為甘肅省轄區所奉行的政策，[[78]](#_78_Guan_Yu_Zuo_Zong_Tang_De_Gao)在1871年9月開始的河州之役頗具實效。清軍緩緩推進，于11月進到距河州30英里的范圍內，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著該城的一位舊教回民叛亂頭目馬占鰲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隊在一條寬闊河流的岸上的一個設防市鎮遭到慘敗，雖則他已經使用了新式來復槍。可是，馬占鰲即使有此勝利，他仍然決定談判和平，以便盡可能利用眼看最后會是沒有希望的形勢。他告訴他的徒眾，在備受戰禍蹂躪的甘肅，如果戰爭繼續下去，“不惟漢族仇怨日深，回族亦無立足之地”。因此，勝利后的投降要比失敗后的投降好一些。[[79]](#_79_Ma_Xiao_Shi____Xi_Bei_Hui_Zu)他準備向左宗棠移交4000匹馬和“一萬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這樣的保證：河州的回民是多數民族，應繼續在那里居住，漢民則要一次遷出。到了6月份，河洲的漢民和大約二千名陜回，已被安置到了別處。馬占鰲及其他從前的叛亂領袖們最后被吸收進了一個綠營軍官所統率的地方戍軍中去，左宗棠的部隊則在附近各城市監視著他們。[[80]](#_80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1872年8月，左宗棠移節于蘭州的總督官署內。鑒于俄國侵占伊犁，他已于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隊去肅州，此地是離甘肅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遠的戰略要沖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領下，這支6500人的部隊（包括騎兵在內）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據的肅州附近建立鞏固的據點。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蘭州西北120英里的西寧，這特別是因為它在1872年被陜回首領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彥虎在內；白彥虎曾經是馬化龍的黨羽，現在擁有一萬余名久經戰斗的回民戰士。劉錦棠于8月承擔了攻擊西寧的任務。劉錦棠花了三個月時間才得以突入西寧險要而又防守嚴密的地帶，但最后他終于取得優勢。他殲滅了1萬名回民黨徒，但白彥虎卻漏網而逃。捍衛新教的西寧“回民紳士領袖”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領地上被清軍追捕到手。[[81]](#_81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左宗棠在這整個時期實際上一直在準備對肅州進行決定性的攻擊。許多東干族首領云集在肅州，集合在新教統領馬文祿（本來出身于西寧）的麾下。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隊，左宗棠在1872年12月從他自己的湘軍中派去3000人；在左宗棠的請求下宋慶和張曜兩支豫軍也奉旨前來會戰。新近被任命為烏里雅蘇臺將軍的金順也參加了戰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財政和給養，包括在蘭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廠，并命一位有些軍械知識的干練的陸軍軍官、廣東人賴長開始為德國攻城炮加造炮彈。[[82]](#_82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左宗棠雖因組織戰爭，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達到消除種族沖突的根源的目的。這時只有兩萬陜回難民留在甘肅。他們不能回家，因為即令是這一小批人也不受陜西的歡迎。左宗棠保證將平涼及其南方兩個城市附近的農村地區的土地撥給他們，并與漢人社會隔絕開來。必須從某些城市趕出的甘肅回民則被遷往蘭州附近同樣指定的地區。以下規定必須被嚴格執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組織起來，十戶的頭頭由官方選派；準許貿易，但任何人想要進城都必須持有縣長的許可證，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則必須向道臺申請護照；不許舉行新教儀式。這些被隔離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畝的多少依其人口的數量而定，并供給農具和種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難民，可繼續接受救濟。[[83]](#_83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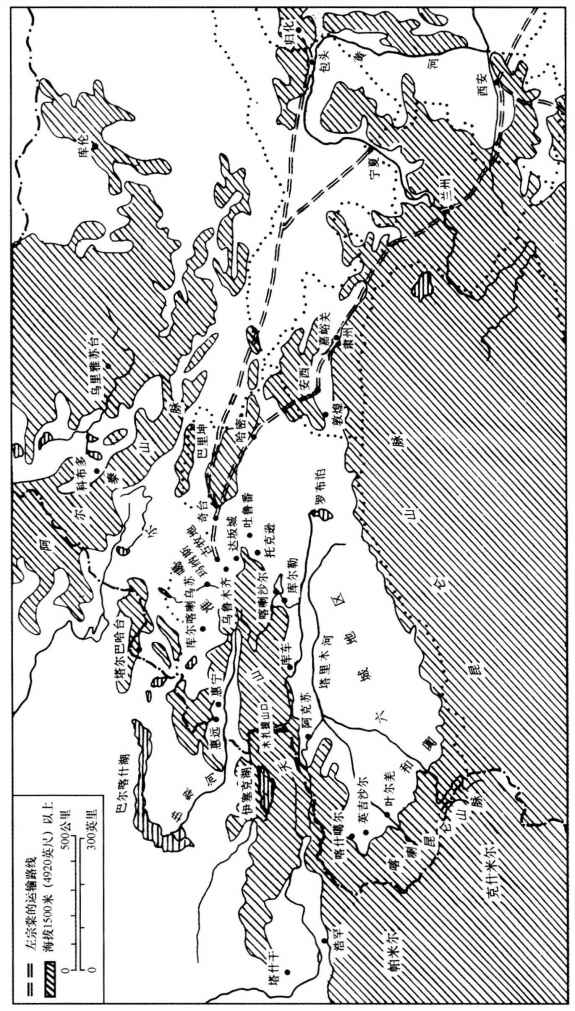
同時由于宋慶的3000步兵和500馬兵在1873年年中到達，肅州的包圍得以完成。在六位統領統帶下的整個清軍迅即數逾1.5萬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親臨前線，隨身帶了兵工廠經理——也是大炮專家——賴長。克虜伯大炮現在轟擊著厚厚的城墻，炮火還得到埋在城墻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馬文祿投降。左宗棠上奏說，5400名土著回民和1573名從外地到肅州來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處決。他向他的西安總部的軍需提出了他的計劃：肅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婦女將和甘肅走廊其他兩個主要城市幸存下來的回民一起，在甘肅南部得到安置。“自此，關內甘涼肅三郡可無遺種，而關內外可免勾結之患。”左宗棠又寫道：“數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肅州）為最妥善；次日各軍因爭賊贓，亂我章法。”[[84]](#_84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 收復新疆

在清除了甘肅的叛亂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國人。早在1874年2月他經上諭批準后，便要求張曜進軍哈密，著手在那里舉辦屯田。[[85]](#_85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時間以后——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揮向新疆進軍的事宜，他的由劉錦棠率領的主力部隊也要到1876年4月才從肅州出發開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決策和授權左宗棠能動用巨額款項，這才使得他能夠制定出耗資巨萬的后勤方案，終于把總數達六萬多的人馬開進了清屬突厥斯坦。左宗棠的遠征是中華帝國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舉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漢唐兩代。[[86]](#_86___Zuo_Wen_Xiang_Gong_Jia_Shu)另外，這是一場中國人的種族戰爭，可比之于清代中葉或唐代的遠征。左宗棠為使新疆變成清朝的一個行省并使更多的漢族移民前往定居鋪平了道路。但是，盡管他取得了勝利并且俄國人最后撤離了除伊犁一段地帶以外的全部地區，但俄國早就在經濟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過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給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為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景廉是烏魯木齊副將，曾收復迤東的奇臺。作為陜甘總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給景廉輸送給養。

從當時形勢和歷史傳統來看，收復新疆是一項不可避免的任務。因為，蒙古在東干人的刺激下也開始有些不穩。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爾侵襲蒙古（例如，1872年從肅州來的一支部隊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毀了作為該城驕傲的黃廟）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裝蒙古股匪仿效東干人的榜樣，也在這里出現了”[[87]](#_87_Bao_Deng____Meng_Gu_Jin_Dai)。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國人占有新疆，騷亂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臺灣危機（由于五個月以前日本軍隊在這里登陸而造成）解決以后，才對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復新疆這一代價昂貴的冒險行動的問題，又展開了討論。李鴻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議可以承認阿古柏為清朝的藩屬，把計議中收復新疆的大筆開支節省下來，移作海防之用（見第二章）。但滿人政治家文祥，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軍，可是他還是支持左宗棠的觀點，即必須刻不容緩地進行新疆戰役。文祥爭辯說：“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破關而入，陜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文祥還相信，左宗棠的軍隊在甘肅受過戰爭考驗，因此他們很可能在新疆打勝仗。[[88]](#_88_Wen_Xiang_Zai_Yi_Ci_Jue_Ding)



地圖11 清朝收復新疆（1876—1878年）

一定是這最后一個考慮，才促使清廷把新疆軍事托付給左宗棠，但是，遠征必要的財力和物力必須予以認真的解決。作為給新疆戰事負責運輸和供應給養的駐節蘭州的總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準，能夠通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國行號舉債300萬兩，舉債辦法與1867—1868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釋說，雖然甘肅戰爭的最后幾年中每年在西征餉項名下得到的協餉曾增加到七百余萬兩，但事實上他每年只收到500萬兩，他需要借300萬兩債來償還所欠中國商人的債務。現在他正積極籌劃新疆戰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議在1876年1月向外商舉債1000萬兩來完成這一準備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負責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這時是駐南京的總督和經管海防的兩員欽差大臣之一，他反對左宗棠的這一建議；可是，清帝仍授權左宗棠向外國方面商借500萬兩債款，同時命令戶部立即支付給他200萬兩（這筆款子事實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專款）。與此同時，清帝命令12個省給左宗棠解送總數達300萬兩的款項，以湊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終于從匯豐銀行借到500萬兩，分七年償還，而以廣州、福州、上海和漢口的海關收入作抵。[[89]](#_89_Zhu_Wen_Chang____Zhong_Guo_X)在從1875年到新疆戰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這三年時間內，左宗棠共收到2670萬兩，平均每年收到890萬兩。1878年，清廷批準左宗棠續借350萬兩，其中半數借自匯豐銀行，半數借自中國商人。為了支持打完這場戰爭，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時間內得到協餉共2560萬兩，即平均每年640萬兩。[[90]](#_90_Xu_Zhong_Yue____Dui_Zuo_Zong)

七年之中總數逾5230萬兩協餉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勝利的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應歸功于他的籌劃和戰略，以及他對復雜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當。左宗棠早就決定他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東準噶爾。東干人在那里很活躍，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區——而與之進行決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東北部的巴里坤和奇臺這兩個城市獲得充分的供應。為了通過甘肅走廊和這些城市之間的沙漠道路運送糧食和軍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輛大車、2.9萬峰駱駝及5500頭驢和騾。糧食供應是個特別困難的問題。張曜所計劃的在哈密實施的軍墾雖然據說在1875年已開出1.9萬畝土地，但并不產糧。甘肅的糧價本來就很高，在那里啟運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經驗表明，通過肅州和哈密之間艱難險阻的沙漠、隨后又要穿越崎嶇不平的山地把糧食運到巴里坤，這意味著沿途要損耗供應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發現，為北部新疆獲得糧食的一個較經濟的辦法，是應遠到歸化或包頭以及寧夏的一些地點去購買糧食，然后用駱駝運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運往巴里坤。在1876年極困難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軍隊就是從這種來源弄到糧食的。[[91]](#_91_Qin_Han_Cai____Zuo_Wen_Xiang)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還應歸因于這一事實：他現在增多了對歐洲武器或者中國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給他的部隊分配了歐洲制的來復槍，這種槍他曾貯備了1.5萬支。到1876年，新疆清軍的裝備有連發槍、發射12磅或16磅炮彈的鋼炮、克虜伯的撞針槍和一門歐洲大炮（此炮“能致遠數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馬隊之成團者最妙”）。左宗棠在蘭州的兵工廠除了制造槍彈和炮彈（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滿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鋼槍管后膛槍”，這是一位俄國官員所親眼目睹的。左宗棠的有些部隊還在使用舊式劈山炮，但他們似乎沒有繼續使用土炮。[[92]](#_92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左宗棠在新疆的勝利，雖然是由于自己有實力，但也由于對手虛弱之故。烏魯木齊的東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兩年后想起來造反。可是，他們被再一次打敗了。白彥虎在新疆的傳奇中被當作阿訇而為人們所傳誦，他于1874年隨身帶了肅州和敦煌的東干殘余來到北疆。他在距烏魯木齊不遠處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但也像新疆的東干人那樣，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93]](#_93_Ku_Luo_Po_Te_Jin____Lue_Shu)這時，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歐洲方法來訓練他的軍隊。按照1876—1877年訪問過六城地區的一位俄國軍官的估計，他的軍隊總計達45360人。阿古柏已經在向中亞通商洋行這一新開設的英國商號購買現代武器。他也有一個能生產“擊發火器”的兵工廠。可是，他的部隊的士氣卻很低。許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調來的。經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銳的安集延騎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區諸綠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負責征兵的，他們也不時在每年的稅賦外被專橫地大量征款，所以據說在居民及其頭目和官員中都有不滿情緒。[[94]](#_94_Ku_Luo_Po_Te_Jin____Lue_Shu)

甚至俄國人也給清軍以幫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國官員在拜會駐節蘭州的左宗棠時，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隊提供500萬斤糧食，價格極其公道。1876年中期，300萬斤被發往奇臺，這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幫助，因為那時在當地市場上幾乎是粒米不見的。[[95]](#_95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正在此時，左宗棠的部隊在劉錦棠和滿洲將軍金順的率領下，已在新疆發動了進攻。

在烏魯木齊迤北一帶的市鎮上，新疆東干人糾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掙扎。烏魯木齊東北15英里的古牧地城墻很厚，它遭到了劉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擊。左宗棠上報說，有6000名回民被殺，215名被俘；只有幾個回民——包括白彥虎在內——逃掉。次日，即8月18日，烏魯木齊不戰而棄守。但在瑪納斯，金順的裝備較差的軍隊所發動的包圍在將近兩個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將其攻克。他們的城墻被摧毀，幾千名東干人于最后撤出城門之后被消滅。[[96]](#_96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

阿古柏伯克在這時帶了約1.5萬人往東來到吐魯番。他派了一支部隊去協助守衛古牧地和烏魯木齊，但因到達時間過晚而馬上被擊敗。在肅州總部指揮戰事的左宗棠給他的同僚寫信說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頗精。洋槍洋炮外亦有開花炮，但不如官軍之精利，又不善放，一敗即不回頭耳。”[[97]](#_97_Ku_Luo_Po_Te_Jin____Lue_Shu)

阿古柏在達坂城建造碉堡，這是控制通往烏魯木齊和吐魯番之間的要隘的北門鎖鑰。但在4月份當天山山麓積雪融化使軍事行動又能進行時，劉錦棠即進攻達坂城，僅僅四天時間就攻占了此地。[[98]](#_98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i)阿古柏的軍隊中繼續有人開小差，他的那些在諸如阿克蘇等綠洲城市的官員，特別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統治下當過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現在又與清軍有所往來，并且為清軍效勞。左宗棠從肅州致書給即將離開哈密去進攻吐魯番的張曜說，優遇南疆居民是一項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眾，官軍撫之以仁。安集延貪取于民，官軍矯之以寬大。”左宗棠給劉錦棠寫信時指出，要抓獲的兩個主要敵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彥虎，另外還有其“死黨”。左宗棠并不過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達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國人報告說，劉錦棠曾經“非常明智地對待他抓到的俘虜……他給予這些人的待遇，可以預期會產生有利于漢人的良好影響”[[99]](#_99_Ku_Luo_Po_Te_Jin____Lue_Shu)。

阿古柏伯克政權的厄運現在迅速來臨。張曜于4月26日進入吐魯番，同一日劉錦棠也拿下了它西邊40英里的托克遜。阿古柏退到了庫爾勒，幾天以后即在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國馬上四分五裂，諸子爭立。清軍一個接著一個地克復了綠洲市鎮。白彥虎至少在兩次小仗中出現過，但總是得以逃脫。喀什噶爾在12月被清軍收復，阿古柏的長子及白彥虎退入俄國境內。1878年1月，清軍已光復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國人手中。[[100]](#_100_Guan_Yu_1878__1879Nian_Jian)關于這個問題的外交危機自然要求擺出一副軍事態勢，左宗棠的部隊要長期留駐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總部遷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討和戰問題（見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請應在新疆設行省。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發現有中國的商人、農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遷入東疆，因此他相信，有一個完全不同于僅僅處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組織，就會使這一地區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101]](#_101___Zuo_Wen_Xiang_Gong_Quan_J)左宗棠的建議，雖在細節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諸實行，也就在這一年劉錦棠變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撫（供職期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確的動機是想節省新疆龐大勇營的維持費用，因為甚至在伊犁危機以后這筆費用也每年高達790萬兩。改新疆為行省，便可預期把現有的軍隊減少到3.1人。他們將被編入綠營，由外省調撥協餉供給給養，每年所費擬減至480萬兩（此數之30%將代新疆轉撥給甘肅，以彌補該省為新疆輸送軍需品等支出的費用）。與此同時，新疆的稅收體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該省在財政上最后能達到自給的程度。[[102]](#_102_Jian_Yue_Se_Fen__Nai_Lan__Z)

在行政組織上，新疆將有一位巡撫駐烏魯木齊，全省擬劃分為26個州縣、10個廳、6個府和4個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調查。從1140萬畝可耕地中可征收實物稅糧食2000萬斤，飼草1390萬斤；現金稅額僅被定為57952兩。舊時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繼續留用，在新制度下當鄉約或書吏。他們實際上是稅吏，而且“鄉約之借勢虐民，與昔日之伯克無異也”[[103]](#_103_Ceng_Wen_Wu____Zhong_Guo_Ji)。這里也開征厘金稅，但在1892年即予以取消，因為它一年只不過收入厘金2萬兩略強一點。根據圣彼得堡條約（1881年），俄國商人在新疆享有“臨時的”豁免納稅的身份，因此他們事實上經營著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貿易。由于他們免交厘金稅，所以要開征厘金，就不過意味著鼓勵所有其他商人去與俄國人合伙而已。來之不易的中國的這個新行省，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好，使之足與俄國的影響相抗衡，因為俄國的影響有比阿古柏伯克強大得多的軍事實力做后盾。

## 李鴻章與海防

作為1870—1895年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區搞好防衛準備工作的主要倡導人。1872—1885年清政府在自強的名義下實施的計劃，約有五分之四是經李鴻章之手主辦的。[[104]](#_104_Guan_Yu_Li_Hong_Zhang_Zhu_B)其中有一項是北洋海軍建設，這是中國幾支艦隊中最好的一支。李鴻章也是淮軍——顯然是清帝國最精銳的一支軍隊——公認的首領，雖然并無正式頭銜。可是，他的權力并非占有壓倒優勢。他不僅要按照列強時刻警惕地捍衛著的條約體系行事，而且還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員的復雜派系政治斗爭之中，更不要說還要觀察那位善變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臉色了。李鴻章的活動還受到麻煩的財政制度及各級既得利益集團的限制。他在直隸的職位也不是萬無一失的。當左宗棠1881年從新疆回到北京時，醇親王就顯然有意讓他接替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位置。[[105]](#_105_Liu_Guang_Jing____Dui_Qing)李鴻章必須作妥協才能保持權力，這無疑影響了他的革新計劃的質量；但是沒有這妥協，也就根本不會有這些計劃。

李鴻章之所以對清朝有價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無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龐大的勇營。到1871年，淮軍約達4.5萬人，其中13500名駐扎在直隸。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隊分別駐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人）、江蘇（4500人）及陜西（2萬人）。在后來的年代中，李鴻章的部隊仍然是主要的保衛力量，不僅在直隸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別由各該省督撫統帶——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中，淮軍既戰斗在東京，也戰斗在臺灣；而在1894—1895年與日本發生的沖突中，李鴻章的軍隊也在各主要戰線上作戰。[[106]](#_106_Liu_Guang_Jing____Dui_Qing)

### 淮軍和它的問題

李鴻章1870年到達直隸后不久，他就開始把直隸的各西式訓練部隊統編到他自己的軍事組織中來，希望能更好地使用這些地方力量。他開始從該省約6000名綠營練軍辦起，想使他們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諸實行的同樣的操練和軍事教育。他也分別獲得北京的批準，任命淮軍統領為該省綠營兵制中的高級軍官。崇厚的洋槍洋炮團隊被李鴻章接收過來后，也重新加以訓練。李鴻章重新給大沽口設防，并在距河口10英里的瀕河處建立了一座戰略性的城池。他還擴建了天津制造局，為此目的他從天津關稅中攤了一部分款子。[[107]](#_107_Si_Pei_Ke_Tuo____Li_Hong_Zh)

李鴻章似乎把淮軍的訓練交給了直隸的三位統領，其中以周盛傳（1833—1985年）最為積極認真。周盛傳是一位身經對太平軍和對捻軍戰爭的宿將，在19世紀70年代統帶著淮軍中裝備最好的一支勁旅，通常他管轄1萬多人。和李鴻章一樣，周盛傳也極端強調現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當通曉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鴻章推薦要購買克虜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現代來復槍，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給李鴻章的呈文和他給自己部隊下達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僅要弄到和保養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統地訓練官兵去使用它們。[[108]](#_108_Zhou_Sheng_Chuan____Zhou_Wu)

周盛傳和其他勇營統領不一樣的是，他還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練的優越性。他不僅印發操典，而且經常親自監督他的軍隊的操練，他還不斷告誡營官和哨官也要參加操練。對優秀神槍手又是發獎金，又是發“功牌”；操演不好者則要受處分。曾在19世紀70年代被李鴻章送往德國受過訓的淮軍軍官之一的查連標，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別受到周盛傳的表揚。[[109]](#_109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

雖然周盛傳不想在他的部隊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經常向外國人求教。但是，他對外國人的批評所采取的態度，一般是進行辯護，有時則嗤之以鼻。例如，戈登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機中回到中國時，他就很懷疑戈登的大部分軍事建議；他甚至責怪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國軍官不懂得夜戰和臥射的優越性。有時，周盛傳也分明誤解了外國人建議的要點：例如他就曾譏笑過戈登關于游擊式運動戰法的主張。可是，他指責戈登低估了高級技術的重要性，這又似乎是相當對的。[[110]](#_110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周盛傳和李鴻章一樣，對應用科學（特別是醫藥）和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如電報、鐵路）有著持續不衰的興趣。至少用當時的中國標準來看，周盛傳所部的各營是第一流的武裝力量。日本人、德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對他的軍隊的報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贊揚之聲。[[111]](#_111_Fu_Dao_An_Zheng____Lin_Bang)但是，周盛傳本人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就曾幾次指出說：這支軍隊已在走下坡路；它經過20年的征戰之后已耗盡銳氣，暮氣沉沉。問題不是在裝備方面，而是在勇營制度的軍官的挑選和提升方面。周盛傳抱怨說，有經驗的軍官缺乏朝氣，而新手又缺少知識。盡管周盛傳屢屢告誡他的營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樣艱苦地參加操練，但軍官們仍拒不上操。他們把這當作丟臉的事。周盛傳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國人的觀察都注意到了這一有決定意義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但顯然是束手無策，坐視莫救。[[112]](#_112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周盛傳的軍官們想方設法要擠進清朝的官僚階層，哪怕是擠進綠營的官僚集團也好，可是他們缺乏職業軍人的榮譽感。

周盛傳軍隊的主要問題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營。每當德國顧問們建議對勇營的組織進行任何細小的修改，他也幾乎總是一成不變地加以反對。雖然周盛傳知道法國和德國都實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認為這辦法不適合中國國情。他對上述建議作出的讓步，就是提議勇營兵中每營所擁有的50名長夫應給予機會使之變成士兵。[[113]](#_113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周盛傳很贊賞作為淮軍特點的家長式統治和人與人之間的精誠團結關系。事實上他也把許多親戚安插在他的部隊中。雖然他本人很欣賞像查連標那樣受過外國教育的軍官的技術和知識，但周盛傳很少推薦他們獲得勇營軍官垂涎三尺的綠營軍階和官職。顯然，周盛傳和李鴻章沒有這些特殊薦舉的客觀標準。[[114]](#_114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

在周盛傳的部隊中有吸鴉片煙、賭博和欺壓老百姓等常見的惡習的人比較少，但是他確實仍一有機會就要告誡官兵們應注意道德和軍隊風紀。[[115]](#_115_Jian_Zhou_Sheng_Chuan_De_Ju)淮軍訓練計劃的效率，一定因執行一些有價值的、但非軍事性的任務而受到損害。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傳的部隊經常奉命參加建設工程，參加墾荒、屯田，還參加一些救災活動。[[116]](#_116___Zhou_Wu_Zhuang_Gong_Yi_Sh)

同時，淮軍也繼續受北京財政政策變化莫測的影響。李鴻章為反對餉項收入的日益削減而奮斗不息，這在文獻上是有充分的記載的。在70年代，整個淮軍的歲入平均遠遠超過300萬兩，但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減少到不足250萬兩。[[117]](#_117_Si_Pei_Ke_Tuo____Li_Hong_Zh)武器價格高昂，迫使李鴻章向士兵（理論上還有軍官們）連續支付原定薪餉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為積欠在退伍時償清。北京確實向各省施加壓力，以促使它們把駐直隸的淮軍的軍費撥給李鴻章，并使撥款至少保持在削減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監督淮軍的某些具體的支出。淮軍要服從戶部“造冊報銷”的規定，而且戶部在很長時期以來拒不承認每個營長夫的搬運、燃料和餉項等費用為合法的開支。[[118]](#_118_Wang_Er_Min____Huai_Jun_Zhi)盡管李鴻章負責清帝國最精銳的軍隊，他顯然仍須指望北京給他的軍隊以財政支持，因此他必須做出各種妥協。就是在這種局面下，以及在勇營制度本身的基礎上，李鴻章努力建設了一支現代化的海軍。

### 建設一支海軍

李鴻章關于海軍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辯論中具體化的。雖然他仍然覺得海軍不像陸軍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議反映了一種日益關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證沿海的安全，包括緊鄰滿洲和華北的朝鮮的安全在內。一個明顯的需要是迅速獲得現代化的軍艦。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上海和福州兩個主要造船廠甚至付出高得不敢問津的代價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得到清帝的支持，著手從國外買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間人。1875年4月李鴻章通過赫德向英國訂購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訂購了四艘。但是，他開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國海軍計劃的競爭者（見上卷第十章）。于是，李鴻章通過別人來買船，而赫德也撇開李鴻章向其他督撫供應訂貨。他們兩人各自出于種種原因，試圖總攬武器的購買事宜，但都沒有成功。[[119]](#_119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李鴻章從不認為，整個中國海岸只由一支水師負責在政治上是可行的。19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反對總理衙門關于設置一位統帥負責沿海和長江諸省防務的建議，盡管他可能是這一職位最有希望的候選人。在盡力解決一個互不協調的陸海軍制度的時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負主要的責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駐節天津的李鴻章、駐節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官員們相繼而起，買船成風。可以預計，結果是造成了一場混亂。建立起來了四支互不統屬的艦隊：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領一支，福州船政局統帶一支，駐節廣州的總督也統帶一支。還有一些舊式水上部隊，包括長江水師在內。這些部隊的武器、船只和訓練，不僅在地區與地區之間迥然不同，甚至在一個號令系統內也各吹各的號。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導方針（盡管赫德有過這樣的建議），各省官員經常被狡詐的軍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鴻章也未能免遭他們的擺布，歐洲和美國來的軍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門、他的統領們和他的外國顧問們那里進進出出。[[120]](#_120_He_Tian_Jue____Zhong_Guo_De)

李鴻章的財政資源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多。在1875年清帝許諾的每年400萬兩“海防經費”中，到1877年后期李鴻章只收到總數不足二百萬兩，因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壓力，要它們給左宗棠遠征新疆之役提供經費。可是，李鴻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別是沈葆楨——的合作，還是能夠擴充他的艦隊。沈葆楨把原來南洋水師訂購的四艘英制炮艇讓給了李鴻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機期間俄國的海軍威脅發生之后，李鴻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國定造兩艘斯特汀式鐵甲艦和一艘鋼甲巡洋艦。它們的財政來源有下列幾個方面：“海防經費”項下的各種撥款；輪船招商局為償付政府過去債款轉來的100萬兩；皖南鹽商捐贈的60萬兩；以及向專用于外交用途的海關收入所借的“借款”。[[121]](#_121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1881年訂購的德國船只直到中法戰爭以后才運到。與此同時，李鴻章還計劃在滿洲南端的旅順口搞一個大型船舶修造廠。旅順和山東的威海衛將成為他的海軍基地。

1882年，清帝國可以號稱它擁有約50艘戰艦，其中約半數為中國自造。李鴻章直接經管著12艘船——8艘小炮艇，兩艘1350噸的巡洋艦（通過赫德向英國阿摩士莊廠定造），以及兩艘福州船政局的產品。美國海軍準將舒斐爾特（1881年李鴻章顯然曾考慮要讓他暫管北洋艦隊）贊揚了他所視察的英制船只，他說：“每一項現代海戰工藝器械都裝備到了這些新艦艇上：用水力操縱的具有大口徑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機關槍、電燈、魚雷和魚雷艇，雙螺旋槳引擎，鋼制金屬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確，這個艦隊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顯然，若要使它確實發揮效益，它還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隊伍和一個完善的組織。”[[122]](#_122_Shu_Fei_Er_Te_Gei_Can_Yi_Yu)

李鴻章不是沒有覺察到人事方面的問題。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學生使團去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總理衙門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學生，李鴻章對這一意見作了妥協，這部分的是因為，與1868年的蒲安臣條約相反，安納波利斯軍校和西點軍校不接受中國學生受訓。1876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個電動魚雷廠。也就在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軍軍官去德國學習戰爭技術。但在19世紀70年代，為中國的海軍提供軍官的最好的來源是福州船政局訓練的士官生。雖然江南機器制造總局有一個小規模的船上訓練計劃，但在福州舉辦的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被認為更加完備。[[123]](#_123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

到了1873年秋天，4名從福州船政局修船科畢業的士官生已取得艦長或大副的資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將獲得同樣的軍階，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資格。一年以后，14名輪機艙科的畢業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師則等待分配。李鴻章急于想利用這批由在華洋人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學生經李鴻章和沈葆楨的薦舉被派到歐洲去深造（見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國后，他們都在艦只上或福州船政局獲得了重要的職位。有幾個人為李鴻章效勞。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趨衰落，這部分是因為現在已沒有什么洋員留任。頭兩任船政大臣沈葆楨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較差的人員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評為軟、懶、貪的攤子。行政經費被削減，這表明北京和省級官員都對它減少了興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諭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說，在多年的代價高昂的訓練之后，中國海軍學生仍然不知道怎樣駕駛船只。雖然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爭所調唆出來的，但從歐洲留學回來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確未博得信任。李鴻章本人也把他們形容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124]](#_124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

李鴻章現在想法尋找一個更可靠的來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訓練的中國海軍軍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開辦了自己的水師學堂。它的第一任學監是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生嚴復，他在格林威治深造過，后因翻譯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譯家的盛名。水師學堂的外國教官包括海關派來的三位官員和一名年輕的美國人阿靈敦。1882年，李鴻章通過赫德招來了英國海軍軍官瑯威理，此人曾幫助把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訂購的幾艘阿摩上莊船只弄回中國。瑯威理給李鴻章當了約兩年北洋水師總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編制內。作為海軍提督丁汝昌（曾任淮軍騎兵軍官）的副手，瑯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李鴻章艦艇上的現役人員。[[125]](#_125_Fei_Zheng_Qing_Deng_Bian)

天津水師學堂在主要課程和學制方面（見上卷第十章）類似于福州船政學堂的英語班。它開設兩個科：一為1881年開設的駕駛科，一為1882年開設的輪機科。為了想吸引那些不進學堂就會受科舉制度引誘的才智之士，李鴻章在水師學堂的告示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新式艦只將給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進入仕途的新機會。在說到福州畢業生的時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經學有所成……而且當上了艦長。有些人現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過了勛章。”[[126]](#_126_Yin_Zi_Luo_Lin_Sen___Zhong)這水師學堂的第一批學生只經過三年學習就畢了業。他們在中法戰爭中處于戒備狀態的艦艇上繼續接受訓練。雖然北洋艦隊幾乎沒有參加這次沖突，但是由于英國是中立國家，瑯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國海軍的現役。他的一位臨時的繼任者德國人式百齡，完全是一個無能之輩。瑯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國海軍中工作。

## 中法戰爭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是對中國過去20年間所執行的新式陸海軍計劃的第一次外部考驗。中國的日子并不好過。在兩年之內的陸上和海上的零星戰斗中，中國人在經費、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中國丟失了對安南（中國人對越南的稱呼）傳統的宗主權，而且必須讓法國人在商業上侵入華南內地諸省（見第二章）。

可是，法國的勝利也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勝利。[[127]](#_127_Chu_Le_Bie_De_Zhu_Zuo_Yi_Wa)在中國于1884年“非正式”宣戰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劉永福的黑旗軍有效地在東京困擾法國人，有時設壕作戰，有時巧設埋伏以伺機狙擊。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軍官王德榜統率勇營參加作戰，在北黎附近經過三天苦戰之后打敗了法國人。8月初，著名的淮軍將領劉銘傳率領的軍隊打退了法國艦隊司令禮士卑士對臺灣基隆要塞的進攻；10月份，法國人又在淡水遭到嚴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國人在中國—安南邊境的鎮南關擊敗了法軍，并且在往后的兩個星期中接連收復了重鎮諒山和安南的其他據點。在某些人看來，當和平談判迫使雙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敵對行動時，中國人正在勝利的邊沿。

然而，中國的外交和戰略形勢實際上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關系和中日關系因中國在朝鮮的地位問題而鬧得很緊張，而且謠傳法國人正想在北面幫助日本人與中國交戰。[[128]](#_128_Yi_Si_Te_Men____1880__1885N)此外，中國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嚴重困難而大傷腦筋。正當北京的決策人繼續舉棋不定時，省一級督撫官員卻完全陷于思想混亂之中。這種混亂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福州地方上，因為1884年8月23日這里的11艘艦只組成的中國建造的“現代”艦隊，不到一小時就被法國人摧毀。隨著福州這次創巨痛深的慘敗之后，以江蘇為基地的南洋艦隊也由于領導無方、訓練糟糕和紀律松弛，在試圖打破孤拔將軍對臺灣的封鎖時大敗虧輸。

甚至中國在陸戰中的勝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劉永福在東京取得的有限的勝利，部分是由于黑旗軍在非正規戰爭中東奔西突的勇氣，但是這些遭遇戰也表明了法國人的弱點：猶疑不定，后勤困難，戰術措置失宜，完全缺乏準備。當1883年12月13—16日法國人在山西發動一次協同一致的攻勢時，黑旗軍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擊”。法軍在四個月后占領北寧的時候，劉永福據說是不戰而退的。[[129]](#_129_Kao_Er_Die____Zhong_Guo_Yu)甚至經常被吹噓為中國大捷的諒山之戰，法軍之戰敗似乎不是由于清軍的戰斗力高和訓練有素，而是由于人數上占壓倒優勢以及法軍供應上存在的問題。目擊者的記述表明，尼格里將軍的部隊極端缺乏火藥和其他供應，因為法國的“苦力隊”大批地開了小差。根據一位西方觀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國人認為是同情中國人的）的說法，諒山地區的清軍裝備得很好，但訓練和領導都極差。[[130]](#_130___Bei_Hua_Jie_Bao____1885Ni)勝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國軍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為沒有中國軍事制度影響的緣故，而且中國人的傷亡幾乎總是比法國人的傷亡大得多。只有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才能夠一比一地堅持與法國人交戰，這大部分應歸功于劉銘傳的精明的準備工作和幾位淮軍軍官的指揮才干。[[131]](#_131_Liu_Ming_Chuan____Liu_Zhuan)

李鴻章通常被指責應對中國海軍在中法戰爭中的覆沒負有責任。批評家們認為，如果他一旦接到請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艦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艦隊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國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戰時只顧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鴻章之專注于北方防務是情有可原的，甚至連張之洞也認識到這一點，這特別是因為日本在朝鮮的活動正在日益加緊。此外，就法國人來說，他們實際上也打算進犯北方。他們之所以還不敢放手進攻華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鴻章的部隊。[[132]](#_132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李鴻章雖然很明顯地不急于以反對法國人來考驗他的艦隊，但他并不缺乏愛國精神。中國所處的復雜的國際局勢以及整個清帝國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對法國的挑戰作出迅速而舉國一致的反應。

### 海軍衙門和北洋海軍

雖然某些文人和官員相信，中國在1884—1885年與法國作戰時實際上是打贏了陸戰，但是，中國海軍的缺點卻是暴露無遺了。有許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應謀求更集中的協同作戰。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國藩就已經提議，需要把海軍船只置于單一的指揮之下。[[133]](#_133_Wang_Jia_Jian____Qing_Ji_De)1885年這個意見至少在名義上突然變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軍衙門，以醇親王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而以慶親王奕劻（1836—1916年）和李鴻章為會同辦理大臣。這一“中國海軍部”的組織可以比得上總理衙門，它最后擁有6名幫辦，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員則主要是滿人。[[134]](#_134_Wang_Jia_Jian____Qing_Ji_De)醇親王本人這時似乎已轉而相信自強運動。但海軍衙門應該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后及其寵幸們所搞的鬼把戲，意在與李鴻章分享北京能從各省提取的經費，雖然它表面上的動機是無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宮廷政治中發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擊恭親王和軍機處應對東京的軍事挫敗負責，作為攝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個軍機處，而以禮親王（世鐸）為首的五名新軍機大臣來接替。恭親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從總理衙門免職，它的領導權交給了慶親王。作為年輕皇帝的父親，醇親王不便在軍機處或總理衙門供職，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諭，“著醇親王奕譞（就軍機處事宜）一并與議具奏”[[135]](#_135_Wu_Xiang_Xiang____Wan_Qing)。醇親王的心腹顧問中有孫毓汶：這是一位精明而貪得無厭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軍機處供職，直至1895年，即醇親王死后的第四年。[[136]](#_136_Tong_Shang_Shu__Di_131Ye)

雖然醇親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機期間也站在“主戰派”一邊，但他過去對海軍事務卻不感興趣。他曾給神機營買過西洋軍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開始以矛盾復雜的心情對鐵路和機器開礦表示興趣。[[137]](#_137_Zhong_Guo_Ke_Xue_Yuan_Jin_D)他和慈禧太后之決定成立海軍衙門，無疑是受了李鴻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個星期逗留時的影響的結果，那時這個計劃正被提出來反復加以研究。

李鴻章非常急需經費來維持和建立他的艦隊及其相關的設施。雖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鮮問題簽訂了協議，李鴻章仍然相信，中國遲早會因它的這一最鄰近的藩屬而與日本相對抗。醇親王也能夠看到朝鮮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異母兄弟和政敵恭親王由于反對慈禧太后喜愛豪奢的苑囿宮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憤怒。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每年只從各省收到約60萬兩用作海防經費。[[138]](#_138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軍衙門看作這樣一種手段，即它將迫使各省在滿足皇室的園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為海軍多出經費。李鴻章別無其他選擇，實際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現在給各省施加壓力，要他們給海軍衙門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經費四百萬兩，按照上諭所說，甚至為此削減綠營和勇營兵額以及廢除海軍的中國帆船式戰船和無用的陳舊輪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設“海防捐”。為此目的，公開實行賣官鬻爵，官員被鼓勵出錢來“報效”，以使自己能夠晉升或使過去的瀆職行為得到寬恕。[[139]](#_139_Bao_Zun_Peng____Qing_Ji_Hai)

慈禧的當務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宮西面圍繞三海的、有許多亭臺樓閣的御花園，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離宮。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滿洲的四大富裕貴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內）幫助苑囿的建設，即伸手要他們捐錢。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幾家共捐出24萬兩。1886年1月的一道上諭，公開為三海建設要求粵海關監督幫助經費，而且還要求海軍衙門本身作為“借款”提供款項。醇親王在12月份寫信給李鴻章說：神機營和海軍衙門已從當時籌措到的220兩中提供了75萬兩，但池苑工程還需要更多的錢。因此，醇親王建議李鴻章應該籌集更多的經費。他希望李鴻章的衙署能幫助弄到一筆70萬兩的外債，其名義是“可否指稱創建京師水操學堂或貴處某事”。李鴻章只得照辦，而且他顯然在這筆外債中增借了22.7萬兩，以用于他的艦隊。這筆錢由當時正在幫助李鴻章搞直隸北部鐵路計劃（這計劃得到海軍衙門的贊助）的伍廷芳來籌措，而由德商泰來銀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總數為500萬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莊和芝罘海關收入于15年內償清。[[140]](#_140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李鴻章最后放棄了他籌款不舉外債的原則——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這樣做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每年從海軍衙門收取他的應得份額約150萬兩（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過是記在海軍衙門賬上）。他也從海軍衙門接受數額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應付特殊需要。他分別通過駐英國與駐德國公使曾紀澤和許景澄在1886—1887年訂購了兩艘新的英國巡洋艦和兩艘德國巡洋艦。（前駐德國公使李鳳苞在訂購李鴻章的頭三艘德國艦只時被指控收受了大量個人傭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職。）[[141]](#_141_Bao_Zun_Peng____Qing_Ji_Hai)1888年當新的巡洋艦到達時，李鴻章訂出一套北洋海軍章程，重新組織了他的艦隊。這個章程的內容把英國海軍的實際做法、勇營的制度和綠營兵的術語，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將由兩員小軍艦艦長輔佐，他們被授予總兵銜，各指揮一艘7430噸的鐵甲艦。從2300噸到2850噸的幾條巡洋艦則交給軍銜為副將的艦長統帶。這些艦長一方面得服從提督調動，一方面對自己的艦艇又享有完全的權威，并完全有權指揮支應委員以及管好受訓的學生。[[142]](#_142___Bei_Yang_Hai_Jun_Zhang_Ch)這是一支給人印象深刻的艦隊，它擁有兩艘鐵甲艦、7艘巡洋艦、6艘炮艇和6艘魚雷艇。

可是，李鴻章發現他不能進一步擴充他的艦隊，雖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購買一種更新式的、經過改進的船只。困難是在財政方面，因為慈禧現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頤和園的計劃。她從海防經費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錢來建造頤和園，其確切數目是難以弄清楚的。但是我們發現，醇親王在1888年11月給李鴻章寫信，要求他向幾個省的督撫們籌款200萬兩，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進一步修造這座避暑離宮。[[143]](#_143_Guan_Yu_Chun_Qin_Wang_De_Qi)可是，這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因為1891年3—6月清帝批準了海軍衙門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議頤和園的建筑款項應取自海防捐款和駐外使團專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諭中宣稱，他愿為皇“母”提供休憩頤養的環境以娛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對待他的母親那樣。[[144]](#_144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皇室的倫常顯然允許這樣胡亂花錢，以盡孝道。

在這同時，北洋海軍在1889—1890年繼續每年收到約130萬兩，勉強夠維持它現有的艦隊、設備和人員。1890年，旅順口海軍基地裝備了一個400英尺長的磚石船塢，以蒸汽作動力，俯臨一個疏浚達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總共花費了300多萬兩（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鴻章因此不能給他的艦隊增添一條船了。顯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斷增加和許多諂諛之徒從夏宮的修建中漁利，海軍衙門向清帝建議“停購船械”。[[145]](#_145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

可是，經費來源不足還不是李鴻章的海軍所面臨的唯一困難。在籌措經費和保護自己的權力的同時，李鴻章還在想方設法解決對合格人員日益增加的需要的問題。隨著福州船政局的日就敗落，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成了培養下級海軍軍官的主要來源。1888年，李鴻章在瑯威理的幫助下改組了水師學堂；瑯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國的。水師學堂的重訂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國的海軍訓練趕上西方的現代實際水平。入學要求被提高了，學習年限延長到六年零九個月（包括27個月的艦上訓練），定期考試也被規劃出來了。章程也包括了關于獎懲、提升和海軍禮儀等復雜細致的規定。畢業生還被授予候補千總的身份。[[146]](#_146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旅順口、威海衛、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據點，還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訓練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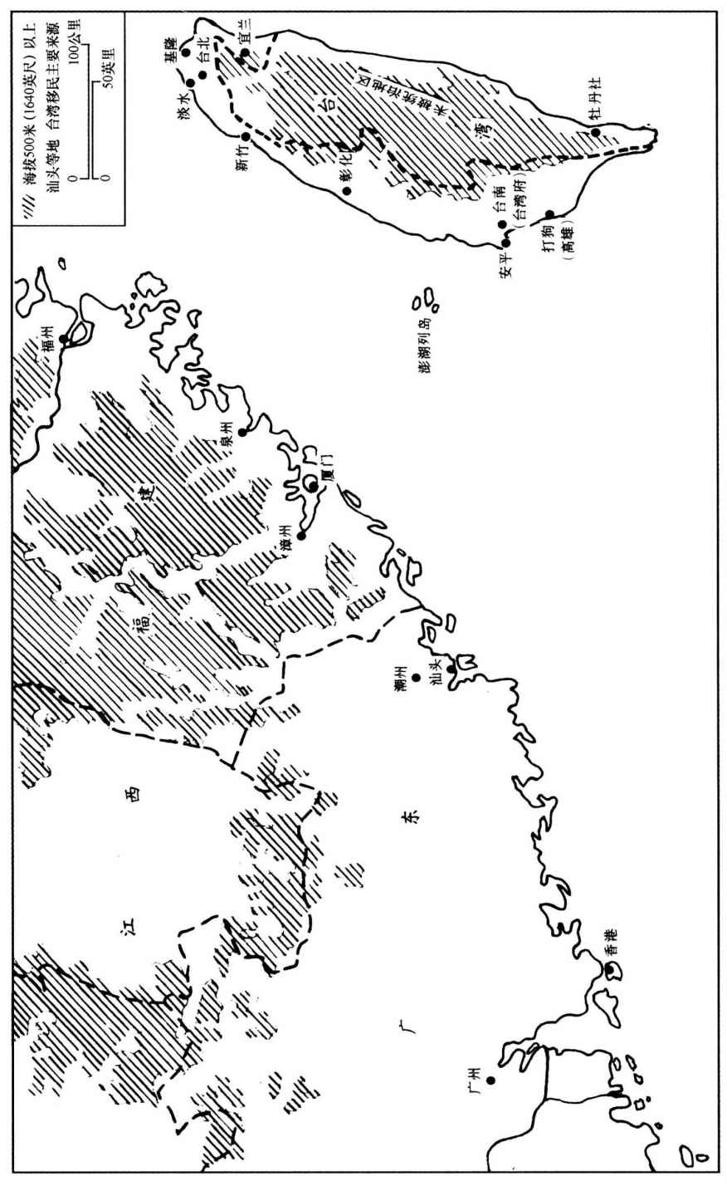
可是，有些中國的高級海軍人員的特點是驕傲自大和爾虞我詐。福州船政學堂出身的高級軍官與其他地區來的軍官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有些高級軍官對瑯威理的非常寶貴的工作表示不滿，所以瑯威理稱這般人為“既愚昧又嫉恨別人的人”[[147]](#_147_Luo_Lin_Sen____Zhong_Guo_Fa)。這些緊張關系，再加上瑯威理在中國軍隊中的地位不明確，造成了一次事件，從而使他在1890年辭職。瑯威理的去職特別不幸。它不僅促使中國學生被排除于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的標準也為之下降。赫德曾經非常痛惜瑯威理的辭職，可是也承認他的僵硬態度使他陷入了麻煩的境地。[[148]](#_148___Bei_Hua_Jie_Bao____1890Ni)

與此同時，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正在試圖改進海軍訓練，當然，他們的資源必然比李鴻章更受限制。在廣州，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開設了廣東水陸師學堂，其基礎是原淮軍將領張樹聲總督1881年在黃埔早已開辦的一所訓練學校。雖然在理論上張之洞認為海陸軍訓練同樣重要，實際上廣東地處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視海軍。黃埔學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開辦的，它吸收了這兩個學校原來的師生員工。吳仲翔曾在福州做過10年學監，并幫助李鴻章創辦過天津學堂，現在當上了張之洞學堂海軍部分的第一任負責人。雖然海軍部分在1887年開始時有70多名學生，后來又至少從福州轉來了37名學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25名士官生。財政拮據可能是享受公費補助的學生人數嚴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張之洞又要強調中文學習，又要強調海軍技術，這也一定打擊了許多學生的學習情緒。士官生在學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讀經，以“鞏固根本”。李鴻章的天津水師學堂不允許學生應科舉考試，可是，張之洞卻準許他的士官生這樣做。張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調任是對學堂的一個打擊。他的繼任李瀚章對擴充學堂的計劃橫加阻撓，而在1892—1894年，臭名遠揚的保守派、廣東巡撫剛毅則蓄意摧毀了這個計劃。在剛毅的任期內，廣東水陸師學堂遭停辦，洋員被解聘，廣東小艦隊的現代化船只常年投閑置散，拋錨而不開動了。[[149]](#_149_Ai_Er_Si____Zhang_Zhi_Dong)

在北京避暑離宮附近，于1887年創立了一所所謂昆明湖水師學堂，以此來證明海軍衙門的開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訓了約四十名滿洲生員，以便他們去天津水師學堂深造。曾國荃在南京遲至1890年才開設的南洋水師學堂則不那么被人們所恥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師學堂的榜樣，意在為南洋艦隊提供軍官。據報道，它的入學要求是嚴格的，課程是完備的，師資（有幾位教師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優秀學生，而且經費顯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戰爭后才畢業。[[150]](#_150_Bao_Zun_Peng____Zhong_Guo_H)

### 劉銘傳在臺灣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驟以加強帝國的海疆。10月12日，即宣布海軍衙門成立之當日，宣布了一道上諭：把前此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臺的臺灣單獨另設行省，而以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是原淮軍將領，以打敗太平軍和捻軍而蜚聲國內，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國人入侵中負責防守臺灣。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撫，駐節在臺灣。現在他將就任清帝國第二十個行省的巡撫。（福建巡撫之職將由駐節福州的閩浙總督兼任。）劉銘傳將單獨負責臺灣的人事安排，特別要對軍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負責。[[151]](#_15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清廷終于遲遲地認識到了臺灣的戰略重要性及其經濟潛力。



地圖12 19世紀后期的臺灣

自1683年清朝征服臺灣島上國姓爺的后裔之后幾乎兩百年期間，被葡萄牙人稱為福摩薩的這個島，對滿洲人來說是一個邊境地區，要放棄它就太危險了。它那里隱匿著許多不同政見者，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來反對清朝。可是，北京還不能貫徹限制中國人從大陸移向臺灣的法令。清朝自18世紀中葉以來在那里的記錄是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間它不時對起義進行鎮壓。英國艦船在鴉片戰爭中炮轟基隆和在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為條約通商口岸，才開始使北京憬悟到這個島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該島一事，才真正使幾位政治家相信加強其防務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機期間任欽差大臣的沈葆楨在臺灣呆了一年，他安裝了海岸炮臺，并且計劃在基隆搞一個機器開采的煤礦。1875—1877年任福建巡撫的丁日昌對臺灣事務給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際視察過該島。他目睹過基隆各礦第一次用機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臺灣府（臺南）和打狗之間的一條30英里長的電報線在1877年才得以鋪設。丁日昌還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想把臺灣建成華南的海軍基地；建一條縱貫該島南北的鐵路以便利戰時運兵。這些設想原則上雖已被清帝批準，但各個方面都不給予財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財源的閩浙總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視察了島上的綠營兵，發現貪污成風，例如有許多“士兵”只在花名冊上列有虛名。由于他的建議，至少臺灣的10名綠營軍官被裁汰，包括總兵和一員副將在內。可是，丁日昌本人對有機會在臺灣貫徹他正在進行的各項革新事業的這一幻想也破滅了。從1875年以來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擊，其兇險程度較之李鴻章所受到的攻擊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攻擊得特別厲害的是他想擁有鐵甲艦和傾向西學的觀點。丁日昌于是乞病（這也是實情），請辭去福建巡撫職務；這辭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152]](#_152_Lu_Shi_Qiang____Ding_Ri_Cha)

丁日昌對臺灣的幻想現在等待劉銘傳巡撫去實現了。劉銘傳在中法之戰之后來到臺灣就任，他得到的財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們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關稅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達45萬兩，后來還略有增加。這筆款項都被撥做臺灣陸軍費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給劉銘傳80萬兩，為期五年。這個數目由福建省庫和福州海關出資44萬兩，另由上海、九江、漢口、寧波和廣州等海關出36萬兩。[[153]](#_153___Liu_Zhuang_Su_Gong_Zou_Yi)鑒于他的計劃龐大，劉銘傳的總收入還是不豐裕的。他被當時的外國人譽為“非凡的中國官員”，不過，一位現代的審慎的學者把他五年的巡撫政績評為“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記錄”[[154]](#_154_Dai_Wei_Xun____Fu_Mo_Sa_Dao)。

劉銘傳忠實信奉李鴻章關于武裝備戰的重要性的主張，所以他馬上通過歐美商號大批訂購大炮和槍支。在劉銘傳以前，沈葆楨、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經用大炮裝備了臺灣和澎湖的要塞。從1856年開始的三年內，劉銘傳給臺灣和澎湖的炮兵掩體增加了31門新的阿摩士莊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徑是9—12英寸。他還買了1萬支后膛槍，并計劃在臺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廠，他到1886年花了兩萬多兩建造工廠，花了8.4萬兩買機器、金屬和更多的槍支及子彈。這座新兵工廠約有300名雇工，在一員德國工程師的帶領下工作，它向劉銘傳的部隊提供槍炮的子彈，而且當1887年劉銘傳為臺灣鋪設鐵路的計劃開始的時候，它的金工車間被證明是極其有價值的。[[155]](#_155_Si_Pai_De_Er____1884__1891N)

早在1886年，劉銘傳就計劃在臺北和臺南之間搞電報，搞海底電線把臺灣、澎湖和福州連接起來：所有這一切計劃都被認為在軍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與德商泰來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簽訂了合同，這兩條線路在1887年完成，此時正是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了電報總局以后的第五年。[[156]](#_156_Zhu_Chang_Jun____Liu_Ming_C)

正如他在打太平軍及捻軍的年代那樣，劉銘傳這位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不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還急于讓他的士兵實行西法操練。劉銘傳認為，臺灣島上的綠營兵在全國是最下乘的。它的名義上編制是1.4萬名，實際數字在1884—1885年是4500名。劉銘傳著手搞一項重新訓練的計劃，從優秀射手中挑選新軍官。劉銘傳也不滿意臺灣的勇營。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說，湘淮兩軍已成“強弩之末”。他主張，實行新的訓練是絕對必要的，特別是現在當后膛武器已引進國內的時候。“倘令槍碼不明，則遠近高低茫無準的，是有槍與無槍同矣。”[[157]](#_157___Liu_Zhuang_Su_Gong_Zou_Yi)

1885年后期有16營楚勇在臺灣，由左宗棠原來將領之一劉璈率領，此人在1881—1885年任臺灣道臺。劉銘傳現在接管了劉璈的楚勇，還統帶著他本人帶到臺灣來的10營淮軍。淮軍的補充兵員主要從劉銘傳的家鄉合肥取得，這使他到1888年擁有總數達43個營，即2.2萬人馬。兩位歐洲教官訓練著他的士兵。[[158]](#_158_Si_Pai_De_Er____Liu_Ming_Ch)

劉銘傳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規定的五年期滿以后每年還有80萬兩協餉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歲收的辦法，這就是要使農田的實際所有主繳付更多的稅。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調查，而這項工作在清代卻從未在一省的范圍內開展過，除了新建的新疆和臺灣二省以外。李鴻章知道中國農村的既得利益集團壁壘森嚴，所以他在受任直隸總督以后的1870年明確指出：“通省清丈，斷辦不到。”[[159]](#_159___Li_Wen_Zhong_Gong_Quan_Ji)可是，劉銘傳1886年恰恰著手解決了這個問題，結果把臺灣地賦的估計收入從183366兩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兩。

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兩年中，劉銘傳已經成立了兩個清賦局，一在臺北，一在臺南，挨家挨戶編造土地清冊。他正在利用渡過福摩薩海峽而來的移民兩個世紀以來的開拓成果。從18世紀初起，數量不大的人們（有人說臺灣全部是四萬人）曾得到政府的專利執照，準許他們開墾大塊土地。[[160]](#_160_Zhe_Yi_Jie_Guan_Yu_Liu_Ming)可是，這些專利執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實際從事墾殖。反之，他門把每塊土地分給幾個開發者，后者又轉而把地再租給佃戶。當涌入的移民越來越多和地價上漲時，許多開發者實際上又變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戶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這些地主在臺灣被稱為小租戶：他們應向那些專利執照持有者（被尊稱為大租戶）交付他原來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根據傳統，只有執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稅。由于臺灣島上清朝官僚體制的腐朽無能是臭名遠揚的，專利執照持有人往往連并不沉重的地稅也予以規避。例如，劉銘傳驚愕莫名地發現，淡水全縣每年的土地稅僅能收780兩！另外，許多專利執照持有戶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戶常常是具有紳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們根本不納稅。

至少在臺灣北部，劉銘傳贏得了當地紳士領袖人物的合作，稅制改革進行得頗為順利。小租戶是實際的土地所有者，所以發給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們的土地征稅。原來的專利憑照在理論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戶每年向專利執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減少了40%。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臺灣北部實行。可是，這改革在臺灣中部和南部卻遇到了抵抗，這部分是由于土地調查中的種種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發了一次嚴重的起事，它是由當地的地主施九緞領導的。[[161]](#_161_Jian_Si_Pai_De_Er___Liu_Min)雖然新稅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廣，劉銘傳認為必須與臺灣南部的更加鞏固的既得利益集團作出妥協，于是同意了這樣一個方案：某些專利憑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們與土地的關系，而與小租戶一起分擔新征的土地稅。

同時，劉銘傳還想開辟該島的商業財源。他開征了種種厘金稅，但由于外國商人的反對，許多種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征收樟腦稅，不過他不得不準許外國商人免交厘金稅出口。這些收入來源，加上關稅和土地稅的留成（即平余，這是征稅所收之銅錢折算成銀兩的“成色差額”），使得劉銘傳治下的臺灣甚至在1889年協餉已經停解之后歲收總數仍能達到212萬兩。[[162]](#_162___Liu_Zhuang_Su_Gong_Zou_Yi)

劉銘傳用這有限的資財計劃了許多亟待開發的項目：辦鐵路，開航運，采煤，興建一所洋學堂，聘用外國人訓練軍隊。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國都必須為防御日本而進行準備之際，劉銘傳的部隊卻必須在臺灣的高山密林之中與“兇殘的生番”作戰。

臺灣土著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沖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當移民到19世紀80年代估計增加到了250萬人的時候，自然要引起對較低山丘可耕地的爭奪，土著居民在這些地方或是被消滅，或是被趕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隨波逐流并心甘情愿來到臺灣的清朝官員們，從未制定出一項令人滿意的“山區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間的沖突歷久不衰；后者也購買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們經常突襲平原，殺人泄憤。[[163]](#_163_Chu_Le_Qi_Ta_Zhu_Zuo_Yi_Wai)劉銘傳部分地為了便于同他們作戰，部分地為了取得樟腦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條橫亙東西兩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嶺，止于彰化。由于戰斗越來越激烈，數以百計的清軍士兵和幾位最好的淮軍軍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區。劉銘傳在臺灣任職期間合計與“生番”打了40次仗。盡管他使用了機關槍和野戰炮，他的部隊仍吃了幾次大敗仗，例如1889年在宜蘭附近便損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兒在內。清軍的士氣很低；[[164]](#_164_Si_Pai_De_Er____Liu_Ming_Ch)在曠野地方作戰并無戰利品可資擄獲，這就使得這種對土著的戰爭完全不同于打太平軍、捻軍或打回民的戰斗。

劉巡撫既一絲不茍，又富于創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臺劉璈貪污，由此得罪了臺南地區的官僚和地主勢力。為了吸引品性卓異的文官到臺灣服務，他在1886年上奏說：和在新疆一樣，凡到臺灣服官積功滿3年以上者，準其回大陸后優先擢升。劉銘傳不得不從吏部為臺灣掛牌的人員中挑選府縣長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鑒于臺灣環境的特殊，10年之內那里的縣令應由巡撫薦舉，特別是要從有地籍調查經驗的人員中薦舉。吏部認為，該部在臺灣10年停止任免人員的時期太長，而清帝則準許他3年之內可自選縣長。[[165]](#_165___Liu_Zhuang_Su_Gong_Zou_Yi)

和李鴻章一樣，劉銘傳也設專局來經辦他的新事業。但在1889年，清廷強調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諭，要求各省裁減這樣的局及其人員，而凡屬必不可少者，應將它們的財政情況定期上報戶部。[[166]](#_166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當清廷的政策實際上決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時，劉銘傳的倡議就幾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19世紀80年代，甚至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也不得不歸還70年代政府所舉的公債。[[167]](#_167_Jian_Fei_Wei_Kai___Zhong_Gu)

到了1890年，劉銘傳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樣逐漸喪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調查工作也被御史們攻擊一通，說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亂。[[168]](#_168_Si_Pai_De_Er____Liu_Ming_Ch)劉銘傳開設了一個商務局（英文名稱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經費來源一為臺灣官方資金，一為私人所認捐款，特別是新加坡華僑的捐款。雖然它在1888年擁有兩艘英制新輪船，但它在與外國商號的競爭——甚至在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競爭——中，一直賠累。1888年，劉銘傳改組基隆的著名煤礦為官辦的“基隆官煤廠”。但它缺少周轉資本，所以劉銘傳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萬兩的投資，其條件是這個企業應在20年內在臺灣享有壟斷機器提煉煤油及機器采煤的權利。可是，北京拒不批準。為了挽救基隆的煤礦，劉銘傳在1890年6月重新奏請清帝：這些礦井可以交給一位廣東人率領的一批中國人經辦。擴資之后，臺灣政府將出此資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應份額的紅利。從這個跡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勢，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護人李鴻章的影響下降了；因為他為此受到總理衙門及戶部的嚴厲批評，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駁的建議：它們擔心這些投資者的后臺仍是外國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諭給劉銘傳以“革職留任”的處分。[[169]](#_169_Zhu_Chang_Jun____Liu_Ming_C)

1891年6月當劉銘傳辭去臺灣巡撫的時候，他或許有一種慰藉。自從1880年以來他一直為在中國建造鐵路奔走呼號，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準在臺灣興建了鐵路。在“官督商辦”的名義下，劉銘傳的商務局從海外華僑那里集資100萬兩。工程進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臺北和基隆之間長20英里的路面已被鋪軌15英里，而兩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內，臺北和新竹之間42英里的鋪軌工程也得以完成。[[170]](#_170_Zhu_Chang_Jun____Liu_Ming_C)它的起步是緩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國僅有319英里鐵路，包括臺灣在內。在直隸，李鴻章花了20年時間才建成一條長257英里的鐵路。

### 武備學堂和它們的問題

中國第一所訓練陸戰人員的學堂——即天津武備學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師學堂興辦的五年之后。在這方面遲遲才動手是叫人很難理解的，鑒于李鴻章在70年代就已經大力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人員去接受軍事訓練，這種現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_171_Guan_Yu_Zhong_Guo_Xue_Sheng)早在1875年美國將軍埃默里·厄普頓即曾向李鴻章建議應開辦一所中國的武備學堂，但李鴻章以厄普頓的建議花費太大而加以拒絕，因為它需要從美國陸軍聘用九位教師和教官，還加上一個學六年英語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鴻章興辦一所武備學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認真地考慮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因為：中法戰爭方興未艾；幾位德國教官已到達中國；他的某些將領——特別是周盛傳——改變了態度。[[172]](#_172_Mi_Qi_Ye____E_Pu_Dun_De_She)

遲遲不能開辦陸軍學堂，無疑是由于大多數勇營軍官抵制向他們帶領的部隊中輸進新成分。新式海軍則不那么威脅既得利益集團，雖然李鴻章早期的海軍軍官據說很快就養成了反對新培養的士官生的偏見。甚至周盛傳也表示，他雖然贊成按照西方模式興辦一所中國武備學堂，但他也覺得不一定會培訓出許多將領來。[[173]](#_173_Wang_Jia_Jian____Bei_Yang_W)周盛傳基本上滿意淮軍的指揮結構，他對許多老軍官會反對人事的變動是了然于胸的。

李鴻章最初關于開辦這種學堂的建議是很有節制的。他只計劃訓練約一百名下級軍官和一些從淮軍及練軍營伍中選送來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學點軍事的文員而已。經過壓縮的課程包括天文學、地理、科學、測量、打樣、數學、筑城學和軍事操練及作戰。6名德國軍官開始在學堂教書。課程主要以德文講授，由從同文館或其他地方調來的譯員幫助翻譯。李鴻章希望學生們能在一年內完成學業（實際上要兩年），然后他們回到原單位把新學來的知識傳授給同伴們。從1885—1900年用這種方法共對大約1500名士官生進行了訓練。大多數人只充當教官；只有少數人成了軍官。[[174]](#_174_Bi_Nai_De____Zhong_Guo_Zui)

1887年春，李鴻章增加了一項旨在培養軍官的五年計劃。應試者年齡限在13—16歲，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應與其年歲相當。是否合格，應以入學考試為準。最初有40名學生被錄取，每個學生必須保證連續在校五年，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也不許結婚。父喪或母喪可以準假，但假期很短。[[175]](#_175___Bei_Hua_Jie_Bao____1887Ni)這五年學程是相當嚴厲的：頭三年學一門外語（德語或英語）、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學、天文學、自然科學、地理、地圖繪制、中國歷史和經書；后兩年包括射擊學、軍操、筑城學及其他工藝科目。定期考試用來測驗熟練程度，評定升級或留級，并作為向上奏報學習進展情況的根據。這種一般的教學方法也用于李鴻章辦的威海衛和山海關的軍事訓練學校中：這些學校被認為是天津訓練計劃的擴大。[[176]](#_176___Bei_Hua_Jie_Bao____1887Ni)

和天津水師學堂一樣，這所武備學堂的財源也是來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經費”。雖然它經辦不善和貪污腐化，與外籍教官的關系有困難，學校中存在著語言障礙，學生中間存在種種問題，但中國20世紀初期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該校培訓出來的。[[177]](#_177_Wang_Jia_Jian____Bei_Yang_W)

此外，在1894年以前開辦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備學堂就是張之洞的廣東水陸師學堂中的陸軍部分。1885年，張之洞曾經在他新建的勇營部隊——即廣勝軍——中聘用過德國教官。有一兩名德國軍官在該學堂里教書，但中國教官承擔了大部分教學任務。張之洞看來很滿意于他們的教學工作，因為他后來選派了畢業生充當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強軍的軍官，而且聘用該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時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備學堂執教。[[178]](#_178_Ai_Er_Si____Zhang_Zhi_Dong)

在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已擁有一支不容輕視的陸海軍。對李鴻章的淮軍和其他中國部隊的贊賞不乏其例，北洋海軍也贏得了不少好評。[[179]](#_179_Chu_Le_Qi_Ta_Zhu_Zuo_Yi_Wai)當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可能爆發時，大多數西方人士認為中國有優勢。它的陸軍數量龐大，海軍在數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國參謀本部認為日本不可能取勝。在路透社的一篇訪問記中，瑯威理預言日本必敗。瑯威理認為中國的海軍受過良好的訓練，艦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強大。他說，威海衛是不可攻破的。雖然瑯威理也強調過，一切得取決于中國部隊的領導如何，但他相信，“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徹底粉碎”[[180]](#_180___Bei_Hua_Jie_Bao____1894Ni)。

## 中日戰爭的災難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鮮、滿洲和中國本部，人們對中國陸海軍優勢的幻想馬上破滅。與中法戰爭時雙方的決策都猶疑不定的情況不同，中日戰爭從一開始就被日本發動的、以決心攻占北京為目標的一連串攻勢所左右。結局清楚地和富于戲劇性地暴露了中國軍事準備的失敗和日本軍事準備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陸海軍建設得力于它的社會其他部門的現代化革新，同時它也促進了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實施激發了國民意識進一步的覺醒，同時，陸海軍教育的中央集權體制使軍官得以去國外留學，使軍事學校得以在國內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參謀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參謀學府。陸軍和海軍之間能有保證地實行密切的合作。[[181]](#_181_Shan_Xian_You_Peng____Ri_Be)

在把日本武裝部隊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國顧問和教官們，包括英國人約翰英格爾斯和德國人雅可布·麥凱爾在內，都是出過大力的。麥凱爾幫忙改組了陸軍部，提高了參謀本部，改進了軍事教育，充實了它的后勤和醫藥工作。他也幫助把日本軍隊改組為師的建制，并且告訴日本人“關于實行全國總動員的要求，其中應具備一個戰略性的鐵路網，一項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進的參謀作業”。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國的同行漢納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爾斯也比他的同行瑯威理上校能夠做出更大的成績。[[182]](#_182_Jian_Pu_Lie_Sai_Sen___Qin_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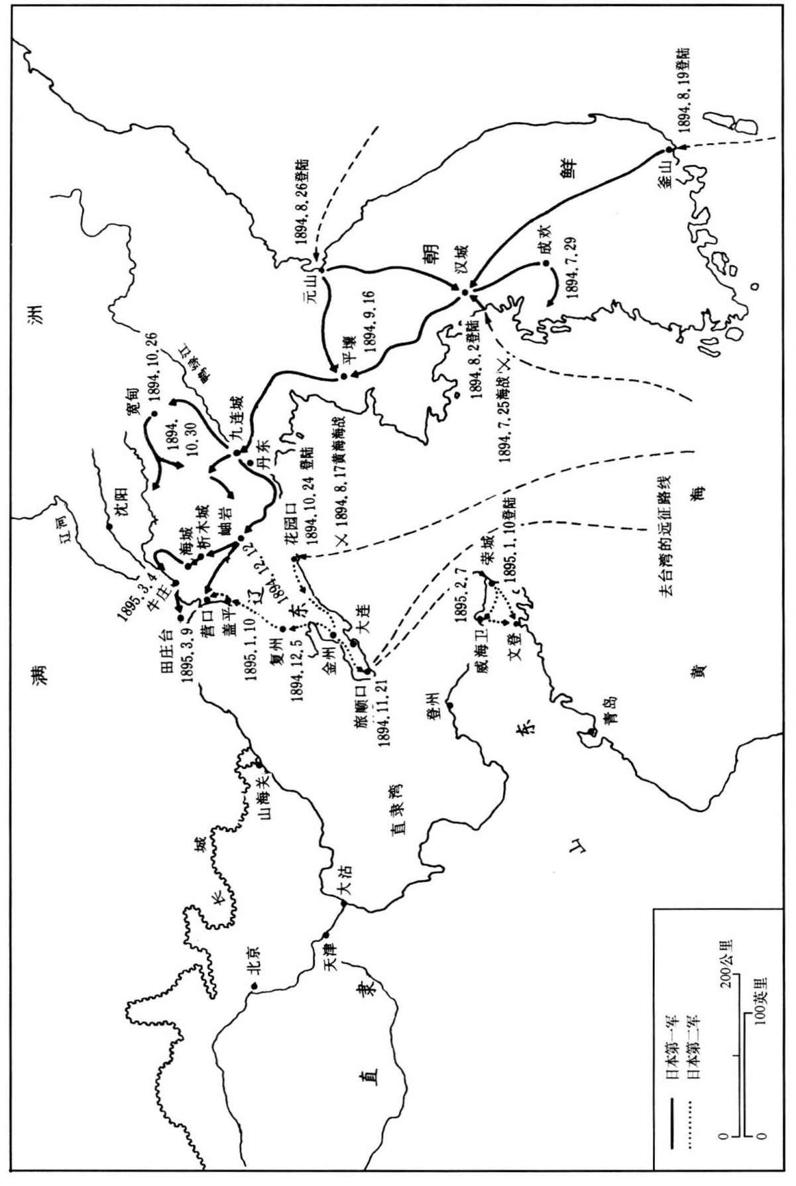
甚至在宣戰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鮮就已向人們表現出這樣的成就：它的“將軍們知道怎樣指揮作戰，而軍隊的組織甚至在一個沒有良好公路的國家中也能順利地運轉”。在整個戰爭期間，法國、英國和其他外國觀察家一再贊許日本人精于戰略和戰術，贊揚他們有效能的訓練、紀律、勇敢善戰、集體主義精神，以及他們在運輸、軍糧供應和醫藥設施方面的突出表現。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于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贏了這場戰爭。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鮮的攻勢進展神速。[[183]](#_183_Xia_Mian_De_Xu_Shu_Zhu_Yao)8月10日，日本艦隊襲擾旅順口和威海衛以掩護軍隊的運輸；中國海軍未能對挑戰作出反應。僅僅一個多月日本軍隊就占領了重鎮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時間就拿下了這個重兵防守的要塞，把葉志超等人統率的淮軍一舉趕過了鴨綠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艦隊決定性地在鴨綠江口擊敗了中國艦隊（見第二章）。這一勝利是伊東佑亨海軍上將出色指揮的結果，其戰果是摧毀了幾艘中國艦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權，讓日本人得以隨意派兵登陸，并謀劃特別大膽的作戰計劃。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滿洲長驅直入，在鴨綠江附近的九連城和鳳凰城打敗了中國人。11月初，他們攻陷了金州和嚴加設防的中國人陣地大連灣，在這里奪取了大量軍需物資，其中包括621支槍、129門炮、3300萬余發槍彈、約250萬發炮彈。[[184]](#_184_Fu_La_De_Mi_Er____Zhong_Ri)大連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對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國海軍基地旅順口的攻擊行動，結果使旅順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這不僅使日本得到了東亞最優良的海軍船塢，而且嚴重地瓦解了中國軍隊的士氣，使北京陷于驚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滿洲攻占了幾個重要據點，如復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別嚴重。它不僅阻斷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國的軍事力量，還使沈陽本身也成了易受攻擊的目標。在后來的戰斗階段，清軍三番五次地企圖奪回海城，往往犧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軍占領蓋平，使它的第一軍和第二軍的交通聯絡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從遼東到中國的內陸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時候，日本人開始進攻山東，作為向北京作大鉗形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在1月18日炮轟登州作牽制性進攻，兩天以后侵入榮成，在半個月內經過幾次惡戰之后攻占了威海衛。用一位法國觀察家的話說，威海衛之役提供了陸海軍緊密協同作戰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顯示了現代的陸戰和海戰的所有方法：對要塞實行猛襲；巧妙地操縱大炮和船只；（還）敢于發動魚雷攻擊，讓港口塞滿了被擊沉的船只”[[185]](#_185_Suo_Wa_Re_Hai_Jun_Shao_Xiao)。



地圖13 中日甲午戰爭

威海衛的陷落對中國人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所余北洋艦隊的船只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日本人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幾位陸海軍將領紛紛自裁。現在，從山東去北京的道路已經門戶洞開，日本人可以長驅直入了。在中國人主動提出和平倡議期間，戰事繼續在山東和滿洲兩地進行。2月下半月，清軍在宋慶（包括淮軍的若干大分遣隊在內）和其他將領的率領下，在海城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雖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人數之比有時略超過二比一（約6萬人對2.5萬），日本人仍頑強地守住了城池，使對方傷亡慘重。中國人曾取得幾次戰術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勝利。[[186]](#_186___Ri_Qing_Zhan_Zheng_Shi_Ji)

在3月份的頭兩個星期，日本地面部隊在滿洲拿下了牛莊、營口和田莊臺。此后不久，日本人又開始侵犯臺灣，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島。在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準備，要從南滿和山東半島對北京進行鉗形進攻。雖然據說中國人已集結了15萬到20萬軍隊在直隸北部，但他們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戰爭從頭至尾是一場十足的災難。中國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籌碼不是它所剩下的陸海軍力量，而是一個日本狂熱分子對李鴻章的傷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內疚。[[187]](#_187_Yao_Xi_Guang____Dong_Fang_B)

（張書生 譯）

[[1]](#_1_3)關于八旗軍和綠營軍，見魏源的《圣武記》和羅爾綱的《綠營兵志》。勇營之名初見于曾國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載《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頁。關于東軍，見《山東軍興紀略》（卷4，第8頁）和《丁文誠公遺集》卷1·4，第37頁；卷4·9，第16頁。關于豫軍，見尹耕云等編《豫軍紀略》卷1·3，第11頁；卷5· 10，第10—11頁；卷12·22，第5—6頁。滇軍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亂之役，見王樹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變》，第224—228頁。

[[2]](#_2_3)參照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24—31頁。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載《亞洲歷史雜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頁。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3]](#_3_3)羅爾綱：《綠營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頁。

[[4]](#_4_3)同上書，第179—181、213—220、237—244頁。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卷1·2，第4頁。

[[5]](#_5_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頁。

[[6]](#_6_3)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卷331，第8—9頁。

[[7]](#_7_3)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3冊，第475—479、484—491頁。神機營核心部隊總兵力似保持為6000人之數。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報認為神機營本部只擁有3500名步兵，2000名騎兵，500名炮兵。見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卷1，第21—22頁。

[[8]](#_8_3)王爾敏：《淮軍志》，第354—35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頁。

[[9]](#_9_3)《洋務運動》第3冊，第459—470、481頁。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清政府在兩個城市聘用外國教官訓練八旗軍和綠營兵，即福州（從1865年中至1866年）與武昌（從1866年初至1868年中），見同上書，第471—472、482、492—494頁。

[[10]](#_10_3)《皇朝政典類纂》卷333，第11頁。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邊疆》，第123—125頁。

[[11]](#_11_3)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載《大陸雜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頁，文中摘錄了劉長佑的奏折。

[[12]](#_12_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頁。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卷12，第3、21、31—37頁。《大清歷朝實錄·同治朝》卷193，第18—19頁。

[[13]](#_13_3)《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7，第2頁。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卷2，第2856頁，1869年2月27日條。

[[14]](#_14_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頁。

[[15]](#_15_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頁；卷29，第13、16、18—19頁。

[[16]](#_16_3)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頁；卷19，第16—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187頁。《皇朝政典類纂》卷325，第4、8—10頁。

[[17]](#_17_3)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2，第9、505頁。劉廣京：《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頁。

[[18]](#_18_3)《皇朝政典類纂》卷326，第6—8頁。

[[19]](#_19_3)見恭親王1884年1月奏折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奏折，載《洋務運動》，第526頁。又見張佩綸《澗于集》卷6，第10頁。

[[20]](#_20_3)見羅爾綱《綠營兵志》，第72—73頁（注70—73）。關于使用練軍鎮壓地方叛亂，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現在已有更詳盡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頁；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頁。

[[21]](#_21_3)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

[[22]](#_22_3)戈登檔案（英博物館），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關于英帝國勢力范圍的秘密備忘錄”（1864年）。

[[23]](#_23_3)詳見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載《現代亞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頁。

[[24]](#_24_3)戈登檔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_25_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頁。可是李鴻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負責訓練計劃，“以后無甚波瀾”；《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頁。

[[26]](#_26_3)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卷7，第10—11頁。哈克：《太平軍叛亂中的事件》，第526—527頁。

[[27]](#_27_3)丁日昌：《撫吳公牘》卷50，第8頁。FO（英國外交部檔案）228：453及492，文茲坦利的報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_28_3)FO228：54，文茲坦利的備忘錄（1873年1月6日）。

[[29]](#_29_3)特別見金天柱《清真釋疑》，第1、4—5、17、19—21、25—28頁。

[[30]](#_30_3)王樹槐：《咸同云南回民事變》，第45—52頁。

[[31]](#_31_3)同上書，第136—184頁。陳錦江：《馬如龍從云南回民之亂的叛亂者變成了變節者》，載《中國論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頁。

[[32]](#_32_3)馬德新：《大化總歸》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頁；卷2，第1—2頁。王樹槐：《咸同云南回民事變》，第109—127頁。

[[33]](#_33_3)黃家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第25—37、88—113頁。

[[34]](#_34_3)白壽彝：《回民起義》第1冊，第8頁；第2冊，第106、111—131頁。王樹槐：《咸同云南回民事變》，第118頁注22。黃家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檔案（第164—189頁）。參照田汝康《有關杜文秀對外關系的幾個問題》，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頁。

[[35]](#_35_3)佐口透：《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34—538頁。貝柳：《克什米爾和喀什噶爾：1873—1874年喀什噶爾旅行記》，第321—327頁。

[[36]](#_36_3)單化普：《陜甘劫余錄》，載《回民起義》第4冊，第311頁。佐口透：《18和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59—579頁。弗萊徹：《中亞的蘇菲教派和馬明心的新教》，載陳階賢（音）編《第四次遠東阿爾泰會議紀要》，第75—96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頁。

[[37]](#_37_3)朱文長：《談有關西北回亂的兩個問題》，載《清華學報》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頁。

[[38]](#_38_2)東阿居士：《秦難見聞記》，載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93—96頁。

[[39]](#_39_2)單化普：《陜甘劫余錄》，載《回民起義》第4冊，第311—312頁。

[[40]](#_40_2)除非另注出處，我們關于陜甘兩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長的《1862—187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事日志》。

[[41]](#_41_2)特別可參看1863年甘肅寧夏邊境紳耆通過御史上皇帝的請愿書，載于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34頁。

[[42]](#_42_2)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5，第23頁。黃河的支流據信為湟水（見馬修斯的《漢英字典》條目第2289號），它連接著青海的西寧和甘肅東南部。

[[43]](#_43_2)這兩種著作均見上面213頁注4，以及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簡史》。

[[44]](#_44_2)《紀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寫成的殘卷，由龐士謙譯成中文），載《回民起義》第3冊，第240頁及第1頁對面的圖版。

[[45]](#_45_2)引自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64頁。

[[46]](#_46_2)我們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研究，特別是對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當前弗萊徹教授關于清代亞洲腹地的歷史考察的手稿。在見解方面，我們也要感謝紐約州立大學拉尼·布魯斯·菲爾茲教授，我們從他的《左宗棠與回民：1868—1880年在中國西北實行的經世之道》一書受到很多啟發。

[[47]](#_47_2)妥明（妥德林）據信從甘肅河州來，在到達新疆之前曾訪問過金積堡。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第1冊，第449頁。

[[48]](#_48_2)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第27頁。

[[49]](#_49_2)袁清：《阿古柏與回民叛亂》，載《中亞雜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頁。

[[50]](#_50_2)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61—62頁。袁清：《阿古柏與回民叛亂》，第149頁。

[[51]](#_51_2)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15—48、303—305頁。

[[52]](#_52_2)引自V.G.楚爾南《喀什噶爾和中亞的政治，1868—1878年》，載《劍橋歷史雜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頁。又見徐中約《伊犁危機》，第34—35頁。

[[53]](#_53_2)中田吉信：《同治年間的陜甘回亂》，載《近代中國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頁；卷37，第6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6頁；卷11，第32頁。

[[54]](#_54_2)《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23—26、52頁；卷11，第10頁。

[[55]](#_55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0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頁。

[[56]](#_56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45頁；卷14，第48、55頁；卷16，第27頁。《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頁。

[[57]](#_57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頁。

[[58]](#_58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2—119頁。劉廣京：《清末地方權力范圍的再估價》，第204頁注58—59。

[[59]](#_59_2)《大清穆宗實錄》卷220，第26—27頁；卷244，第19—29頁。

[[60]](#_60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3—114頁。

[[61]](#_61_2)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頁。

[[62]](#_62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27—128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頁；卷38，第63頁。

[[63]](#_63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2、52頁。

[[64]](#_64_2)《大清穆宗實錄》卷261，第24頁；卷262第17—19頁；卷263，第10—11頁；卷276，第23頁。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爾多斯旅行過的普列杰瓦爾斯基記錄了東干人對這兩處地方侵襲的后果，見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爾馬·摩根英譯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頁。

[[65]](#_65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19、26、36頁。

[[66]](#_66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頁。

[[67]](#_67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35頁；參照卷11，第29頁。

[[68]](#_68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0，第55頁；卷11，第7、10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頁。

[[69]](#_69_2)貝爾斯：《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頁。

[[70]](#_70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頁。

[[71]](#_71_2)關于陜回從甘肅西南部馳援金積堡的記載，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第528—533頁。

[[72]](#_72_2)《大清穆宗實錄》卷277，第1—3頁。

[[73]](#_73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2、23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頁。

[[74]](#_74_2)《大清穆宗實錄》卷276，第7頁；卷282，第15頁（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1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頁（第8—9行）。貝爾斯的《左宗棠》一書第240和248頁上的地圖。

[[75]](#_75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21、27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頁；卷37，第12—13、59頁。

[[76]](#_76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1第33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頁；卷38，第3—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頁。

[[77]](#_77_2)《大清穆宗實錄》卷293，第17頁；卷309，第22—23頁；卷312，第10—11頁；卷313，第1、11頁；卷315，第6頁；卷319，第12頁；卷320，第12頁；卷321，第16頁。1870年12月普列杰瓦爾斯基在庫倫即聽說東干人襲擊了烏里雅蘇臺。他記述說，一支俄國分遣隊曾被派往庫倫，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時間；見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頁。

[[78]](#_78_2)關于左宗棠的告示，見《回民起義》第4冊，第1頁（圖版）。按照乾隆時代的前例，清帝沒有批準左宗棠在全帝國實施這條禁令的奏請；《大清穆宗實錄》卷310，第15—16頁。

[[79]](#_79_2)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46—47頁。

[[80]](#_80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頁。

[[81]](#_81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頁；卷43，第24—25頁。

[[82]](#_82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3，第23、32頁。陳其田：《左宗棠：促進中國船政和羊毛紡織業發展的先驅》，第51—53頁。

[[83]](#_83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49—155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頁。

[[84]](#_84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3，第34—35頁。

[[85]](#_85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頁。

[[86]](#_86_2)《左文襄公家書》卷6，第58頁。

[[87]](#_87_2)鮑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頁。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第54頁。

[[88]](#_88_2)文祥在一次決定性的宮廷會議上發表的意見，被這位資深的政治家吐露給了一位北京官員李云麟。見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頁；又見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7，第36—37頁。

[[89]](#_89_2)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19—122頁。匯豐銀行在各通商口岸發行債券，以籌措這五百萬兩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寫道：“政府給中間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給銀行10%，銀行付給公眾8%。”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的信件》第1冊，第251頁。

[[90]](#_90_2)徐中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載《中亞雜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頁。

[[91]](#_91_2)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頁。朱文長：《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第189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53頁；卷16，第27頁；卷17，第1、39頁。關于左宗棠的屯田實驗未能滿足他的軍事需要這一點，見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亂糧餉之籌劃與轉運研究》，第96—97頁。

[[92]](#_92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4，第49頁；卷15，第41—42頁；卷16，第31頁；卷17，第14、15、36頁；卷18，第26頁。皮亞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國的俄國旅行家》卷2，第156—157頁。

[[93]](#_93_2)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79頁。中田吉信：《同治年間的陜甘回亂》，第142頁注13。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卷6，第36、44頁；卷7，第23—2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59頁；卷16，第65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頁。

[[94]](#_94_2)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 197—206、243、249—250頁。弗萊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東突厥斯坦的抗衡》，載《皇家中亞學會學報》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頁上引用了英國的檔案。

[[95]](#_95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5，第34頁；卷16，第10頁；卷17，第5頁。徐中約：《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第59頁。

[[96]](#_96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頁。

[[97]](#_97_2)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80—181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7，第11頁。

[[98]](#_98_2)《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9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頁。

[[99]](#_99_2)庫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第182、247、254頁。《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8，第22、34頁。

[[100]](#_100_2)關于1878—1879年間清軍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團的較小的沖突，包括可能是白彥虎及其他東干人所挑起的邊境侵襲在內，其記載可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第641—657頁。

[[101]](#_101_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頁。

[[102]](#_102_1)見約瑟芬·奈蘭·周《1759—1911年新 疆的邊疆研究及行政變動》（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103]](#_103_1)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第364頁。

[[104]](#_104_1)關于李鴻章主辦的重大事業項目，其清單見K.H.金《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第4—12頁。

[[105]](#_105_1)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199頁注35。

[[106]](#_106_1)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201—202頁注49。王爾敏：《淮軍志》，第356—361頁。

[[107]](#_107_1)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169—170頁。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第203頁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頁；卷26，第38—41頁。

[[108]](#_108_1)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4—35、38、40、49頁；卷4，第3—4、10頁；《外記》卷1，第7頁。

[[109]](#_109_1)《周武壯公遺書》卷1·2，第24頁；卷2·2，第1—2、13頁；卷4，第19—24、26—27、32—33、37頁；《外記》卷1，第11—23、44頁。關于派學生去德國接受軍事訓練的材料，見王爾敏《淮軍志》，第203頁。

[[110]](#_110_1)《周武壯公遺書》卷1·2，第2、14—18、34—47頁；卷4，第26—34頁。關于戈登的戰術思想，見《北華捷報》1880年9月11日。

[[111]](#_111_1)福島安正：《鄰邦兵備略》卷3，第45—46頁。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2冊，第4、57—59頁。特洛特：《記李鴻章的軍隊》，《英國陸軍部檔案》，33/4（1880年）第127—130頁。

[[112]](#_112_1)《周武壯公遺書》卷1·1，第19頁；卷1·2，第41—42頁；卷2·2，第22頁；卷4 第36—37頁；《外記》卷1，第14、18—21、23、36—37頁。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2冊，第57、197頁。特洛特：《記李鴻章的軍隊》，第129頁。

[[113]](#_113_1)《周武壯公遺書》卷2·2，第16—17頁；卷4，第32—47頁。

[[114]](#_114_1)《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3、49、56頁；卷2·2，第1—8、13頁；《外記》卷1，第50頁。王爾敏：《淮軍志》，第146—147頁。

[[115]](#_115_1)見周盛傳的軍歌，載《周武壯公遺書·外記》卷1，第50—52頁。關于一些具體問題，見同上書，第37、39、41頁。

[[116]](#_116_1)《周武壯公遺書·卷首》，第31—56頁。

[[117]](#_117_1)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7章。王爾敏：《淮軍志》，第275—290頁。

[[118]](#_118_1)王爾敏：《淮軍志》，第284—289頁。《周武壯公遺書》卷2·2，第15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頁。

[[119]](#_119_1)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頁。斯坦利·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467—478頁。

[[120]](#_120_1)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79—81頁。威廉·曼切斯特：《克虜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頁。

[[121]](#_121_1)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頁；卷40，第52—56頁。

[[122]](#_122_1)舒斐爾特給參議員薩堅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載于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檔案和公共檔案》，第163頁。

[[123]](#_123_1)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46—49、177—178頁。

[[124]](#_124_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頁。

[[125]](#_125_1)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537—538頁。

[[126]](#_126_1)引自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頁。

[[127]](#_127_1)除了別的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169—174頁。

[[128]](#_128_1)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頁。

[[129]](#_129_1)考爾迭：《中國與西方列強關系史》卷2，第481頁以后。《北華捷報》增1885年5月22日。麥卡利維：《黑旗軍在越南》，第230—231頁。

[[130]](#_130_1)《北華捷報》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國的兵勇》，載《亞洲評論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頁。

[[131]](#_131_1)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卷3，第5、9—11頁。

[[132]](#_132_1)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15頁。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頁注5。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頁。參照克萊德《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第180頁。

[[133]](#_133_1)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季刊》5（1973年），第2頁。在談到曾國藩的計劃時，李鴻章1871年寫信給他說：它“目前固辦不到，內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頁。

[[134]](#_134_1)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第14—18頁。

[[135]](#_135_1)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34—135、145頁。

[[136]](#_136_1)同上書，第131頁。張其昀等編：《清史》第6冊，第902頁。

[[137]](#_137_1)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洋務運動》第1冊，第117—118頁。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57—58頁。

[[138]](#_138_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頁。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學刊》第1期（1969年），第21頁。

[[139]](#_139_1)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8—31頁。

[[140]](#_140_1)《大清德宗實錄》卷209，第1頁；卷221，第10—11頁。醇親王的信具載于《李文忠公全集·海軍函稿》卷2，第22—23頁；又見卷2，第36頁。斯坦萊：《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頁。

[[141]](#_141_1)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26—28頁。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39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12頁。

[[142]](#_142_1)《北洋海軍章程》，載《洋務運動》第3冊，第195—264頁；又見第200、203、206頁，并散見其他各處。

[[143]](#_143)關于醇親王的請求及督撫實籌二百萬兩款項的支配問題的討論，見吳相湘《近代史事論叢》第1冊，第151—170頁及包遵彭《清季海軍史》第38—42頁。

[[144]](#_144)《大清德宗實錄》，卷252第1頁；卷294第9頁；卷296第8頁。

[[145]](#_1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頁：卷74，第33頁；卷76，第50頁；卷78，第53頁。斯佩克脫：《李鴻章和淮軍》，第231頁。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頁。

[[146]](#_146)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58—163頁。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473—474頁。

[[147]](#_147)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65頁。卡文迪什：《中國的武裝力量（？）》，載《皇家聯合兵種雜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頁。

[[148]](#_148)《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費正清：《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第1冊，第797、801頁。參照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1冊，第62—63頁。

[[149]](#_149)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4—57頁。參照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1頁。

[[150]](#_150)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232—236頁。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58—60頁。《北華捷報》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151]](#_151)《大清德宗實錄》卷215，第5頁。《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4頁。

[[152]](#_152)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9、283—319頁。《洋務運動》第1冊，第121、131頁。黃家謨：《中國電線的創建》，載《大陸雜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頁。

[[153]](#_153)《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1、3頁；卷8，第16、18頁。又可參照林東辰《臺灣貿易史》，第186頁。

[[154]](#_154)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247頁。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與財政改革》，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頁。

[[155]](#_155)斯派德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 （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頁。

[[156]](#_156)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頁。

[[157]](#_157)《劉壯肅公奏議》卷2，第11—14、20頁。

[[158]](#_158)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0頁注46。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168、177—178頁。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第202頁。

[[159]](#_15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160]](#_160)這一節關于劉銘傳的土地稅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敘述，所根據的是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2—454頁。邁爾斯：《1684—1895年清帝國治下的臺灣的傳統經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學研究所學報》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頁。威克伯格：《十九世紀后期臺灣的土地租賃》，載戈頓編《中國地方史中的臺灣研究》，特別請看第86—88頁。

[[161]](#_161)見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第454頁注64。

[[162]](#_162)《劉壯肅公奏議》卷8，第21—22頁；參照第20頁。

[[163]](#_163)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戴維遜《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第114、135頁及以后諸頁、252頁。

[[164]](#_164)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288—294頁。

[[165]](#_165)《劉壯肅公奏議》卷6，第5頁；卷9，第17、23頁。關于清帝對劉銘傳1889年奏疏的批答，見卷9，第23頁。

[[166]](#_166)《大清德宗實錄》卷276，第13—14頁。

[[167]](#_167)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第133頁表11。

[[168]](#_168)斯派德爾：《劉銘傳在臺灣》，第405頁注14；又見《劉壯肅公奏議》卷1，第20頁。

[[169]](#_169)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40—42、44—46頁。黃家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第223—235頁。《大清德宗實錄》卷288，第89頁。

[[170]](#_170)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的現代化》，第50頁。參照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77—78頁。

[[171]](#_171)關于中國學生未能進入西點軍校的問題，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將來》，第82—83頁。

[[172]](#_172)米契耶：《厄普頓的生平和書信》，第290—298、309—310頁。《洋務運動》第3冊，第55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4（1976年4月）第319—320頁。

[[173]](#_173)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第324、339頁注18、341頁注36。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85頁。

[[174]](#_174)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1—62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7—8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頁；卷74，第23頁。卡文迪什：《中國的武裝力量（？）》，第717頁。

[[175]](#_175)《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

[[176]](#_176)《北華捷報》1887年4月13日。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3頁。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8頁。

[[177]](#_177)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第9—19頁。何天爵：《中國的過去與現在》，第84—85頁。

[[178]](#_178)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頁（特別是注42）。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64—65頁。

[[179]](#_179)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別請看佚名者《中國和日本的軍隊》，載《美國兵役雜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頁。《北華捷報》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180]](#_180)《北華捷報》1894年9月21日。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162、169頁。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第140—141頁。

[[181]](#_181)山縣有朋：《日本的軍隊》，載大隈重信編《新興日本的五十年》第1冊，第209頁。史密斯：《中國和日本軍事方面現代化的比較研究》，載《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雜志》，16（1976年），第11—23頁。

[[182]](#_182)見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特別請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編：《海軍年鑒，1895年》，第91頁。杰恩：《日本帝國的海軍》，第36頁。瓦格茨：《軍人的國防與外交》，第185頁。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89頁注28。

[[183]](#_183)下面的敘述主要根據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第1冊，第1—108頁。《日清戰爭實記》，中譯文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18—286頁。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編：《日中戰史》第1冊。布雅克：《論中日戰爭》。郭頌平（音）：《中國對外人蠶食的反應：專論中日甲午戰爭及其后果》（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53年）。鄭昌淦：《中日甲午戰爭》。劉鳳翰：《甲午戰爭雙方兵力的分析》，載《中國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頁，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瓦拉：《東方的戰爭》，載《美國海軍學院會議錄》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頁。關于有關的日文著作，見關于本章的書目介紹。

[[184]](#_184)伏拉的米耳：《中日戰爭》，第215、223、231頁。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34—36頁。《日清戰爭實記》，載同上書，卷1，第246—256頁。

[[185]](#_185)索瓦熱海軍少校：《中日甲午戰爭》，第204頁。伏拉的米耳：《中日戰爭》，第303—304頁。《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69—275頁。

[[186]](#_186)《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75—278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第63—65頁。索瓦熱：《中日甲午戰爭》，第220—227頁。

[[187]](#_187)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90—108頁。杜布萊：《中日甲午戰爭梗概》，第62、70—71頁。索瓦熱：《中日甲午戰爭》，第229頁。《日清戰爭實記》，載《中日戰爭》第1冊，第281—285頁。

#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 背景——西方沖擊的形勢

在中國，19世紀90年代開始了思想的風云激蕩過程，這不僅產生了變法維新運動，也預示了一個社會文化變化的新時代的到來。誠然，這種激蕩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19世紀后期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發展。在儒教中，反對流行的漢學學風的反作用繼續在中國學者中存在，對佛教和古代非儒家的各種哲學思想的興趣也重新出現了。然而，所有這些發展都或多或少的是19世紀初期已經開始的思想界變化的結果。[[1]](#_1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u)而使這些本國固有的發展轉變成思想激蕩的原因，則是西方的擴張引起的變化。

這有兩個主要的方面。帝國主義侵略是顯而易見的一面，它表現為西方國家強加給中國的壓迫和剝削。另一個方面則是改造性質的，它表現為在與西方接觸時帶給中國的多種多樣的變化。在19世紀90年代，可以看到這兩個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在1890年前的半個世紀中，中國不得不面對帝國主義的擴張，但到1890年帝國主義侵略進入了新的關鍵階段。在中國蒙受被日本擊敗的羞辱后不久，1895年初夏法國帶頭聲稱華南和西南為其“勢力范圍”，西方列強開始了“爭奪租借地”的狂潮。在這一爭奪的高潮中，德國占了膠州灣，俄國占了旅順口，這些行徑使中國面臨立即被分割的危險。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氣氛形成了，全國彌漫著被瓜分的恐懼。

這種情況是與西方對華的改造的影響（它自19世紀40年代起即已不斷地在起作用）的新發展同時出現的。在19世紀后期，它的最明顯后果無疑是發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會經濟變化。首先，西方的擴張在那里引起了持續的累積的經濟增長，結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場有密切關系的城市的經濟中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現代”部分。和這種經濟發展有關的是，社會發生了變化，產生了諸如買辦、工資勞動者和城市無產階級這樣一些新的集團。而且，由于各種西方制度的“示范影響”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長，社會變動的過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發生，它逐漸破壞了他們傳統的態度和信仰，同時提出了新的價值觀、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動方式。

盡管有這樣地區性的變革，在整個19世紀末期，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所受的影響甚少。中國的紳士照樣享有他們傳統的上流社會地位，仍是帝國中占支配地位的社會集團。簡言之，雖然西方的擴張在通商口岸創造了一種新社會，但卻不能把其改造的影響擴展到中國內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沖擊來說，情況卻是不一樣的。19世紀90年代是轉折點，當時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首次從通商口岸大規模地向外擴展，為90年代中期在士紳文人中間發生的思想激蕩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為了理解這些重要變化的意義，我們必須放眼縱觀前此數十年內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沖擊。

在1840年后的將近半個世紀以內西學的輸入是緩慢的，它對中國士大夫的影響是表面的，特別是與西方文化在19世紀日本的迅速發展及其改造影響相比就更加明顯，這是重要的然而經常被忽略了的事實。這個世紀中葉以后，當西學在日本迅速成為全民族注意的中心之際，它在中國卻于數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圍之內和數量有限的辦理所謂“洋務”的官員（見第三章）之中。在1860年以后的數十年間，基督教傳教士向中國內地的滲透，就思想的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實上，這種滲透引起了社會文化的沖突，擴大了中國和西方之間心理上的隔閡。中國大多數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們自己傳統的精神世界里。

當人們回想起，在19世紀90年代以前，士大夫所受的教育仍然面向科舉制度和面向成為該制度基礎的儒學時，那么他們不接受西方文明就不足為奇了。西方長期未能對這樣一種重要的文化制度產生影響，這件事本身既深刻地反映了大多數中國士大夫思想上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情況，而且也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內在原因。

中國士大夫對西方文化的冷淡態度能從幾處看出來。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譯局翻譯的出版物銷路是很有限的。據有人估計，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譯局賣出約13萬部譯著。[[2]](#_2_Jian_Bo_Zan_Deng_Bian____Wu_X)中國公眾對讀物的冷淡態度和明治時代日本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那里，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自1866年出版后幾乎立即賣掉25萬冊（包括私印本）。[[3]](#_3_Zhe_Yi_You_R_P_Duo_Er_Deng_Re)這種冷淡態度還可以從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在1861—1894年之間開設的現代學堂缺乏成績一事得到證明，這些學堂原本計劃提供西方語言、工藝知識、軍事訓練和軍事組織等方面的教育。但是，它們之中沒有一個發生過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文人不愿進這些學堂。[[4]](#_4_Bi_Nai_De____Zhong_Guo_Zui_Ch)

對這種思想上的隔絕狀態，再也沒有比19世紀90年代以前西學在書院課程中沒有地位的情況更能說明問題的了。這種狀況也和19世紀后期的日本有明顯的區別。一個在1870年到日本一所普通學校從事教學的美國人，對于西學所占有的顯著地位以及學校收集西方書籍的規模有深刻的印象。[[5]](#_5_Duo_Er____Ri_Ben_De_Chuan_Shi)但如果他甚至在20年后訪問一所典型的中國書院時，他也幾乎不能發現任何表明西方影響的證據。19世紀80年代后期，梁啟超曾在廣州兩所著名大書院學習過。無論在那一個書院，他都未能發現西學的蹤影；課程中傳統的儒學仍占統治地位。這是廣州的情況，而廣州可能是西方影響比其他地區更深的通商口岸城市。雖然有關研究清季書院的專著甚少，但已有的材料可以證明，在1895年開始的教育改革以前，西學在書院的課程中總的說來是被禁止的。[[6]](#_6_Ding_Wen_Jiang____Liang_Ren_G)

更多的證據可以在一本教育書目中找到，此書是與張之洞同樣杰出的一位官僚學者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出版的，在19世紀后期很流行。它根本沒有提及西學。當我們翻閱一下這個時期受尊敬的儒學學者如朱次琦、陳澧、朱一新和王闿運等人的著作時，也會驚異地發現，他們的注意力幾乎全都集中在傳統的儒家學術上。所有這些記述在分散時可能不足以說明問題，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說明，在19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在西方化了的通商口岸和中國士大夫知識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鴻溝。

然而，經過數十年時間，這個鴻溝由于西方思想的緩慢滲透而開始被填平了，結果使西方觀念和價值標準在19世紀末在中國士大夫中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更重要的是，伴隨著西方思想的傳播而來的是士大夫對這種傳播的態度的重大變化。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人對于西學僅有的一點興趣大部分集中在技術知識（“藝”）上。但在該世紀末，如果我們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一本有關西學的中文文獻目錄來作判斷的話，那么，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已轉向西方政治經驗和政治知識（“政”）以及西方宗教思想（“教”）等方面了。[[7]](#_7_Liang_Qi_Chao____Xi_Xue_Shu_M)

士紳文人日益接受西方的知識和價值標準，這使西方思想從中國文化的外圍向其中心滲透。這種滲透引起了西方思想和本國思想傾向的大融合，最后產生了19世紀90年代中期思想的風云激蕩。當然，這種激蕩之勢只有從普遍要求改變現狀的迫切愿望的背景中才能理解，而這種愿望都是由帝國主義不斷增長的侵略所激起的。但是1895年以后的民族危機氣氛只不過是一種觸媒劑，它促進的變化在19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了。

這類的發展之一是基督教傳教士們在19世紀90年代的知識傳播活動。在1860—1900年之間，新教和天主教這兩種基督教教會的傳教活動很少成功。事實上，從中國士紳文人在19世紀后期經常發生的反洋教事件中扮演領導角色這一點看，基督教教士在填補他們與中國社會精英之間的文化裂縫上似乎收效甚小。但是有些傳教士并非單純從事傳播基督教福音的宗教代表，他們也扮演費維愷恰切地稱之為“文化掮客”的角色，為受教育的中國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識。在這非宗教的活動方面，他們主要依靠三種機構：學堂、民間團體和報紙。在19世紀90年代，后兩種機構作為他們的文化活動工具，是特別重要的。

在1887年這幾方面的工作進展很大，這一年建立了一個在中國人中間普遍稱它為廣學會的組織。雖則學會不完全是傳教士創辦的，但他們是創立該會的發起人。在促進該機構的活動方面傳教士提供了推動力，特別是在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它的總干事之后。在他有力的和富于想象力的領導下，這個組織不但大大擴展了自己的活動，而且采用了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勸說中國的社會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價值。[[8]](#_8_Wang_Shu_Huai____Wai_Ren_Yu_W)這種做法被證明很有成效，對中國的社會精英的影響程度是19世紀60年代大規模傳教活動在中國開始以來所未曾有過的。廣學會在中國政府官員和士大夫中的影響表現于兩個方面。首先，作為一個兼有知識和政治目標的自愿聯合機構，廣學會提供了一種組織的樣板，對有意于改革的許多文人來說，它是很合心意的。其次，廣學會的知識影響體現在它的數量很大、內容多樣的論述西學和世界新近形勢的譯著中，其中包括如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末》這樣一些很著名的作品。

在廣學會的出版物中，最流行的是《萬國公報》。這種月刊的前身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1868年創辦的《教會新報》。1874年改稱《萬國公報》以后，這個雜志不但變成傳播基督教信仰和西方非宗教知識的工具，而且成了社會批評和公共建議的論壇。[[9]](#_9_Bei_Nei_Te___Liu_Guang_Jing)《教會新報》以它的傾向性和版式在當時中國存在的報紙中獨樹一幟，因為那些報紙不是適合于通商口岸的商業界，就是適合于教會的通訊交流。《萬國公報》在1883年停刊，1889年由廣學會接辦時復刊。林樂知仍是它的主筆，雜志仍然保持它原先的傾向性和版式，致力于用文言文介紹西學和有關世界事務的最新情況。它的發行額在19世紀90年代迅速增加，高達四千份左右。作為文化掮客，基督教傳教士終于能夠使士林普遍受到他們的影響，其成績是他們直到1890年為止在傳教活動中從未取得的。[[10]](#_10_Wang_Shu_Huai____Wai_Ren_Yu)

《萬國公報》對于維新時期思想激蕩的貢獻，應由它對當時中國文人的影響的性質來加以估量。首先，使用報紙和雜志作評論社會與討論公共事務的工具，無疑為19世紀90年代后期將要出現的、新型的社會政治性的中國報業樹立了榜樣。其次，《萬國公報》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對于激發新思想和新價值標準來說，也證明是一種強有力的酵素。當時的一份權威西學書目列入了許多廣學會出版物，特別把《萬國公報》作為新知識的源泉加以介紹。[[11]](#_11_Chen_Qi_Yun____Liang_Qi_Chao)誠然，傳教士的思想影響并非自始至終都是明確的和直接的。因為在《萬國公報》和其他刊物提出關于公共事務的建議和開展社會評論時，傳教士通常都還沒有以任何公開的方式向中國的各種帝國制度提出挑戰。可是，他們在自己著作中介紹的社會政治消息和理想，經常隱含激進的東西，使有志于改革的中國讀者非常樂于引用和吸收。這樣，傳教士的出版物鼓動政治改革的理想多于提供政治改革的內容。

另一發展是19世紀90年代初一些有志改革的中國學者所出版的政治著作，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宋育仁、陳虬、湯震、鄭觀應、陳熾和何啟。他們的改革思想在許多方面和前此30年的思想相比并無新意。他們對國家富強的關心以及他們關于行政和教育改革、關于商業和工業的思想，要么與19世紀60年代以來多少流行過的類似思想相呼應，要么就是這些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即使是他們那些最大膽的，例如要求對科舉制度大加改革的建議，都早已在傳教士的著作中概乎言之了。

然而，在政治思想領域，19世紀90年代初期維新派的著作有其特色，他們和在此以前數十年中的那些人有肯定的區別。幾乎所有維新派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漸接受了西方的國民參政觀念。這在他們提倡的議會制以及他們中有些人所稱的“君民共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這些主張在19世紀70與80年代的改良派思想中只是很膚淺地、含糊其辭地被提了出來，而現在卻成了頭等重要的問題。誠然，他們所設想的參政仍是有限的。宋育仁仍然模糊地設想以傳統的方式來擴大皇帝與官員之間的聯系。湯震、陳熾和陳虬認為，“議院”成員應來自官員以及身為社會精英的士紳文人中間。鄭觀應，特別是何啟和胡禮垣，設想過一個有更廣泛的人們參加的議院。他們的參政思想仍然不是充分民主的，因為參政有地位和財產的限制；此外，皇帝在制定所有政策時仍然是擁有大權的。這些改良主義思想家之所以為參政劃定框框，是因為他們多少都持有一種認識，即中國并不具備完全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12]](#_12_Song_Yu_Ren____Cai_Feng_Ji)

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在君主立憲下的參政，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一種手段，因為他們壓倒一切的關心之事是在猖狂的帝國主義時代如何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當他們研究西方國家強盛的秘密時，他們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著眼于技藝精巧和工商繁盛。此時他們發現，西方國家發展的關鍵主要在于它們消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壁壘，從而取得了共同意志和集體行動的能力。據陳熾說，這種能力在西方的特殊發展應該歸功于無與倫比的議會制度，它能“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13]](#_13___Wu_Xu_Bian_Fa____Di_1Ce__D)。這樣，隨著這些早期改良主義者的出現，便開始形成了一種傾向，即把民主融化于民族主義之中，并把民主僅僅看成民族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傾向在后來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間變得十分明顯。

然而，并非所有要求改良的知識分子都是被這種把參政作為手段的觀念所左右的。例如，19世紀90年代后期其著作在通商口岸廣泛流行的何啟和胡禮垣，不但傾向于把民主看成是推動國家富強的手段，而且也就其內在的意義來看待它的價值。在他們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孟軻式的反對專制主義的道德說教已發展成為對民權統治作為施政普遍原則的贊揚。按照這種觀點，傳統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受譴責，不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效率，而且還由于缺少道德方面的合法性。[[14]](#_14_He_Qi___Hu_Li_Yuan____Xin_Zh)無論是以道德為理由，或是以政治為理由，重要的事實是，所有這些早期的改良主義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愿意看到對中國的政體朝著非正統的方向進行改組。

對于晚清的改良主義者來說，這種愿望是一個重要新起點的標志。在此以前改良主義的思想都是以以下兩個想法為依據的：一是假定傳統政體具有合法性；一是先假定只有在傳統政治體制內才能實現適當的改革。現在它的合法性受到了懷疑，那么就要在另外的基礎上考慮組織政體的可能性了。用當時的話來說，西學不僅是技藝之學，而且也是政治學的知識源泉。

和他們對傳統國家制度的廣泛批評相比，這些改良者一般還沒有批評舊秩序的信仰一思想基礎（即儒學），這是很有趣的。事實上，他們中間有些人，如陳熾、陳虬，特別是宋育仁，不憚其煩地以保衛儒家和維護綱常名教的正當性為己任。如陳熾就認為，在中國，和一種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健全的道德思想體系。對于大多數改良派來說，他們的政治改良主義的激進性中隱藏著道德—思想方面的保守主義，因而使改良主義的激進程度有所緩和。[[15]](#_15_Song_Yu_Ren____Cai_Feng_Ji)

在這里何啟和胡禮垣又可作為突出的例外。他們在香港寫作，何啟在那里是一個兼有英國的法律和醫學學位的頭等公民，娶有英國妻子。許多改良主義者對西方立憲制度和議會制度的向往受到他們忠于儒學的感情的束縛，而何、胡二人卻不同，他們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立場上對傳統的政體進行無情的攻擊，這反映了他們道德和思想意識方面的激進程度。在他們的出版于19世紀90年代后期的論戰著作中，他們不但批評了獨尊儒術的傾向，而且對整個儒家經書是否適合中國這個國家的實際需要也表示疑問。他們的激進觀點幾乎點名攻擊儒家，并且到了公開向神圣化了的儒家“三綱”學說進行挑戰的程度。“三綱”學說要求人們必須遵行權威主義，把它當作國和家的組織原則，這和他們所承認的平等信仰背道而馳。因此，它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一個傳于后世的意識形態基礎，是必須予以摒棄的。顯然，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所背上的道德觀念體系的包袱是有缺陷的，正如它的政治制度、工藝文化也是有缺陷的一樣。[[16]](#_16_He_Qi___Hu_Li_Yuan____Xin_Zh)

在所有這些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批評，意味著改良者感覺到，在中國所面臨的三個主要問題（即“藝”、“政”和“教”）上都需要向西方文明學習。西學價值概念的擴大，確實表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只注重工商技藝的老路子，這種路子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的西學觀點中曾經流行過一時。現在由于西學威望的提高，對西學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關系，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新的看法了。

必須記住，正統理學的形而上學二元論世界觀認為，世界上每樣東西，無論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則和物質的融合。后者從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質特征，而前者則以后者為其具體形式。因此，兩者被認為是不可分的。理學用不同的公式來表達這種本體論的二元論，其中通行的一對概念范疇是“道”與“器”，或是“體”與“用”。

在理學的理論體系中，雖則從邏輯上說道在器先，但這種優先地位并不包含具有較高價值之意。然而在19世紀比較流行的論述中，道和器這對范疇有意無意地被賦予了價值的含義。有些中國學者在試圖說明西學而運用這對概念時就有這種情況。1860年以后，那些按照道與器這對概念來看待西學意義的人往往稱西學為器，中學為道。這樣，賦予西學的價值只是工具的價值，是第二位的，而傳統的儒學仍被視為高高在上，具有本質的和基本的價值。但到了現在，在承認西方政治理想和制度的價值的同時，19世紀90年代初期的某些改良派的著作中出現了強調器不能與道分離的明顯傾向。如果西學被發現有器的價值，其中必有道，因為在任何事物的器中必然有道。顯然，這種思想路線所暗示的傾向是，頌揚西方不但產生了工具的、第二位的價值，而且也產生了本質的和主要的價值。[[17]](#_17_Xiao_Ye_Chuan_Xiu_Mei____Qin)

盡管這些改良派思想家都認識到中國的主要政治制度需要改變，但是他們的共同政治理想并非任何協同一致的思想活動的結果。他們互不來往，卻不謀而合。雖則他們在19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有助于改變這十年間的學界氣氛，但是他們的影響加起來也遠遠比不上當時以康有為為其領袖的一群年輕廣州士子所發起的思想政治運動的影響。

## 康有為和新思想的風云激蕩

康有為（1858—1927年）是一名廣州士子，他的書香門第出身在當時也是很不一般的。他出生在一個有理學傳統的士大夫家庭中，他想象自己應作一個圣人，因此早在童年時代就開始有一種道德使命的強烈意識。后來在青年時代，他的使命感在他老師朱次琦的深刻影響之下被賦予一種增強了的社會傾向性。朱次琦是廣東的一位著名儒學家，他強調的是儒家學說中道德—政治這一主旨。

與此同時，康有為通過廣泛閱讀儒家之外的哲學和宗教著作，深受其他方面知識的影響。大乘佛教給他留下的印象特別強烈。大乘佛教的菩薩作為受難的救世主形象是和儒家圣哲的典型一致的，這使他的使命感和對社會的關心更為強烈，而大乘佛教的宗教教義加深了他的存在主義意識。

當康有為到香港和上海旅行并被西學吸引時，他的思想境界進一步開闊了。在19世紀80年代初，他開始閱讀能找到的所有有關西方的書籍。在此期間，因為他住在廣州附近和香港，他自然強烈地感覺到了19世紀中國再三遭受的西方國家的侵略。在1884年中法戰爭開始時，他正在廣州，親身體會到迫在眉睫的外國襲擊所造成的緊張和恐懼。對西方國家力量和好戰精神的直接感受，必然使他特別迫切地要求學習西學。他對西學的特殊興趣立即引導他去發現將促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的新的知識世界。[[18]](#_18_Huo_Hua_De____Kang_You_Wei_D)

由此可見，到19世紀80年代初，康有為已經在家傳的理學之外受到多種知識的陶冶，即受到非儒家的中國古典哲學、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的影響。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這些影響開始具體化為支配他全部生活的兩個關注的中心，一是憑經驗產生的對新世界的渴望，在這個新世界里，他到處看到的混亂、痛苦和不公正將為道德的和諧與心靈的愉快所代替。這種“普”度眾生的宏愿明顯是受到他所研究的儒家、道家、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經典的影響，并促使他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斷斷續續地致力于形成有時混亂、有時矛盾，但卻始終是大膽而嚴肅的世界觀，用以了解展現在他面前的新世界的意義。

除了精神上普濟眾生的宏愿之外，他還有一種由于中國民族危機的增長而產生的更加具體的關心。這從他對非宗教的西學，特別是對西方政府的形式所表現的強烈興趣中可以看出來。1886年他向當時駐廣州的總督張之洞上書，提議翻譯西方有關政治的書籍，這也反映了他的志趣。康有為的愛國心最終導致他采取大膽的政治行動。1888年秋末在北京應試時，他不顧朝廷禁止非官員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書的為時已久的規定，向皇帝呈遞一份轟動一時的條陳，請求“變成法”。除了這個大膽的請求之外，他對改革的具體方法的主意是含糊的和一般化的。但是在該條陳中，一種國家完整受到西方侵略威脅的強烈感覺是情見乎辭的。[[19]](#_19___Wu_Xu_Bian_Fa____Di_2Ce__D)

從一開始，康有為就看到西方擴張的威脅不僅僅在社會政治方面，而且也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除了民族危機之外，中國又因受西方基督教吞沒的威脅而陷入一場精神危機。因此，處于危險關頭的不僅是作為“國”的中國，而且還有作為“教”的儒家。為了對付西方擴張的挑戰，“保教”和“保國”同樣重要。這雙重目標終于構成了康有為改革綱領的核心，這綱領在他于1895年到1898年之間向光緒皇帝呈送的一系列條陳和政治著作中詳細地提了出來。

康有為政治綱領的目標是一系列制度改革，這些改革如果付諸實施的話，等于一場“來自上面的革命”。這個綱領的第一步是建立制度局，直接置于皇帝領導之下，由有志于變法維新的官員組成。這個局負有規劃和實施制度改革的責任。綱領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建設現代的海軍和陸軍。為了這個目的，以考察弓、刀武藝為主的傳統武舉制應予廢除，并按照普魯士和日本軍事學校的模式來設立現代化的軍事學堂。這些軍事學堂應提供能成為新型常備軍核心的專業軍官，這種常備軍則準備取代當時清政府的無能的軍隊。

在康有為的政府改組綱領中，比軍事改革更為重要的是發展經濟的計劃和使財政合理化的措施。制度局下的12個衙署中有一半是處理這兩方面的事務的。強調國家有責任促進工、商、農、礦和現代化運輸事業，是康有為的改革綱領中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主題。[[20]](#_20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這些改制的思想基礎是康有為所接受的尋求國家富強的政治理想。他向清廷推薦俄國的彼得革新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中國的榜樣，這就最清楚不過地反映了他所致力的目標何在了。[[21]](#_21_Huo_Hua_De____Ri_Ben_Zai_Kan)

康有為的另一部分改革建議是主張對文教制度進行果斷的革新。這些建議提出，中國政府應采取特殊措施以確定儒學為國教，用以抵制外來的信仰——特別是西方基督教——的輸入中國。在這方面康氏主張在政府中成立教部，負責建立和管理全國范圍內的孔廟，并以孔子誕生之年紀年，來取代傳統的王朝和年號計年之法。[[22]](#_22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按照康有為的意見，在進行這種信仰—意識形態的保衛戰的同時，應該在文化上加強對西方世俗知識和觀念的了解。后一個目標可以部分地由大規模翻譯日本有關西方的書籍來完成，部分地則用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西方知識的辦法來完成。但是，吸收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步驟是實行果斷的教育改革，先從取消傳統的八股文和舊式武科這類傳統科舉考試制度中的重要科目做起，以專門的西學為基礎的考試來取而代之。康氏希望這些革新將最終廢除科舉制和建立全國性的學堂制度。

這種教育改革的部分目的無疑是為國家發展提供不可缺少的有文化的和有技術的公民。另一部分目的必須從康氏所接受的民治和立憲政府的西方理想中去尋找。康氏和其他早期的政治改革者都認為，君主立憲的一項重要職能是要增加政府之外的人民的參政機會，從而加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聯系。關于這一點，民主被稱頌為能達到民族團結和政治統一的有效工具。但是，康氏的立憲和議會政體的概念不僅僅被設想為功利主義的東西，他也把民主看成是將來所有人類社會必定會實現的政治理想。為了這個目的以及為了舉國人人富強的目的，受教育的公民是必不可少的。[[23]](#_23_Xiao_Ye_Chuan_Xiu_Mei____Qin)

就康有為的政治綱領而言，君主立憲和國家富強是他的兩個指導性理想。在他的兩個壓倒一切的目標——保國和保教——的后面，就隱藏著這兩個理想以及他對提倡儒教的關心。他的維新思想的依據是他對儒教所作的激進解釋的全面的思想體系，康有為之所以這樣解釋，主要是他與清代后期的一種主要思想流派——即今文學派——接觸的結果。在1890—1898年之間，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寫出了他的動搖儒家學者精神世界基礎的解釋。

他對儒學思想所作激進解釋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新學偽經考》，它出版于1891年。這本書企圖懷疑當時稱為漢學的考證學派；漢學自17世紀以來就在儒家學者中很流行。康有為并非致力于這方面工作的第一人；從18世紀后期以來，若干儒家學者已以各種校勘和訓詁的理由，試圖討論考證學是否配得上久受崇敬的漢學這一名稱。他們認為，“真正的”漢學不是考證學（后者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東漢儒學中占優勢的潮流，即古文學派）；而應是今文學派，即早在西漢流行的儒家思想形式。這樣，始于漢代而久已被人遺忘的知識領域的論爭，在清代后期又在儒家學者中間恢復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

康有為的一個挑起爭論的論點是在晚清今文學派學者——特別是當時該學派的一位學者廖平——所奠定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個論點的內容是，考證學（儒家的古文學派）的知識源泉，都可以通過文字校勘來證明它是偽造的；因此，真正的漢學——即可信的儒家學說——是今文學派所獨有的。[[24]](#_24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

康有為的目的是要力斥漢學之非，因為它對社會道德的冷淡態度可悲地偏離了孔子教導的本意；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肯定關心政治和政制改革是儒家的主要宗旨，他相信這就是今文注疏的精髓。1898年，他在他的維新思想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了這一解釋。

按照康有為的觀點，孔子尤其是一位偉大的革新者，他不但是儒教的先知般的創立者，而且也是建制之“王”。依據今文學派一些神秘的說法，他認為孔子在死前不久受天之命，要為即將到來的新王朝設計新制。用康氏的話說，孔子是一位“圣王”或“素王”，是以改制為務的。但是，在康氏的圖式中，改制意味著什么呢？在今文學派原來的文獻中，“改制”是一個廣泛而含糊的概念，帶有宗教神秘色彩，它更多的是暗示禮儀的改變，而不是現代意義的制度革新。但是，康有為的“改制”理想卻有改變制度的全部現代含義，就像在他的改革綱領中所清楚地反映的那樣。通過他對儒教教義的解釋，他設法為自己改革傳統中國政體的基礎尋求文化上的支持。

在康有為看來，改制不但可取，事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把歷史的變化看作直線的進步。這種觀念表現在他對孔子的描繪中，因為他把孔子描繪成救世主式的、有遠見的“圣王”，這位“圣王”認為歷史是通過若干特定的階段向理想的未來作直線的發展。盡管康有為的直線歷史觀顯然主要來自他所讀過的西方思想的著作，但他是根據今文學派的三世說來闡述這個道理的。按照他對這一種學說的解釋，孔子認為人類歷史不可抗拒地從據亂世通過升平世發展到最后的太平世，或如他以后在另一圖式中提出的那樣，經過小康世到達大同世。每一世都有與它相當的政治制度：據亂世為專制君主制，升平世為君主立憲制，太平世為共和政體制。隨著歷史通過三世向前發展，改制是不可避免的。簡而言之，制度的變化是歷史進程中固有的現象。[[25]](#_25_Xiao_Gong_Quan____Kang_You_W)

康有為把歷史看成經過各特定階段向前直線發展的進程，他的這一概念也包含了歷史進程最后將在理想的大同社會趨于完成的信念。他思想中的這種千年至福世界的理想，是他自青年時代即已專注的普救眾生的宏愿的反映。從“大同”理想中的明確表達看來，這一宏愿發自兩個方面，一是追求理想的人類共同體的強烈道德感，一是對于他認為的人類社會到處都充滿的苦難所引起的深刻而自覺的反抗精神。結果就使他產生幻想：在道德高尚的共同體中，苦難將消失，幸福無處不在。按照康有為的觀點，人類的苦難雖然形形色色，但都出于一源，即來自人們根深蒂固的自私心，和隨之而來的自己高于他人的習性。因為有了這些習性，社會到處出現了不平等現象，這種種不平等束縛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他所描述的未來普遍幸福的人類共同體中，康有為強調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任何歧視。這種激進的社會平等思想將涉及廢除幾乎全部現存的人類制度，包括國家、私有財產和家庭。在這個意義上，康有為的烏托邦“大同世界”充滿著激進的平等主義和普濟眾生的思想。[[26]](#_26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這表明康氏的世界觀是糅合了諸家之說的。

所謂“大同”，是康有為從儒家的烏托邦思想推導出來的。內容上它很像儒家的“仁”的理想，因為這二者都象征著對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完整的共同體的渴望。然而康氏對社會道德的激進主義超越了儒家所能接受的限度。例如，家庭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中心地位，所以仁的最終實現將導致產生道德共同體，但這種共同體只是家庭的擴大，而不是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大同理想甚至含有超越像家庭這樣的主要社會機體之意，由此可見，康有為的社會烏托邦理想吸收的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墨家學說的思想，至少與吸收的儒家思想一樣多。

康有為的這種世界上人人具有高尚道德的烏托邦理想，雖然已為他的門人和親密合作者所知，但在19世紀90年代并未公開發表。而且，在他的歷史發展觀點的體系中，這種人人幸福的理想只是與遙遠的將來有關。這樣，他的壓倒一切的目標仍是一個富強的國家。他的思想體系中起作用的部分仍是他對儒家的激進解釋，其核心是有關改制的思想。簡言之，雖則康有為把實現普遍幸福的共同體作為他最終的目標，因此不能把他視為民族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明顯地包括了民族主義這一大因素。

總之，他在19世紀90年代公之于世的那部分思想對士大夫有重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西方的政治價值觀，這是康有為與其他同時代維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種思想體系來闡明這些價值：這個體系不但把它們納入對儒家總的解釋之中，而且將它們和清末國內的重要思潮聯系在一起。由于康有為以人們熟悉的傳統形式提出問題，因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發揮的號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發揮的要大得多。盡管他對儒家思想的激進解釋使他的許多同時代人感到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雖然許多中國士大夫仍然討厭西學，但他們不能對它置之不理。由于康有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國文人官僚對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想為19世紀90年代學風的改變提供了有力的刺激。

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著重大的意義。政治上，它要求改制，這意味著懷疑政府的政治效率。更重要的是，他主張的民眾統治、參政和立憲政府等西方政治觀念都和其他政治維新派多少有相通的地方，這樣就一起向傳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隨著這些新政治價值觀對公眾意識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不但面臨著行政管理崩潰的現實，而且開始了以辛亥革命為結果的政治瓦解的進程。

思想上的意義也同樣重要，這是康氏對儒家進行激進解釋的結果。誠然，儒家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曾有過各種不同的解釋，但對儒家基本的社會—政治價值觀和信仰，卻是很少被準許各抒己見的。康氏已經使人對這些主要的價值觀和信仰產生疑問，這一事實即意味著作為中國信仰核心的儒家正日趨衰微。當康有為在改變長期被公認的孔子形象和孔子學說的價值觀的內核方面走得如此之遠時，其含義就更加嚴重了。任何讀過康有為的富于煽動性解釋的人必然產生一個感到煩惱的問題：儒家的本來面目和特征何在？這個問題的出現預示著這樣一種后果：使儒家學說從一直是無可懷疑的信仰中心，變成了其基本特征是可疑的和有爭論的一種思想體系。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個問題的出現必然是一大震動。它沖擊著中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像火山爆發和地震一樣。

## 維新運動

康有為發表他的維新思想體系無疑對思想界的變化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當他以此激起和組織一場維新運動時，沖擊就更大了。這個運動的基礎在康有為于廣州創立私塾長興學舍（他在那里教著一小批勤奮好學之士）時就已奠定。它的課程已有所革新，不過仍維持著儒家的格式，盡管如此，它實際上已與當時的儒塾背道而馳了。課程中基本上包括康氏對儒家學說的激進解釋，著重研究大乘佛教教義、中國的非儒家思潮和西學；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向學生灌輸康氏的政治意識和維新理想。因此，這些學生中有許多人后來都致力于政治活動，就不足為奇了。其中，梁啟超成了康有為在改制運動中的主要助手。[[27]](#_27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

盡管康有為在1888年已上書朝廷倡言變法，但是他推動變革的活動直到1895年才以持久的大規模運動的形式出現。他重新開展這一運動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中日戰爭中的敗北，此事對公眾意識所產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對外戰爭的失敗都要大。首先，這場災難使中國遭受的物質損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開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驚的賠款之外，它還喪失了對最后的重要屬國朝鮮的宗主權，而且向日本割讓了自己的大片領土——臺灣和遼東半島。這樣巨大的犧牲出現在二十余年大聲疾呼的“自強”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別令人震驚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國歷來輕視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國家，所以，深深的喪師辱國之感特別具有辛辣意味。

在1895年春天，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同到北京參加會試。當中國被迫于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關簽訂屈辱的和約時，康有為立即抓住這個機會鼓動和他一起應試的士子堅決反對和約，并向朝廷請愿要求變法維新。結果引起了一場戲劇性的反對和約的請愿。1300名士子簽署了由康有為起草的激動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絕和約，著手改革。所有這些主張和請愿都沒有受到理睬。然而公眾關心國事的氣氛已經造成，從而激勵著康氏進一步開展他的運動。[[28]](#_28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這次維新運動比起康有為在1888年單獨首先發動的那一次，范圍要大得多。在那時，他的努力沒有超出向皇帝上書言事和向朝廷大臣游說的范圍。而這時康有為繼續進行新的嘗試，即在1895年初夏繼驚人的群眾請愿之后，又向朝廷提出兩個大膽的變法請求，企圖從上面首先開展改革。與此同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作出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他們在向朝廷請愿的同時努力爭取來自下面的支持。這些嘗試的基礎是維新派長期夢寐以求的目標：在中國建立立憲政府和國民參政制度。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單純上面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輔之以“開民智”。

為了促進這個運動，康有為和他的合作者創立了新的組織和新的宣傳工具。最重要的組織是學會，它起兩個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執行促進思想一致和組織團結的最重要的一體化功能，沒有這些，要形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的。其次，它的更特殊的任務是教育和動員文人士紳。康有為及其朋友雖然希望看到“開民智”的良好形勢，但他們也同樣地知道中國民眾普遍缺乏教育，還沒有為承擔這樣一種任務做好準備。在普遍教育和群眾啟蒙實現以前，許多地方有賴于中國社會“中產階級”——有功名的紳士——的領導。一方面，這個階級構成地方上的社會精英力量，比人民群眾受過較好的教育，能力也較強。另一方面，和官僚們比較，紳士更適合于領導民眾，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接近民眾，與民眾的關系也較密切。由此可以看出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重要性，正如梁啟超所說，紳士“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

但不幸的是，紳士們還沒有做好扮演中間人角色的準備，也沒有做好充當廣大群眾的啟蒙領導的準備，因為他們既沒有政治動力，又不省察國內外大勢。而且，就他們的教養而言，他們很少有公民精神和組織才能。為了克服這些缺陷，年輕的維新派把學會看作對他們進行教育和動員的最有效的工具。

這些學會是根據地區和專門化知識這兩個原則組織起來的。它們首先在北京和上海開始創立，接著在各省、府、縣、鎮成立分會。同時，為了用新知識教育官、紳人士，各種專業學科的學會紛紛成立，遍及全國。維新派期望用這種方法組成全國范圍的學會網，以促進“民智”。[[29]](#_29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康梁集團用來推進運動的另一個新手段是報紙，他們認識到了這是在民眾中間傳播新知識、新觀念以及促進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雖然康有為向朝廷吁請變法的努力歸于失敗，但他不顧官方的壓迫和社會的阻撓，利用學會和報紙來推進“開民智”的工作，這一努力是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里程碑。

康有為在組織學會方面的第一次嘗試是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強學會。盡管康有為是該會背后的動力，但當時中央政府一位地位不高的官員陳熾卻被推為正式負責人。起先，學會辦得很成功，不但將首都許多有志改革的學者官僚集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西方人士參加，如英國公使歐格納，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更重要的是，它的會員名冊中包括一些清朝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其中有張之洞、王文韶和劉坤一等幾位總督，有翁同龢、孫家鼐和李鴻章等幾位朝廷命官。[[30]](#_30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許多捐款使學會的財政也很充裕，會員們每10天定期集會一次，聽取有關時事的公開講演。

梁啟超被委任為書記員。當日報《中外公報》由學會主辦出版時，梁啟超和麥孟華（康有為的另一個學生）成為該報編輯。該報通常只有一篇由梁啟超或麥孟華撰寫的時事述評文章，但偶爾也轉載一些廣學會出版物中的作品。為了促進它在北京的學者官僚中間的傳播，采取了免費和京報一起分送的辦法。最盛時它在北京發行3000份。

在此期間，康有為認為上海是“南北之匯，為士大夫所云集”，便于1895年秋天在當地成立強學會分會。分會從當時在南京代理總督職務的張之洞那里接受許多經費，經辦自己的報紙《強學報》，和《中外公報》一樣免費散發。[[31]](#_31_Tong_Shang_Shu__Di_249Ye)這樣，在多事的1895年春天以后的幾個月里，在學者官僚中間出現了若干新的和重要的動蕩，它們不但喚起普遍的民族危機感，而且將這種危機感納入要求變法的直接的和協調的運動中去。

然而，這些組織的努力立即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壓制。張之洞撤回了他對上海分會的財政支持，而且封閉了報紙，因為報紙用孔子生辰紀年而不用清朝年號紀年而觸怒了省當局。顯而易見，張之洞從這件事中看出了它對清朝不忠的不祥傾向。同時，北京的學會也受到政府的打擊，盡管它在上層得到相當大的支持。1896年2月，一位御史指控強學會非法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能會在士子中間助長無節制地討論政治和公開批評時政的危險舉動。這次彈劾一經提出，不可能不為朝廷所注意。自1862年以來，清朝的既定政策就已經是禁止私人針對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議和請愿，以及禁止私人結社。政府按照御史的指控取締了該學會，從而使它建立僅僅五個月就關了門。[[32]](#_32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雖然解散強學會和取締北京、上海兩地主張變法的報紙之事對于正在成長中的維新運動是一個挫折，但是新的機會立即又在別處出現了。在1896年春天，緊接著上海分會被封閉之后，它剩余的經費和另外的私人資金被用來創辦一份報紙。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被邀請任主筆。這就是著名的《時務報》的開端，它于1896年8月起在上海發行。第二年春天，在澳門創辦了一份附屬報紙。該報開始時稱為《廣時務報》，后來改名《知新報》。這兩份報紙使變法運動在長江下游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保持著生氣。[[33]](#_33_Tong_Shang_Shu__Di_231__243)

《時務報》的精華是梁啟超寫的文章。他是康有為的忠實弟子，因此，他的許多寫作不用說是受到康有為的強烈影響的。然而，細心地閱讀就可以發現，梁啟超的作品并不是簡單地宣傳康有為的思想，而是有所發展，使民族主義和民主化在變法綱領中更為集中突出。

像康有為和當時其他有志于變法的學者們一樣，梁啟超強烈地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于學習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復興，政治的改革比西方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如果政治改革成功，軍事和技術的革新將自然而然地會實現，而沒有政治變革伴同的單純的技術革新，其結果只是浪費精力，這在自強運動中已經充分證明了。換句話說，梁啟超的變法綱領斷言，政治改革與技術革新相比，應占首要地位。

梁啟超堅持，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從根本上說，這包括廢除科舉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系統。這種新途徑的首要目的是在民眾中間普及識字和有用的知識，而同樣重要的是，也要提供以中國文化傳統和西方政治理想及經驗這兩方面的知識為基礎的政治教育。梁啟超希望，從這些新學堂里將會產生有知識的和有政治覺悟的公民。

梁啟超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兩個主要的概念，即變和群。在康有為的歷史哲學和當時傳入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之下，梁啟超首先設想變應分階段發展。然而在梁氏的思想中，這種變是由一種新的政治意識——即被歸納為群這一多種意義的概念——所支配的。這個名詞表示需要在士大夫中間建立聯合，以便動員和組織他們開展社會和政治的活動。意義深遠的是，除了聯合的理想之外，群還包含著深刻地貶低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價值的某些更廣泛的政治理想。根據梁氏的意見，古代君主制主要適合于維護統治王朝的政體，因此經常是純粹壓迫人的。這樣一種壓迫人的制度，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國際競爭的現代世界中，是不能維持中國生存的。首先，它將妨礙在民眾中間產生力量和朝氣，而集體的活力對于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壓迫人的君主制阻礙人們的交往：不但阻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交往，而且也阻礙社會的不同方面之間的交往。缺乏這種交往，傳統的中國社會就像缺乏民族生氣那樣缺乏民族團結。

隱藏在這種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指控下面的思想，顯然是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受到民族主義和達爾文派關于世界為無情的國際競爭和斗爭所支配之說的強烈影響。在這個時期梁啟超從來沒有明確將這個概念和民族主義等同起來。事實上，作為康有為的親密追隨者，他仍然聲言信仰康氏的普濟眾生的理想。然而潛藏在他的政論作品表面之下的，正是民族主義的思想。

但是，民族主義在梁啟超的新政治共同體夢想中雖屬重要，卻非唯一的決定因素，因為一方面他對傳統政治秩序作了實用主義的估價，一方面他又關心道德上的合法性。傳統的王權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無能的，它在道德上也應受譴責。梁啟超把國家看作應該屬于共同體全體成員的一個共同實體，即不但屬于統治者，而且也應屬于被統治者。因此這個共同體應該是它的全體成員的利益和愿望的綜合。民眾由某一個統治者或統治家族來加以統治，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丑惡表現，因此其結果只能使共同體蛻化變質。這種新的共同體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類似盧梭的民權和公意的理想。簡單地說，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體看作政治變法的最終目的，其中不僅有活力和團結，而且也體現了民主主義。[[34]](#_34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

梁啟超的變法主張集中到這種新的政治共同體理想上，其最終目的在于使中國的傳統政治秩序發生根本的變化。這些激進觀念的傳播立即使政治變法論成為風起云涌中的思想激蕩的焦點。當這種風云激蕩擴展開來時，變法運動逐漸失去了它開始時在康有為單獨領導下那種明確的一元性。確實，康有為的變法綱領和思想體系仍然代表運動中最公開和最明顯的部分。然而，在運動下面的其他思潮則和康有為的思想大不相同。這樣，維新變法作為思想運動看起來可能最像一種帶有各種顏色的光譜。在較溫和的一端往往可以發現由陳寶箴和黃遵憲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類型，他們也同意康有為的需要改制的主張，但是未必同意他對儒家學說所作的激進解釋。在這個溫和派別中，某些思想狀況本質上和自強運動提倡者張之洞及李鴻章等人的態度基本上并無二致。可是，在比較激進的一派，其觀點和同時代的革命運動很難區別，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進。在這種背景下，有兩個人物應該特別受到注意，因為他們在圍繞著變法運動發展起來的日益擴展和日益復雜的思想激蕩中扮演著領袖群倫的角色。

其一是嚴復，他在青年時代曾在英國留學兩年，因此屬于不但懂得西方語言而且也直接觀察過西方的少數中國人之列。在1895—1898年間，他在天津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表達他自己關于中國民族危機和需要改革的觀點。1897年，他是傳播新知識和發表維新觀點的天津一家新型報紙《國聞報》（它很快成為華北的最重要報紙）和周刊《國聞匯編》的創辦人之一。在那些年，他還開始了他的翻譯事業，完成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譯注，此書取名為《天演論》。嚴復的著作和翻譯立即對讀者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天演論》在1898年出版后取得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響，因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讀過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經對嚴復佩服得五體投地。

按照當時的標準，嚴復的政治態度是非常溫和的，因為他提出的僅僅是漸進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這是和預期未來中國文化將經歷一場徹底的改造這樣一種思想上的激進態度聯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漸進主義和在思想上的激進主義二者都產生于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觀點，而這主要是他研究斯賓塞哲學的成績。

斯賓塞的思想認為，進化必然是緩慢的和累積的，不能飛躍地前進，這使嚴復不相信任何激烈變化的奇跡。實際上，這是說，在中國人民做好準備以前，不應進行制度改革；為了在體質、知識和道德上改造他們，需要漫長的教育過程。嚴復的目標也同樣是在將來徹底改變價值觀。

嚴復的文化激進主義發端于他對國家的熱切關注，即如何實現共同富強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一個猖獗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生存下去。嚴復那種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表達出來的對集體的關注使他相信，集體富強只能求之于一種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學。這種天地之學把天地描繪成為質和力所會之寶，它處于從“始于一氣”向“演成萬物”的持久進化過程之中。整個宇宙如此，人類世界也如此，在人類世界中，活力產生于生存競爭，進化由生存競爭推動。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存競爭在人類之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生命卻大量增加；而且它作為動力和發展的源泉，對于世界來說也是一種幸事。

對現實的這種看法鼓舞和吸引了嚴復，因為它突出了他所重視的關于斗爭、活力和進展的思想。達爾文主義的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使他向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嚴復看來，現代西方奇跡般的成就在于，在西方，個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還能被融合而產生集體的活力。現代西方的社會精神是公眾精神和原始力的獨特而和諧的結合。根據嚴復對西方思想的研究和他對英國的觀察，這種結合只能在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的環境中產生。他對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集體活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觀和基本的價值觀而言，嚴復是一個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這導致他對中國的傳統進行無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體力量充溢現代西方的同時，他在中國傳統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縮。他在把中國與現代西方進行對比后著重指出，中國是軟弱的，因為過去中國的圣賢在培養民眾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歷代王朝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卻都是在壓制他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幾乎是全面地、徹底地駁斥當時思想界唯中國之法是舉的傾向，不但攻擊科舉制度的機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籠統地把當時全部儒家學派都視為思想的廢物而不屑一顧，這就不足為奇了。醫治中國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35]](#_35_Shi_Wa_Ci____Yan_Fu_Yu_Xi_Fa)

另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是年輕的湖南學者譚嗣同，他屬于迥然不同的另一種知識分子類型。作為高級政府官員之子和中國士大夫的一個成員，譚嗣同深受儒家教育。后來，在他成年的初期，通過對知識的探索，他受到西學、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響，同時他也受到在19世紀末年重又流行起來的古代非儒家哲學——特別是墨家學說——的影響。這些多樣化的思想影響使他形成了一種折中主義的觀點，1896—1897年，他將這一觀點正式寫在一本有煽動性的小冊子《仁學》中。雖則這本小冊子直到20世紀初才出版，但其內容在出版前已為他的親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啟超在內。

《仁學》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現一個大同社會。這樣一種社會將充滿生氣和活力，不斷向更美好的未來發展。它也是以激進的平等主義和自由地表達感情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體。這種烏托邦幻想既來自宗教的普濟眾生主義以及大乘佛教、理學、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也來自現代西方工商社會的生氣勃勃的時代精神。然而，在《仁學》中明顯地沒有流露出民族主義意識，而這在譚嗣同的許多同時代人思想中已開始成為突出的特征。

從對世界的這樣一種幻想出發，譚嗣同發表了對中國傳統的過激的批評。他像嚴復一樣攻擊傳統的君主制，將它描述為一種最黑暗的專制主義，壓抑人類的能力和感情。但與嚴復對傳統制度的攻擊范圍僅限于政治秩序不同，譚氏的抨擊還擴大到傳統中國的主要社會制度——家庭。這從他對傳統的道德和社會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綱教義）的毫無保留的詰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類全部關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絕對統治的權威原則為基礎的。譚嗣同認為，父子、夫妻這兩種家庭關系和君臣這種政治關系一樣，都是腐敗的和壓制性的。在譚嗣同看來，這三者構成了單一的乖張和壓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傳統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墮落。

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個能生存的人類共同體，譚嗣同呼吁沖決三綱這一令人窒息的羅網，進而消滅中國的整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與康有為或嚴復不同，譚并未提出有步驟的改革綱領，他的《仁學》也未指出如何用具體而明確的步驟去實現他的幻想。可是，在這整本小冊子中他都用熱情洋溢的語言鮮明地表達了完全否定和徹底解放這兩個如影隨形的主題。在這些語言中產生了一種革命的蒙眬概念。[[36]](#_36___Tan_Si_Tong_Quan_Ji_____Di)

從上述情況我們已經看到，盡管變法維新運動中的思想激蕩之勢包含各種各樣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種激進的傾向為特征，這種特征反映了對兩個主要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對國家富強的廣泛要求。另一個是對宗教道德意義的探索，這主要表現在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思想中。激進思想是由對這兩方面的關注助長而成的，它打擊了傳統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礎。這樣，在1895年之后的數年中，思想沖突不但發生在激進的維新派與保守的士大夫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激進的與溫和的維新派之間，這就不足為奇了。1897年下半年，這種思想沖突終于在湖南趨于公開化。

## 湖南的維新運動

當1896年初康有為的運動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壓制以后，維新運動不得不將它的活動限制在上海和澳門從事思想宣傳，以取得公眾的支持。但與此同時，新的發展也在湖南進行，省府長沙立即成為維新運動的中心，這樣就使它有在省一級獲得成功的機會。

這時湖南的維新必須在19世紀后半期中國國家和社會發生的兩大變化這一背景下來加以理解。第一大變化是督撫的權力增加了，這是19世紀中葉的各種叛亂，以及這些省級官員們為了應付中國面臨的國際危機在自己轄區內各自在經濟技術發展和制度變革方面所作種種努力的結果。19世紀60年代初以后三十余年中的這些革新努力，構成了所謂自強運動的大部分活動。

第二大變化是地方名流勢力的增加。庫恩已經說明了他們的力量在19世紀中葉叛亂的年代中是如何通過組織地方自衛武裝而發展起來的。還有種種跡象表明，這種力量的增長也導致紳士們進一步插手非軍事的公共事務。在大多數場合下，這無非是他們的傳統公務活動在政府軟弱時期的擴張而已。但在某些省份，這也同在與西方接觸時因受到直接和間接的刺激而產生的商業化有關。這些本鄉本土的發展的綜合力量使紳士在他們出生的城鎮和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37]](#_37_Ku_En____Zhong_Hua_Di_Guo_Ho)

因而，19世紀下半期，在各省官員勢力增長的同時，紳士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兩者活動的結合，導致19世紀90年代湖南開始的一場維新運動。首先，湖南所幸的是從19世紀90年代初起相繼有兩位能干的開明學者官僚在省內當政。1892—1895年吳大澂任巡撫期間已經開始在教育、經濟和軍事方面進行過若干革新。當陳寶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撫時，改革被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規模。他在致力于促進省政改革時，得到了他的有遠見的兒子陳三立的幫助，后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維新的文人學士中間有許多朋友。陳寶箴還得到管理省政的兩名高級官員黃遵憲和江標的協助。

黃遵憲是一位廣東的學者—詩人和歷練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國、英國和東南亞任過職。在長期的海外經歷中，他形成了強烈要求變法維新的傾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務（特別是日本事務）的權威。19世紀90年代，他的《日本國志》和關于日本的歷史詩篇是中國文人了解明治維新情況的一個重要來源。從1895年起，他積極從事改革政治的活動。他是康有為的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會員。在上海分會被解散之后，他是贊助創辦《時務報》的少數人之一，梁啟超是該報主筆。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鹽法道，隨后并曾一度代理過按察使。他不僅僅是熱心于在這些職掌范圍內進行改革的斗士，他對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識，特別是他對明治時期日本興起的理解，也是1895年以后在湖南開始制度革新的靈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38]](#_38_Wu_Tian_Ren____Huang_Gong_Du)

江標在1895—1897年間任湖南學政。雖然他是通過正規考試進入官場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觀點并不受傳統儒家學術的束縛。在經過會試之后，江標在北京同文館學習，后來訪問過日本。他在1895年參加北京的強學會，去湖南以后成為新學的一個積極發動者。[[39]](#_39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除了一個有志于維新的省署之外，湖南還是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治下；張之洞是技藝和制度革新的強有力的和堅定的發起者，對于維新運動的重要方面如報紙、學會等，他都給予有力的支持。同樣重要的是，這時省內許多有影響的紳士領袖對維新有著熱情。他們不僅對政府的改革努力給以熱烈的支持。事實上，他們在許多重要方面是采取主動行動的。因此，當1895年維新運動在湖南認真開始時，它是政府和省內名流的共同事業。鑒于19世紀后期湖南是眾所周知的紳士保守主義的堡壘，湖南紳士提供的合作確實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19世紀90年代初，還可以看到以湖南為基地的席卷長江流域的排外浪潮。晚至1892年在湖南建造電報線路的一次嘗試，在當地民眾中間引起了一場騷動。[[40]](#_40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隨著19世紀90年代的流逝，變革之風顯然在湖南強烈地刮起來了。

從一開始，技藝和經濟的革新就是維新運動的一個引人注意的方面。在巡撫倡導下，長沙有了電燈，建成了碎石馬路。在省署設立了采礦局，一條連接長沙和漢口的電報線路也得以建立。[[41]](#_41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比這些政府主辦的項目更為重要的，是著名的地方紳士自己創辦的企業。1895年后期，兩位紳士領袖王先謙和張祖同在巡撫鼓勵下建立了一個火柴廠。1896年，王先謙、熊希齡和省內其他紳士在本地普遍支持下，募資開辟一條旨在聯系湖南湖北的輪船航線。在同一年冬天，王、熊二人從政府得到一筆貸款開設寶善成公司。他們甚至向巡撫申請建造一條經過湖南將漢口和廣州聯結起來的鐵路。[[42]](#_42_Xiao_Ye_Chuan_Xiu_Mei____Qin)

當隨后數年維新運動繼續在工商界鼓勵新的努力時，其他方面也在著手改革。首先，在長沙出現了組織鄉勇的活動，并將一座地方書院改為新型的軍事學堂，作為進一步軍事改革的基礎。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若干制度方面的革新，它們大部分是在黃遵憲指導下進行的。其中包括制定一項專門的官員訓練計劃，以便授予他們專業技能和時事知識。訓練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員能在省內的維新運動中起帶頭作用。黃遵憲也起草了若干旨在改進司法程序和監獄制度的新章程。黃氏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保衛局，它模仿他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看見過的警察局。附屬于保衛局的是一所新感化院，其目的不僅是處罰罪犯，而且也對地方社會的渣滓進行再教育。這兩種機構都被打算用來改進傳統的保甲制度，以便加強地方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和秩序。然而，按照黃遵憲的計劃，保衛局不完全是一個政府組織，而又是一項共同事業，由政府官員和紳士名流雙方參加的管理機構來監督它的工作。[[43]](#_43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

在湖南維新運動中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革新。在這方面帶頭的是學政江標。在學校課程方面他強調新的西學的價值，主張在西學與研究中國文化傳統方面保持平衡。為了執行這一政策，在府一級舉行的各種考試中，除了傳統的儒學題目之外，還要求加試世界時事的知識。這樣就使《萬國公報》、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和廣學會的其他出版物成為應試士子的必讀書刊。

對新學的重視還導致江標在一所地方上的儒學堡壘——長沙的校經書院——進行修改課程的試驗。他推薦在課程內設地理學、數學和外語這三門新學科目，來補充理學課程中的兩門基本科目——經義和治事。[[44]](#_44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

江標還提出創辦第一份湖南的報紙，在他贊助下該報在校經書院辦了起來。從1897年春天開始，每10天出版一次，名為《湘學新報》或《湘學報》，它后來發展成為宣傳維新運動和傳播新知識的主要的地區性工具。

江標1897年秋天辭職。他所進行的教育革新基本上沒有越出自強運動的思想范圍，但是在他離職時，文化和教育的改革已經在朝比較激進的方向發展了。

在這方面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是1897年秋天一所新式學校——時務學堂——的創立。陔學堂是由紳士和省署共同發起的另一個項目。辦校的建議和基金來自紳士方面，而學堂的提調和會辦則由巡撫指派。這種新式學堂的出現顯然受到當地人民普遍的熱情關注，因為據說有多達4000名年輕人來到長沙報名參加入學考試。結果第一年只有40人被錄取入學。

雖然該校的格調企圖鮮明地擺脫傳統書院的影響，但它的課程基本上是被安排得四平八穩的。西學占突出地位，包括自然科學、歷史直至法律學和政治學，但同時又有大量儒家經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事實上，在宣布該校入學考試的公告中，巡撫陳寶箴仍然強調中學為主是教育的指導原則。因此，在最初規劃時，該校仍然不過是另一個自強運動的事業。

然而，當選擇國學部分的教員時，學校開始表現出激進的性質。經過黃遵憲的又一次推薦，梁啟超被聘為總教習。其他三名廣州青年學者葉覺邁、韓文舉和歐榘甲被聘為梁氏的助理，他們全都是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和他的助理們在1897年秋到達長沙。

那一年引人注意的事情是，在湖南又有一批思想上同情梁黨的人物嶄露頭角。該年春天，年輕的湖南學者唐才常擔任《湘學報》主筆，他是西學和今文學派的熱情的學者。秋末，唐才常的密友譚嗣同從南京回來，也投身于維新運動。在梁啟超到達長沙在新辦學校擔任教職后，唐、譚協助他向學生講課。與此同時，著名的湖南今文學派學者皮錫瑞也從江西回來支持正在興起的維新運動。必須記住，這些人之云集湖南，正是在康有為今文學的一位熱情擁護者徐仁鑄繼江標任學政之際。[[45]](#_45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人文在湖南薈萃，必將使這里的維新運動局面一新。

新局面是從梁啟超及其助手們在時務學堂講課開始的。為了符合他所強調的政學至上的觀點，梁氏的講課主要是依據西方的民權和平等這樣一些政治思想對儒家典籍《春秋》和《孟子》加以闡發。梁啟超不但通過講課，而且通過在要求學生定期交來的札記上寫評語的辦法，試圖向學生灌輸這種政治激進主義。評語中的一個主旨是將中華帝國的政治傳統說成是道德淪喪和政治上巧取豪奪的可恥記錄。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不但嘗試在校內學生中間宣傳這些激進的思想，而且通過秘密重印和散發數以千計的黃宗羲在17世紀所寫的反對專制主義的《明夷待訪錄》一書的節本（有梁和他的友人們的評注），企圖向校外傳播這些思想。

梁啟超和他的同事們的政治激進主義還含有排滿種族主義的鮮明色彩。在他為學生札記所寫的評語中，有時直言不諱地提到懸為嚴禁而不許涉及的事實，即在17世紀征服中國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可怕的屠殺暴行。而且，他和同事們還傳印和散發了成千本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這是據說有關滿人在揚州所犯暴行的驚人的、但禁止傳播的記述。就做這件事而言，維新派和同時代的革命派事實上很難加以區別，因為在20世紀初革命派自己撰寫的革命小冊子出版以前若干年內，這種反滿記述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也是被他們用來作為主要宣傳品的。

梁啟超的激進政治態度在一次大膽的上書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緊接著1897年冬天德國占領膠州之后他向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果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獨立。這個建議反映了梁啟超對清廷的憤慨，因為這個政府在面對威脅要瓜分中國的外國列強的侵略時，表現得愚昧無能。梁氏堅持，如果不能推動中央政府去實行變法維新，那么，阻止外國列強征服中國的唯一途徑是效法日本德川后期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和中央政府分離。

梁氏引證日本的經驗不是偶然的。這反映出他來到湖南參加維新運動時念念不忘薩摩和長州的榜樣。在一篇發表于《湘報》的文章中，他公開鼓動湖南紳士應學習日本德川晚期的經驗。梁氏注意到，明治維新的成功，主要由于首先在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四處封建領地成功地實現了變革，然后推廣到日本其余地方。由于中國有著廣闊的國土和長期存在的問題，這個經驗對它來說極有借鑒意義。梁氏強調說，按照日本的榜樣，首先應限制在數省范圍內實現變革，然后在全國推行。按照梁啟超的看法，湖南的環境在當時最適合這種地區性的維新。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湖南人甚至應考慮采取脫離中央政府的革命行動的可能性。梁氏顯然從日本的事例中得出教訓：地方自治可以用來為民族主義的目標服務。[[46]](#_46_Zhang_Hao____Liang_Qi_Chao_Y)

這些革命思想的宣傳，立刻在這所新學堂中造成了有助于維新運動激進化的政治氣氛。當1897年冬天南學會成立時，這種情況進一步發展。這時維新集團似乎已分成兩派：激進派與保守—溫和派。新學會的領袖們，除了少數省署中表示同情的官員之外，大多數是在較晚時期參加維新運動的那些年輕的廣東和湖南的士大夫。引人注意的是，參加者名單中沒有那些迄今與維新運動中重大工藝革新有關的地方士大夫的名字，如王先謙和張祖同。因此，南學會不同于開明的地方官員與溫和的維新派紳士共同創辦的時務學堂，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維新派士大夫中的激進派在某些省級官員的支持下創立的。

根據這些激進的青年維新人士的設想，南學會在促進省內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應比時務學堂更為重要。他們之所以重視南學會，是因為他們認為，總的說來，學會的重要職能就是教育和組織紳士。簡言之，南學會被看作是在湖南和其他南方省份增進紳權的一個必需的工具。后一目的現在在激進維新派的政治綱領中占據了主要位置。因為第一，紳權被看成逐步達到民眾參政和取得主權的必不可少的踏腳石。第二，鑒于紳士在中國社會中的領導作用，增進紳權也被視為使中國國家強盛的第一步。由于激進的維新派有這樣一種政治綱領，所以南學會必然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占有最優先的地位。

賦予南學會的這些重要職能無疑說明了這時湖南士大夫建立學會為什么會具有這樣高的熱情。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于1898年夏初報道說，全省“講堂之場林立”。這可能是新聞報道的夸張，但是除了南學會之外，這些年能夠查明的學會至少有13個之多。論規模，沒有一個可與南學會相比；最盛時它的會員可能超過1200人。

南學會雖然有大量會員，但更重要的是該會的組織方法和它打算活動的廣泛范圍。理論上它是一種個人自愿聯合的組織，但因為政府參與了它的建立和活動，所以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其重要標志是它的會員享有政治特權。例如，如果覺得某些地方公共事務是正當和有用的，他們可以通過該會向巡撫和其他省內高級官員建議施行。而且，會員們在研究新問題時，能向政府要求查閱公共檔案。所有這些都表明，南學會與其說是私人組織，不如說是公共組織，即使不是政府的一個正式組成部分，也至少緊密地依附于政府。

該會的半官方性質及其活動表明，在參加者的心目中，它不僅僅是一個自愿的組織。正如常在該會集會上講話的杰出演說家皮錫瑞在他的日記中所記的那樣，精心推敲的該會章程是想用來為地方紳士控制的省議會奠定基礎的。這種可能性由梁啟超在該會關閉后不久所作的評論中得到了證實，他說南學會“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事實上，梁啟超認為南學會是湖南全部維新運動的關鍵。[[47]](#_47_Wang_Er_Min____Wan_Qing_Zhen)

除了起自治政府的預備性組織的作用外，南學會也從事諸如建立圖書館和辦日報《湘報》（1898年1月開始發行）等文化活動。《湘報》和《湘學報》一起，成了主要的媒介物，湖南維新運動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通過它們公開宣傳的。唐才常、譚嗣同、易鼐和樊錐等激進派控制了這兩份報紙。特別是唐才常，他在兩報的編輯部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思想觀點方面，唐才常和康有為、譚嗣同二人是接近的。像康有為那樣，他公開聲稱是今文學派的信徒，相信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歷史進步和制度變革的理想。雖則在表述思想上不如譚嗣同那樣有系統，他在對待中國傳統，特別是中國的政治秩序方面，和譚嗣同有許多共同的看法，持同樣的批判態度。他像譚嗣同一樣，譴責君主制是人類自私心理的最赤裸裸的表現，歡呼民主制應該是未來的秩序。正與康有為和譚嗣同的情況一樣，唐才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是兼收并蓄的，不但受各種傳統思想影響，而且也帶有西方的深刻烙印。唐才常由于有這種吸收各家之說的背景和激進的觀點，所以能和譚嗣同以及其他年輕的湖南學者一起，把《湘學報》和《湘報》變成促使新思想萌發的肥沃園地。[[48]](#_48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隨著這些新的文化機構在1897年末和1898年初的出現，維新運動變得更加激進起來。這即使保守派，也使紳士—官員感到驚慌，雖然后者前此一直是許多維新計劃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結果是維新者的隊伍產生了分裂。溫和派此時和保守的紳士—官員合力攻擊激進派，并且試圖向他們潑冷水。分裂最后在1898年春天爆發成一場激烈的思想斗爭。

由保守派和溫和派聯合發起的攻擊在夏初達到頂點，當時王先謙和省內紳士的其他領袖組織長沙三個書院的學生起草湘省學約。在學約中他們試圖提出共同的思想立場，來反對他們認為的當時正風靡全省的危險的異端。對于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和信仰正處在危急關頭。為了保衛這些價值和信仰并反對日益猖獗的異端，他們認為自己正在遵循孟子和韓愈的受人尊敬的道統。正像孟子拒楊墨和韓愈辟佛老來保衛儒家那樣，他們現在決心要反對康梁集團的異端以保衛儒家。[[49]](#_49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

按照這些湖南紳士的意見，這些異端中最主要的危險，總的來說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公開批判，具體地說是對清政權的赤裸裸的攻擊。同樣使他們感到驚駭的是康有為對儒家思想的激進的解釋。湖南紳士們對所有這些情況的反應是強烈的。有些人進行全面的譴責；其他像葉德輝等人則逐點加以批駁。所有這些反應的特點就是情緒激昂，這和儒家傳統中進行學說之爭時一般所持的寬容態度截然不同。[[50]](#_50_Su_Yu____Yi_Jiao_Cong_Bian)

這種不同不是偶然的。傳統的學說之爭之所以容易持寬容態度是基于這樣的事實：若干世紀以來在儒家學者中間的思想分歧通常是在共同信仰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的基礎上出現的。湖南的紳士發現，康梁集團的思想正在向他們的基本信念挑戰。首先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一口氣同時否認了理學正統和流行的漢學學派二者的正當性。況且在康氏的《孔子改制考》中，他進一步斷言，在儒家思想體制中改變君主政體這個神圣的政治制度，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為了進一步證實康有為的這些解釋隱含政治顛覆之意，湖南人指出，在康梁集團的書信和著作中普遍以孔子出生紀年來代替當時在位的清帝年號紀年。在大多數湖南士大夫看來，這等于是否認了清王朝的合法性。

更加令人驚駭的是，激進的維新派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和平等理想。對于大多數紳士來說，宣傳這些理想，是對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圣核心——儒家三綱學說——的正面挑戰。三綱說有兩個明顯的性質：一是獨裁主義，因為三綱是無條件的統治；一是不可違抗性。正統的儒家世界觀認為，人類秩序是和宇宙秩序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作為人類秩序核心的三綱被看作是宇宙秩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所固有的。這種儒家宇宙觀的神話仍然支配著大多數中國士大夫的道德觀和社會思想。

19世紀90年代的新思想間接和直接地向這種學說挑戰。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傳入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自然主義世界觀時便出現了間接的挑戰。這就不可避免地逐步破壞了儒家所主張的人類社會秩序寓于宇宙秩序之中的宇宙觀的神話。一旦沒有這種神話的支持，三綱之說必然會喪失它的大部分傳統的神圣性和說服力。[[51]](#_51_Li_Ze_Hou____Kang_You_Wei_Ta)

新思想還直接破壞了三綱的道德合法性。譚嗣同的哲學坦率地攻擊三綱學說，但是他的《仁學》直到1900年后才出版，而且其影響只限于他的親密友人的有限范圍之內。正面對三綱學說的挑戰，只是在宣傳有關人權和社會平等的西方自由理想時才趨于公開的。

這些自由的理想和三綱學說的矛盾沖突是顯而易見的。當人權否定君臣之間的獨裁主義關系時，社會平等理想便和整個這個學說的獨裁主義要旨發生了沖突。因此，許多湖南士大夫斥責平等理想是對集團特權的倫理觀和上下隸屬原則的徹底否定，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們認為這兩者是古老的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中心。這種斥責在一個保守的湖南人曾廉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得最為簡明扼要：“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婦之綱，蕩然盡矣。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廢，于是天下之人視其親長亦不啻水中之萍，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于是乎憂先起于蕭墻……而隸卒優倡儼然臨于簪纓巾卷之上。”

曾廉與他的許多同伴都認為，接受社會平等理想簡直是意味著顛倒了乾坤。盡管激進的維新之士從來沒有全面而公開地攻擊三綱學說，可是幾乎所有斥責新思想的湖南紳士都大聲疾呼反對這些理想，這也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為對于大多數紳士學者來說，已不是某個儒家價值觀或某個傳統制度處于危險之中的問題，而是危及全部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神圣核心的問題。對于他們來說，西方思想的傳入正在威脅著儒家思想體系與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這二者的本質。[[52]](#_52_Su_Yu____Yi_Jiao_Cong_Bian)

對于康梁新思想的理論上的攻擊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運動。當1898年春夏這種攻擊在湖南展開時，反對激進派的運動也在其他地方進行著。御史們向朝廷提出彈章，揭發康有為的異端學說和變法活動，一個官僚學者王仁俊在上海的《實學報》上批駁康有為的變法思想。[[53]](#_53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但是湖南之外最有力的反擊來自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群著名的官僚學者。

1898年春，張之洞出版了他的《勸學篇》，他同意湖南紳士的基本論點，但是發揮得更加深刻。從春末到仲夏，此書在《湘學報》上分期刊載，給反對激進派的十字軍運動以有力的思想支持。

按照張之洞的觀點，康有為的思想可以用他提出的作為運動目標的三句口號來概括：保國、保教、保種。但是張之洞認為，把這些目標割裂開來作為獨立的目標，則是錯誤的。應該只有一個目標，即保國；達到這個目標，就自然而然地會達到其他兩個目標。

張之洞認為保種有賴于保國，其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他為什么認為保教可以歸結為保國，這就有必要探究一下他所使用的“國家”概念了。必須記住，張之洞所確定的保國思想，主要是為了反駁康有為的思想。在康有為的思想中，至少如在保國會的序言和指導章程中所反映的那樣，“國”很清楚地指包括中國版圖內全體人民的共同的實體。在梁啟超的政治著作中，特別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國”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地理區域中全體人民的集合體，這一定義就表述得更為清楚了。然而，這種“國”的總概念在張之洞的政治思想中是沒有位置的，他把中國完全等同于具體的清王朝的皇室。保國，首先是要保清朝。因此在他論及忠時，他列舉清朝過去執行的十五項政策作為它的仁政的表現，以此強調清朝是人民效忠的當然對象。這些仁政使清朝有別于歐洲國家，也有別于包括漢唐在內的以前的中國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張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種寓意，即像康梁那樣只泛講忠于中國而不具體地講應忠于清朝，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險的。

張之洞所謂的忠，歸根到底，仍然取決于他對儒家三綱學說的信仰。這種學說長期以來一直被尊為至高無上的儒學的核心，它與君主及家庭的制度緊密聯結在一起。從這里便可看出中國文化和政治傳統的顯著的特征，即政教融為一體；用張之洞的話來說，就是“以君兼師”，或“政教相維”。從這一觀點出發，張之洞自然拒不承認保教可以脫離保國。康有為試圖在既定的政治體制之外提倡儒學，當然就會被他認為是異端行為。因為張之洞認為，且不談康有為解釋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種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國家相脫離從而破壞神圣的三綱學說的危險。

還因為張之洞批駁康有為關于保國的根本之途是變法的思想，這使得兩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張之洞是變法的熱烈鼓吹者，并自認為是西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關于學習西政應先于西藝的主張。但在事實上，張之洞理解的政與法有很不相同的含義。他認為政在本質上意味著官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張氏的變法思想可以歸結為不過是進一步發展了自強運動和經世致用傳統的行政改革的主張而已。張之洞論點的前提是：從基本政治價值或制度的意義上來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綱學說的范圍之內，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名的儒家格言來說，是“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張之洞的這種信奉儒家的基本社會政治價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治變革中的態度，也決定了他對西方思想的總的態度。他曾經是西學的熱誠擁護者，他的《勸學篇》用大量篇幅論證西方知識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論證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礎上的，按照“循序”之說，研究西方知識不論多么重要，都必須放在研習中學及其核心——經書——之下。因為中學之中含有傳統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不僅使人能認識到中國作為國家與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為人所必須據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張之洞一方面鼓勵中國人對西學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們把“知通”和對儒家學說的“知本”結合起來。這樣二者就能夠互相補充。這一認識便是張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礎。[[54]](#_54_Zhang_Zhi_Dong____Quan_Xue_P)

在本質上，張之洞無非是重新肯定自強運動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則在激進派和保守派之間采取中間立場，因為他感到這兩者你死我活的斗爭正在使國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間立場事實上是反對激進派要更甚于反對保守派。因為他所持立場的目標，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國的其他許多地方捍衛中國傳統的價值和制度，以反對勃興的激進派的猛烈攻擊。

因此，張之洞的《勸學篇》在湖南的思想辯論的氣氛中出版，這標志著中國思想斗爭新階段的開始。首先，斗爭的中心原在自強運動的提倡者和保守派之間進行，現在轉到了前者和激進的維新派之間。其次，思想斗爭過去往往采取在政府內部展開政策辯論的形式。但是現在新的辯論擴展到政府之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間如火如荼地進行。最后，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辯論，無論是在60年代的恭親王與倭仁之間，或是在70和80年代的自強運動提倡者和清流黨之間，一般的是在所有參與者的基本價值觀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的。然而，19世紀90年代后期的論戰，就不再有這樣的一致性了。事實上，恰恰是對某些基本的價值觀產生了分歧。因此，維新時代的思想辯論在深度和廣度上標志著與過去斷絕關系，并預示了1900年以后席卷中國的思想沖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風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時，方興未艾的思想沖突最后發展成為政治斗爭和社會沖突。許多湖南省紳士這時響應王先謙和葉德輝等領袖的號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煽起反對激進派的情緒。為了對省署施加社會壓力，他們有些人個人寫信給巡撫和學政表示抗議；還有些人則集體進行活動。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體湖南紳士名義向巡撫送上一份公呈。它把激進的維新派斥為危險的異端，要求把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革出時務學堂。同情年輕維新派的紳士學者進行反擊，稟請省署改組保守派控制的地方書院，而王先謙和他的伙伴也在一些書院中動員學生加強他們的攻擊。[[55]](#_55_Su_Yu____Yi_Jiao_Cong_Bian)

湖南紳士除了組織抗議之外，還向民眾宣傳，并公開在社會上排斥激進派。例如，一所地方書院的學生印刷和散發揭帖，對時務學堂痛加丑詆。湖南的一名激進維新派，即南學會會員中的活躍分子、《湘報》撰稿人樊錐，被地方人士趕出家鄉。[[56]](#_56_Su_Yu____Yi_Jiao_Cong_Bian)在攻擊風暴的高潮時，據報道有反對激進維新派的騷亂發生。反對新思想的運動現在所表現的性質，不禁使人想起19世紀后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間，支持湖南反激進運動的政治壓力還來自武昌的總督衙門。在1898年春季以前，張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書院訂閱湖南的維新報紙。但此時由于對遍及湖南的激進思想和行動感到恐懼，他下令停止訂閱，他還和他的親密顧問梁鼎棻馳書警告湖南官員，要他們注意這些激進的傾向。與此同時，有些湖南紳士也試圖使北京出面來制服激進派。御史們根據來自湖南的報告，向朝廷陳奏，要求對康梁一黨采取強硬的手段。保守的紳士—學者曾廉引用梁啟超在湖南的激進言論和行動作為悖逆的證據，甚至要求朝廷將康梁處以死刑。[[57]](#_57___Hu_Nan_Jin_Bai_Nian_Da_Shi)

這樣，從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對維新運動激進化的壓力的加強，大多數維新派被迫離開了該省。8月初，巡撫陳寶箴在壓力下奏請朝廷燒毀康有為的有煽動性的《孔子改制考》一書的木版，并禁止再版。激進的維新派學者的有些活動雖則在夏季仍舊繼續進行，但他們在湖南實現文化革新的嘗試結果以完全的失敗告終。

湖南維新的失敗當歸因于運動后期的激進化表現。運動自始至終得到省署當局的充分支持。這種特殊順利的環境鼓舞了年輕的激進分子，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區然后在全國實現劇烈的變法。激進化的推動力是這種從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當時像長州和薩摩等封建領地在整個政治發展中起了帶頭作用，領導了日本的民族復興。然而，應用日本榜樣的想法證明是考慮不周的。湖南省當局沒有像日本的長州和薩摩封建領主那樣的獨立力量。他們不能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來實現廣泛的地方改革。激進的維新派在沒有自治的地區政權的支持下，在地方上與強大的保守勢力發生了沖突，結果使運動陷于停頓。

之所以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其源蓋出于清代的中國和德川時期的日本在社會和政治結構上的不同。在德川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形態中，封建主義給予日本的許多封建領地以很大的自治權，這就使它們有可能在遠離中心的地區成功地實行地區性的改革，作為以后全國規模政治改革的基礎。然而，從地區發展到中央的這種方式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清帝國，幾乎是不可能的。誠然，19世紀后期中國的政治結構通常被看作實行地方分權，這大部分是因為在各省出現了所謂地方主義。然而，這種狀況是被強調得過了頭。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義”最盛的時候，清廷仍然保持了許多體制方面的控制權，督撫與其說擁有地方自治的權力，不如說只有有限的活動余地。[[58]](#_58_Liu_Guang_Jing____19Shi_Ji_D)

其次，地方權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動的思想領域的權威地位的限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響尚未能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進行任何重大的滲透。儒家的價值觀和信仰，至少以理學的正統形式，反復地向人們灌輸無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動搖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權威地位對于地方權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除了來自上面的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來自下面的紳士這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也限制著地方革新。在清代，紳士是社會的精英人物，也是地方上掌權的精英。在他們本縣或本省，他們獲得政府的許可，承擔著重要的公共事務。事實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沒有他們參與就會癱瘓。

這些地方的掌權的精英人物構成強大的向心力，因為基于實際的和意識形態的考慮，他們和朝廷是休戚相關的。首先，他們的精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中央政府的科舉制度。此外，帝國的官僚制度提供了一種組織體制，使他們能有獲得權力和財富的機會。這樣，顯赫的地位、經濟利益和權力猶如繩索圍繞著帝國的政治中心把紳士綁在一起，他們雖然和地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仍掙脫不開這根繩索。

這種利害關系的聯結，由于有以三綱之說為中心的正統儒家的思想紐帶而得到加強。除了要求個人忠于皇帝之外，這種學說還在人們思想中樹立了一種宗教式的天道觀，即相信王權有制度上的神圣性。在這些思想束縛的約束下，紳士不但成為支持帝國政治統一的強大社會力量，而且也充當著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堅決保衛者的角色。

如前所述，19世紀中葉以后，地方精英的力量是與督撫的力量一起增長的。這就使清末的所謂地方主義具有不容忽視的二元性質。只要紳士像上面所說那樣仍然效忠不變，督撫的地方勢力是不能過分越軌的。保守的紳士能夠制約地方官員的自治，他們也能削弱官員們的革新能力。這就是1895年以后三年中間湖南省發生的事情。

19世紀后期的許多時間內，湖南紳士和其他地方的紳士一樣，仍然是保守的和向心的社會力量。因此，他們再三地與威脅著要急劇改變中國社會的運動發生沖突，就不足為奇了。在19世紀的50和60年代，湖南紳士為了保存傳統的秩序，組織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衛中央政府和反對太平軍。在1860年以后的30年中，最激烈地抵制基督教傳教士向內地發展的也是湖南的紳士。確實，在1895年以后的幾年里，湖南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但是，對于大多數與維新運動有牽連的士大夫來說，這僅僅意味著他們開始接受許多督撫已經倡議了幾十年的事物：自強式的變革。同時不應忘記，大多數士大夫還具有自強運動提倡者所持有的變革概念的另一面，即認為變革應在中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和制度永遠不變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礎上進行。因此，當維新派從事于威脅這些主要價值和制度的變革活動時，湖南的紳士立即撤銷合作，并對維新人士發起無情的攻擊。湖南維新派的失敗說明，雖然到19世紀末變革已經開始，但變革的程度遠不足以像20世紀頭十年進行的改革那樣改變紳士的基本社會政治傾向性。中國的政治秩序仍是由儒家的文化力量以及地方精英的社會力量在支撐著。各省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和文化力量與國家的制度基礎的一致性，使得在地方上進行激進的改革非常困難，而且使受到日本啟發的由省到中央變法維新的路子幾乎沒有希望。

## 1898年的災難

當維新運動在湖南失敗時，1898年初春它卻在北京又時興起來。這次復活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外交戰線上再次發生了深刻的危機。1897年11月德國人進入山東占領膠州灣和青島港口。俄國人緊接著在12月派遣炮艦進入旅順港。他們把控制山東和滿洲作為各自“勢力范圍”的努力，觸發了1898年初列強普遍爭奪租借地的活動。這一陣掠奪領土的行動使中國有被瓜分為外國殖民地的危險。在迫在眉睫的瓜分陰影籠罩下，全國陷入一片驚慌恐懼的氣氛之中。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的意識驅使康有為回到北京，在1897年冬天重新開始他的變法活動。1898年初，康有為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前的上書不同，新的請求立刻得到朝廷肯定的答復，并在1898年春夏引起了一系列始料所不及的和決定性的發展，使康有為密邇政柄，使他的變法運動幾乎獲得成功。這些發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央政府內部圍繞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這兩個主要人物出現了權力的新組合。

慈禧在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繼續在幕后操縱。所有奏折仍須送到皇太后居住的儀鑾殿，供她批閱。她也準許光緒帝處理日常政務，但是對諸如指派軍機處和六部等大臣這樣的大事，她仍保留決定權。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在像中日甲午戰爭和爭奪租借地等危機事件期間，當他入宮接受指示時，經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接見，皇太后對外交和國內的事務往往說得很多很多。[[59]](#_59_Xiao_Gong_Quan____Weng_Tong)

引退中的慈禧的權威依靠著這樣幾個因素。作為皇太后，她是皇帝的正式的母親。在以孝治天下的王朝傳統中，她以尊親的地位行使權力，皇帝是很難加以抵制的。和慈禧權力有關的另一個事實是，光緒帝與同治帝不同，同治是從父親（咸豐帝）那里合法繼承皇位的，光緒并不是同治的法定繼承人，他的地位完全是由于慈禧的意愿和權術才取得的。在她的保護下長大成人的光緒，不可避免地產生恐懼的心理，即皇太后可能作成他于先，也可能廢黜他于后。

更重要的是，慈禧的力量還來自這樣的事實：朝廷中大多數高級官員的位置都出自她的恩賜并效忠于她。從光緒名義上開始親政的1889年起到他失去政權的1898年為止這段時期，軍機處的組成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對清朝歷史的簡短回顧就足以看出，幾乎每個新皇帝上臺時，軍機處都要進行大改組。而光緒帝在1889年執政時卻沒有這樣的大改組，這是意味深長的。事實上，在1889年以后四年，5名軍機大臣仍是慈禧攝政的最后幾年中指派的。從1893年起，新增了幾名軍機大臣。從那一年到1898年9月總共委派了10名新軍機大臣。有的是在這整個期間始終其事，有的只是暫時的。大多數官員是通過慈禧的恩典而上來的，除了作為老師和心腹顧問的翁同龢之外，沒有一個人是親光緒帝的。但即使是翁同龢的顯宦地位也得主要歸功于皇太后，1889年他說過，如果沒有太后，如何能升到如此高的地位？簡言之，協助皇帝作出重要決策的高級官員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至少大部分是皇太后的人。這就是慈禧在所謂引退時仍然掌握實權的真正原因。[[60]](#_60_Fu_Zong_Mao____Qing_Dai_Jun)

在迫使光緒忠順和服從時，慈禧的權力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不滿，因此產生了緊張和沖突，這些又因兩人之間的其他差別而加劇。首先在年齡上，1895年光緒24歲，慈禧則為60歲。另一個差別存在于思想背景和觀點方面。確實，光緒接受了大量的傳統教育，但是1889年當他開始“親政”時，他首先基本上在翁同龢的影響下接受新的思想。例如，那一年在翁氏的推薦下，年輕的皇帝對《校邠廬抗議》很感興趣，這是1860年前后馮桂芬寫的關于改革的論文集，他強調“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接受有用的西學知識。然而，光緒對新學的興趣馬上超出了翁同龢所能贊同的范圍。在1891—1894的三年中，他在宮中跟同文館的教師學習外國語言。1894年，他閱讀陳熾和湯震等變法維新派的一些著作。1895年，他的另一個師傅孫家鼐說，皇帝和他一起講論了李提摩太所翻譯的麥肯齊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61]](#_61_Wang_Shu_Huai____Wai_Ren_Yu)

也許部分地出于皇太后對光緒日益醉心于新思想的驚恐，她于1895年決定，除了傳統的中學之外，停止他在師傅指導下的學習。但是這一禁令事實上不能阻止他對西學的強烈興趣。皇帝的思想觀點必然與皇太后有很大的差別。

由于1889年以后在兩宮之間逐步發生的不和，在宮廷內和政府中出現了派系斗爭。其大部分發展情況仍籠罩著神秘的氣氛，因此歷史學家很容易曲解它的意義和性質。首先必須記住，在受派系支配的宮廷政治大漩渦中，帝后之間的對峙只是一股成長中的潮流。在研究這時期的宮廷政治時，必須防止只用這種對峙來解釋所有的派系斗爭。也必須反對簡單地把兩宮之間的派系斗爭同保守派與維新派之間的思想沖突等同起來。事實是，慈禧太后作為朝廷中的實權人物，自然博得大多數官員的效忠。因此，在她的派系中也有各種政治觀點和信仰的人物，包括保守派和溫和派都在內。確實，站在皇帝一邊的大多數官員是傾向維新的。但是諸如翁同龢和汪鳴鑾等帝黨人士，并不一定比通常認為是太后一派的重要成員李鴻章和榮祿更具有維新的思想。事實上，直到1898年初，帝后之間的對峙才發展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而且，在那時之前，所謂帝黨只是一個未定型的小集團，代表分散的親帝的情緒。他們中的一些人，如以同情皇帝聞名的文廷式和汪鳴鑾，雖然和翁同龢很密切，但是這些人的相互關系既不總是那么密切，也沒有作出深思熟慮的努力去結成一個有組織的派系。加之，當時兩個派系之間的界限并不像1898年春天以后那樣涇渭分明。例如，翁同龢雖然被普遍認為是帝黨中領袖群倫的人物，但從未反對過皇太后。直到1898年夏他任職的末期，他仍認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調和而不是制造兩宮之間的不和。從他的例子可以看出，親帝并不一定反對皇太后。[[62]](#_62_Xiao_Gong_Quan____Weng_Tong)

然而，當康有為在1897年冬回來再度開展變法維新運動時，局面開始變化。在1898年春夏，分散的親帝情緒逐步具體化為羽毛豐滿的一派，派系沖突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斗爭，最后使朝廷因激進的與溫和的改革問題的爭吵而發生兩極分化。雖然康有為因1895年的大膽和激動人心的上書要求變法而成了一個有爭論的人物，但在朝廷內還有幾個官員對他的愛國熱忱和豐富知識仍有深刻印象，因此將他薦舉給皇帝。而將康有為引入帝黨過程中起作用最大的高級官員卻是翁同龢。

翁同龢早年在朝時的政治觀點和大多數保守派并無不同。然而在19世紀80年代后期，他對西方事務產生了興趣，并傾向維新。這種觀點方面的重大變化對年輕的皇帝有決定性的影響。1894年中國被日本擊敗更增強了翁同龢的看法，使他成為維新的熱烈提倡者。

翁同龢的強烈的維新傾向不可避免地使他注意到康有為所發起的運動。翁氏對于維新雖是熱情的，但他的觀點或多或少仍是自強運動的路數，和康有為信奉的激進的維新變法主張有很大的距離。這就是為什么當他首次看到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發表的非正統和挑戰性的觀點時表示了重重疑慮。但是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那樣，翁氏對康有為感興趣以及后來將他舉薦給皇帝，可能不完全出于思想意識上的考慮。他畢竟是一個有一番雄心壯志的高級官僚，與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志維新的官員（如李鴻章和張之洞）在進行著權力斗爭。所以對于翁同龢來說，維新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也是值得爭取的具有高度權力價值的東西。有著淵博的維新思想的康有為可以作為翁氏有用的伙伴，能夠想方設法幫助翁同龢以從事維新的名義在朝廷中戰勝他的對手。[[63]](#_63_Tong_Shang)

此外，康有為的儒家異端思想和激進的改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是逐步為人們所知的。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康有為并不像1898年那樣表現得激進。事實上，他的“越軌的”觀點只是在1898年春夏才公之于世。在此以前，他的變法綱領看上去仍可以被翁同龢、孫家鼐和張之洞等溫和的維新派所容忍；這些人對康有為所掌握的知識和大膽的政治主張有很深的印象。當康有為的激進主義的全部內容揭曉時，翁同龢和其他一些人都感到驚恐，于是與康的立場分道揚鑣。但是翁同龢已將康有為舉薦給皇帝，他們早已有了直接的接觸。

在康有為于1897年冬到達北京以后不久，但在他重新向皇帝上條陳要求變法以前，皇帝下令在總理衙門安排康氏與李鴻章、榮祿以及翁同龢等高級官員進行一次晤談。在1898年1月24日舉行的這次晤談中，康有為大膽地宣稱，“祖宗之法”需要改變，中國的“法律官制”應予廢除。甚至連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此番談話也感到驚愕，以致在他的日記中稱之為“狂甚”。[[64]](#_64_Xiao_Gong_Quan____Weng_Tong)

同時，康有為連向皇帝送上三道奏章，繼續發揮他在1895年提出的變法建議。和以前不一樣，這三本奏章都送到了皇帝手里。這些奏章公開提議頒布憲法和建立國會。更重要的是，這些奏章清楚地說明了關于貫徹他的改制理想所必需的政策革新的具體想法。首先，政府必須自覺地以明治時代的日本和彼得統治下的俄國作榜樣。為了學習這些榜樣，皇帝應采取三個重要步驟。第一，他應大誓群臣，表明咸與維新之意。其次，在午門設上書處，旨在縮短緩慢的官僚機構途徑，從下層直接發現人才，了解思想。最后，為了繞過全部現存的官僚機構，應在內廷設立制度局，詳細制定制度上的應興應革的計劃，并付諸實施。總起來說，康有為的策略是一個大膽的號召，它要剝奪宮廷和官僚機構的權力，并將權力集中到皇帝及其維新派助手們的手中。實際上，這是對整個清朝官僚體制宣戰。

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奏章的反應顯然是很熱烈的；當第一份奏章送到他那里時，他命令總理衙門將康氏論維新的作品送呈上來。此后，康有為在送呈他的變法條陳的同時，還附上了他的《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以及其他有關現代歐洲各國政治歷史的著作。這樣，1898年初春，早在康有為首次被召見以前，他的思想輪廓已為光緒帝所了解了。[[65]](#_65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與此同時，康有為繼續用組織學會的辦法將士大夫動員起來，以貫徹他的主張。1898年1月5日，他在北京的廣東同鄉中間創立粵學會。兩個月以后，建立了閩學會、蜀學會和關學會，它們都是由各省有志于維新的士大夫組成的。同時，康有為和他的朋友組織了兩個其他團體：經濟學會和知恥學會。

當康、梁及其同伴們重振變法維新運動的旗鼓時，與1895年的情況一樣，正好遇上三年一度的會試。數千名士子麇集在北京。由于德國和俄國分別侵略山東和滿洲，京師充滿了緊張和義憤。康有為又想到發動這些舉子和紳士官員在京“成一大會，以伸國憤”。于是便和有志于維新的御史李盛鐸一起，組織了保國會，在4月12日首次集會。在它的影響下，三個同樣性質但規模較小的其他學會也在北京建立了起來，它們是保浙會、保滇會和保川會。[[66]](#_66_Tong_Shang_Shu__Di_256__261Y)

保國會打算按照強學會的模式，成為全國性的而不是地區性的組織，在北京和上海都設立總會，最終在全國各省、府、縣設立分會。保國會不同于強學會之處在于表達學會宗旨的新的民族主義的動人辭藻。強學會后面的推動力是開始覺醒的民族主義意識。然而這種意識由于使用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而有所削弱，成立強學會的宣言以及此后的各種宣言就包含有這樣的語言。例如，學會的目的仍是“自強”，這是19世紀60年代以來流行的名詞。但在成立保國會的宣言中，這些老一套的愛國主義語言已為新的動聽的言辭所代替。該會的目的是保全國權、國地和國教。這些新名詞的出現清楚地表明，自1895年以后的三年中，民族主義在中國有了顯著的發展。

可是保國會比起它的先行者來證明并沒有更多的成就，盡管在會員方面它看起來給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強學會只有30名會員，而保國會有186人。但是它沒有得到強學會曾從政府上層得到的那種支持。沒有顯赫的姓名出現在它的花名冊上。而且，當保守派開始進行攻擊時，它幾乎還沒有開始活動。康有為強調民族國家的利益而不強調清朝的利益，這使許多人害怕它包藏顛覆的禍心。很快，一份題為《駁保國會議》的小冊子得以流傳開來。御史們倡議彈劾該會。一場反對保國會的運動被組織起來了。在這種攻擊下，甚至最早和康有為聯合倡議的李盛鐸也變了卦，也參與了彈劾以保護自己。在此期間，大多數舉子在4月中旬的會試結果揭曉后已離開京師。這樣，只舉行了三次會議，維持了大約一個月之后，保國會很快便銷聲匿跡了。[[67]](#_67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這個團體的命運表明了1898年春末夏初圍繞著康有為在北京的變法維新運動發展起來的敵視和猜疑的程度。如上所述，在康有為的追隨者及其敵對者之間的激烈的意識形態的斗爭，此時在湖南也達到頂點；對手們的一個主要策略是上訴中央政府，根據他們提出的關于維新派在湖南種種活動的報告，對維新派提出這樣那樣的控訴。結果是，對于中央政府的許多官員來說，康有為和他的伙伴們現已被證明是一個危險的集團。當康有為帶著他的全部非正統觀點和激進的政治思想突然得以接近皇帝并且被卷入宮廷內的權力斗爭時，氣氛確實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康梁集團關于變法的條陳突然有了成果，6月11日，光緒帝發布上諭，宣布以變法為國是。6月16日，康有為被召至宮廷，首次陛見。在這次長達幾小時的陛見中，他強調中國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他向皇帝許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緊接著陛見之后，皇帝給予康有為在總理衙門一個特殊職務，并且享有不用經過原有途徑而直接向皇帝上書言事的特權。由于皇帝和康有為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聯系，變法運動進入了被稱為“百日維新”的新階段。

從6月11日到9月21日這一百天中，皇帝迅速地接連發布了一百多道上諭，試圖以空前規模大力推行變法維新。在8月底前，大多數法令涉及經濟、軍事和文教領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中，詔令體現了自強運動的強化。在經濟領域中，國家以更大的力量促進農、工、商業。為此目的頒布了許多改革法令：在首都建立農工商總局，各省設立分局；在中央政府設立礦務鐵路總局；制定獎勵技術發明的章程；在首都和其他商業中心設立郵政局；按月上報預算，使政府財政合理化。至于軍事改革方面，著重于訓練現代化的陸軍，加強海軍，組織保甲和團練：所有這些都由各省當局負責。

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已經大大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就，表現出自1861年以來以點滴方式進行的教育改革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兩個最重要的有計劃的改革是：徹底修改科舉制度，包括以時事和實學的策論為考試的新標準，來取代以書法和刻板的八股文為取舍的舊標準；在首都建立京師大學堂，在各省設立各種高等和初級學堂，外加軍事的和工藝的學堂。

8月后期起，清帝進一步加緊了他推動改革的活動，開始改造政府機構。一些中央政府的衙門和幾個督撫所轄的地方衙門都被廢除。中央政府的重要部署也都得到了要它們刪汰舊例和編定新則的命令。在政府中決策的新顧問被指定了。9月13日光緒帝宣布他的決定，準備“開懋勤殿以議制度”[[68]](#_68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政策改革，都是以有志于改革的溫和派和激進派紳士—官僚提出的建議為基礎的。這些建議的大部分思想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康有為，他不但在6月11日以前提交了一系列關于變法的總的方向和方法的條陳，而且于此后上呈皇帝的21件奏折中提出的具體政策建議也繼續闡述了他的思想。

不過在1898年夏天公布的變法詔書并沒有把康有為的建議全部付諸實施。他關于軍事和文化教育改革的意見幾乎全被采用。他關于經濟革新的大多數建議，除了廢除漕運和厘金制之外，也都在改革的詔書中得到了體現。但是他關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議，如頒布憲法、建立國會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諭中均未提出。然而，光緒在9月中宣布準備討論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改革一事，表明有可能接受這些建議。這樣，當夏季消逝時，光緒的改革運動日趨激進，并預示了最后要對帝國全部政治機構進行激烈改造的前景。[[69]](#_69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沖突。修改考試制度之舉使帝國廣大文人有失去晉身機會的危險。廢除許多衙門和改變官僚政治的現有管理則例之舉，威脅了許多在任官員的直接利益。軍事改革會涉及裁汰許多現存的軍隊。指派年輕的維新派進入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等重要政府機關擔任雖然低級但很關鍵的職務，再加上新條例規定士人和官員均可越過正規的官僚制度渠道而直接向皇帝上書：所有這些都趨向于破壞宮廷中高級官員的權力地位。變法方案的最厲害的一招莫過于蔑視皇太后的權威，直接威脅她的權力和她最寵信的太監的命運。最后，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致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個官場。

雙方之間的矛盾沖突幾乎在百日維新剛進行時就趨向于表面化。6月15日，在維新被宣布為國是后的第四天，幫助皇帝起草詔令的翁同龢在后黨的壓力下被黜退。從此開始，當皇帝和激進的維新派忙于發布詔令時，皇太后和她的強大的黨羽則悄悄地在鞏固他們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最親信的寵臣榮祿被指派署理直隸總督，統率華北的全部軍隊。與此同時，發布了一道詔令，規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級官員必須親身覲見皇太后，以表示謝恩和保證忠誠。

在接著而來的兩個月中矛盾沖突繼續升級。9月初，皇帝甚至一舉下令黜退了禮部的兩名尚書和四名侍郎。同時，四名具有強烈變法傾向的青年學者楊銳、林旭、劉光第和譚嗣同被指派到軍機處任章京，參與審議和革新政策。由于以這樣大膽的行動來維護權威和奪取權力，最后攤牌的階段終于到來。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發動了政變，剝奪了光緒帝的權力，并把他幽禁起來。同一天，她還宣布重新當權“訓政”，開始了她的第三次攝政，這一次繼續了10年，直到她死去為止。與此同時，在9月末她發起一場清洗，廢黜和逮捕了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康有為運動的文人和官員。6名年輕的維新派被處死，其中包括激進的湖南學者譚嗣同和康有為的兄弟康廣仁。康有為本人在英國官員幫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過清洗；梁啟超則乘日本軍艦逃往日本。9月26日，西太后廢除了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所有重要的革新政策。

## 維新時代的遺產

維新運動在京師證明是一次失敗，如同以前在各省進行的那樣。自相矛盾的是，雖然帝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進變革，但是帝國政府最高層的權力集中程度卻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動來進行全面的制度變革。可是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它不僅僅暴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于全面改革的驚人無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領導是多么沒有能力使制度恢復生氣和經受中國危機時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維新運動決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敗。從一開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陣思想的巨浪。當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動展開時，它所喚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過來又加深和擴大了這陣巨浪。結果，盡管維新運動沒有能達到它的政治目標，但它所引起的思想變化卻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長期的和全國規模的影響。

首先，這一思想變化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新階段，即新的思想意識時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樣，維新的時代出現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規模涌進中國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蕩。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觀和制度化了的價值觀兩者的崩潰，從而揭開了20世紀文化危機的帷幕。從一開始，文化危機便伴隨著狂熱的探索，使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深刻地觀察過去，并且超越他們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尋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結果是從19世紀90年代末起充斥于中國的各種思想泛濫成災。這些新思想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史無前例的思想變化，主要應歸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筍般產生的新的變革工具。其中的一種工具的產生方式是改造傳統的書院以創立新的學堂。幾乎從10世紀書院首次出現起，它們就成為士大夫思想活動的中心。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理學主要在書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書院還起了提供獨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學者在這些中心里面能集體地對朝廷提出政治抗議和批評。

清代初期以后，書院被置于政府的財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進行社會政治性質的講學和討論，所以它們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作為培育社會精英的教育機構仍是重要的，這從書院林立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有一種估計認為，在19世紀，書院約有4 500所。據另一個估計僅廣東一地清代有書院410所。[[70]](#_70_Liu_Bo_Ji____Guang_Dong_Shu)然而，它們的教育職能被縮減到主要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的程度。從少數在19世紀初建立的書院，如廣州的學海堂和杭州的詁經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學術某些復興的跡象。但是，19世紀40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變革之風，差不多沒有觸及大多數書院中長期不變的知識生活。[[71]](#_71_Xie_Guo_Zhen____Jin_Dai_Shu)

只是在19世紀90年代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士大夫開始改組書院和創辦新學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數目日漸增加。這種教育改革的倡導者是一些省級官員，如張之洞、盛宣懷、廖壽豐和江標。[[72]](#_72_Guan_Yu_Jiang_Biao_De_Jiao_Y)比起這些地方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員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學堂的奏折。最突出的是與康梁有密切關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通過修改課程來改造傳統的書院是開辦新學堂的最切實可行的方法。這個建議為朝廷所接受，并作為政府的政策加以頒行。[[73]](#_73___Wu_Xu_Bian_Fa____Di_2Ce__D)在響應這一政策的過程中，據說全帝國許多地區的舊式書院已按建議作了改變，對于開辦新學堂的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這樣，在1896—1898年的兩年中，教育改革之風席卷全國，最后體現在百日維新期間修改考試制度和建立全國的學校體系的全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變，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對已經進行的改革并不想加以糾正。就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都是從1895年以后開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課程。它的主要目標當然是接納西學，而修改過程中突出的趨勢是在“實學”名義下接受西方知識。實學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中曾經是一個重要的范疇，它指的是對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會關注有實用意義的學問。在若干世紀中，實學曾被儒家學者反復用來作為劃分界線的支配性概念范疇，凡是他們斷定為不“實”之學都概被貶斥，認為無價值。西方知識在實學的名義下得以在新課程中占有突出地位，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在傳統的思想價值領域中已被承認占有一席之地。

許多有名望的古老書院所進行的課程改革，便導致了19世紀90年代后期西學的重大發展。確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術方面的（包括數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歷史，也許還有西方語言）。但是，康梁集團對于西方政治經驗和理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專門技術知識的重視。康梁二人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建立了一所小規模的私立學校，名叫長興學舍，其教學的基本部分是將儒家中的社會義務思想和西方的政治價值觀融合在一起，旨在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74]](#_74_Liang_Qi_Chao____Nan_Hai_Kan)

這種適應政治需要的教育綱領后來為梁啟超所繼承，他在變法宣傳中強調西方政治理想和經驗的重要性，以區別于西方的技術知識。由于心中有這種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勸在杭州和陜西地方書院從事改革的友人們要以政治學院的模式辦學。當1896—1897年在上海從事私人教學時，他追求的也是這種理想。后來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計劃主要是要在時務學堂內制造激進思想的氣氛。那個學堂的許多學生后來成為政治活動家，并在1900年以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嶄露頭角。

像學會這樣的自愿組合并不是完全新鮮的工具。在許多世紀中，學者之間出于文學的目的結社已司空見慣。明朝末年，某些學者官員組成的“社”對時政提出批評和進行黨爭。但是從17世紀后期起，出現了堅決反對社團活動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嚴厲禁止士大夫結社干政。[[75]](#_75_Xiao_Wei_Ke_Man____Ming_Qing)當強學會在1895年突然興辦學會活動時，對宋明時期儒生中間自愿結社的追憶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個源泉。但是直接的動力主要來自西方。廣學會在文人官員中間的積極活動，必然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識到這樣一種團體具有作為革新工具的潛力。同時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識，他們知道自愿聯合的團體對于西方的進步是作過重要貢獻的。當時一次普遍的有關學會職能的討論認為，它是現代歐洲文化迅速發展的關鍵所在，這種認識是頗有典型意義的。

從1895—1898的三年中，一共報道過76個學會。大約三分之二的學會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這些出色的學會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數沿海大城市。它們分設在10個省和31個不同的城市，其中25個在內地。可見這些學會大部分是由紳士發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國的。它們雖然分散各地，但在傳播新思想方面卻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和改頭換面的書院之不足的重要組織手段。學會主要對成年人起作用，而學堂和書院則在出身于士大夫的許多年輕人中間傳播新的價值觀和知識。[[76]](#_76_Zhe_Li_Ji_Zai_De_Xue_Hui_Zon)

按照這些學會宣布的目標而對它們進行的粗略的分類也很說明問題。其中一個學會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義；30多個學會或是按照新的實用精神研究傳統的儒學，或是研究西方科學和翻譯西方書籍；15個提倡社會改革（如反對吸鴉片，反對纏足或提倡婦女教育）；23個試圖喚起士大夫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政治覺悟。確實，在最后一類學會中，只有像保國會和其他在1898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數幾個學會，才以民族主義的動聽語言明確地闡明了它們的目的。但是這23個學會全都是由于尖銳的民族危機感而成立的。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識和改革社會習慣的非政治性的學會，也越來越認識到其活動是國家的需要，這是促使它們成立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些學會的出現顯然是民族主義在上層階級中間傳播的一個標志。[[77]](#_77_Xiao_Wei_Ke_Man____Ming_Qing)

數量不斷增加的學者們聯合在學術團體中，這件事還證明了在中國社會中，除出現民族意識之外，還有其他一些范圍更廣的趨勢。中國的社會傳統總的說是離解性質的，即除親屬紐帶之外，人們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開的聯合。然而，士大夫此時在親屬或官僚體系之外采取了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體目標的團體，這很像西方以聯合為宗旨的社團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之間的學術組織打破了晚期中華帝國的離解性質的傳統，開始出現了一種成為20世紀中國許多社會團體特點的新趨向。[[78]](#_78_Wan_Shan_Zhen_Nan____Ge_Ti_H)

許多學會是為了政治活動而組織起來的，因此它們還體現了更多的人參與政治的趨勢。士大夫們所信奉的儒家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們作為社會精英的地位經常促使他們參與政治，但是其活動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內。然而，1895年以后的學會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像強學會、南學會和保國會等少數團體是明確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參政理想組織起來的。即使其他不是有意識地以民主參政為主要目標的學會，也表現了學者們越來越愿意采取集體行動，從而也被卷進了政治之中。

作為改革的工具，在維新運動年頭里出現的報紙和雜志比新式學堂和學會更為重要。在19世紀90年代，現代化的報刊在中國已不是新穎之物。19世紀90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約已出版了12份報紙，多數在香港和上海。[[79]](#_79_Bu_Li_Dun____1800__1912Nian)而從1895年起，在中國公開發行的報刊有了驚人的增加和新的發展。在1895—1898年期間，出現了約60種報紙。這樣一種發展是前所未有的，預示著在國家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新的轉變。重要的是，這時許多報紙已見之于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不但出現在長江下游的蘇州、無錫和杭州，而且也出現在漢口、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和西安等內地城市。[[80]](#_80_Guan_Yu_1895__1898Nian_Chu_B)

還沒有說明這些報紙發行情況的確切數字。它們大多數是小型報紙，而且可能只限于在地方或地區內發行。只有五種報紙——即《時務報》、《知新報》、《湘報》、《湘學報》和《國聞報》——是由和維新運動密切相關的人士辦的，它們號稱能在大地區之內或在全國范圍之內大量發行。規模最大的是《時務報》，最盛時銷路有萬余份。《時務報》在全國的影響能夠從它的分銷處數目來加以估量。當該報于1896年秋天出版時，它在9個省的19個城市有分銷處。最后其數目增加到67個，遍布在15省以及東南亞和日本的華僑界。甚至在西安、蘭州、成都和重慶等內地城市，它也有二三個分銷處。簡而言之，它幾乎遍及中國本部的所有省份。[[81]](#_81___Shi_Wu_Bao____Fen_Xiao_Chu)

《時務報》和其他維新派報紙的廣泛發行，應部分歸功于各省、府級的官方贊助。據報道，至少有11省的官員命令所屬衙門和機構購買并研究主要的維新報紙。[[82]](#_82_Tang_Zhi_Jun____Wu_Xu_Bian_F)但是，報紙普遍受到重視的最主要原因是，和早期通商口岸報刊的撰稿人不同，這些維新派撰稿者中的許多人本身就是士大夫。由于他們處于社會精英的地位，這些新出的報紙不但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中間，而且特別是在士大夫成員中間，比通商口岸的報刊有著更大的影響。張之洞向他的下屬推薦《時務報》的理由是，由紳官創辦的這份維新報紙，“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這可能表達了當時的總的態度。在張之洞看來，紳官的參與其事是維新派報紙與由外國商人主辦并以獲利為目的的通商口岸報紙的主要區別所在，后者十分自然地為紳官所輕視。[[83]](#_83_Zhang_Zhi_Dong____Quan_Xue_P)正如張之洞的態度所表明的那樣，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

這種屬于社會精英的報刊，仿效教會的《萬國公報》的樣式，在版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都和通商口岸的報刊有明顯的不同。通商口岸的報刊一般用大部分篇幅來報道地方的和商業的新聞，至于教會主辦的報刊，主要則報道基督教的活動。即使像王韜的《循環日報》這樣一種進步的通商口岸報紙，廣州和廣東省的地方新聞仍占有重要地位，商業版一般是其他版的兩倍。反之，維新派報紙有兩個主要版面。一版專用于報道新聞，包括有關重要政策的詔令、全國其他地區的地方新聞以及重要的國際事件。另一版專用于社論，主要是關于國事的社會政治文章。通商口岸報紙中占很突出地位的商業和地方消息，在維新派報紙中卻明顯地缺乏。這些社會精英的報紙傾向于關心國家大事的報道，關心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以尋求立國之道。這種類型的報紙表現了一種明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84]](#_84_Bu_Li_Dun____1800__1912Nian)

這種民族主義也許確實是正在蓬勃興起的社會精英報刊的最主要特征。幾乎每一種大報都在發刊詞中公開宣稱，它的出版發行主要是對民族危機的反應。甚至像《無錫白話報》這樣一種專門化的小報，也宣布它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而推進白話。[[85]](#_85___Wu_Xu_Bian_Fa____Di_4Ce__D)正如梁啟超所說，報紙的目的首先是促進思想的交流，以實現國家的一體化。

這些報紙的興起標志著可以稱之為中國社會精英的民族主義的開始。單就民族主義而言，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態當然可以上溯數十年。像王韜、郭嵩燾和馬建忠等人，都有民族主義的思想形態，但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運動和廣泛的意識，很清楚只是在1895年以后才出現的；因為有了學堂、學會，尤其是有了社會精英的報刊，才使它的出現成為可能。[[86]](#_86_Ke_En____Wang_Tao_He_Zao_Qi)

作為傳播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工具，社會精英的報刊充滿著一種需要參政和有責任參政的新認識。結論是通過參政，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朝新方向發展和變得富強起來。以商業利益為目標并為外國人所有的條約口岸的舊式報刊，一般都避免刊登有社會政治意義的爭論性文章，而在1895年以后，社會精英的新式報紙則和新學堂及學會一起，變成了傳播新政治意識的有力工具。

這三種工具和機構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維新派報紙報道關于創立像報紙、新式學堂和學會這些新工具和機構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學堂和學會中，報紙被閱讀和討論。例如，在長沙的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鼓勵學生閱讀《時務報》。有一個公法學會，以研究國內外的報紙為主要宗旨。再如，另一個校經學會則是在校經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此同時，南學會則宣稱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教育改革。三者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大大增強了它們的總的影響。它們創造了一種引起思想激動的氣氛，這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中間廣泛地起著作用。

這就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并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因此，這些新的渠道體系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并加以鼓吹，創造了類似現代的社會輿論的事物——這是1895年以后的重要的新發展。

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遺產，是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新社會集團的誕生。

中國知識分子的突出特點與其說是他們的階級背景或社會地位，倒不如說是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新異觀點和行為準則，以及他們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中所起的獨特作用。關于這方面的情況，只要把新型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進行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首先，絕大部分士大夫是扎根于他們鄉土的社會精英，他們在地方社會中履行著重要的職責。反之，新式知識分子階層大都是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或祖籍有聯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

其次，即使士大夫已經在從事政治組織活動，這些活動也只限于政府官僚機構中或地方社會中。確實，在進入公元11世紀以來的許多世紀中，士大夫有時曾被卷入其他政治組織活動之中：例如在宋、明兩代，私立書院成了這種活動的中心；又如在士大夫中間組成了自愿結合的團體，特別是組成了那些與17世紀一度興盛的著名的東林和復社運動有關的團體。[[87]](#_87_Xie_Guo_Zhen____Ming_Qing_Zh)然而所有這些社會動向均已消失。可以肯定，在19世紀末以前，中國士大夫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少從事這類活動。反之，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組織活動大部分發生在官場或地方社會的范圍之外。在城市中，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學堂、報紙和自愿結合的團體內，從而為后代樹立了榜樣。中國的知識階層人數很少，分布在大城市中，并且和他們家鄉的社會斷絕了往來，因此當他們最初產生于維新變法的時代時，當然是中國社會中的無足輕重的人物。然而，中國與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這類人物往往對變革特別敏感，而且經常成為變革的代理人。

知識階層還由于他們同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而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和傳統的中國國家之間存在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盡管經常存在緊張和矛盾，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系通常使士大夫依附于國家。一般來說，中國的社會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和現代政府之間則不存在這樣的關系。總的來說，他們對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們的政治支持則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與國家的關系常常是一種緊張的而不是同命運的關系。在這里，中國第一代知識階層又證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等知識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敵，然而他們的基本政治態度是與政府離心離德和對它抱有批判的意識。

新、舊知識分子集團與中國文化傳統的關系，也是大異其趣的。中國士大夫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感到自滿。對他們來說，這種傳統是天地間知識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導人類心靈和社會活動的智慧和準則。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十分自豪，對從過去延續下來的思想源流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意識。如果士大夫有時為自己和秉政當局之間的關系感到煩惱的話，那么，他們之間的文化一體感卻是不大會出現問題的。然而，當維新時代開始時，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觸已經大大開拓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同時使他們與自己的傳統產生了疏遠感。由于各種各樣的文化信仰從外部紛紛涌進中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現代世界中迷失了他們的精神方向。因此，在產生中國知識階層的同時，其成員不但有了開拓的文化視野，而且還經受著怎樣與自己文化打成一片這一深深令人苦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過去士大夫幾乎聞所未聞的。

從所有這些與社會、國家以及文化傳統發生的關系中，可以看到維新時代產生了新的社會類型的人，這些人和舊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們的出現，與新穎的思想風氣、新的變革的組織工具以及正在成長的社會輿論一起，構成了維新時代的主要遺產。

（陳高華 譯）

[[1]](#_1_4)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34頁。

[[2]](#_2_4)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2冊，第18頁。

[[3]](#_3_4)這已由R.P.多爾等人所證實。

[[4]](#_4_4)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卷1，第93頁。

[[5]](#_5_4)多爾：《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第2頁。

[[6]](#_6_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1，第11—14頁。

[[7]](#_7_4)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在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1896年第9—10冊。

[[8]](#_8_4)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9—25、33—46頁。

[[9]](#_9_4)貝內特、劉廣京：《林樂知和初期的 〈教會新報〉（1868—1870）》，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59—196頁。又見貝內特編《1868—1874年 〈教會新報〉研究指南》；《1874—1883年 〈萬國公報〉研究指南》。1889年后的英文名稱是The revie wof the times。

[[10]](#_10_4)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40—45頁。理查德·薛：《譚嗣同思想中的若于西方影響》，見科恩等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194—203頁。

[[11]](#_11_4)陳啟云：《梁啟超所受的“教會教育”》，載《中國論文集》，16（1962年），第111—112頁。

[[12]](#_12_4)宋育仁：《采風集》，見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第1冊，第6、13—14頁。《戊戌變法》第1冊，第55—58、177—180、198—201、228、245—247等頁。參見伊斯特門《中日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7期（1968年8月），第695—710頁。

[[13]](#_13_4)《戊戌變法》第1冊，第245頁。

[[14]](#_14_4)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卷5，第42—61頁。

[[15]](#_15_4)宋育仁：《采風集》第1冊，第14、15、23、24、26等頁。

[[16]](#_16_4)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卷5，第9—15、19—23、42—61等頁。參見科恩《19世紀中國的“基督徒”改革家》，載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第197—225頁。

[[17]](#_17_4)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頁。

[[18]](#_18_4)霍華德：《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等編《儒家人物》，第303—305頁。

[[19]](#_19_4)《戊戌變法》第2冊，第123—131頁。

[[20]](#_20_4)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178頁。

[[21]](#_21_4)霍華德：《日本在康有為改革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8—302頁。

[[22]](#_22_4)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8—169頁。

[[23]](#_23_4)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75—111頁。

[[24]](#_24_4)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8—52頁。

[[25]](#_25_4)蕭公權：《康有為與儒教》，載《華裔學志》，18（1958年），第88—212頁。

[[26]](#_26_4)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52—57頁。

[[27]](#_27_4)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41—47頁。

[[28]](#_28_4)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34頁。

[[29]](#_29_4)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2—227頁。

[[30]](#_30_4)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334頁。

[[31]](#_31_4)同上書，第249頁。

[[32]](#_32_4)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6、227—229頁。

[[33]](#_33_4)同上書，第231—243、249—250頁。

[[34]](#_34_4)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73—120頁。

[[35]](#_35_4)施瓦茨：《嚴復與西方》，第42—112頁。

[[36]](#_36_4)《譚嗣同全集》，第56—90頁。

[[37]](#_37_4)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89—225頁。

[[38]](#_38_3)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223頁。

[[39]](#_39_3)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1—182頁。

[[40]](#_40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3—138頁。

[[41]](#_41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26—129頁。又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4頁。

[[42]](#_42_3)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81—283頁。劉易斯：《1896—1898年湖南的維新運動》，載《中國論文集》15（1961年），第62—90頁。又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43]](#_43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37—138頁。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第156—196頁。

[[44]](#_44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13、138—139頁。

[[45]](#_45_3)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3—186頁。

[[46]](#_46_3)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第125—128頁。

[[47]](#_47_3)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01—133頁。皮錫瑞：《師復堂未刊日記》，見《湖南歷史資料》，Ⅰ（1958年），第80頁。

[[48]](#_48_3)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189—197頁。另見唐才質《唐才常和時務學堂》，載《湖南歷史資料》，Ⅲ（1958年），第98—108頁。

[[49]](#_49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42—145頁。也可參見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4—18頁。

[[50]](#_50_3)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30—34頁；卷4，第183頁。

[[51]](#_51_3)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第51頁。

[[52]](#_52_3)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1—83頁；卷5，第12—13、14—18頁。

[[53]](#_53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1頁；蘇輿：《翼教叢編》卷3，第14—25頁。

[[54]](#_54_3)張之洞：《勸學篇》卷3，第80頁。

[[55]](#_55_3)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2—13頁。《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152頁。

[[56]](#_56_3)蘇輿：《翼教叢編》卷5，第1頁。《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51—152頁。

[[57]](#_57_3)《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第162—164頁。

[[58]](#_58_3)劉廣京：《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響》，載何炳棣等編《中國的危機》，Ⅰ.Ⅰ.第109—112頁。

[[59]](#_59_3)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清華學報》第1卷第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頁。《戊戌變法》第1冊，第528頁。

[[60]](#_60_3)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第529—683頁。

[[61]](#_61_3)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第53頁。《戊戌變法》第1冊，第509—512頁。

[[62]](#_62_3)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243頁。

[[63]](#_63_3)同上。

[[64]](#_64_3)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第111—243頁。

[[65]](#_65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221頁。

[[66]](#_66_3)同上書，第256—261頁。

[[67]](#_67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56—260頁。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第344—350頁。施雷克：《1898年的維新團體保國會》，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50—64頁。

[[68]](#_68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78—216頁。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第1—305頁。

[[69]](#_69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154—221頁。

[[70]](#_70_3)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頁。格里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載施堅雅編《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第475—498頁。

[[71]](#_71_3)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載胡適等編《張菊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第281—322頁。

[[72]](#_72_3)關于江標的教育改革見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頁。關于廖壽豐，見《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381頁。又見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第223—230頁。

[[73]](#_73_3)《戊戌變法》第2冊，第292—296頁。

[[74]](#_74_3)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第64—67頁。

[[75]](#_75_3)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載《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刊》卷101第2期（1972年春季號），第35—37頁。又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6—23頁。

[[76]](#_76_3)這里記載的學會總數是根據《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所報道的學會數和張玉法、湯志鈞、王爾敏所開列的學會數計算出來的。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又見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4—165頁；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2—270頁。

[[77]](#_77_3)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第55—67頁。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99—206頁。王爾敏：《清季學會會報》，第134—165頁。

[[78]](#_78_3)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見詹森編《日本對于現代化態度的變化》，第459—531頁。

[[79]](#_79_3)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80]](#_80_3)關于1895—1898年出版的報紙數目的粗略估計，其依據來自《時務報》、《湘學報》和《知新報》的報道，另外加上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27—270頁）和張靜廬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65—84頁）所開列的名單。

[[81]](#_81_3)《時務報》分銷處的總數是根據該報每期所列地點統計而成。

[[82]](#_82_3)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第236頁。

[[83]](#_83_3)張之洞：《勸學篇》卷2，第16、111—117頁。

[[84]](#_84_3)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第1—85頁。

[[85]](#_85_3)《戊戌變法》第4冊，第542—545頁。

[[86]](#_86_3)科恩：《王韜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載《亞洲研究》卷26第4期（1967年8月），第559—574頁。參看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

[[87]](#_87_3)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5—255頁。

#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中日兩國近代改革相互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蒸汽輪船航行的問世，兩國都發現閉關自守的狀態已經維持不下去，西方炮艦在其中某一國港口出現，對另一國也產生影響。文化的聯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著其中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給另一個國家，并且對挑戰和應戰的審察會引起反省和仿效。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危機比日本與西方關系的危機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與國際秩序發生關系，而同年，清朝的圓明園卻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此后，日本領導人決心保持民族團結以對抗外國人的意志，因19世紀60年代使中國瀕于毀滅的四分五裂狀態而更加堅決。不久，日本向現代化進軍，這給中國帶來鼓勵，也帶來了警告。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日本一躍而在國際間與列強平起平坐，這件事使它的各項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青年一代學習的中心。

這些年來，兩國之間一國在另一國眼中的形象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給分析研究提供了一個課題，而這個課題到現在才正在產生成果。對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從有頭腦的、內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中的圣賢，一變而為1895年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軍隊面前倉皇逃跑的烏合之眾。這樣他們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學生，在20世紀初的東京街頭上，往往因其發辮和衣著而受到頑童們的嘲罵。在中國人眼中，人們記憶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寧的東洋矮子作為近代化的鄰邦又卷土重來，并且答應把中國人帶入光明的未來新世界，但事實上卻證明在這個未來世界中有一個新的亞洲帝國主義。在19世紀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領導人警告其國民不要無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對中國虛弱的嘲笑。中國領導人在一開始交口稱譽日本的成就，然后變成了恐懼，并且警告國民應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險。可是后來，當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顯時，日本的現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學習的目標，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國革命的地方。由于中日兩國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對對方具有那么重要的影響，所以對有關的兩方面進行觀察是有好處的。

## 中國的開放對日本的警告

中國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盡管不是有意識的，但仍適合作為本文討論的開端。貢獻是幾方面的。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歷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文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學者們都同意19世紀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產生的恐懼感有著重要意義，并且從中國傳來的消息顯然對那種意識的產生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船只莫里森號出現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種種明顯失實的傳聞，說什么這位在廣州地區有著普遍影響的英國人，現在正準備對付德川政府。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在中國戰敗的消息傳來從而證明他的預言錯了以后，影響是巨大的。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寫信給他的一個僚屬說：“這是一件外國的事，但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警告。”[[1]](#_1_Guan_Yu_De_Chuan_Qi_Zhao__Jia)不久，荷蘭和中國的商人把中國的出版物帶到了長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廣為流傳，那里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得到這些作品。他的《海國圖志》有許多日本的版本。魏源的關于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于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于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君主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后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他寫道：“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后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圣武記》……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素昧平生。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嘆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致，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2]](#_2_Guan_Yu___Hai_Guo_Tu_Zhi____D)

當來自中國的新聞在量和質的方面在19世紀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長提高時，這些新聞就成了使蔓延于該國的危機感加劇的重要因素。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爭后解散鄉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系起來。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于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幾年的日本人，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一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日本人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恢復明室和英國支持復明戰士的情節。逐漸地，比較準確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了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的關系。在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報道，但一些虛構的傳說（如說復明戰士與清軍進行大戰）繪聲繪色，因而混亂不堪。許多這樣的報告取材于有關國姓爺（鄭成功）的老傳說，以美化報道中的英雄，但是愈來愈多的報道，卻把中國的災難與外國的干涉和征服聯系了起來。[[3]](#_3_Guan_Yu_Ri_Ben_Qu_De_You_Guan)

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后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19世紀60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搜集有關中國人災難性經歷的第一手觀察材料。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為千歲號，它于1862年出發；由于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后，就提供了關于中國沿海事態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4]](#_4___Ming_Zhi_Wen_Hua_Shi_Lun_Ji)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只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5]](#_5_Yin_Ci__Zhuan_Xie_Jing_Shang)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中國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設在日本的分行（特別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購買輪船和輕型武器。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著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系。幾十年后，在1885年福澤諭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后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后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余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于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復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6]](#_6_M_B_Zhan_Sen____Ming_Zhi_Shi)

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后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也使人很感興趣，因為它提供了把以后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的事物。西方書籍的早期中文譯本含有重要的漢字詞組，它們逐漸進入了日本人的“現代”思想中。到19世紀末，這些漢字詞組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后來日本詞傳入中國時，許多中國人認為要為這些詞匯（像為另外一些術語那樣）感謝日本。這種傳入在出版國際法的譯文方面尤其重要，因為需要譯好像“right”（權利）和“sovereignty”（主權）這樣一些相近的字眼。但這些術語與以后大量涌進中國語言中的日本詞相比，數量仍是比較少的。在早期自強運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為學習現代化而留學中國。

## 中國人心目中的明治時期的日本

在19世紀后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制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贊揚甚至欽佩之情。李鴻章認為德川后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他們的這些態度在明治中興初期的幾年還繼續存在。根據一位權威的研究，李鴻章在1870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后，“給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取得的相對的成就……以及據說日本已籌集巨款興建兵工廠和輪船之事。李鴻章感到中國應與日本友好，也許甚至應派官員駐在該國，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國家一邊”[[7]](#_7_Liu_Guang_Jing____Li_Hong_Zha)。后來日本人利用臺灣土著對琉球漁民施加暴行之事，作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對琉球群島的領土要求和對臺灣采取行動的借口，李鴻章及其同僚開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險的策源地。明治的變革現在開始表現得過于想徹底地趕超西方了。

1875年的糾紛解決后森有禮來北京，李鴻章與他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談話，李對日本想與東亞文化傳統決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驚。在日本外務省官方的英文談話記錄中，李鴻章談話的內容如下：“我對貴國近年來作出的幾乎一切成績都深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還不很理解，這就是你們把古老的民族服裝改成歐洲式樣……服裝是激起對祖先的神圣回憶的事物之一，后代理應以崇敬的心情永遠保持下去。”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森要他相信：“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著的話，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事……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為他們當時發現中國服比原來的穿著要好。”李鴻章反駁說：“你如果出于理智，就應該穿中國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貴國產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們四百年前的祖先誰也不愿意改成本朝開始后改變的服飾（即留辮子）。但畢竟發生了變化，不過你們的這種變化是強加給你們的，盡管你們不喜歡它。”[[8]](#_8_Dong_Bei_Da_Xue_Qian_Jiao_Sho)但是，李鴻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過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聳聽地談到了借外債的危險性，一方面卻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這兩點連同其他措施引為觀測日本所以“其勢日張，其志不小”的基礎。到1885年他寫道：“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在這10年的末期，當李鴻章的預言已成為事實，并且親往下關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時，他仍極力設法想使中日兩國“成為兄弟而不結成仇敵……對我們一方有害之事，對另一方一定也如此……黃種人準備對付白種人，此其時矣”[[9]](#_9_Deng_Si_Yu___Fei_Zheng_Qing)。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1894—1895年的對日戰爭，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態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爭也被看成是對兩國采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致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因此，中國嘗到失敗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滿洲王朝和李鴻章也要分擔責任。日本的戰勝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蓋過；歐洲列強在1895年進行干涉，并表面上充當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護人以反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后立刻順手牽羊地掠奪了它們原來加以保護的東西。這種行徑在中國引起的憤怒直接導致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見第五章）。

明治時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維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傳統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引進代議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發揚的為國效勞而不是滿足個人或某個地區利益的精神，看來可以成為任何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的榜樣。維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國的讀者和領袖人物介紹明治維新各項成就的事實和適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樣說是有意義的，也是恰當的。例如黃遵憲（1848—1905年）在1877年作為公使館參贊隨同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來到了東京。黃遵憲與日本文人進行了許多接觸，并且寫了一部日本史。這部在他任舊金山總領事后一段時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脫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才流傳，到1897年才出版，書名《日本國志》。就是這個黃遵憲，他邀請梁啟超到上海主編強學會辦的一份雜志，并且在湖南支持譚嗣同和梁啟超。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緒帝的注意，當時黃遵憲正在湖南任職。[[10]](#_10_Lie_Wen_Sen____Liang_Qi_Chao)

維新派中間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在他的論點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在他看來，明治時期的憲法是使日本強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紹了日本的范例，并且在以后堅持他的論點。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從1898年夏季起，康有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紹明治；對中國來說，現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統治和擴大參政的范圍。他指出，日本與中國近，其政治形式與社會制度也近似中國。以后，康有為在供清帝參考的研究俄國和日本的長篇論著中重復并且發揮了這些論點。不過，他的主張依然是泛談多于實指。他贊成尋求新的模式，特別贊成日本的立憲改組。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儒家原則，需要中國政制的民主化。[[11]](#_11_Jian_Xiao_Gong_Quan___Jun_Zh)但是，雖然康有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卻沒有什么理由可以認為明治的民族主義或社會組織就是他追求的目標。在1911年以前，他傾向于給德國的榜樣以更高的評價，因為這種榜樣似乎把自由與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紀律結合在一起了。

可以設想，明治時期的領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來贊助1898年的維新運動。他們自己在這個時候對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幫助中國進行抵抗。外務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隈主義”，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在百日維新期間，伊藤博文訪問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見。在皇太后對維新派發動政變后，維新運動的領袖們得到日本人的保護。康有為取得英國的保護到達香港后轉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難。梁啟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領事館，然后乘坐一艘日本炮艦前往日本。

華人社會在日本日益發展，維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為領袖群倫的人物。他們往往與有地位的上層日本人進行接觸。大隈重信親自接見過康有為，此后還與他有通信關系。近衛篤麿親王也是如此。犬養毅和其他議會政治運動的領袖們都以擁有與這些中國貴賓的友誼而自傲。隨著不斷高漲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的華人界中開始蓬勃發展，維新派由于他們的學識和道德威望而沽了光。作為華人界人士的宣傳員和發言人的梁啟超更是處于黃金時期。在創辦一所以徐勤為首的供中國青年學習的學校時，他是主要人物；同時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論點來提倡他的君主立憲制主張，這樣便與主張共和的戰士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與此同時，日本的榜樣在義和團之亂以后幾年清王朝進行的政府改革中顯得重要了。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張之洞和劉坤一一系列奏議中提出的關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見第七章）。軍事改革包括專門為訓練一代職業陸軍軍官而興辦的學校。日本教官的人數逐漸超過了歐洲教官。派往日本軍事學校的中國士官生人數也愈來愈多。日本的武裝力量也給中國新式軍隊的行政結構提供了樣板。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據德國的，特別是日本的實踐制定新的法典，許多后來成名的日本法律學家首先就是作為中國人雇傭的咨議和顧問而開始他們的事業的。

日本的榜樣對立憲制的計劃尤為重要，特別在日本打敗俄國以后更是如此。在1906—1911年期間，派往日本和歐洲學習的代表團，從伊藤博文那里聽到的謹慎的意見，與伊藤本人早期從他德國老師那里聽到的一樣。這些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清朝的憲法應由朝廷頒賜。1908年，慈禧太后頒布了準備憲政的九年計劃，此舉與其他同時提出的有實質性內容的建議一樣，是直接根據1881—1890年的日本經驗作出的（見第七章）。

##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其他的改革都沒有教育變革產生的那種長遠意義。中國從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轉變，從傳統的標準和注重傳統向西方的標準和注重西方轉變，在這些方面，日本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某些人對西學的詆毀，曾經使甚至容閎的一小批學生在1872年留學美國之事也有了爭議，并且在1881年迫使學生歸國和撤銷留學生團。但在日本戰勝中國以后的十年中，這種態度讓位于重視出洋留學，其重視程度使留學不但對一個人在官場的晉升有好處，而且最后成了晉升的關鍵性的條件。日本似乎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誘人、最經濟和最不出亂子的來源。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它產生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第一代領袖。[[12]](#_12_Zhe_Fang_Mian_De_Quan_Wei_Zh)在規模、深度和影響方面，中國學生留日遠遠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因此，經過最近的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從1898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的重大影響”[[13]](#_13_Fei_Zheng_Qing_Deng_Bian)。

學生的出國始于甲午戰爭以后。1896年，第一批13名學生來到日本。在東京神田區專門為他們辦了一所學校。他們不懂日文，因而他們初期的課程主要是語言課。不到幾個星期就有四名學生離學。單調乏味、難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現實的或想象的陋習，使他們灰心失望。但是有七名學生完成了學業，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問題的專家。他們開始用中文寫作有用的日語教科書和留學日本的指南。

歐洲帝國主義在中國下一輪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的行動，這一輪侵略又引起了學習現代制度的緊迫感，同時也使日本成了一條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上面已經談到，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主要的維新派及其信徒們逃往日本避難。雖然清廷試圖利用導致1900年義和團災難的蒙昧主義的潮流，但像張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以及像康有為、梁啟超等在維新運動中受挫的知識分子仍然繼續重視去日本留學。

張之洞早已在他的《勸學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經從西方翻譯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內容，由于他們的語言與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國學生所掌握，所以應該利用日文書籍。他強烈地支持出國留學。“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經驗教訓。“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學生毋忘其國；[[14]](#_14_Gen_Ju___Zhang_Wen_Xiang_Gon)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談到從中取得的經驗教訓時，他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學生也。”[[15]](#_15_Yin_Zi_Shi_Teng_Hui_Xiu___Z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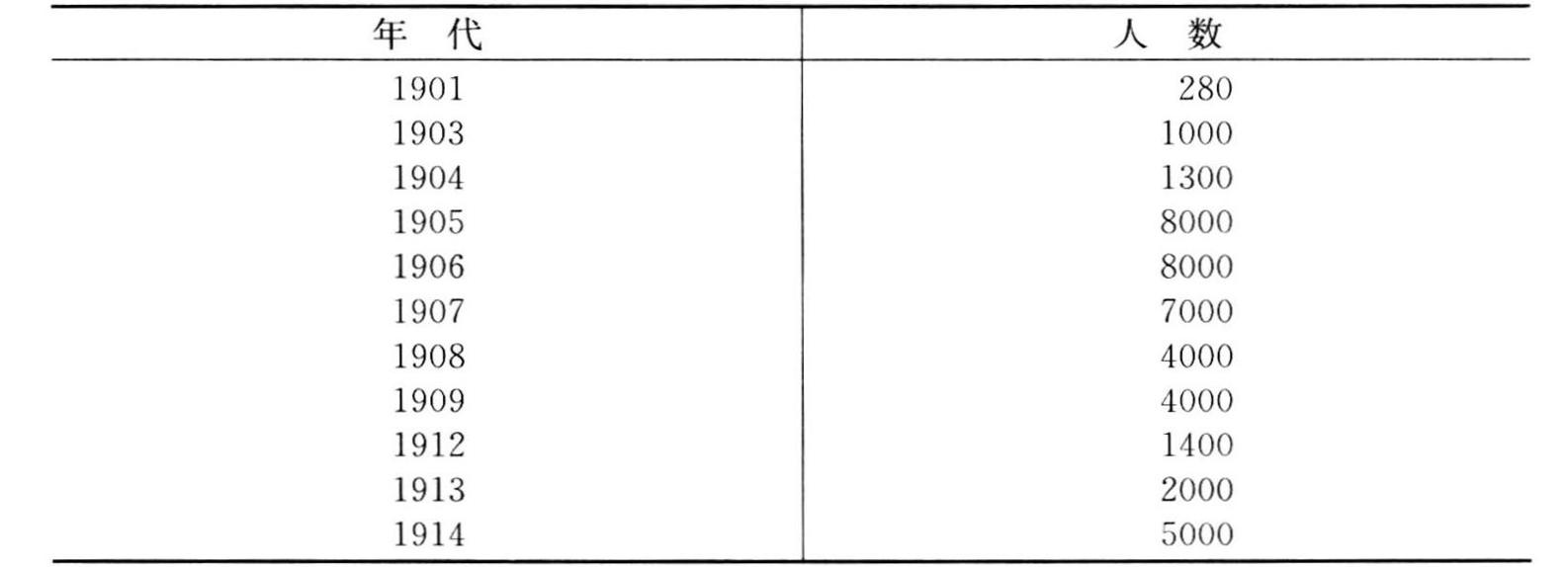
于是一批批學生陸續出洋。1899年，在日本的留學生超過一百名。張之洞派出的使者還調查那里的學習設施。在他的指示下編寫的一本留學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從此一直是標準的指南讀物。張之洞這時還派出少數軍事專家前去學習。熱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員。梁啟超總結了日文的幾個優點：它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復雜，大部分詞匯與中文有關；60%—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

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看到中國派學生到他們國內留學的重要意義。像上田萬年等學者和大鳥圭介等外交家都開始就教育其鄰國子弟而出現的機會和責任問題向其同胞們寫文章和發表演說。大隈重信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制定出由日本向其大陸鄰國償還歷史債務的“主義”的。上田等教育家號召：采取行動，專門為中國學生準備教育計劃；設立專門的語言學校，以便使他們在到達后兩三年內可以為攻讀大學水平的課程做好準備。他還意識到民眾的愛憎心理以及可能對中國人進行侮辱，堅持撥專款興建足夠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對學生進行無禮、利用或“誘使腐化墮落”的行動。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應作出安排，以便使學生們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個方面。[[16]](#_16_Tong_Shang_Shu__Di_45Ye_De_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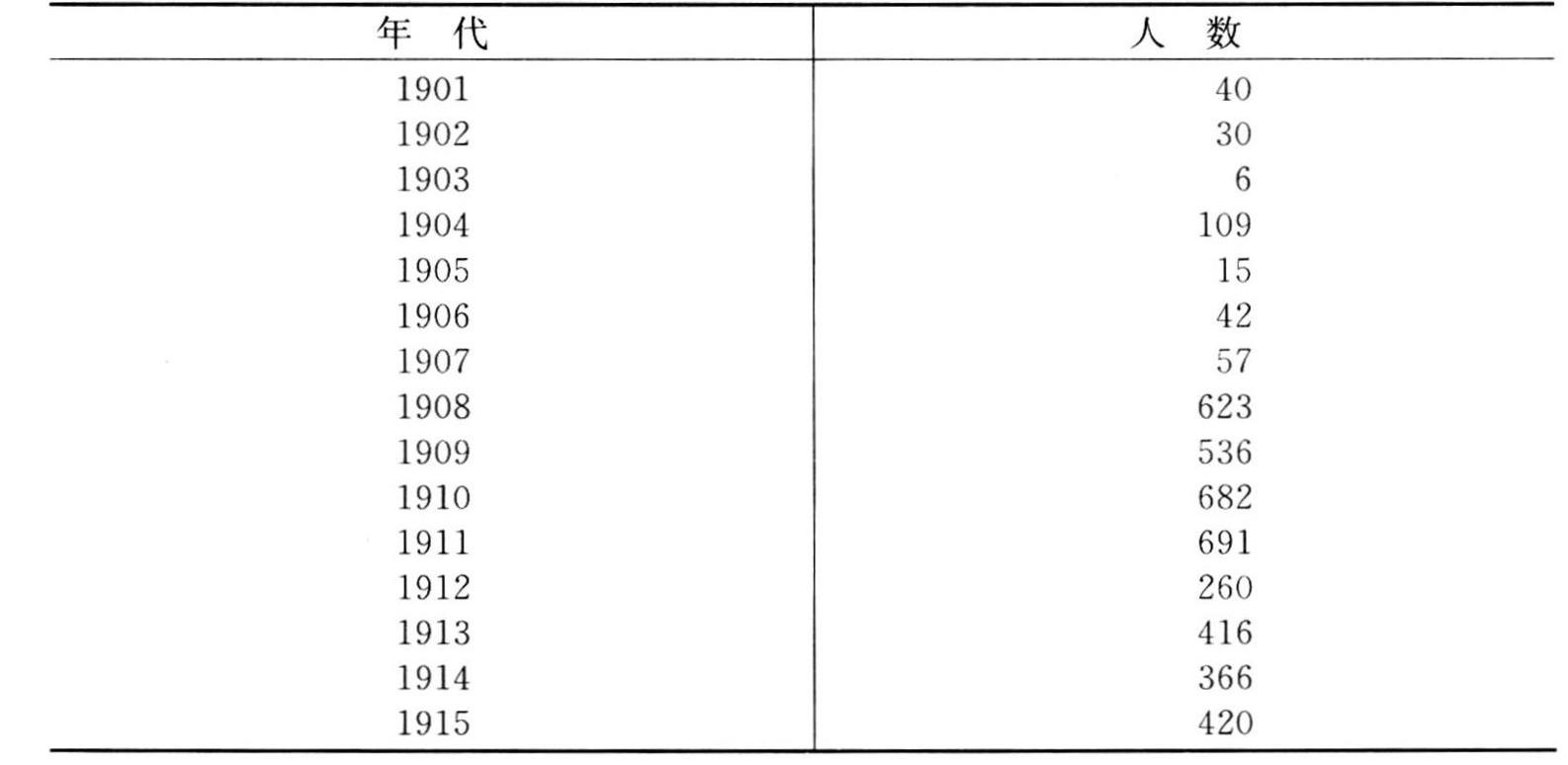
在此期間，義和團的災難以及愚昧的排外主義的失敗，使張之洞和劉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們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緊迫感。對出國留學的重視迅速加強，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機會的出版物也激增。這時，去日留學和出仕二者開始掛上了鉤。與此有關并且最終發展而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改革和最后取消。出國留學代替了經典著作的基礎訓練，成為進政府工作的基本條件。

對東京學生的人數也有直接的影響。到1905年底，中國的留日學生的估計數已增至8000—10000人，190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估計人數為6000—20000人，估計數的懸殊如此之大，說明在護照、簽證、學校或課程注冊等統計數字不可靠的情況下，是難以計算人數的。研究這一留學動態的第一流學者實藤利用當時保守的估計數，算出的總數如下：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留日的中國畢業生



在留學風達到最高峰時，學生中也有舉家赴日的，如父親陪著兒子，年輕的中國姑娘和纏足的婦女也前來學習。其中只有少數人來日準備正式學習，或者能夠正式入學，所以在日本學校的畢業生雖然人數仍較可觀，卻大大低于駐留在日本的人數。[[17]](#_17_Shu_Zi_Gen_Ju_Shang_Yin_Zhu)

很少教育機構有能力應付這種洶涌而來的人潮。日本當然也不例外。為了應付中國學生的涌進，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提供指導。設立了許多的專門學校。成城學校一開始是訓練日本士官生的軍事預科學校，也接納中國學生并培養了許多人。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學校有日華學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東亞商業（建于1901年）和弘文學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書院東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為重要。例如，弘文學院前后共收7 192名中國學生，其中3810人畢業，學生中有黃興、魯迅和陳獨秀。許多私立學校，特別是早稻田，新開辟了外國學生區，以供應新收學生的伙食。為了培養未來的現代母親，還開辦了女子學校。開學典禮常滔滔不絕地提起孟母和華盛頓之母，因而生色不少；這樣的典禮又使張之洞相信在“東洋”留學的好處。[[18]](#_18_Guan_Yu_Xue_Xiao___Zhuan_Ye)

盡管作了這些努力，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毫無疑問是很不好的。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學，像日本學校接納他們一樣準備不足。許多學生上填鴨式的課程，他們看重節約時間和強調集中精力于關鍵性學時上。多數學生根本不上正規學校。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了；他們的急躁和不滿情緒直接傳到了中國的親友那里。但是像這樣規模的造就民國時期中國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運動，必須被認為對整個這一代上層人物的經歷有著關鍵性的重要意義。東京和中國之間的通訊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響遠遠不限于在日本學校學習的人。因此，學生們的經歷和所受的影響這兩者的質量問題最能吸引人們的興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關于中國人在日本的經歷，可從留學生的回憶錄和自傳中看到典型的情況。這種經歷還作為文獻資料被收在中國和日本當局編的調查和報告中，并且反映在許多學生出版物中。[[19]](#_19_Shi_Teng_Zhun_Bei_Le_Yi_Tao)旅日往往從一些已去日本或正準備去日本的人的鼓勵開始。學生們往往回國鼓勵其他人學他們的樣。他們一旦到達東京，神田區就成了他們的家。學生們寄宿在神田區，在那里的商店購物，在那里的飯館就餐。出現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像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為專門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譯文以及刊物和教科書的企業而開設的。理發師不厭其煩地使他們的辮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化樣式，結果湊合成一種向后梳得直而高的發型，稱為富士發式。[[20]](#_20_Jian_Sun_Bo_Chun__1891Yi__De)隨著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會紛紛在東京成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并加以指導。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經歷常常充滿著矛盾和諷刺。這可以從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的記述中看出，他從1903年起開始在日留學。他在日本小客棧的第一夜充滿著令他驚奇的事。“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板屋席地，進門要先脫鞋的。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復古。”[[21]](#_21_Jing_Mei_Jiu_Ran_Hou_Hui_Gu)留學生可能會收到告誡他們在日本社會應怎樣待人接物的指導性傳單。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聲呼叫，不無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廳的拖鞋要分開使用，要尊重婦女，在擁擠的街車中向老幼婦女讓座，注意珍貴物品，保持衣著整潔，不問他人年齡，不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飯。[[22]](#_22_Shi_Teng_Hui_Xiu___Zhong_Guo)

這種名義上一切為了留學的實際留學經驗，常常是勞而無功的。日本的教師和作家樂于使留學生們相信，他們的國家面臨著日本在明治初期的處境。他們的事例中充滿了過去出國在外留學的日本人的經歷。各專業的代表人物都準備提供保證，使他們相信，這個專業的成果對中興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看來，大部分留學生已經學到的主要教訓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他們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們在同鄉觀念中增添了一種日益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在神田，由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點這兩種覺悟的鼓舞，一個全國性組織開始形成。神田的中國學生會起了使學生團結一致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不久，美國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設在神田）能夠利用它不受日本人約束的地位，使其規模超過了日本人辦的早期的學生會館。但它們都被用作集會場所，都促使同鄉觀念與民族主義相融合。同鄉意識從未喪失過，大部分留學生首先與本省人集會結社。對革命組織的詳細研究表明，它們招收成員和做報告都是通過設在東京的各省同鄉會進行的。但留學生的聚集地與革命一樣，也把同鄉淵源與民族覺悟融合在一起了。[[23]](#_23_Zheng_Xian_Xiu_Lan__Yin)

日本在許多方面為加強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做了工作。恩施態度和民族歧視當然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表現的自負心面前煙消云散，關于這場戰爭，日本政府和人民都認為是文明與中世紀精神之間的一場斗爭。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經過了幾十年的長期耐心等待之后終于戰勝了中國，這件事產生了影響日本社會和思想意識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義。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以及狂熱的歌曲，都被用來灌輸和加強突然爆發的廉價和嘩眾取寵的愛國主義。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必然首當其沖。他們的國家已被視為一個弱國，一個無準備的和非現代化的國家。幸德秋水指出：“在對華戰爭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而且這些不只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著血腥的敵意。”[[24]](#_24_Xing_De_Qiu_Shui____Di_Guo_Z)留學生就這樣深受嘲弄和蔑視。街上的頑童集中嘲弄他們的發辮，并且跟在他們的后面高聲叫喊“清國佬”。

這種環境經常提醒中國人，叫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弱點和失敗。一部敘述中國留學生的小說描寫說，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車轉身問乘車的中國留學生是否知道日本剛打敗了俄國，還問這個勝利是否使他們產生嫉妒之意。[[25]](#_25___Shang_Xin_Ren_Yu_____Zhe_S)

可以預料，其后果是激怒了留學生，促使他們剪辮子，易西服，自充現代化。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幾次與同校的日本人用漢字筆談的情況。他們說：“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在羞辱的驅使下，他直奔理發館，打著手勢要剪辮子。[[26]](#_26_Jing_Mei_Jiu____Zui_An_____D)

這種蔑視的態度終于與中國一詞聯系了起來。“支那”一詞可以追溯到唐代，當時此詞通過從印度傳入的佛經而在中國語匯中使用。雖然此詞日本人已在德川時代后期和明治時期用得很多，但仍與“清”交替使用，中日甲午戰爭仍被稱為日清戰爭。此后，日本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詞；在學生運動初期，因為它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名，所以學生曾被此詞所吸引。但隨著“支那”逐漸與在街頭呵斥追逐中國人的孩子們聯系起來時，它就使人聯想到中國的虛弱。在民國時期發生的一些災難和二十一條要求以后，中國人的憤怒變得愈加厲害了。但在明治時期，這個過程還剛開始。[[27]](#_27_Li_Ru__Guo_Mo_Ruo_Zai_1936Ni)

日本通過示范，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了更積極的貢獻。明治時期的最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產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漲的十年，它明顯地表現在與英國的結盟和對俄戰爭的勝利上。日本的民族主義對一些甚至非常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也有深刻的影響。一個年輕的河南人在日記里對他的學業或環境不怎么關心，但對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卻感到驚奇。乃木將軍在旅順口喪子的故事贏得了他的欽佩；他寫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愛國，以致她們之中很少有與中國留學生結婚的。[[28]](#_28_Guan_Yu_Yong_Zhu_Yin_Fu_Hao)梁啟超描寫了上野青年參軍時其親戚朋友熱烈歡送他們的場面，他說他看到一面旗上寫著“祈戰死”三字。他寫道，見此情景，不禁為之矍然肅然，不能忘懷。日本人有“大和魂”，對中國來說，最緊迫者莫過于發展“中國魂”。梁啟超隨即強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確立自愛心和愛國心，這樣國民就會愛其祖國。要分享強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愛和愛國心。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的《國民教育：愛國心》剛問世，就立刻被北京大學堂官書局作為教科書翻譯出版。許多論述愛國主義方面的日本著作和傳記很快都有了中譯本。[[29]](#_29_Shi_Teng_Hui_Xiu____Zhong_Gu)

由于學生運動充當了培養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所以留學生的人數自然而然地隨著政治情緒的高昂或挫折，時而增加，時而減少。從數字看，留學生在1906年以后銳減，雖然人數依然很可觀。人數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許多人在東京所受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不滿。有些觀察家認為，這種不滿情緒似乎是與那些受教育者質量下降的狀況相符合的；事實上，日本刊物開始覺察到，優秀的中國學生正被送到其他國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來日本。這些看法也許有些根據；美國首先免除了義和團之亂的賠款，作為1908年中國學生的教育經費，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開始這樣做。對準備差的學生不加控制地涌進日本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和它的代表們開始表示驚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開始規定選拔學生和選修課程的標準，同時禁止受短期訓練。日本的教育當局會同執行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學生。這樣，又轉而引起留學生對本國政府和東道國的憤怒。根據學校畢業生的數字，教學質量可能改進了，但學生組織和不滿情緒也隨之加強。1907年兩國達成協議：日本最好的國立高等學校將向中國留學生開放，讓他們學習正規課程；因此在以后兩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學校入學。1911年6月，中國政府安排在北京開辦一所預科學校，以便培養到日本高等專門學校求學的學生。到中國的日本教師的人數也有增加，他們有的自辦學校，有的也在中國學校任教。[[30]](#_30_Guan_Yu_1907Nian_Xie_Yi__Jia)

東京和北京的觀察家們和官府的憂慮，因留學生變得日益自覺、激動和警覺而與日俱增。對他們的每一次冒犯只會更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并且使他們的東道主和贊助人感到不便，往往還感到惶懼。1902年，章炳麟等人預定組織一次集會來紀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時刻被日本當局取消了。同年，中國公使蔡鈞決定拒絕為九名自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入學提供必要的保證。一批留學生拒絕在公使接見他們以前離開公使館，這時公使館就召來日本警察抓人，這就給留學生以口實來指責中國當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們把本國國民從享受豁免權的中國使館中趕出去。由于學生們早已聽到蔡鈞已經上疏北京，說他們中間有人傾向革命，所以他們的憤怒更趨于白熱化。被捕和被驅逐出境的吳稚暉在被押送經過東京的煅冶橋時，企圖跳河自殺。梁啟超也卷進了這場糾紛，他在他的《新民叢報》中譴責公使是“文明之敵”。實藤調查了當時的14種報紙，除了兩種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學生。經過日本官員和私人的廣泛調解，達成了放寬學生保證這一規定的妥協。同時，中國公使館任命一名官員擔任學生監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換，這九名留學生即進入成城學校就學。[[31]](#_31_Shi_Teng_Hui_Xiu____Zhong_Gu)

第二年，中國政府把攻讀軍事的留學生轉到一所為入日本軍事學校而新辦的預科學校。這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應措施，因為新公使提出，日本陸軍著重忠君愛國，服從長官，無不服管教或反對政府之危險。清政府作出規定，將選派100名18—22歲的官費留學生去受軍事教育。同時，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辦了一所學校，使自費留學生也得以受軍事教育，盡管北京政府抵制這種學校。[[32]](#_32_Tong_Shang_Shu__Di_68__71Ye)

1903年中國留學生成功地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把中國少數民族和福建人的產品放在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參加抗議。但到那時為止，這些糾紛都沒有導致中日對抗。由于這些年來日本反俄思潮泛濫（寺尾亨教授就是積極推動戰爭的“七主戰論者”之一），所以下一個事件，即發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為主要內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發生對抗了。這次運動的引起是由于俄國拒絕按期撤出滿洲和俄國對華提出了它開始否認后來又承認的“七條要求”（奇怪的是它們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因為俄國人想長期在滿洲盤踞。中國的留學生從日本的報刊收集情報，這些報刊對將會長期危害日本在滿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沒有明顯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動學生舉行示威的跡象，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還因害怕造成外交麻煩而加以阻撓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動無疑與日本的輿論是一致的，并且還受到后者的歡迎。留學生自己在神田學生會中組織起來，組成第一個拒俄義勇隊，后來又組成學生軍。留學生在慷慨激昂的場面中簽名發表他們視死如歸的聲明，并且派代表回國敦促袁世凱總督宣戰。不過袁世凱的屬員反而勸他們再去讀書。中國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33]](#_33_Guan_Yu_Ying_Guo_Ren_Kan_Dao)日本外務省在接見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學生說，他們的活動正在給日本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正在這個時候，運動夭折，其組織改為毫不掩飾其革命意圖的軍國民教育會。這一連串事件對利用各省刊物和學生會主要學生組織來調動各省學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學生中像黃興和陳天華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機進一步進行民族主義的和反滿的煽動。[[34]](#_34_Guan_Yu_Xiang_Xi_De_Fen_Xi)

到此時為止，留學生的活動名義上是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蔑視中國的民族尊嚴和主權，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現了日益強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傾向。與上海幾個不滿分子中心的聯系是密切的；而東京各省同鄉會發行的刊物，使全中國都惶惶不安。鄒容撰寫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滿小冊子《革命軍》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時有香港和東京的版本。馮自由認為它的發行總數達100萬冊。[[35]](#_35_Zou_Rong____Ge_Ming_Jun)最近的研究已把這本著作與其他三本書（即章炳麟對康有為改良主義的抨擊，以及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后不久寫的《猛回頭》和《警世鐘》）列為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小冊子。[[36]](#_36_Dao_Tian_Qian_Ci____Zhong_Gu)

1905年發生了留學生與日本教育當局的沖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其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專門規定學校應保證留學生住在具體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對他們進行管理；學校要監督學生的行為，拒絕可疑的人入學，并停止犯規學生的學籍。這一規則體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關注，因為張之洞已經因學生的鬧事和激進主義而變得十分驚慌，所以他警告說，八千多名留學生的思潮充滿了革命的危險；但他又說學生十之九受脅迫，煽動肇事者不足什一。[[37]](#_37_Yin_Zi_Yong_Jing_Suan_Ji___S)留學生立刻抗議，說此項規則是對他們的歧視，因為規則單單不給他們享受日本人享受的憲法自由，并且指責規則具有政治目的。原來推動留學生來日本的各省同鄉會和出版物馬上又煽動他們退學以示抗議。大批學生歸國，沒有歸國的幾千名留學生則罷了四十天課。為了解決這場糾紛，日本駐北京公使內田康哉和張之洞還進行了幾次談判。

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當局開始擔心留學生的騷亂。12月7日，《朝日新聞》認為罷課是由于留學生對規則及其目的的誤解引起的。它一開始就指出：“東京各地區學校的八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罷課成了一大問題。罷課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它是由于留學生對文部省規則進行了極為狹隘和片面的解釋而引起的不滿造成的；它還起因于中國國民似乎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當時尚未積極參加罷課的陳天華花了大半夜寫就一份遺書，號召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放縱卑劣”這四個字。“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殺，這就使他的遺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遺書中寫道，“時時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結果，幾乎有兩千名留學生返回了中國。隨著罷課的深入發展，日本議會議員和其他領導人介入了討論，于是學生運動再也沒有恢復它早期的勁頭。對學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罷課開始緩和下來。

罷課為中日兩國學生一起行動這一少有的大規模嘗試提供了機會。雖然許多人私人之間結成友誼，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少有機會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場合了解他們的日本同學。1906年1月，發起了成立中日學生會的活動。成立大會有1500名學生參加，他們聽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說。大隈又把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的必然性。馬相伯號召中國留學生愛國勿忘學習，學習勿忘愛國。[[38]](#_38_Shi_Teng_Hui_Xiu____Zhong_Gu)有些留學生獲得了更有意義的個人感受。魯迅后來在贊揚他的導師藤野教授時說，藤野在借給他筆記和檢查他的筆記本時的關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擔心其他學生會指責藤野偏心。但中國留學生回憶錄中更常見的，是對日本人傲慢的憤慨和對本國軟弱的體會的記載。北一輝后來指出，弱者和強者很少能成為朋友；很明顯，最近才弱起來和最近才強起來的人們，在像中日兩國那樣關系復雜的情況下，似無成為朋友之可能。

盡管留學生人數稍有減少，并且入學的人逐漸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認真學習的學生，但學生運動逐漸成為產生動蕩、不滿和行動的重要源泉。在清代的最后幾年中，在東京的中國各省的和全國性的留學生組織一直警惕地注視著對中國主權尊嚴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強一樣，日本人在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過錯，甚至為了革命者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更合學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嚴時也是如此。在連續發生的鐵路借款和爭奪勢力范圍的糾紛中，留學生發現不乏可以用來保持他們政治覺悟的事件。[[39]](#_39_Guan_Yu_Tie_Lu_Zheng_Duan__J)

## 翻譯的影響

留學日本所產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總結說：“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于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40]](#_40_Yin_Zi_Shi_Teng_Hui_Xiu___Zh)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學的愿望所推動。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辟專欄。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最早被翻譯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東亞史。到1900年，一批中國留日學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和出版組織。在幾年內，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日文書籍進行翻譯。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科學著作的中譯本。對日本現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致翻譯許多日本的近代史，在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量多得驚人。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興趣從純科技轉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時候。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隨著20世紀的來臨，“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面，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新的著重點對以后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著重大影響。自1902—1904年，幾乎一半翻譯書籍與歷史和制度有關。對制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在1880—1940年期間，約有2204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歷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面，1850—1889年，從日文翻譯的作品只占總翻譯作品的15.1%，1912—1940年，占18.2%，但1902—1904年卻達到了60.2%。[[41]](#_41_Qian_Cun_Xun____Cong_Fan_Yi)很可能那個10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匯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像《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梁啟超翻譯）中十分明顯，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面。根據近來作的一次統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匯來源于日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內容，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日本的現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19世紀60年代在上海采購印刷機的時期。半個世紀以后，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發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于刊物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42]](#_42_Guan_Yu_Chuan_Ru_Ci_Hui_De_T)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跡。

##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除了知識和教育方面的影響外，日本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之間還有個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觸。對這種接觸，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所傾注的注意要比中國對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憶錄和原始材料的出版，這種接觸的范圍也更明晰了。[[43]](#_43_Zhan_Sen____Ri_Ben_Ren_He_Su)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許多理由要保持對中國政局的直接關心。中日甲午戰爭以后，滿洲政府垮臺的危險和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是日本論述民族安全和國際政治著作屢見不鮮的題旨，而加劇的國際競爭和對抗給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們提出了結盟和選擇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他們還必須抓緊時機去影響中國事態的發展。他們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是通過對合法政府提供指導和援助來做到這點。通過派軍事使團和訂教育計劃向中國提供援助，日本無可辯駁地證明在實現現代化的競賽中已經超過了中國，并且使人們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領導亞洲的復興。另一方面，日本在趕超西方和與西方聯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許多日本人認為，繼續遵循福澤提出的與亞洲分道揚鑣的意見是符合他們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這種關心至少在整個日俄戰爭時期一直保持著，當時之所以不讓中國人卷入，是因為怕西方從白種和黃種的種族角度來看待那場斗爭。從此以后，日本完全與帝國主義政策纏在一起，這就使得以亞洲人姿態出現的那種趕超西方的緊迫感和吸引力進一步衰退了。

但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意見，即東方與西方（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最后對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時期的最后十年，這種論斷是很流行的，當時西方許多論述種族斗爭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紹給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這種看法，即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證明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么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代替滿洲政權。

這種成為明治時期特點的種族之爭的悲觀觀點以及畏懼西方統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種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盡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戰術策略多種多樣，但根深蒂固的血緣感和對亞洲事務的責任感——表現為“同文同種”——卻很少被人否認。1895年日本解決了獨立和與列強平起平坐的主要問題，從此，它就有可能面對亞洲的問題了。這一步對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領導層的結構。在20世紀開始時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總的來說對走與西方聯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這條路對他們來說走得很順利。其中有些人（特別是山縣有朋）非常關心未來的種族沖突，但是執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們注重西方的海軍和工廠這個方面，并且使他們投身于這方面的事業。山縣的觀點與以他為首的軍事專家們的觀點一致。軍事領袖們特別意識到中國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負擔起在朝鮮、遼東和“南滿”爭奪大陸地盤的責任，從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彌補其鄰國的弱點。對中國北部邊境以及那里的俄軍的關心促使他們渴望訓練中國的新軍。像福島安正等個別軍官個人大膽地偵察了偏僻的中亞內陸，因而成了浪漫主義的和傳奇式的人物。[[44]](#_44_Hei_Long_Hui_De_Zheng_Shi__J)

與這些擁有實權的上層人物相反，也有人對與西方的關系表示憂慮，厭倦于本國在國際秩序中明顯地處于二等國的地位，他們是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的旗幟鮮明的鼓吹者。這些日本人既無執政重任，也不指導國務，因而能夠指責本國的謹小慎微和外交活動。這些人以消息靈通的民族意識衛士自居，是繼其前人負喚醒民族之責的重要人物，他們主張擁護天皇，捍護國家和文化民族主義。這一類集團包括了19世紀80年代黨派形成時期的民族主義組織，如1881年頭山滿的玄洋社和1901年內田良平的黑龍會。作為自封的民族主義和道德論的提倡者，這些民族主義領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戶豪門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國家的新正統理論，對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們的隊伍中涌現出了一批朝鮮、中國和滿洲方面的活動家，以及在國內政治中進行恫嚇和宣傳的代理人。

與這些組織有關但見解不盡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們相信日本的經濟前途在于發展對華貿易關系。只有在亞洲，日本才能指望應付西方的挑戰，因為它擁有地理近便、情況熟悉等有利條件。進入19世紀90年代后的一段時期，在一個堅決要與西方站在一起的社會中，這類情緒仍只為少數人所有，但這個事實卻助長了熱情和道德優越感，使這些亞洲主義者能借以號召同胞們完成自己應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陸軍參謀工作中嶄露頭角后于1886年去漢口。他名義上設立一個商號，分派他的下屬到各地區做調查，從中搜集中國全國各地的情報。雖然他的指導思想是要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日本霸權，但當它施行于中國時，他堅決認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賴其鄰國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須改造和加強清帝國。[[45]](#_45_Jing_Shang_Ya_Er_De___Ju_Ren)

民族主義運動和亞洲主義運動與以近衛篤麿（1863—1904年）為代表的最高層人士結合起來了。由于他受到社會的普遍愛戴，由于他的國際經驗、早期在德國受的教育以及貴族院的領袖身份，近衛擁有發言和行動的至高地位。他以贊助和加強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為己任。他主持、資助和領導了在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通過設在中國的教育機構和設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對作為它主要任務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它創辦于1898年，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義”的那一年。從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以及從日本公眾對中國虛弱的厭棄中，近衛感到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有人主張放棄中國和參加西方進行帝國主義的爭奪。在1898年1月《太陽》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號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聯合。他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其他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只有到那時，他們才能夠采取適當的政策以應付兩國面臨的危險。[[46]](#_46_Zai___Zhong_Guo____Di_21Qi)就像近衛的活動與1898年政府的活動相一致那樣，他的活動在1901年又與民族主義的活動合流了。1901年是黑龍會（它力圖使日本在黑龍江站穩腳跟）和近衛的國民對俄同志會成立的時間。

不屬于權勢圈子但仍處于執政上層集團邊緣的勢力，是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聯系的明治時期的自由派人士。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在日本進行爭取政治自由主義的斗爭與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自由主義者的斗爭休戚相關。他們大部分人雖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立憲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沖擊這一點上仍是熱誠的“亞洲主義者”。早期的自由黨作者和社論撰稿人都敏銳地了解朝鮮的狀況，并且要像在日本那樣也在朝鮮提倡自由主義。大井憲太郎在1885年為了自由的目的對朝鮮發動了一場異想天開的對外擴張的遠征，在同一時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締的東洋社會黨的創辦人樽井藤吉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合邦論》，號召日本和朝鮮合并成一個稱為“大東”的國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都認為種族戰爭正在迅速降臨，再也不能采取不徹底的措施了。必須建立亞洲的團結。這些計劃既包括狹隘的地區觀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義和信仰；它們既吸引著最壞的明治時期本國至上論者和沙文主義者，也對最優秀的明治時期普遍拯救論者有號召力。同樣，像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論家堅持把中國的維新和日本的維新結合起來，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經組織了興亞會。甚至隨著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從而使爭取議會自由運動的主流更加靠攏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進派，即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利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烈興趣去維護其先驅者的亞洲意識，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47]](#_47_Dui_Mou_Xie_Zhe_Lei_Shi_Qing)

日本的自由主義左派提供了他們私人與中國革命派合作的鮮明例子。宮崎滔天被孫中山稱頌為“今之俠客也。識見高遠，抱負不凡。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宮崎及其幾個弟兄從早期自由主義運動中脫穎而出，他們試驗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喬治的單一稅解決法，并且獻身于中國的革命事業。[[48]](#_48_Gen_Ju_Sun_Zhong_Shan_Wan_Go)

由于這些關于危機、信仰和覺悟的論旨在明治時期的環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能與上面簡單介紹過的許多集團有著多方面的融洽關系，就不足為奇了。許多重要事件的關系純粹出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黨運動的兩個領導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執政時正值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造成的危機觸發了戊戌變法之際。宮崎滔天的終生事業的開始、孫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見、北京的百日維新、大隈和板垣的憲政黨內閣的產生、同文會的成立、中國維新派的逃亡日本、學生運動的發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來了。

上面已經指出，在政治避難中自然地成為上層人物的中國維新派受到了高級日本人士的照顧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層人士提供了幫助，使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日本。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會的領袖近衛親王穿針引線，而且他暗中參與了此事的全過程。康有為會見了日本領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與近衛本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中近衛把明治中興的長期準備與百日維新表面上的倉促進行作了對比。近衛強調了他一貫的主張，即關心中日兩國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為必須實行亞洲門羅主義。但是近衛集團感覺到，康有為名聲太大，不宜長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衛籌集了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供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梁啟超也與近衛及其他地位顯赫的日本人會過面。1899年近衛親自來中國。他在中國幾次與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進行長談。張之洞就日本讓康、梁避難以及梁的著作對中國的留日學生可能產生害處之事表示抗議。近衛不同意這個抗議，也不同意把維新派說得那么重要，他寧愿把話題扯到他愛談的中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事務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衛還在香港會見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經費的宮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華南的政治形勢。[[49]](#_49_Cong_Jin_Wei_Ri_Ji_Dui_Yi_Xi)

像宮崎和平山那樣活躍的自由派，在中國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國的維新派或日本的貴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宮崎大力促使康有為和孫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為的懷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當局逮捕，而近衛在他日記中提到此事時，罵他的同胞[宮崎]為“陰謀者”。發展與學生運動的關系也需要時間。在早期，當留學生仍被謹慎地資助并且偏重于學術活動時，孫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支持還比較少。但后來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人員的日趨復雜以及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強，革命的情緒蔓延滋長起來了。同時日本的民族情緒因為事實上正掉頭去反對俄國，所以對上述情況并沒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結果中國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國留學生中間找到了為他們的活動作了較好準備的場所。

孫中山在1895年廣州第一次起義的嘗試失敗后，已經逃到了日本。他在橫濱剪掉了辮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來回憶說：“中日戰爭后，日本人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后，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他從日本前往倫敦，在那里，中國公使館對他的扣留和幾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閱讀的《倫敦被難記》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這時他結識了宮崎和平山。他們原先應犬養毅的要求去中國調查政治，在那里從孫中山的朋友處聽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孫中山很快對他的新朋友產生了吸引力。雖然他們聽命于犬養，并且確實把孫中山介紹給他，但他們卻忠于孫中山，忠于與孫共同持有的振興亞洲的觀點。

他們的第一項合作事業就是通過購買和運輸武器以及小股冒險者去援助阿基納爾多的菲律賓革命的計劃。像那艘陳舊不堪的船只因超重運輸槍炮而沉沒那樣，這次行動也失敗了，使幾個日本冒險者喪了命。在第二個行動中，日本人試圖在“百日維新”的災難性失敗以后使中國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合起來，但也毫無成果。雖然革命派和維新派同樣依靠日本人的庇護，而且接觸同一批日本人（宮崎曾與康有為在香港會晤過，平山曾陪同梁啟超到橫濱），但中國的維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不如自己。早期得到犬養和近衛幫助成立的學校，很快就處于維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間，日本人中間的自由派冒險家卻傾向于活躍的革命派，而不傾向于維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未遂的起義名義上都得到這兩派中國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進行變革的中國人中間就長期出現了分裂。[[50]](#_50_Guan_Yu_Zao_Qi_Ge_Ming_Yun_D)

1900年夏末，孫中山試圖在廣東省策動一次革命，發動時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起義的基地是當時已被日本人占領的臺灣島。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一種期望，即日本將利用華北義和團之亂而進入華南。廈門事實上一度被日軍所占領，這是為了對付一場策劃好的反日“挑釁”。孫中山計劃成立一個有幾名日本人擔任要職的臨時政府。他的一個伙伴搜羅了廣東省的秘密會社成員，開始領他們前往廈門，以迎接預期來自日本的人員和武器供應。在開始的幾次戰斗中，造反者所向無敵。但到起義開始兩個星期后，當孫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會來到時，就傳話放棄這一嘗試。帶著最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軍手中并且被殺害。孫中山在為山田良政建碑的紀念詞中寫道：“君不以政府忻厭為意，銜命冒險，雖死不辱，以殉其主義，斯其難能可貴者。”[[51]](#_51_Zhan_Sen____Ri_Ben_Ren_He_Su)

1900年的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試圖以來自印度支那和美國的支持來進行革命，但都沒有成功（法國總督曾經邀請他在1903年前去訪問印度支那；在美國，他曾試圖支配三合會的領袖）。這些失敗，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過去為他提供大部分追隨者的華南秘密會社的成員無紀律和不可靠而產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應從中國的留日學生（特別是從軍事學校的留學生）中吸收人員。當孫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國逗留期間，學生運動明顯地發展了。日本反俄情緒的高漲也很重要。黑龍會會員們看到他們的民族主義順應著亞洲出現的機會，并且認為隨著清朝的垮臺，中國人對滿洲的統治就將失去理論根據。因此，在黑龍會的正史中寫道：“日本人在援助華南革命的行動中，同時發揚了愛國心和俠義精神。”[[52]](#_52_Yin_Zi_Zhan_Sen___Ri_Ben_Ren)在此期間，原在1903年因抗俄組成的學生義勇隊又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黃興回湖南企圖發動一次起義。他開始時擔任一所日語學校的教員，但同時還印刷和分發陳天華的革命小冊子。實際上，在他創辦的早期革命組織華興會中活動的每一個成員，都已經是或者即將成為留日的學生。但是在這個組織策動一次計劃在1904年爆發的起義之前，清當局襲擊了黃興的住所和他的日語學校，主要人物勉強沿著危險而困難的路線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經幫助過孫中山的這幾個日本人立刻與他接觸。他與孫中山一樣，接受了“同文同種”的論點，并且與宋教仁一起，也成為日本人鼓勵和援助的對象。[[53]](#_53_Bu_Guo_Song_Jiao_Ren_Cong_La)

孫中山回東京時正是1905年夏末學潮高漲之時。他的革命綱領和口號已被制定出來。這時所缺乏的就是一個新的組織，但經過他和日本朋友給他介紹的黃興的共同合作，這種組織出現了。經過一系列籌備會議以后，1905年7月30日在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家中組成同盟會。約有70人出席，實際上全是中國留學生，他們代表了18個省中的17個省。正式的成立大會定在8月20日舉行，這次是在坂本金彌家中舉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長知——是正式會員，宮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權，以便作為該會的日本代表談判武器給養。同盟會在留學生原在東京成立的各省同鄉會的基礎上組成；它另外還有傳統秘密會社的宣誓儀式和秘密活動的特點，這些都是以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西方學習時擬訂出來的）和五個口號（其中之一是號召中日友好）的名義進行的。這樣，同盟會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通過留學日本以尋求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具體成果。

關于同盟會宣傳的思想內容及其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的政治斗爭，另有論述（見第九章）。同盟會的領袖有時面臨一種艱巨的任務，即要對付某些革命派，因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輿論中的溫和路線。胡漢民在《民報》撰文，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隱隱流露出來的恩賜觀點和傲慢態度以及日本政府更為明顯的冷遇進行解釋和辯護。[[54]](#_54_Dao_Tian_Qian_Ci_Zai_Ta_De)在1907年以后，當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亞洲各國邊界線的協定中選擇正式與帝國主義合作，并要求孫中山離開日本時，甚至這些解釋也不夠了。孫中山的離日，像康有為八年前一樣，也得到外務省秘密資金的安撫，這樣就可以防止公開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義友人的憤怒；但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們的東京根據地，從而使同盟會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靠近中國的其他地方。孫中山離開后，留學生因同盟會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識而產生的離心傾向，削弱了它的團結和力量。但是隨著中國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義和不滿情緒的不斷增長而出現的更重要的傾向，卻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最后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好處，雖然這些傾向并不直接給革命增光。

隨著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響衰退了。宮崎和萱野等革命黨的代理人卻成了政府監視和懷疑的目標。他們的秘密訪問日本的中國友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漸變成了一個特別危險的帝國主義強國的形象，而它鄰近中國和容易到達中國的有利條件也更加令人擔心。辛亥革命爆發時，人們發現孫中山從美國啟程，不是回中國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國，這是因為他希望遏制可能發生的日本干涉；而東京政府本身也對事態的發展一點沒有把握，所以它疏遠了幾乎所有可能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候選人。在滿洲，受日本軍隊支持的冒險家們最早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親日緩沖國。在其他地方，孫中山的（ 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動，但卻不能提供或保證提供其同胞們的支援。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設法每天向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打電報，報告混亂的政治局勢。他后來退隱著書立說，頗有創見地解釋了日本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社會為什么不能在重要的良機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為什么不能與一個為誕生而奮斗的中華共和國建立信任關系。包括宮崎和萱野在內的其他人士與孫中山的關系如此密切，以致他們在革命政府失敗后也與孫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孫中山在短暫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時他表明比過去更愿意作出關于日本在滿洲享有利益的諾言。[[55]](#_55_Zhan_Sen____Ri_Ben_Ren_He_Su)

日本人還在近代中國更長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著作用。當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年；1908—1911年）強調高壓的帝國主義政策和西園寺（1906—1908年；1911—1912年）執政下的較溫和的路線之間進行更替時，社會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找機會在演說和出版物中表達他們對議會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見。宮崎滔天的弟兄宮崎民藏是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的堅定擁護者，并在革命刊物《民報》中發表了兩篇文章。沒有理由可以懷疑這類觀點和人事往來對孫中山土地問題觀點產生的影響。[[56]](#_56_Bo_Na_Er____1906__1907Nian_W)

在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可以找到更為直接的影響。早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關于俄國虛無主義的著作。日本的激進派后來認為他們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東洋社會黨之事即與這些著作有關。1902年以后，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在日本不斷發展。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了一本關于俄國革命運動的有影響的著作，它著重談了三個階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學、宣傳鼓動和暗殺恐怖活動。這本著作對中國革命派有影響。日俄戰爭進一步助長了日本人對俄國的興趣，像二葉亭四迷那樣受歡迎的小說家和成為戰爭化身的民間英雄廣瀨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過日譯文傳入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中的。就在這幾年，俄國革命派中的個別英雄人物開始成為非常適合中國留學生仿效的典范。這十年中在個別愛國的自殺行動中，在留學生以先驅者自任的意識中，在他們對其政府的暴政的厭惡情緒中表現出來的激情，似乎都與俄國的事例有關。

經過1905年的短暫革命后，一批俄國的避難者和革命派前往長崎。啟程前往安南的孫中山通過黑龍會和萱野的介紹會見了他們。宮崎\_萱野集團和這些俄國人一起辦了名為《革命評論》的雜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進程。雖然這個雜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締，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涌現的氣氛中產生的。《光》、《平民新聞》、《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從它們的名稱中看出社會批判的潮流。當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轉奉無政府主義時，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發生的重大轉折的情況。有一個時期，《民報》和《革命評論》互相借鑒，互相標榜。《民報》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張繼等人的手中，他們甚至在孫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這些人根本不親日（章炳麟對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負確實有強烈的批判傾向），也不親西方。但他們與日本的處境相同的人一樣，也處在激進知識分子的大潮流中。他們譴責西方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們道德上的責難和審判雖然是以無政府的激進主義表達出來的，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他們自身傳統中反對資產階級物質主義的哲學思潮。

關于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響這個大問題，不屬于本章討論的范圍。[[57]](#_57_Bo_Na_Er_De___Wu_Zheng_Fu_Zh)中國人在借鑒思想意識方面，越來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從日文譯成的中譯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難以確定的。但是兩國的激進思潮顯然不能孤立起來加以考慮。對留日的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的激進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記明確地指出，對一個有影響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聽到像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的講話是多么重要。日本人的激進主義在東京的華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58]](#_58_Guan_Yu_Hui_Wu_He_Jie_Chu__J)

日本的影響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它補充和強化了中國人經歷的更大的變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劃第一次革命時也不是決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瑪麗的說法：“他們創造了一個傳統，而不是一次革命。”[[59]](#_59___Ge_Ming_Zhong_De_Zhong_Guo)要衡量中國領袖人物個人在與日本人交往時所受的影響是困難的。但在交往中卻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歷。“中國浪人”（人們對宮崎及其友人的稱呼）在他們的一生中就被認為是這種日本人。對他們來說，建設一個新東亞的斗爭是一項超越個人或超越民族界線的事業。但是在中日兩國，國際主義的經驗都證明是難以容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60]](#_60_Huang_Xing_Zai_Dong_Jing_De)

（楊品泉 譯）

[[1]](#_1_5)關于德川齊昭，見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載《水戶藩史料》，別集條，98。關于水野忠邦，見日本史籍協會編《川路圣謨文書》8（1934年），第318—319頁。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東方道德，西方科學”的佐久間象山》，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論文集》Ⅰ，日本1972年版，第54頁。關于中國戰敗的第一個報道是在1840年通過一艘荷蘭船只傳到長崎的。

[[2]](#_2_5)關于《海國圖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響，見王家儉《 〈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349頁。各種譯文紛紛出現于1854年，并且持續到明治時代初期。關于《海國圖志》對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編者，即有聲望的儒家學者鹽谷宕陰（1810—1867）的影響，見范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第4期（1939年）第478—545頁。佐久間象山對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關于槍炮的論點。他指出：魏源在這方面“大部分是不正確的和站不住腳的。那好像兒童游戲。不親自進行研究，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問題的真髓。像魏源那樣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幸”。引自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編《日本傳統的源泉》，第614頁。

[[3]](#_3_5)關于日本取得有關太平軍成就的情報的過程和結果，見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

[[4]](#_4_5)《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81—486頁。這里詳細敘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來源。

[[5]](#_5_5)因此，撰寫井上馨傳記的作者指出：“當他到達上海，從輪船甲板上看到約一百艘戰艦、輪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時，便大吃一驚。侯爵這時才開始認識發展海軍以便實行排外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看清佐久間象山教導的全部意義和單純排外主義思想的不足。”見井上馨侯爵傳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傳》第1冊，第90—91頁。

[[6]](#_6_5)M.B.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

[[7]](#_7_5)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74頁。

[[8]](#_8_5)東北大學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這次談話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謝。日文版本見木村匡《森有禮先生傳》，第102頁。這次交談還見于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第64—65頁。

[[9]](#_9_5)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19—120頁。1895年的談話記錄為英文。見鹿島守之助（音）《1894—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頁。

[[10]](#_10_5)列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25頁；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應》。下一個研究日本現代化的重要中國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年）的《日本論》，此書發表于1928年。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譯文載于《中國》第56—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_11_5)見蕭公權《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第24期（1965年），第 1—83頁；《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頁（關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見第184頁及第260—261頁的注）；《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193頁；《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蕭教授已把他的許多文章收進《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一書中。彭澤周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收集并補充了他自1970年以來發表的文章，成為最全面論述日本維新運動的集子。

[[12]](#_12_5)這方面的權威著作有實藤惠秀的《明治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特別應重視《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學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關的論述取材于第140頁和第110—111頁。

[[13]](#_13_5)費正清等編：《東亞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頁。

[[14]](#_14_5)根據《張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勸學篇·游學二》，應為：“一去華近，易考察。”——譯者

[[15]](#_15_5)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1頁。

[[16]](#_16_5)同上書，第45頁的摘錄。

[[17]](#_17_5)數字根據上引著作第545頁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計1909—1912年和1915年學生數的根據。各學校畢業生的按校統計（上引著作第138—140頁）顯示學生畢業的學校從帝國大學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學校。關于1901—1939年的數字，實藤列出中國畢業生總人數為11966人。

[[18]](#_18_5)關于學校、專業和日期的情況，見同上著作，第64—79頁。

[[19]](#_19_5)實藤準備了一套中國人寫的日記目錄。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記；有一名官方視察員李宗棠記錄了這個時期九次去日的見聞（見同上著作，第313、425頁）。1906年以后，中國政府出版指導性的月報供在日本留學之用。還有不少小說，其中最出名的為《留東外史》。實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一書中對它進行了研究，此書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由張銘三翻譯。

[[20]](#_20_5)見孫伯醇（1891一）的回憶。孫伯醇于1905—1914年在東京學習，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國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回到東京，在外國語大學和東京都大學當講師。見他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第30期（1966年5月），第24—33頁。特別可看他的《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第31期（1966年6月），第28—33頁。

[[21]](#_21_5)景梅九然后回顧了漢代的一些風俗，那時中國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讀者這些風俗以及過分的禮貌準則仍在日本流行。見《留學回顧》。此書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譯文，由大高巖和波多野太郎翻譯。

[[22]](#_22_5)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92—195頁）轉載了這種《留學生自治要訓》的傳單，并且指出，當時的中國小說有時把歸國留學生描寫為文靜而有禮貌的人。

[[23]](#_23_5)鄭冼秀蘭（音）：《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第116—117頁。注意K.S.劉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第40、59頁敘述的地方關系。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5頁提到學生會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國出口日本書籍的機構。

[[24]](#_24_5)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第35頁。巖波書店重印了1901年的這部名著。

[[25]](#_25_5)《傷心人語》，這是夢蕓生寫的一部論戰性小說，在1906年出版。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13頁。

[[26]](#_26_5)景梅九：《罪案》，第34頁。

[[27]](#_27_5)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寫的文章中說，“日本人稱中國為 ‘支那’。本來支那并非惡意，有人說本是 ‘秦’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太還要下作。”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24頁引了這段話。實藤作了長篇討論，并對使用此詞表示歉意。竹內好在《中國》第16期（1965年3月，第34—36頁）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詞。1930年國民黨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28]](#_28_5)關于用注音符號拼成“Sokoman”音的年輕人的日記，見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第277—336頁。關于乃木，見第317頁。

[[29]](#_29_5)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2—513頁。

[[30]](#_30_5)關于1907年協議，見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06—107頁。關于在華的日本教師情況，見第96頁。到清代后期，在華的日本教師約600名，甚至在來華熱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年，中國學校邀請的356名外籍教師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費用問題。

[[31]](#_31_5)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24—460頁。

[[32]](#_32_5)同上書，第68—71頁。

[[33]](#_33_5)關于英國人看到的危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部把“七條要求”秘密透露給英國代表的情況，見倫森編：《1895—1904年處于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第213—217頁。

[[34]](#_34_5)關于詳細的分析，見永并算己《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頁。

[[35]](#_35_5)鄒容：《革命軍》。約翰·勒斯特介紹和翻譯此書，并加注釋，見英譯本第152和84頁。

[[36]](#_36_5)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4頁。此書包括陳天華的政治小說《獅子吼》的日譯文，見第81—121頁。島田還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書中刊載了《警世鐘》的譯文，見第83—144頁。又見歐內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頁。關于陳天華，又見《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1—79頁。

[[37]](#_37_5)引自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61—511頁也詳細敘述了這場斗爭的經過。

[[38]](#_38_4)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92頁。

[[39]](#_39_4)關于鐵路爭端，見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眾》，載《信州大學紀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頁。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鐵路的英國借款的文章，抵制運動從東京的江浙學生集會上開始。關于借款談判，見孫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第61—68頁。

[[40]](#_40_4)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45頁。

[[41]](#_41_4)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頁。

[[42]](#_42_4)關于傳入詞匯的統計數，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作者認為1905年是留學生翻譯作品采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于《中國》第24期（1965年），第5—16頁。

[[43]](#_43_4)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及《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

[[44]](#_44_4)黑龍會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編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在最后全面地歌頌了這些東亞先驅者生平的光榮作用。

[[45]](#_45_4)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傳記。又見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帝國和中國》，載古德曼編《對日本帝國和亞洲的再估計》，第35頁。

[[46]](#_46_4)在《中國》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頁中，可以看到關于東亞同文會和東亞同文書院的歷史和貢獻的權威性簡明概述。

[[47]](#_47_4)對某些這類事情的討論，見詹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第163—189頁。關于宮崎的全集，見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編的《宮崎滔天全集》。

[[48]](#_48_4)根據孫中山萬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所寫的序言。

[[49]](#_49_4)從近衛日記對一系列事件的敘述中，可以研究他與其他人的正式關系和非正式關系的脈絡。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劃康有為來日，1898年11月12日與他會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資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與張之洞會面。見《近衛篤麿日記》第2卷。

[[50]](#_50_4)關于早期革命運動及其興衰，見薛君度《孫中山、楊衢云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頁。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產的合作》，載《中國論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頁。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51]](#_51_4)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82—104頁。惠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宮崎寫了《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

[[52]](#_52_4)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1頁。關于孫中山與留學生的來往以及他與秘密會社的關系，見鄭冼秀蘭的《同盟會》，第36頁。又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300頁以下。

[[53]](#_53_4)不過宋教仁從來沒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論點。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載《中國論文集》第21期（1968年），第 189頁。關于黃興，最詳盡的材料為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對宋教仁最充分的論述是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

[[54]](#_54_4)島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頁）中討論了大隈的幾次演說。大隈在鼓吹中國必須采納日本意見這一點上采取了十分強硬的路線；胡漢民在《民報》試圖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55]](#_55_4)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喬治·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第45—53頁。關于北一輝從中國拍的電報，見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

[[56]](#_56_4)伯納爾：《1906—1907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116頁。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頁。

[[57]](#_57_4)伯納爾的《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又見石母田正《幸德秋水與中國》，載竹內好編《亞細亞主義》第9卷：《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頁。關于俄國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見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

[[58]](#_58_4)關于會晤和接觸，見竹內善作的回憶《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頁。但還可見斯卡拉皮諾和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對抗》，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頁。其中所選的例子和論點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59]](#_59_4)《革命中的中國》導言，第45頁。

[[60]](#_60_4)黃興在東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學生組織新人會的總部，宮崎滔天的兒子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見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第59頁。

#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 光緒皇帝的改革詔書

1900年8月14日聯軍占領北京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撤離京師，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奉命上書言事，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財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1901年1月29日，經太后指示，皇帝發布上諭，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統治方法則應順應時勢加以改革。在這道上諭中，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_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____J)

上諭還宣稱，中國向外國學的只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級官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情，考慮“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向上奏報。因此，許多高級官員呈上關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見。1901年4月，政府創立政務處，著手審查這些建議，選出那些可以照辦的建議。[[2]](#_2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____J)此后，政務處就成為政府改革規劃的指揮部。

## 教育改革

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從西方采納某些東西。為此，某些政府官員必須通曉西方文化。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學士研究西學。它把留學生召回本國，授予官職，還為由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推薦的那些人開了一次經濟特科考試。[[3]](#_3_Shu_Xin_Cheng_Bian_De___Jin_D)

在實行這一權宜措施的同時，政府企圖在選擇官員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自7世紀以來，中國歷代統治者就已規定了文字考試，人們通過這種考試就有資格成為高級文職官員。科舉曾經是一種優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時間的實踐中逐步趨于完善。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義。它的大部分試題要求人們在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然后加以釋義和說明。在明清時代，每一部儒家經典都有官方的注釋，它們是科舉用的欽定版本。結果，應考人得努力把各經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釋都死記硬背下來。科舉考試就僅僅成了記誦之學與書寫能力的考試，它要求的不是邏輯性強和論點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著駢偶和典故的華麗辭藻的文章。此外，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段，寫成所謂的“八股”體。甚至字跡也必須是“小楷”。

有清一代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說中國所有的學生學習都是為了科舉考試，絕非言過其實。無懌乎在正統教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呆板、因襲和沒有創造性思想才能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希望得到一個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人呢？

顯然，修改考試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1901年，清政府開始廢除八股文章。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以及論述中國歷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試中開始實行。

其次，政府認識到需要一種西式公立學校制度，決定把書院改建為西式學堂。自甲午戰爭以來，張之洞和盛宣懷就提倡過這種學堂，而且他們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這種學堂。然而，幾乎不可能使學生入學，因為教育的最強烈的動機仍然是在政府中做官。因此，為了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政府同意給予學堂畢業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4]](#_4_Can_Kan_Fu_Wu_Kang___Zhong_Gu)

清政府也鼓勵學生去國外學習，因為將要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學堂中缺乏合格的師資。從國外延請教師花費太大；此外，即使花費大量錢財，也難于得到好的外國教師；因此，較快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學生出國。特別是鼓勵到日本去留學。與去西方相比較，去日本的旅費和生活費都便宜得多，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文字，習俗又相近（見第六章）。另外，人們認為西方文化幾乎已原樣傳入日本，因此就沒有多大必要費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見，教育改革是從改革科舉、創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的。沿著這個方向，新學堂越辦越多，但是它們的課程和學習年限差別很大。政府認為有統一標準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為模式的學堂行政管理規章。在這種制度下，學堂正規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為7—12虛歲的學生開辦初等小學堂，為12—16虛歲的學生開辦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則為16—21虛歲的學生開設。高等學堂收21—24虛歲的學生。分科大學則收24—28虛歲的學生，最高一級則為通儒院。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這就使新式學堂的畢業生有了正規官員候補者的資格。[[5]](#_5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____J)

政府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后，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學部，作為中央的教育行政機構。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的傳統教育事項。可是在甲午戰爭之后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就沒有授權禮部管理。1898年京師大學堂已經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但是這所京師大學堂實際上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由于新式學堂的數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的作用。因此，京師大學堂這時就被定為最高學府，另設學部來管理學堂。[[6]](#_6_Jian_Yu_Chang_Lin_De_Xu_Shu)

1904年當政府建立這種學堂制度時，它企圖在1906年以后逐漸減少舊式科舉考試功名獲得者的人數，并在全國各地建立起足夠數量的新式學堂之后最后廢除科舉考試。然而日俄戰爭的結果加速了這個進程，因為日本的勝利被看作是立憲政體戰勝專制政體的事例。很多中國人認為，對中國來說，立憲幾乎是勢在必行的。但是為了成立一個立憲政府，百姓就必須獨立思考和判斷。因此，傳統教育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確實可以說是很有害的。在日俄戰爭期間，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廢除科舉。1905年9月，在日本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政府決定在下一年廢除科舉。[[7]](#_7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____J)

當這一持續了約有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完全被廢除時，它確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代替了傳統的有功名的人。同時決定在國外高等學校水平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也有資格取得進士或舉人的功名，但這部分地要按照他們回國時考試的成績來決定。[[8]](#_8_Can_Kan_Wang_Yi_Ju___Zhong_Gu)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據學部的統計，在1904年學堂總數為4222所，學生總數為92169人；在1909年學堂為52348所，學生為1 560 270人。[[9]](#_9___Di_San_Ci_Jiao_Yu_Tong_Ji_T)這些數字表明學校教育有驚人的發展。然而隨著這種發展，教育的內容是否有任何實際變化，這還是有疑問的。

首先，由于難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師，在大多數新式學堂里不可避免地仍然按舊課程教課。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堂的教師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傳統功名的人，他們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這就說明為新式學堂獲得新教師是多么困難了。

其次，幾乎所有私立學堂都由紳士—文人所辦，而且大部分公立學堂也是由他們發起而開辦的。然而紳士階級基本上反對政府廢科舉、建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的政策。他們有許多理由來反對。紳士們在地方上享有種種特權，這并非因為他們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曾經科舉及第。廢除科舉就意味著他們的特權要消失。此外，由于他們的子弟通常準備參加這種考試，所以科舉的廢除將會毀壞所有紳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著享有的那些特權。因此，紳士—文人作為一個階級，是始終反對廢除科舉的。但清政府終于還是公布了廢除科舉的法令，此后紳士們機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辦學堂以保存他們特權的新出路，因為學堂也能授予畢業生進士、舉人和生員的學銜。紳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學，希望以此保持他們的特權；因此他們非常熱衷于開辦學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錢來辦。

再次，新制度中盡可能地保留了舊東西。例如，由皇帝從高級官員中任命最后考試的總監，讓他與學部大臣或督撫一起主持考試。然后對考試合格者授予功名。顯然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無二致。“學堂”與科舉考試僅僅一詞之異而已。

儒學仍然被認為是學業的基本內容，即使在新式學堂中也不得忽視。[[10]](#_10_Guan_Yu_Ci_Shi_Qi_De_Xin_Shi)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學堂要舉行一次祭孔儀式，而且很多學時花在閱讀和講授經典著作上。以初等小學堂為例，在每周三十個學時當中，有12個學時是朗讀和講解儒家經典。一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和《孝經》40個字；二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大學》和《中庸》60個字；三年級學生每天讀《孟子》100個字；四年級學生讀《孟子》和《禮記》100個字；五年級學生讀《禮記》100個字。除所有這些規定之外，還有兩個學時的修養課，它是一種儒家的教育方法。顯然儒家學說是被強調的；甚至學習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學堂的禮堂和課室中都貼有雍正皇帝的《圣諭廣訓》，每月初一由大家齊聲朗誦，而且被用作教官話的課文。這些都說明了傳統的民眾教育或對鄉民的教導（即“鄉約”制）這時改由新式學堂來負責的情形；與此同時，還通過口語的標準化來試圖統一國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當局對于任何新鮮事物都是極端慎重的。例如在初等學堂不教外語，因為害怕孩子們在幼年學外語會忽視傳統的學業。此外，還認為不應使用外國術語，因為這樣就不可能保持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和堅持正當的學業。舉例來說，諸如“社會”、“影響”和“犧牲”這些術語不久前從日本傳入，但這些近代術語的意思與原來漢文的含義不同。另外，“團體”、“國魂”、“膨脹”、“舞臺”和“代表”這些術語此時已經流行，但它們被認為是不優美的，因為它們原來不是漢文的詞匯，而是日本人創造的。[[11]](#_11___Xue_Wu_Gang_Yao_____Zai)所以這類術語不該使用，免得使中國語言陷入混亂。

還強調在學習外國的政治和法律時宜看全文，而不是學習其細枝末節。政府解釋說：“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而中國今日之剽竊西學者，輒以民權自由等字實之。”“殊不知民權自由四字乃外國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詞。”“外國所謂民權者，與義務對待之名詞也。所謂自由者，與法律對待之名詞也。法律義務者，臣民當盡之職；權利自由者，臣民應享之福。不有法律義務，安得有權利自由？”[[12]](#_12_Tong_Shang_Shu__Di_12Ye)政府之所以對這些詞語特別加以闡明，是因為它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利。

婦女不許受新式教育，因為在中國，男女在公共場所是嚴格隔離的，決不允許他們一起上學堂，也不許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婦女閱讀太多的西方書籍，使她們誤入歧途而模仿外國的風習，那就會貽害不淺；如果竟然發生這類情況，她們就會開始鬧婚姻自由而無視父母和丈夫的權威了。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還是得到了承認，于是制定了關于女子師范學堂和女子小學的章程。[[13]](#_13_Can_Kan_Li_You_Ning___Zhang)即使如此，婦女受教育的目的也只限于培養賢妻良母和一些教師而已。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舊被否定。結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兒童也要分校就讀，而且婦女不得參加政治集會。

在初等小學堂、中學堂和高等學堂中都有軍事訓練課。在高等學堂中，增加了三學時的軍事學，講授不同國家的軍事制度、軍事史和戰略。與政治學和法律一樣，軍事學也只有官辦學堂才有。這些課程私立學堂是不準開設的，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么懷疑人民辦事的動機。

從以上各點看來，人們會懷疑政府辦新式教育的態度會認真到什么程度。政府諸公可能并不認為官辦學堂教育實際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強采納了這種新制度，因為它不僅已由立憲派康、梁等人要求過，而且各省督撫也提出過這種要求。正像1904年皇帝批準的《奏定學堂章程》所說的那樣，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養“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的人。[[14]](#_14___Ge_Xue_Tang_Guan_Li_Zong_Z)這里不是不可能把“大清國”解釋為“中國”，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滿洲王朝。不妨考慮以下的事實：即法律、政治和軍事學在私立學堂被禁止講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稱的那樣是諄諄教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實，其中以“忠君”為最高美德。換言之，清政府開始辦學堂教育是很勉強的，是受外界壓力的結果，它的目的并非培養憲政時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國家臻于富強的人民，而是培養一種熱愛清王朝和始終忠于清帝的人。

事態的發展與清政府袞袞諸公的意圖恰恰相反，反滿運動在學生之間擴大了。1907年，政府禁止學生干政或集會，而且對此三令五申。結果國內學堂中的反滿運動一般說來是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學生中間卻發展了起來。在義和團事件之后清政府推行改革計劃時期，它極力鼓勵到日本留學，于是留日的中國學生逐年遞增無已。至1905和1906年，人數曾達到大約1萬人（參看第六章）。在日本比較自由的環境里，中國學生對清朝的批評要尖銳得多，而且加入立憲運動或革命運動的人數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戰爭之后尤其如此。面對這個問題，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監督到日本，1903年，發布章程禁止留學生議政，不準出版有關政治的報章雜志或者作任何會影響公共道德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協助管制中國學生。東京對此作出了反應，它在1905年發布了《關于招收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規定》。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了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憤慨。[[15]](#_15_Shi_Teng_Hui_Xiu____Zhong_Gu)

不久，中國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協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動。1906年2月，它擬定一項決議：凡派去日本留學的，只限于那些擅長中文并精通儒家經典的學生。12月，中國駐日公使被任命為留日中國學生總監督，使之可能進行更嚴密的監督。但是，無論清政府如何試圖加緊控制留日中國學生，其結果恰好與愿望相反。控制愈嚴，學生中的反滿情緒就愈強烈。最后，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團體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運動的核心。

## 軍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編腐化墮落的舊式軍隊和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正規軍隊由八旗和綠營組成，但是到了19世紀，尤其是綠營軍已無甚戰斗力了。結果，政府不得不臨時招募軍隊以對付起義和抗御外國；這種權宜措施現已成為正規的辦法了（參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本卷第四章）。在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后，有些新軍被遣散，但它們大部分被保存下來，最初被稱作“勇營”，后來被稱作“防營”（幾年來軍隊的名目層出不窮，甚至比軍隊本身增長得還要快）。然而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證明它們已腐敗無能，不再有戰斗力了。

1895年中國的戰敗，使清朝清醒地認識到非常需要訓練有素和具有西方裝備的軍隊。結果，繼李鴻章之后統率北洋軍隊的袁世凱在華北著手組織一支“新建陸軍”，張之洞也在長江地區組織了他的“自強軍”。兩支軍隊都是洋式的。義和團事件的經驗進一步表明需要這樣的軍隊。[[16]](#_16_Guan_Yu_Kai_Shi_Yu_1901Nian)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各該省兵制。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舊式武舉，而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它們的畢業生就被任命為新軍的軍官。同時在1901年，決定取消20%或30%的綠營和半正規的防勇。然而，除非建立有效的中央控制，否則就不可能建立一支擁有西式裝備和受過西式訓練的軍隊（這種軍隊稱作新軍）。不然的話，各省新軍只會加強各省督撫的力量而威脅中央政府。因此在1903年，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作為在全帝國招募和訓練新軍的中央機構。這樣做的目的，是企圖由中央控制各省已招募和訓練的新軍。1904年，政府決定改建整個兵制，并把新軍建成36鎮，歸練兵處控制。為了為新軍訓練軍官，政府決定派遣學生到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并建立一種軍事學堂的制度，它將從開辦初級軍事學堂開始，直到成立武備學堂為止。

新軍共36個鎮，每鎮有官兵12500人，總數將有45萬人，組成常備軍。除此之外，還組成了第一次征用的續備軍和第二次征用的后備軍。常備軍的服役期為三年，三年后其士兵遣散回籍，并再接受三年非經常性的訓練和少量津貼。這些士兵就成為續備軍。然后又成為后備軍，接著再服役四年，并接受更少的訓練和更少的津貼。后備軍服役期滿后，士兵將恢復平民身份，不再履行軍事方面的義務。[[17]](#_17_Can_Kan_Mai_Jin_Nong___Bei_Y)

征兵被看作理想的辦法，但暫時還是決定在自愿的基礎上征募士兵。同時，準許當兵的資格也被規定得比較嚴格。從前，任何志愿服役者，不問其經歷、家庭出身、職業或年齡，都可以當兵。而現在只有20歲到25歲、身體健康、在本省居住和有家的人，才有資格當兵。有鴉片煙癮的人和那些屢次觸犯刑律的人一概不準入伍。通過對36鎮新軍規定這些征兵標準，代表中央政府的練兵處力圖對新軍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當時的其他兵種仍歸兵部節制。因此，在1906年政府改組時，兵部與練兵處合并成為陸軍部，由它統率帝國的全部陸軍。

滿洲人鐵良被任命為陸軍部尚書，另兩位滿人被任命為左右侍郎。這樣，陸軍完全歸滿人統率。在這次改革之后不久，陸軍部立即合并了袁世凱手下的北洋軍四個鎮，只給他留下了兩個鎮（第二和第四鎮）。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軍隊是前所未有之舉。陸軍部這時統率了帝國最強的北洋軍六個鎮中的四個鎮，這也是劃時代的事件。[[18]](#_18_Can_Kan_Mai_Jin_Nong___Yuan)

清政府在這一成就的鼓舞下，推行了一種把全部軍隊控制在滿人手中的政策。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和直隸總督袁世凱被調到北京任軍機大臣。軍機大臣的職位當然要高于總督，但是他們的提升意味著他們不再能直接統兵。這兩個統率最強大的帝國軍隊的人，就這樣明升暗降地被剝奪了權力。[[19]](#_19_Can_Kan_Bei_Si___1895__1905N)最后，在1910年，北洋軍隊全部六個鎮都被置于陸軍部的直接統馭之下。

1908年光緒帝薨，年幼的宣統帝（溥儀）登極，而其父醇親王第二（載灃）成了攝政王和朝廷上最有權勢的人物。醇親王一就職就建立起一支新的宮廷衛隊禁衛軍，并委托他的兄弟載濤和另外兩個滿人毓朗和鐵良進行訓練。1909年，詔書宣布皇帝是海陸軍的最高統帥，由于皇帝尚在沖齡，醇親王就對軍隊行使最高統帥權。

在這同時，海軍也建立起來，還準備開始把軍事管理與軍事指揮分開。1910年建立了海軍處，1911年設立軍咨府（不屬陸軍部）。醇親王委派他的弟弟載勛任海軍處大臣；他的另一個弟弟載濤為軍咨使。這樣，醇親王就把帝國的全部軍事力量掌握在他自己和他的親兄弟之手。[[20]](#_20_Bao_Zun_Peng____Zhong_Guo_Ha)用這種方法，清朝先把軍事力量置于滿人手中，其后到宣統時期又置于皇室宗族之手。可是清朝統治者在軍事改革剛一開始，就已經計劃重新訓練八旗兵，而且還訓練宗人和滿洲貴族作為軍官。1903年，政府命令袁世凱和鐵良在北京訓練旗人。這支軍隊后來成為新軍的第一鎮。又在1903年建立了陸軍貴胄學堂，以便把王公貴族及滿洲高級官員的子弟訓練成為軍官。1908年，為了同樣目的設立了一所海軍貴胄學堂。與此同時，政府派遣一些王公貴族去日本和歐洲考察他們的軍事設施，并派遣他們的子弟去那些國家學習軍事科學。

在晚清時期，八旗兵已與綠營兵一樣腐敗無能。由于很多滿人以當旗兵為生，政府并不削減旗軍。但在另一方面，因為綠營軍由漢人組成，所以很早就計劃予以裁減。到1901年，綠營軍擬裁減20%—30%，到1906年，擬改編成巡警；然而這些計劃并未完成。1907年，決定把綠營軍改編為巡防營：在和平時期，他們的任務是擒拿盜匪以維持治安；在戰時，他們被動員作為新軍的輔助力量。[[21]](#_21_Bao_Wei_Er____1895__1912Nian)

軍事改革計劃的進行已如上述。但是歸根到底，清政府是否可能建立一支既強大而同時又忠于清帝的軍隊呢？這確實是一個與教育問題非常相似的問題。軍事改革遇到很多困難。首先，在中國，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好男不當兵，而那些臨時被征募的兵通常又是破產的農民或流浪分子。由于這種原因，在招募新軍時，就不可能照章辦事，即不許吸鴉片者和犯罪有案可查的人當兵，也不能只限于招募有家的當地居民。這種理想主義的規章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閣；事實上，被遣散的綠營兵、鄉勇以及破產的農民和流浪者紛紛參加了新軍。

其次，軍隊建設很花錢，而清政府并無足夠的錢財。政府必須依靠各省巡撫的財政支持。但是當北京企圖集中軍隊的統率權時，各省巡撫卻不愿與它合作。實力派地方總督像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還在增加歸他們指揮的軍事力量。結果政府對他們很惱火，終于剝奪了他們的兵權。但與此同時，勢力較小的巡撫們雖然不能像張之洞或袁世凱那樣行事，但仍然能夠妨礙新軍的建設。結果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清政府并沒有它所計劃的36個鎮，而只有20個鎮。而且，反對政府軍事改革的并不僅僅是漢族巡撫。甚至陸軍部尚書滿人鐵良，最后在1910年也辭掉了陸軍部職務。為了削弱漢族官員的勢力，他一直在進行有力的斗爭，但他的辭職卻是因為他不能遵循醇親王以皇室宗族為中心的路線。甚至在滿洲官員之中也蔓延著不滿情緒。

然而，新軍對改變中國人對軍隊的傳統觀念有很大影響。民族主義約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時產生，通過義和團事件的經歷以及俄國占領滿洲和日本戰勝俄國等大事而更形活躍。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才把軍職官員的官品提到與文職官員一樣，才創辦了軍官學堂，并派遣學生到日本進行軍事訓練，而皇帝則成為帝國全部武裝力量的統帥。結果，普遍鄙視軍人的傾向消失了，甚至在紳士隊伍中也有志愿去當軍官的人，在以前他們是根本不會想到這種可能性的。這是一種很大的變化。人民對軍官態度的轉變，自然也改變了他們對軍隊的態度。在新制度中，作為一名軍官，強健的身體和軍事技術已經不夠用了，他還必須擁有相當的學識。候補軍官被派遣留學日本，但他們在那里卻被革命思想所鼓舞。征募紳士當軍官，同時又從本地居民中征募士兵，這樣就使得各省的軍隊與各省督撫一樣，都反對把軍隊集中到中央。[[22]](#_22_Can_Kan_Bo_Duo_Ye_Shan_Da)結果，當辛亥革命爆發時，革命事實上是由新軍發動的，而且大部分新軍站在革命者一邊。支持清政府的軍隊主要是由綠營軍改編的巡防營。

## 立憲政體的準備工作

1901年，清政府雖已開始了教育和軍事改革，但是只是在日俄戰爭之后才開始認真地考慮立憲政體的可能性。[[23]](#_23_Guan_Yu_Qing_Zhao_Li_Xian_Zh)這次戰爭的后果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因為它被認為是立憲政體戰勝了專制政體。中國人像亞洲其他民族一樣被這次戰爭喚醒了，革命運動也被激起來了。要求中國采用立憲政體以便成為富強之國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像張之洞和袁世凱那樣的地方實力派加入了這種大合唱，清政府再也不能置若罔聞了，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載澤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國、美國、德國和法國去考察它們的政府，并詳細調查中國實行立憲政體的可能性。1906年7月該使團回國，而每位成員都推薦立憲政體。[[24]](#_24_Can_Kan_Sun_Ren_Yi_Du___1905)海外的中國使節也齊上條陳說，憲法決不會損害皇室的權力，事實上它是維持皇室權力的最好手段。因此，皇太后和皇帝召見醇親王、軍機大臣和內閣大學士、部院大臣中的當然成員以及袁世凱在頤和園會議，以討論立憲政體的正反面的意見。在這次御前會議中，慶親王和袁世凱贊成采用憲法，但是鐵良和榮慶反對。最后，經過長時間的商討，決定采取立憲政體。1906年9月1日，光緒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師和地方高級官員開始憲政的準備工作。[[25]](#_25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問題就這樣決定下來，于是準備工作就開始了。

### 行政制度的改革

在清政府致力于實行立憲政體之后，它處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行政制度的改革。[[26]](#_26_Guan_Yu_Yi_Ban_Zhi_Du_Wen_Ti)在義和團事件之后不久，政府已經開始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飭吏治和改組過時的官僚機構。但是這種努力遇到了很多困難。

造成許多官員貪污腐化和官僚制度落后過時的原因被認為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存在著“捐納”制度，特別是賣官鬻爵。以前當政府需要額外收入時，它就臨時求助于賣官鬻爵的辦法，但是自從太平軍戰爭以后，這個制度就成了一項長期措施。結果官場中有很多人是以金錢或軍功獲得他們的官職的。人們認為這種做法造成了大量的貪污腐化。

還有，高級文職官員并不熟悉政府的日常工作，這些工作實際上都經員司胥吏之手處理。關于公文的格式都有復雜的規定。每個官署都有自己單獨的一套簿籍。對高級官員來說，由于他在一個職位上最多不過三五年，所以就不可能掌握這些規章。結果，他們別無抉擇，只能依賴年復一年在此工作的胥吏。這些胥吏的社會地位很低，而且他們大部分得不到固定薪金。當人們在訴訟和繳稅過程中與這些胥吏發生關系時，后者就向他們收費以維持生計。由于胥吏索取無度，這種費用就成為一種賄賂。百姓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此外，有很多官署幾乎沒有職守。在中國，子女們被認為應遵循由父母規定的成例行事，因此，由歷代皇帝設立的衙署即使在時移世易和需要改組時，仍然被保持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舊的官署原封不動，而新的又單獨成立。例如清政府以四名至六名內閣大學士配備的內閣作為它的中央行政機構。在1729—1730年征討蒙古人期間，雍正帝在他辦公的宮廷附近設置軍機處，以便讓軍機大臣（他們是從大學士和六部尚書中遴選出來的清帝的心腹大臣）在那里討論軍事機密。這樣，軍機處開始是一個臨時機構，它的所有官員都是兼職的，沒有專任官員。然而在戰役結束之后，雍正帝并未取消這個機構，他繼續與軍機大臣商討國家大事。雍正之后的皇帝都沿襲這種做法。這樣，自設置軍機處之后，內閣大部分職能都由它接辦，使內閣幾乎可有可無，但內閣并未取消。的確，自從秦統一中國以來，盡管在歷史過程中王朝興衰不已，但每個朝代都自稱是前朝的繼承者，即使是在以武力征服前朝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樣，秦代的官僚結構就被一朝一朝地、稍事更張地繼承下來，一直傳到清代。簡言之，中國的官僚機構從公元前3世紀，或至少從公元7世紀初直到20世紀，基本上沒有變動。證據之一就是很多官署名稱都是從古代沿襲下來的。

甚至更嚴重的一個缺點就是官員的職責不清。在很多情況下這是由于在一個官署不止任命一位主管大臣所造成。在內閣，有四至六員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人數在四名至八名之間，而六部每部都有兩個尚書。總理衙門是應西方國家的要求而在1861年設置的，總理大臣的人數不定，多達10員，在1894—1898年期間甚至更多。當一個官署里有那么多主管要員時，他們之中就誰也不愿意負責了。不言而喻，每個人都力圖把責任推給別人。在歷史上，中國政府歷來在許多官署中任命兩個以上的主管大臣，這樣做無疑是為了防止大臣因專權而威脅帝權。出于同樣目的，清朝的總督和巡撫也以此種方式互相牽制，使之互相約束而不致讓地方權力集中到一個官員手里。

1901年清政府開始改革時，它企圖糾正這些積弊。首先，決定簡化各官署的公文形式，取消書吏。捐納制被廢除，不過這種做法仍以不同的形式繼續出現。河東河道總督[[27]](#_27_Zhe_Ge_Guan_Yuan_Fu_Ze_He_Na)和通政使司[[28]](#_28_Zhe_Ge_Guan_Zhi_Shi_Yu_Ming)的職位被取消。詹事府[[29]](#_29_Zhe_Ge_Ya_Men_Fu_Ze_Yu_Huang)被并入翰林院。云南、湖北和廣東的巡撫建制都被撤銷。[[30]](#_30_Zhe_Xie_Xun_Fu_De_Ya_Men_Yu)這些都是不必要的衙署。

在撤銷某些有名無實的衙門的同時，政府又創設了一些新的官署。首先是改組總理衙門后建立起來的外務部；總理衙門則是在1861年作為軍機處的一個機構勉強成立起來的。因此它開始時只是一臨時的官署，官署內有多達十人以上的兼任大臣。因為總理衙門的地位是非正式的，西方國家感到與它談判時有些不方便，因此在清朝于義和團事件中戰敗之后，就要求改組總理衙門。這時外務部就成了一個常設的正式機構，內設一名大臣和兩名副大臣。這便開始瓦解了自隋唐沿襲下來的傳統的六部建置。新的外務部成了第七部，而且比其他六部的品級要高——這確實是個巨大的變化。

不久又進行了一次改革，即在1903年由政府設立了商部。在傳統的中國，積極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較充裕，并不是統治者的正業，所以政府往往并不為促進農業、工業和商業而操心。但是，此時大家承認富國是為了強兵，而富國就需要促進農、工、商業。

1905年，設立了巡警部和學部（前面已談過）。此舉是企圖建立西方式的警察制度，并在1906年決定從綠營中招募警察。巡警部后改成民政部。[[31]](#_3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

在1906年宣布準備實行憲政的方案后不久，對政治制度根據下列原則開始了進一步的改革。首先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然而當時還沒有立法機關，所以只對行政和司法機關進行改革。其次，精簡冗員，明確官員的責任。[[32]](#_32___Dong_Hua_Xu_Lu__Guang_Xu_Z)結果，下列改革措施得以實現。

（一）合并職能重復的官署。太常寺、[[33]](#_33_Fu_Ze_Ji_Si_Huang_Jia_Ling_M)光祿寺[[34]](#_34_Fu_Ze_Gong_Ting_Ju_Xing_De_Y)和鴻臚寺[[35]](#_35_Ju_Ren_Wei_Shi_Fu_Ze_Guo_Jia)都被并入禮部；舊兵部、練兵處和太仆寺[[36]](#_36_Fu_Ze_Fan_Zhi_He_Xun_Lian_Ju)合并成為陸軍部；戶部和財政處被改組為度支部。練兵處和財政處的設立原來是為了集中軍事和財政的管理。自古以來，管理軍事的官署一直是兵部，管理財政的官署則是戶部，但它們現在已成為不必要的了。它們并未被廢除，不過把財政處與戶部合并，練兵處與兵部合并，這在中國都是前所未有的措施，雖然對一個局外人來說，它似乎是勢在必行的事。

（二）增加了一些中央管理機構。郵傳部建立了，刑部被改組成法部，它的職能則限于管理司法事項。[[37]](#_37_Zhe_Dian_Zai_Ci_Chu_Zhu_Shi)這樣，中央政府的部就變成了十一個。自隋唐以來，中央政府機構就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1901年增加了外務部，后來又增加了商部、巡警部和學部，而舊式的六部則仍予保留。但是，1906年改革的結果，只有吏部和禮部保持它們的舊有名稱。傳統的六部建置已經不復存在了。

（三）各部都建立單一的領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在此以前，清朝給各部都任命兩位尚書，一般是滿、漢各一人。此法是使滿人與漢人互相制約，但也趨向于使大臣們不負責任。雙頭領導的廢除明確了責任。同時這也意味著滿、漢族之間不同待遇現象行將結束。出于同樣精神，為了盡可能地避免兼職，廢除了各部大臣兼任軍機大臣的做法。[[38]](#_38_Can_Kan_Ci_Chu_Zhu_Shi_He_Ci)

（四）在各部以外單獨成立了大理院、審計院和資政院。大理院的權力是與純粹作為行政機構的法部明確地分開的。[[39]](#_39_Can_Kan_Ci_Chu_Zhu_Shi)從前，法庭和司法行政機構并不分開。審計院獨立于各部之外，因為它負責審計它們的賬目。雖然已經決定暫不涉及立法機構的事項，但深切感到有征求民意的必要，因此，在將來召開國會之前，計劃把資政院試作立法機關。（資政院的情況將在下面敘述。）

政府企圖包括在行政改革之中的兩項主要變革未能實現。一個就是改革省的官僚政治，另一個就是建立責任內閣。總的來說，在清朝的地方官僚政治中，有許多含糊不清之處。例如，外省督撫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和總督與巡撫之間的關系，都不十分明確。可能是清政府寧愿不去明確這些關系。但無論如何，自從太平軍運動以來，總督與巡撫的權力增加了。在軍事上或財政上，他們都不受中央政府的嚴密控制。清朝改革的一個目的就是削弱他們的權力，辦法是把他們置于中央政府各部處之下，而不是使他們成為與各部處平行而能向皇帝直接上奏的皇帝直屬官員。[[40]](#_40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這樣就可以建立起一個一元化的政體，各省就被置于各部之下，而不是與各部同在皇帝之下：這是行政機構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當然，各省高級官員是反對這種變動的。

成立責任內閣制的要求是當時的一個改革原則——即明確責任——的自然后果。然而，這會導致撤銷軍機處、內閣和政務處。反對采取責任內閣制的理由是：總的行政管理應由若干官員分擔，否則，個人就會專權，從而可能侵犯帝權。這種觀點獲勝了，有關中央行政機構的改革因此沒有進行。

這樣，削弱督撫權力和采取責任內閣制這兩項改革[[41]](#_41___Dong_Fang_Za_Zhi____Di_5Ni)都未實現（在改革活動中，政府原來把這兩者都放在最優先的地位）。1907年，對省一級的行政制度進行了改革，但是督撫的權力并未削弱，也沒有真正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它僅僅以改變一下地方行政官署的名稱而告終。僅有的一件重要的改革也許就是在省的各級建立了審判廳，這是打算按照中央政府的大理院的模式設立的獨立地方司法機關。[[42]](#_42_Can_Kan_Ci_Chu_Zhu_Shi)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在外國人稱為滿洲的東三省進行行政改革。由于這是清朝祖先的發祥地，原來在那里建立過特殊的制度。現在實行了改革，滿洲的行政就與中國的其他部分一模一樣了。盛京將軍被取消了；代之以1907年設置的東三省總督，并任命了吉林、奉天和黑龍江三省的巡撫。[[43]](#_43_Can_Kan_Zhao_Zhong_Fu____Qin)

雖然清政府不能削弱督撫等高官的地方權力，卻成功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中滿洲官員的權力。在只任命一位大臣領導政府的每個部之后，在13個高級官員（即軍機大臣和各部大臣）之中，有7個滿人，5個漢人和一個蒙古旗人。這個蒙古旗人當然是蒙古族，但是他是屬于滿人陣營的。因此中央政府改革的結果是在最高級官員中，滿人與漢人的比率為8∶5。而與以前滿人和漢人人數相等的安排相比，清政府在取消種族區別待遇的公平原則下，巧妙地把對中央政府的控制進一步置于滿人的手里。

另一個改革的基本原則是盡量減少兼職。根據這種政策，袁世凱辭去他的一切兼職，所以他的權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上面已經談到，政府提升兩個集大部分地方權力于一身的漢人總督張之洞和袁世凱為軍機大臣，這樣就剝奪了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力。因此，盡管各省的行政沒有進行改革，中央政府的滿人官員的權力卻大大地增強了；相比之下，漢人地方官員的權力卻被削減了很多。

從1908—1911年的宣統時期，這種趨勢甚至更加強烈。首先，在1909年1月，袁世凱被迫以足疾為由到河南退隱。九個月之后，張之洞死去。這樣，兩位難對付的漢族高級官員就不能妨礙攝政的醇親王行事了。被這種情況所鼓勵，他讓他的兩個兄弟掌握陸軍和海軍，最后在1911年5月，他應漢人提出建立責任內閣的要求，終于組織了一個責任內閣。它對皇帝負責。與此同時，舊內閣、軍機處和政務處都被撤銷。責任內閣由一個總理大臣和兩個副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學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院和外務部各部大臣組成，總數為13個成員。[[44]](#_44___Da_Qing_Xuan_Tong_Shi_Lu)在這13員被任命的內閣大臣之中，8名是滿人，漢人只有4人；8名滿人中，有5人是皇室宗族。醇親王在為皇室宗人取得軍權以后，這時又要全面控制行政了。但這種事實也說明，在這時候，攝政王確實感到除他自己的宗人外，甚至連滿洲官員都不能信任了。任命這一內閣是清廷在行將崩潰時的最后一個孤注一擲的行動。在這個皇族為中心的內閣組成后不到一年，武昌就發動了革命，其后又不到一年，清政府垮了臺。在此以前，朝廷曾經利用改革方案，使它一直下降的權力不斷地集中。

### 準備立憲的日程與“憲法大綱”

當清政府宣布它要采取憲政的政策決定時，極力主張更加激進的一批批評論家開始要求政府立即實現這項目標，不久他們迫使政府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去答復他們的要求。1908年8月，政府因此宣布它準備實行憲政的計劃，聲明在第九年（即1916年）將頒布憲法，并將第一次選舉國會，國會將于1917年召開。[[45]](#_45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

與此同時，政府發布了“憲法大綱”，[[46]](#_46___Dong_Hua_Xu_Lu__Guang_Xu_Z)大綱以日本明治時期頒布的憲法為范本。它開宗明義寫道：1.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2.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47]](#_47_Jian_Xie_Bao_Zhao__Yin____16)在日本憲法里，天皇被賦予很大的權力，但是在“憲法大綱”里，清帝的權力甚至比日本天皇的權力還要大。皇帝的特權幾乎沒有限制。皇帝被賦予以下權力：（1）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2）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準頒布者，不得見諸實行；（3）“憲法大綱”無內閣組織章程，設官制祿，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議院不得干預；（4）司法之權操之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5）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6）宣戰講和訂立條約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7）宣告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旦肯定憲政即將付諸實施，知識分子，尤其是立憲派，就立刻提出批評，這些人早就主張采取這一步驟，但不滿意基本《大綱》和準備立憲的進程。他們強烈要求馬上開始實行憲政。在這種壓力下，清政府在1910年把立憲的日程縮短了四年，并決定在1912年頒布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48]](#_48___Da_Qing_Xuan_Tong_Shi_Lu)然而，這種讓步不過是在旱地上灑幾滴水，遠不足以使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喧嚷平靜下去，就在這個時候，即1911年10月，革命爆發了。

清政府被革命嚇得驚慌失措，它在奄奄一息之際，于1911年11月匆忙地宣布了人們所期望的憲法重要信條“十九條”。[[49]](#_49___Da_Qing_Xuan_Tong_Shi_Lu)為了平息革命運動，與1908年的“憲法大綱”相比較，皇帝的權力在這個文件中大大地縮小了，而國會的權力則增加了。主要的變化如下：（1）憲法由資政院起草，由皇帝頒布。修改憲法權力屬于國會，皇帝不能干預；（2）總理由國會選出，由皇帝任命。皇族不能擔任總理。當總理受到國會彈劾時，他可以或者解散國會，或者提出內閣總辭職；（3）皇帝有直接指揮陸、海軍的權力，但如無國會批準，他不能利用陸軍或海軍來解決國內爭端；（4）非經國會批準，不得締結條約。如果在國會休會期間議和或宣戰，這個行動須提交下屆國會批準。不用說，到頒布的時候，這些改動已無實際意義了。

### 咨議局、資政院和自治會

清政府一旦決定在1917年召開國會，它就不得不承認，它越早聽取公眾意見并把它反映于政府工作之中，情況就越好。因此，它在1909年召開了第一次咨議局會議，并于1910年在北京召開了資政院會議。咨議局即將成為省立法機構的前身，而資政院就是國會的前身。

按照1908年公布的章程，[[50]](#_50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咨議局大致按以下規定組成。

（一）投票資格。（1）必須是年滿25歲以上的男性，在省內長期定居，至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①在省內從事教育或其他公職時間滿三年者；②中學堂畢業或在國內外高等學校畢業；③具有生員以上的功名；④擔任過七品以上的文官或五品以上的武官；⑤在省內擁有價值5000元以上的經營資本或不動產。（2）或者是年滿25歲以上非長期在本省居住的男子，但在本省居住兩年以上并擁有價值1萬元以上的經營資本或不動產者。

（二）當選的條件。年滿30歲以上的男性，在本省久居或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

（三）成員的人數。每省生員的固定名額的5%。田賦較高的南京地區和江蘇省，另外分別增加9個和23個名額。

（四）允許討論的問題。（1）省政府可能改革或尋求改革的事務。（2）本省的預算和收支決算。（3）有關本省稅收和公債發行事項。（4）修訂或廢除只影響本省的有關章程。（5）資政院成員的選舉。（6）由資政院或督撫提出的質詢。（7）市政會上的爭議事項；自治會申請或建議的事務。

（五）與督撫的關系。（1）總督和巡撫如對咨議局的決議無異議，應負責予以公布并執行。如無總督或巡撫的批準，此類決議不得實施。（2）如總督或巡撫對咨議局的決議不滿時，他可以命令復議。（3）在進一步討論之后，如果未能取得一致意見，應征求資政院的決定。（4）督撫有權召開、中止或解散咨議局的會議。

從章程中的條款來判斷，咨議局似乎是紳士表達意見的機構，但很難被認為是一個立法機關。它毋寧說是各省督撫的一個咨詢團體，因為督撫們有權拒絕咨議局決議。然而，咨議局的出現完全可能約束各省督撫專斷地使用他們的權力。即使在以前，督撫也不敢忽視顯貴紳士的意見，所以他必須審慎行事而不冒犯紳士，否則，他會給自己招致相當的麻煩。從這個意義上說，咨議局可以被視為僅僅是把過去實際實行的一切加以合法化罷了。事實上清政府把咨議局議員數規定為各省生員定額數的5%，[[51]](#_5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就說明政府已經有了這種想法。但不管怎樣，一旦有了這一法定形式，地方紳士對各省督撫的壓力無疑就增加了。

1909年，各省舉行第一次咨議局的選舉。結果證明很多當選者年紀在40—45歲之間，而紳士占大多數。然而，那些學問高深和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紳士都寧可不參加地方政治和咨議局。那些當選的人中很多在政治上有野心，也往往不為人所尊重。[[52]](#_52_Guan_Yu_Jin_Xing_Xuan_Ju_Fan)

這樣，省一級立法機構的雛形逐漸形成，1909年在各省召開咨議局第一次會議。在很多省內，最直接的結果就是督撫與咨議局發生了沖突。由于督撫有否決權，他畢竟比咨議局權大。但是這只能驅使咨議局議員參加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運動，而這個國會將不僅僅是一個咨詢機關。

資政院是由清政府創立的，它是一個審議機關，或者是國會的雛形。按照1909年起草的章程，[[53]](#_53___Da_Qing_Xuan_Tong_Shi_Lu)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成員資格。成員將包括100名帝國的被提名人和100名民選的代表。在帝國的被提名人中，有48名宗人或滿洲貴族，32名現任官員，10名學者和10名最高級的納稅人。民選產生的代表從咨議局議員中選出，而且由他們投票選舉，但要經本省督撫的批準。

（二）允許討論的問題。（1）全國的預算與收支決算；（2）有關稅制和公債的發行事項；（3）修訂或廢除法令；（4）關于咨議局和督撫有爭議的事項；（5）由皇帝提交的其他事項。

（三）與行政當局的關系。（1）各部或其他高級行政機關的大臣如對資政院的決議不滿意時，可以命令重新審議；（2）在重新審議之后，如果雙方不能達成協議，得呈請皇帝作出裁決；（3）當資政院對內閣或政務處的決議有疑問時，可以要求闡明；（4）當某一行政機關的大臣侵犯資政院的權力或破壞法律時，資政院可奏請圣斷。

資政院顯然無權監督政府。政府也不是非執行資政院的決議不可的。因此，嚴格地說，資政院只是一個協商機關。

資政院成員的選舉始于1909年，第一次會議于1910年10月在北京召開。從此以后，資政院常常與各部大臣以及各省督撫發生沖突。結果，有些決議得不到有關行政機關的大臣的批準，而且因皇帝的決定而被廢棄。由于這種原因，資政院的議員也開始大聲疾呼，要求立即召開國會。

清政府認識到憲政應該以地方自治為基礎，于是決定加以促進。1908年起草了《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54]](#_54___Da_Qing_Guang_Xu_Xin_Fa_Li)1910年起草了《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55]](#_55___Da_Qing_Xuan_Tong_Xin_Fa_L)地方自治會的選舉立即開始。選舉和當選資格的限制如下：投票者必須是男性，年齡在25歲以上，中國籍，在其所住地連續居住三年以上，付兩元以上的固定稅金或公共捐獻。董事會的董事由有關的自治會選出。在這種情況下，自治會成員投的票數應該與他們擁有的財產總數相符合。這樣，有財產的人在自治會中格外地被賦予了特權。在自治會會員之中，相當數量的人是有低級功名的紳士。大部分被選為自治會會長和鎮鄉董事的人是紳士。的確，清末的地方自治實際是紳士之治。然而，政府官僚政治對這種自治制度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知府、州官和知縣有權解散地方自治會。董事會的決議沒有這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批準不能實施。知縣能夠免除鎮鄉的董事的職務，而且可以不同意有關自治會選出的自治會辦事人員。結果，這種自治會很像咨議局和資政院的情況，實質上就是政府的一個輔助機構或咨詢團體。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互相擔保的集體的制度，如“保甲”或“里甲”，它們的作用是輔助政府維持公共秩序和征稅。一般說來，紳士并不與這種制度有牽連。然而，只要這類集體仍在起作用，他們就可以發揮相當的影響；總之，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紳士對每個地方的家族和社團都擁有相當的影響。事實上，地方當局只有與紳士控制的這些社團合作，才有可能進行治理。目前清政府正在組織地方自治會作為憲政的基礎，它當然不敢忽視紳士的力量。由于地方紳士擁有的權威不是法律授予的，因此至少在理論上，政府官員在過去有時忽視過紳士。但是現在，紳士的權力由法律規定并加以保證。這就是清末所規劃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實際內容。從另外的角度看，可以說清政府有這種企圖：正式認可紳士在地方上的控制，把紳士置于地方官員的控制之下（即把他們的職能正式納入基層的政府部門），以此來鞏固它的統治。簡言之，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與同樣保守的地方紳士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個正在變化的世界中保持他們的政治權力的企圖。[[56]](#_56_Jian_Fen_Che___Zheng_Zhi_Di)

## 財政的清理與集中

清朝財政是極端混亂的，以致中央各部以及各省政府幾乎不受中央的控制。如果政府要提倡教育、發展武裝和準備實行憲政，集中財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義和團事件之后，財政改革的第一個企圖是統一貨幣。在此期間，在中國流通的貨幣有傳統的紋銀（細絲銀）、銅錢和各種外國鑄造的銀元。此外，1889年，張之洞在廣東開辦了一個鑄幣廠，用機器生產銅錢和銀幣，此舉證明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很多省份開辦了鑄幣廠，源源不斷地鑄出錢幣。但是這些硬幣并沒有標準化。事實上，自從1850年以來，流通著各種各樣的貨幣，它們之間并沒有定出固定的兌換率。各省官辦的、私營的銀行和錢莊以及外國銀行都在發行紙幣，這樣就使財政更加混亂了。這種貨幣的混亂狀態當然阻礙了商業的發展。西方商人愈來愈堅持要求統一貨幣。事實上1902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以及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續訂條約和中日通商行船續約都要求清政府統一貨幣。此外，由于1901年下半年之后世界銀價急劇下降，進口貿易對于采用銀本位制的中國來說變得非常不利。而且在甲午戰爭之后，中國還遭到必須以黃金償付外國債款和賠款的損失。[[57]](#_57_Guan_Yu_Bei_Jing__Can_Kan_Fu)因此不僅在西方人之中，而且在中國人之中也有人提出建議，要求采取金本位制和試圖使貨幣標準化。

清政府也認為這是當務之急，于是就專門設立了財政處。[[58]](#_58_Cai_Zheng_Chu_Jian_Yu_1903Ni)這時幣制改革與外國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關，以至沒有它們的合作就難以進行。因此，清政府與還在實行銀本位制的墨西哥政府一起要求美國在友好的條件下合作，以便在采用金本位制國家和銀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之間建立穩定的關系。結果，在1903年成立了國際匯兌處，次年美國專家精琦到中國來調查貨幣情況。精琦向中國政府提出以下方案：（1）中國應該立即采取金本位制，但金貨幣不應在國內流通，只作貨幣的儲備和支付外國之用；（2）在國內，銀幣應用作標準貨幣；（3）金與銀之間的兌換率應是1比32；（4）為了監督新幣制的采用，應雇傭外國人。[[59]](#_59_Jing_Qi_Tui_Jian_Fang_An_De)

德國和法國同意這個建議，但英國和俄國反對它。在中國內部有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但由于張之洞的強烈反對，這個建議被擱置起來了。張之洞反對的理由如下：（1）不應該允許外國人干預中國的財政或貨幣問題；（2）由于中國通常是使用銅錢，所以采用銀本位制就夠了，采用金本位制則太過分了；（3）金和銀之間的實際兌換率是1比40；把它折成1比32將是欺騙百姓，在鑄造中將會獲得高達20%的利潤，而且將使一種不足值的貨幣流通；（4）世界銀價下跌，雖不利于中國償付賠款和外債，但有利于促進出口而限制進口。當清帝國的主要目標是富國強兵時，銀價下跌對它并不是一個問題。

精琦的意見遭到駁回，政府的意見是決定暫時維持銀本位制，雖然金本位制也可能在將來實行。但是關于標準硬幣的問題仍有爭執：究竟應該采用一兩的銀幣還是采用約等于半美國銀元的一元銀幣（相當于0.72兩庫平銀）。張之洞主張鑄造一兩的銀幣，其理由是納稅以兩為基礎，而銀元又不能與外國銀元競爭。袁世凱表示同意。因此在1905年，政府決定暫時以銀兩作為標準硬幣，并在天津開設造幣總廠和四個分廠，以便專門鑄造一兩重銀幣，同時禁止其他造幣廠鑄造銀幣。但實際上關于采用銀兩或銀元的爭論仍未停止。主張使用銀兩的人主要是張之洞和袁世凱等各省督撫；使用銀元的支持者是戶部（后來改為度支部）的一些官員以及中外商人。由于張之洞和袁世凱直到1908年仍有強烈的影響，1908年政府再次決定以銀本位制統一貨幣制度。但是在1909年由于袁世凱丟官和張之洞死亡，支持銀元的人們的力量頓時變得強大了。最后在1910年決定取消銀兩制，而以銀元為標準硬幣，只限造幣總廠和它設在漢口、廣州、云南及成都的分廠鑄造。

可惜的是，這并不意味著以前發行的銀通貨停止使用，而僅僅是在舊體系上增加了新的銀元；這樣只會加劇貨幣的混亂，并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王朝結束。

另外，還有省的鑄幣廠在鑄造銅錢。鑄造銅錢是為了增加經費，所以它們的質量日趨低劣，從而引起了通貨膨脹。由于銅錢與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這就使他們遭受極大的苦難。有鑒于此，當1905年在天津開設造幣總廠時，政府開始只鑄造銅錢，因為當時的急務被認為是要控制住銅錢，或者甚至是在銅本位基礎上統一貨幣。但是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吸收各省鑄造的銅幣。它就命令各省不要再鑄造銅幣，并關閉那些還沒有開始經營的鑄幣廠。由于督撫們不愿遵奉這條命令，濫鑄之風仍然存在。[[60]](#_60_Wei_Jian_You____Zhong_Guo_Ji)

另一個引起混亂的原因就是紙幣。接近清朝末期，督撫們和某些商人開設官、私銀行，而且它們和錢莊都不受限制地發行紙幣，這也引起了通貨膨脹和使百姓遭殃。1905年，清政府開設了戶部銀行，資金四百萬兩，為的是要發行有高度信譽的鈔票，以期抑制無限制地濫發紙幣的情況。然而，即使這個銀行發行的鈔票，也沒有足夠的儲備金和固定的發行額。因此戶部銀行發行的鈔票也不過是增加混亂而已。隨后，在1908年政府把該行改組成為有1000萬元資本的大清銀行。

1910年，政府為了集中管理紙幣，決定今后只有大清銀行才能發行鈔票；與此同時，政府還規定發行總額并建立儲備基金。不準有其他發行鈔票的機構，那些已經發行了的，要在流通中逐步收回。當然，這些計劃并未完成。流通中的紙幣總數估計有6.5億兩。如果大清銀行要發行同樣數量的鈔票，它就需要3.25億兩儲備基金，但它只有1000萬兩資本。[[61]](#_61_Yang_Duan_Liu____Qing_Dai_Hu)

還打算統一度量衡制。在中國，度量衡隨各省而異；甚至在一省之內也因地而異；甚至在同一地方隨著目的不同它們也有差異。如同貨幣一樣，這種情況妨礙了商業的發展。在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了章程，規定了長度標準（營造尺）、容量標準（漕斛）和重量標準（庫平兩）。[[62]](#_62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清政府決定度量衡采用十進位制。按照頒發的計劃進度，官方所用的量器和磅秤都要在兩年內加以調整，以符合新制度；私人用的要在十年以內調整完畢，但政府未能看到這些計劃被付諸實施就壽終正寢了。

在此期間，清政府企圖集中它的財政管理。關于各省的財政，只有正規的收入和支出得上報戶部。額外的收支盡管在太平天國時期之后都大大增加了，但并不上報。這種不上報的情況更加削弱了清末中央對地方行政的影響。因此，在1906年政府把戶部和財政處合并以統一中央的財政之后，政府打算冒險把全國的財政加以集中管理。但是這當然會遭到督撫們的強烈反對。

然而，在1909年擬定了下述指導性的政策方針[[63]](#_63___Da_Qing_Guang_Xu_Xin_Fa_Li)：（1）只有度支部有權借外債。如中央政府的任何部或省政府要締約借外債，需經度支部的許可，并必須以它的名義借款；（2）到當時為止，中央政府各官署籌措的資金原由這些官署支配。自此以后，這類資金都要上報度支部；（3）由于各個部的官辦銀行正無限制地發行鈔票，又由于國家要對這些鈔票負責，度支部被授權可對這些官辦銀行不定期地進行抽查；（4）當時各省花費本省自籌的款項，不向中央政府匯報。今后，所有這些資金都應上報度支部，度支部被授權調查這類事務。

為了執行這一政策，決定度支部在1909年3月起開始檢查各部和省政府1908年的收支，并從1911年起建立預算制度。因此，每省的財政實際情況都被廣泛地考察過，其結果也被公布了。[[64]](#_64___Cai_Zheng_Shuo_Ming_Shu)在1910年，度支部根據各省各部呈交的預算表編出一份擬議的1911年全國預算表，并把它呈交給資政院。資政院作了某些修改即予通過。根據直到此時的中國人的定額使用法，歲入總數應該總是不變的，而在開支方面應該是量入為出，所以沒有作預算的必要。因此，中國采用預算制之舉是前所未有之事——不過這項措施證明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第一個預算表行不通，因為由各部和各省政府呈交的最初計劃都不可靠，它們都是根據“少收多支”的方針制定的。結果，度支部造的全國預算表的收入為2.96億兩，支出為3.76億兩，證明是一個“赤字”預算。這個預算不可避免地成了資政院的一個爭論問題，于是就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把預算的收入改為3.01億兩，支出改為2.98億兩，以便使收支趨于平衡。[[65]](#_65_Can_Kan_Wang_Ye_Jian___1750)當然，這種修改并無堅實的基礎。辛亥革命終止了這種閉門造車的官樣文章。由于歲入還沒有被集中起來，北京沒有統一的國庫，也不了解實際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編制預算在技術上仍然是不可能的。

## 其他改革方案

### 編纂新法典

中國自古以來就已經有與近代行政法和刑法相似的法律，但是沒有或很少有與近代民法和商法相似的法律。另外，司法和行政的權力并不像近代西方那樣分立。在義和團事件后，當清政府積極打算采用西法來富國強兵時，它終于看到了需要按照西方模式修訂法律。自從政府開始主動提倡工商業以來，對民法和商法的需要就變得明顯起來了；與此同時，中國人終于逐漸認識到不平等條約的種種不利，并希望取消治外法權。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按照西方模式修改法律和修改司法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它們1902和1903年簽訂條約時已經要求修改。結果，清政府在1902年決定著手修訂法律和司法管理的準備工作。為此目的，設立了一個官署，由有豐富經驗的官員沈家本任主管，開始檢查《大清律例》。結果，在1905年，如剮刑、梟首示眾、死后斬首以及文面等酷刑都被廢除。杖刑等體罰則代之以罰款，連坐和嚴刑拷問也被廢除。[[66]](#_66_Can_Kan_Mai_Jie_Er___Zhong_G)

從1906年起，政府聘請日本法律專家幫助編纂新的刑法以及民法和商法；新刑法的草稿則在1908年完成。后者以日本刑法為范本，而日本刑法又是以德國法典為基礎的；新刑法規定，懲罰限于死刑、監禁或罰款。這樣，以前所有的肉刑都被廢除了，同時又引進了緩刑和假釋的新的做法。在犯罪名目中，又增加了涉及外交事務、選舉、運輸和交通以及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犯罪行為。結果，它實際上與其說是《大清律例》的修訂本，不如說是一本嶄新的刑法典。當然有許多人起來反對這一法典草案。當它被呈交給中央和省政府的高級官員評議時，下列各點受到最嚴厲的批評：（1）根據草稿，16歲以下的犯罪者不予起訴——這種年歲限度應予降低；（2）對那些犯有損害皇室、反叛、搞陰謀或犯忤逆罪者處以絞刑，懲罰太輕；（3）對犯有掘墓，或破壞、遺棄、偷盜尸體罪行者處以監禁勞役，懲罰太輕；（4）把合法自衛的概念應用于違犯祖宗的罪行是不能接受的；（5）與無夫之婦通奸而不予起訴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67]](#_67_Mai_Jie_Er____Zhong_Guo_Jin)總之，起草的新刑法遭到了儒家觀點的批判。結果，作了很多修改以迎合上述大部分反對意見。

經過這些修改后，起草的法典隨同補充章程被呈交給資政院討論。在資政院里，出現了種種不同意見，但無法作出任何結論。討論結束時，只通過了一般條款，至于特殊條款和補充章程則被掛了起來。然而，在1911年1月，清王朝借口如要實行憲政，就不可推遲頒布刑法，因而公布了一般條款以及資政院尚未通過的特殊條款和補充章程。政府打算把它們送交下一次資政院的會議上批準。

在此期間，由于新刑法典的編纂非常緩慢，因此修訂的《大清律例》已在1910年作為臨時措施頒布，其名稱為《核定現行刑律》。[[68]](#_68___Da_Qing_Xian_Xing_Xing_Lu)這部刑律除上述在1905年修訂的部分外，基本上與原來的律例一樣，只是名詞有一些變化，并且對章程的某些方面作了簡化。它在1928年之前繼續有效。

政府在著手編纂新刑律的同時，開始編訂商法和民法。特別迫切需要一部商業法，因為它是發展商業的先決條件。早在1904年1月，已經起草了《商人通例》、《公司律》以及其他章程。由于這些律例是倉促制定的，不能令人滿意，因此當局就與一名日本顧問在1908年開始編纂新商業法，但它只完成了一部分。除此之外，農工商部起草了一部商業法典，在1910年呈交資政院，但是在它被批準之前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大規模編纂民法的工作是在1907年與一位日本顧問一起進行的，草案于1911年完成。它以日本的民法為基礎，而后者則仿效德國的民法。然而，所提出的草案是不得人心的，因為它忽略了傳統的中國習慣；總之，在清王朝垮臺之前它是沒有機會付諸實施了。[[69]](#_69_Dao_Tian_Zheng_Lang____Guan)

### 革除陋習

在進行行政、司法、法律和軍事制度的改革的同時，清政府還在百姓中間開展了一場革除陋習的運動。1902年，政府公開反對纏足，這是早就遭到傳教士和中國改良派攻擊的陋習。[[70]](#_70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

1906年，皇帝下詔禁止鴉片。詔令的內容如下：（1）逐漸減少種植罌粟，在10年之內徹底消滅；（2）禁止吸鴉片、開煙鋪或進口鴉片；（3）有鴉片煙癮的官員必須于6個月內戒除。[[71]](#_71___Dong_Hua_Xu_Lu____Juan_203)至于鴉片進口，清政府與英國當局進行了協商，1907年英國人同意把過去5年平均每年自印度輸入中國的數量減少10%，如果清政府在其后三年禁煙有進展，就繼續減少進口。在1910年，重新開始談判，英國人不肯答應在7年內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但是由于英國輿論的壓力以及資政院和中國學生強烈要求立即停止鴉片貿易的行動，英國人終于在1911年答應到1917年停止從印度向中國輸出鴉片。[[72]](#_72___Jin_Yan_Tiao_Jian____1911N)

### 消除滿漢畛域

作為中國的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不像蒙古人那樣，他們特別注意如何對待漢人，盡量對漢人不搞歧視。然而，滿人人口只有漢人的四十分之一，而且文化水平也稍低，如果他們要維持統治地位，一定程度的歧視是難免的。例如：滿族男子不能與漢族婦女通婚；法定的禮儀和刑罰在滿、漢之間也有所不同；某些官職只許滿人擔任。

此時，清廷修訂了這些規章，力求滿漢之間關系和諧。1902年，滿族男子與漢族婦女通婚的禁令解除了；1904年（滿族）將軍和都統的職位以及海關上的某些職位也可以讓漢人擔任了。1906年的行政改革使中央各部開始實行新的一長制，即不分種族，滿人和漢人均可擔任各部唯一的大臣。在以前，所有滿人的生計都有著落；他們不經營農業和商業，以使他們能夠集中力量服兵役；1907年，政府廢除了這種特殊待遇，也給他們土地，并命令他們與漢人一樣種地，自食其力。在這一年，法定的禮儀和刑罰改為對滿、漢族同等待遇。滿族官員在朝見皇帝或寫奏折時也奉命不再稱“奴才”，而像漢人那樣稱“臣”。[[73]](#_73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然而，當滿族中心主義正在軍事和行政制度方面得到加強時，這種裝點門面的努力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在短促的宣統期間，政治和軍事力量都集中在滿族宗室手中，但這種做法卻直接幫了革命黨人的忙。

## 清末改革的特點

當我們回顧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時，可以明顯地看到以下各點。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敗的矛盾。例如：當創設資政院和咨議局的時候，本來是為了廣開言路以作為準備立憲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卻愈來愈嚴格地控制人們表達自己的思想。當清朝接受了立憲政體的思想，中國的知識界就立刻開始要求馬上召開國會。梁啟超在東京組織政聞社以促進憲政運動。清政府對這種頗有影響的運動疑慮重重。它警告：學生應集中精力學習，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開發表演說。它還警告紳商不得干預政府事務，指出在君主立憲的各國，主權是屬于君上的；雖然“庶政公諸輿論，而施行庶政，裁決輿論，仍自朝廷主之”[[74]](#_74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1908年，梁啟超的政聞社被政府下令封閉。由此可見，即使在改革帝國專制主義的時候，清政府仍力圖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參與制定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謀私利。1901年以后各項改革主要是由滿族軍機大臣榮祿和幾名漢族總督張之洞、劉坤一以及袁世凱等所提倡。1903年榮祿死后，慶親王奕 劻接替了他的職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倡改革的主將就是奕劻，協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凱，他在北京有兼職——以及地方上迎合漢族士紳改革要求情緒的張之洞等人。1902年，當張之洞的同僚劉坤一死后，張之洞的影響也下降了；幾乎可以這樣說，在1903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慶親王和袁世凱聯合進行的。然而，大約在1906年行政改革時，出現了一個有勢力的反對慶親王和袁世凱的滿人集團。這個集團由陸軍部大臣鐵良和學部大臣榮慶領頭，后臺是光緒皇帝的兄弟醇親王載灃。榮慶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滿人。在1906年以后的兩年時間中，兩個集團爭奪改革方案，但形勢逐漸不利于慶親王和袁世凱。最后，在1908年當皇帝與太后相繼去世后，醇親王成了攝政王，袁世凱被迫退隱河南。1909年，醇親王控制著局勢。鐵良對他不滿而離開了政府。代替他的是醇親王的兩個兄弟載勛和載濤，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擁在醇親王的周圍。[[75]](#_75_Can_Kan_Xiao_Yi_Shan___Qing)

滿洲朝廷實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統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要改革？義和團事件之后，不僅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立憲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撫和外國人也都有此要求。為了防止反滿勢力的壯大，并要保持督撫們和外國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統治者喜歡與否，除了改革別無選擇余地，實際上，政府原先本無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門面，而對實際內容則毫不關心。

因此清政府開始搞改革時姿態很消極，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后，它對改革的活動就越來越認真了。可是在這時候，改革并不如康有為和梁啟超所主張的那樣是為了富國強兵以防御列強的侵略。改革的目的毋寧說是為了保衛清政府不受漢人與外國人兩者的攻擊。換言之，改革是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須有統率陸海軍的大權，必須萬世勿替地統治帝國，必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漢族督撫們也需要維護清王朝的統治。這就是他們與慈禧太后、醇親王以及滿洲的高級官員合作的原因。然而，他們想保存這個王朝的愿望并非只是出于他們對皇帝的忠誠或對清朝的熱愛。那是因為他們感到如果沒有清王朝，他們的權勢也會化為烏有。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當朝廷力圖削弱漢族督撫的權力而把它集中于滿人手中時，他們自然要大力反對。使形勢更加糟糕的是，在1908年以前，漢人督撫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親王接替了她，也行使控制帝國官員的特權，但他的威望遠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權力也越來越靠不住。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漢人督撫們對滿洲政府的不滿就空前地表現了出來。愚不可及的滿洲統治者正在毀壞中國的儒家君主政體。

在有清末年，紳士給了督撫們以社會的和經濟的支持。原來紳士是反對改革活動的，但是一旦決定了要進行他們最反對的取消科舉和宣布立憲政體這兩件大事，他們卻一反故態，轉而積極支持改革。毫無疑問，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愛于清政府或整個中國。對他們來說，新式學堂和舊式科舉考試一樣。通過開辦學堂，他們能夠把他們的紳士特權傳給子孫。此外，未來立憲政體的基礎應該是地方自治制。而這種地方自治正是他們所希望的。因此，他們樂意與各省督撫合作進行這一改革，而當后來政府企圖集中權力時，他們也與督撫們一起起而反對。可是每當督撫采取任何似乎不利于他們的行動時，紳士們就要反對督撫。因此，各省督撫和咨議局常常發生沖突。[[76]](#_76_Guan_Yu_Dui_Ta_De_Jin_Yi_Bu)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資金。政府開始它的各項改革時并沒有足夠的經費。它必然要從各省榨取必要的資金。在各省，以強制捐獻形式出現的額外稅收卻用種種名目強加到公眾頭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這是最不堪忍受的負擔。對他們來說，采取立憲政體也好，專制政體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這都無關緊要；他們說到底只需要輕徭薄賦、雞犬不驚的生活。反映人民這種絕望處境的民眾起義，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幾乎連年不斷。與此同時，政府一方面強迫督撫們對財政改革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們的權力。不言而喻，督撫們對所分派的任務或者加以拒絕，或者有意留滯。結果，政府只好借外債來實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與四國（英、美、德、法）銀行財團簽訂一筆一千萬英鎊貸款的借約，作為開發滿洲和幣制改革之用，另外還舉借六百萬英鎊貸款作為建筑粵漢鐵路之用。前者用來實現1910年已計劃好的幣制改革，后者是為了把私人建設或發展的鐵路收歸國有。這筆粵漢鐵路貸款結果成了點燃辛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華合興公司已獲得建筑粵漢鐵路的權利。然而在義和團運動之后，收復利權運動的風暴在全國興起，特別是席卷了廣東、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作為這幾省的代表與合興公司談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權。結果，湖北部分的鐵路歸該省管理，而湖南和廣東部分則交給私人經營。[[77]](#_77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Zui)此后鐵路的建筑非常緩慢，最后北京以私營公司不能有效地經營鐵路這一并非站不住腳的理由，決定把川漢和粵漢兩鐵路統統收歸國有。為此目的，政府力圖從四國銀行團借得必要的資金。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廣東四省的紳商人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對。這幾個省的督撫被責成去鎮壓反對這次政府行動的騷亂，但甚至連他們也對紳商頗表同情。這種騷亂一直沒有平靜下來，最后竟發展成為觸發革命的引火線。紳士和督撫們是否真的反對這種外債，這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他們自己能夠得到這些貸款，他們也許就不會反對了。

概括地說，如果不是在清朝統治的最后10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滿洲統治者及漢族督撫和紳士企圖保存、甚至擴大他們勢力的嘗試。但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結果，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滅亡。

（劉坤一 譯）

[[1]](#_1_6)《大清德宗實錄》卷476，第9頁。

[[2]](#_2_6)《大清德宗實錄》卷481，第4頁。

[[3]](#_3_6)舒新城編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是有關清代教育改革的一本有價值的資料書籍。另外還有舒氏重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卷本，1963年版）。關于紳士在創辦學堂中的作用，參看瑪麗安·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

[[4]](#_4_6)參看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3—67頁。

[[5]](#_5_6)《大清德宗實錄》卷523，第19—20頁。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第59—67頁；再參看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7章。

[[6]](#_6_6)見喻長霖的敘述，轉載于《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06，第8648—8650頁；又見莊吉發《京師大學堂》第2章。

[[7]](#_7_6)《大清德宗實錄》卷548，第4—5頁；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第233—234頁。

[[8]](#_8_6)參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61、63、68—69頁。

[[9]](#_9_6)《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宣統元年》。

[[10]](#_10_6)關于此時期的新式學堂章程，參看張百熙等人的《奏定學堂章程》。研究新式學堂的主要著作有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11]](#_11_6)《學務綱要》，載《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0頁。

[[12]](#_12_6)同上書，第12頁。

[[13]](#_13_6)參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第2冊，第974—989頁。

[[14]](#_14_6)《各學堂管理總則》，載《奏定學堂章程》卷5，第8頁。

[[15]](#_15_6)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1970年修訂本），第461—463頁。

[[16]](#_16_6)關于開始于1901年的軍隊的改革，參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4—7章；麥金農：《袁世凱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與組織》（加利福尼亞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關于1895—1901年時期軍事改革的重要背景材料，參看劉鳳翰的兩部專著《新建陸軍》和《武衛軍》。

[[17]](#_17_6)參看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與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頁。

[[18]](#_18_6)參看麥金農《袁世凱在天津和北京》，第106—119頁。

[[19]](#_19_6)參看貝斯《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第189—197頁。參考書目該書所列時期為“1895—1909年”。——譯者

[[20]](#_20_6)包遵彭：《中國海軍史》，第519—520頁。

[[21]](#_21_6)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47—249頁。

[[22]](#_22_6)參看波多野善大《新軍》，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65—382頁。

[[23]](#_23_6)關于清朝立憲主義者運動的總的背景，參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1—6章；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3章。

[[24]](#_24_6)參看孫任以都《1905—1906年的中國憲政考察使團》，載《近代史雜志》卷24第3期（1952年9月），第251—268頁。

[[25]](#_25_6)《大清德宗實錄》卷562，第8—9頁。

[[26]](#_26_6)關于一般制度問題的背景，參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清國行政法》第一部分。在莫里森的《儒家官僚政治的現代化》（拉德克利夫學院1959年博士論文）一文中可以看到有關晚清行政改革的史料。

[[27]](#_27_6)這個官員負責河南省黃河堤壩的保護工作。但是這項工作可以由該省的巡撫來照管。

[[28]](#_28_6)這個官職始于明代，其職責是審查奏議，然后再呈送皇帝。但是它引起很多批評，到清朝期間，它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官職。

[[29]](#_29_6)這個衙門負責與皇太子有關的事項。由于清代后期的皇帝并不指定皇太子，詹事府便形同虛設。

[[30]](#_30_6)這些巡撫的衙門與總督的衙門都設在同一城市中。

[[31]](#_31_6)《大清德宗實錄》卷564，第11—13頁。

[[32]](#_32_6)《東華續錄·光緒朝》卷202，第12—14頁。

[[33]](#_33_6)負責祭祀皇家陵墓的官署。

[[34]](#_34_6)負責宮廷舉行的宴會事項的官署。

[[35]](#_35_6)據認為是負責國家宴會禮儀的官署。

[[36]](#_36_6)負責繁殖和訓練軍馬。

[[37]](#_37_6)這點在[此處注釋](#_3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引的詔書中已提到。

[[38]](#_38_5)參看[此處注釋](#_3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和[此處注釋](#_32___Dong_Hua_Xu_Lu__Guang_Xu_Z)。

[[39]](#_39_5)參看[此處注釋](#_32___Dong_Hua_Xu_Lu__Guang_Xu_Z)。

[[40]](#_40_5)《大清德宗實錄》卷574，第6—7頁；《東方雜志》第4年第8期（1907年）“內務”，第401—424頁。

[[41]](#_41_5)《東方雜志》第5年第1期（1908年），第10—13頁。

[[42]](#_42_5)參看[此處注釋](#_31___Da_Qing_De_Zong_Shi_Lu)。

[[43]](#_43_5)參看趙中孚 《清末東三省改制的背景》，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313—335頁；參看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七章。

[[44]](#_44_5)《大清宣統實錄》卷52，第18—23頁。

[[45]](#_45_5)《大清德宗實錄》卷583，第4—5頁；卷595，第1—2頁。《大清光緒新法令》卷2，第25—32頁。

[[46]](#_46_5)《東華續錄·光緒朝》卷219，第1—7頁。

[[47]](#_47_5)見謝保兆（音）《1644—1911年的中國政府》，第372頁。

[[48]](#_48_5)《大清宣統實錄》卷43，第2—5頁。

[[49]](#_49_5)《大清宣統實錄》卷63，第10頁；卷65，第9、10—18頁。最后一處載有“十九條”的原文。

[[50]](#_50_5)《大清德宗實錄》卷579，第14—15頁；《大清光緒新法令》卷2，第2—24頁。

[[51]](#_51_5)《大清德宗實錄》卷579，第4頁。

[[52]](#_52_5)關于進行選舉方法的敘述，參看張朋園《立憲派》，第12—40頁。

[[53]](#_53_5)《大清宣統實錄》卷17，第14—19頁；又參看《大清光緒新法令》卷2，第1—2頁。

[[54]](#_54_5)《大清光緒新法令》卷2，第44—62頁。

[[55]](#_55_5)《大清宣統新法令》卷14，第1—15頁。

[[56]](#_56_5)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與民族革命》，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185—226頁；菲利普·庫恩：《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載小韋克曼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68—280頁。

[[57]](#_57_5)關于背景，參看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1814—1919年》。

[[58]](#_58_5)財政處建于1903年，但于1906年與度支部合并。

[[59]](#_59_5)精琦推薦方案的譯文載于《幣制匯編》第3冊，第1—62頁；文件原文發表于《關于金本位制傳入中國的報告》（美國參議院文件第128號，第58屆國會第三次會議，1904年）。

[[60]](#_60_5)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第179—181頁；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第283—361頁。

[[61]](#_61_4)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第374—385頁；魏建酞：《中國近代貨幣史》，第192—207頁。

[[62]](#_62_4)《大清德宗實錄》卷579，第2—3頁；《光緒政要》卷43，第43—44頁；卡梅倫：《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第179頁。

[[63]](#_63_4)《大清光緒新法令》卷10，第95—98頁。

[[64]](#_64_4)《財政說明書》有23個報告，每一報告長達數百頁，大約刊印于1911年。

[[65]](#_65_4)參看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75—76頁。

[[66]](#_66_4)參看邁杰爾《中國近代刑法介紹》第1—2章；陶龍生：《沈家本與中國法律的現代化》，載《社會科學論叢》第25期（1976年9月），第275—290頁。（參考書目所列陶龍生一文刊載時間為1966年9月。——譯者）

[[67]](#_67_4)邁杰爾：《中國近代刑法介紹》第3—5章；《大清光緒新法令》卷19，第25—64頁。

[[68]](#_68_4)《大清現行刑律》卷26；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第887—898頁。

[[69]](#_69_4)島田正郎：《關于清末民法與商法草案的編纂》，載《法律論叢》卷34第6期（1962年），第119—149頁；米特拉諾：《1906—1907年中國的破產法》，載《華裔學志》卷30（1972—1973年），第259—337頁。

[[70]](#_70_4)《大清德宗實錄》卷492，第9頁；李又寧、張玉法合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第1冊，第525—532頁。

[[71]](#_71_4)《東華續錄》卷203，第6—7頁；《大清德宗實錄》卷579，第2—3頁；余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5章；至于背景，參看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143—173頁。

[[72]](#_72_4)《禁煙條件》1911年5月8日，載麥克默里編《1894—1919年與中國締結的和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和協定》第1冊，第861—866頁。

[[73]](#_73_4)《大清德宗實錄》卷492，第9頁；卷576，第1頁；卷579，第2頁。《大清宣統實錄》卷30，第26頁。羅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44—145頁。

[[74]](#_74_4)《大清德宗實錄》卷583，第4頁；《大清光緒新法令》卷2，第25—32頁。

[[75]](#_75_4)參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501—2516頁。

[[76]](#_76_4)關于對它的進一步的討論，參看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297—313頁。

[[77]](#_77_4)關于這個問題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年中國爭取自辦鐵路的行動》。

#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1]](#_1_Ben_Zhang_Zhai_Zi_Chen_Jin_Ji)

## 關于商人和現代企業的再評價

當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滅的時候，大約有六百個中國人自己興辦的使用機器的制造業和礦業企業。已經鋪設的鐵路約5600英里長。中國人在這些現代的商業冒險事業中的投資總額大概達到1.6億元。[[2]](#_2_Ci_Chu_Ji_Xia_Wen_Yin_Yong_De)這個數目相當大，但只合農業投資的百分之六七。

雖然在清朝的最后10年，這些事業的發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別是在興建鐵路方面，但是，這幾種工業沒有造成任何持續的經濟發展。主辦人和經理方面沒有制定出計劃去注意各種工業發展本身之間以及它們與其他經濟部門（如信用設施、資金籌措、市場銷售、稅收結構等）的職能上的結合。無論如何，許許多多必要的變革必須在全國范圍進行，因此都非控制現代工業的地方官吏辦得到的。（甚至在1918—1922年之間大得多的經濟大發展也無法造成一種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趨勢。到了1933年，由制造業、礦業、銀行和運輸業組成的中國現代經濟部門，也只占全國國內純產值的大約百分之十二。）[[3]](#_3_Jian_Liu_Da_Zhong___Ye_Kong_J)

## 工業化的政治理論基礎

雖說中國早期的工業實驗以令人失望的結果告終，但也不是沒有費過勁的。最初是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船塢和兵工廠，當時中國政界領袖和知識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動，清楚地表明他們對西方技術和工業管理是抱著完全贊同的態度的。這種以“自強”口號表現出來的新態度推動了一個借鑒西方實際知識以建立強大中國的運動。[[4]](#_4_Jian_Ben_Shu_Shang_Juan_Di_Sh)

由于具有這樣一個得人心的目標，“自強”的思想對所有愛國者都有巨大號召力，甚至在今天還是這樣。但是關于怎樣才最能取得這種嶄新的力量，則因時間的轉移和意識形態的歧異而意見有所不同。文化純粹派希望只借用西方的槍炮和炮艦等重武器。但是事實證明，只是增加一點現代軍事器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夠的。甚至在重新加強的歐洲壓力——它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使中國受辱的中法戰爭中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面前，中國領導階層已經開始制定各種政策，借以執行一個更為廣泛的自強計劃。

一份新的材料促進了在士大夫中間重新集中辯論借鑒西方的問題。1864年中國海關開始發表各商埠進出口數字，這些數字清楚地表明，中國幾乎經常出現貿易虧空。對這種逆差的關心從19世紀初就已開始，批評者曾把它歸咎于折成銅錢的銀價上漲的緣故。現在有了中國海關的具體統計，官員們再次挑起這個問題，說這種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財富，使國家愈來愈弱，人民愈來愈窮。李鴻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夸大其詞地宣稱，“計洋商（每年）所贏之利，當不下3000萬”[[5]](#_5_Xue_Fu_Cheng____Chou_Yang_Chu)。

薛福成和許多其他同樣關心國事的官員因此提出了一個促進“商務”的理論根據。既然中國無法拒絕接受外國商品，它只能多生產自制產品供應國內外市場，以此來限制進口。這樣一來，貿易不平衡便顛倒了過來，而增加的財富就會加強國力。一旦把富和強這樣聯系起來，追求財富就變成新的自強計劃的動力了。為了在思想意識上重視這一新的自強計劃，它的一些倡議者轉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張把國家的財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有幾位士大夫為了使“富強”的舊口號重新流行起來，在19世紀80年代創作了一批新作品來表示他們的新信念，如馬建忠的《富民說》、陳熾的《富國策》、汪康年的《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和許多其他的文章（見第三章）。[[6]](#_6_Dui_Yu_You_Xie_Zhe_Lei_Zhu_Zu)的確，他們如此強烈地提倡他們的新的經濟思想，致使共產黨歷史學家也把他們看成是新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7]](#_7_Li_Ru__Can_Jian_Mou_An_Shi)

然而，這些作者的主要重點是放在現代工業上面。他們普遍認為經營商業最多只能起輔助作用。事實上，對外貿易活動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運輸困難、地方集市和地區市場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數商人對經商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一切都使得國內的商業仍按傳統的方式繼續進行。[[8]](#_8_Shi_Jian_Ya____Zhong_Guo_Nong)

更重要的是，成為現代企業主辦者的有權勢的官吏，對工業特別偏愛。從19世紀70年代初起李鴻章就爭辯說，僅有槍炮和炮艦，不能使一個國家強大；要使用它們和使它們運行，還得靠制造業、礦業和現代運輸業的支持；工業將創造這一伸張國力的新財富。[[9]](#_9_Li_Hong_Zhang____Li_Wen_Zhong)張之洞也認識到軍事力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強調他的信念，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優先于商業，所以他爭辯說，所有西方國家的富強都來源于煤鐵。[[10]](#_10_Jian_Li_Guo_Qi___Zhang_Zhi_D)

因此，中國在19世紀末之提倡現代企業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盡快地獲得受人尊重的國力。這一根本目的把見仁見智的政府官員聯合到一起，使他們能共襄工業化的盛舉。

###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變化

清末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因迷信現代工業能產生財富，財富又能產生權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業的重要性，認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業家之手。于是在發展工業的目標下，這些官員依次擔任了下列的新職務：先是當監督，繼之當經理，再當投資者，最后，有些人當上了官僚—企業主。在擔任這些新職務之后，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便提出了關于商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問題。

然而商人階級的性質的變化，比推進現代企業的時間要早。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期間，領得引票的鹽商和廣州的行商是中國最著名的商人集團。其他還有幾大類客商，即從事興隆的跨區域的絲、茶、藥和其他地方特產等貿易的商人。各商業城市的許多地方會館，聲名藉藉，就證明了商人社會的規模和影響。但是，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叛亂摧毀了賴以建立省際貿易的壟斷商業和經濟基礎。[[11]](#_11_Zhang_Peng__Yin_____1842__19)

19世紀后半期，起著新的企業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現了。最有名的是買辦。他們一開始是行商雇傭的伙食承包人，1842年以后逐漸改變了他們的職務而成為外國人的管事，接著變成了契約經理，最后終于成為和外商進行貿易的獨立的企業主。買辦和買辦商人觀察西方商業實際所得到的知識，使中國商人階級內部產生了新的經濟思想和新的社會態度。[[12]](#_12_Hao_Yan_Ping____19Shi_Ji_Zho)

第二類商人是金融商人，由于他們往往具有一般幕友所不具備的隨機應變的才智，他們被委以半官方職務，幫助正式官員制定財政政策和開征形形色色的捐稅。一個商人由捐納而取得有名無實的官銜，就能成為一位高級官吏的顧問和得力的助手，同時又可利用他的新關系為私人的或半官方的企業去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胡光墉，他是一位銀行商人，在19世紀50—60年代，他在當地建立了一個經營錢莊、當鋪、中藥店、絲綢及其他商品的王國。胡光墉的發跡是由于他的勤奮、幸運以及冒險精神。不過更加重要的是他榮麿過一系列要職，例如他曾當過巡撫王有齡和總督左宗棠的財政顧問和承辦商（見第四章）。[[13]](#_13_Si_Tan_Lai____Qing_Ji_De_Cai)

1870年以后，因為官員們開始主辦工業企業，許多買辦商人都被招聘去當官辦企業的經理。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官員被任命去幫助管理或監督各種新辦的企業。有些仍然保留官職，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辦企業方面。有些人干脆息影官場，用全部時間辦私人的或者半官方的事業。正像商人捐納官銜那樣，官員和士紳也紛紛從商，從而擴大了商人隊伍。到了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經商活動已經變成仕途以外另一個受人尊敬的選擇了。這些發展的結果產生了商人階級之內的新的“紳商”社會階層，這些人出于公私兩方面的原因，已成為致力于經濟現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業主。

這種有官紳背景的人涌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識形態上重新確立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1897年保守派御史褚成博在上疏時譴責傳統上對商人的歧視。褚成博雖然是一個大地主，并且是頑固守舊派徐桐多年共事的同寅，但他極力主張，現代工商業是解救中國免于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辦法。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文人王先謙走得甚至更遠。他宣稱如果官員們的口頭禪能與社會實踐分開，那么自秦漢以來，商人和手工業主實際上已成了中國社會的上層人物。王先謙得出的結論說，如果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商人階級必須領導全國的工業生產。[[14]](#_14_Zhang_Ting_Ju____Wu_Xu_Zheng)志在維新的士大夫也經歷了同樣的轉變。梁啟超曾經嘲笑商人愛推波助瀾和操縱把持，不久卻一變而恭維他們足智多謀和富于創業精神，極力敦促他們在大規模貿易和工業方面與政府合作。[[15]](#_15_Liang_Qi_Chao____Yin_Bing_Sh)

1903年4月22日在宣布商部率先成立時，上諭宣稱：“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16]](#_16___Guang_Xu_Zhao_Dong_Hua_Lu)

這道勸誡性的上諭承認了國家意識形態中的變化。大概因為一些新式工業項目是由高級官員熱心贊助的，所以它們的具有現代技術的經理就肩負一定的責任了。同時，大多數經理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會靠捐納得官晉爵而變成富人。商、紳、官，已形成一個新的紳商社會階層，但此時尚未變成一個佼佼的資產階級。在大商埠，紳商的數目很大，致使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價值觀、社會和政治傾向都變得十分與眾不同。但是他們仍然缺乏一個完全的統一目的，并且對傳統的鄉土和宗族關系仍承擔著強烈的義務。[[17]](#_17_Guan_Yu_You_Yi_Zhong_Duo_Sha)

## 官方對現代工業的贊助

自漢代初年起就一直有關于國家控制鹽鐵的爭論；一般同意法家的主張，即國家必須參與重大的經濟活動。雖然受到把節儉仁慈的統治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加以理想化的正統儒家的挑戰，但大凡雄才大略的皇帝和講求實效的官僚仍都贊成法家主張干預的思想。所以，關于這個問題的反反復復出現的爭論往往是關于國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質，卻很少涉及是否需要控制這一問題的本身。[[18]](#_18_Que_Shi__Guo_Jia_Zhi_Zhi_Din)原來的清朝官員和學者所能夠設想的是，只能在國家監督的范圍內去提倡工業。他們關于國家特權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由于新產生的國家危機感而得到加強，這種觀念使官員們相信現代企業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讓商人去辦。商人們同意這種意見，只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對任何大規模的新興企業來說，特別是當它面對外國資金雄厚的企業的競爭時，國家的倡導、支持和保護是必不可少的。

### 李鴻章的領導作風

在19世紀60年代，政府投資的官辦制造局和造船廠（見上卷第十章）直接關系到國防，所以沒有尋求私人資金或交由私人辦理。但是在70年代，當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潤為主旨的廣大工業領域的時候，一種官商合辦的新形式必然應運而生。由政府把這些工業組成國家壟斷是不現實的，其原因有以下種種。第一，盡管經營這類專賣有很長的歷史，但清政府主辦的只是鹽、銅和瓷器。重要項目如茶、糖、谷物、紡織品和航運等，絕大部分都是私有和私營的。第二，現代企業需要專業管理和技術才能，這些是官員們力所不及的。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庫根本沒有大量的能夠轉化為興辦大企業資本的閑置資金。

1872年，李鴻章倡議建立第一個非軍事性的現代工業，即輪船招商局，當時他不打算使它成為政府壟斷的企業，甚至也不希望它成為完全的官辦企業。李鴻章從鹽的專賣中引用了一個官僚主義的名詞“官督商辦”，顯然決心在尋求某種官商合辦的形式，即集鹽務、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傳統中國的合伙商號等特點之大成的形式。鹽務這個模式是很有用的，因為它早有吸收富商的傳統，使富商提供資本和管理技能，官員則保留全面的控制。西方的模式也是有用的，因為現代企業需要現代技術以及某種程度的西式管理。政府資金的支持將只限于貸款的形式。私人投資者提供金錢，在官方的贊助監督下經營，同時要承擔一切風險。[[19]](#_19_Guan_Yu_Li_Hong_Zhang_De_Ji)然而除了這些總的指導方針外，不論李鴻章或任何其他官方倡導者，胸中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組織格局。“官督商辦”一詞的含義依然是含糊不清，可此可彼，當后來的督辦如盛宣懷等人也用這個術語而官商之間的工作關系發生變化時，它的不足之處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李鴻章的官督商辦事業也用傳統的中國形式作為模式。西方的企業是召開股東會議以選出董事會和全體高級職員，李鴻章的企業則不是這樣，而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雇一名經理，畀以差不多絕對的管理大權。所有主并不逐日逐月地加以過問，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經理一道檢查一下業務，這個經理如果不令人滿意，也可以把他解雇。[[20]](#_20___Zhong_Guo_Jing_Ji_Yan_Jiu)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開辦的三大企業為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和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它們管理上的特點與一個傳統商號的特點是相同的。第一，他們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經理所領導，盡管他們全都捐納了官銜和擁有半官方地位。甚至在最初幾個月經理輪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個商人出身的官吏。朱其昂在擁有官職的同時，還繼續做帆船運輸的生意。[[21]](#_21_Guan_Yu_Zhu_Qi_Ang_De_Chuan)當朱其昂未能籌足私人資本時，他便在1873年由兩個前買辦唐景星（唐廷樞）和徐潤所接替。唐景星得到兩個正式官員——前任天津道臺丁壽昌和天津海關現任道臺黎兆棠——的幫助，創建了開平煤礦。這三個人訂立了開平礦務局的章程和組織結構。但是，當丁壽昌和黎兆棠離開的時候，開平礦務局幾乎沒有開始營業。兩個廣州商人徐潤和吳熾昌隨即來頂替，與唐景星一起辦礦。[[22]](#_22_Qia_Er_Sen____1877__1912Nian)

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又有另一個前買辦鄭觀應為他效勞，他和另一個最早建議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1880年，彭汝琮由于與其他商人投資者不和而離開，李鴻章留下鄭觀應，并任命了其他五個商人經理幫助他經營改組后的織布局。只有負責織布局官方關系的候補道臺龔壽圖原來是一名官員，但他也有從商的經驗。[[23]](#_23_Yan_Zhong_Ping____Zhong_Guo)這些人都是紳商。他們都捐納官銜，因為官銜已成為任何想進入官衙做生意或尋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絕對必要的條件。他們大多數人以前也是買辦。

第二，作為贊助人和保護人的李鴻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時，準許這些商人經理像企業主那樣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行動權。輪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國競爭者競爭而取得勝利，并且在1877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隊而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總噸位。開平礦務局在唐景星和徐潤負責時因利用商人資金而大大地擴大了它的資本。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在派別斗爭猖獗一時的時候，李鴻章也沒有插手下令大改組，一直到1884年鄭觀應離去，隨之喪失了投資者的支持和管理的知識時為止。因此，盡管唐景星、徐潤、鄭觀應、龔壽圖和其他紳商經理聽命于李鴻章而為他效勞，但李鴻章本人卻很像一個傳統商號的老板，一般不干預他們的生意活動。他保護這些公司不受官府過分的壓榨，而且多次及時地和異乎尋常地拿官方資金發放貸款，使這些公司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了他因增加取得個人收益的機會以及因提供保護而給自己帶來的好處。

第三，和傳統商號的消極的老板們一樣，這些早期的大多數股東并不對他們無權管理的情況提出疑問。像唐景星這樣的商人經理比較容易籌集商人資本，這說明這些股東的投資完全是出于對經理的忠心和信任。至于這種信任是否有保證，那是另一回事。1884年唐景星和徐潤被迫放棄對輪船招商局的控制，而讓位于李鴻章任命的總辦（先是由馬建忠擔任，后是由盛宣懷擔任），因為據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資金轉移去做他們自己私人的生意。在1883—1884年因中法沖突擴大而引起的上海財政危機，導致許多商業的失敗，其中包括與唐景星、徐潤和鄭觀應有關的買賣。當他們無力償還公司的資金而朝廷的御史們又開始彈劾李鴻章（說他包庇他們的不法行為）時，他們就不得不掛冠而去。同樣地，鄭觀應顯然曾把他籌集起來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資本挪為私用。這就導致他于1884年辭職，并使該局最后改組，同時移交給盛宣懷管理。

這些經營上的瀆職行為反映了傳統商號的辦事程序的缺點，即它沒有提供獨立的查賬人去稽查經理的賬目。這類財政上的不正當行為是傳統企業的通病，只要公司和經理把公司資金挪作私用而不出問題，這類行為就可以作為商業投資的風險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這和中國官吏之以私人名義利用或濫用財政收入頗相類似。他只要能夠繳足他的征稅定額，也不會被追問。

### 官督與商辦之爭

這樣，在1885年前后，三個最早的官督商辦企業中的兩個，其經營管理之權轉入了盛宣懷之手。盛宣懷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訓成為一名官員。他是李鴻章幕府的一員，幾乎在1873年輪船招商局開辦時就被委派在該局任職。1882年他雖然表面上已離開招商局去經管天津電報局（它也是一個官督商辦的企業），但是盛宣懷在財政經營上的才能使李鴻章合乎情理地挑選他做徐潤和唐景星的繼任者。有了盛宣懷當督辦，李鴻章就能夠更周密地執行官方的監督權了。盛宣懷不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總辦時業已存在的嚴重裙帶風以及濫用公司資金的弊病，并且還加劇了那些陋習，以及引進了更多的官僚主義經營方式。輪船招商局的船隊沒有增加什么噸位，同時由于它和兩個主要競爭者訂立了“聯營協定”，它幾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潤。這是指輪船招商局和兩個英國運輸公司——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之間的成文協定，它們訂出了統一的貨運率和集中它們的所有收入，然后再根據每個公司的實際運輸里程來分配收入。[[24]](#_24_Jian_Liu_Guang_Jing___Ying_G)

說到開平礦務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對它的總方針和財政擁有很有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年死去時為止；他們管理礦務局主要采用傳統商號的方式，而不是他們原來想要仿效的那種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就像他在經管輪船招商局時那樣，總辦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資金以投資于其他礦業、錢莊和投機事業，為他的私利服務。股東大會確實召開過，但都是敷衍塞責而已。未見有公布每年賬目的記錄，雖然公司章程明文規定要這樣做。唐景星也搞裙帶關系，他把他的兒子塞進公司，提升他擔任高級職務。當他在1883年旅游歐洲的時候，他還安排他的親兄弟代拆代行。但事實依然是，在他任職期間，開平礦務局的業務每年都在擴大，直到它的煤產量達到25萬噸左右為止。公司賺取了利潤，未受到關于揩油或貪污的直接指控。唐景星的確作為一位誠實而有能力的經理而享有盛名。他的任人唯親和其他傳統的陋習應該根據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來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標志著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新任總辦張燕謀是一個漢軍旗人和官僚，他的發跡主要依靠他的腐化的庇護人醇親王。在唐景星經管時，企業設備的擴充是靠新式商人的投資來實現的。但是自從張燕謀接任以后，商人們就不再資助，公司只能轉而向外國人借款，于是就為1900年以后外國人的控制提供了條件。

這些事態的發展和早期的情況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早期的時候，商人經理在籌足私人資金方面相對地說沒有什么困難。在唐景星和徐潤于1873年7月負責輪船招商局以后不久，招商局的實收資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差不多達到50萬兩，到1880年達到100萬兩。在1881—1883年期間，對公司的股票求過于供，特別在1882年，公司很快籌足了其被批準的資本額200萬兩。

輪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資者歡迎，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唐景星和徐潤操有實權，特別是在1882—1883年之間李鴻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懷暫時重新調任別處時更是如此。第二，采取等著瞧態度的商人投資者被回收的利潤以及李鴻章的寬厚的庇護態度所打動。因此，這個時期也可以看到商人們對李鴻章的其他兩個官督商辦公司同樣給予大量的資助。在1878—1882年期間，唐景星和徐潤為開平煤礦籌集了100萬兩銀子，而在1880年前后，在鄭觀應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籌劃的35.28萬兩銀子中絕大部分款項是他個人籌集的。

可是大約在1883年，商人的熱情衰退了，從那時起，越來越少的商人投資于這些企業或其他官辦企業了。有幾個因素促成了這一趨向。第一，現代工業的龐大資本和獲厚利的機會，使它成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標。第二，像盛宣懷這樣的官員在經營管理方面以及在安排政府的貸款方面獲得了經驗。第三，這些官員還發現，除了使用政府貸款之外還有其他籌措資本的來源，因為他們有更多的官方朋友用自己的錢投資，同時因為他們控制著幾個公司，使他們能夠把較老而實力較雄厚的公司中的資金轉移到一些較新而實力較差的公司中去。最后，這些官員改變了他們的顧問和保護人的角色而變成了名實相副的官方經理。出身于商人的經理如唐景星、徐潤和鄭觀應已經紛紛去職，這就傷害了其他商人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

現在不妨試舉兩個例子。在1887—1893年期間，盛宣懷利用政府貸款和轉撥輪船招商局和也由他控制的一家保險公司的資金，使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資本增至三倍，達到100萬兩左右。實際上卻并沒有增加新的商人資本。第二個例子是漠河金礦，它在1887年由李鴻章和滿族黑龍江將軍所創辦。他們任命了一個典型的官方經理李金鏞。李的功名不高，入過李鴻章的幕，與商人們交往甚密，以精于做生意而素負盛名。在1887—1889年期間，他在許多上海和天津商人朋友中間不斷活動，想籌集一筆為數不多的款項，計20萬兩，作為金礦的開辦資本。但他只籌集了六七萬兩。最后，黑龍江省庫不得不借給他3萬兩，另由一名天津商人在李鴻章擔保償還后提供了第二筆貸款，計10萬兩。[[25]](#_25_Gong_Jun____Zhong_Guo_Xin_Go)

雖然缺少的商人投資已經部分地由政府資本和政府貸款來彌補，但官方創辦人仍不斷想出新辦法來吸引投資者。一種鼓勵方法是給官員及其親友們以私人投資的機會。看來投資人都是那些負責人的親密朋友和同事。盛宣懷依靠的這樣一批為數不多的同僚給他辦的幾個企業提供過私人資本，這就是19世紀80年代初的天津電報局以及19世紀90年代中葉的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和中國通商銀行等。可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持批評態度的御史的敦促下，經常反對用公款去從事有風險的工業，并且要求提前歸還貸款。

但是，公款對提供官督商辦企業的資金來說，仍然是極為重要的。從19世紀80年代后期起，到李鴻章于1895年政治上失勢以前，張之洞的紡織業和采礦業等一批企業逐漸與李鴻章的企業互爭雄長。中級官員盛宣懷從來就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保護他的日益發展的工業網，所以他最初不得不投靠李鴻章，后來不得不投靠張之洞，以謀求政治靠山和獲得政府貸款的支持。因為清廷不愿意地方財政收入過分地投向工業，所以提交清廷待批的新的工業方案總是包含著允許吸引商人參加的計劃。張之洞的許多奏議中也包含這樣的計劃，雖然他不信任商人，而且認為他們的思想過于陳腐而不能接受新工業。這些計劃于是變成一種方便的掩護，因為許多省的創辦人知道，一旦方案得到批準，就總能從地方財源中找到一定數量的公款。出身世家大族的各省官員出于需要和私利的緣故，事實上卻日益依賴政府的資金來維持他們的新工業的運轉。因此，官督商辦企業的性質在19世紀80年代中葉已經改變，而越來越嚴重的官僚主義陋習不但無人非議，卻反而更加加強起來。

通過利用政府的資源，盛宣懷這個最有成就的官僚企業主控制了許多官督商辦的企業。他在為他的天津電報局尋找資本時，就這樣大量地依靠各省省庫和政府貸款，并利用現存電報線路作為貸款的附屬擔保品。只有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地區的那些商業上有利可圖的線路才能取得商人的投資。

另一相同的例子是盛宣懷從1896年起為張之洞經營的漢陽鐵廠。盛宣懷原應尋求私人投資來代替業已花在鐵廠的560萬兩官方資金這一驚人的數字，但他規避了這一義務。然而張之洞改變了這一大企業的地位，即把它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因為中央政府堅決拒絕再調撥公家資金用于這項工業。1894年以來，張之洞已奉朝廷之命邀請商人經營這一企業。他拖延了大約一年，辯解說他仍然需要再進行一些試驗，來證明業已找到適于煉鋼用的煤，不然商人就不愿參加。1895年10月16日他上奏清帝說，適用煉鋼的煤已經找到，而且其成品能獲高價。他現在準備邀請商人來治廠，但是他說為了讓商人有時間能察看廠址和礦場的位置，他需要政府再撥一筆款子以使鐵廠能維持運轉到年終。[[26]](#_26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1895年后期，張之洞受到朝廷很大的壓力，他只好接受盛宣懷的幫助而不管條件如何，盛宣懷則提出用每出產一噸生鐵抽一兩銀子的辦法來償還官本。盛宣懷本想從商人那里籌集一筆數目有限的資本來改善現有設備，但是這一著未能成功。他抱怨商人們因不能預卜采煤和煉鐵能否成功而抱觀望的態度。但是，作為與張之洞安排的一部分交易，盛宣懷得以從另外的政府資金中提出190萬兩，指定為京漢鐵路購買鋼鐵之用。到了1904年，從兩個來源籌集到200萬兩左右資本：較大的一部分從輪船招商局轉來，其余的部分從他本人以及一些官紳同事處得來（他們對他的其他官督商辦的銀行、輪船、電報和紡織等企業都曾經作過貢獻）。[[27]](#_27_Sheng_Xuan_Huai____Sheng_Sha)

把某一公司的基金轉到另一公司是盛宣懷常用的一種手法。在1890—1891年之間的某個時候，盛宣懷利用職權并且不顧會辦鄭觀應的反對（因為未與商人投資者協商過），從輪船招商局把大約30萬兩資金轉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1896年，盛宣懷又命令把另外兩筆巨款——輪船招商局的80萬兩和天津電報局的20萬兩——轉給他新辦的中國通商銀行。這兩筆款項各占當時那兩個公司的資本總額的30%或40%。[[28]](#_28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 張之洞對商人合伙的許諾

因為愈來愈多的商人不信任官方的意圖，所以從19世紀80年代后期以后，甘冒風險向官僚控制的企業投資的商人越來越少。官員們則另外提出一種讓商人參加的方案作為對策。這些官員利用種種新口號（它們可以歸納為一個廣泛使用的名詞：“官商合辦”），允許在國家和私人投資之間存在一種更加平等的合伙關系。

張之洞是第一個從他在長江中游的基地武昌把新口號應用到工業項目的主要人物。他曾經在必須適應西方這一點上表現得很遲鈍，但他在19世紀80年代初就改變了他的觀點，并且深刻了解到建立工業的重要性。張之洞認為他于1889年開設的最早期的工業湖北織布局是一種官商合辦的企業，雖然他為這個織布局所做的一切安排，與他在同一成規下贊助的其他一切紡織業或與紡織有關的工業是完全不同的。1888年當他在廣州任職的時候，他就想出了一種籌足資本來開辦一個紡織廠的新方法。張之洞在奏折中提出了一種含糊其辭的“官為商倡”的政策。[[29]](#_29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張之洞的新方法實際上是對廣州的所謂闈姓商人所征的稅（這些商人被特許辦彩票，彩票的獲獎者必須準確地猜中每次科舉考試中式士子的姓氏）。[[30]](#_30_Guan_Yu_Zhe_Zhong_Li_Qi_You)1889年，張之洞強迫他們捐款40萬兩；1890年，除正常稅收外再要他們捐獻56萬兩。一年后他上報了這些額外稅收，因為當時他調任為湖廣總督，所以他不得不請求清帝批準他把資金和廠址從廣州遷往新任所。從廣州彩票商籌集資本在漢口辦紗廠是個不尋常的方法，張之洞為此辯解說，正規的商股的征集往往費時誤事，他希望一旦企業變得有利可圖時在商人中間會引起更大的興趣。廣州的資金能夠這樣用來辦湖北的一個企業，這是張之洞取得北京支持的一個標志。彩票商人的“捐獻”事實上是一種征用。然而張之洞卻把這一政府收入的不尋常來源看作是完全控制工廠的一種手段。除了請求恩準他把資金和廠址遷移到華中，他的奏疏還要求借用一些政府的資金；繼任他署廣州總督的李瀚章只允許他從地方彩票特稅中帶走他獲準的收入的一半多一點。湖北織布廠終于建成，它名義上雖是官商合辦企業，但事實上“商人資本”卻是用強制手段取得的。

不過，只要行得通，張之洞并不反對商人的合作。雖然他對商人的能力和愛國心的評價并不甚佳，但他很現實，認為商人的支持是必要的。1894年，張之洞為了大力擴充織布局的資本，允許給任何新的投資者以每年“官利”15%，此舉顯然取得了部分成效。[[31]](#_31_Wang_Jing_Yu_Bian____Zhong_G)但是，他仍然不許商人負經營管理的責任。

織布局總辦是張之洞的幕僚之一，名叫蔡錫勇，1896年蔡死后由盛春頤繼任。他們兩人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蔡錫勇畢業于同文館，曾做過陳蘭彬班子中的語言專家，后者在1875—1881年期間擔任過中國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等國的公使。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張之洞對他的西方知識和自強思想印象很深，便聘請他工作，于是他立即成了張之洞的近代的工業、軍事和教育項目的主要設計者和監督者。[[32]](#_32_Li_Guo_Qi____Zhang_Zhi_Dong)關于后任盛春頤的情況我們知道的很少，但是看來他的近代企業方面的知識較少。盛春頤的接任大約是在1896年，恰恰是在張之洞的幾個工業項目開始越來越困難之時。

然而，湖北織布局一開始就有一些問題。雖然它最初是有利可圖的，張之洞卻不僅利用它的利潤，而且還利用它的一部分資本來支持他的其他虧損的企業。漢陽鐵廠在它于1896年改組之前，從織布局共抽走了34萬兩，只歸還了大約6萬兩，還是運費和保險費。在織布局和張之洞其他企業之間的這種賬目不清的情況，以及官僚主義的浪費和織布局為應付其本身需要而必須支付的高利息，更使公司的財力枯竭。到1902年，當它的虧損迫使張之洞把它讓與私人的時候，它從政府方面得到的貸款至少已達68.3375萬兩。[[33]](#_33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

張之洞的第二個紡織企業是湖北紡紗局，它的官商合辦史更加典型。[[34]](#_34_Tong_Shang_Shu__Di_579__591Y)它開辦于1894年，其時張之洞正獲得幾個商人對他的舊的織布局的支持。張之洞向清帝許諾，準許商人投資者成為合伙人。但他未能詳細地提出怎樣去實施這種合伙關系。雖然他用了“官商合辦”和“招商助官”等詞來說明官商合作的新形式，但是他上奏清帝請求敕準的奏疏的大意，仍與官督商辦企業相差無幾。

不過有幾個商人的反應是積極的。到1887年，他們為了這個新的紡紗局提供資金約30萬兩，亦即資本的一半。看來當張之洞任命一個高級官員做督辦和盛春頤做總辦的時候，商人股東至少對機器和公司賬目擁有控制權。然而在1897年期間，當紡紗局準備開工生產的時候，張之洞任命王常川道臺做他的局中常駐代表，負責督辦事宜。合伙的商人對張之洞的有增無減的干涉已經越來越不愉快。王常川被任命為局中官方常駐代表一事把他們的快要爆發的不安變成了公開的反抗。王常川的回答是要保護政府參與公司管理的權利，因為政府業已提供了半數資本。

他們其后是怎樣辯論的就不十分清楚了。看來張之洞力求磋商出一個妥協方案。但妥協方案被拒絕，1897年7月，商人們退出了。根據張之洞的說法，商人們不但要全部管理權力，而且另外還要20萬兩借款。作為報償，原來的政府股金30萬兩轉為貸款，付給預先決定的保證利息。[[35]](#_35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張之洞宣稱他同意這些條件，但附加的20萬兩借款卻未予同意；因此，商人們決定退出。張之洞可能堅持過要有某種政府控制的形式。與官督商辦形式下所處的地位相比，避免這種控制對商人來說應該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確實，官員和商人的作用就會顛倒過來。在官督企業中，歸根到底是利用商人資本的官員負責管理。按照張之洞的條陳所說，商人們在新的方案之下可以利用政府資本，并且仍然對工廠管理有控制權。至于說到官方放出貸款所收的保證利息，它和許諾給所有私人和官方資本的“官利”很相似，而不管這種資本是投放到官督企業還是投放到其他種類的企業。

無論如何，到了1897年夏，紡紗局本質上變成了一個官辦企業。商人投資額的一半是立即償還的。另一半則用在一年以后到期的債券償付。這顯然引起了很深的反感。提倡新工業而又得到官方支持的紳士張謇報告說，在張之洞和商人之間發生破裂以后，他在為創辦一個私人紡織廠而大力籌集資金時遇到了很大困難。曾經向張謇提出金錢保證的許多私人投資者也都撤銷了他們的支持。[[36]](#_36_Zhang_Jian____Zhang_Ji_Zi_Ji)湖北紡紗局的經營未能賺取利潤。1902年它仿效湖北織布局而被租給了一家私人公司。

張之洞總督遠未被這些失敗所阻，他在1905年和1906年試圖再次大干一番。這一次他公開承認，政府干涉近代工業的管理是錯誤的，他提出倡辦其經營將對股東們負責的經過改革的官商合辦公司。張之洞還答應私人投資者，他們在湖北和湖南兩省擁有生產和銷售的專利權，并且在頭五年期間保證投資者能獲得其本金的百分之五的利潤。政府的控制限于：第一，政府的審計官定期檢查公司賬簿；第二，在第六年，政府和公司一起決定每年的合理的稅率。

張之洞希望這些寬厚的條件能夠吸引商人大規模地向他的新的合股公司投資，同時希望政府資金在需要時也只是少量提供而已。這些希望破滅了，因為原計劃資本為80萬兩的一個氈呢廠，在1906年開張時官方資本為30萬兩，而私人資本只有10萬兩。兩年以后，氈呢廠因缺乏流動資本而倒閉。還有幾個其他的企業，包括紙廠、玻璃廠、水泥廠、針釘廠和皮革廠等，都只辦了很短時間就關了門。失敗的原因總的說來顯然是沒有經驗和管理不善。就針釘廠而言，它是由歐洲進口的最新機器裝備后于1908年開辦的。然而總辦毫無辦廠經驗。說得更確切一點，他曾做過張府西席，可能他就是因為這一關系才得到此職的。1910年在他宣布該廠破產以后，他被告發、定罪和坐牢，因為他至少侵吞了公司的公款5萬兩。[[37]](#_37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

張之洞答應和商人保持比較公平的合伙關系，仍不過是口惠而已。首先，他要求辦的每件事都貼近他自己。他辦的織布局跟著他從廣州遷到武昌。他的煉鐵廠就在他衙署的隔壁，雖然該廠既不靠近產煤地，亦不靠近鐵礦。張之洞不肯授權給別人，只相信自己才能夠密切地進行監督。特別是在他的助手蔡錫勇于1896年死后，他對他的一些官方總辦都不信任。還要提一下，不論蔡錫勇或者盛春頤，看來都不是干練的總辦。

張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的幫助方面，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的顧問中間沒有一個出色的買辦。也許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他一向低估商人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搞工業發展的路子與李鴻章的路子截然不同。李鴻章從商人和官吏隊伍中起用了許多優秀的經理和行政人員，而且知人善任。但張之洞作為一個近代工業的提倡者，因缺乏才干如盛宣懷或唐景星的助手，所以他對工業發展的貢獻嚴重地受到了限制。

### 幻想逐漸消失

在19世紀末，商人們越來越不情愿對官辦近代企業進行投資，這不僅是由于給予他們的職責不夠。當其中任何一個公司倒閉的時候，它們所在的省政府常常要求把公司剩余的資產優先償還官債，給商人股東的就為數不多了。1893年，煙臺繅絲局在經營十多年以后關門了。在它滿足了政府的全部要求以后，官方經理們只給投資者每股10兩，而他們原先每股付了200兩；如果第二次認股又每股付出200兩，則可得20兩。這種做法顯然沒有和投資商人充分商量過，根據徐潤的記載，他們對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滿。徐潤不是盛宣懷的朋友，他指責盛說，盛宣懷后來接收繅絲局之后就把它變成了一個唯利是圖的買賣。徐潤于是評論道：“（官方經理）有強權而無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勢，無可如何，只可隨眾而已。”[[38]](#_38_Xu_Run____Xu_Yu_Zhai_Zi_Xu_N)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來證明官員們本身洞悉商人的不滿。當劉坤一總督被詢及關于采用官督方式建造鐵路的意見時，他在1895年的奏疏中說：

若復狃于官督商辦之說，無事不由官總其成，官有權，商無權，勢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疊出，從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織布等局，成效可觀，究之經理歸官，利又無幾，于商情終形隔膜。[[39]](#_39_Li_Guo_Qi____Zhong_Guo_Zao_Q)

劉坤一總督的分析也適用于官商合辦企業，因為這兩類形式實際上差不多。

盛宣懷完全知道商人們怨聲載道。就在徐潤指控他不公平地對待煙臺繅絲局投資戶那一年的晚些時候，盛宣懷試圖對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股東們訂出一個比較公平的補償辦法（該局在1893年焚毀）。他得到李鴻章的同意，拒絕了政府關于收回官方貸款26.5390萬兩的要求。然后他表示愿意從織布局剩余的資產中以現金付給商人，同時再用該局的后繼企業華盛紡織總廠的股票償付。結果是商人股東獲得償還的現款合他們最初投資的二成，其余則為華盛的股票。不過，如果盛宣懷以為對商人投資戶這樣明顯的示惠就會吸引他們重新向華盛投資，那他就大失所望了。商人們仍然疑慮重重，而且由于他那個小圈子中的商業伙伴們都是鋪面不少而資金有限，所以華盛的資本一直不敷。華盛紡織總廠開始很有希望，以后在短短的幾年中一直賠累，直到1901年為止。1901年，盛宣懷得到清廷許可，在宣布所有華盛的股票（包括那些為兌換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舊股票而發行的股票在內）一律無效以后，就把華盛紡織總廠變成了一個私營公司。[[40]](#_40_Xu_Run____Xu_Yu_Zhai_Zi_Xu_N)

然而，商人對官商合辦的新工業也不是完全沒有感情的，這就是這類企業一直到清朝滅亡時和滅亡后仍陸續在開辦的原因。如果說人們對它的幻想大大地破滅的話，那么他們也普遍地認識到在外商競爭的面前必須有官方參加。鄭觀應所表現的這種對政府若即若離的感情就是最好的例證（他本人至少是兩個這類企業的商人兼總辦）。一方面，鄭觀應承認商人需要官方的保護，因為在中國沒有商法和憲法來保護他們的權利和財產。所以他提出，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辦法是可取的。另一方面鄭觀應覺得，這個辦法只能臨時解決問題；最終還是應該制定出一項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法律來保護商人。

鄭觀應爭辯說，官僚機構的腐敗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地減少了某些企業的利潤，造成了另一些企業的失敗。在提到三個贏利的官督商辦企業，即天津電報局、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時，他大聲疾呼道：如果讓它們全由商人經營，則“其所收效果寧有涯涘！”[[41]](#_41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鄭觀應還觀察到這些企業的開辦過于依賴各省官方贊助人的一時興致。雖然人們承認李鴻章很開明，不會對官督商辦企業科以重稅，但“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識大體”。[[42]](#_42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后來，鄭觀應在民國初年寫作時，對清政府卷入各種工業之舉諷嘲備至。他譴責官員們“損下益上”，反過來還要假裝幫助商人。他回憶了天津電報局在20世紀頭10年的末期如何對其股東沒有作出適當的賠償就收歸國有的情景。他拿這種情形和日本政府的政策來對比，日本對新型的和新生的工業給予財政資助，并且提供管理人員，讓它們順利通過開辦之初的歲月。鄭觀應于是提到他從日本友人處得知的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日本人開辦一個煉銅廠，在頭幾年虧損慘重，差不多要宣布破產了。這時政府進行干預，它先作調查研究，然后嚴辦了那些貪污腐化的辦事人員，并在資金、管理和一般的監督方面給予幫助。幾年以后當該廠開始賺錢的時候，政府放棄了對該廠的一切權力，把權力交回給商人董事們。鄭觀應暗示，中國政府對它自己的企業也應該以此為法。[[43]](#_43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因此，官商合辦到底該如何進行，在這方面仁智之見大不相同。商人們歡迎官方的提攜和眷顧。他們至少在草創時期甚至會接受以政府的貸款和管理指導為形式的國家控制。相反，張之洞、盛宣懷等官方主辦人對這種官商合伙關系的概念卻大異其趣。由于國家沒有多余的資金搞這些經濟事業，所以一定要利用商人們的財源和吸收他們的資本來為國家的目標服務。近代企業雖然能使中國強大以對抗西方，可是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完全交給商人去辦。官方一定得保留控制大權。

根據國家在中國經濟中的傳統作用來看，很難挑剔官員們對國家的控制所持的自以為是的看法。但是在保持這些控制權的過程中，他們超越了李鴻章最初主張只進行一般監督和扶助的想法。他們直接插手經營管理；同時由于他們一身而兼官方經理和私人投資者身份，所以自然而然地會產生混淆國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傾向，并且從為國家效勞的立場轉而后退到追求他們的一己之利。因為越來越多的官員與近代企業發生關系，這類傾向也日益嚴重，直到它們開始形成中國式的工業發展時為止。

## 創辦私人企業的運動

很難說究竟是由于官僚的控制還是資本的不足，才使清末近代企業的發展受到更大的壓抑。這兩個問題是相互聯系的。如果籌集到足夠的資本（不管是來自政府外部或政府內部），那就必須采取一些措施來減輕官僚控制所產生的那種窒息企業的影響。自1873年以來曾號召公開征股，但結果不好，因為商人們對官方提倡者的用心采取戒備態度。

然而，大約1900年以后，許多這類籌款運動能成功地籌集大量資本。輿論的改變使得投資者愿意提供資本了，但條件是公司要商辦。中央政府也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以幫助增強公眾的信任。盡管國家的這些措施往往不能很好地付諸實踐，但是它們還是適應了私人投資者求取法律保護的要求。

不過，促使公眾越來越給予支持的最大動力還是新世紀日益高漲的政治氣氛。大城市的重要商人團體組成了自己的商會，以進行一些政治運動，如抵制外貨，或者要求中國人參加外國人主持的上海工部局。[[44]](#_44_Li_Ru_Can_Kan_Ai_Er_Wen_De)這些出于愛國心而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關注，不久就集中在外國對中國工業的控制這一經濟問題上。既然政府看來不愿意或者無力防止外國人的控制，所以有政治覺悟的商人和紳士現在就以此為理由來積極推動創辦私營公司。這些運動取得了巨大的規模和力量，因為愛國主義因夾雜著私人利益而得到加強。

### 私營鐵路和經濟民族主義

一個深得民心的運動是從外國公司手中收回鐵路財政和鐵路建筑的權利。[[45]](#_45_Ling_Yi_Ge_You_Zhu_Tong_Yang)近代工業雖然在開始提倡的時候是要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時卻正落到外國資本家手中，因為國家寧愿向外國銀行借款，以保持對一切實際上快成為外資企業的徒具虛名的控制。在對這類事情進行爭論時，各省紳商積極分子把商辦變成了政治問題。他們的抗議不再屬于經濟性質，而是政治性質的了，“商辦”在抗議聲中被看成是保全國家經濟實力以對抗外國侵略的行動，而國家的創辦卻被看作是與西方銀行家相勾結的行徑。完全獨立的、無留難的、不受本國政府和外國人控制的私營企業，就成為收回利權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然而國家卻認定，鐵路不像紡織工廠，它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所以不能讓私人企業家去經辦。在19世紀90年代期間，張之洞作為督辦中國第一條重要鐵路的官員，曾慷慨激昂地爭辯說，鐵路影響著國家的利益和主權。他承認，私人資本能夠補充國家貸款或外國貸款之不足，但是官員們一定得保留最終的決定權。

粵漢鐵路首先對張之洞的見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戰。1904年，廣州七十二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領袖組織了好幾次人數眾多的集會，要求把粵漢鐵路的建筑權和財權還給中國人。這些權利業已由中國政府授予一個美國組織——美華合興公司。在漢口，張之洞支持甚至煽動了一個同樣由商人和紳士領導的恢復利權的運動。使地方感情突然爆發的表面原因是鐵路建設遲延了，以及美華合興公司占有的、數量足以控制鐵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經認可就被賣給了比利時辛迪加組織。不過，造成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純粹是對外國特許權和貸款所產生的日益增長的敵對情緒。

在1905年內，美華合興公司的控制權又被美國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復權運動從參加了幾十個群情激憤的集會的成千上萬商人、學生和紳士那里獲得如此聲勢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會發生地方叛亂，所以它不得不強迫美國人接受贖買的協定。

廣東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籌集地方稅來建筑鐵路。地方紳商領袖大力倡議私營鐵路以后，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反應是逮捕紳士領袖和商人領袖各一名。但是這個行動起了相反的效果，因為1906年初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店員重新活動了起來；他們在前些時曾參加過許多恢復利權運動的集會，但是他們后來退出了關于公司資金來源和行政管理問題的爭論。現在，少數幾個主張鐵路私營的領袖一經岑春煊指責，他們的反官辦的行動反而大白于天下，并且深得民心。接著召開了幾次集會，或者通過決議對省撫之計劃征收附加稅表示遺憾，或者組織支援代表團去訪問被監禁的領袖，或者保證募款資助成立一個私營鐵路公司。[[46]](#_46_Xiang_Gang___Hua_Zi_Ri_Bao)

清末近代企業不能通過公開征股來吸引民眾的支持，因為股票價格太高。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曾經有過幾次征股活動，但每股的票值都高達100兩。當時一個店員的平均工資是三塊銀洋一月（約合二兩三錢銀子），而此數足以養活一個小小家庭，所以100兩銀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年的這些集會攻擊了這種一貫的高昂價格，堅決認為建造鐵路所需的巨額款項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們通過決定，主張發行一種可以分期攤付的低面值股票。他們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約合4兩銀子）的辦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內三次付清，這甚至使貧寒學生也能認購。在1906年2月共籌集到第一期認股款1648788元。這次運動計劃籌集2000萬元作為私營鐵路公司的資本，它進行得很順利。

這個公司正式取名為粵漢鐵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請要求取得商辦地位。為了保持對政府的壓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廣州商人源源不斷地提出保證，但都以取得商辦地位為條件。[[47]](#_47___Hua_Nan_Chen_Bao____1906Ni)

不論是北京的或者廣州的當局，都不能抵擋這樣一個有群眾支持的強大的示威。1906年4月，前買辦和實業家鄭觀應，被地方行會和慈善堂領袖組成的組織委員會選為粵漢鐵路公司總辦。商辦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準。同年6月21日鄭觀應就能夠上報說，收到的第一期認股款已逾880萬元。這是中國直到此時為止不論用哪一種方法所能籌集到的最大的一筆資本。

但是，雖然得到私營權利，并沒有終止關于對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導的爭論。在以后五年中，該公司即以商辦企業來經營。但是這五年中危機不斷。首先是被選舉的高級職員的合法性問題。鄭觀應之被選為總辦，受到一些股東的反對，直到他被迫辭職而由梁誠接替為止；梁誠這名官員是剛卸職的駐華盛頓公使。股東中間的派別活動隨之產生。董事之間互不信任，結果只好用互相制約和平衡的辦法，以劃分職責范圍，這樣甚至使總辦無權對整個企業進行協調，更說不上進行管理了。[[48]](#_48_Zheng_Guan_Ying____Sheng_Shi)

這一切都促進了股東們的戰斗性和公眾的警覺。當公司賬務管理不善和高級職員中間貪污成風被宣揚出來時，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機會。到了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營和半私營的鐵路都收歸國有，部分原因是廣州鐵路像另一條重要的私營川漢鐵路那樣也是一個失敗。在移交的時候粵漢鐵路公司實收資本約1600萬元，其中已花的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5英里長的鐵軌。像這樣低的效率，再加上公開揭發出來的高級職員貪污之風，就使商辦公司的信譽完全掃地了。國有化引起抗議。但是大多數抗議者之所以情緒激昂，與其說是因為私營企業的告吹，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收到償還的現金只有自己資本的六成。

在這幾年期間，另一個商辦的滬杭甬鐵路公司的歷史與此有驚人的相似之處。[[49]](#_49_Guan_Yu_Zhe_Tiao_Tie_Lu_Zhon)1907年后期，在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有時是很劇烈的運動以后，浙江地方紳商領袖收回了一家英國公司的筑路權，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認購后五年分期繳清）的辦法籌集資本。浙江鐵路公司是建造一條橫貫長江下游南岸的鐵路的兩個省辦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貪污腐化、工程質量差、管理上的爭吵和公眾支持的日益減少，很快就受到了打擊。以進步聞名的士大夫湯壽潛由于他在收回利權運動中一向是直言無隱的領導人，所以在1905年被選為修建滬杭鐵路的總辦。過去人們抱怨湯壽潛狡猾、固執和驕傲自大，現在則轉而贊揚他的提倡立憲運動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力。

1909年，湯壽潛為了對批評他的人讓步，提出辭職。但是這一行動反而為他的黨人提供一個展開強有力的挽留運動的機會，來顯示他們的力量。在他這樣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湯壽潛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職，此事又引起了對私營效率的懷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過群眾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頭腦的股東購買股票是為了抵御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他們容易抓住新得的股東權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務，特別在涉及私營公司和國家之間的事務時更是如此。結果是使受到群眾支持的私營企業帶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湯壽潛被免職一事，驅使為數眾多的股東們集會于上海，他們通過決議說，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個經過正式手續選出的公司高級職員革職。他們援引北京前幾年頒布的公司商律第77條，上面規定，每個公司的董事會享有任免公司職員的權利。整個9月還繼續開了幾次會，有些集會開成了群眾示威活動。寧波的一次集會參加的人達萬人以上。該公司以這樣的民意支持為后援，便徑直和浙江巡撫增韞及省咨議局打交道。省咨議局認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視它自己所規定的法律，特別是在清帝鼓勵要實行憲政的時候。浙江巡撫增韞最后答應把這個決議正式轉呈北京。省咨議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務相威脅。

但是郵傳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張之洞的標準論點，即鐵路涉及國權，因此甚至那些處于商辦地位的鐵路公司也仍然要與政府保持一種特殊關系。所以每個鐵路公司的總辦和會辦在選出以后，得經郵傳部正式任命。郵傳部的結論是，鐵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職的命令仍然有效。[[50]](#_50___Dong_Fang_Za_Zhi______Zhon)

浙江公司股東們的反應是派一個代表團去北京，郵傳部侍郎堅持第77款不能適用，因為湯壽潛是在郵傳部把公司股東們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經清帝批準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權把他革職。至少就鐵路來說，“商辦”實際上與“官督商辦”并無不同，因為國家保留了選任高級職員的權力。

對廣東和浙江兩鐵路來說，更加嚴重的問題是經營管理的作風問題。雖然梁誠和湯壽潛兩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兩人都使公司最后陷進了官僚主義的辦事陋習之中。梁誠成為浪費和無能的犧牲品，后來竄改公司的賬目為他私人謀利益。湯壽潛支持有關地方紳士利益的事業，使公司與中央政府發生了沖突。關于這兩個鐵路公司經營不當的情形愈公開，就有更多的人逐漸了解，商辦不是一種為了公眾福利而必須爭取的權利，而是一種使公司的董事和經理發財致富或授予他們政治權利的特許證。浙江鐵路公司短期內保留過有名無實的商辦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國家所接收。這兩條鐵路沒有一條是真正由商人們經營的企業，這個事實反映清末的大工業幾乎不可能擺脫與官僚主義的聯系而獨自發展起來。

### 私營企業茂新面粉廠

有幾個近代企業得以規避了官方的主辦和買辦的經營。它們由傳統商人的財力興辦，因為這些商人已經認識到機器能夠被用來謀取更大的利潤和提高生產力。此種企業中第一個成功的嘗試是茂新面粉廠。[[51]](#_51_Guan_Yu_Mao_Xin_Chang_Zao_Ni)從1901年開始，這個廠即由江蘇無錫的兩兄弟榮宗敬和榮德生開辦。雖然榮家與官方有著某些并不重要的關系，但榮氏兄弟卻是非紳非官。他們的父親只不過是政府的一個主事，他送長子榮宗敬到鐵匠鋪當學徒，又送次子榮德生進學堂念書。榮德生愿意學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兩個錢莊里當了三年學徒。

滿師后，榮德生在一個政府衙門里謀得文書的職務，榮宗敬則在一家上海銀行繼續工作。在1897—1898年期間兩兄弟都在上海的時候，其父親帶領兩兄弟決定邀約幾個朋友開設他們自辦的錢莊。錢莊開業以后不久其父即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資者便把股票都賣給了榮氏兄弟。大約在1900年，榮宗敬和榮德生開始對面粉廠發生興趣。榮德生發現盡管面粉市場越來越興旺，但因為面粉被視為專給外國人消費的進口貨，所以它仍然是免稅的。競爭是微乎其微的，全國共只開設了四家面粉廠：天津、蕪湖各一家，兩家在上海。上海的兩家中，有一家是美國人經營的，另一家則為軍機大臣孫家鼐的兒子孫多森所有。不過，榮氏兄弟搞近代工業完全是外行，他們不知道需要什么機器，更不知道辦整個廠得花多少錢。和他們打交道的面粉廠都不讓他們參觀工廠。榮家兄弟詢問一家進口美國機器的洋行，得知開設一個小型工廠，單購機器一項約需8萬兩銀子。最后他們找到一些英國造發動機，帶動四個法國造的石制研磨機。為此他們總共只花了不到2萬兩。

這筆巨款實非榮氏兄弟所能籌集。幸運的是，榮家的恩主朱仲甫前來過問并給予幫助。朱仲甫剛剛弄丟了一頂不大的烏紗帽，正在找機會進行合適的投資。他和一個朋友一起為這個新公司提供了3萬兩資本的半數。榮氏兩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6000兩，他們的幾個親戚則出資補足剩下的9000兩。

但是他們發現，甚至在工廠開工以前3萬兩資本總額也是不夠的。在1902年，榮氏兄弟實際上把他們錢莊的全部利潤1萬兩都轉給了面粉廠，從而使他們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們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為這時他們錢莊的新收益使他們能夠買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當時已決定放棄他的股權，因為他準備離開上海另就新官職。接著面粉廠改組。在其他朋友幫助下，該廠實收資本已增加到5萬兩。面粉廠的名字由保豐改為茂新。這一切剛安排就緒時，日俄戰爭爆發了。而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廠開始賺錢。

公司成功了，于是決定試用比原來石制研磨機更好的機器。1905年，它廉價購進六臺嶄新的英國造鋼質研磨機。這是一種新型號，因而英國出口商急于要在中國試驗其性能。它們證明是一大成功，因為1905年因產品改進，產量增加，茂新面粉廠在那一年的盈利達到6.6萬兩。這筆利潤再加上錢莊賺的錢一起，又被投入了面粉廠。1905年1月11日當茂新面粉廠作為一個私營有限公司成了向中央政府注冊的第四個企業的時候，它已經宣布它企圖把資本增至6萬兩。[[52]](#_52_Nong_Gong_Shang_Bu_Tong_Ji_C)

榮氏兄弟于是想法擴充業務，到另一近代企業領域中去發展事業。在1906年和1907年，他們約集一些親友在他們的家鄉無錫開辦一個棉織廠。他們把面粉廠這幾年得到的利潤投作資本。但是，日俄戰爭結束以后棉花市場萎縮不振。面對不穩定的前途，他們迅速把款子抽回面粉廠。于是他們一直等到1915年才進行經營棉紡業的第二次嘗試，這一次卻獲得了成功。與此同時，他們的面粉廠繼續蒸蒸日上。1908年，他們在無錫建立了第二家面粉廠。它在1910年，接著在1914年，都一再擴大業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面粉停止進口，榮家的面粉廠和設在上海和漢口的分廠都飛速發展，直到1914年，每天平均生產面粉8000袋。到1929年，榮氏兄弟控制著大約十二個面粉廠，一天生產10萬袋面粉，為中國機器工廠所生產的面粉總產量的六分之一。

榮氏弟兄是第一批轉營近代工業獲得成功的傳統商人，他們幾乎沒有官方照顧和官方財政支持。他們沒有買辦的經驗，他們的工廠是用他們錢莊中積累的資金，以及用他們面粉廠的盈利進行再投資而開辦起來的。

然而它們也不是毫無官僚資源的幫助。首先，朱仲甫的資金在榮氏兄弟經濟非常拮據的創辦時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仲甫的參加很可能使這個新企業的威信和保證得到了必要的提高，這才能夠使榮氏弟兄勸說親友出面投資。

其次，他們在建廠時碰到了官僚的反對。受到官員支持的地方紳士抱怨工廠的煙囪高聳入云，根據風水，它會給當地帶來災禍。雖然現存的材料沒有說明這位非高官顯宦的朱仲甫在后來的商談中起過什么作用，但是可以保險地說，他在商定最后的解決辦法時一定出了很大的力，從而得以在很少的限制下建立這個面粉廠。

第三，榮氏本族略有官僚背景。榮家父親和弟弟曾一度當過低級官差。他們從仕宦中得到的錢大概就是他們先在錢莊以后在面粉廠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開辦資本。我們把這些“官僚影響”加以考慮之后就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茂新面粉廠的成功代表中國傳統商人的新發展。但是，茂新的資本很少，僅幾萬兩銀子，與擁資二三百萬兩的官督或官辦的大紡織廠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來看，要吸引大量投資或經辦一個大型近代企業，如果沒有密切的官方合作是不可能的。

唯一真正的例外是這個時期由廣東華僑商人在香港建立起來的為數不多的近代大企業。有三個重要的近代企業：先施公司，于1900年由馬應彪創辦，資本2.5萬元；永安公司，于1907年由郭樂、郭泉兄弟創辦，資本15萬元；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于1906年由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創辦，資本10萬元。先施和永安兩公司都是百貨公司，它們是仿照馬應彪和郭氏兄弟在澳大利亞的兩爿百貨公司開設的，他們最初就靠那些公司賺了錢。簡氏家族同日本、越南、泰國、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地方都有商業聯系。因此，他們辦企業的精神和方法都得益于傳統社會之外的力量。直到1912年，先施公司在廣州開設了一個分公司，兩年以后又在上海開了第二個分公司。永安公司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起而效法，在20世紀20年代，這三家公司都變成了重要的私人企業。不過，它們在清朝末年創業的成就是在中國政治力量的范圍之外取得的。[[53]](#_53_Xian_Shi_Gong_Si____Xian_Shi)

### 新的行政章程和法規

私營企業應該在國家工業的發展中起一定作用，這個思想引導人們去努力爭取政府對私人企業活動的保護。政府在京師新設的各局制定了關于確定商人的身份、組成私營公司、確立專利權利和破產程序等等方面的行政章程和法律。1904年1月21日首先頒布的綜合章程有《商人通例》九條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一條。以后又頒布了公司登記法（1905年）、破產法（1906年）和專利權法（1906年）。[[54]](#_54_Nong_Gong_Shang_Bu____Nong_G)其中以公司商律最為重要，因為它承認了五大類商、工企業：（1）兩人或兩人以上的無限合伙企業；（2）兩人或兩人以上的有限合伙企業；（3）七名或七名以上股東的無限公司；（4）七名或七名以上股東的有限公司；（5）獨自經營和具有無限責任的商號。1904年設局專門登記這些公司。

結果是引人注目的。在1904—1908年期間，向該局登記的公司約272家，它們的核準資本總額接近1億兩銀子。不過這個數字是夸大了的，因為實收到的大概只是核準的資本的半數或不足半數。這些公司也不都是近代企業。這272家公司中有44家是傳統的個體經營的當鋪、錢莊、中藥鋪或其他批發和零售商店。不過大多數（272家中的153家）都是近代的股份有限公司。它們占全部資本積累額中的絕大部分。到1908年，它們事實上的確形成了全部中國現代化的企業。[[55]](#_55_Gen_Ju___Nong_Gong_Shang_Bu)

清政府也開始制定官方獎勵的詳盡制度。第一部章程強調工程和技藝。它被采納作為1898年“百日維新”的一部分內容，可能從未被實行過。1903年頒布的第二部規章是針對投資者和創辦人的。但是這些也證明效果不大，因為允許獲得個人投資或創辦企業獎勵的最低數目是50萬元。對這樣一筆大數目，很少人出得起。同時，任何擁有社會威望而首先能夠籌集這樣一筆數目的人，只能獲得“第五等議員”的身份，這顯然是降低身份的事。不過在1906年和1907年之間，全面的獎勵制度終于建立了起來。它把獎勵分為三類：第一，獎給高超技藝的手藝人和有所發明的技工；第二，獎給工業提倡者，而要求他們籌集資本的數目卻大大降低了；第三，獎給投資者，包括對真正作出突出貢獻的人授予終身貴族的地位。

受到獎勵的實際人數一直是很少的。正如《東方雜志》所指出的，中國的企業家們并不需要榮爵虛銜，而需要政府真正和有效的保護措施。[[56]](#_56___Dong_Fang_Za_Zhi______Shan)由于爵銜兩者仍然能捐買到手，事實上許多商人也都捐到了手，所以這些獎勵不能使人產生敬仰之感。比這更壞的是，所需的數目仍然太高。一個人要成為三等男爵，必須投資1000萬元。所以沒有人被授予終身貴族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雖說這整個獎勵制度未著成效，但仍然表明中央政府對新工業的態度是積極的，表明政府愿意采用洋辦法，即給予官方承認來鼓勵商人。

##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領導方面的矛盾

獎勵和法規一樣，都是由北京頒發和公布的。頒發獎勵屬于中央政府的職責范圍。它們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導國家經濟政策。有鑒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沒有定出新制度措施領導工業發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計想用建立新制度和開展新項目來抵消各省的優勢。

地方對工業發展的指導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進行的。第一，各省官員通常要輪換。工業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繼任人所否定。第二，雖然中央政府沒有用財政的力量幫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業，它仍然保留著核準各省分配財政收入的權力。不過一經中央政府核準，實際支出和由于這些支出而需要的一切贊助都是在省級領導人權力之下安排的。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間的權力，從而不可能按照國家的輕重緩急使工業能夠井然有序地發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員司的品質愈來愈壞，所以北京各部的工作不見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 京師新設的各部

適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業法規，是中央官僚機構進行基本改革的產物。改革首先是精簡傳統的六部，增設了一些新的部（見第七章）。其次是在思想上確立了新的任務，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領域和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因此，在工商業方面北京組織了一個新的部，各省下設分署，并且鼓勵商人組織商會。

自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鄭觀應等播諸文章，但大約到1902年盛宣懷對它發生興趣時才予以認真考慮。盛宣懷對此事的關心反映出，他不僅理解現代的經濟需要國家的指導，而且還因為他和各省工業領導人的關系并不那么融洽。雖然盛宣懷在擔任幾個大公司的官方督辦時頗有成就，但他的官階一向不夠高，所以他無論是在各省或是在北京都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他在李鴻章手下開始他的官宦生涯，而在1895年以后李鴻章失勢的時候，張之洞成為他的新的庇護人。但是，張之洞寧愿躬親監管他的工業項目，所以他的庇護往往不足恃。1902年，盛宣懷任宗人府丞和會辦商約大臣，這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中等官員。他建議設立一個新的部來指導工業和貿易事務。

盛宣懷的建議恰好和兩個滿族親王的類似意見相吻合。醇親王二世（清帝的異母兄弟）和慶親王的兒子載振兩人剛剛分別從海外旅游歸國，顯然因受到華僑商人的熱烈招待而深受感動。雖然軍機大臣榮祿帶頭提出過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當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時候反對意見便漸趨消失。五個月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57]](#_57_Guan_Yu_Shang_Bu_Chou_Bei_Ch)

新成立的商部在開始時工作熱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傳統的六部，僅次于外務部。它擁有廣泛的管轄權，并且受權接管所有已由傳統各部和機構建立起來的重大工商業計劃。它還計劃在各省建立直接對它負責的商務局。商部尚書是載振。他的父親慶親王為新成立的財政處起草一個全面改革國家財政的方案。甚至傳說慶親王意欲將這個有權力的財政處置于新的商部之下。報紙報道，北京書肆內關于工業和國際商業的書一售而空；官僚把這些書全部買去，準備自己參加新商部錄用人員的考試。

但是商部的存在沒有能滿足這些期望。矛盾發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部和機構放棄它們的管轄權限。例如，欽命的商務、商約和鐵路等官署都一如既往地進行工作，完全獨立于新成立的商部。[[58]](#_58_Qian_Shi_Fu_Bian____Qing_Ji)同時，商部的財政經費也少得可憐；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償付庚子賠款之前的海關存款的利息。由于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銀行的時間長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擬訂新的經費方案上的時間比花在擬訂新的工業計劃上的時間要多。[[59]](#_59_Guan_Yu_Qi_Zhong_Mou_Xie_Fan)不過，商部失敗的最關鍵原因是載振及其同僚領導無方。載振因放蕩腐化而聲名狼藉。1907年5月，他被迫辭職，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員的一個身價很高的歌妓，并為他的父親慶親王弄到一筆10萬兩銀子的巨額賄賂。[[60]](#_60_Jian_Chen_Yun_Long___Zhang_W)英國訓練出來的一個律師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對商部的組織和章程有所幫助，在1903年擔任了四個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為人干練正直，后來，陳壁接任了三年，而陳壁卻是個有名的貪官。

在1906年進行大整頓的時候，商部進行了大改組。它對鐵路、船舶、郵電的管轄權都轉給新設的郵傳部。由于這些交通通訊工業占用了當時用于開發的大部分資金（特別是外債），所以改組后并另外改名的農工商部就無職守可言了。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輪船招商局的權利。但是，郵傳部則聲稱船政理應屬于它的權限。農工商部爭辯說，輪船招商局是商辦，因此得屬于它的管轄范圍。最后它們同意讓郵傳部監管招商局的運輸政策（如經營的航運路線），而讓農工商部監管它的業務經營。[[61]](#_61___Dong_Fang_Za_Zhi__Ji_Zai)

還不清楚為什么要把指導國家的近代企業的責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劃分，使之形成兩個部。主要受益人看來就是袁世凱，他在1907—1911年期間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郵傳部。因此，在盛宣懷在1911年成為郵傳部大臣之前，該部先后由袁世凱的門生陳壁、徐世昌和唐紹儀所領導；而部中一個有勢力的鐵道部門一直是由袁世凱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詒領導。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關系中間不是一個簡單的沖突。1907年9月，袁世凱和張之洞都從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軍機大臣。中央政府這時大概想把交通通訊工業——在當時主要是鐵路——集中于一個部管轄，以便進行統一發展鐵路的新的努力。鐵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別注意——不僅因為它具有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且因為需要借大量外債作筑路資金。[[62]](#_62_Jian_Li_En_Han___Zhe_Jiang_S)袁世凱和張之洞調任軍機處，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們辦鐵路的長期經驗和興趣。在1908年，張之洞又被任命為粵漢路和川漢路的督辦。不過，如果說北京曾希望抓住鐵路經營的主動權的話，那么它的策略又失敗了。無論是袁世凱或是張之洞，都無法使各省的紳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范。

### 各省的反應

各省巡撫對在本省設立部屬省署的新計劃抱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既然北京已無其他辦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從來搪塞應付。由于各部都設法把新署局強加于省一級，各省便擴展自己的機構，把它們置于北京名義上的控制之下。例如，1904年初，商部尚書載振奉旨計劃在各省建立商務局——一個嶄新的官僚機構——來為他的商部服務。各省當局的回答是，他們早已有了商務局在執行這些任務。事實上，張之洞在1896年就已第一個開始建立這樣的局來計劃近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不久就利用它來籌集工業資本和謀取貸款。張之洞的榜樣被其他省會紛紛效法，直到商人普遍對它們表示不歡迎時才停止。在1903—1904年的某個時候，廣州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商務局被迫關門，因為它們不受歡迎。[[63]](#_63_Zhang_Jian____Zhang_Ji_Zi_Ji)

1904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愿屈服了。8月，各省原來所有商務局被正式指定為商部的分署，以指導各省一切工商發展事宜。每局由一個經督撫遴選的商務議員領導，但他要經商部批準和任命。商務議員應具備知府或候補道臺的官銜，他必須精通工商事務，定期上報，編制統計表，進行調查研究，以及保護當地商人和歸國僑商。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報告，但報告副本應呈送督撫衙署。[[64]](#_64___Da_Qing_Guang_Xu_Xin_Fa_Li)這樣一來，商部任命商務議員只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辦法，各省卻擁有實權，既可以遴選他們自己推薦的候選人，又可以收到他們送給商部的報告的副本。

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務局。1908年末，44名商務議員被任命，但是商部立即發現他們不執行商部的指示。下面講幾件北京和各省省會之間行政上鉤心斗角的事件，以說明商部的困境及其無能。1904年末，商部已經在奏疏中申訴說，各省選派的商務議員都沒有工商業的知識。“在各督撫中關心民瘼，認真遴選者固不乏人，而視為例差者亦復不少。”[[65]](#_65___Dong_Fang_Za_Zhi__Shang_Wu)它請求朝廷命令總督們要更加勉力從事。這說明困難之所在。一個中央政府的部為了強迫一個不順從的省政府遵從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權力。商部的創立者們原來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傳統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幸的是，這個新部出現時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財源以償還國債之際。

1905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訴苦說，所屬商務局都不執行它的命令。雖然商部已經主動解決了對江蘇、江西、山東等省許多付不出存款的錢莊提出的破產索取權，但上海的一個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決，另有的省份對商部的信“有閱六七月未復者，有閱四五月未復者，疊經臣等督飭，文電交催，仍復遲延”[[66]](#_66___Dong_Fang_Za_Zhi__Shang_Wu)。以后不久，有一個人向商部的《商務官報》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喪情緒：商部在設法保護商人的時候卻無能為力，除非總督及其僚屬執行它的政策。[[67]](#_67_Wang_You_Ling____Shang_Bu_Zh)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間的這些沖突，常常非各省督撫所能控制。但是北京畢竟對所有省級正規官員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職和再委派的大權。特別在清末數年，大多數巡撫事實上是由那個腐敗的慶親王精心挑選的，他們都對慶親王感恩戴德。各省許多不順從的表現，是以巡撫、長期留任的胥吏和稅吏為一方與控制經濟企業乃至稅收等公共職能的省的和地方的紳士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造成的。這些紳士和各級小官僚——不僅僅是巡撫或他們的屬員——才是地方權力增長后的真正的受益者。[[68]](#_68_Guan_Yu_Dui_Zheng_Fu_Xu_Li_H)

1907年改組而成的農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屬的局（它們已改組成為農工商務局），同時把局的下屬對照部中的機構重新作了安排。1908年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使新設的農工商務局的等級同于鹽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的官員（勸業道）主持局務。根據諭旨，勸業道同時對農工商部和郵傳部負責。作為省一級的高級官員，勸業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當局挑選。到1908年年底，已任命了9名勸業道。

雖然這件事實看來是農工商部的勝利，但沒有證據表明在1908年以后它對各省產生了任何巨大的影響。這有幾個原因。第一，農工商部嚴重地喪失了熱情或使命感。1907年繼載振之任的新農工商部尚書是另一個宗人溥颋，他為官直到清朝覆滅時為止，一直沒有有力的政治后盾，也沒有創造力。第二，在清朝最后幾年，朝廷專心于它自己的派別斗爭，這顯然越來越導致各省高級官員把他們任職的省份視同他們利益之所在。例如，浙江人周善培從1908年10月至1911年夏季任四川省勸業道。當鐵路國有化危機爆發時，他卻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69]](#_69_Zhou_Shan_Pei____Xin_Hai_Si)

最后，北京在工業上的失敗只不過是中央對各省的權力進一步減弱的部分表現而已。朝廷允許通過各省咨議局表達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紳士和紳商更多地倒向它一邊。但是結果使紳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間已經脆弱的關系更加不正常。各省政府的權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致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多數巡撫只能唯紳士的馬首是瞻，或者干脆逃命了事。

## 辦企業官員的出現

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試驗是想吸引商人投資于近代企業，但兩者都告失敗，這是由于官方提倡者如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未能使投資戶相信他們的利益不會被官方的經理所損害。大約在20世紀頭10年商人們的回答既響亮又清楚：除非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合伙者，否則干脆散伙。但另一方面，個人和集體在這時也無力建立大規模企業，這表明商人們自己仍然過于軟弱和不團結，不能領導中國走向工業化。由于官方提倡者不甘心或者不能夠放棄控制，結果在新安排中又出了歪門邪道，或者完全避開官辦，或者使它流于形式。

關鍵是出現了官僚企業家。晚清對工商業作用的重新評價已經使近代企業在思想上受到尊重。官員們最初無非是實行一般的監督，后來開始自己投資，承擔起管理職能，到最后又給企業做決策。從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但是盛宣懷辦他的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他的主要關心是要在官場飛黃騰達。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著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利；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卻常常敗北。[[70]](#_70_Guan_Yu_Sheng_Xuan_Huai_Zhon)

寧可要健全的商業經營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到20世紀頭10年，有些官僚企業家開始獨立出資或者靠朋友籌集大多數甚至全部資本，他們以民間身份籌資，并無官方的正式照顧。由于自負盈虧，所以他們比較容易地把自己的官守與企業家使命分開。作為又能直接負責政府政策或者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經理和企業主，他們不再需要正式的官方照顧來保護企業而使之不受官方的剝削了。約在1890年，有兩名中級官員上海道臺悄悄地伙同商人向上海華新紗廠投資，他們看來在這種事業的發展中起了先鋒作用。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對上海整個地區擁有壟斷權，照理他應給予抗議，但還是保持了緘默。他也許非正式地同意這樣做，因為與此事有關聯的龔照瑗和聶緝椝兩道臺，連同一個紳商銀行家嚴信厚，都出自李鴻章的門下。[[71]](#_71_Guan_Yu_Hua_Xin_Sha_Chang_He)

華新紗廠在開辦階段有一些虧損以后，到了20世紀頭10年就變成了一個贏利的企業。聶緝椝道臺已經提升為巡撫，于是買下華新廠其他股東的全部股票，讓他的兩個兒子來辦廠。現在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聶緝椝曾利用公款而不是自己出資購買他最初的股票。官員挪用公款做私人資本，這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華新廠從官督或官商合辦的安排中徹底擺脫出來，這使“官”字有了新的意義：它現在指的是官員個人，不再有“政府”或者“官員集團”的意思了。因此，華新廠事實上是一個私營企業，官員股東和商人股東以個人身份在企業中合作共事。它不需要有正式的官方關系，因為官員是企業投資者的成員，他們能保證使企業得到官方的保護。

在以后十年期間，官僚企業家集投資者、經理和官方贊助人的作用于一身，他們能夠給新企業提供國家的保護，而不再使它們受國家的那種荒謬的控制了。

### 作為官僚企業家的周學熙和張謇

周學熙的父親周馥原為山東巡撫，在20世紀頭10年期間升任兩江總督，以后又當兩廣總督。周學熙在1900年前后在袁世凱手下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袁世凱對他的經濟才能深為賞識，很快把他從候補道提升到實缺，然后任為鹽法道，最后在1907年任他為直隸省按察使。1906年，作為督察直隸工業發展的總職責的一部分，他領導一個委員會以組織一個煤礦公司，然后自任公司的總辦。[[72]](#_72_Guan_Yu_Zhou_Xue_Xi_De_Chuan)

灤州官礦有限公司是一個私營公司和官督企業的混合物。大概因為中國政府與附近英國控制的開平礦務局之間爭訟不息，周學熙決定稱該公司為官督商辦企業，由國家提供一部分資本。然而礦內沒有督辦（這個頭銜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用來稱呼官督組織的主管的）。代替督辦的是一個15人的董事會，其中兩人，一任總理，一任協理。為了保證有效的控制，總理或協理每個人至少必須持有2000股股票，而其他13個董事和兩名審計每人必須至少持有1000股股票。[[73]](#_73_Qia_Er_Xun____1877__1912Nian)每股股票合100兩，這就意味著17名高級職員持有至少1.9萬股股票，合銀190萬兩。由于公司的資本在1908年開辦時是500萬兩（其中五分之三已收到），所以這筆款約占全部股票的四成。當增加官股50萬兩，即資本的10%的時候，高級職員和政府兩者一起在股東會上在理論上就占多數了。

大投資戶也有重復投票權，即每50股一票，直到總數25票。同時，只有已經投資五股（合500兩）者可以提出建議，而持有50股（合5000兩）者可以投票表決。因此購買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資戶就沒有發言權。周學熙的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資戶只能限于少數人，只有他們才可以決策和管理公司。雖然我們只有17名最初的董事和職員的部分名單，但是從我們所掌握的9個人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袁世凱的部下，又是周學熙的朋友，有的是周學熙的安徽同鄉，有的是袁世凱的河南同鄉。

啟新洋灰公司是周學熙的另一個主要工業，它的組織和管理在許多方面和灤州煤礦很相似。[[74]](#_74_Guan_Yu_Qi_Xin_De_Yuan_Shi_C)但是，啟新這個私營公司沒有任何國家資本，只是向天津（直隸）官銀號貸款40萬兩（以后被公司所償還）。公司不斷賺取厚利，從不感到經濟匱乏。頭一年周學熙就籌集到批準的100萬兩。他得到的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他煤礦的那一批僚屬。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分為二，以設立分廠。公司于是要求增資150萬兩，供發展和擴充之用。為了保證這一小批高級職員能繼續占支配地位，半數新股票保留給原先的股東認購，他們根據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權在規定期間購進。另一半新股票不向普通公眾出售，而是賣給直隸省政府和使用該公司產品的各省鐵路公司。但是公司的檔案表明，在以后的幾年，這幾方面沒有向公司投資。很可能，這150萬兩全被原來的股東和他們的朋友認購。同樣，當公司在此后不久另外要求增資30萬兩以建立一個北方分廠的時候，它特別限定老股東認購。老股東們顯然設法滿足了增加新資本的需求，因為他們把他們的大部分股息和紅利進行了再投資。

周學熙繼續興辦其他企業。1909年，他在北京組織了第一個自來水廠。在1911—1920年之間，他還賈其余勇經營銀行業、玻璃廠和紡織業。灤州煤礦在與比它大的開平煤礦合并以后營業繼續蒸蒸日上，而啟新也發展不已，終于支配了全國的洋灰市場。

周學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東們所得的利潤不斷地進行再投資；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東們因為是袁世凱手下的官員，能夠對公司提供政治保護。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系分裂，周學熙參加安福系，以他的經濟資源換取繼續對他政治上的支持。

張謇則是另一種官僚企業家。在周學熙戀棧官位時，張謇已辭去了一切公職。這個決定不是輕易作出的。他的成年生活絕大部分花在伺機會試上面，終于經過僅僅幾次落第之后在1894年中了令人艷羨的狀元。周學熙和張謇在他們尋求財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徑庭。周學熙面向的是他的官場同寅，張謇則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張謇因丁憂從北京離職奔喪，被張之洞召見，要他辦一個現代紗廠。他的家鄉南通是一個重要的產棉區，有著從事手工紡織業的長期傳統。以前盛宣懷曾企圖在南通建立一個現代紗廠而遭到當地人的反對。張之洞挑選張謇，不僅因為他是當地名流，比別人更能應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對，還因為張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為新建工廠提供資金。[[75]](#_75_Guan_Yu_Da_Sheng_Sha_Chang_D)

張謇接受他的任務時，大概對如何組織和經營一個近代企業毫無成竹在胸。他獲準建立一個私營公司，兩名與他有交情的當地棉織品商人幫助他組織了一個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員會來籌集資本。他最初計劃開辦的紗廠完全用私人資金，這并不意味著他在思想上反對國家提供資金。張謇曾在幾位官員手下當過私人幕賓，有多年公共財政工作的經驗；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見解，即經營近代工業必須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導。張謇本人律身謹嚴，這確實使他產生了傳統的認識，即只要負責的官員能干廉明，官方的監督就會帶來好處。當他的商人董事們發現他們無法籌足資金時，張謇乘機以官方提供的機器來彌補這個差額。當有些商人抗議這會為官僚的干預開方便之門時，張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說，他作為一個廉正的高級職員，“官有干涉，謇獨當之”[[76]](#_76_Chen_Zhen___Yao_Luo____Zhong)。

幸虧這種對官商合辦的過分簡單化的態度在他身上沒有堅持太久。在以后的幾年，當他不顧一切地要為大生紗廠籌集足夠的資本時，他認識到他清白的名聲和善良的愿望都不足以保證取得商人們的信任。他還認識到，他的官場朋友們所作的給予支持的許諾附有種種條件，或者常常不能兌現。張謇的兒子在為他寫的傳記中說：“上面的總督雖然贊助，而底下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拆臺。”[[77]](#_77_Zhang_Xiao_Ruo____Nan_Tong_Z)張謇遇到的困難，使他對商人和官員在設法興辦近代工業時所面臨的問題有了認識。他們告訴他，他在慘淡經營時會遇到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限制。同時，他們還幫助他下決心完全同官場一刀兩斷。官僚的僵化和奴性使他作嘔；他開始認識到，從某種程度說，企業活動如果進行得好，就更忠于儒家的號召，因為近代企業提供了就業機會，從而增進了人民的福利。這說明了他在轉變成一個卓有成就的企業家時從紗廠邁步而出，再去辦墾荒、水利、新式教育和漁業等事業的原因所在。

大生紗廠原來的計劃是籌資60萬兩，建成一個中型的紡織廠。但是，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幾乎立即碰到了困難。總督張之洞被劉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關于免稅的諾言。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束使原棉價格猛漲。外國人在上海正興辦紗廠，這使財力較弱的中國紗廠瀕于破產。張謇的兩名董事辭職了，另外兩名勸他推遲建廠計劃。然而張謇的回答是另聘新董事，并接受劉坤一提供的價值50萬兩的官方織布機和紗錠，把紗廠的原定資本增至100萬兩。這樣，私營企業就轉成了一個可以設想成官商合辦的企業，這種轉變又使兩名董事離職而去。

最后作了妥協。張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機器的半數，折價25萬兩。私人資金將籌集另外25萬兩，建立一個規模將予以縮小的紡織廠。但是，商人們在籌集自己名下的資本額時依然很不順心。最后只籌集到十七八萬兩，所以在1899年紗廠開辦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貸款以補足缺額。這些貸款來之不易。張謇曾描述過他如何不斷地懇求他的官場朋友們的情形。只是在劉坤一總督個人批準了追加的政府貸款之后，他才渡過了不能清償債款的危機。

因此，張謇的經驗不是讓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紗廠最后之所以獲得成功，應歸功于他健全的經營管理和艱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是，恐怕還得歸因于張謇在官場上的關系，這給他弄來了必需的、盡管是勉強獲得的資金，并且允許他繼續稱該廠為商辦企業，即使它的資金有半數以上來自官方（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有的是貸款）。結果，官僚企業家張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資本，又能在利用它時不受國家的監督。

### 一點淺見

盡管許多進步官員懷有善良的意愿和機靈地順應著近代管理技術的需要，但是中國在清末沒有建成一個堅強的工業基礎。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有了幾種近代工業——紡織、采礦、鑄鐵、航運和鐵路。但是它們十分分散，職能又不配套，有時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團手中。官員對企業的支配和國家對企業的控制常被視為中國失敗的唯一原因。但是關鍵不只這兩個因素，并且還有國家如何進行控制和官員如何起支配作用的問題。明治時期的日本在工業發展的同樣階段中，是極力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推動的，但是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數國營工廠賣給了私人企業家。[[78]](#_78_Tuo_Ma_Si__Shi_Mi_Si____1868)相反，中國官員則不愿意放棄控制，甚至參與工業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為他們把官方的名義和個人的私利糾纏在一起了。

最初，李鴻章的官督商辦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資，并且讓他們在他的全面監督之下自己冒風險去經營近代工業。李鴻章認為這種安排是挖掘必需的私人資本的一種手段，如果中國要開始全面建設近代工業的話。商人們對此表示贊成，這種反應表明，他們認為李鴻章的倡議是一種公平交易，它可以免除官員的過分壓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監督為代價。可是，甚至李鴻章的權勢也不足以保護他的企業不受其他官僚機構的影響。與此同時，他本人在這些企業中的代表，如盛宣懷等人，愈來愈陷進了在國家目標和個人利益之間形成的利害沖突之中。他們越來越厲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經理人員的權利。在當時，由于商人在許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夠湊足資本，省政府的資金就日益頻繁地被他們所利用。這就為官方的監督人如盛宣懷之流提供了機會，使他們自己變成真正的經理，同時也把國家的監督變成了官僚的控制。

張之洞用了“官商合辦”這種新名詞，倡議要與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伴關系，但這并沒有改變日益加劇的官僚干預的趨勢。不像李鴻章那樣，張之洞對于商人的企業精神及其對國家幸福的關心，并不虛心體察。他也不輕易授權給部屬或干練的商人領袖。他主持的各種工業項目，得到商人支持者甚至比李鴻章得到的還要少。

大約在1900年，工業發展中這種明顯的失敗，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員所支配，這一事實促使中央政府試圖帶頭制定全國性的工商業政策。所有重大企業都已由各省高級官員主辦，這是有許多原因的。19世紀末在典型的改朝換代形勢下王朝日就衰落，這時國內混亂和總的趨勢給地方領導提供了擁有金錢、軍力和人才的機會。同時，他們也能更多地接觸到西方技術和實踐，更能領略它的奧秘。但是發展既是以地方為基礎，必然存在許多內在的缺陷。第一，既無政策的配合，又無一套統一的原則。第二，省級官員經常調來調去，許多掙扎求存的公司終因接任官員不再支持它們而歸于失敗。第三，只有兩三個“地區”，因為能得西方風氣之先，因為有干員派駐，因為有比較充裕的商業財富，所以才能參加發展近代企業的活動。

中央政府為反對由各省支配企業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設分局的中央集權的商部這一措施，卻遇到了不僅來自各省官員、紳士和紳商，而且也來自中央政府本身一部分官僚機構的強烈反對。好幾個部彼此都為爭奪管轄權而爭吵不休。

結果，發展工業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級進行。但是它面臨著風靡一時的商人思想，即重商業輕工業的思想。因為絕大多數中國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不懂得工業企業是比商業發展較慢的一種類型。市場價格時漲時落，可以使他們迅速獲致短期的利潤，所以他們很容易迷戀于商業。

在清末，私營鐵路成為唯一有機會能爭取到有廣泛基礎的財政支持的重大實驗。在1906—1908年期間，有幾條省辦鐵路獲得成功，因為它們能夠激起真正的民眾運動來支持它們。在廣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寧波，確實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學生和店員拿出自己的數百萬銀元來組織以省為基礎的鐵路公司。他們由于恢復利權運動（內容是要求外國銀行家退還各該省的鐵路理財權和筑路權）的興起而在政治上活躍起來。由于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因需要外債而與西方列強相勾結，所以要求私營也就成了這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但是這些鐵路公司也紛紛歸于失敗。到1911年在清王朝快要滅亡之際，國家再一次企圖搞國家控制。但無論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權更為強大，它是否能從國民那里集中足夠的巨額資金來全面興辦近代化工業，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國民們還只是剛剛認識到要利用這些機會。此外，鐵路公司的歷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驅使而進行投資的商人和紳士股東往往容易搞派別活動，而對于有效的企業管理來說，這種商業政治的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制。政府和商人的關系，當他們合伙而又處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無法律保證的時候，是很難和諧的。中國在1911年，盡管有西方的挑戰和影響，仍然缺乏制度的基礎，以使近代工業能借私人主動性和私人資本之力而發展起來。

（黃巨興 譯）

[[1]](#_1_7)本章摘自陳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作者對劉廣京和麥金農所提的寶貴意見，以及洛杉磯的西方學院和海恩斯基金會提供的經濟幫助表示感謝。

[[2]](#_2_7)此處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銀洋，亦即中國銀洋，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時期約值0.72兩銀子，或者等于兩個英國先令。銀子和銀元二者都是記賬的單位。

[[3]](#_3_7)見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第89頁；侯繼明：《經濟的兩重性：中國的實例，1840—1937年》，載《經濟史雜志》卷23 第3期（1965年），第277—297頁。

[[4]](#_4_7)見本書上卷第十章。

[[5]](#_5_7)薛福成：《籌洋芻議》，轉載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1冊，第154—156頁。

[[6]](#_6_7)對于有些這類著作的討論，參閱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第1—147頁。

[[7]](#_7_7)例如，參見牟安世《洋務運動》，第128頁。

[[8]](#_8_7)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第一部分，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1期（1964年11月），第3—43頁。

[[9]](#_9_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1頁。關于李鴻章的動機，見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1870—1875年一個政策的形成》，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68—104頁。

[[10]](#_10_7)見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頁。

[[11]](#_11_7)張鵬（音）：《1842—1911年中國地方商人集團的分布》。彭澤益：《19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頁。

[[12]](#_12_7)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

[[13]](#_13_7)斯坦萊：《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

[[14]](#_14_7)張廷舉：《戊戌政變時期頑固派之經濟思想》，載《中國經濟》卷4第6期（1936年），第141—147頁。

[[15]](#_15_7)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1冊，第1—11頁；第11冊，第1—47頁；第23冊，第33—53頁。

[[16]](#_16_7)《光緒朝東華錄》二十九年三月，第27—28頁。

[[17]](#_17_7)關于有一種多少是對立的見解，參見貝爾熱《資產階級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229—235頁。又見周錫瑞《評1911年》，載《近代中國》卷2第2期（1976年4月），第141—184頁。

[[18]](#_18_7)確實，國家只制定了極少數規章，而且經營商業可以獨立于國家之外。（漢密爾頓：《商人和現代化：對中國商業看法的變化》手稿，伯克利，1975年12月。）但是，缺乏明確的規章并不等于沒有控制，而是有大的指導方針（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這就形成了一個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19]](#_19_7)關于李鴻章的幾種官督商辦事業，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中曾加以討論。關于輪船招商局最初幾年的詳情，見劉廣京《在中國的兩個輪船公司，1862—1877年》（哈佛大學，1956年博士論文）。

[[20]](#_20_7)《中國經濟研究大全》（ 日文）第1冊，第185—187頁。

[[21]](#_21_7)關于朱其昂的傳記，見《清史稿·列傳》卷239，第3頁；又見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第108頁。

[[22]](#_22_7)卡爾森：《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

[[23]](#_23_7)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第84—92頁。

[[24]](#_24_7)見劉廣京《英國和中國輪船在華的競爭，1873—1885年》，收在考恩編《中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第49—78頁，特別是第75頁注1，它表明，在1884—1893年間，輪船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額不斷減少，因為它的船隊沒有增加，而兩個英國競爭者的船隊卻有增無已。

[[25]](#_25_7)龔駿：《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第36—43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40—42頁載有李金鏞的一篇小傳。

[[26]](#_26_7)張之洞：《張文襄公集·奏稿》（許同莘編）卷69，第11、13頁。

[[27]](#_27_7)盛宣懷：《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卷4，第24—26頁。

[[28]](#_28_7)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0，第27頁。

[[29]](#_29_7)張之洞：《張文襄公集·奏稿》卷17，第24—26頁；卷19，第3—6頁；卷29，第30—31頁。

[[30]](#_30_7)關于這種離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詳見洗寶榦編《佛山忠義鄉志》卷4。

[[31]](#_31_7)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第1冊，第573—574頁。

[[32]](#_32_7)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頁。

[[33]](#_33_7)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冊，第572頁。

[[34]](#_34_7)同上書，第579—591頁。

[[35]](#_35_7)張之洞：《張文襄公集·公牘》卷12，第15—16頁。

[[36]](#_36_7)張謇：《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張孝若編）第1冊，第14頁。

[[37]](#_37_7)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冊，第592、613—620頁。香港《華字日報》1905年6月2日和20日。

[[38]](#_38_6)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第73頁。

[[39]](#_39_6)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第131頁。引文載《劉坤一選集》（中華書局）第2冊，第883頁。

[[40]](#_40_6)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盛宣懷：《盛尚書愚齋》卷5，第41—43頁。

[[41]](#_41_6)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8，第43—44頁。

[[42]](#_42_6)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12，第4頁。

[[43]](#_43_6)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8，第56—57頁。

[[44]](#_44_6)例如參看埃爾文的《1905—1914年的上海行政》，羅茲的《1895—1911年的廣州商會》，以及瓊斯的《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這三篇文章都載在埃爾文等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

[[45]](#_45_6)另一個有著同樣動機并且在同時進行的大得人心的運動是要從外國公司手里收回開礦的權利，見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46]](#_46_6)香港《華字日報》1906年1月9、15日；《華南晨報》1906年1月12、15、18日。關于官員、紳士和商人之間的這些戲劇性沖突只有粗略的文獻記載，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第1045—1055頁。岑春煊在他的自傳《樂齋漫筆》中緘口未談此事。許多有關的記載只能從兩份當時的報紙中搜集到，它們是香港的《華字日報》和《華南晨報》。

[[47]](#_47_6)《華南晨報》1906年3月2、4、7、10日；4月14日。《華字日報》1906年3月3、5、10、19日。

[[48]](#_48_6)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9，第46—47、61、74頁。

[[49]](#_49_6)關于這條鐵路中的外國利益的大部分情況，見孫任以都《1908年的滬杭甬鐵路貸款》，載《遠東季刊》卷10第2期（1950年），第136—150頁；馬德琳·齊：《滬杭甬鐵路貸款：恢復利權的事例研究》，載《現代亞洲研究》卷7第1期（1973年），第85—106頁；以及李恩涵《浙江紳商與北京朝廷官員關于1905—1911年收回英國的蘇杭甬路權的斗爭》，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第1期（1972年），第223—268頁。關于當時的記述和文獻，見墨悲編《江浙鐵路風潮》，連載在《東方雜志》上；又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冊，第999—1009頁。

[[50]](#_50_6)《東方雜志》，“中國大事記”第7年第9期（1910年），第67—70頁；第10期，第75—77頁；第11期，第87、94—95頁。

[[51]](#_51_6)關于茂新廠早年的情況以及榮家的背景，見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1冊，第372—376、381—382頁。

[[52]](#_52_6)農工商部統計處：《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第5冊，第1頁。

[[53]](#_53_6)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紀念冊》；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年紀念錄》；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等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54]](#_54_6)農工商部：《農工商部現行章程》。

[[55]](#_55_6)根據《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第五冊和《第二次》第五冊的材料算出。

[[56]](#_56_6)《東方雜志》，“商務”第2年第1期（1905年），第2—3頁。

[[57]](#_57_6)關于商部籌備成立的消息，在《華字日報》上經常刊登，例如見1903年3月23日、5月7日、7月18日、8月8日、9月26日、10月10、31日、11月13日以及12月30日的報道。

[[58]](#_58_6)錢實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第68、71頁。

[[59]](#_59_6)關于其中某些方案的報道，見《華字日報》1903年10月10日；1904年2月9日、7月6日、8月13日；1905年2月24日、5月31日；1909年10月16日、11月8日；另見《東方雜志·記載》第6年第9期（1909年），第430頁。

[[60]](#_60_6)見沈云龍《掌握晚清政柄之奕 劻》，載于他著的《現代政治人物述評》第2冊，第73—74頁。

[[61]](#_61_5)《東方雜志·記載》第5年第10期（1908年），第93頁。

[[62]](#_62_5)見李恩涵《浙江紳商與北京朝廷官員關于1905—1911年收回英國蘇杭甬路權的斗爭》。

[[63]](#_63_5)張謇：《張季子九錄·政文錄》卷1，第19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冊，第596—597頁。

[[64]](#_64_5)《大清光緒新法令》卷16，第36—37頁。

[[65]](#_65_5)《東方雜志·商務》第1年第11期（1904年），第119—120頁。

[[66]](#_66_5)《東方雜志·商務》第2年第9期（1905年），第88—90頁。

[[67]](#_67_5)王有齡：《商部之責任》，載《商務官報》第7期（1906年），第1—4頁。

[[68]](#_68_5)關于對政府胥吏和地方紳士的地區、地方權力增長的分析，見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載《清華學報》卷10第2期（1974年），第207—223頁。（中文和注解見第176—207頁。）

[[69]](#_69_5)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

[[70]](#_70_5)關于盛宣懷重官輕商的抉擇的不同解釋，見中村義《清末政治和官僚資本：盛宣懷所起的作用》，載《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第34頁。

[[71]](#_71_5)關于華新紗廠和聶氏家庭的情況，見根據公司檔案和目擊者記述所編的《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及聶曾紀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

[[72]](#_72_5)關于周學熙的傳記，見周叔楨《周止庵先生別傳》；包華德編：《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卷1，第409—413頁。

[[73]](#_73_5)卡爾遜：《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周叔楨：《周止庵先生別傳》，第33—40頁。

[[74]](#_74_5)關于啟新的原始材料見公司檔案的資料匯編，見南開大學經濟系《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編《北洋公牘類纂續編》卷19。最近用英文寫的研究有費維愷的《20世紀中國的企業：啟新洋灰公司》，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304—341頁。

[[75]](#_75_5)關于大生紗廠的建立有張謇本人的記述，見他的《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大生紗廠》和《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1，第14—18頁。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張謇和大生紗廠的建立》，載《清華學報》卷2第1期（1960年），第301—317頁。

[[76]](#_76_5)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353頁。

[[77]](#_77_5)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1編，第72頁。

[[78]](#_78_4)托馬斯·史密斯：《1868—1880年日本的政府企業：其政局變化和工業發展》。

#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1911年秋和1912年春這期間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件，人們稱之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點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雖然分析家們對許多問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1]](#_1_Guan_Yu_Zhong_Guo_Xue_Zhe_Dui)但是直到最近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們的懷疑。一位蜚聲壇坫的學者曾經認為它沒有實現什么社會改革，所以這次革命是一場“假革命”；[[2]](#_2_Chen_Zhi_Rang____Yuan_Shi_Kai)另一位學者認為，舊的統治階級仍像在過去易代之際那樣保存了下來，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換代式的革命”[[3]](#_3_Shi_Gu_Zhou_San____Shi_Lun_Sh)。由于對舊說提出了這樣一些挑戰性言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成了一個熱烈辯論的題目。

在近年爭論中不斷涌現的大量新觀點中，有兩種是我們這一章的出發點。[[4]](#_4_Guan_Yu_Zhe_Xie_Guan_Dian_Ji)第一，辛亥革命不僅完成了從王朝到共和國的政治變革，它也完成了種種社會變革，例如出現了新的社會集團和改變了舊的社會集團。[[5]](#_5___Ge_Ming_Zhong_De_Zhong_Guo)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為20世紀社會革命中的1900—1913年階段，不應僅僅看作整個政治變化的1911—1912年階段。其次，根據這種廣義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遠遠不是像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6]](#_6___Ge_Ming_Zhong_De_Zhong_Guo)這是一場大于它所有的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7]](#_7_Tong_Shang_Shu__Di_53Ye)。根據這種看法，辛亥革命運動對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貢獻，不如它所創造的革命傳統那樣重要。總之，我們目前的解說傾向于兩個與以往不同的論點：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大的一個非常事件，但它的實際成就比通常認為的要小。

最近，學術界提出的問題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種革命？誰應對所發生的事負責？這段時期在整個中國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種嘗試性的答案以下面這種認識開始：即在1911—1912年，種種抗議運動臨時湊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則不是革命的，但綜合我們試圖加以闡釋的種種理由，不妨認為：在那個時候，所有這一切抗議運動都認為，在當時應該擁護以共和國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對此應該表示接受。由志趣各異、利益和社會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脆弱的聯合，產生于一個處于大變動狀態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些舊紐帶已經斷裂，另一些紐帶反而有所加強；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像盛開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長。換言之，到了1911年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了。那些彼此齟齬的意見可能模糊了這一事實：在中國的某些部分是有社會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則又看到傳統的權威和階級關系恢復了力量，而且在這兩者之間又有許多程度不等的情況。事實不僅僅是每一種說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國社會在1900—1913年時期已經分裂，并且開始沿著新路線重新組合起來。1911年不是像某些舊說法所認為的那樣是現代民主運動史上的主要轉折點，它是中國將近20年大動蕩的頂點；這2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比以往許多世紀的任何20年都要急劇。可是，這種變化的發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為革命者只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間許多活動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運動促使19世紀60年代以來維新派和反維新派紳士之間早已存在的比較溫和的分裂變成勢不兩立的鴻溝，結果使前者發現自己與革命派之間的共同點多于同反維新的紳士之間的共同點。至少暫時看來，紳士地位與其說是表示一種團結統一的力量，倒不如說是表示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的標志。新的鴻溝分裂了主要已經西洋化的都市中國和傳統的大部分農村中國，并且它促進了開始超越舊有親屬、階級和鄉土紐帶的新結合和新結盟；商會和政黨就是這種組合的例子。這些革命運動形成的分裂、組合、利害關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國以后幾十年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00—1913年時期代表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 早期的聯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運動

中國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基本上還是統一的。產生最深刻分歧的問題——即應向西方學習多少以抗拒西方的問題——并未使一些人產生推翻傳統制度的認真打算，甚至沒有產生這種傾向。人們普遍設想，學習國外技術是為了保衛中國文化。這一共同的想法綽綽有余地彌縫了所有的不同意見。

在90年代的中葉，這種共同的意見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聲打開了缺口。在孫中山的倡導下，一個小組織成立了起來，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國為職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雖然遭到失敗，卻標志著武裝革命的開始。

19世紀90年代末期，從傳統陣營內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匯合到革命運動中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使許多維新之士相信：自強運動已告失敗，需要進行更加深遠的努力。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之后，有一翼變得更加激進，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啟超領導下，它搖擺于革命和改良之間。

共和派革命分子與激進維新派這兩個集團都在海外留學生中間尋找支持。從1902—1905年，留學生人數增至約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敵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國革命者中間構成人數最多、喊聲最高和行動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這二者都不是組織完善的，或緊密結合的集團，但它們共同地都希望喚起和保衛中華民族，使它富強，即令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犧牲傳統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爾他們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時間他們卻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時清政府卻保持著政治主動權。因此，革命運動在它的頭10年只是一棵幼苗，對事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

### 孫中山與興中會，1894—1903年

孫中山是創建中國最早一個公開以革命為宗旨的團體的主要負責人。他1866年生于澳門附近的廣東香山縣，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華僑中間和西洋學堂中度過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環境給了他決定性的影響。相比之下，他在鄉下的兒童時代對他性格的形成影響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說英語；信基督教；得了醫學學位；他一生多半或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邊緣區——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邊緣區——如美國、日本和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孫中山自13歲到45歲期間只有約4年是在中國。在他最親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國人士。孫中山很早就贊羨西方和日本，特別贊羨它們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們的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以及洋溢在它們社會之中的干勁和活動意識。

基于他與外國生活的接觸和對19世紀中國維新派思想的了解，孫中山起草了一個改革的建議，企圖在1894年給李鴻章上書。建議書的內容只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他強調需要發展西式教育，促進商業，鼓勵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要想法使科學技術用到農業上去。孫中山這時所寫的內容大多是中國改良派30年或三十多年來所說的東西，并無一項可以稱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興趣的是：首先，孫中山1894年年中的這一溫和的常人之見不久就變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認為那位在中國最當權的官員應該親自傾聽一下一個剛畢業兩年的青年醫生的呼聲。對孫中山思想的急劇轉變尚未見有清晰的解釋，但他試圖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層去，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溫和，他無意在行動上也溫良恭儉讓。當一次訴諸極峰當局的努力宣告失敗，孫中山就下定決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劇轉變有什么原因，這一事件表明他意識到了他個人的使命，而這正是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孫中山未能使李鴻章聽一聽他的陳述，經過這一挫折之后他決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兩個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糾集幾位舊友和老相識建立了興中會分會。這個分會代表著孫中山和楊衢云之間的聯盟；楊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孫中山更洋化，此時是香港分會名義上的會長。根據現有的材料，不能證明興中會從一開始就馬上公開宣布以反對清王朝和擁護共和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證明，孫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幾個入會者中的至少幾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8]](#_8_Guan_Yu_Zhe_Yi_Bian_Lun_De_Qi)可是，這個組織的章程當時只是強調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以及清廷的軟弱腐敗使它不能抵御帝國主義。這一愛國主義的呼聲至少在未來的九、十年內一直是他們革命觀點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這兩個組織又小又弱。經費不足常使它們大傷腦筋。原來的會員總計不過幾十或百把個人，從未超過幾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會員都是廣州地區的人，而且幾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國本部以外的地方，他們與四億同胞的聯系差不多只限于親屬關系和跟秘密會社的一些松散聯系。它們的組織松弛，彼此之間也只是偶有聯系。它們不是訓練有素和組織完善的精英集團，并不像我們在現代革命中所見到的那樣。但他們是中國政治中的新元素。會員幾乎都是窮苦而未受過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數是商人，約四分之一是勞工。那少數幾位有影響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過現代教育。有幾個人（包括孫中山在內）學過中國的經典書籍，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傳統的文人。反之，興中會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認為是下層階級人民中的典型人物。

在甲午戰爭仍在進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開始擬訂一次起義的計劃了。雖然和約已在4月間簽署，但幾個月后形勢仍然有利于搞暴亂。和約條款對中國非常不利，所以在廣州地區，人們特別為之憤憤不平。大量遣散的士兵在鄉里游蕩，有些人就流為盜寇。從紳士到農民，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心懷不滿。入秘密會社的人數增加了，小規模起事變得更加頻繁了。

基督教傳教士及其中國信徒，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中間表現很突出的人們。在幾個小規模的公開組織（一個廣州的“農學會”和一個長老會會堂）的掩護下，興中會置辦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員，與秘密會社及地方民團的人員接關系。孫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與秘密會社串聯過，它們大規模反政府行動的潛力一直吸引著他的注意。它們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們擁有廣泛的分支網絡，同時也由于這樣的事實：像孫中山自己的追隨者一樣，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國社會中的“局外人”或“無權無勢的一群”。秘密會黨的會員包括流浪的勞工、喪失了土地的農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喪失生計的人們，另外加上土匪、海盜、小偷、走私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體面或更易鋌而走險的人。但特別在困難年代，他們還吸引著科場失意的士子，甚至還吸引著某些紳商人物及其他個別家道殷實或體面的人士。這些人往往當上了秘密會社的頭子。恰恰是這些頭頭們參加了興中會。因此，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系使他能接觸形形色色社會背景的人們，雖然他并未羅織到大量的追隨者。

孫中山的追隨者人數太少，并且他們缺乏組織，在中國的根基又太淺，但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感到苦惱。他認為反清思想是如此強烈和普遍，以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他的戰略是想在大陸贏得一個立足點，建立一塊飛地，使革命志士能由此點燃一個地區性的或全國范圍的熊熊起義烈焰。但是，國內的盟友人數太少而不可靠，同時，把人員和物資供應從香港等鄰近地區運進國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1895年的準備工作落后于形勢，舉事被推遲下來，一艘運軍火的船只被攔截，計劃被廣州當局察覺，香港來的軍隊被拘捕，因此，未發一彈（至少在革命黨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計劃就偃旗息鼓了。

孫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家里，后來取道香港，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辮子以示與滿人的中國決裂，并裝扮成一個日本人。（這一行動只是象征性的，這點他雖有所認識，但并不深刻。他長期在國外的經驗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他先人的傳統，孫中山以后16年中再沒有踏足過中國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視察過東京—廣西邊境的一次叛亂。）孫中山和他的兩位助手——陳少白與鄭士良——一起在橫濱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分會。孫中山讓陳少白負責日本的事務（在日本，他得到一位他在檀香山結識的日本基督徒的幫助），讓鄭士良回香港發展與秘密會社的聯系，然后他自己出發去檀香山、美國和歐洲。由于他在中國受挫，他希望在海外發動革命。

1896年在倫敦發生了一件奇遇，它足以顯示孫中山向外國人求助的本領和他適宜于做驚天動地大事業的品質。孫中山走進了中國駐倫敦公使館，其原因至今沒有完全弄清楚，不過有足夠的理由假定，他是經反復權衡才冒此風險的。他被監禁了12天，已經準備好把他解送回中國，要使他落得個悲慘的下場。在危急時刻，兩個當過孫中山的老師的英國人來搭救了他，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獲釋。孫中山馬上抓住這個機會，接見如饑似渴的新聞記者，然后寫信給英國的主要報紙，對它們以及英國公眾和政府表示感謝。他給新聞界寫的信顯示了他一生事業的特點，即他相信應訴諸西方人士的純良稟性，應努力說服西方人士知道他正在盡力為他的國家做好事，如果那些好心的西方人士與他易地而處，也會這樣做的。他寫道，這整個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盛行于英國的慷慨的熱心為公的精神，證明了它的人民卓然不群地表現的對正義的熱愛……我現在更加強烈地知道和感到一個憲政政府和一個文明的民族意味著什么，這使我以后要更積極地為我自己可愛而備受壓迫的國家尋求走上進步、教育和文明的道路”[[9]](#_9_Xi_Fu_Lin____Sun_Zhong_Shan_H)。

孫中山還寫了一篇短短的自傳和一本小冊子《倫敦被難記》，這本書是用英文寫的，但他后來又不予承認。它在1912年才用中文發表。[[10]](#_10_Xie_Wen_Sun____Guan_Yu_Xin_H)孫中山對外國公眾的重視再也沒有比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更加清楚了。他幾乎立刻成了國際聞人，盡量利用由此產生的每一點每一滴公開的名聲。他不論做什么，哪怕是上教堂，也盡可能著眼于影響輿論。他發展了很廣泛的個人聯系，從俄國的革命者到英國的傳教士，他都有交往。他發表了好多文章（其中的一篇發表在《雙周論壇》），呼吁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漢人的賢良政府和清明吏治，最初可用歐洲人的建議，在若干年內還希望得到歐洲人的行政幫助”[[11]](#_11_Xi_Fu_Lin____Sun_Zhong_Shan)。在他從中國駐倫敦使館轟動一時的獲釋之后的八個月期間，他儼然以一位世俗傳教士或運動領袖這類人物自居——這一運動會使中國身受現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益，也能鋪平走向西方商業發展的道路。

因此孫中山的要求只是英國準許他返回香港，而列強應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的要求被拒絕了。英國仍然認為，它的利益所在最好是堅持香港總督在孫中山1895年密謀舉事之后不久所頒發的五年驅逐令。孫中山絲毫沒有表示氣餒，因為倫敦的經驗和正在贏得的有利的公眾影響使他興奮異常，這只會使他感到樂觀。為了使他能擔負未來的重任，他把以后五個月的大部分時間用在在英國博物館讀書。孫中山可能是在這幾個月接觸了大部分西方思想，后來他就想把這些思想融合到他的中國革命綱領中去。特別是他強烈地被亨利·喬治的思想所吸引，因為亨利·喬治的思想在英國知識分子——例如費邊社會主義者——中間風靡一時。同時，他在倫敦的歷險使他在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盟友之中出了名。孫中山的聲譽日隆，這有助于他在1897年夏回日本途中在加拿大的華僑中間籌集款項。當他到達日本的時候，他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最有利的同情；這一次同情是來自一批日本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他通過他們會見了日本重要的政界人物，從此他就認為日本可以成為中國的“天然盟友”。孫氏取了一個日本名字“中山”，其音讀為Nakayama。他致力于學習日文，廣泛交結新朋友。由于歐洲未能給他以幫助，他就只好求助于另一個外國緊鄰了（見第六章）。

### 孫、康、梁之間合作的企圖

孫中山和他的新同志們一起投入了極其廣泛的活動。由于有日本人做居間人，他想通過恢復和康有為、梁啟超及其他維新人士的合作來開始他的活動。這些努力早在1895年初就已開始，斷斷續續進行了約一年半時間。未能合作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康有為已經青云直上，而且康有為相信，一位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時代日本的中國維新皇帝所能取得的成就，將要比孫中山這些革命黨人的成就更大。可是到了1898年，孫中山似是人望稍崇，而康有為則大不如昔。由于康有為現在已被清廷褫奪公民權，似乎在戊戌變法結束之后又有新的合作的可能性了。

變法運動把許多觀點不同的人糾合在一起，并且使傳統的思想發揮到了它的極限。有一派，也許可以譚嗣同為最好的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沖決了傳統思想的一切樊籬。1895年幾乎只有譚嗣同持“全盤西化”這類思想，但那一年他遇難后不久，其他維新分子都逐漸接受了他的遺志。有一個科第出身的畢永年馬上加入了孫中山一派。梁啟超在1898年以前已經聲言，稱許可以通過代議制度實現“人民政治權威”和“民治”。直到戊戌變法失敗以前，他一直相信能自上而下地實現這種民主改革。到1898年底，他在日本東京辦了一種報紙。他馬上用人民“權利”的字眼代替了僅僅是人民“權威”的字眼，他認為“權利”不能等待著朝廷賜予，“權利只能由每個公民寸步不讓地奮力爭取到手”[[12]](#_12_Huang_Zong_Zhi____Liang_Qi_C)。梁啟超已變成了一位革命家，他是那些年輕士紳的主要代言人；這些青年人因戊戌變法失敗而亡命海外，所以他們開始相信傳統是一潭死水，必須搞劇烈的政治變革。

孫中山認清了有擴大革命運動的機會，并熱切期待它的來臨。孫中山與梁啟超在1899年底合作辦了一個反滿的報刊，當那一年12月梁啟超去檀香山的時候，孫中山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介紹給他的哥哥。對孫中山來說，不幸的是，梁啟超去檀香山是帶了康有為的指示，銜命去執行康有為已于7月建立的保皇會的任務。梁啟超被弄得左右兩難，一方面是他與康有為及其一切教導的親密關系和他本人對孫中山潛勢力的疑慮，另一方面是他的激進的思想傾向。他試圖向孫中山表白：盡管他相信排滿思想，但當前最好是追求有皇帝名義的民眾政府的目標；他說，一旦除掉了慈禧太后，皇帝就可以當共和國的總統。

現在尚無材料表明孫中山曾答復過他的這一建議。梁啟超繼續走著搖擺的道路。他寫了許許多多東西，參加了檀香山的一個秘密會社以便設法更好地啟迪海外華僑的民智，1900年發表演說贊成暗殺行為，甚至遲至1904年10月還稱譽俄國的恐怖分子說：“大戰刀劍！圣哉炸彈！”[[13]](#_13_Tang__Pu_Lai_Si____E_Guo_Yu)當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時候，保皇會決定乘機救出被囚禁的君主。他們狂熱地開始準備一次起事，企圖擁立光緒帝在南方成立政府。對孫中山來說，這形勢似乎再一次給了他以聯合反滿力量的機會，而且盡管他對梁啟超的幻想已經破滅，他又一次尋求與康有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康有為表現得很冷淡，致使孫中山的努力不見成效。8月份在漢口爆發了一次起事，由唐才常領導，有康有為的支持，但它也被鎮壓了下去。保皇會此后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

孫中山重新開始了他的努力。他仍然保有畢永年和史堅如等原來的紳士改革派的支持，他還盡量同下述這樣一些人合作共事：例如廣州的紳士、華中和華南的秘密會黨、李鴻章及其他大員，以及像香港總督，甚至像菲律賓的叛亂分子這些外國人。雖然所有這些努力都遠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而且有些努力很不切實際，跡近幻想，但它們仍使北京當局感到震驚：孫中山全力以赴的努力，是與義和團起事、外國的入侵以及康梁所支持的漢口舉事同時交錯著進行的。清政府被所有它的敵人可能結成聯盟的前景所震驚，更因它的上層正開始同情叛亂分子而感到苦惱，所以被迫實行一些比先前設想的更劇烈得多的改革。因此，孫中山旋風似的革命活動的間接結果要遠遠大于它的直接結果。

直接結果是微不足道的。1900年年中，孫中山弄到了足夠的支持，使他敢于發動另一次起事。他再次想奪取廣州，但這次他決定首先在東面開始進行這場戰役，即在惠州建立行動基地，然后向廣州前進。在其他方面，這次舉事倒很像1895年的那一次：參加者主要是秘密會黨的成員，也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可能有30%是孫中山原來的人馬），以及一小批日本人和西洋人；戰略是用一支小部隊發動一場大起義；最大的障礙是如何獲得武器并把它們運進內地交給戰士；一再推延起義日期和更改起義計劃使行動走漏了風聲，從而使政府有時間從容準備對付這次起義。在10月份開始打響的戰斗后的兩個星期內，清政府就已占了上風。幾天以后孫中山下令解散革命部隊，再一次首途赴日，在那里檢討第二次失敗的原因。

孫中山感到可以增強信心，因為他的戰略的主要之點似乎是很正確的。惠州之役表明，一小股起義戰士能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大規模的部隊。廣東的居民在開始時只是不支持政府，但他們的中立馬上變成了給予叛亂者以積極的支持。成千人參加了戰斗，同時由于農民壯大了革命隊伍，所以能容易地弄到糧食和軍需供應并獲取情報，并更易伏擊打援和打敗大得多而裝備精良的敵人部隊。可是，這還是尚待加以發展的萌芽狀態的游擊戰術。地方上給予革命軍的支持大部分是為了地方上的問題，孫中山的人馬只是進行了最低限度的、短期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努力。他們沒有反反復復地試圖詳細說明地方問題的原委，沒有培養潛在的反滿或反帝意識，沒有傳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沒有開始成立獨立于或不同于現存秘密會社之類的新組織。據說，孫中山在1897年在英國的研究中大量吸收的政治思想，在1900年尚沒有明顯的表現。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只是一種傳統的扎克雷起義或盲動主義式的暴動，還不是20世紀的革命。

因此，對一個比孫中山更加客觀的觀察家來說，他的運動在1900年的失利以后，前景看來是頗為暗淡的。回顧一下，暴亂給人們深刻印象的是它勃然而興，忽然而亡。考慮到1900年的局勢不穩，同時應注意到這種不穩乃是國內一百多年動亂和外國數十年來對中國剝削的結果，那么，革命黨人的成就比起他們擁有的廣泛機會來說就相形見絀了。要么就是學者們夸大了清王朝衰落的程度，要么就是1900年的革命確是一場很軟弱的運動。

孫中山的名望這時一落千丈，致使其余革命黨人給他謚以種種惡名，例如稱他為“不學無術的亡命之徒”，“膽大妄為的寇盜”，或胸無點墨的“莽漢”，等等。年輕的領袖湖南人宋教仁說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孫中山只能大聲嚷嚷而已。可是，孫中山自己卻回憶說，1900年失敗以后，人們不再這樣貶損我了；“進步分子實際上同情我的不幸遭遇”[[14]](#_14_Li_Jian_Nong____1840__1928Ni)。

孫中山有幾年很少改變他的戰略。他仍和從前一樣，非常喜歡把他的運動的基礎放在討好秘密會社、海外華僑、日本人和西洋人士方面。直到1903年9月以前，孫中山把他的總部設在日本，但他本人卻從一個華僑社會旅游到另一個華僑社會去籌款，去征募追隨者和探索外國支持的可能性。他在河內創辦了一個小小的興中會支部，而且會見了法國當局以研究是否有可能獲得法國的援助。法國人曾對孫中山一度感興趣。惠州舉事之前四個月，他會見了法國駐日本東京的公使，請求后者協助他弄到武器和軍官。按照這位法國公使的說法，孫中山答應“給予我們所可能要求的一切”作為報答。據說，孫中山在1900年6月曾經說過：“我們不是外國人的敵人。遠遠不是。相反，我們呼吁他們理解我們祖國的新生和變化。”[[15]](#_15_Fa_Guo_Zhi_Min_Bu_Bian____Yi)法國人繼續密切注視孫中山的活動。1903年他們又一次會見了他，并且他們向法國殖民部長報告說，孫中山曾答應給予法國以“最誘人的經濟利益和一種保護國的地位，以對他夢想建立的新國家實行保護”[[16]](#_16_Fa_Guo_Zhi_Min_Bu_Bian____Yi)。但是，法國仍未給予援助。

到了1903年后期，孫中山甚至未能組成一個像1900年舉事時所擁有的那種軟弱的組織。秘密會黨、海外華僑和外國人合在一起只能結成脆弱的聯盟，當然不足以構成一次革命的堅實基礎。孫中山注意到了農村中可能存在群眾的支持；但他的模模糊糊的政綱不能引起農村人民的興趣，他除了和不甚可靠的秘密會社有聯系之外，和鄉下居民并未建立聯系。孫中山的幾次失敗，再加上幾位親密合作者的死亡或變節，使他平日昂揚的精神受到暫時的打擊。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道：“時（1903年7月）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17]](#_17___Sun_Wen_Zi_Chuan_____Zai)他在東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在灰心之余啟程去檀香山，重新周游海外去尋求華僑的支持。

### 1901—1905年的學生運動

到1901年，除了蓄謀未遂的叛亂和1900年的外國入侵之外，清廷又面臨著中國上層階級迅速擴展的離心離德的傾向。自1895年以來，對傳統思想的忠誠心已大大動搖，致使某些向往西化的人甚至準備接受西方的殖民化統治，以期促進中國的變化。與對清政府的嚴厲批評和官員明目張膽地不遵從北京詔旨的情況相比，這種失望和聽天由命的情緒還不是那么普遍的。清廷在1900年動員戰爭的號召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未被理睬。與此同時，甚至在1898—1900年的反動年代，某些省份的當局還悄悄地繼續搞維新，如派留學生出國等。

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產生了那些在后來將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會集團和組織。這些集團和組織包括新近紛紛成立了商會的新興商人階級、一個新的軍人集團和一個新的知識階層。這個新的知識階層首先形成并逐漸活躍起來。它是1895年出現的維新派紳士的旁支。和這些紳士一樣，新興知識分子階層主要也出身于上層階級，至少也曾經受過一定的傳統教育。這兩種知識分子都把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反動官僚當作他們的敵人。這兩者都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都決心引導中國走上復興的道路。但是，這個新知識階層還比較年輕，又因游學外國而懷有新的世界觀。

20世紀頭10年初期的一個短時期內，有一個人在發展維新派紳士和發展新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同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腳踏兩只船的梁啟超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表明改良派知識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是靠得多么攏。戊戌變法失敗之后梁啟超逃往東京，他辦的一種報紙開始介紹各種新思想。梁啟超一方面貪饞地吞嚼著西方和日本的各種各樣著作，一方面馬上用一種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文體把它們傳達給讀者。他還辦了幾所學校。他的著作燃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到1903年，梁啟超提倡實行最激烈的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使知識青年大大受到他的影響。

其他年輕的中國人也起而仿效梁啟超的榜樣。早在1900年，與梁啟超的報紙相似的刊物中就已譯載了西方和日本的著作，并且開始登載關于中國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社論。中國學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美國和法國革命中的人物——華盛頓、丹東、羅伯斯庇爾、拿破侖，但他們也把革命的思想追本求源到了盧梭和孟德斯鳩那里；他們有時甚至上溯到希臘人那里，但不久就主要轉向盧梭和19世紀的著作家，如達爾文、穆勒，最后轉向了斯賓塞。“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思想開始統治著學生們的頭腦。

日本的變革和發展的氣氛也有助于越來越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集團的出現。日本的榜樣告訴人們，擺脫外國的統治和贏得列強的尊敬是能夠辦得到的。1902年，英國甚至接受日本為盟國。中國學生在一個戰爭狂熱日益高漲的時期紛紛擁入日本。學生們被日俄戰爭的景象弄得異常激動，因為戰爭是為了決定哪個帝國主義強國將統治這部分特定的中國土地而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而中國政府只好坐觀勝敗，毫無辦法。由于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和對中國在庚子之役的屈辱記憶猶新，學生們對日本的成功的敬佩和對中國的無能及恥辱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學生的各種刊物充滿了攻擊帝國主義和攻擊滿人屈從帝國主義的言論，充滿了提倡尚武和愛國精神的言論：他們認為日本人在這方面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們譴責本國人民的懶散、自私和愚昧無知，所以他們呼吁萬眾一心，呼吁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領土而犧牲個人。

在學生這些要求的背后存在著一種新的、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民族意識。它把對中國過去的驕傲感和這樣一種信念糅合在一起：中國人民應該根本地加以改造，以便肇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因此，梁啟超的論“新民族”的一系列論文是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文章，因為他的這些文章中的基調是給過去以適當的評價，但也應該向前看，展望一個新的未來。這樣便巧妙地作了外國人對中國作過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是以保存中國人自尊心的方式作出的。

梁啟超發現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它確是民族性的根本。他說，中國的特殊品質是偉大、崇高而完美的，迥然不同于其他民族，它應以能夠自新的方式予以保存。他又說，它像一棵樹：除非每年抽出某些新芽，其枯萎將指日可待。進一步使民族返老還童的辦法，在于從其他變成獨立的民族所遵循的方法中挑選我們本來缺少的品質。梁啟超自居于19世紀改良家之外，因為后者只襲取西方文明表面的東西。他們只想嫁接樹枝到我們的枯樹干上來，而不理會其根本，如人民的品質、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活力。根本之根本的東西就是梁啟超所稱的“公德”，此即凡有利于群者即為善，反乎群之利益者為惡的原則。中國最大的缺點即是“在吾國民中竟無人視國事為己事者”[[18]](#_18_Jian_De_Ba_Lai_Deng_Bian___Z)。

梁啟超在論述了他那一代人的思想矛盾——即他們與中國文化的聯系和他們決定激烈地改變中國文化這兩者之間的沖突——以后，他還指出了第二個矛盾。使中國人對國事不感興趣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對本鄉本土有特殊感情。學生們也不例外地存在這一矛盾，但他們力求解決這個矛盾。

去日本的中國學生或者由他們的省府出資，或者由中央政府出錢，或者由私人擔負。其中最常見的是省政府出資。當學生到達日本后，他們分別組成各該省同鄉會，而且主要也是與同省的鄉親們交往。他們住在一起，出刊物，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和《江蘇》等。有些集團甚至組織該省的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見第六章）。

學生們的同鄉觀念雖然仍很強烈，可是，他們也認為他們的同鄉會組織是建設新中國的積木。學生們悲嘆，中國之所以缺乏團結統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正處于一個國際的“物競天擇”的環境中，湖北學生就是這樣說的。江蘇的青年則認為，在現代國家中，“主要的不是依靠個人的才智和勇敢，而是靠整個國家的才智和勇敢……所以中國人沒有贏得戰爭和商戰，一直處于貧困，這是毫不奇怪的”。中國的積弱是由于缺少舉國一致的大合作，所以一份湖北學生雜志在創刊上就寫道，全國的合作必須逐步予以實現，必須建立在較小單位的合作的基礎上。因此，愛國必須從愛本省開始。[[19]](#_19_Shang_Mian_Suo_Shu__Jun_Yin)湖南的學生們一致認為，如果要規劃中國，必須先規劃湖南。[[20]](#_20_Yin_Zi_Cha_Er_Dun__Liu_Yi_Si)

由于要投身于民族統一的大業，并且認識到傳統的鄉土觀念會產生分裂情緒，學生們便迅速著手組成一些全國性的團體，實行各省組織之間的大聯合。早在1900年，勵志會等社團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進各省組織之間的聯系。另外一些社團像青年會等，則致力于“民族主義”或恢復“國權”的活動。其中有些組織幾乎完全是某一個省的人組成的，但到了1903年，學生中間企圖建立跨省的全國性組織的情緒卻日益高漲起來。

在以后兩年內，這種情緒沒有產生什么重大結果。例如1903年春在抗議俄國侵占滿洲的時候，青年會會員組成了拒俄義勇隊。上海的革命志士出版了《俄事警聞》和《警鐘日報》，以抗議俄國的政策，批評清廷無力抵抗。在一位正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的義勇隊隊員的主持下，兩百名隊員每天進行操練；同時，有兩位領袖前往天津請求直隸總督袁世凱抗御俄國，并且請求接受他們在抗拒俄國方面的幫助。當這些路子都走不通了時，最激進的學生便轉入地下，繼續企圖推動一種有戰斗精神的愛國主義。新出版物采用了諸如《20世紀之支那》和《漢幟》的刊頭，而不用原來的省份名稱。老刊物則徹底改換門庭，例如《湖北學生界》改成了《漢聲》。新社團取了華興會或愛國會等名稱，表明它們全國團結的大方向，而且它們的綱領也提出了全國性的目標。

在日本呆了一年剛剛返回中國的湖南人黃興建立了華興會，它是試圖沖破省界的第一個最重要的革命組織。華興會的大多數會員雖然是湖南人，而且其目標按照黃興的話說是以奪取湖南省作為革命的基地，但他著重指出，一省不能與全國其余部分相敵對。因此只要可能的話，他準備尋求與其他省份人士的合作，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能夠發動舉國一致的行動。[[21]](#_21_Xue_Jun_Du____Huang_Xing_He)除湖南省以外，會員還來自至少其他八個省，而且華興會還同五個省（廣西、四川、湖北、江西及浙江）及兩大市（上海與南京）的一些組織取得了聯系。它最初的會員幾乎全部是學生，但是經過緊張的努力，它也著手吸收駐扎在湖南及其鄰省的一些士兵。它還贊助建立一個輔助性組織，其明確的目的是要迅速與哥老會等秘密會社接上頭。有意思的是，這個輔助性組織取名為同仇會；華興會除了反滿以外，沒有什么綱領給予它的秘密會黨盟友。黃興和幾位友人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以掩護他們的活動（這活動在1904年大部分時間里不斷取得勢頭）。

中國其他地區也同時在進行這種努力。在湖北，一位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革命家吳祿貞，回湖北后在政府的新軍中服役。他便利用他的勢力在陸軍中安插了幾位同志，并且在士兵中搞宣傳鼓動工作。他的朋友們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學校舉行集會，宣傳革命，并散發激進的刊物和傳單。到1904年夏，他們有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組織，取名為科學補習所，以此冒充一個學術團體。這個組織獲悉黃興正計劃在1904年秋發動叛亂，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黃興在湖南的行動。

他們計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方案，打算同時在湖南的六個城市起事，還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響應。現在不能確切知道這個計劃搞到了什么程度，不過他們至少是已確定了起事的日期（慈禧太后的70歲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在10月后期政府的耳目偵破了這一密謀，迅即予以撲滅。在幾次小規模起事的零星嘗試和幸免一死的厄運之后，黃興和其他幾位領袖四散逃命，他們多數人逃到了日本。這時，黃興等人只有準備考慮另圖良策來實現中國的革命了。

在1903—1905年之間，其他許多革命團體也有興旺起來的，也有衰落下去的。某些留日學生回到了中國。在上海，一批學生參加了罷課，并且組織了軍國民教育會。它的秘密宣言的宗旨表現出這樣的擔心：如果清廷繼續統治下去，中國人“會亡國滅種”。在表達當時盛行于學生作品中的絕望情緒和行動主義時，這宣言說道：寧可奮斗而死，不可一事莫為。[[22]](#_22_Ma_Li__Lan_Jin____1902__1911)軍國民教育會忠于自己的宗旨，于是組織暗殺隊，開始制造炸彈，派出會員去與秘密會黨及其他組織——例如華興會——掛鉤。

經過這些努力，在這些為數不多的組織中產生了一個幸存到1912年的組織，這就是光復會。和別的組織一樣，它也想聯合知識分子和秘密會黨分子一起反滿，而且它也是想打破自己省界的一個省的組織。光復會雖由浙江的學生和幾位老名流知識分子所創辦，但它也招收安徽和江蘇籍的會員，并把最初的基地設在上海。它受無政府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它組織不善，領導不力。學生想動員一個可靠的秘密會社的戰斗部隊，其努力迄無多大成效；而光復會之所以獲致聲譽主要是因為它蠻干，它至少搞了兩次轟動一時的暗殺計劃和幾次流產的起事。

### 分裂的運動與排滿主義的增長

在日本游學的留學生從1901年的約100人增加到1905年的約8000人。一小組一小組的學生在中國很活躍，特別是在比較安全的大城市中更是如此，因為像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有外國租界為他們提供了額外的保護。還有另外一些人則在歐洲和美國。雖然學生的幾十個小規模組織互相之間有聯系，而且學生們也彼此互相閱讀出版物，但沒有什么成功的協調活動。他們想沖出各該省組織的界限并把革命推向全國，可是未獲成果。清政府的警惕性和力量，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像孫中山那樣，他們也已認識到需要盟友，或至少需要比現有追隨者能提供的更多得多的人數，而且他們也確曾想法利用秘密會黨似乎能夠提供的潛力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也像孫中山那樣，他們的努力盡付東流。學生們只能在遠處進行辱罵，在自己隊伍內部鬧不團結，并把自己同別的革命組織和全國人民隔離開來。由于遭受挫折，他們更加乞靈于印發印刷品而不是真槍實彈地披掛上陣，但是他們的著作則呼吁應恢復并立即投入暴力行動。例如，在一份當時最膾炙人口的小冊子中，陳天華寫道：

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 向前去，殺！ 向前去，殺！[[23]](#_23_Zhou_Xi_Rui____Hu_Nan_He_Hu)

中國政府的反應迫使狂熱的反帝學生們考慮做出某些困難的抉擇。北京希望用乞靈于民族主義和內政改革的辦法，來誘使革命意識離開它的軌道。清廷又一次采取比它1900年支持義和團時更寓于幻想的形式，試圖把國內的不滿引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而不使它反對自己。政府通過創辦一些武備學堂和派遣更多的學生去日本接受進一步軍事訓練（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軍）的辦法，來支持反帝的恢復利權運動。1904年1月的一道上諭批準成立商會，它的目的顯然是在抗拒外國的經濟統治。[[24]](#_24_Yin_Zi_Luo_Zi___Zhong_Guo_De)批評政府的人要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了。梁啟超1903年在美國旅行時已開始認為，革命和共和政制未必能治愈中國的 痼疾。他深深地有感于清廷改革的氣勢，在1905年斷言說：中國人民只有經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時期之后才能實行自治。康梁二人現在認定，帝國主義是中國最直接的威脅，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支持清廷的政策，以反對帝國主義。

雖然，所有這一切對學生究竟有何影響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但顯而易見，學生們的意見是分裂的，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贊成排滿的革命。對大多數人來說，反帝是首要任務，而如果他們反對清廷，那可能是因為它姑息西方和日本。可是在1903—1905年之間，學生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靠近孫中山的立場：反帝的口號聲減弱了；西方式的改革被強調起來；排滿情緒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的排滿文章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歲的四川青年鄒容寫的《革命軍》，它由著名的國學大師章炳麟作序（章氏對滿人的仇恨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忠于明室的思想）。鄒容和章炳麟的合作，表明了革命運動怎樣使人們結成了出乎意外的聯盟。

鄒容小冊子的內容包括了對清朝統治的廣泛的指控，并且用最富煽動性的語言號召進行革命，以“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雖然他明言中國備受列強和滿人的“雙重奴役”，但他的憤怒幾乎全部傾注在后者身上。除此之外，鄒容的小冊子還充滿了對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德國和意大利的統一，以及對華盛頓和馬志尼等領袖人物及盧梭等思想家表示敬佩的言論。在結論中他給中國的未來開了處方，他坦白地承認：“嗟予小子……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25]](#_25_Jian_Zou_Rong___Ge_Ming_Jun)

鄒容言辭激烈的散文和章炳麟的序，觸怒了清朝當局。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他們未能說服上海公共租界的官員們引渡作者們，因為鄒容的文章是在公共租界發表的。在清廷的盛怒之下被外國人包庇起來的章炳麟和鄒容最后受中西混合法庭的審理，而使滿人受到劇烈挫折的是，1904年5月該庭判決章炳麟三年監禁，但只判了鄒容兩年的監禁。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一場徒有虛名的勝利，它本來是想從嚴懲處作者的，卻不料被外國的干涉所羞辱，但是，這場官司也暫時使上海革命運動受到挫折。

日本東京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此地馬上變成了革命宣傳的中心。這里宣傳排滿比宣傳反帝要安全一些，所以學生們的寫作逐漸改變了重點。學生們不是集中力量于反帝，或重點攻擊清廷姑息外洋的政策，或致力于倡議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尚武的中華民族，而是不憚其煩地縷述滿人的缺點。中國百孔千瘡的弊端都被大部分歸咎于這個異族王朝的統治。排滿宣傳正是在不團結成為學生的主要問題的時候加緊進行的。從策略上看，這種宣傳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有一個廣泛的革命運動，使之包括秘密會黨成員和華僑，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士兵、勞工和人數雖少但在日益增多的商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問題在于怎樣能使一個主要是政治性的革命運動適應這一驚人的事實，即中國也正在開始一場社會革命。新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產生，舊的社會集團和階級正在演變。排滿是一種大家都能夠基本上或毫無保留地加以接受的思想，而對于反帝，有人持首鼠兩端態度，有人則根本漠不關心。這種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滲透是不平衡的。在通商口岸身受外國歧視政策之害的商人和被傳教士或外國士兵破壞了其生活的農村居民，自然比秘密會黨的會員更熱衷于反帝，因為會黨成員有長期的反滿傳統，而很少或完全不接觸外國人；我們曾經以為秘密會黨是反西方的，其實它們基本上是排外的，有時甚至被中國的基督教徒慫恿著去反對滿人。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無論如何，他們喊出排滿的口號比批評英國人、法國人或美國人要更加安全。

總之，許多人多半責怪中國的困境是由于滿人的軟弱無能，而不大歸咎于外國的侵略。所有中國人都能夠看到滿人的顢預無能，而且所有人都身受其害。反帝激情不能取得這種舉國一致的支持，特別是不能取得激進的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支持，因為這兩種人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心理中還摻和著敬佩和嫉妒的心情，而他們對滿人的敵視感情則是純而又純的。

另外，西方帝國主義在1904—1905年似乎也有所收斂。英法兩國忙于歐洲事務，俄國則正在被日本弄得威風掃地。日本帝國主義此時已構成了比西方的統治更大的威脅，但是自從日本變成了學生們的主要避難所以來，他們也不能把日本當作一個問題來展開爭論。在東京的革命者們會盡量縮小外國對于中國內部起義事件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所以他們寧可討論共和政府的優點，而姑置帝國主義的劣跡于不論。他們希望用突出排滿而不是用突出反帝的辦法來避免激怒列強，甚至希望盡可能地贏得它們的同情，——這種態度是與孫中山的態度不謀而合的。

到1905年時，革命運動同時面臨著兩種情況：又是前景光明，又是危機四伏。革命派仍然害怕外國的侵略，但使他們更擔憂的仍是清政府日益增強的活力。雖然北京的所作所為是瑕瑜互見，但總的說來它表現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預料，而且毫無衰退的跡象。清廷有時對帝國主義者也小心翼翼地表現出堅定的立場，同時它的國內改革甚至超出了它在1898年拒不容忍的那些事物之外。清王朝正在取得新支持，甚至得到了像梁啟超這樣一些有現代頭腦的愛國人士的支持。

這種趨勢是危及革命運動的生存的，但另一些趨勢則為它提供了希望。幸虧有了清廷的維新，學生運動才得以發展，才有新的機會使得受教育的人們能在創功立業的同時去推動革命；例如，他們可以一方面在維新派官僚和新軍中工作，一方面又搞顛覆活動。出現了從事教育和新聞這樣的職業，這在幾年以前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改革需要具有某些外國知識的教師。在日本的學生雜志上初露頭角的年輕作者們回到中國之后參加了迅速發展的中國新聞業。他們在許多城市發現，在內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開展禁煙和禁賭運動，開辦新學堂，進行市政實驗，舉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當上了教師和新聞記者并宣傳激進思想，而且發現在商會中，在地方官員、警察和士兵中有志同道合的人。總之，學生們能夠找到許多潛在的朋友。他們過去未能在自己中間實現聯合，也未能團結內地的秘密會社和其他組織，這個教訓使他們懂得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運動。就像一位學生領袖在1905年所說的那樣，革命思潮就像已經變成大江大河的一條支渠。最初由人力開鑿的支渠已變成一條自然的江河。現在正需要作進一步的努力，要劈山開嶺，到達泉源，取出水來。[[26]](#_26_K_S_Liu____Song_Jiao_Ren_He)他們仍然保持著樂觀態度和決心。

## 革命的聯盟，1905—1908年

1905年夏是中國的轉折點。事態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件事正發生在中國政府及其革命的反對派都想探索未曾經歷過的道路的時候。對每一方來說，日本的經驗指出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看來，日本瞬息之間已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國家和世界強國。它令人注目地改變了國際關系（特別是亞洲的國際關系），因此它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仰。清廷看到日本人在取得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實行了立憲和創建了議會，但卻沒有完全摒棄他們的傳統。的確有理由相信，日本人之得以加強國家團結是因為復蘇了代表國家的古代天皇制度。北京對研究日本的立憲政體非常感興趣，準備如法炮制。

革命黨人則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亞洲人可以戰勝西洋人，贏得他們的尊敬，甚至可以激勵他們奮起革命。革命黨人現在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好奇心，中國學生到處尋找思想和資料。他們意識到世界上有一股新潮流，并且從俄國、波蘭、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地方以及日本找到了證據。給學生們印象最深的是其他民族的戰斗性，特別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同樣地，梁啟超對日本團結性的觀察促使他發出了要注意“公德”的號召。）看來，強烈的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識可以彌補缺少自然資源之不足，也可以彌補現代化起步晚的缺點。中國學生感到，國民萬眾一心地投身于國家目標的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所缺少的，而沒有這種精神，中國就仍然會是比它更加統一的國家的刀俎之肉。團結又恰恰是他們自己運動所缺乏的東西。他們受到新的希望和信心的鼓舞，再一次走向聯合。1905年8月，經過十年零星的和不協作的行動之后，運動的各個山頭都聯合組成一個單一的反清組織——中國同盟會。[[27]](#_27_Tong_Meng_Hui_De_Ying_Wen_Go)它變成了在以后兩三年間使革命派被認為是真正奪權對手的工具。

同盟會所代表的企圖是，首先聯合學生組織，其次再把它們團結到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周圍。雖然這一點成就是有限的和暫時的，但它是革命運動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統一。該組織成立的頭一年內約有一千人入會，大多數是來自學生團體。創建人希望進一步發展到第三階段，即實現全國性反清聯合，但沒有成功。聯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開始破裂了。同盟會在1908年實際上停止了活動。雖然它在1910年重新恢復起來，但在1911年各地起義推翻清王朝時，同盟會會員不足1萬人。在該組織活動的高潮時，它可能有更多的會員，而且它肯定還有許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領袖也估計說，大多數在日本的學生都是擁護君主立憲政體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會把革命運動帶到一個新階段，但同盟會此時與其說是推進的力量，不如說是一個象征。對于一個運動來說它是一個傘形組織，這把傘容納不下這個過于多樣和過于廣泛的運動。當一個廣泛的反清聯合在1911年迅速成為事實時，同盟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間，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錢財和思想的主要來源，它也是清廷進行反擊和外國人感興趣的重要目標。不論是友方或敵方，經常都把同盟會直指為“革命黨”。

### 一個新的革命戰線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國學生開始承認需要實行更大聯合的時候，孫中山已經在檀香山和美國的華人社會游歷。在尋求秘密會社支持的過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參加了美國的三合會分會。他籌措的錢只夠開銷旅行費用。他受到中國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別是傳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么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孫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實現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會見了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經過與他們的激烈辯論之后孫中山承認，他過去忽視了學生，過于信任秘密會黨了。他公開表示他已被說服：學生——特別是滲入新軍中去的學生——可以扭轉形勢而有利于革命。學生和孫中山同意要組織一個新的革命政黨，學生和秘密會黨在其中處于半斤八兩的地位。由于孫中山改變了對學生的態度，一位興高采烈的學生說：我們興奮地給東京寫了一封信報告這件事情，要求我們每一個同志在孫中山到達日本時熱烈地加入他的組織。[[28]](#_28_Zhu_He_Zhong____Ou_Zhou_Tong)至于孫中山，他的興奮情緒可能因這一事實而減弱了：他在歐洲五個半月期間所吸收的60名學生，在他離去時紛紛退出了組織，只剩下了14人。

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間雖有尖銳的分歧，但很少人強烈反對追隨孫中山來實現大聯合的思想。盡管孫中山屢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個別領袖應有的最高威信。孫中山的主要本錢是他精通外國的情形。當學生們擔憂外國可能要對一場革命進行干預的時候，他們要尋找一位能使他們的革命運動為外國人所接受的領袖。孫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廣泛經驗和聯系（特別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聯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外國領袖們認真地看待孫中山，密切地注視著他的業績，有些人偶爾還破格地要見他一面。他沒有像康梁那樣受到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接見，但他和他的兩位政敵康梁一樣引人注目，他們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壽誕（1904年）之際滿人實行的大赦之外的僅有的幾個“叛逆”。因此，他是中國三名天字第一號的公敵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無忌的革命者。他為人正直無私，全心全意獻身于共和政制和現代化，這種種都是沒有疑問的。在華僑中間籌集款項方面，沒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這樣大的能耐。學生們在中國內地比孫中山有更多的聯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敗表明他們還做得不夠。必須在國外做大量工作，而國外的工作又必須與中國大陸的工作相配合。孫中山同秘密會黨的聯系可能補充國內學生組織之不足。總的說來，他是能夠指望把一個高度分散而廣闊的運動聯合起來追隨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學生說過一句有趣的話，即孫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視力，使人們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29]](#_29_Yin_Zi_K_S_Liu___Song_Jiao_R)現在還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這種看法：把孫中山看成是船頭裝飾像和避雷針的混合物）。

孫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陸，他發現他的日本朋友們（見第六章）已經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及華興會的其他湖南領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可是，爭論仍然存在，而且因為別的組織將要被囊括進這個聯盟之中，所以談判變得復雜了。基本的爭論是，孫中山主張小規模而嚴密的組織，學生們卻主張建立其基礎更廣泛而比較松散的組織。這個有爭議問題的部分內容是，像華興會等原來的舊團體是否還要在同盟會之外獨立地繼續存在。另一部分內容是會黨和新軍將起什么作用，以及它們與知識分子將維持什么關系。像他在歐洲與學生們討論時所說的那樣，孫中山仍然強調會黨所具有的革命潛力和他與它們保持聯系的意義。宋教仁等學生領袖則認為，知識分子乃是革命陣線內最重要的集團。孫中山同意會黨需要由學生領導，否則只會使革命瀕于毀滅，但他堅持，學生的領導權只有通過會黨的力量才能實現。可是，學生似乎同意他們在歐洲的朋友們的意見；后者相信，知識分子應該集中力量在新軍中搞策反工作，因為新軍中的許多軍官曾留學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孫中山再一次承認他被說服。最后達成了這樣的協議，即不論是會黨或新軍對革命都是重要的，但這種妥協并不嚴格地指導政策。雖然革命黨人想對會黨和新軍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幾年中會黨仍繼續給反清運動提供人力。只是在會黨舉事幾經失敗之后，新軍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黨人的注意。

孫中山和學生們還辯論權力應該怎樣構成和分配的問題。最后，孫中山滿足于落得個“總理”頭銜和集權領袖制的門面，同盟會則采納了復雜的正式結構，以美國政府為模式。為了搞一套聯邦制，使之互相制約和平衡而又有分權，孫中山及其同志們甚至創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但這只是象征他們忠于現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這種民主結構和密謀行為的奇怪結合中，西方形式不過是門面裝飾。那些職能部門馬上變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別及小組。

除了一個省外，各省在同盟會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約四分之三的會員是日本留學生。約有一百名會員——其中許多人是學生——都是在國外入會的。所以同盟會很不同于孫中山的第一個革命團體；那第一個團體絕大多數是廣東人（其中逾半數住在國外），而且最大的職業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業者（18%）。在同盟會的會員中，廣東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緊列第二，這兩省只占會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個大隊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會員分屬其他13個省籍，其中五個省只有10名或不足10名會員。[[30]](#_30_1905__1906Nian_De_Tong_Meng)

從現有的會員花名冊來看，它可能夸大了學生在同盟會中占優勢的程度。在同盟會存在的七年內學生會員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組成部分，但同盟會實質上是一個聯合組織，其中沒有一種成分——甚至也沒有哪一個省的學生組織——是占統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國革命團體來說，它的品類的龐雜，還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較廣泛。學生組織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章炳麟和劉師培等年歲較大的知識分子，他們許多人有國學修養，甚至還擁有傳統的功名。他們代表著極其紛紜繁雜的思想，有時彼此嚴重地形成對立。有些人，例如吳稚暉和章炳麟之間，還有很深的個人宿怨。有些人對孫中山抱猜疑態度，有些人又對他很親近。有些人與秘密會黨的頭頭緊密合作，有些人卻與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協作，還有些人則主要與學生配合工作。各省同鄉會兼備了這些分歧，會員中間大部分出自上層社會的人也是如此，從這方面來說同盟會也絕不是一個和諧一致的組織。比如孫中山的追隨者中間主要是海外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小業主，也包括某些大企業家和各式各樣的勞動人民。他們許多人和中國國內有聯系，特別是在會黨中間有聯系。孫中山的追隨者比起學生及其同盟者來雖然人數很少，但卻有舉足輕重之勢。同盟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孫中山籌集的款項，特別是他從華僑中間籌集的款項。這一點使孫中山的追隨者的發言有了分量，他的個人影響也因華僑的財政支持而得到加強。除了許多小的捐助者外，還有幾位富戶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孫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學生們的親戚或朋友，還有些人是不屬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問題是它沒有統一的指揮和嚴格的紀律。這個聯合中的各個團體雖然經常合作，但它們并不能融為一體。每個小團體都有它的門戶之見。因此，學生人數雖多，但并不表明他們掌握了同盟會的實權。

### 意識形態與“革命一改良的辯論”

1905年革命黨人實現的團結雖然還很不完全，很不穩定，但它已達成了這個運動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黏合劑是意識形態，但這只是說，革命黨人在意識形態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運動中還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主義。毋寧說，一個活躍而強烈的思想酵素是他們都公認滿人無能，天命當改。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詢謀僉同，但當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經濟政策、社會變革和一些更具體的政策問題時，革命運動中的意見又形成互相鑿枘之勢了。

一方面是意見的一致在日益擴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鋒也愈演愈烈，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們了解共和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在中國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見日漸一致的人士包括許多所謂“改良派”及革命黨人。雖然雙方爭執激烈，甚至有些不懷好意，但他們之間的交鋒表明，他們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見地，甚至還有一些令人矚目的共同設想。這些思想交鋒也顯示了革命黨人之間的分歧，其嚴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啟超和孫中山之間的分歧。辯論的雙方，特別是革命黨人方面（因為梁啟超在1905年僅32歲，他實際上是單槍匹馬作為辯論的一方），提出了極不相同的見解，這些見解在激烈的爭論漩渦中又往往變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論哪一方，確實可以說也許是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相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由于近乎發狂地要尋求、吸收、博采和運用新觀點，他們的特點是高度折中主義的、自相矛盾的、模棱兩可和變化無常的。雖然如此，從1905—1911年雜亂無章的著作中還是出現了這樣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開展近代中國知識界的革命，其內聚性足以為政治和社會革命提供意識形態方面的基礎。

革命意識形態的主要輪廓是孫中山提出來的。孫中山作為一位思想家來說可能缺乏深度，但他在觀察別人的情緒、調和他自己和別人的思想以及生動簡明地表達自己意見等方面的能力，往往能補自己思想之不足。由于孫中山不耐心搞枝枝節節的問題，同時又陷于種種復雜的事務之中，更因為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籌款和搞革命的實際工作方面，所以他便把詳盡闡述革命思想的工作交給別人去做。他們填充著他的思想輪廓，還加進了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樣其中有些人便遠遠超過了他。自然，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部分地或全部地反對孫中山的思想框框。同樣地，整個運動因發展了很大一批人員和組織而使孫中山難以掌握，運動的各種思想也超過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可是，孫中山在不斷的失敗和挫折中仍能重獲運動的主導地位，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即在革命運動的排滿主義或共和思想方面，在它的戰略或戰術（特別是它的密謀方式）方面，以及在它力求調和又要反對外國統治又要尋求外國幫助及支持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方面——處處明顯地留下了他個人的烙印。孫中山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思想是最招物議，也最少被共和派陣營所接受的，但即使在這方面他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不管是同情者還是批評者，哪怕他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但仍然要圍繞著孫中山所說的和所想的內容來爭辯，仍然要討論他提出過的問題，仍然要使用他創造出來的術語。[[31]](#_31_Li_Ru__Jian_Ma_Ding__Bo_Na_E)

革命思想的精髓表現在孫中山所擬定并為同盟會全體會員所接受的誓詞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1905年起，由于數十位作者在發行于全世界的報刊和小冊子上的勞動，這副空骨骼架子就變得有血有肉了。東京仍然是中心，稿件則紛紛來自香港、新加坡、巴黎、舊金山、溫哥華、檀香山，以及當清朝控制稍松時的中國國內地方。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它在1905年11月創刊于東京，共發行了24期，直到三年以后被迫停刊為止；1910年又增印了兩期。它的編輯部改組了幾次，報紙一直對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開放。特別在1905—1907年期間，其他報刊也很活躍，雖然《民報》辦的時間最長，也吸引著更多知名的革命黨人給他寫稿，但它從不是運動中唯一的聲音。[[32]](#_32_Can_Zhao_Bo_Na_Er_Dui___Min)這些報刊彼此之間也有很多聯系，例如相互轉載文章，相互宣傳文章的要旨等，但大多數情況還是各走各的道路。有些出版物采取了與同盟會政策針鋒相對的立場，其中最著名的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雜志和在東京發行的《天義報》；前者宣傳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后者宣傳自己的種種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的觀點以及關于維護女權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一種革命刊物重在宣傳排滿和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一種著重介紹外國的思想，有一種則注意宣傳保衛中國邊境使之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

可是在1905年時，主旨是統一和民族主義。學生們和孫中山都對他們國家的前途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西方和日本是他們用以衡量中國進步的標準，比起西方和日本來，中國青年為國家的落后感到羞愧難當。現在，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的學生群眾集會上告訴學生們說，中國甚至可能進步得比日本更快。

在中國學生看來，日本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神移的；現在親聆中國革命領袖說中國可以進步得甚至更快，這使他們像觸電似的震動。孫中山告訴他們，中國得天獨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綜合在一起：有令人崇敬的歷史遺產，有無與倫比的人力和物質資源，有日本和美國可資借鑒，有日本朋友和像他本人那樣的一些中國領袖——他們懂得日本和西方因而在借鑒時知道如何取舍。據他的觀察，日本的現代化是由一小批人指導的。幸虧有一批留學生正在獲得建設新中國所需要的知識，所以他們的國家馬上會得到與日本一樣的領導者。只要中國的革命者保持團結，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們能夠創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政府，就像他們能夠制造出最現代化和最有效率的機車那樣容易。他們能夠應用亨利·喬治的原則使他們的經濟現代化。他們能夠擺脫外國的統治而獲致完全的主權，其辦法是建立一個共和國，以此向外國人證明中國是強大的、堅定的和進步的。

孫中山所強調的主題——統一、主權和國家強盛——是很適合學生們的胃口的。他們接受他，主要是因為他懂得外國人的威脅，不僅知道怎樣去消除它，而且知道怎樣把它變成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他滿懷信心地說出了學生們所感到的特殊使命感，他說：“每一件事都能被有決心的人安排好。常人所不懂者，一定會被 [這些]人介紹明白……如果我們能在一種變革中打動人們的心，文明就會立刻來到，不出十年則 ‘獨立’必將深入人心。”[[33]](#_33_Yin_Zi_Xi_Fu_Lin___Sun_Zhong)

孫中山呼吁學生們要起而領導一場救國的十字軍運動。這個呼吁是未來革命領袖們在以后數十年內要一再發出而學生們要不斷聽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它使運動的其他目的大大地相形見絀，甚至與其他目的發生了沖突。例如，同盟會誓詞中所說的共和政制和平均地權這樣一些目標，相當于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即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中文即民生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粹主義和平權主義與學生們的習慣和感情完全對立，而且也許是與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出身背道而馳的。雖然他們被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新思想所強烈地吸引著，但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向往民族主義，這或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既能喚起愛國主義的新感情，又能喚起團結一致和文化優越感的以往的意識吧。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第二、三項所得到的支持，要比第一項（民族主義）少得多。誠然，孫中山本人無論怎樣喜歡把他的三民主義同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同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論，卻顯然有一種超人倫的色彩；和學生們一樣，他之重視人民參政卻不如他之重視強有力的領導。另外，他和學生們一樣的是，他把民主和社會正義的理想擺在迅速改變中國成為富強國家的目標之下。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目的，對人民權利、制約與平衡以及聯邦制，中國的革命志士并沒有漠然置之。但是，他們之所以珍視民主更多的是由于它似乎能與國家的強大聯系起來。最強大的國家是民主制國家，而且最快地富強起來的國家美國就是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政制主要是能借以建成一個強盛中國的手段。社會正義同樣也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以手段成分居多：中國人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要終止貧富懸殊，終止特權的存在，但它也意味著全國的統一。當第二或第三個主義可能危及第一個主義的實現時，第二或第三個主義應該讓路，或者放松要求。例如，有幾次“平均地權”被悄悄地收了起來，以便安撫地主集團或其他人等，因為他們的支持這時被認為是“國民革命”之所需。[[34]](#_34_Zui_Qing_Chu_Bu_Guo_De_Li_Zi)

中國人在擬定這些觀點時一方面著眼于外國的威脅，同樣也注視著外國的楷模。在1911年以前約十年間的中國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外國的影響。中國人對外國生活懷著好奇心理并且傾向于采用外國思想，這種情緒自從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增長，到19世紀90年代以后又加速發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達到了近乎發狂的程度。有時中國青年在狂熱地學習西方和日本的時候，忽視了把他們的所學應用于中國的問題。革命的作者們更注意土耳其、波蘭和葡萄牙的愛國運動，而不大注意廣州和上海的愛國運動。當他們熱烈地討論民主和社會正義的時候，通常是用外國思想家們的名詞——這些名詞更適用于外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例如，他們主要根據德國的政治理論和日本的實際來討論立憲政制。他們寫到俄國的革命黨人，寫到他們使用恐怖和政治暗殺的問題，但很少提及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區別，以及他們自己和俄國革命人士之間的區別。他們勁頭十足地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志趣在于用以解釋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問題（如英國工黨的前途），而不是討論怎樣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偶然有一位作者探究對中國來說是極關重要的問題，例如土地國有化問題、土地政策與稅收政策之間的關系問題，但就是這類討論也往往旨在反映西方問題，而不是反映中國問題。例如，這些問題大部分產生于對國家社會主義是否可取的探討中，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把它們當作德國的和日本的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的。

中國人不僅僅是羨慕別人的模仿者。他們看到了西方生活有許多可資批判的東西，他們也預見到工業化國家孕育著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他們以令人嘆為觀止的手法把馬克思的話顛倒過來，預言中國社會比工業化國家更容易建立社會主義，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階級分化是太明顯了。因此，他們勾畫出一幅比較和平地過渡到適中形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圖景。有些人——最著名的是孫中山——也提出修改西方的民主實踐的問題，如果中國也要實現共和政體，這是勢在必行的。但總的說來，他們仍是無批判地吸收外國的觀點，囫圇吞棗，而不經過充分的咀嚼。這就引起了知識上的消化不良，這樣，當他們建立新的政府的時機到來時，它又轉而造成了政治規劃不周和執行不當的情況。

中國的革命黨人感到與“進步的”外國人有手足之情。鑒于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派、社會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所以他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先鋒力量的一部分。這就是他們為什么如此地注意外國革命人士的一個原因。關于共和政制和社會主義正在席卷全世界的信念，使中國人對這兩個主義大感興趣；中國人認為它們是最新的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們會給國家的強大、政治的統一和秩序以及社會福利準備條件。在他們尋求新的和進步的東西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抱住一個觀點又舍棄一個觀點，或者把那些很難共存的觀點兼容并收在一起。他們的思想意識把他們的個性弄得嚴重分裂，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對外國人的難以言喻的態度。他們對外國革命者有親切感，可是他們也妒忌外國的富強；他們反對西方的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但他們又同時向西方和日本求助。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淵源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部分統治，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革命運動及其意識形態的不穩定性。在革命人物中間，有的掉隊了，有的變節了，有的改信別的思想了，并且在自己隊伍中間出現了爭吵。章炳麟對共和制的價值及其是否適合中國國情表示異議；主張社會主義的人爭論國有化應該實行到什么程度；無政府主義者攻擊一切形式的有組織的權威；《民報》則悉心推敲在涉及多數人意見與“普遍民意”時的少數人和個人的權利問題。到了1907年，這些意見分歧爆發為宗派主義和公開的爭吵。可是，有一個重大的、政治方面多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仍對同盟會的思想意識有影響。孫中山被章炳麟等人指控從日本人方面接受了一筆巨款，另外他又因忽視中國同志和偏袒日本支持者而受到指責。另外一個問題主要也是章炳麟挑起來的，而且明白無誤地涉及一個政治問題，即革命是否過于洋化而有損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同盟會從來沒有用一個聲音講話，而從1907年起它的宗旨是不和諧的，主要分歧之點是關于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

應該從同盟會意識形態上的狂熱、活躍、成長、混亂和政見分歧這樣一個背景，來看待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的爭論。這場辯論主要是1905—1907年在梁啟超的《新民報》和在《民報》上展開的。1907年10月以后當梁啟超的報紙停刊以后，論戰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出版物上繼續進行，但其爭論點已不那么集中，其方式不那么系統了。

梁啟超為清廷大力引進立憲政府而積極地作辯護，同時他激勵北京更快地走向比它的維新所企圖達到的更扎實的民主。他以更強烈的筆觸嚴厲地抨擊革命黨人，但是他的攻擊題目是經過挑選的。梁啟超在民主和人民主權、國力、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等等問題上的觀點，很接近許多革命派人士的觀點；在這些問題上他們通常只爭論細節或方法，而不是爭論根本目標和價值。1905—1907年辯論的關鍵問題是，不首先推翻滿人能不能達到這些目標；這些目標能不能很快地達到；反滿革命會不會招致——或防止——外國人的干預和接管。雖然他們也辯論不同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問題和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君主制或實現共和國的問題，但他們討論這些問題就不如爭論應否容忍滿人繼續統治的問題那么火氣大了。

梁啟超的根本立場是，反滿革命是危險的和不必要的。說它危險，是因為它可能引起混亂，勢必招致外國的干涉。說它不必要，是因為滿人已經開始進行的改良本身會逐漸消除他們的專制統治于無形。梁啟超這些看法的基礎是他對中國能否取得很快的根本改變抱著極端悲觀的態度。他是一個敏感而變化莫測的人物，受到當代動亂的猛烈沖擊，所以他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些看法，但這些是他信念中最執著的一部分，在1905—1907年期間他頑強地為它們戰斗著。

革命黨人的觀點則認為，國事已經混亂不堪，而且外國勢力已出現在中國，這一切都得由滿人負責。正是這些本身就是異族統治者的滿人，他們縱容了列強進入中國，而且又沒有能力把它們趕出去。的確，清廷已經默許西方對中國的統治，以便維護它的寶座。中國之所以喪失了它從前在世界上的顯赫地位，不是墨守傳統，或者人口過多或者任何歷史事件之過，而是清政府喪師失地的結果。因此，革命黨人責怪入侵的帝國主義列強少于責怪中國的那些不能大力抵抗入侵者的人。《民報》的作者們極力縮小外國的侵略性，一方面用來駁斥梁啟超，一方面用來支持革命者的論點，即盡管列強由于中國軟弱和清廷的姑息而獲得好處，但它們現在也會歡迎北京有一個穩定而進步的政府。

梁啟超猛烈攻擊說，外國的統治已迫在眉睫，因為他堅持列強貪殘成性，會迫不及待地利用機會瓜分中國。他甚至反對爭取獲致外國資本。孫中山則堅決認為，西方和日本的援助在努力推翻滿人的時候就可取得，從而把中國推向前進。他無休止地想方設法要弄到這種援助，他一直深信，如果沒有外國人的幫忙，中國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支持他的人，像《民報》的主要執筆者胡漢民，都是捍衛孫中山的觀點的，所以同盟會公開呼吁外國給予援助。

清政府在排外運動中曾于1900年促使秘密會社“殺盡洋人”，現在仍在起勁地強調“恢復國權”。它的維新派擁護者們認為，它的努力即使還不充分，但也比革命黨人的姑息政策可取。的確，當1908年的事件使民族感情需要集中起來反對日本時，革命黨人并未帶頭。相反，一只日本船為革命黨人運送走私槍支，政府對它的拘留卻得到了群眾熱烈的支持。雖然許多人對政府未能堅持抗拒帝國主義而感到憤怒，但至少在1909年以前他們寧愿敦促它多做點事，而不是想到去推翻它。

同盟會的一些發言人堅決認為，推翻滿人的統治是有效地抗御帝國主義和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希夫林敏銳地注意到，當時革命的民族主義由反帝暫時轉向反滿，主要是在策略上轉移了重點：“不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忘記了他們的反帝冤仇，而是他們感到沒有希望贏得這場沖突，因此他們在對外關系方面安于表現出克制的態度。”[[35]](#_35_Xi_Fu_Lin____Sun_Zhong_Shan)還得補充一點，革命黨人不愿直接攻擊外國列強，這并不妨礙他們間接地宣傳反帝論點；當他們發誓要結束滿人統治時，他們也保證要恢復漢人統治下的中國。

在火熱的意識形態爭論中，排滿思潮沸沸揚揚，掩蓋了其他問題。《民報》宣稱：“所謂惡劣之[滿人]政府，謂以惡劣之民族而篡據我政府，其為惡也根源于種性，無可剪除，無可增飾，不指一二端之弊政而云然。”[[36]](#_36_Hu_Han_Min____Min_Bao_Zhi_Li)這樣喧囂的種族主義喊聲可能主要只是一個宣傳策略口號，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原則，但是它創造了一種辱罵和仇恨的氣氛，使得講道理的討論受到干擾。因此可笑的是，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越來越起重要的作用時，理性反而被感情所壓倒。一位學生后來在總結1905年前后他們那一代聽到各種主張作何反應時寫道：“當我們從梁啟超那里獲得精神食糧時，我們從孫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感情上的營養。一般說來，當決定性時刻到來時，感情導致行動；當這一時刻在中國到來時，孫先生這位夢想家兼實干家在對擁護憲制政體（即立憲君主制）的新式文人的論戰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37]](#_37_Jiang_Meng_Lin____Jiang_Meng)革命黨人重視的是要贏得這場辯論，不大重視解決有關共和政體、土地政策和外國人在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問題，所以他們得不償失：打贏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場小遭遇戰，卻丟掉了爭取對新中國的領導權。后來，當清廷已倒而排滿思想已達目的時，他們就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提供給國家了。合起來看是個笑話，在1911年以前忽視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利害關系和價值而且彼此視同切齒之仇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即將在1911—1912年攜手并肩地推翻清廷。因此，這些辯論表明了1911年以前對反清運動是多么沒有準備。

1905—1908年的思想戰線大辯論令人奇怪地脫離了中國的生活。辯論的內容不但忽視了百分之八十住在農村的人口，而且也脫離了城市新興的運動。除了經常發生的、有時還是規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還有許多從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從純粹地方性的活動發展成為省一級的、甚至全國規模的運動。這些運動包括從禁賭、禁煙、禁纏足運動等常見的改革計劃，到組織學聯、勞工聯合、鐵路建設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有從未在公共生活中一顯身手的人們——特別是婦女、青年和商人——開始參加。1905—1908年革命運動領袖們的觀點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關心的事情。革命領袖們關于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會改革者的行動相去甚遠：后兩種人的喊聲越來越高，要求清廷應該快些采取更果斷的行動。只是在革命知識分子指責清廷的改良辦法主要是為了加強滿人政府的騙術時，他們才能與群眾的抗議活動取得了有效的聯系。一方面是革命黨人揚言要致力于民族主義、民主與社會福利，一方面是公眾越來越要求國家的尊嚴、自治和社會改革，但這二者之間存在的可能的結合并未得到加強。沒有建立任何組織紐帶。如果說有什么聯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經同意了的觀點上的聯系。梁啟超及其《民報》上的反對者所爭辯的東西，同廣州自治商會和南昌自治協會這些活躍的組織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同盟會會員自己辦的地方團體，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讀書會和贛州學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進行非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對江西省的革命運動加以研究之后發現，這兩派在東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們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顯了。[[38]](#_38_Sai_Mou_Er__Ku_Po____Xin_Hai)

在中國，那些積極推動實實在在的變革和那些不這樣做的人之間的分歧，卻是更為重要的。在推動變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樣的貢獻。他們的辯論在上層知識界中傳布了新觀念和發展了一套新語匯。觀點集中在國家的團結統一問題上，公民權、平等、權利、代議制、國有化和公共輿論等等概念豐富了語言詞匯。這些詞的意思和含義還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說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10年間它們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創造的精神產品。1905—1908年的大辯論差不多使所有傳統觀點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幾個除外），使整個一代新知識分子顯露了頭角。他們的著作滿足了對急劇變革的日益增長的要求。1910年以后，當清廷終于證明它無力滿足這種要求時，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 革命策略和秘密會社

同盟會幾乎沒有改變1905年以前已經失敗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會社來補充其兵員，并且希望再像廣東那樣的單獨一個省發動武裝起義，以推動全國的革命。

軍事勝利后隨之而來的將是建立共和國的三個階段。隨著每個縣在清統治下被解放出來，將實施軍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內，貪污、不公正、行政不當以及像纏足等有害的舊風俗的“積弊”都要被消滅。隨后將廢除軍事管制法，并在每個地方實施臨時憲法。在以后六年實施這些臨時憲法的時期，地方自治的權力將轉給每個縣的人民，而軍政府則仍管理全國的政務。最后一步是實施全國憲法和進行全國選舉，最后，軍事管制法將被取消，由憲法產生的共和政府將治理國家。

學者們頌揚孫中山樹立了“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內容是由一個臨時政府實施訓政，以訓練政治上麻木的中國人民，使之最后參加立憲民主政制”[[39]](#_39_Deng_Si_Yu___Fei_Zheng_Qing)。但是，如果說孫中山創立了訓政的思想，其他許多人則接受了這個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啟超也堅持，中國人民還沒有作好治理自己的準備。他號召應有一個在清朝監管下的“開明的專制主義”的過渡時期。本質的區別并不是訓政的觀念，而是究竟由誰來充當訓政者。孫中山的主要貢獻是建立臨時政府的思想。沒有人能說清楚民主制導師的資格是什么，也不能說清楚如何去取得這種資格。知識分子簡單地認為他們最有條件在中國走向民主制的過渡期中進行管理。孫中山主張迅速但有步驟地向立憲政府過渡，這個觀念深為與梁啟超打筆墨官司的同盟會會員所依賴。兩個主要論戰者汪精衛和胡漢民認為訓政是對梁啟超論點的答復，因為梁啟超認為革命會導致由一個軍事鐵腕人物控制的獨裁制。

孫中山的軍事戰略證明是難以執行的。同盟會沒有自身的內地根據地，只能對國內事態作出反應而不能采取主動行動。它與行動的地方相隔太遠，而且其內地的盟友在它對他們進行支援和補給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堅持戰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廣東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壓力的農民造反者派兩名代表到孫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經過助手的調查后，孫中山派黃興和一個姓王的三合會領袖去監督這次行動。王某到9月初才組成一支農民和秘密會社成員的大隊伍，并且安排它與兩支叛軍合作。王某很快奪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繼續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黃興在這時也已在設法打入府城的守軍。但當黃興的計謀未成時，他們內外協同攻擊的企圖失敗了。王某隨即離去，臨時組織一次單獨的行動，這次行動使他的兵力從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戰斗持續了幾天后，他彈藥告罄，不得不撤退。孫中山的總部因在離戰斗現場二百英里的河內，他不能向其戰斗人員提供給養和增援。廣東西南的起義在開始后約四個月就全部歸于失敗。在1906—1908年之間，至少有五次起義，也許多達12次以上，都以同樣的原因失敗了。

原因究竟何在？很明顯，連綿不斷的崎嶇地形給孫中山從外部支援的策略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單是地理條件就使他的策略不能實行。但在日本、香港、河內和上海的革命者與他們在中國的潛在的盟友和支持者之間，不只存在著距離、高山、敵軍和警察的障礙，還存在著非常大的社會距離。同盟會的成員雖然比以往的任何組織更加復雜，但仍基本上由知識分子組成。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他們必須逾越階級的界線。孫中山的策略是把秘密會社當作橋梁。但是秘密會社難以負此重任。

在某些方面，革命派和秘密會社是天然盟友。兩者都被宣布為亡命之徒，都由進不了傳統社會等級的人組成，都憎恨外國人的統治。

同盟會之與秘密會社合作，主要是為了接近對當局不滿的、有叛逆精神的和最具有潛在革命力量的農民。在此方針下，19世紀已經普遍出現的農民起義在20世紀的頭10年更有所發展。大部分起義開始時只是地方問題占主要地位的小運動，但缺糧、通貨膨脹和高稅額（常常是為興辦新學堂等改革而支付）成了許許多多地方上的問題，因而也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問題。因此，地方性的叛亂可以發展成為更廣泛的運動。只有擁有地方組織和有一定數量農民參加的秘密會社才得天獨厚地處于直接指導這類運動的地位。尋求秘密會社為盟友的革命派，“是在尋找接近地方勢力的捷徑”[[40]](#_40_Lan_Jin____1902__1911Nian_Sh)。他們沒有想出獲取民眾支持的其他手段。秘密會社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手段，但也不是毫無希望的手段。它們在20世紀的頭10年發展到農村，并且在各方面表現出具有日益加強的內聚力。至少在1906年，它們是中國境內最活躍和最強大的反政府力量。

到1906年，起義在華中和華南全面爆發。其中一次是1906年12月沿湖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起義，它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致必須從四個省派軍隊去進行鎮壓。礦工和其他工人也參加了方圓約八百平方英里的萍瀏醴地區（即江西的萍鄉和湖南的瀏陽和醴陵）的農民隊伍，起義者的目標是各種各樣的。在江西，有幾個革命學生在不知道東京有同盟會總部的情況下，企圖網羅知識分子和秘密會社成員于一個組織，來發動一次群眾運動。在兩省交界的湖南一側，革命派卷入的程度較輕。經濟要求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但在其他方面目標就不那樣一致了。在江西，滿洲人被攻擊，因為他們向洋人獻媚。在湖南，有一些像“滅清護洋”和“鏟富濟貧”的老口號。有一個自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的集團有著明顯的傳統，另一個集團卻號稱“中華共和國政府”，它許諾給予自由和平均地權。[[41]](#_41_Jian_Zhou_Xi_Rui___Hu_Nan_Hu)各地起義仍由地方領導，主要由地方問題引起；學生仍不能與秘密會社建立持久的關系。

同盟會約用了兩年時間致力于加強它與秘密會社的關系，并通過它們去加強與中國人民的關系，但是迄無成效。爆發了無數次起義，只有少數是由同盟會指導的，較多的起義由秘密會社領導，但絕大多數起義則沒有明確的上級組織。江西的經驗是典型的。雖然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經濟苦難的加深造成了饑饉、盜匪和大量涌現的起義，但革命派根本不能把他們的運動與農民聯系起來。相反，農民的不滿找到了反抗的傳統形式。在浙江，農民起義“幾乎總是完全脫離革命運動的”[[42]](#_42_Lan_Jin____1902__1911Nian_Sh)。

學生激進分子所以不能與秘密會社結成同盟，并通過它們與群眾結成同盟，原因并不簡單地在于階級偏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證實，不論是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或是秘密會社，都不代表某個單獨的階級或某種單一的觀點。[[43]](#_43_Li_Wen_Hai____Xin_Hai_Ge_Min)有些秘密會社并不是一貫反滿的，也不是一貫排外或反帝的，有的由小紳士、商人、地主或官員領導。的確，在解釋秘密會社與知識分子不能在一起有效地活動時，學術界的意見著重指出，秘密會社的虛弱與知識分子的清高態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原因。[[44]](#_44_Tong_Shang_Shu__Di_171__177)

秘密會社和革命派既代表著廣泛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分歧，也有著共同利益。問題是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

這時期的激進知識分子要求擁有特殊身份，因為他們受過國外的教育。他們贊成由“有大決斷的人”對老百姓進行“訓導”，這本身就是他們有此要求的明證；但很少革命派深入群眾。大部分人留在國外大城市，當他們在中國時，就麇集在大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不像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分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眾。例如，紳士經常與秘密會社發生關系，這說明傳統的社會精英與平民建立關系時困難要比近代社會精英少，因為后者發現自己與城市商人、華僑和外國人的共同點多于與中國農民或游民的共同點。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

這種情況可從廣州地區得到證明，對四川、湖南、河北、江西、上海和浙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廣州三角洲，革命出現了兩個運動：一個涌現在農村，其根源基本上是自發的和傳統性質的，另一個則是大城鎮的秘密會社。例如，三合會把它的活動限制在集市中心及其周圍，并不擴大到農村的農民那里。“民軍”首先在農村地區、村落和小城鎮組成。它們最初的形式是民團、氏族武裝和村社自衛團。它們逐漸地合并成更大的部隊，并與官軍交戰。當它們超越農村和集鎮而向較大的城市中心發展時（因此容易被動員起來搞超過地方性的大目標），秘密會社提供了進行組織、聯絡和協調的必要手段。最后，有些“民軍”終于與同盟會接觸，并且在廣州（也許還在其他重要城市）與它合作。但到那個時候，許多農村青年已經回轉家鄉了。[[45]](#_45_Xie_Wen_Sun____1911Nian_De_H)

總之，在廣東省，伴隨著革命運動的是農村的嚴重動亂，而革命派與這種動亂只能建立暫時的、松散的、脆弱的和一般來說是最低限度的聯系。在有些情況下，這些聯系是由前往偏僻地區發展新組織的革命派，或是由到城市參加現有組織的農村青年建立的，但秘密會社提供的聯系則要多得多。同盟會提不出能吸引農民的堅定的土地政策。的確，它贊成的是農民不愿意資助的那種現代化綱領。它還缺乏組織能力，以使它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意識形態吸引力發揮最大的效用。因此，革命派從來未能充分利用秘密會社已經創造的接近群眾的機會，也從來未能找到一個比秘密會社更好的中間人。它更不能直接與群眾聯系。

當革命派真與一個秘密會社聯系上了時，他們又往往不能與普通會員接觸。在運動初期，參加孫中山的興中會并積極參與最初幾次暴動的秘密會社會員與其說是一般會員，不如說是會黨領袖，這些人“受過教育，相當富裕”[[46]](#_46_Bao_Luo_Ke____Lue_Lun_Mi_Mi)。在浙江，與革命派緊密地在一起活動的兩個秘密會社都由小紳士領導，其中一個會社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蘭金的說法相當恰切：在諸如此類事例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對待群眾，“與其說像對待信徒，不如說像對待軍隊”[[47]](#_47_Lan_Jin____Shang_Hai_He_Zhe)。

像紳士階層多少世紀以來已經做過的那樣，紳士和革命派這時都設法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秘密會社。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1907年（約在4月）成立于東京的共進會，其目的是要團結長江中游一大片地區的秘密會社。它代表了同盟會中人數相當多的一個抗議派，一方面反對孫中山把力量集中在華南，一方面也反對共進會領袖們認為的那種過分關心理論和知識分子影響太大的現象。該會最初的成員中大約有九十名同盟會會員，其內部組織則仿效同盟會。創辦人是強烈反滿的，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其他部分則不很熱心，特別是對它的土地政策更不熱心。共進會會章采用了同盟會的前三點，但把第四點“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這個明顯例子說明同盟會的思想意識為什么不能流入內地和被群眾所接受。該會的領袖們聲稱，“地權”之所以被改為“人權”，是因為“人權”對秘密會社成員更有吸引力。但農民則發現“人權”二字神秘莫測。一個參加者的回憶說：“共進會放棄了‘平均地權’的主張，終于使它無力去發動廣大的農民群眾。”[[48]](#_48_Wu_Yu_Zhang____Xin_Hai_Ge_Mi)

這一改變，更多地想討好地主，而不是為了吸引農民。許多共進會領袖出身地主家庭，他們對“人權”不像對哪怕是意義含糊的“地權”那樣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們心目中的“人權”與同盟會知識分子理解的“人權”意義不同。例如，共進會江西分會采納了儒家的準則：“‘平均人權’指的是按照傳統公認的社會規范確定的正確行為。”[[49]](#_49_Ku_Po____Xin_Hai_Ge_Ming_Qia)

因此，共和革命派想挖掘在中國的潛力來進行民眾起義的努力，并沒有使它與一般民眾建立牢固的關系。共和派還發現，他們必須與紳耆妥協，后者對革命則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共進會是第一個明顯的暗示，它表明了那一類組織后來會發展成為一個范圍廣大的嘗試，以把反滿的共和革命與保存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結合起來。

到1908年初，同盟會已經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力。大約在一年中，它一次又一次地發動或參加了起義——根據不同的說法，總共至少五次，也許多達八次；但沒有任何明顯的成就。政府在鎮壓這些起義時不很費勁。沒有一次有希望觸發革命派夢寐以求的連鎖反應。隨著失敗的升級，同盟會會員內部發生了爭吵。曾經在1905年被掩蓋的分歧這時把團結的門面搞得粉碎。在敵視孫中山的新編輯的主持下，《民報》發表了批評共和主義的文章，論調也很悲觀。同時，清政府又取得了革命派在1905—1906年已經奪走的主動權，逐步增加對外國當局的壓力，要求它們取締或限制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印度支那、上海公共租界和其他外國庇護所的活動。在國內，它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革命活動仍在繼續，但協同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了。學生、秘密會社、老的革命知識分子和反滿的紳士在以后的兩年中各行其是，直到1910年才開始組成新的隊伍。同時，在1907年被逐出日本和在1908年1月被逐出河內的孫中山在新加坡避難。從那里，他又恢復旅行，去訪問全世界的華僑界，這時他仍在繼續實施十三年前自己已經制定的策略。

## 清王朝的滅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時，清政權已經在一個多世紀的叛亂和外國壓力中幸存了下來。與白蓮教、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規模宏大的運動的情況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規模的分散的起義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了下去。與此相反，表面上與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沒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卻導致了王朝的覆滅。對清朝的支持在從前一些起義中很少動搖，但這時卻冰消瓦解。幾次小規模事件迅速發展成新形式的大運動，最后出現了一個共和國。

很明顯，在1908—1911年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但是那些變化只是一個很長的衰敗過程的最后階段呢，還是朝著新方向的急轉彎呢？

總的說是傳統，具體地說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長時期中已經在衰落，但不時出現復蘇的跡象。即使清朝在諸如自強運動和1898年維新運動中失敗了，但仍表現出一種傳統適應能力的頑強韌性。1901年以后的幾次改革是又一個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10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清朝的歷史并不單純表現為漫長的衰敗過程。

按照這個觀點，則1911年前后確有一個突變。清朝已經容許甚至鼓勵新利益集團的發展。它已經在形成新風氣和創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貢獻。它已經放寬了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并把公共事務交給公眾討論。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夠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們對原有的秩序構成任何嚴重的威脅。大部分商會、學習會、自治會和其他新的組織的成員依然是忠誠的臣民。但是他們正在開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們對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們的期望驚人地發展了。例如，只在12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為過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對他。但同樣是這個清朝的領導集團自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并且超過了康有為曾經打算做的一切，“新紳士”們卻立刻斷言朝廷還走得不夠遠，不夠快。在1910—1911年他們堅持新的要求，當他們不能得到滿足時，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滿和更廣泛的反清大聯合。

不妨引用列寧的話，可以說1908—1911年之間發生的一切是上層階級中較活躍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舊的方式，而上層階級的其余部分人變得不能再按舊方式行事了。根據列寧關于革命形勢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層階級”的成員。下層階級在最后的反清聯合中雖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數量還不足以產生一次群眾革命。1911年反清聯合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別是新軍中的士兵）和“新紳士”（特別是在咨議局、自治會和投資者集團中的“新紳士”）。“下層階級”在聯合中主要是通過新軍進行活動，但也在聯合以外的各種運動中活動。革命學生也在新軍中起最直接的作用，還可能在“新紳士”中起作用。他們的宣傳品（包括舊《民報》和其他雜志）在發行后幾年仍在內地流傳。有的學生還在1911年與其他革命派結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并參加他們曾經大力贊助的聯合。

多年來迂回曲折的事態發展進程突然起了變化，并且集結了力量。反對派過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亂了步驟，因這些改革和自身內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時他們各處一方而社會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設法保存了下來，最后，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終于把他們糾集到一起來了。

## 大聯合的出現

### 新軍

清代的軍事現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軍。到20世紀頭10年之初，清朝的維新措施正在對中國軍隊的社會成分和總的面貌產生影響（見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定了一套通過筆試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時，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軍多半是從上層階級征集兵員的。在其他省份，新軍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舊軍中的比例高得多。[[50]](#_50_Guan_Yu_Zhe_Fang_Mian_De_Zon)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從事戎馬生涯，這是最重要的變化。一名中共領導人回憶說，在1910—1911年，當他還是萍瀏醴區的一個十來歲的青年時，“我的許多同學甚至敢于打破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他們終于接受了……戰死疆場，雖死猶榮的新思想。他們以參加新軍為榮。”許多人出逃去參軍，其中有的不夠年齡，就偽造證件，以參加入伍考試。[[51]](#_51_Zhang_Guo_Dao____Zhong_Guo_G)

新軍大力進行教育（特別是減少文盲）工作，這同樣是新事物。士兵們歡迎進學習會學習的機會，學習成了普遍的活動。一名湖北士兵回憶說，在他的部隊中，每人的閱讀能力大約達到了小學水平，班長們都會寫字。[[52]](#_52_Li_Pei_Ji____Tong_Meng_Hui_Y)

與某些舊軍隊不同，新軍在它們駐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較謹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薦和保證等安全手續，以確保入伍者品端行正。這樣就傾向于更多地向上層階級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軍士，甚至下級軍官可能仍繼續來自農民家庭。對游民和盜匪分子則堅決加以清除。與過去中國軍隊明顯不同的是，新軍與地方老百姓關系良好。許多中國人與革命運動的唯一接觸是通過新軍進行的。

留學日本歸國的軍官明顯地促進了這些傾向。從一開始，到日本軍校留學就蔚然成風。當1905年通過仕途發跡的舊門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威信。對那些既關心國家又關心自己前途的人來說，軍事訓練可以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許多青年感到，中國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傳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會會員在這些軍校留學生中大力進行宣傳。盡管政府瘋狂地大力把現代軍事訓練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圍內，但日本軍校的學生名冊中充斥著年輕的中國激進分子的名字。他們回國在新軍服役時，就擴大了革命的宣傳。

湖北發生的事件值得特別的注意，因為新軍是在那里開始1911年的起義的。張之洞總督曾在該省花大力氣建立了一支新軍。但張之洞在甄別革命分子這方面，卻不如其他官員——例如直隸的袁世凱——那樣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動的溫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吳祿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備學堂派往日本進修。他在參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輟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后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隱藏的革命積極分子。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后，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系密切（但與同盟會關系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軍隊同盟會”和“振武學社”等名稱中看出。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別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這樣就開始了1907—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么脆弱。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1908年后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征集會員和盟友。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軍隊同盟會”被“群治學社”接替。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憲政計劃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劃的活動。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后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后出現的。隨著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并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后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號。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陸軍部長委托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53]](#_53_Liang_Jing_Dui____Xin_Hai_Ge)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在湖北，像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并不一樣。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爭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這就是地方官員顢頇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54]](#_54_Luo_Zi_De___Zhong_Guo_De_Gon)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革命派是否取得了像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并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文學社。在一個月內即已有約400名新成員入社。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里去。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爭。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句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55]](#_55_K_S_Liu____Song_Jiao_Ren_He)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后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別出面充當。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 新紳士和省咨議局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爭端，又使北京因其態度軟弱而受到攻擊，咨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16個省立憲派中的51人聚集在上海，組成咨議局聯合會。該會隨即派一個32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這次行動贏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愿后，11月4日的上諭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布憲法。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內閣。但政府態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贏得讓步。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諭命令請愿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討論了兩個月。因此，到1911年初，請愿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并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愿態度轉變為爭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這些請愿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辭一次比一次強烈。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眾的支持以防止叛亂。但時隔一年以后，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的原因。六個月以后，隨著要求立憲派“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號召就更加清楚了。[[56]](#_56_Zhang_Peng_Yuan____Li_Xian_P)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號召所有中國人“并力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57]](#_57_Ou_Nei_Si_Te__Yang____Liang)。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斗爭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他甚至爭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爭論得最為激烈。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隨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立憲派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此后的行動，已不如請愿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58]](#_58_Zhang_Peng_Yuan____Li_Xian_P)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只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將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于“新紳士”一方。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于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于革命組織。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墻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省議員滿懷著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咨議局議員年輕，并且更傾向于西方）特別有戰斗性。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愿行動中特別積極，當請愿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并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他們又像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并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商紳”，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 革命組織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郁積了好幾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劇。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它最后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內部爭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有些領導人則鋌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于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劃，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范圍轉向長江中游。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這項計劃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內部新的爭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內就失敗了，死了86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干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于謹小慎微和腐化墮落的人。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分裂其對手的努力只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的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貽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總之，清政府終于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采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內閣，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筑這兩條鐵路。內閣是一個由13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只有4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5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責為“御用的”或“皇族的”內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內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確，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內閣對于他們呼吁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內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確的拒絕。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態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59]](#_59_Chen_Zhi_Rang____Yuan_Shi_Ka)最后，內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內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系。其他許多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后透露，計劃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標了。北京在這個爭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像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別有用心的，但恢復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里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于是違反了三民主義）。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三民主義并不完全明確和前后一致，有些捍衛它們的人只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于全國一致的事物。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態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只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只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內容。因此，他們在最后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別中，最能夠調解利益沖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 憲友會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在請愿運動期間，特別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后，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已成為請愿者領袖的直隸省咨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咨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討對策，以便“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針”[[60]](#_60_Zhang_Peng_Yuan____Li_Xian_P)。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化之事。不到10天，代表16個省的40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咨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16天以后，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內閣。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眾支持的基礎。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尊重君主立憲”，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愿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新紳士”的一個突出例子。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絕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并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后感到被清朝出賣了。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像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闿（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別對統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云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它致力于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眾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咨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憲友會中的干部也是省咨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以及利益（包括對像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 同盟會中部總會

清政府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適的了。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后，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內部分裂折磨著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但在政府第一次頒布鐵路國有化命令后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爭的辦法。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各派代理人仆仆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定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至于孫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卷進爭論。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跡遍于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并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漫游”，他們決定自行其是。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像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像陳其美（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后來的會員，以及更后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游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后產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準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只有一個“臨時”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確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談“平均地權”，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別是共進會。由于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于孫中山的意志。[[61]](#_61_Guan_Yu_Zhong_Bu_Zong_Hui_De)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一個復雜的計劃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劃以湖北為行動中心，并往北向陜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像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狀態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 四川危機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當國有化和外債計劃的細節公開后，抗議變本加厲起來。清廷宣布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請愿和集會并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干涉。[[62]](#_62_Zhe_Yi_Shi_Jian_Yu_You_Guan)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稱為‘民黨’”[[63]](#_63_Tong_Shang_Shu__Di_188Ye)的憲友會休會，并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并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它建議在北京召開“國民大會”，以便“仿照外國的做法”，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64]](#_64_Tong_Shang_Shu__Di_208Ye)它辦了三種報紙。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眾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它的不妥協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將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爭論不休，詔令將不得遵行”[[65]](#_65_Tong_Shang_Shu__Di_215__216Y)。北京靠詔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沖突逐步升級，最后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眾抗議運動席卷四川。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別是省議員。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咨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斗的中心。它的127名議員屬于上層階級（35名有高級功名，另外74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42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于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13名董事中，有7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伙人）。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臺。北京嚴厲地警告說，咨議局“只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66]](#_66___Zhong_Guo_De_Xian_Fa_Jian)。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范圍。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并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并由蒲殿俊親自編輯。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范圍廣泛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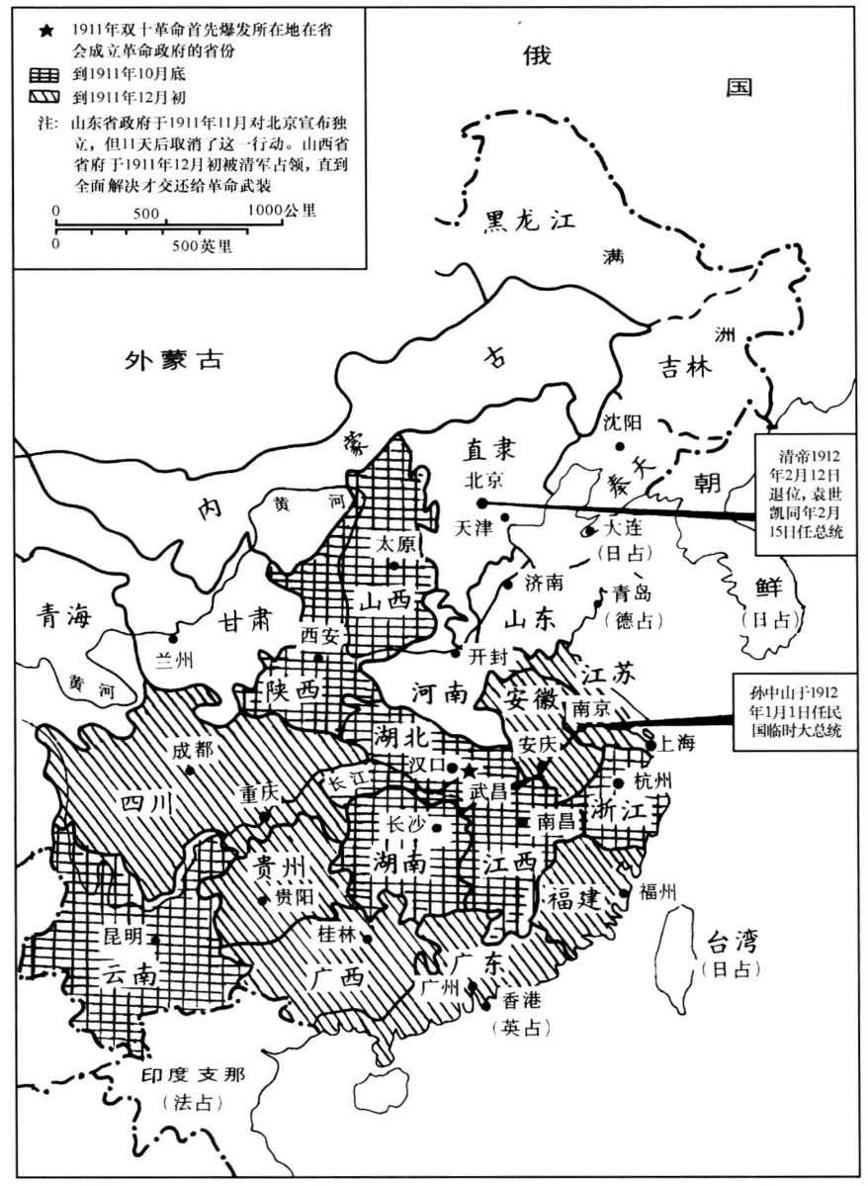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在對北京應采取什么立場的早期爭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議員在開始時并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劃；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后來，又指責“出賣給洋人”，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鐵路之爭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鐵路準歸商辦”和“庶政公諸輿論”等口號中得到證明。這些口號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諭，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于帝王靈光的地步。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據認為，口號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他們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分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標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只是一個借口，后面隱藏著獨立運動。他隨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眾示威。抗議和起義隨即遍及全省。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么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于與四川紳士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于保路同志會。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復秩序。端方的行動過于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到9月底，事態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警察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并切斷電報線。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劃中受害最深的人。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他們有著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多達10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后者到10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地圖14 辛亥革命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于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隨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14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于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內部造成了緊迫感。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將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干的人。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愿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劃，并且愿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像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只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態度。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劃毫無所知。當湖北的領袖們由于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劃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警察正在步步進逼。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后，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號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隨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似乎到處都是忠于政府的軍隊和特務。革命派內部出現了叛徒。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定出了當天晚上的計劃，然后堅決地出擊。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里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300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并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里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戰斗在刮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到凌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并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布成立共和國。他們還采用新的歷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后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著新秩序，也同樣代表著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盡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當事態急轉直下變得有利于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只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并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還留著辮子的黎元洪答復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眾人隨即把他架到咨議局，在那里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但他仍不讓步。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至少在他們內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致電，宣告他們已采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黎元洪的態度最后軟化了下來。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著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只得勉為其難。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內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后到達武漢時，黎元洪并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態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態。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有關這一內容的照會于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將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財產，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于說明湖北咨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咨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咨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于議長。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闿是同科進士。他與后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并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他不但是最富戰斗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確，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歷，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致，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盡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別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特別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的信仰。他們認為，任命了一位以忠于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斗爭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這樣，革命后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產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態也在沿著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 革命之謎

我們的敘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歷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這里，似乎最好先確定問題，然后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隨后的七個星期中有15個省宣布獨立。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于省當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在新軍官、咨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系。這些關系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并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許多新的和互相沖突的利害關系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別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系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態度的質體。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復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咨議局議員協同行動，并得到后兩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伙同紳士和咨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系各省頗不一樣。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紳士—咨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廁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晚至19世紀90年代，還存在著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1911年以來的中國歷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1911—1913年間，由于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征。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余勢力妥協。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67]](#_67_Ma_Li_An__Ba_Si_Di____20Shi)一個與20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地方關系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跡象表明，人們在沿著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湖北的領導人宣布成立漢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此后不到一個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討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布獨立后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仿效北美大陸會議”）。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獨立”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著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討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產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內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眾中進行討論，其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傳統”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么傳統性的。的確，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從1911年起在咨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由于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進。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進步的立憲派”）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這樣來探討，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68]](#_68_Zhang_Peng_Yuan____Guan_Yu_X)

###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后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1912年又在全國范圍內活動得特別積極。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其他人在導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于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態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適宜于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只是從1911年10—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像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將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1912年討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武昌起義后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這位僚佐匯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致盛贊袁世凱。[[69]](#_69_Liao_Zuo_Wei_Cai_Yan_Gan__Ta)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問題不在于他是否將擔任總統，而在于他是否將支持革命。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里接受統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斗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的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議的達成。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并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此時表示愿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內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他們終于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內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議直到2月初才達成。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于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寧愿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時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宮。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將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穩定。[[70]](#_70_Jian_Chen_Zhi_Rang_De___Yuan)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別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中國國內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于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寧愿選擇隨波逐流的路線。他們尊重袁世凱，樂于見他恢復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們寧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干預去促使它實現。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干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么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么幫助的對象就會是革命派。袁世凱本人后來抱怨說，英國的干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雖然袁世凱可能夸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么，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像有影響的江蘇省咨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采取的。張謇在1911年11月終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場。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適合于像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適合于像中國這樣大而復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一切跡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別擬出了協定。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只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內閣最后批準，于是暫時休會。他隨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討論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詔令。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71]](#_71_Xue_Jun_Du____Huang_Xing_He)。那么，為什么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如果袁世凱的地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隨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于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確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于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討論了策略。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他還寧愿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他急于要防止外來干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確無誤的。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干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著，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爭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后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他隨即前往上海，在那里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內閣成議會制的人。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適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將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72]](#_72_Hu_Han_Min____Hu_Han_Min_Zi)兩天以后，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后的一天，內中還有更多意義。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73]](#_73_Ou_Nei_Si_Te__Yang____Yuan_S)。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系，暫定國旗（最后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后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孫中山贊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并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斗爭。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后就處于僵持狀態。當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時即行停火。[[74]](#_74_Lun_Shu_Zhe_Ci_Shi_Jian_De_Y)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并不是無所作為的。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后來確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并在三個星期后滿洲人終于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這時他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年和1913年，他們憑借技能和勇氣爭取使民國能夠運轉。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托付的重任。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顛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斗外別無其他選擇。“二次革命”（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于1913年。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標志著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張書生 楊品泉 譯）

[[1]](#_1_8)關于中國學者對辛亥革命的這些爭論，見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關于1961年10月武昌學術討論會的一篇報道及其論文集，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

[[2]](#_2_8)陳志讓：《袁世凱》，第92頁。

[[3]](#_3_8)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的中國》，第297—313頁。

[[4]](#_4_8)關于這些觀點及近年的爭論，可看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的《導言：新興的變革潮流》。黃宗智的有關論點，載《現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頁。

[[5]](#_5_8)《革命中的中國》，特別是第1—3、24—44頁。

[[6]](#_6_8)《革命中的中國》，第45—48頁。

[[7]](#_7_8)同上書，第53頁。

[[8]](#_8_8)關于這一辯論的情況，請看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第26—35頁和42—44頁的討論。關于興中會建立日期及其他情況的研究，具載于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52—165頁；關于會員情況的詳盡分析，見第180—205頁。又見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國運動中的早期作用》，載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38—139頁。

[[9]](#_9_8)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26頁。

[[10]](#_10_8)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第16頁。

[[11]](#_11_8)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31頁。

[[12]](#_12_8)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第26、28—30、60頁。

[[13]](#_13_8)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134頁。

[[14]](#_14_8)李劍農：《1840—1928年中國政治史》英譯本，第183頁。對孫中山性格的種種描述，見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頁。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35—36頁。

[[15]](#_15_8)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2號文件，法國外交部長1900年7月28日給殖民部長的信，報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談話。

[[16]](#_16_8)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11（36）第33盒（1906—1909年），第4號文件。印支總督致法國殖民部長的信，1903年2月26日。關于孫中山與法國人的關系，又見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190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95頁。

[[17]](#_17_8)《孫文自傳》，載《國父全集》卷1，第36頁。

[[18]](#_18_8)見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資料集》，第757—759頁。關于梁啟超的影響的例子，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第223—224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自傳，見《西行漫記》，第137、139—140頁；許芥煜：《周恩來》，第12頁。

[[19]](#_19_8)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論新軍》，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66頁。

[[20]](#_20_8)引自查爾頓·劉易斯《湖南的維新與革命》（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5年），第165頁。又見劉易斯《湖南省的思想與制度的變革，1891—1907年》。參照愛德華·羅茲《從廣東看中國的共和運動》，第47—48頁。

[[21]](#_21_8)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8頁。關于這些團體的活動的概述，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51—256頁。關于這些活動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動的材料，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第1—3冊。關于學生的刊物，見同上書，第2冊，第499—763頁。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集（1901—1904年）、第2集（1905—1907年）。《俄事警聞》的全宗（第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鐘日報》第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臺灣國民黨檔案館。

[[22]](#_22_8)瑪麗·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9—30頁。關于光復會的主要材料，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載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第3冊，第3—111頁。關于此事的分析，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89—300、403—528頁（其中有271名已知會員的名單）。

[[23]](#_23_8)周錫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頁（陳天華：《警世鐘》）。

[[24]](#_24_8)引自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62、68頁。

[[25]](#_25_8)見鄒容《革命軍》，由約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譯加注，英譯本（第123頁）。中文原文又載于《辛亥革命》，第331—364頁。

[[26]](#_26_8)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頁。

[[27]](#_27_8)同盟會的英文公章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見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9頁插圖。革命家們經過考慮并最后決定在組織名稱上不用“排滿”或“革命”字樣；見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148頁。可是，詹森書中的文獻表明，孫中山有時也用“革命”一詞。

[[28]](#_28_8)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57頁。

[[29]](#_29_8)引自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44頁。

[[30]](#_30_8)1905—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單，可見之于《革命文獻》2（1953年），第158—217頁。研究同盟會最徹底的著作是鄭冼秀蘭（音）的《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及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01—462頁。又可注意李大齡（音）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

[[31]](#_31_8)例如，見馬丁·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第136—138、152—160頁。伯納爾關于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們在這一章里的觀點。

[[32]](#_32_8)參照伯納爾對《民報》及其不同階段的評價（見其前引著作，第68—73、107—197、217—223頁）。關于《民報》的歷史，包括它的目錄和作者筆名在內，有一本無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華（湯增璧）的《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18—238頁；此文也載于《辛亥革命》第2冊，第438—459頁。又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33]](#_33_8)引自希夫林《孫中山之謎》，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65頁。

[[34]](#_34_8)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會，即所謂的中部總會（詳見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標限制在兩個主義上，即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憲政治制度。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武昌首義》第2輯第1冊，第5頁。

[[35]](#_35_8)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98—299頁。

[[36]](#_36_8)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1906年4月）8。

[[37]](#_37_8)蔣夢麟：《蔣夢麟自傳》， 第53頁。

[[38]](#_38_7)塞繆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密執安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第95—96頁。

[[39]](#_39_7)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26頁。

[[40]](#_40_7)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29頁。

[[41]](#_41_7)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頁，書中還指出這個宣言是學生寫的，“實際上抄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頁；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頁。

[[42]](#_42_7)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92頁。

[[43]](#_43_7)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0—171、180頁。

[[44]](#_44_7)同上書，第171—177、182—184頁。又見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頁；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66頁；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34—139頁。

[[45]](#_45_7)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45—164頁；以及《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載埃爾文和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第119—141頁。

[[46]](#_46_7)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頁。

[[47]](#_47_7)蘭金：《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31頁。

[[48]](#_48_7)吳玉章：《辛亥革命》，第98頁。關于共進會情況更詳細的討論，見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載《東方研究雜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頁；以及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529—540、617—656頁。

[[49]](#_49_7)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頁。

[[50]](#_50_7)關于這方面的總的研究，有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兩部著作；陳旭麓和勞紹華的《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10—119頁，540—646頁；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載《現代亞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頁。關于湖北的材料，見約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載《東方文獻》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頁；以及《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同上著作，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頁；維第亞·杜特的《武昌首義第一周》，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83—416頁；波多野善大的《新軍》，載同上著作，第365—382頁；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頁及以后；馮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載《華裔學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頁。關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見波多野善大的《新軍》，第374—375、377—378頁；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第15—27頁；C.H.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威廉·約翰遜的《辛亥革命在云貴》（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謝文孫的《辛亥革命在廣東》（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唐納德·薩頓的《1909—1925年滇軍的興衰》（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51]](#_51_7)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興起》第1冊，第20頁。

[[52]](#_52_7)李培基：《同盟會與幫會的關系雜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84頁。

[[53]](#_53_7)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頁）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第114頁）提出，到1911年，約三分之一的湖北新軍是革命派。

[[54]](#_54_7)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89—196頁）中有詳細的討論。可與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第76—77頁）和李恩涵的《中國革命的基礎》（第189—192頁）中較老和較正統的解釋作比較。關于湖南的事件，見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頁；以及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頁。

[[55]](#_55_7)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頁。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分歧究竟關鍵到什么程度是特別難以確定的。雖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進展，但日知會曾被一個歸國留日學生所出賣。劉認為，以后的組織“對海外留學生的可靠性有點不放心了”。同上書，第112頁。

[[56]](#_56_7)張朋園：《立憲派》，載《革命中的中國》，第172—173頁。

[[57]](#_57_7)歐內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載費維愷、羅茲、芮瑪麗合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248頁。

[[58]](#_58_7)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1—113頁。

[[59]](#_59_7)陳志讓：《袁世凱》，第82頁。

[[60]](#_60_7)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7頁。這一節還取材于張玉法的嚴謹的研究（見[此處注釋](#_153_Zhe_Xie_Qi_Yi_Yun_Dong_Du_Y)）。關于社會精英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控制革命的論點，見汪榮祖《江蘇省的民眾騷亂與辛亥革命》，載《近代中國》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頁。

[[61]](#_61_6)關于中部總會的章程、會員和宣言，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武昌首義》第1冊，第2—11頁。又見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雜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頁。

[[62]](#_62_6)這一事件與有關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頁）中有非常詳細的討論。

[[63]](#_63_6)同上書，第188頁。

[[64]](#_64_6)同上書，第208頁。

[[65]](#_65_6)同上書，第215—216頁。

[[66]](#_66_6)《中國的憲法建議》，載《北華捷報》1910年9月9日，第598頁。《北華捷報》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間，分十一部分對滿人的憲法作了詳盡的研究。9月9、16日和23日發表的最后三部分論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關系和咨議局的問題。

[[67]](#_67_6)瑪麗安·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100頁。

[[68]](#_68_6)張朋園：《關于辛亥革命社會精英的一個類型學假設》，載《澳大利亞東方學會會刊》卷9第1、2期（1972—1973年），第32—38頁。

[[69]](#_69_6)僚佐為蔡延幹，他對革命派年歲甚輕的印象甚深，甚至超過了對他們的不妥協的共和主義的印象。在與他會晤的40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齡最大，為48虛歲。見西里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第230—231頁。

[[70]](#_70_6)見陳志讓的《袁世凱》以及下面幾篇文章。麥金農：《梁士詒和交通系》，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頁；《北洋軍、袁世凱和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頁；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頁；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19—442頁。

[[71]](#_71_6)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34頁。

[[72]](#_72_6)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臺北）第3冊，第428頁。

[[73]](#_73_6)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第435頁。

[[74]](#_74_6)論述這次事件的有關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華盛頓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第106—109頁。

#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從清王朝鎮壓民眾起義到它垮臺之間的40年并不是中國社會秩序大動蕩的時期，而是中國社會內部發生轉變的時期。在20世紀之初，劉鶚和吳沃堯的小說描寫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義和團，以及實力雄厚而與外國人有聯系的巨商等——包圍的文人和官僚。這些新人對后者的影響是與日俱增的。有些上層人士清楚地意識到社會正在發生變化，并且確認1894—1904年的十年是變化加速而不可逆轉的轉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時張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風云變幻，殆如百歲。”[[1]](#_1_Zhang_Jian____Liu_Xi_Cao_Tang)

那時的觀察家還注意到，光緒和宣統時期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是發生在不斷分化、越來越四分五裂的統治階級內層。變化對下層的影響則遠沒有那么明顯。從當時的記載來看，平民百姓似乎對這種變化仍舊漠不關心，只是他們的處境略為惡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頭，現代工廠的工人同蘇北新來的勞工外表無甚差別，但是，身著藍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禮帽、出入汽車的商人則差別很大。在旁觀者看來，這些差別反映了中國新舊轉換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國社會演進的內在動力，我們歸根結底還必須著眼于仍然包括中國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經討論了經濟、對外關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問題，還討論了對軍隊、商人、官吏、士紳、學生和革命者有影響的種種發展。

## 特權階級種種

自康熙的滿人統治建立后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治階級，在19世紀最后25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19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板，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2]](#_2_He_Bing_Di____Zhong_Hua_Di_Gu)最后，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份的標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紳士”指的是致仕或暫時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19世紀中期地方志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地的豪門大族，盡管其中一些人并沒有功名可言。

### 巨紳：太平天國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21200人增至26800人。[[3]](#_3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_D)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于上述固定增加數的5%，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33年，那么，19世紀最后25年就會有將近91萬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萬人增加了23%。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18%增加到24%。[[4]](#_4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_D)

盡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治者廣泛采用，到19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19世紀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后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于財政目的。為了便于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捐官總數達53.4萬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萬名。[[5]](#_5_Tong_Shang_Shu__Di_103__111Ye)1860年以后，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6]](#_6_He_Bing_Di____Zhong_Hua_Di_Gu)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萬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后的720萬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后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就會更大，盡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于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于分布不均，加劇了地區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與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0.7%，在四川則是3.5%。太平軍起義后，這個比例在四川是0.6%，在浙江則是5%。[[7]](#_7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_D)云南和貴州由于地區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定，但這只是由于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陜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獲得者的數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量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萬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萬名，即11%，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于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的32%，即35萬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50%。太平軍起義以后，145萬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萬人，即14%，至少是貢生，他們屬于上層紳士。其中53萬人的地位，即總數的36%，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66%。[[8]](#_8_Zhe_Xie_Shu_Zi_He_Bai_Fen_Bi)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增多，而且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19世紀末以前，傳統統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19世紀最后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么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系緊張，并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質量。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19世紀后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展，新的集團正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到19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展更為重要了。

### 新軍勢力

現代戰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后銜接的階段。

在1850—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捻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9]](#_9_1856Nian_Zhi_Qian_Xiang_Jun_D)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10]](#_10_Ku_En____Zhong_Hua_Di_Guo_Ho)此后不久，由于形勢的需要，以及像李鴻章這樣的年輕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勢。[[11]](#_11_Huai_Jun_Jiang_Ling_You_Guan)這些人僅憑戰功就在當地，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于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生，后來他統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后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后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晉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于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寧愿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下屬都謀求并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19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于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倡導下，創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后建立的軍火工業，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的發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云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建新軍和使傳統的軍隊現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后來淮軍也仿效這種做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后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可是隨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展技術的代表。[[12]](#_12_Ju_Wai_Guo_Zhuan_Jia_Gu_Ji)

只是在1895年以后，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現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民國總統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年以后割據華北的軍閥，像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御和戰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后，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后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的1/3以上。從1901—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陜西、江西、廣西、貴州和云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并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準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13]](#_13_Zhang_Bai_Xi___Zhang_Zhi_Don)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后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并未被嚴格執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35所，學員共6307人，威海衛、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14]](#_14_Bao_Wei_Er____1895__1912Nian)到1911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像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15]](#_15_Can_Jian_Chen_Xiao_Fen_Deng)這一發展又得力于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16]](#_16_You_Guan_Ci_Shi_De_Zong_Zhan)鎮壓太平軍的最后兩位杰出統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于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治者開辟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借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于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100萬，但大概實際只有60萬戰斗人員，其中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另外17.5萬人是半現代化的巡防隊。后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于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5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7.5萬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17]](#_17_Guan_Yu_Zhe_Xie_Shu_Zi_Ge_Zh)軍官總數近7萬人，10%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平及其對科學技術的了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895年以后，受過現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于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于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于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爭以后惡性發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敗以后，大家舍得花錢使軍隊現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年和1906年練兵處發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用儒生領軍”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爭以后，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8]](#_18_Wei_Xin_Pai_De_Bao_Zhi_Zai_Z)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于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的軍國民教育。[[19]](#_19___Jiao_Yu_Za_Zhi____Juan_3_D)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盡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征，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并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勛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勛，是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1923—1924年擔任總統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后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后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里有后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云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后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于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云南的國民革命，1915—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后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并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系，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20]](#_20_Dan_You_Xu_Duo_Ren_Bing_Mei)1908年以后的大多數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后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21]](#_21_Xie_Li_Deng____Zhong_Guo_Jun)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并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22]](#_22_1907Nian_Yi_Hou_Zuo_Guo_Nu_L)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于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于鄉土觀念，有時又是出于同窗之誼。[[23]](#_23_Ri_Ben_Shi_Guan_Xue_Xiao_Xia)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于他們在政治日益動蕩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 接觸西方后的結果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盡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于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1860年的戰爭，出現了一批辦外交的年輕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于1870—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后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后，先后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的外交使團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像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臺、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臺。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24]](#_24_Ta_De_Chuan_Ji_Can_Jian_Fei)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 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臺，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筑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后轉任直隸道臺，然后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辦一所武備學堂。[[25]](#_25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后，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復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于有執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中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于向要當買辦的同鄉提供外國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于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于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他們大多數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20世紀之初，大多數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26]](#_26_Hao_Yan_Ping____19Shi_Ji_Zho)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20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買辦都是發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干和個人增值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系、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百萬兩者有兩例。一是1861—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20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27]](#_27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買辦的人數在1854年有250人，到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則增至2萬人。[[28]](#_28_Zhe_Xie_Shu_Zi_Chu_Zi_Hao_Ya)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5.3億兩。[[29]](#_29_Hao_Yan_Ping____19Shi_Ji_Zho)同19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6.45億兩相比，這個數字相當低。[[30]](#_30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5.84億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31]](#_31_Lei_Mo____Wai_Guo_Zai_Hua_To)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愿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對興辦近代企業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1873年他們為上海六家航運公司提供了30%的資金；1863—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62.7%；1890—1910年為中國27家大棉紡廠提供了23.23%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制造業提供了所需資本的30%。[[32]](#_32_Hao_Yan_Ping____19Shi_Ji_Zho)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持，還負責這些新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險和采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的成功。由于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19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33]](#_33_Wang_Jing_Yu_De___Zhong_Guo)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系密切，所以他們樂于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和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濱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展經濟的觀念，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像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于洋行，卻熱衷于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財的商人。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19世紀50年代擁有茶園5000畝；以后由于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并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34]](#_34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遺產達800萬兩。[[35]](#_35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財。[[36]](#_36_Tong_Shang_Shu__Di_958Ye)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58家，1903年為82家，1908年則達115家。[[37]](#_37_Zhong_Guo_Ren_Min_Yin_Xing_S)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38]](#_38_Tong_Shang_Shu__Di_730__751Y)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業。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郊區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39]](#_39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業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們也像南方各省的同業那樣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制造以及機械的制造和維修。它們多數是小企業，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場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營的工場中的新型手工業工場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么區別。[[40]](#_40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粵商葉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1.8萬兩資本創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200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制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地的錢莊、豆餅制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并大量投資于銀行和鐵路。[[41]](#_41_Zuo_Zuo_Mu_Zheng_Zai____Ying)

這批從事新行業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像買辦那樣偏離正統。他們遠不像買辦那樣愿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19世紀最后20年，也開始出現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采用西藥的醫院。[[42]](#_42_Li_Ru_Ye_Cheng_Zhong_Ceng_Xi)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課。[[43]](#_43_Zhang_Zhi_Dong____Zhang_Wen)

在1870—1895年又出現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44]](#_44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但是19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的資本往往有40%—80%是出自中國人，這里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45]](#_45_Wang_Jing_Yu____19Shi_Ji_Wai)官辦企業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尤其在私人企業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后，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家。像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像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后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像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后來則當了工商業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占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于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都更正統、更符合傳統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楣。[[46]](#_46_Zhe_Dui_Mai_Ban_Lai_Shuo_You)

###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界

在19、20世紀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范圍自然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于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47]](#_47_Guan_Yu_Wang_Tao_De_Chuan_Ji)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于1886年創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爭之后放棄了傳統的職業而致力于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復，他是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期畢業生，后來發現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許多傳統的文人都進師范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48]](#_48_Can_Jian_Yang_Mao_Chun___Zho)大城市也開始有像律師和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者。然而，許多新知識分子還不得不靠為數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輕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49]](#_49_Can_Jian_Lan_Jin___1902__191)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后，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借助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陳璧、沈云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50]](#_50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51]](#_51_Tong_Shang_Shu__Di_927Ye)和一侄孫[[52]](#_52_Jiang_Su_Sheng_Xing_Zheng_Go)經商。大多數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53]](#_53_Shao_Xun_Zheng____Yang_Wu_Yu)正在做官的人也愿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后來發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休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25名以上的工廠共386家，其中263家就是在上海以外；95家有限公司中的51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54]](#_54_Shu_Zi_Shi_Gen_Ju___Jiang_Su)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開始聯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或資本同官辦企業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能說這與投資于私人企業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后，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就更像私人企業了，因為私人企業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發展。

在20世紀之初，從傳統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并列范疇，同時又不同于“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于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系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于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和各種企業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于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像中過進士并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于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像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經營而取得勢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后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板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盡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士大夫，[[55]](#_55_Liu_E_De_Zi_Chuan_Ti_Xiao_Sh)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分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于這一類人。

這個現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關系所纏縛，傳統原則與現代原則就在這些關系中發生沖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那是一批現代的或半現代的實業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系在一起。[[56]](#_56_Guan_Yu_Xia_Yi_Di_Fen_Xi_Zi)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1905—1911年中國企業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斗爭中，他們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定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家”。[[57]](#_57_Zhang_Jian____Zhang_Ji_Zi_Ji)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 新的社會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系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58]](#_58_Fu_Er_Suo_Mu_De___Wan_Qing_S)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為委員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像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19世紀后半期發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后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渠道。幕府這種非正規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于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采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盡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萬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后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布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可是，盡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占地位。

1902年共有現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59]](#_59_Ba_Si_Di____20Shi_Ji_Chu_Zho)與辦學者的意愿大相徑庭的是，由于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質量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愿。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范圍，甚至在傳授有利于國家發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現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60]](#_60_Ba_Si_Di____20Shi_Ji_Chu_Zho)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后10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康有為創辦了強學會。此后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諭。它們制定了自己正規的規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的傳統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20世紀頭10年的各種協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后，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合會逐漸變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展過程更長，更復雜。那些聯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并未像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于傳統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61]](#_61_Guan_Yu_Ge_Zhong_Ge_Yang_De)這些聯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于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從士大夫到工業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干，并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建者的初衷。[[62]](#_62_Guan_Yu_Jiao_Yu_Hui_Zai_Zhe)1909年選出的各省咨議局，就是現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在清王朝最后兩年，這些咨議局用行動顯現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63]](#_63_Qi_Xing_Dong_De_Zheng_Zhi_Te)由于選舉法的規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輕，大多數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現代企業有聯系。[[64]](#_64_Zhang_Peng_Yuan____Li_Xian_P)盡管咨議局中工商業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的經濟利益。[[65]](#_65_Guan_Yu_Hu_Nan_He_Hu_Bei_De)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合會和各省咨議局普遍發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機構也有助于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并規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家的聯系機構，并沒有取代傳統的行業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于商會。因此，商會有助于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展的合作和聯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愿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66]](#_66_Guang_Zhou_Ge_Shang_Hui_De_X)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的優秀文士，以及現代公司的發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范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并且同顧客的關系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并象征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的官僚體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脫離關系。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合會和商會具有斗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秩序的分歧所在。

### 分裂的開始

隨著統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學和科學課程所發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便是一個明證。在19世紀70年代，這種沖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代化倡議和計劃，都招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后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于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御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67]](#_67_You_Guan_Wen_Xian_Shou_Ji_Za)但是直到中日戰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窒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后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少數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后行”。這種瞻前顧后的態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后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癱瘓。傾向于優先發展新經濟的人，以及像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68]](#_68_Tong_Shang_Shu__Di_209Ye)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建現代企業，宣稱發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69]](#_69_Bi_Jiao_Zhu_Ming_De_Xiao_Shu)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愿、散發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70]](#_70_Li_Ru__1896__1898Nian_Jian_Z)他們鼓動并支持鎮壓百日維新。[[71]](#_71_Qi_He_Wen_Si_Ji____19Shi_Ji)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代化的。[[72]](#_72_1958Nian_Dui_Tian_Jin_Di_Qu)然而，現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勢不兩立后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采取了新的表現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米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73]](#_73_Can_Jian_Zhou_Xi_Rui___Hu_Na)他們為了重新表白自己信守他們所賴以取得合法地位的儒家正統，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于傳統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于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于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別，并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別。而且這種區別也不宜用來區分以發展工商業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系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74]](#_74_Lan_Jin____Zhe_Jiang_De_Ge_M)鎮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傳土地收租，還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75]](#_75_Zhong_Guo_Ren_Min_Yin_Xing_S)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已經明顯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雖然職業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后40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76]](#_76_Te_Bie_Can_Jian_He_Bing_Di)、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流動性的正常表現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我們現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么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國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權階級的人數是否繼續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像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上層分子就讀于現代學校的情況的統計似乎表明，情況并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相比，中學的學生數就凈減了。[[77]](#_77_19Shi_Ji_Zhi_Mo_You_Shu_Yuan)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并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范圍內發生對立。那種使漢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于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并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系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松弛。在向現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后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制度更加針鋒相對，盡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占優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于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里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關系維系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寧愿為一個廣大地區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78]](#_78_Can_Jian_Fen_Che___Zheng_Zhi)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里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保”中，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后來，現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占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于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后果的對立還是城鄉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游覽，有錢人還在城里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19世紀有增無已。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提高了吸引力。[[79]](#_79_Guan_Yu_Ji_Ge_Kai_Fang_Shang)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于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19世紀中期以后，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80]](#_80_Cun_Song_You_Ci____Jin_Dai_J)

在20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里，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81]](#_81_Zhou_Xi_Rui____Hu_Nan_Hu_Bei)在科舉廢除之后，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份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先辦在城里，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村學堂了。[[82]](#_82_Xiao_Xue_De_Fei_Yong_Zhang_L)城鎮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里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代化和工商業的發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展農業。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的聯系。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盡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資于現代企業，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辦學校、銀行和警察所。[[83]](#_83_Zhou_Xi_Rui____Hu_Nan_Hu_Bei)然而，進步還在繼續，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后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愿，1902年頒布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于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之后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后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布了關于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 455人。各省咨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計的女生為141 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準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84]](#_84_H_E_Jin____Zhong_Guo_Xin_Din)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愿意喚起婦女覺醒，并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85]](#_85_Zai_Xuan_Chuan_Fu_Nu_Jie_Fan)他們的呼吁并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于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財，傳統的鄉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鎮和縣里。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咨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于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系減少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系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地社會提供有效的保護。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19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為144.3萬，而在1910年6月散發的、由各省咨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數為30萬。這兩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作為傳統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定，盡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

## 平民百姓縱觀

### 一個新的集團：產業工人

在最初，下層階級中的變化似乎遠不是引人注目的。產業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會集團。他們最初出現于廣東和浙江，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不久的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廠和修理廠做工。這些第一代產業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專門手藝的城市工匠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興起的官辦企業和外商工廠需要工人，他們在對大部分工人進行的技術教育中作出了貢獻。1872年左宗棠創辦蘭州制造局時從廣州招募工人，因為他們以手藝聞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罷工，就是由新創辦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屬造船廠的廣州工人組織起來的。[[86]](#_86_Wang_Jing_Yu___Nie_Bao_Zhang)

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從1894年的10萬人[[87]](#_87_Gen_Ju_Sun_Yu_Tang_De___Zhon)增加到1912年的66.1萬人，[[88]](#_88_Chen_Zhen___Yao_Luo____Zhong)這主要反映了大批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流入工人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都來自農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貧民的行列，其中包括大批婦女和兒童。開始時招工很難，也不穩定，在礦山更是如此。開平煤礦在19世紀80年代雇工1000名，曾經花錢從汕頭和廣州高價招聘有技術的工人，也從當地農民中間招收臨時工（他們冬天進礦做工，夏忙季節回鄉）。這些當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舉行罷工，要求與南方工人同工同酬。[[89]](#_89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

這些涉及人員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許可以部分地說明，為什么傳統的勞動組織留傳下來的雇工辦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則被忽視。當時雇工往往是通過各種中間人如把頭和買辦進行的。有兩種基本制度：合同學徒制和包工頭招工制。前者來自傳統的行會，直隸和長江中游一帶的紡織廠和機器廠都采用這種辦法。事實上它的傳統功能已經消失。招收學徒不過是使用童工和廉價勞動力的一種借口，他們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傭的保證。上海一帶和礦山特別盛行包工制，它的特點是公司授予包工頭全權招工。在整個受雇期間，工人被迫在經濟和社會上依附于包工頭。這種制度使工人處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狀態，很像外商讓買辦對中國員工全權負責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別與雇用沒有技術的農工和礦工的習慣做法有關。[[90]](#_90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它也產生了殘酷虐待的行徑：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來到賭場，將農民灌醉，誘使他們去賭錢；一旦還不起債，他們就被“賣”到礦上，被迫下井干活，直到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以后精疲力竭而死。[[91]](#_91_Sun_Ren_Yi_Du____Qing_Dai_Ku)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人的物質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也有所好轉。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區農業勞動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8小時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銀元一角至二角。那時金陵制造局的勞動時間是11個小時，天津機器局是11個半小時，但是每兩周有一天休息，這在傳統職業中是聞所未聞的。然而，隨著招工愈來愈容易，每天的勞動時間便延長了，但兩周休息一天的辦法還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廠經常是連班倒地開工，即實行每班勞動12個小時的兩班制，全年勞動300—320天。[[92]](#_92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此外，由于銅幣貶值加上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大為下降：物價平均漲一倍，而工資只增75%。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頓飯。[[93]](#_93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盡管一些大企業在19世紀80年代設立了小小的醫務室，開始為工人的工傷付出微薄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已是一大進步），并且某些企業主同意提供比較安全和衛生的勞動條件，但是多數工礦的工人仍然是在極其有害于健康的條件下從事勞動，得不到任何保護。[[94]](#_94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嚴重事故的頻繁發生、職業病的盛行、衛生條件的惡劣，這一切使人想起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況。對輕微過失動輒罰款和施加體刑，這樣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縱監工對工人橫行霸道。[[95]](#_95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i)

工業勞動的技術性不強，加之人員變動頻繁，妨礙了工人采取聯合行動。然而，幾個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確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廣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總數的1/3以上。正是在這些集中的地區，勞工的戰斗性最強。在1900—1910年間，上海46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廠共有工人7.6萬人；這個時期有案可查的47次罷工中，有36次是發生在上海。[[96]](#_96_Ju_Wang_Jing_Yu_De___Zhong_G)罷工頻繁被外國資本家視為不祥之兆；大多數罷工是出于起碼的經濟方面的不滿，主要是反對低工資，也反對普遍惡劣的勞動條件。罷工是自發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搗毀機器。外國公司更容易成為攻擊的目標。這種行動表明對現代工業企業存在著強烈的仇視情緒，就像19世紀初期的歐洲那樣。這種情緒是剛剛形成的無產階級從農民和工匠那里繼承下來的。不僅如此，它還表明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民族主義，它是19世紀后期民眾反帝運動的繼續，并且還使勞工運動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

按年代順序可以看出中國早期的工人罷工經歷了三次高潮：1898—1899年有10次罷工；1904—1906年有15次罷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臺有34次罷工。顯然很容易使人斷定，勞工運動是與當時政治事件的主要階段互相呼應的：首先是列強的侵入、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其次是民族主義運動的復蘇、抵制美貨運動、同盟會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動和憲政運動的興起；最后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1906年的勞工運動看來的確與政治事件有直接關聯。廣州的碼頭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漢的工人確實參加了抵制美貨的活動；華新紗廠舉行了反對日本資本家接管的罷工；萍鄉、瀏陽和醴陵的3000名礦工參加了湖南的反清起義。[[97]](#_97_Zhao_Qin____Xin_Hai_Ge_Ming)不過在這些事件中，無產階級的作用只是對其他社會集團組織的政治運動給予支持。其他幾次大罷工與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沒有內在聯系，而純粹是由于經濟情況造成的：清末的通貨膨脹和糧食歉收導致勞工提出越來越多的要求和產生其他的不滿。

盡管工人在大多數罷工中表現了高度的團結，20世紀初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是深受使傳統行會大受其害的地區和行幫對立的影響。例如某公司有同鄉或同工種的工人舉行罷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卻常常袖手旁觀。

事實上，大城市的技術工人，尤其是機工、木工和織工，雖然已經受雇于新式的機器廠，卻仍然屬于手工業社團，他們在進大工廠之前就是在這里學藝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廠的木工和鐵路上的機工，像手藝匠人那樣加入同樣的行會。在工業化的前夕，行會能夠施加充分的影響來維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工廠使用技工方面。工廠不得不利用行會作為代理人去招收熟練工，這些工人被迫繼續向行會交付會費。在辛亥革命前夕，參加行會基本上成了定規，這樣做常常是為了想從行會辦的善舉中得到好處。

非熟練工人多半組成幫或幫會，這是一些松散組織，由同一地區的無業工人擁戴一個頭目所組成。頭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在某些地區和行業中，秘密會社的影響也很大，例如三合會及其分會一向在礦工和搬運工中吸收大量會徒。在廣州和香港，秘密會社控制了各行各業。他們為了報復艦隊司令孤拔襲擊福州和臺灣，在1884年組織了一次不亞于總罷工的罷工。[[98]](#_98_Sun_Yu_Tang____Zhong_Guo_Jin)

通過秘密會社的渠道，也有為數很少的工人加入了革命組織，例如1911年同盟會就曾吸收過興建川漢鐵路的勞工和滬寧、滬杭線上的鐵路工人。但是，這些工人是作為個人加入革命組織的，而不是整個無產階級的集體行動。這些組織沒有一個是專門代表勞工利益的。雖然也正在創立更加嚴格地按行業界線的組織，例如1909年在廣州成立的機器研究公會以及廣東機器工會后來派生的組織，但其成員既有工人也有小雇主；它們首先重視的是通過工廠和課堂學習來提倡技術教育。1902年為開平礦工、鐵路工人和泥瓦工開辦的唐山俱樂部，給工人提供了讀書、聽音樂和娛樂的方便。有技術的工人更喜歡以等級為基礎建立單獨組織，例如1906年在廣州建立的郵電職工俱樂部。但是，所有這些組織都是聯絡感情性質的，主要目的是業余活動、互助和學習。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同這些早期的勞工協會沒有直接的關系。[[99]](#_99_Xie_Nuo____1919__1927Nian_De)

工業無產階級人數太少，覺悟太低，還不足以在民眾中形成一支獨立自主的力量。毫無疑問，罷工使它有了不同于眾的面目，并為其發展開辟了道路。但是，由于無產階級還年輕，流動性大，需要它做的工作又是非技術性的，所以只能說明它在進行質的轉變，這種轉變將使它與曾經孕育它的社會集團，如貧苦農民、熟練工匠和城市群眾等大不相同。它還起不了在民眾運動中應起的集體作用。

即使考慮把現代第三產業即服務行業的職員、機關雇員、各種商業和市政機構（如海關、公用事業和電訊等部門）的雇員統統算在新企業工人之列，以擴大其隊伍，直接同具有最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特點的工業生產有關的勞工數量，在勞動人民的總數當中也仍然是極少數。雖然資料缺乏，不足以提出精確數字，但可以說它所占的比重不會超過百分之一，還包括家屬在內。如果同新、舊上層分子之間的比例加以比較，這個新、舊勞動者之間的比例是特別低的。物質條件和世界觀的相應差異還沒有考慮在內。因此，工業資本主義對統治階級的社會組織的影響比對人民的影響要大得多。

### 農村暴發戶和貧苦農民

農村形勢表面上沒有變化，但是也能看出它在變動。由于得不到文獻資料的證實，而且這種變動并沒有使生產關系或生產方式有重大改變，所以要確切地認清農村的變動是很困難的。在農村體制中只有一些緩慢的變動，但是總的說來，農村體制在這一時期是依然如故的。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以及山東、奉天、廣東和四川等省，富裕農民的數量顯然有所增加。[[100]](#_100_Li_Wen_Zhi_Bian____Zhong_Gu)這似乎是同商業的發展和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有關。然而，商業的發展涉及幾種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內地商業的擴大，那是由18世紀以來傳統的水陸運輸的改善所促成的，這種擴大也使城市發財致富。盡管19世紀中期有過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在廣州三角洲、江蘇南部和作為糧食貿易中心的長江中游一帶，仍舊能夠感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由于政府將大運河對私人運輸開放，山東中部和西部便依靠它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性市場體系。隨著市場的擴大，出現了城市的發展和手工業內部更嚴格的分工；市場的擴大也刺激了專業的商品農業的發展以滿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101]](#_101_Jing_Su___Luo_Lun____Qing_D)這種農業體制反過來又吸收了城市的財富：城市商人購買農村土地，直接通過中間人管理雇工，同時又在市鎮設立店鋪、作坊和當鋪。農業、商業和工業往往就這樣攜手并進，相互受益。想方設法要增加土地的農民都愿意轉向這種類型的商品化農業，他們可以將所得到的利潤投資于市鎮的賺錢買賣中去。山東中、西部的這種市場經濟，在19世紀中期受到社會動亂和天災的嚴重破壞，在1890年以后就被與開放商埠和鐵路有聯系的商業發展所取代。商業活動此后轉到東部沿海一帶，而不再依靠運河了。這些地區也變成了農業向商品化和專門化轉化的地方。毫無疑問，此時的這種轉化使農業利潤更多地被吸收為城市投資，而農村回收的城市投資則是極少的。[[102]](#_102_Mai_Er_Si____1890__1949Nian)

在長江流域和廣州三角洲，同西方的滲透和商埠的發展有關的這一商業發展的第二階段開始得較早，并且又擴大了第一階段的影響。但是在東北，商業發展的第二個過程則是單獨發展起來的。[[103]](#_103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

土地所有權變動的加速也許有利于富裕農民的增加。實際上，繼承人平分土地的習慣做法導致地產遭到周期性分割而小得不足以維持生計。連續的農業歉收、稅收的增加，以及預測不到的市場波動，在清末四十年中經常發生，[[104]](#_104_Tong_Shang_Shu__Di_557__563)從而迫使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低價出賣土地以償還債務和勉強餬口。根據少數地區的統計數字，20世紀之初地價明顯下跌而農產品價格上漲。[[105]](#_105_Mai_Er_Si____1890__1949Nian)安徽一個地主利用1910年洪水之災，竟買了九千畝土地。在困難時期，出賣土地的速度總是加快的。[[106]](#_106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

不過，一部分農民發財并不一定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集中。某些地區的土地是有所集中的，例如在安徽和湖南，那里有些文、武官吏在太平軍失敗以后得到了大量土地，但是這種現象既不普遍，也不長久。[[107]](#_107_Tong_Shang_Shu__Di_178__188)小土地所有者仍占優勢。[[108]](#_108_Tong_Shang_Shu__Di_193__196)

收入增加往往是經營效率提高的結果，但也反映了已經引進可以獲利更多的經濟作物，如鴉片之類；效率提高也使一些農民能夠擴大耕種面積。四川就曾出現一種自己土地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土地的富裕佃農。[[109]](#_109_Jiu_Bao_Tian_Wen_Ci____Qing)在山東，地主成功地引進新的農業技術，一般都在不超過五百畝的土地上應用。這些“經營”地主自己耕種，同時又雇工幫助；由于更多地使用有機肥料和較好的農具，其產量要比小生產者高30%—50%。增加的收入被投放于商業和金融活動，而不是用來購買更多的土地。[[110]](#_110_Jing_Su___Luo_Lun____Qing_D)

江蘇南部還出現了租棧，這是一種從幾戶地主（多是不在農村的地主）的土地收稅和收租的機構，它使少數仍在農村的地主能夠通過管理租棧來增加收入。于是，它們就使農業經濟內部一個寄生的集團興旺起來。這個集團是由收租人和土地丈量人所組成，其中許多人往往還在衙門兼差，所以能利用其雙份收入來放高利貸、做小買賣或者購置土地。[[111]](#_111_Cun_Song_You_Ci____Jin_Dai)

以上所述種種變化，許多都是一種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的繼續，結果導致各地產生一批農村新寡頭。這批新寡頭同傳統的上層文人并無多少淵源；后者在太平軍起義之后已經逃離農村，拋棄了農業。農村新寡頭的地位并不比生員高多少，而以生員和監生為多。他們沒有文人那種傳統的文化聲譽，在地方上他們也不承擔司禮儀的傳統職能，但他們確實需要并且得到了官府的直接幫助以維護私利。這些人很少自費養兵，卻深知如何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太平天國之后仍然在活躍的或因臨時危機而重新集結的民團。[[112]](#_112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這些農村新寡頭還能夠在十八個省份的未開墾區和邊境地區占用大量官地，他們系統地進行開墾，不受習慣性的保佃措施的限制。[[113]](#_113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

農村某幾類人在光緒和宣統年間能夠比較富裕，似乎并非因為農業生產有所增加，即使從局部地區來看也是這樣。相反，如果當時有關農村普遍貧困的大量記載是準確的話，某些人直接犧牲了小農的利益才使他們個人的財產得以增加。廣大農民被剝奪了土地，或者不得不耕種經過任意分割而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小塊土地，還要負擔增加的地租，同時又不再能用手工產品來彌補其虧空：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農民的逐漸貧窮幾乎是普遍現象。[[114]](#_114_Tong_Shang_Shu__Di_255__282)目前的研究還不能對此作出精確的說明；但是，農村貧困的日益普遍似乎影響到了清末社會變化的許多其他特點：手工業內部狀況的變化、移民、海外移民和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 手工業的變化

少數破產農民加入了工業無產階級的行列。更多的破產農民則擴大了也在轉變中的手工業勞動力隊伍。在經歷20年國內動亂所招致的大量破壞之后，手工業為了同外商和工業競爭，也在起變化。根據1864—1894年六個省的15個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登記在案的76個手工業行會有43個是新行會。[[115]](#_115_Peng_Ze_Yi____19Shi_Ji_Hou)某些手工業嚴重衰退，如手工紡織在1905年只能滿足國內需要的50%。產品用于省際貿易的湖南和山西的鐵廠也是如此，由于進口鋼材的競爭，到1900年這些鐵廠實際上都冰消瓦解了。但是，其他部門在出口貿易和工業發展的推動下，正在發展，甚至創造更好的運輸工具。廣東、浙江、四川、山東和奉天等地的繅絲產量大為增加。在1870—1880年的短短時間里，浙江、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制茶業也很繁榮，共有茶葉商號近四百家。中國特產如瓷器、扇子和竹制品等的需求量很大。另外，出口刺激了絲綢業的壯大，而運輸業的發展又擴大了榨油業、面粉業和老式采煤業。1866年營口有兩家榨油坊，1895年增至30家；蕪湖的碾米廠在1850年有20家，1900年增至一百余家。盡管工業生產的發展沉重地打擊了某些手工業，但也使另外一些手工業活躍起來：因為機器紡紗降低了耐用布的生產成本，這便使得一向以紡織業聞名的地區能大規模發展手工織布業，甚至以往從來沒有紡織業的地區也興辦了手工紡織業。在19世紀最后幾年，手工制造火柴、肥皂、卷煙、玻璃和針織品的行業都發展迅速。

手工業產量的增加在引進大機械化工業之后尤為顯著，增產的形式基本上是辦工廠，擴大工場，或者組織工人在家里生產，計件付酬。這種生產所利用的是部分機械化的，或者至少經過改進的工具，例如19世紀80年代以后浙江的紡織工就已廣泛使用日制腳踏織布機。在19世紀之末，手工生產棉制品的工廠不超過30家，而在1901—1911年間卻開設了三百多家。[[116]](#_116_Fan_Bai_Chuan____Zhong_Guo)這個時期政府也力圖鼓勵手工業，在各省設立了工藝局，使之負責開辦學徒作坊，發展技術，對某些企業提供幫助。這在直隸和山東頗見成效。[[117]](#_117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

在一些手工行業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改變了老板、工人和學徒之間的關系，這種變化甚至反映在合作組織中。受威脅最重的行業不斷向專業化發展，對吸收外來學徒和幫工以及對生產率、銷售和勞動時間等方面都規定得更嚴，旨在限制競爭，并使不斷增加的同業者能夠盡可能平分微薄的利潤。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使得許多手工業者能夠勉強維生，但卻有礙于積累資本和發揮積極性。在有大作坊發展起來的興旺行業中，有一種提倡把工人和學徒分別組織起來的傾向。這類組織仍然是排他性的，都附屬于業主的聯合會。[[118]](#_118_Peng_Ze_Yi____19Shi_Ji_Hou)在20世紀頭10年，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似乎越來越頻繁了。[[119]](#_119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

盡管有精心的集體保護和工廠的發展，在19和20世紀之交，大多數手工業工人的前景常常是很渺茫的，因為他們依賴于不斷擴大但調節仍舊很差的市場，而且工業的競爭又使這個市場的利潤幅度劇烈下降。糧價高漲和所獲銅幣貶值更加重了這一情況。[[120]](#_120_Tong_Shang_Shu__Di_582__595)根據官方統計，1912年的30個行業共有手工業者1300萬人。[[121]](#_121_Tong_Shang_Shu__Di_431Ye)看來19世紀中期手工業者有所增加，它以全日工或零工方式吸引了農村的部分剩余勞動力，這也使得手工業者感到比以往更不穩定。流動的手工業者為數更多；茶廠總是擠滿了一文不名的流浪的求業者。破產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工人的行列，變成了民眾運動的領導的一部分。

### 移民

農村的貧困，經常再加上工匠貿易的厄運，造成了國內人口的流動。在太平天國之亂以后，大量人口的轉移尤其影響到長江下游各省，并使來自河南以及湖北、湖南、蘇北、浙東等人口密集區的移民重新定居到蘇南、安徽、江西和浙北等遭到戰火蹂躪的地區。這種狀況直到清末還在緩慢地延續。在50年內河南光山縣就有百余萬農民遷移到蘇南、浙北、安徽和江西60多處地方。[[122]](#_122_Li_Yi_Zhi____Zhong_Guo_Jin)都市更是吸引了大量移民，例如上海人口在1880年為10.7萬人，到1900年為34.5萬人，到1911年就增加到125萬人。這些移民帶著農業技術和殊風異俗從一地遷到另一地，往往弄得彼此關系緊張，或者造成不同的地方集團之間的沖突。[[123]](#_123_Wang_Jing_Yu____Zhong_Guo_J)

最大規模的地區間的移民運動無疑是北方各省（尤其是直隸、山東）的農民向滿洲的遷移。由于清廷的限制，以往只許滿人和八旗軍使用這一地區，所以長期以來這里就是一塊神秘的地方，但在整個19世紀，向這塊清朝發祥地的遷移不斷增加，并且逐漸合法化了。嘉慶帝在位時，直隸和山東連年遭受饑荒和自然災害，官方就在1803年“暫”準移民滿洲。在1786—1840年間，奉天人口從80.7萬人增至221.3萬人；吉林從14.8萬人增至32.4萬人；黑龍江則從1771年的3.5萬人上升到1808年的13.6萬人以上。[[124]](#_124_Zhong_Guo_Ke_Xue_Yuan_Ji_Li)面臨俄國及其后日本對東北的覬覦，清廷于1860年才決定鼓勵移民。許多最肥沃的地區于是逐一向數量日益增多的、由于農村不安定和貧困而被迫背井離鄉的華北各省移民正式開放。1907年，奉天、吉林和黑龍江都變成了行省，阻止漢人移民的一切禁令都被取消。當時每年遷來的移民大概有三四十萬。1911年奉天人口增加到1069.6萬人，是1897年的兩倍；吉林人口增加到373.5萬人，是1897年的五倍；黑龍江的人口則有145.3萬人。[[125]](#_125_Tong_Shang_Shu__Di_158Ye)

1880年以后，這些地區的采礦業、軍火工業和各種商業發展較快，呈現出一派特殊景象。習慣與傳統的影響很小，發財容易，但是隨著政府加強財政管理，稅收的負擔也立刻加重起來，而且在沒有集體保護和集體團結的情況下，經濟上掙扎求存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北滿有大量非法移民、原來的犯人、土匪、冒險分子、逃荒者和探礦者，他們統稱為“紅胡子”：這些在19世紀之末自發地以絕對集體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在那里非法地承擔著各種行政和治安的實際職能。其中最著名的是什都喀共和國，它是以黑龍江的一個支流命名的，在1885年那里共聚居有2萬人，曾引起幾位信仰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歐洲旅行家的好奇。[[126]](#_126_Man_Kao_Er___Ji_De_Ke_Fu)

正當華中和華北各省民眾設法擺脫貧困而在國內移民之際，華南居民則向往海外，以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在1876年以后，官方準許和鼓勵向臺灣移民，這吸引了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幾個府的居民；當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時，曾有二三十萬人返回大陸。19世紀后半期，成群的客家人從廣州三角洲遷到人煙稀少的廣東西部，尤其是雷州半島和海南島。[[127]](#_127_He_Bing_Di____Zhong_Guo_De)云南與印度支那的東京之間鐵路通車，曾出現臨時性移民熱潮；1911年這條鐵路就載運了100多萬名中國的四等車乘客。但是，多數海外移民還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在1840年以后，他們遍布東南亞、太平洋沿岸地區、古巴和印度洋諸島，并且遠及南非。很難得出海外移民的準確數字，因為其中許多移民只是臨時性的。估計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在1876年約有二三百萬，在1908年約有八九百萬，大部分是在東南亞。[[128]](#_128_Fu_Tian_Sheng_San____Hua_Qi)這些數字沒有區分新來的移民和自然增長的人口。在東南亞某些華人區，自然增長率大概相當高，像檳榔嶼和暹羅很早就有中國移民。

政府以政治安全的緣故，立法禁止向海外移民（但又無力貫徹實施），因此移民是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的。在1850—1875年間，外國代理人和航運公司用欺騙甚至常用暴力手段招募了128萬“契約”華工，到古巴、南美（那時非洲奴隸貿易已被禁止）和馬來亞的種植園與礦山當勞工，他們實際就是奴隸。這些不幸的人們擁擠在貨棧和船艙中，食不果腹，給他們許諾的微薄工資也從一開始就被騙走，因此病死和自殺使死亡率高達50%—60%。在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下，苦力買賣的弊端迫使清政府和有關的外國政府對雇傭辦法和運輸條件共同進行了某些控制。葡萄牙人在1875年決定禁止從澳門以契約形式移民，這在理論上結束了苦力貿易。當時拉丁美洲由于內部戰亂也開始使苦力貿易失去了主要市場。此后移民雖說是由完全“自愿”的工人組成，但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是以契約方式組織起來的。在1875—1914年間，用這種形式被雇傭并被運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和南非的歐洲人殖民地當苦力者逾百萬。[[129]](#_129_Chen_Ze_Xian____19Shi_Ji_Sh)

清政府既不能保護契約華工使之不受外國主子的剝削，也不能保護在19世紀最后25年數量的增加快得多的自由移民。不過，中國當局的態度倒的確從漠不關心轉為給以關注和警惕。[[130]](#_130_Guan_Yu_Qing_Zheng_Fu_De_Xi)在陳蘭彬、郭嵩燾、張之洞、薛福成和黃遵憲等外交官和高級官員的影響下，政府終于開始意識到華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從1869—1895年，曾就在主要的華僑地區建立領事館問題進行談判。清朝的外交是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和加拿大在19世紀80年代以及澳大利亞在1890年以后采取限制華人移入的措施。它抗議虐待華僑。1893年9月13日，上諭正式廢除禁止海外移民的傳統法令，并采取措施頒發護照，禁止地方官敲詐歸國華僑。這些措施鼓勵了僑匯歸國投資，并且在移民不斷增加的時期方便了大陸同海外華僑保持經常的聯系。20世紀之初廈門每年出境登記者有10萬人，新加坡每年入境近25萬人。[[131]](#_131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1907年華僑匯回的資金有7300萬兩。他們還為中國現代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資本。

華僑匯款回國使沿海府縣大量居民得以維持生計；它促進了廣州地區、華東諸省，甚至往北遠及滿洲等地的工業化；就全國范圍來說，僑匯數量大大有助于彌補商業赤字和外債造成的收支不平衡。而且在南洋（即東南亞），有為數眾多而且十分活躍的華僑富商甚至還為祖國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人才和精神鼓舞。在廣州附近創辦第一家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的陳啟沅、李鴻章的幕僚伍廷芳和1901年曾奉旨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百萬富翁張弼士等人，都是南洋華僑。華僑熟悉西方事務，相信經商的優越性，而且因身處備受歧視之地而產生的一種自衛感，使他們能熱愛祖國和堅持自己的民族特點。他們帶來了影響大陸的文化模式，例如言論自由和中西結合的教育制度，1886年哈瓦那開設的一所學校就采取了這種辦學方式。雖然清政府利用其海外臣民的財富和才干，但清末的維新派和革命派也向海外華僑尋求物質支持和羅致人才，以幫助他們逃避在本國受到的迫害。特別有幫助的是秘密會社的支持：這些秘密會社在國外已經發展壯大，這樣就便于為處于少數民族地位的華人提供有組織的保護；它們也有反對滿族王朝的傳統（參見第九章）。[[132]](#_132_Shen_Ru_Yan_Jiu_Zhe_Xie_Hui)

在清王朝的最后30年，華僑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作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方面的影響，僅僅在中國東南部的少數地區，華僑的人口影響才是重要的。

## 半無產階級的產生

在大規模民眾起義被鎮壓以后，半無產階級興起了，即令下層人民的國內遷徙和移居海外也未能緩和這一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相繼產生的現象。不論城鄉地區都廣泛存在著赤貧如洗的民眾，他們生活不穩定，居無定所，受饑饉、天災和傳染病的打擊最重。當時的有識之士對這一情景作過最有分量的描述。[[133]](#_133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他們把這種不幸歸咎于以下幾種情況的綜合影響：農業困難，人口增長，內戰后的遣散兵員，由于引進技術和現代化企業所造成的失業（尤其在運輸業和紡織業）。

由于大多數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生計維艱，稍有風吹草動、農業歉收或稅收加重，都會使流民隊伍擴大。當時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常使得大片地區荒無人煙。直隸和奉天在1886、1890和1891年遭到水災。江蘇約六十個縣和安徽約四十個縣從1886—1911年連年遭受旱澇風蟲災害的襲擊。受災最嚴重的是黃河沿岸諸省，成千上萬的村莊年復一年成為旱澇災害的犧牲品，使它們既無時間又無資金去修復溝渠堤壩。許多地方的水利工程被棄而不用，這便加重了不利的氣候條件造成的危害，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廢棄的原因不單是管理腐敗無能，而且也在于地方資源枯竭。1902年四川七八十個縣遭受旱災，破產的饑民多達幾十萬。[[134]](#_134_Zhong_Guo_Ke_Xue_Yuan_Shan)農村傳統的團結互助和政府的微薄救濟，對于數不勝數的、失去了任何生計的饑民來說都無濟于事了。在許多地方，游民的比例高得驚人，陜西某縣高達90%，云南某村高達33%，湖南某縣高達25%。[[135]](#_135_Xiao_Gong_Quan____19Shi_Ji)當然并非所有的地方都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在南方的富裕地區，人們還算是比較安居樂業的；但是，對于大多數地區來說，連年戰爭和天災的影響使得貧窮化更加普遍、更加深重了。[[136]](#_136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

一般說來，清政府是維護地主利益的；1854年的上諭要懲辦拒絕交納田租的農民，其罪同于逃稅。[[137]](#_137_Xiao_Gong_Quan____19Shi_Ji)在受災的情況下，官方則首先保護有恒產的農民和有固定職業的人。窮人往往被家族或其他鄉村組織所冷落或拋棄，但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的控制網：保甲和鄉約制度從此只能約束那些生活較好的公民，而不能控制窮人的行蹤了。小說家魯迅最尖刻地給我們描繪了幾百萬擠在中國城鄉而常年求乞的可憐人。他通過阿Q的性格作了這樣的描寫：生計艱難的阿Q有時出于城鄉人們的憐憫，有時出于他們殘酷的蔑視，到處受嘲弄和侮辱。[[138]](#_138_Lu_Xun____A_QZheng_Chuan)

這些不堪一擊的人們——從農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為社會公害的犧牲品，因此鴉片、賭博和賣淫盛行。[[139]](#_139_Can_Jian_Xiao_Gong_Quan_De)但是，城鄉貧民也向秘密會社和民眾運動提供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后備軍。高度活躍于沿江各省的哥老會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員，就是來自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太平軍之亂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進而賦閑的船夫等等；三合會則主要是吸收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140]](#_140_Wang_Yi_Sun____Xin_Hai_Ge_M)在19世紀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會宗旨的會黨超過只具有宗教性質的教門，這似乎是與失業游民和社會的被遺棄者的人數增加直接有關，因為會黨對他們提供了保護和支持。[[141]](#_141_Wang_Tian_Jiang____19Shi_Ji)

因此，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底層的特點毋寧說是生活不穩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繼續發展。其總的結果似乎是使得各個集團和各家各戶的處境都每況愈下，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傳統結構趨于崩潰，并且使得那些結構所提供的一定經濟保障也遭到破壞。

誠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而又情況復雜多變的國度，有許多白手起家而發財致富的例子；有從普通苦力變成百萬富翁的例子，如葉成忠；有設法把日子過得很好的勤勞機靈的農民的例子；還有一些保持繁榮安寧的地區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較富裕的中間等級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和其他經紀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現代上層社會。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口還是由擁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職業的農民組成。這些人也有個別流動的現象（只是未經研究，我們還不能比較其比例是否比過去為高）；在許多地方，這類農民的生活資料正在減少，如山東和直隸，一個縣的平均耕地面積從1870—1910年減少了20%—50%；[[142]](#_142_Mai_Er_Si____1890__1949Nian)在某些地區，他們在全體人口中的相對重要性隨著他們人數的減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這類農民內部，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職業的變化卻是微乎其微的。但另一方面，不再屬于傳統士農工商職業階層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這些人也不再受反映這些階層特點的舊的組織體系和結合方式的限制。這種人包括產業工人和一切毫無恒產的人（在傳統的社會觀念中，有無恒產是很重要的）；它還包括破產的農民和工匠、形形色色的游民和流氓無產者，以及散兵游勇和落魄文人。

傳統的社會體系便是這樣從上、下兩個方面一起瓦解的。不僅上層階級經歷了瓦解和變化，而且戲劇性地出現了一個邊緣的平民階級：他們不受法律的管轄，環境還驅使他們不受社會的控制，不受社會秩序的制約，也不受社會的尊重。

## 社會變化的動力

### 外因和內因

在清朝最后四十年，有許多因素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種形式的外國入侵。它直接造成如買辦和洋務專家等新的社會集團的產生，也促使某些行業衰退，如手工紡織業和華中、華北的傳統水陸運輸業。在許多地區，對外貿易使得經濟發展不平衡，從而增加了有些居民的貧困和失業。不過，外國滲入的間接后果似乎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西方人的出現以及中國同外界的接觸都推動著許多新的活動，改變了某些固有的職能，同時使得一批現代的商人和實業家、軍閥、大地主和城市知識分子新興起來，同時傳統的士紳文人階層則處在瓦解和變化之中。

然而，必須著重指出，在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中，知識分子運動在實現社會經濟變化方面似乎比帝國主義起了重要得多的作用。某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試圖說明，1895—1898年的維新派是“資產階級代表”，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后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動機。他們的行動是由于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后，利潤的誘惑才占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于自愿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在下層階級中，仇洋反教的宣傳似乎比外國經濟剝削的惡果更能激發民眾的有力反抗。在外國人大規模活動的影響彰明較著的地區，其居民比外國人很少涉足的地區的民眾似乎更不容易掀起暴動。1870年以后，許多排外事件都是發生在外國商業勢力基本上未到達的地方，那里有時只有三四個外國傳教士。[[143]](#_143_Can_Zhao_Li_Shi_Yue___Fan_Y)上海和廣州在四十多年中發生的少數事件和抵制活動，同義和團造反相比就未免相形見絀了。

然而，知識分子運動及其思想的實際能量能夠用純心理學來解釋嗎？是不是也有某些物質條件作支撐呢？

如果沒有有利的經濟變化的支持，1895年士紳文人所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將是毫無作為的。為了認識這種變化，中國的歷史學家把眼光放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工商業資產階級興起時“資本主義萌芽”（它孕育于16世紀以來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之中）所起的作用上。[[144]](#_144_20Shi_Ji_20Yu_30Nian_Dai_Yi)但是事實上，我們只能從幾個有限的地方事例中看出傳統的商業同工業資本主義有直接的聯系。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起義，終于打斷了這一發展過程；大作坊中的手工業生產是與辦工廠同時進行的，而不是早于辦工廠。大多數新的上層人物都是直接來自傳統的士紳文人和官吏統治階層。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直是土地，盡管他們通過做生意和開錢莊得到越來越多的利潤。所以我們必須著眼于土地所有制問題，才能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 土地關系的惡化

清末造成震撼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力量，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農業形勢的不斷惡化，尤其是在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方面。

人口增長是使長期束縛農民的“封建”關系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繼19世紀50—70年代中國內戰的大量傷亡之后的20年中，人口又恢復并超過了1850年的高水平。雖然太平天國戰爭肯定使長江下游人口增長放慢，但華北平原的人口看來是在加速增長。問題不僅是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而更復雜的是，根據家譜等等資料來看，特權階層的出生率要比較高一些。[[145]](#_145_Zhou_Rong_De_Yan_Jiu_Le_20S)這便產生了幾種同時出現而又矛盾的現象：對佃農剝削加重；地主喪失權威；衰退和貧困更加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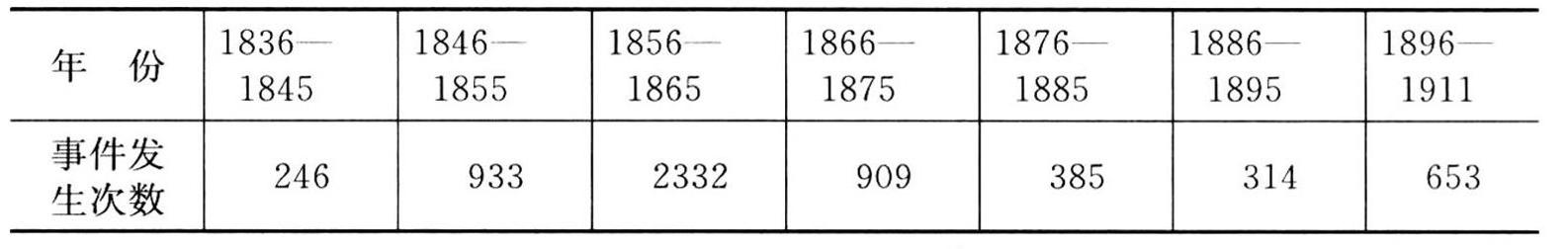
農民之間的競爭加上地主的新需求，造成了地租的增加和浮收的加重。這種現象是逐步產生的，但變得越來越普遍了。地主一旦決定卜居城鎮，就不再提供種子和工具；他們到收獲季節也不再親自監收，而開始改收固定的糧食或貨幣為地租；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也采取這些辦法。[[146]](#_146_Li_Shi_Yue____Xin_Hai_Ge_Mi)為了防止佃戶拖欠，還廣泛采用押租制，其數額往往高達10年的地租。[[147]](#_147_Li_Wen_Zhi____Zhong_Guo_Jin)這種做法在太平天國之后重新分配的土地上被廢止了，長期租地制也逐漸棄而不用。地主利用貨幣和農產品市場價格兩方面的波動以使地租換算率有利于己，并且進一步從事市場投機來從中獲利。因軍費開支而加重的財政負擔、現代化的費用和公私稅吏成倍增收附加稅，大大加重了小生產者即小戶的負擔，而大地主即大戶則利用其影響規避這種負擔。1876年發表的馮桂芬的遺著對太平天國之后江南的減租還表示過樂觀，可是蘇州文人陶煦不久就在《租核》一文中揭露了1863年改革的虛偽和不公，因為這項改革僅僅有利于那些同大官僚有聯系的少數貪婪的家族。他抨擊了地租的過分增加、大戶的傷天害理的殘暴行為、小農負擔倍蓰地加重所造成的減產和農業生產力的下降等現象。[[148]](#_148_Tao_Wen_Jian_Dong_Jing_Jiao)估計在辛亥革命前夕，農民的經濟負擔比起19世紀40年代來，即使沒有增加兩倍，也增加了一倍。到那時，田賦還算是農民較輕的負擔，但也已增加了60%—80%。誠然，農民總的實際負擔由于通貨膨脹可能比太平天國之前較輕。[[149]](#_149_Wang_Ye_Jian____1750__1911N)但是總的來說，租稅更加不平等，征收方法對納稅者更為不利。1895年以后為了滿足戰爭、債務和變法的需要又使稅額猛增：凡此種種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也許一個尚未加以具體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種講求個人關系和社會責任的體系已經分崩離析，而這種體系本來是能夠緩和對抗和激烈的階級沖突的。這個體系曾經保持過農村社會上下一條心，此時則越來越破裂了。以往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減免租賦，或向佃農和小農提供幫助和各種保護，而此時這些情況越來越罕見，或者越來越成為麻煩的負擔了。紳士名流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地主離開土地遷居城鎮，它雖然不是造成體系破裂的唯一原因，卻加劇了這種破裂，因為仍舊留在農村的地主肯定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儒者的仁愛之心。地主的無情，尤其是在進入城市以后，破壞了他們與佃戶關系中曾經有過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權威。實際上，這使感情更難建立，并且使雙方所借以承擔義務的默契中的靈活性也減弱了；它直接打擊了中國社會賴以運轉的中心觀念——“感情”（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互惠意識，或者毋寧說是不同境遇的人們之間互相承認對方和個人承擔義務的情感）。19世紀末竟有那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慨嘆上下“一心”已經不復存在，并且感到傳統做法的失敗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夠提供醫治其制度的藥方，這些現象的出現可以說絕不是偶然的。

然而，許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戰爭破壞、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而敗落下來，但它們在地方上仍舊起著集體負責的作用。充當著農村社會同外界官府聯系的中介。可是20世紀之初的華北許多農村，貧窮使這些家庭喪失了它們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沒有這些人以書寫的有力方式來反映它們的利益了，所以，現在留給它們的只有一條道路：造反。

### 民眾運動及其社會影響

光緒和宣統時期當然沒有發生可與太平軍、捻軍和回民起義相比的農民暴動。但是，這些規模空前的起義開始破壞了傳統的農村社會，后來其他民眾運動又繼續加以破壞，不過影響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1911年間，強弱程度不等的各種事件層出不窮。經歷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后運動有所緩和，然后在19世紀之末又勃發起來。楊慶堃曾對《大清歷朝實錄》記載的民眾活動作過定量分析，[[150]](#_150_Yang_Qing_Kun____19Shi_Ji_Z)其頻繁程度有如下表：



《實錄》所提供的這些數字看來相當低于實際數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如此。當時上海的《東方雜志》做過調查，1909年曾發生起義113起，1910年285起。[[151]](#_151_Wang_Yi_Sun_De___Xin_Hai_Ge)還有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緊接大規模動亂的相對平定之后，事件的平均持續時間更長，參加人數也增加了。華北（尤其是直隸省）雖然依然是動亂的主要地區，但動亂已遍及中國的各個省份。[[152]](#_152_Yang_Qing_Kun____19Shi_Ji_Z)

雖然這些事件都不能與太平軍起義相比，但是清末的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省持續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對列強的戰爭，接著發生的動亂又遠及四川和滿洲。在廣西，天地會在1898年發動的短命的起義，在1900年又恢復了活動，并在1903年威脅到鄰省。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幾十萬軍隊，但起義軍還是堅持到了1906年。約從1890年起，政府被民變頻起鬧得惶惶不可終日。[[153]](#_153_Zhe_Xie_Qi_Yi_Yun_Dong_Du_Y)

這種民眾騷亂有什么社會意義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結論之前，看來許多民眾運動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沒有公開宣稱的或顯而易見的社會目的：它們無非是一些騷亂，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國教徒，并且排滿，或者反對現代技術，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稅吏。據楊慶堃統計，這類動亂在1876—1911年《實錄》所載的事件中占1/4 到1/3。主要從這類動亂中產生了組織得更周密、對清帝國的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騷動：即1891年長江流域的排外風潮[[154]](#_154_Guan_Yu_Zhe_Xie_Shi_Jian__C)和義和團運動。

在這些騷亂中，參加者的社會成分是非常復雜的。鼓動者和領導者當中除手工業者、船夫、小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還有許多士紳文人、有抱負的官員、衙門胥吏、上層地主和商人。農民與苦力、流浪漢、無家可歸者或青少年等，他們在起義軍中占少數。義和團的情況就是如此。楊慶堃的統計表明，《實錄》所載光緒和宣統兩朝發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領導者的社會地位：這些人物中的57%都屬于統治階級或者至少與統治階級直接有關系。這些人有士紳文人、官吏、貴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員的奴仆和衙門的差役。領導層既然有這樣的社會淵源，這就使得動亂都像是內戰，而不像是階級斗爭了。

確實，清末經常發生的動亂大部分是秘密會社煽動起來的，這些秘密會社的成員復雜，它們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們雖然反對現存制度，卻又依附于它；它們起著調節傳統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會社的成員與正統社會決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個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個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經濟條件。秘密會社具有結拜兄弟的各種特點。它們志在維持在官方秩序以外的人們的生活，并對他們進行約束，從而使這一秩序不致徹底崩潰。它們在傳統社會中的結合，表現在它們的地方性、它們對過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們的許多禮儀和它們傳奇式的尊號。一旦形勢需要，它們的領袖會毫不遲疑地與政府當局妥協或互相勾結起來。在19世紀之末，長江流域許多名門大族至少有一個成員加入哥老會，以保護親屬免受會友的侵犯，同時又可使會友得到地方當局的寬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許多動亂很難被認為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戰爭或階級斗爭。但是，我們仍不應當否認其經濟和社會根源，也不應當根據單純的政治對立或叛逆來看待它們。事實上，每次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騷動，總是發生在農業歉收或者地方經濟出現災難以后。1886年夏重慶糧價猛漲，憤怒的群眾就燒毀了新教教堂。長江流域在連年遭受水災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發生了騷動。自1895—1898年，山東發生天災、饑饉及橫征暴斂，接著就爆發了義和團之亂。遭到襲擊的傳教士往往已經變成了仗勢欺人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獲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還是用欺詐手段奪取的族產或廟產，而且他們只準許教徒耕種這些土地，卻又拒不承擔地方上的公共義務。中國教徒被指責向洋人賣身投靠，以謀求不受當局的管轄和擺脫貧窮。拉幫結伙襲擊傳教士的人和大批秘密會社的成員，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沒有希望得到這種保護的人們。銳氣最盛的民眾運動的領導人便是從這些人當中產生的。義和團的兩位主要領袖曹福田和張德成，一個是被遣散的士兵，一個是運河上因輪船興起而失業的船夫。

許多排外的騷亂威脅甚至搶劫地方上被懷疑倚仗洋人的社會名流的財產，而且還攻擊衙門。拳民雖然主要是反對外國人，但是也提出了社會要求，盡管他們是與清廷站在一起的。他們的社會綱領超不過原始性的劫富濟貧，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農民更爽快地供應糧食的“護民”的口號。但這種原始的社會反抗始終是義和團行動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四川等地農村繼續進行抵抗的集團也都打著這種旗號。清末的排外和反滿暴動的特點之一并不是它們沒有社會內容，而是簡單的經濟對抗被賦予了政治色彩，這多半是受到秘密會社的影響。

總之，洋人和滿族只是引起標志著清末特點的動亂的次要原因；民眾運動也不僅僅是由秘密會社引起的。兵變、匪徒嘯聚、劫掠、搶米風潮、抗稅暴動和抗租運動：這些都是常見的地方騷亂的具體表現形式。騷亂常常通過簡單的反抗和自發行動表現出來。遇到歉收，人們就會立即拒絕交租，甚至痛打地主的監工以表示堅決的抗拒。官吏們變本加厲的暴戾和貪婪也激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眾可能把判決不公或下令增稅的官吏趕出衙門；參加公共工程建設的民工可能罷工抗議官員克扣工資；囚犯可能殺死百般肆虐的獄卒等等。

在各種斗爭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動占絕大多數。暴力針對統治機器和壓迫。群眾襲擊衙門、監獄、豪門富戶、監工、稅吏、高利貸者、商船和公私糧倉；他們燒毀債券地契和賬本。暴亂的發展開始是緩慢的，然而一旦展開便呈現其力量，有時只限于個人暴力行動，但是也可能發展到結成一支名副其實的武裝軍隊。暴動者利用鄉下可以弄到的各種武器來武裝自己，如長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槍等等；如果事態延續下去，他們還可能得到彈藥供應（這要感謝秘密會社的幫助），甚至能得到兵員補充。州縣官員和地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夠長期忍耐和等待；他們也知道適時讓步就可能撲滅一場正在醞釀的起義。然而在19世紀最后幾年，他們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討價還價的能力也開始枯竭，這尤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一無所有，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騷亂發生，官府便越來越可能訴諸武力鎮壓以驅散肇事者，既不謀求仲裁，也不搞妥協。但使用武力似乎只會增加暴力行動。[[155]](#_155_Guan_Yu_Dui_Dong_Luan_Shi_X)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會動亂的特點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意《實錄》所記載的騷動分布地區，就會發現這一特點。以京師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動亂最為頻繁；差不多半數事件都是發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會和府縣治所。[[156]](#_156_Tong_Shang_Shu__Di_187Ye)甚至那些偶發的小事件也都表現出這種政治色彩。例如農民會抓走衙役，或者進城攻打衙門；或許還會有個把落魄文人加入饑餓的農民一伙搶劫南方農村中的倉米，甚至張貼反詩。即使起事是出于個人或私人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們都寧愿去攻擊同對方有聯系的政治權力的象征。

從19世紀80年代到義和團起事，社會動亂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為秘密會社的影響而表現出來的。事實上，由于19世紀中期的大規模起義失敗以后，下層各階級處于大混亂之中——人口流動、人心渙散、農村解體、特權階級重新掌權肆虐等等，這時它們才發現秘密會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陷危境而束手無策的人們能夠依靠的唯一組織。秘密會社發展很快，大量的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術現代化排擠而失業的犧牲者，都紛紛加入秘密會社。例如19世紀最后30年，在長江中下游太平軍已被鎮壓、散兵游勇不可勝數和輪運也最發達的這一地區，哥老會非常迅速的發展就不是偶然的現象。遍布全國各地的秘密會社篤信反滿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動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戰。[[157]](#_157_Wang_Tian_Jiang____19Shi_Ji)

不過，在20世紀之初，秘密會社就不再對社會動亂的政治化起著不可缺少的決定性作用了，盡管沒有證據表明其影響有任何實質性的減少。同革命者一起采取行動，表明秘密會社的政治形象有所減弱。但是更說明問題的是，幾次規模相當大的民眾運動的發展，都是在沒有秘密會社支持的情況下向清王朝當局提出挑戰的；例如在1909—1911年中，浙江、甘肅、貴州、滿洲和山西等地發生的與禁種鴉片的禁令有關的持續幾個月的騷動；同一時期在華中數省發生的反對谷物漲價和提高田賦的暴動；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資助新學和改革運動而引起的動亂等等，情況都是如此。起事者搗毀公共建筑、辱罵政府、監禁甚至處死地方官。1910年五六月間，在山東萊陽曾發生反對增加苛捐雜稅的沖突，當局企圖把沖突歸咎于地方的上層人士，結果發展成為空前的暴力行動。參與其事者達四萬多人，死傷約1000人。[[158]](#_158_Zhong_Guo_Shi_Xue_Hui_Ji_Na)

文獻材料表明，所有這些動亂都是經濟因素觸發的，因為經濟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種原因造成的不滿情緒。然而，某些作者認為這些社會斗爭遠不是反映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相反的，卻是表明人們難以適應旨在改進整個局勢的各種變化。[[159]](#_159_Can_Jian_Mai_Er_Si___1890)他們的論據是其說不一的：或者說與19世紀中期的內戰相比，光緒和宣統年間的民眾運動比較軟弱；或者說極端貧困只會迫使農民竭盡全力茍延殘喘，沒有余力去鬧事。誠然，在廣州某些地區，農業的商品化使得農民對地主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他們有勇氣拒不交租。[[160]](#_160_Qian_Tian_Sheng_Tai_Lang)然而要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解釋得根據詳盡的經濟研究，可是現在這樣的研究畢竟闕如。目前的研究狀況和擁有的材料只能斷定，清朝最后幾十年雖然有些農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真正的窮人所占的比重增加了。民眾運動的大多數參加者就是這一類人。

不過，民眾運動之所以影響社會變革，顯然主要是由于其政治色彩，這也是事實。從民眾運動突出地看清了清王朝政權機構越來越無力維持社會秩序，它們還削弱了它殘存的力量。有人指責清末農民運動說：它們的目的同早年的農民起義相比幾乎沒有改變；它們對外國之侵入中國這一總的歷史趨勢仍然比較遲鈍；它們放棄了太平天國受西方影響而作的現代主義的革新努力；以及說它們不能以新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等等。[[161]](#_161_Can_Zhao_She_Nuo___1840__19)的確，除了同共和派合作的起義（盡管它們的政治思想是抄自國外，它們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主張也是溫和的）之外，這些民眾運動從未提出哪怕能與太平天國相比的綱領。它們從未提出任何明確的“革命計劃”。

然而，緊接在這類自封的造反之后，社會進步總是要加速的。民眾力量的不斷打擊，動搖了維護舊的生產關系和保護社會上層對農民剝削的政權。當包括社會名流在內的各社會階級不再支持統治政權時，上述的情況就成了產生任何革命形勢的基本因素。[[162]](#_162_You_Qi_Yao_Can_Kan_Ke_Si_Ji)事實上，上層人物雖然指責清朝無能，但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后通過在地方上擴大勢力和勒索行為也得到了這個政權的好處，因此他們極力想維護這個政權于不墜。至于農村的上層人物，他們的不滿和蔑視是由于出現的政治制度不能再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們也不知不覺地拋棄了這個制度所固有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負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19世紀之末許多士紳文人都指出，“私”已經壓倒了“公”。這顯然是一種倒退。但是這個“私”又導致另一個“公”的出現，即國家民族的集體感。社會不太平和對民眾憤怒的畏懼，也促使許多社會上層分子從事新的職業。這種趨向在1891年的騷動浪潮過后遍及華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后更是遍及全國。上層人物的這種轉變以及他們逃進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來自下面的壓力同他們維護特權的本能相結合的結果。新的工商業者和現代上層分子經常表示希望多提供就業機會，希望消除大眾貧困和愚昧，這就顯然表露了那種埋藏很深的情緒。然而奇怪的是，社會重視技術特長——清末社會的一個特點——歸根結底是義和團的拳頭打出來的，而不是洋人的炮艦和梁啟超的譴責造成的。義和團咄咄逼人的拳頭迫使當局匆忙尋找新技術和新辦法來保持它的地位。

民眾起義在影響清末各階級的社會動員這一新現象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情況雖然沒有影響到社會地位或生產關系，但卻表明人們對個人行動在社會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變。每次騷動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不僅如此，民眾運動還通過模仿和自衛反應促使各社會階級的聯合，以便集體干預公共生活。例如他們倡議建立自衛組織，發起保護和發展新式學校或民眾教育的運動，在北京和各省省會舉行抵制洋貨和抗議集會，等等。

民眾起義也維護了清帝國領土的完整，它們使列強懾于民眾起義，特別是在經歷了義和團起義的恐怖以后，列強放棄了肢解中國的希望。然而，民眾起義雖然沒有讓維護民族統一的支柱垮下來，卻使傳統的制度及與其相關聯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會和道德秩序等準則全部崩潰了。

清朝的覆滅并沒有使傳統社會隨之湮滅，而是使它越來越陷入混亂。士紳割斷了自古以來同君主制的聯系。產生了新的特權階級：軍閥、包括工商資產階級在內的現代上流社會以及大地主寡頭集團。農村共同體松散了：宗族內部互相救助的組織的活動范圍縮得更小了；涌進城市找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里被行會所歧視）和無家可歸、無以為生的人越來越多。這種混亂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無不如此。社會機構受到下層力量的打擊而被削弱，開始逐漸瓦解。太平天國之亂標志著這一瓦解的開始，它的最大作用也許不是在于破壞了人們對其主人的尊敬和信任，而是在于鼓勵傳統的統治階級獲取更多的地方權力，以改變它同清政府的關系。這就使得君主及其代理人失去了作為仲裁人和管理者的作用，從而剝奪了他們掌權的最有效手段。在以后的幾十年當中，民眾起義的騷擾、外國影響的擴大以及政治制度顯然無力維持社會穩定的情況，都進一步損害了社會結合的機制。剛剛形成的城市上層社會企望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不僅把傳統的鄉村社會置諸腦后，而且把對它的約束和它內部的團結也拋諸九霄云外了。

因此，這是一個脫了節的社會制度，隨著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遜位，它的結構也被腰斬。清末的社會變化既是政治權威削弱的原因，也是政治權威削弱的結果。一個顯著的特點也許是社會現象同政治現象相互之間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這個特點來自中國社會的傳統組織方式和中華帝國所信奉的遍及各地和無所不包的儒家思想。最后，這種變化的局面的結果是通過以下的長期趨向表現出來的：同外國的關系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了國內幾個地區的結合。這些結果跟天災一起，還使農村共同體日益發生困難。

1911年的中國表現了一個脫了節的社會所具有的兩面性的面貌（這個社會也是培育1911年因反對清王朝而聯合起來的許多新社會力量——例如新軍、現代上層社會和革命志士——的溫床）。一個逐漸喪失了靈魂和精神而留存下來的社會外殼，是包不住這個新生命的。但當時被人們稱呼的少年中國，對自己的特性心中無數，它又建立在無法辨別的千變萬化的地區條件的基礎之上，所以它也許不過是一場春夢。倘若沒有民眾的壓力長期把清王朝的元氣耗盡，那些暴發戶、年輕軍官和活躍在大都市的知識分子，有可能推翻清朝嗎？可是最終還不是靠少年中國的猛擊一掌才迫使清帝退位的嗎？而這又難道不是由于最高統治層政治意志力的衰竭所造成的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城市起義，被視為鴉片戰爭之后社會發生空前變化的產物，被看作是那些背棄古老的農業帝國而轉向西方以尋求建立政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新技術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腦力勞動的成果。不過，盡管民國此時已掌握在新的社會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誕生的清朝的滅亡卻是全國農村中深刻的運動逐漸取得成功的結果。

（黃振華 譯）

[[1]](#_1_9)張謇：《柳西草堂日記》（1904年10月25日）。

[[2]](#_2_9)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第34—40頁。

[[3]](#_3_9)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8、94頁。

[[4]](#_4_9)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98—102頁。

[[5]](#_5_9)同上書，第103—111頁。

[[6]](#_6_9)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第47—50頁。關于整個清朝地方官的詳細情況參見李國祁、周天生《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頁。

[[7]](#_7_9)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3—115頁。

[[8]](#_8_9)這些數字和百分比出自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6—137頁。

[[9]](#_9_9)1856年之前湘軍的多數將領是文人，后來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這個比例。參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55—64頁。

[[10]](#_10_9)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6—151頁。

[[11]](#_11_9)淮軍將領有官階和功名者只占10%，在淮軍核心，即在十一營軍隊的最高指揮當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見王爾敏《淮軍志》，第184—185頁。

[[12]](#_12_9)據外國專家估計，1885年中國擁有的西式武器有來復槍和連發槍20多萬支、擊發槍數10萬支、機槍約50挺、各種口徑的大炮1200門。參見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領事的政治報道·上海》12，第211—215頁。1885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裝備的報告。

[[13]](#_13_9)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4、17頁。

[[14]](#_14_9)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35—236頁。

[[15]](#_15_9)參見陳孝芬等人的回憶，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

[[16]](#_16_9)有關此事的總章程可參見《大清德宗實錄》卷537第14頁所載1904年12月20日的上諭。其詳細說明見《大清實錄宣統政紀》卷20，第20—24頁，1909年11月11日的上諭。

[[17]](#_17_9)關于這些數字各種不同來源的討論，參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88—298頁。

[[18]](#_18_9)維新派的報紙在這個運動中發揮了先鋒作用，尤其以《新民叢報》為突出，特別是奮翮生和蔣百里在1902年發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9]](#_19_9)《教育雜志》卷3，第6，附錄2。

[[20]](#_20_9)但有許多人并沒有青史留名，他們的記述可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輯，第211—213、281—301頁；第4輯，第247—255頁。又見陳旭麓和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

[[21]](#_21_9)謝里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第43—44頁。

[[22]](#_22_9)1907年以后作過努力，但勞而無功。其時張之洞已死，袁世凱失寵，推行這項工作本應較為容易。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54—281頁。

[[23]](#_23_9)日本士官學校校友即形成一個十分團結的小團體。見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1冊，第22—25頁。

[[24]](#_24_9)他的傳記參見費維愷《盛宣懷與中國的官辦企業》。

[[25]](#_25_9)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頁。

[[26]](#_26_9)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48—54頁。

[[27]](#_27_9)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9—960、966—967頁。

[[28]](#_28_9)這些數字出自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頁，只包括“大”買辦。1870—1900年的數字則包括現任買辦和仍舊從事某些商業活動的前任買辦。

[[29]](#_29_9)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105頁。

[[30]](#_30_9)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第197頁。

[[31]](#_31_9)雷默：《外國在華投資》，第69頁。

[[32]](#_32_9)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20—136頁。

[[33]](#_33_9)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091—1095頁上列舉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買辦有聯系的行號，這些人在1878—1910年是這些行號的發起人或大投資者。

[[34]](#_34_9)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2輯，第104頁。

[[35]](#_35_9)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4—956頁。

[[36]](#_36_9)同上書，第958頁。

[[37]](#_37_9)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32、94頁。

[[38]](#_38_8)同上書，第730—751頁。

[[39]](#_39_8)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57—965頁。

[[40]](#_40_8)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331—449頁。

[[41]](#_41_8)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Ⅰ（1958年），第213—267頁。

[[42]](#_42_8)例如葉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20萬兩，1893年粵商創辦了廣濟醫院。

[[43]](#_43_8)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頁。

[[44]](#_44_8)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15—1118頁。

[[45]](#_45_8)汪敬虞：《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頁。作者估計以這種方式投資的中國資本總數超過四千萬兩。

[[46]](#_46_8)這對買辦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72—173、221頁。不過，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幫辦人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9—930頁。

[[47]](#_47_8)關于王韜的傳記，參見保羅·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嚴復的傳記，見施瓦茨《嚴復與西方》。

[[48]](#_48_8)參見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第296—315頁。

[[49]](#_49_8)參見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此書敘述了長江下游的革命派。關于湖南的革命派，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頁。

[[50]](#_50_8)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926、928、934—943頁。

[[51]](#_51_8)同上書，第927頁。

[[52]](#_52_8)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司：《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5篇，第52、55、58頁。

[[53]](#_53_8)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載《北京市歷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輯》，第258—280頁。

[[54]](#_54_8)數字是根據《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第3篇第2—51頁和第5篇第39、69頁上所開列的名字計算的。

[[55]](#_55_8)劉鶚的自傳體小說《老殘游記》充分表現了這一特點。此書有英譯本。

[[56]](#_56_8)關于狹義地分析資產階級，見貝爾熱《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54頁。

[[57]](#_57_8)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3，第20頁。

[[58]](#_58_8)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紹了曾、李兩人的幕府。

[[59]](#_59_8)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26頁。

[[60]](#_60_8)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94、154頁。

[[61]](#_61_7)關于各種各樣的憲政公會，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365—378頁。關于各種聯合會的組成和重疊情況，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0—72、163—165頁。

[[62]](#_62_7)關于教育會在這方面的情況，可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3—75、172—173頁。

[[63]](#_63_7)其行動的政治特點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44—173頁。

[[64]](#_64_7)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頁。

[[65]](#_65_7)關于湖南和湖北的詳情，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頁。關于廣東的情況，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55—171頁。

[[66]](#_66_7)廣州各商會的詳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廣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個工作機構，以保護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參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80—81、148—149頁。

[[67]](#_67_7)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198—270頁。

[[68]](#_68_7)同上書，第209頁。

[[69]](#_69_7)比較著名的小說之一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1—1905年連載于上海的一家雜志上。

[[70]](#_70_7)例如，1896—1898年間張謇就曾遇到過種種麻煩，他建議開辦紡織廠，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紳的堅決反對。參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33頁。關于廣東的反應，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頁。

[[71]](#_71_7)齊赫文斯基：《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康有為》，第257—280頁。

[[72]](#_72_7)1958年對天津地區的高齡老人所作的調查很有意義，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59、263—264頁。

[[73]](#_73_7)參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頁。

[[74]](#_74_7)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47—348頁。

[[75]](#_75_6)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4—737頁。

[[76]](#_76_6)特別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

[[77]](#_77_6)19世紀之末有書院兩千多處，學生近15萬人。1909年有中學702所，學生7.2萬人；在當時書院已不復存在了。關于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的相對減少問題，見巴斯蒂的《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3—85、222—224頁）和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76頁）。

[[78]](#_78_5)參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載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85—226頁。

[[79]](#_79_4)關于幾個開放商埠的人口統計，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3—1174頁。

[[80]](#_80_4)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81]](#_81_4)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頁。

[[82]](#_82_4)小學的費用漲了一倍，中學的費用則增加了三四倍。見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124、150、218、222、224頁。

[[83]](#_83_4)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頁。

[[84]](#_84_4)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第92—96頁。

[[85]](#_85_4)在宣傳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婦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們創辦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婦女編輯發行的日報。參見吉波倫《秋瑾》，第233—244頁。

[[86]](#_86_4)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斗爭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頁。

[[87]](#_87_4)根據孫毓棠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1頁）的不完全估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國人開辦的工廠。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6萬名工人，其比例也是這樣。

[[88]](#_88_3)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21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83頁。后者估計從1900—1910年雇工500人以上的廠礦有工人24萬人，其中10.9萬人是在外商企業中干活。

[[89]](#_89_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1248—1249頁。

[[90]](#_90_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2—1233、1244—1246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4—1240頁；謝諾：《1919—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94—108頁。

[[91]](#_91_3)孫任以都：《清代礦工》，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探索》，第61—65頁。

[[92]](#_92_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22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98—1261頁。

[[93]](#_93_3)王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5—1254頁。

[[94]](#_94_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37—1241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04—1216頁。

[[95]](#_95_3)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16—1222頁。

[[96]](#_96_3)據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頁）。

[[97]](#_97_3)趙親：《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載《歷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6頁。

[[98]](#_98_3)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44—1248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265—1269頁；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斗爭資料》，載《經濟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頁。

[[99]](#_99_3)謝諾：《1919—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181—185頁。

[[100]](#_100_3)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9—1911年》，第638—640、672—685頁。

[[101]](#_101_3)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3—37頁。

[[102]](#_102_2)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84—257頁。

[[103]](#_103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386—416、469—482、651—660頁。

[[104]](#_104_2)同上書，第557—563頁。

[[105]](#_105_2)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42頁。這些數字涉及的是直隸和山東種植高粱的地區。此種情況并不普遍，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中第276—277頁提到的兩個相反的例子。

[[106]](#_106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175—178頁。

[[107]](#_107_2)同上書，第178—188頁。

[[108]](#_108_2)同上書，第193—196、629—660頁。

[[109]](#_109_2)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戶》，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第247—296頁。

[[110]](#_110_2)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第41—81、130—141頁。

[[111]](#_111_2)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關于其他地區農村社會中這些情況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參見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268—270頁。

[[112]](#_112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287—296頁。

[[113]](#_113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214—233頁。

[[114]](#_114_2)同上書，第255—282、301—385、502—508、908、929頁。

[[115]](#_115_2)彭澤益：《19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2—73頁。

[[116]](#_116_2)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第85—115頁。

[[117]](#_117_2)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505—574頁。

[[118]](#_118_2)彭澤益：《19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1期，第71—102頁；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28—41、599、602、604、611頁。

[[119]](#_119_2)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第615—617頁。

[[120]](#_120_2)同上書，第582—595頁。

[[121]](#_121_2)同上書，第431頁。

[[122]](#_122_2)李義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166—172頁。王天獎：《太平天國革命后蘇浙皖三省的土地關系》，載《新建設》1963年第8期，第46—54頁。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頁。

[[123]](#_123_2)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2—1173頁。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53—158頁。

[[124]](#_124_2)中國科學院吉林省分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近代東北人民革命運動史》，第8頁。

[[125]](#_125_2)同上書，第158頁。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775—808頁。

[[126]](#_126_2)曼考爾、吉德科夫：《中國東北的紅胡子》，載謝諾編《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125—134頁。

[[127]](#_127_2)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3—166頁。

[[128]](#_128_2)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第80—81頁。

[[129]](#_129_2)陳澤憲：《19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

[[130]](#_130_2)關于清政府的新政策，參見戈德利《晚清對東南亞華人的眷顧》，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2期（1975年2月號）。

[[131]](#_131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941—942頁。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178—1179頁。

[[132]](#_132_2)深入研究這些會社的著作有庫默《1800—1900年馬來亞的三合會概述》；摩根：《香港的三合會》；布萊思：《中國秘密會社對馬來亞影響的歷史研究》。

[[133]](#_133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935—938、945—946頁。

[[134]](#_134_2)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論文集》，第243頁。有關黃河和長江流域每年的自然災害，參見李文治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中所列的表（第720—722、733—735頁）。

[[135]](#_135_2)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690頁。里昂商會編：《1895—1897年里昂的中國商業考察團》，第79頁。

[[136]](#_136_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686—692頁。

[[137]](#_137_2)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第391頁。

[[138]](#_138_2)魯迅：《阿Q正傳》。

[[139]](#_139_2)參見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中的引文（第399—402頁）。

[[140]](#_140_2)汪詒蓀：《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載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18—121頁。

[[141]](#_141_2)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42]](#_142_2)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第137—138頁。

[[143]](#_143_1)參照李時岳《反洋教運動》，第31—105頁。

[[144]](#_144_1)20世紀20與30年代已就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進行了爭論，1954—1960年的討論是其繼續。參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費維愷對此作了摘要綜述《共產黨中國史學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見作者自編《共產黨中國的歷史學》，第229—234頁。

[[145]](#_145_1)周榮德研究了20世紀初期的情況，他認為特權階級出生率較高是嬰兒死亡率較低和生育能力較高的結果，見《中國的社會流動性》，第110—113頁。現有的19世紀的材料只能使我們看出出生率的不同。關于生育能力和嬰兒死亡率的情況還沒有足夠的材料。

[[146]](#_146_1)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第35—41頁。

[[147]](#_147_1)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第256—258頁。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農村社會——押租慣例和抗租傾向》，載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結構》，第1—19頁。

[[148]](#_148_1)陶文見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的附錄中。又見鈴木智夫《晚清減租理論的發展——〈租核〉之研究》，載上書第199—246頁。

[[149]](#_149_1)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第110—128頁。

[[150]](#_150_1)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190頁。楊慶堃的全部統計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脅公共秩序的社會抗議和騷動等特點的事件，而略去了列為“皈依基督教”、“集體向政府捐助軍費”和“地方自衛”等項目下的群眾性活動。

[[151]](#_151_1)汪詒蓀的《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同樣將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頁）。

[[152]](#_152_1)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178—187頁。

[[153]](#_153_1)這些起義運動都有專著研究。關于義和團運動，參見翦伯贊編《義和團》；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其他的研究論文和總書目見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法文版與英譯本略有不同）。

[[154]](#_154_1)關于這些事件，參見皮雷蒙《哥老會與1891年的排外事件》，載謝諾編《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又見韋爾利《英國、中國與反傳教士騷動1891—1900年》，第19—44頁；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第16—39頁。

[[155]](#_155_1)關于對動亂實行剿或撫的手段，其統計參見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第205—206頁。

[[156]](#_156_1)同上書，第187頁。

[[157]](#_157_1)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93—97頁。

[[158]](#_158_1)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2輯，第5—64頁。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第3輯，第465—479頁。

[[159]](#_159_1)參見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費維愷：《19世紀中國的叛亂》，第74頁。

[[160]](#_160_1)前田勝太郎：《清代廣東農民斗爭的基礎》，載《東洋學報》卷51第4期（1969年3月），第1—38頁。

[[161]](#_161_1)參照射諾《1840—1949年中國的農民運動》，第78—85頁。

[[162]](#_162_1)尤其要參看科斯嘉也娃《1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第107—110頁。

# 參考文獻介紹

##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關于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綜合論述，沒有哪種文字出版的書籍是令人滿意的。香港出版的兩卷本《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照相平版印刷），轉載了1953—1967年間分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臺灣發表的46篇近代經濟和社會史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領域的狀況。原在1932年和1949年期間《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雜志上發表的21篇較老的重要文章也適當地被轉載了，見《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論集》。

晚清時期出版的經濟資料包括從總理衙門和外交部檔案中照相復印的兩大種文獻匯編，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海防檔》，其中有1861—1911年間購置外國武器、建立兵工廠和機器廠以及興辦電報和鐵路等事項的檔案；另一種是1865—1911年的《礦務檔》。

大量有重要價值的原始資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十年搜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難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過去未經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時冠以有傾向性的小標題。李文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中附有內容廣泛的書目。彭澤益編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年》一書的頭兩卷包括的是晚清時期。關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廠工業的論述，可見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和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有關鐵路史方面的文獻資料收在宓汝成所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關運輸和交通方面的資料則是前國民政府交通鐵道部（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看到的縮微膠卷和“大型目錄”，使我們能夠閱讀這一匯編中的23776頁文獻資料。有關外國貸款的極為詳盡的數字反映在徐義生的《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年》一書中。嚴中平等人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引有廣泛資料，并詳加注釋，但是編者有時忽略了指數問題。

要研究對外貿易等問題，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資料現在已由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制成縮微膠卷，以供使用。蕭亮林（音）的《中國外貿統計，1864—1949年》一書充分地參照原始材料，對外貿統計數字作了有價值的校勘。

專題性文獻尚不多見。入門時或許最好先閱讀施堅雅等人所編《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的有關部分，本書論述的時期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許多專題著作中，下面幾種可能是值得注意的。農業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參見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這是一部研究如何擴大耕地面積和增加單位產量以使中國的農民能夠養活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經濟論》則是一部概述現有1949年以前的20世紀經濟資料的巨著，但它對于19世紀的研究也同樣有價值。學術界對于近代制造業和礦業都相當重視，但對手工業卻不盡然。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說明了晚清工業化的性質。有關軍事工業的問題，可見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的興起》。關于鐵路，有李國祁的《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造船業方面，有劉廣京的《1862—1874年英美輪船業在中國的爭奪》。關于礦業方面，有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年》一書是目前研究某一單項工業的最佳著作。在外國工業投資影響方面，有侯繼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有關人口的論述，可見何炳棣的《中國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稅的管理和規模在王業鍵的《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一書中有論述，而對財政上占有位置的鹽業專賣則在佐伯富的《清代鹽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關貨幣制度的問題，可參閱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和弗蘭克·金的《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與貨幣政策》兩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會議論文集中，有幾篇文章論述了晚清經濟的各個方面。這些文集是：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珀金斯編的《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 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對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須使用多種檔案和多種語言，并且要跨學科來進行。這種研究必須先從研究幾種主要語言的文獻著手，另外還要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和心理諸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影響著中國對外關系的舞臺。這種結合歷史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自然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照，那時研究中國的歐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資料的外交關系專家。例如，馬士的先驅性著作大部分根據英文資料，而考爾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資料，泰勒·德涅特則大部分依靠美國文獻。盡管他們的著作在當時起過開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它們只不過是英、法、美三國的對華外交史。由于他們完全依賴本國資料，致使他們不僅忽視了中文資料和中國人的觀點，甚至對西方資料也不能博采諸國的檔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蘭格的《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一書確立了新的標準，但它基本上仍缺乏東亞的資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學者們已經能夠避免學術上老的狹隘地方主義了，他們也研究中文資料，并試圖理解中國人的觀點。當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關清代外交事務的中文資料時，中國外交史的新時代開始了。特別是在蔣廷黻的影響下，新的一代中國和西方學者出現了，他們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漸使他們的研究符合近代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標準。他們的這種努力在40和50年代取得了長足進展，它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并且開創了利用多種語言的檔案研究中國外交史的新局面。日本論述近代中國的學術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們公認。顯然，也有人很花力氣去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研究中國的學術著作，其結果是給非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他們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釋。

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獻匯編有如下述（盡管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個別官員的著作）：

1.《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彥威和王亮合編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導言一卷和宣統朝（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11卷。

5.《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7卷。

7.《大清歷朝實錄》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標點和索引版《清史》（臺北1961—1962年，8卷）。

9.《宮中檔光緒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1805—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7冊。

12.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7冊。

13.翦伯贊等編：《義和團》4冊。

有關清代文獻的類型、價值和傳播，可參看費正清和鄧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種》；有關宮廷禮制和政策，可看吳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當然已有大量文獻叢書問世，它們提供了日文、朝鮮文和歐洲文字的各該國外交關系的記載，其中也包括這些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記載。關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編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編輯的《1862—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由于英國政策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現有的檔案都有重要價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檔案文獻（例如議會文件中的中國通訊部分和英國議會議事錄的辯論部分）外，我們也可以參考倫敦檔案局所藏外交部有關中國的案卷，特別是如下的檔卷：外交部第17號文件“中國政治通訊”，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號文件“政治通訊”，1906—1932年；外交部第228號文件“中國領事館通訊”，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號文件“中國問題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以及外交部第682號文件“中國處，公使館檔案”，1839—1939年。又見羅惠民的《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補1915—1937年》。還有大部頭的再版書《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19世紀），是愛爾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區域研究叢書，計42卷。

在美國，這些檔案已制成縮微膠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國對外關系，1866— 》一書外，還可以使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文獻《中國：急件》、《中國：指令》和《中國：領事館報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資料都制成了縮微膠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領事館的報告可以在華盛頓特區國家檔案館看到，見《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有關俄國的資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見《紅色檔案，歷史記事》，104卷；魯賓恰克編譯，路易斯·鮑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編輯的《紅色檔案摘要：蘇聯中央檔案部歷史記事》，106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編的《中國書目》中的條目；齊赫文斯基編的《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葉菲莫夫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評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較為重要的輔助著作。關于外交關系的開創，見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和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

關于帝國主義在邊疆地區加緊活動的狀況，見費正清作為背景材料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蔣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3年第17期第1—106頁；徐中約的《伊犁危機，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有關日本侵略朝鮮的論述，見康羅伊的《1868—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凱與朝鮮》；C.I.尤金·金、金漢奎（音）的《1876—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趙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治》；詹森的《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爭到和平的時期》，第4章。

有關瓜分中國的威脅和義和團暴亂，可見施雷克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珀塞爾的《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譚春霖的《拳亂》；弗萊明的《北京被圍記》；埃德蒙·S.韋爾利的《1891—1900年英國、中國和反教騷動》；L.K.楊的《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有關俄國1900—1905年在滿洲活動的論述，可見倫森編的《俄中戰爭》，和陳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有關英日聯盟方面的論述，可見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關美國之卷入滿洲問題，可見亨特的《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 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時期中國對西方關系觀點的史料是豐富的，但卻很分散。有關一些 剴切陳詞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資料，都是他們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國歷史學會主辦出版的大量文獻匯編中，特別是齊思和等編的《鴉片戰爭》、邵循正等編的《中法戰爭》和中國科學院等編的《洋務運動》。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仍然是官方編纂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編輯出版了《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它是1821—1861年期間的文獻綜合匯編。鄧嗣禹和費正清合編的佳作《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收集了從1839年以來晚清的文獻并譯成英文，且有注釋。關于中國對西方態度的總的論述，可參看王爾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關于傳統的中國人的世界觀（這嚴重地影響了近代中國關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譯七經》和那波利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華思想》，對這一題目的有權威的著作是費正清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經世學派在中國對西方的態度方面起過重要作用，關于它的重新得勢的情況，學者們有必要研究賀長齡的重要著作《皇朝經世文編》和它的幾個續編。王家儉的《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是對一個經世論學者所作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

關于19世紀中葉某些士大夫對“變局”的認識，在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對付這種前所未有的情勢的最好途徑，則意見頗不一致。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見之于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和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后兩者書名雖同，但內容各異。關于中國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況是郭廷以等人所編和進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燾先生年譜》的題目；而對繼郭嵩燾而為倫敦公使的曾紀澤，李恩涵的《曾紀澤的外交》則作了詳細的研究。關于那些力主中國須抓住變局良機以圖強的有見識的官員的論點，可見多卷本《海防檔》和劉廣京的《儒家愛國者和實務派李鴻章》。

張灝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書考察了一位理學高級官員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記排印本》提供了有關清廷中保守主義的詳細情況。對于無經驗而又書生氣十足的一批年輕人組成的活躍的政治集團的政治態度，可見郝延平的《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門的《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追求的政策》。對于同情保守派的關鍵人物的研究，可見陸寶千的《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劉鳳翰的《李鴻藻先生年譜》（李鴻藻是顯赫的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老師）。后者系李鴻藻之孫與人合著之書，它包括許多罕見的和從前未出版的文獻，其中有李鴻藻的信件和日記。對于反基督教的觀點，在保羅·A.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一書作了精心的考察，該書著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間文化上的齟齬之處；還可參看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此書除了強調西方帝國主義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對“人、夷與獸”的看法。

對于國家主權的認識和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論的問題，可看呂實強的《丁日昌與自強運動》、李國祁的《張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時代的馬建中》。關于著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業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有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和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五章）。

## 第四章 西北與沿海的軍事挑戰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和史密斯的《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庫恩在《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分析了19世紀中葉的軍事發展。庫恩強調團練超過了羅爾綱的《湘軍新志》。在“更高一級的軍事化”方面，湘軍的具體籌建工作在王爾敏1973年的《清代勇營制度》一文中作了討論。

有關綠營兵的論述，羅爾綱的《綠營兵志》仍然是權威性的著述。《宮中檔光緒朝奏折》中關于部署“練軍”以防止和鎮壓民眾造反的報告。

有關外國對清軍影響的著述，見史密斯的《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一書，該書從歷史角度評述了華爾和戈登。又可看該作者的《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和晚清的實踐》一文。在19世紀中葉的西方著述中，藍普雷的《中國的軍事體系》一文（1867年）雖然妄自尊大，但不失為卓有見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國作者撰寫了有關清代軍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頓（1878年）、馬克·貝爾（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爾遜（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們均未能透徹地理解勇營的政治和財政背景及其組織原則。

關于西北部回民暴亂問題，有貝爾斯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一書，它與贊譽左宗棠將才的19世紀西方作者頗異其趣。由于貝爾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許多錯誤，后經朱文長專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予以指出。此書是有關清朝對陜甘回民作戰的最佳著作。如同我們大家一樣，朱文長不得不使用關于回民的間接材料。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學者白壽彝在《回民起義》一書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陜甘回民之手的兩份簡短的文獻。朱文長的著作又被徐中約1968年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一文所充實，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過強制各省解繳“協餉 ”，從1868年至1884年新疆設行省時止，已經為西北的征戰花費了大量資源。對中國沿海自強運動的研究通常都忽視了從這一亞洲腹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對日益贊同1840—1894年沿海防務的輿論，王家儉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論》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一書著重談到了李鴻章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就對日本之窺測朝鮮有所警惕。羅林森在《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一書中鮮明生動地描述了李鴻章創建海軍活動的艱苦和災難。慈禧太后揮霍海防專款興建頤和園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獻材料加以論證。梁嘉彬（1975年）著重論述了李鴻章對中國敗于甲午戰爭負有責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則剛剛開始探索造成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日益衰敗的宮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資料中，至少有兩種法文材料（黎貢德和愛爾明加）記述了1885年3月末中國在諒山奇襲取得勝利的情況。英國觀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國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這次戰役的具體細節。日本戰時定期刊物《日清戰爭實記》仍然是對甲午戰爭最詳盡的記載，它比由參謀本部在1904—1917年或由海軍司令部在1905年編寫的正史更有價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關于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方面的軍事史可以推薦給讀者。

有關新疆和臺灣邊疆地區的著作，歐文·拉鐵摩爾等人編寫的《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一書，仍然是對這塊沃土、各少數民族集團、英俄競爭以及俄國通過中國漢人進行間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評述。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反映了大漢族主義，同時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國行政管理上的軟弱無力。倫納德·戈登編的《臺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是簡明扼要地介紹19世紀臺灣情況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臺灣史事概說》是一部大陸人的歷史，它還對開發這個島嶼的早期移民推崇備至。

有關1860—1894年中國軍事自強運動的其他著作，可見本書上卷關于第十章書目文獻的介紹。

## 第五章 思想的變化和維新運動，1890—1898年

對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運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以任何種文字全面撰述這方面的歷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20世紀50年代初由翦伯贊等人編輯的四卷本資料匯編《戊戌變法》仍然是研究這一題目的最有用的入門書籍。研究者必然要參考該書目，因為它仍是在原始資料方面最完整的書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統的敘述，但這缺陷已因出現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補償，其中最出色的是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論叢》。他的另一著作《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則是一部非常適用的匯編，其中有運動中的許多人物的傳記資料。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是一本資料豐富的書，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王樹槐在《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維新運動的影響。對于變法時期宮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蕭公權的《翁同龢與戊戌變法》。劉廣京的《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一文一般地闡述了維新運動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維新運動來說，最新發表的著作仍是查爾頓·M.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對這一題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書目。

對維新運動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書。關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蕩的問題，保羅·A.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門的《中日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載《亞洲研究雜志》1968年8月號，第695—710頁）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紹。蕭公權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對康有為的思想做了最徹底和詳細的研究。霍華德的《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載芮沃壽和特威切特合編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均對理解康有為的維新主義觀念的形成大有好處。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是對維新主義陣營內部這兩位息息相關的才智者作出的啟發性研究，盡管它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框。對于理解改革主義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唐·普賴斯的《1896—1911年期間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和張灝的《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

除去陳鍫的《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載《燕京學報》1939年第25期，第59—106頁）的開拓性論述外，對批評和反對維新運動的知識界幾乎還沒有專題研究。還可進一步利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和蘇輿的《翼教叢編》兩種資料，它們闡述了反維新運動的主要論點，特別是那些抨擊康梁集團的論點。

保羅·科恩和約翰·施雷克編的《十九世紀中國的改革》論叢中提到了主要從當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經檢驗的想法。在弗思編的《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會議論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雖然它著重于較后的時期。

## 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于中國事件對日本德川后期的影響問題，鲇澤信太郎在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中作了論述。他在此書第135—144頁討論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的版本和影響，這便是王家儉的《〈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1966年4月號，第242—249頁）一文的基礎。關于曾經編纂過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國圖志》的舉足輕重的儒家鹽谷宕陰（1810—1867年）所受的影響，范古利克在《日本對鴉片戰爭的反響》（載《華裔學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頁）作了探討。佐久間象山對魏源之重視技術是毀譽參半的，關于這一點可看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的《日本傳統的源泉》一書中的摘錄。日本對于太平軍起義的反應，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的《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495頁）一文中作了探討，而增井經夫在《太平天國》中的論述則不夠嚴謹。衛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載《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3卷：《日本法與亞洲》，第53—71頁）討論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記。

維新派對日本的認識已引起學術界更多的注意。霍華德的《日本在康有為改良綱領中的作用》（載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第280—312頁）一文略述了這個問題。關于維新派設法了解明治維新的情況，其研究可見彭澤周的《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載《人文學報》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頁）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開頭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中國變法論》（載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編的《明治維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第61—114頁）一文轉載于《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一書的第193—262頁。論黃遵憲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黃遵憲對明治時期日本和西方的反應》（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有關梁啟超和黃遵憲的論述，見列文森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25頁）、威爾遜的《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載《日本論文集 〔1961年〕》）和黃宗智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王韜是保羅·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一書的主題。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一書則對鄭觀應作了論述。

對康有為思想的影響以及他的思想內容，可以在蕭公權的一系列權威性的專著中進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1957年4月）、《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1965年第24期）、《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1967—1968年第7、8期）、《經濟現代化：從歷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載《華裔學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為的行政現代化倡議及其歷史意義》（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期），上述論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1975年）一書中。羅榮邦把康有為的自傳譯成英文，并把有關康有為的一系列論文編在《康有為：傳記和論叢》（1967年）一書中。

實藤惠秀畢生關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學生運動的題目：他的最有權威性的論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其中有表格和統計數字。實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和《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后者有張銘三譯的中譯本，書名為《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1944年上海出版），實藤所未搜羅的中文資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專著加以使用，此即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它著重論述了留學生的政治活動，也強調了他們的文化活動。斯卡拉皮諾的《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頁）討論了學生辦的報章雜志。從前學生們的回憶錄中有孫伯醇（1891— ）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30 〔1966年5月〕，第24—33頁），以及《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31 〔1966年6月〕，第28—33頁）。景梅九的自傳《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巖和波多野太郎譯成日文，名為《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1966年東京出版）。

除了實藤的著作之外，論述學生運動的，還有永井算己的《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4 〔1954年9月〕，第57—83頁）和《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2 〔1952年7月〕，第31頁）。島田虔次的《中國革命的先覺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兩書翻譯和討論了大量的學生革命傳單，其中包括陳天華的一份傳單。歐內斯特·楊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頁）集中討論了陳天華的遺囑和自殺問題。有關翻譯運動的影響和重要性在錢存訓的《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中作了論述（載《遠東季刊》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319頁）。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增補了對詞匯交流數量的估價。

討論日本活動家和中國革命志士之間的關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和《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一文（載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頁）。還可參看載于《中日文化論集》上的陳固亭的《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第79—93頁）和《中國》（1966年11月號）的論叢中載有野澤豐所編文獻目錄，兩者均以《孫文與日本》為題。宮崎寅藏的回憶錄《三十三年落花夢》在1967年編成，附有衛藤沈吉所作的注釋；同時它也被收入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編輯的《宮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3年版。孫中山的另一位親密合作者萱野長知出版了他的記述，即《中華民國革命秘籍》（1940年）一書。同文會創始人近衛篤麿的日記六卷于1968—1969年在東京出版，名為《近衛篤麿日記》。關于同文會的官方記載以及會員及其追隨者的傳記，可見中島正郎編的正續編《中國回憶錄》。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寫的荒尾精傳記《巨人荒尾精》一書。由葛生能久等編寫的《東亞先覺志士傳記》是一部附有許多中國活動家傳記的黑龍會正史。關于北一輝，可見喬治·威爾遜的《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北一輝的中國來鴻轉載于高橋正雄編輯的《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480頁）。

關于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過的之外，還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態度》（載《亞洲研究雜志》〔1961年5月號〕，第449—461頁）；市又正雄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行者》（載《國際法外交雜志》〔1973年10月號〕，第249—298頁）和池井優的《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號〕，第213—227頁）。

##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五十周年匯編的《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一書提供了關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獻材料。幾乎有半個世紀沒有英文的綜合性研究著作問世了；請看卡麥倫的《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論述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政治史，即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

關于立憲運動，可見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由于張朋園這部著作沒有對地方自治給予特別注意，因此可補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載于《御茶水史學》（1962年第5期）第14—30頁。還可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一書，它研究了積極參與運動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一書則考察了這個領袖人物的個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國也有闡述立憲問題的著作，如胡繩武和金沖及的《論清末的立憲運動》和李時岳的《張謇和立憲派》。

關丁晚清的兵制問題，其概論見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和后來包遵彭的《中國海軍史》二書。下面三本書就制度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又見之于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一書。

陳青之在其《中國教育史》一書中概述了這一時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資料則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編輯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一書中。又見傅吾康的《中國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艾爾斯的《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的改革》和蘇云峰的《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其他方面的專著比較缺乏。有關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見馬里納斯·J.梅杰爾的《中國近代刑法介紹》；另有楊幼炯的《近代中國立法史》和楊鴻烈的《中國法律發達史》。在貨幣制度方面，見魏建酞的《中國近代貨幣史》、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以及宮下忠雄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最近的兩本書闡明了1901—1911年間社會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況，它們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與制度的變化》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貝斯的《1895—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一書論述了這位政治家對民族主義和維新運動的反應。

##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

晚清時期中國的商人事實上也與其他時期的商人一樣，只留下了他們的少量珍貴的活動記載。研究那些參與近代企業的人們的最好資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鴻章、張之洞和袁世凱等高官顯宦的著作。買辦兼工業家徐潤的杰出著作《徐愚齋自敘年譜》詳述了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他的幾個企業，此書依然是珍貴的資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財政革新者胡光墉》一書只能說是不完整的，它只論述了胡光墉一段時期的活動。關于許多商人的統計數字，如他們所擁有的公司、投資數、捐納情況以及對商會的服務等，均收錄在晚清政府出版的兩部資料集子中：農工商部統計處編的《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1909年，6冊）和《第二次》（1910年，5冊）。

與主要官僚兼企業家有關的文獻和研究作品則要豐富得多。盛宣懷的文章收于《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和《盛宣懷未刊信稿》中。費維愷的《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一書首次對官方參與近代工業以及在關鍵性的初創階段如何影響中國工業的發展作了系統研究。兩本專例研究著作是卡爾森的《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和全漢昇的《漢冶萍公司史略》。

張謇辦工業的事跡也同樣有很好的文獻記載，因為有他自己的著作《張季子九錄》和《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大生紗廠》和他兒子張孝若為他寫的長篇傳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另外還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業家所記有關他們參與工業的文獻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為了獲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們應富于創造性地利用當時的社會小說，如吳沃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此書已有劉師舜的節譯本。

鄭觀應是一個發表了大量有見地的言論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編》與他的短一些的政論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較起來不大為人所知，但《后編》不只是廣泛地論述了他辦的幾個企業，而且也表述了他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時闡發商人看法的另一種資料是《香港華字日報》，它從1864年開辦至1940年，原每兩天一期，后改為日報。

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從公司行號的檔案中匯編了幾種資料，每一種都論述了一個開辦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業。其中包括《啟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對個別公司的記載加以補充的有幾部關于某一工業的大型文獻匯編，像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和宓汝成編的《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有關近代工業發展的總情況，可見前引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兩卷本）；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兩卷本）；還有一套叢書，書名相同，未附日期，該書由陳真和姚洛編輯，標上第一輯和第三輯，每輯兩卷，分別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這些文獻不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傳、當時西方報道的譯文、行號報告和各種各類的記載。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這些匯編雖然只羅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見到的記述，卻大大增加了那些組織中國近代初期企業的人物和機構的資料。它們也對近年來許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寫大有助益，例如：費維愷為本卷撰寫的一章和他的《20世紀的中國企業：啟新洋灰公司》（載費維愷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一書中）；瓊斯的兩篇文章，即《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載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和《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載埃爾文和施堅雅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以及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最后，還要說一下近來歷史學對中國商人的看法的變化。許多學者已開始不重視老一套的說法，即中國商人階級受冷酷無情的中國官僚老爺的壓迫。反之，他們現在認為，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著痛癢相關甚至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起碼在清末是如此。對于這種新觀點，可見楊聯陞的《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載《清華學報》〔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頁）、梅茨格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載《亞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頁）、郝延平的《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和威爾莫特編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 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對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運動或者希望更廣泛地了解整個革命的非專家來說，可以先看兩本書，它們從歷史角度來看待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幾年的情況：一本是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它記述了1905年以前的孫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動；一本是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變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孫中山》和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書完成了對孫中山的生平和這次革命運動湖南部分的概述。關于廣東和湖南湖北地區的革命活動，細節可見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和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一書研究的是革命運動具有鮮明特征的另一個地區，并且還彌補了社會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間的缺口。后一題目還在伯納爾的《1907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中有所論述。另一些有用的書包括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此書對黃興的重要性強調得太過分了，但書中有大量有價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一書既過時，又謬誤百出，不過它是唯一對同盟會作全面論述的著作，同時它也便于用來概括以前這方面的學術著作；吳玉章的《辛亥革命》無論從作為個人對革命運動的回憶錄來看，還是從介紹馬克思主義對這場革命的解釋來看，都是有價值的。對于其他解釋和目前的爭論可看 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一書，特別應該看看該書編者的導言（第1—63頁）；以及《辛亥革命討論集》（載《近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頁）。

對專家來說，應先閱讀謝文孫的《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該書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資料的目錄、關于個別資料的有用的評論和一篇論述研究這次革命的整個史學方面的頗有見地的文章。學者們可能會對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獻集和回憶錄給予特別的注意（見謝文孫一書的第50—54和65—68頁）。關于中文資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書是余秉權、李又寧和張玉法合編的《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它包括1900—1911年間出版的十六種期刊的目錄和創刊詞，還有一篇簡要的英文介紹。關于資料和分歧問題的有價值的討論，可看貝爾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歷史評論》第468期 〔1963年10—12月〕，第403—436頁）。關于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專家中間出現的爭論問題，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這個集子出版過遲，以至貝爾熱教授無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討。一本新的和經過認真推敲的指南書是馮兆基的《1949年后中國的辛亥革命歷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頁）。

中國學者所寫論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應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特刊。該研究所的專著已收錄在謝文孫的書目中，但書目還需要補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以及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

關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請參閱書目介紹和第六章的腳注，以及這一章伯納爾和羅茲所引的專著書目。最后，有幾部題目與本章有關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的《中國革命黨》、戴福士的《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歐內斯特·楊的《袁世凱總統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還有周錫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幫助闡明清帝國末期社會史的原始資料。實際上，社會史的概念包括很廣泛的領域，涉及道德、觀念、風俗、人群的組織模式及其關系，甚至涉及經濟境況的發展；所以幾乎是所有的文獻，不管是文字的、圖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樂方面的都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它的組織、運動、結構和自我形象——的實際情況。這里，我們介紹的僅限于文字資料。

對西方社會的歷史學非常重要的計量資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極其零碎，特別是19世紀最后的25年的資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幾批土地文書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謙三郎的《中國土地文書研究》兩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礎。除此之外，大陸以外的學者迄今還難以得到土地文書檔案和地方政府的檔案，并且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在其出版物中也嚴重忽視了這些材料。大部分現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資料基本上是表述性的。再者，這些資料幾乎全部出自統治階級之手，而且撰寫時采用的刻板筆調總是傾向于把新事物納入傳統框框中去，因而它們對研究下層階級和社會變遷狀況用處不大。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30年來從事搜集大量口頭傳聞，試圖矯正這一歷史偏見，不幸至今未見出版什么東西。

以下幾種匯編適當地集中了零散的資料，因此適用于作為研究的起點：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經介紹過的幾種資料集，即由陳真、孫毓棠和汪敬虞分別收集的近代工業方面的資料；李文治關于農業的資料；彭澤益關于手工業方面的資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有關上海錢莊方面的資料。對這些資料必須補充以大量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日文資料匯編，如：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的《中國經濟全書》、根岸佶的《清國商業綜覽》、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鑒。像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這樣的傳記詞典，可惜都過分著眼于官方階層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動。最有啟發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記和報刊中發現，尤其可以在20世紀初期的寫實和諷刺文學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繡像小說》，它發表過劉鶚、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小說。西方資料（外交和傳教士的各種檔案和報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但是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會性的資料，而那時的中文資料也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也許因為現有資料的性質已經使史學家們喪失了信心，或者因為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現象，或者因為先驗的研究計劃束縛了研究，所以我們一直對王朝最后40年間的社會演變很少了解。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是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完整的著作目錄。它表明除了幾部主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編寫的開拓性著作外，研究仍舊是很不完整和極其零碎的。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深刻或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但是，新的讀者通過與西蒙的《中國的城市》（此書受庫朗熱的《古代城市》的啟發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點田園式的描述以及與楊懋春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尚待填補的空白。在施堅雅所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和埃爾文、施堅雅合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對解釋社會風情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于特權階層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最好的，因為有一些關于紳士—文人的擴大、變動和財產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張仲禮的《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更給這方面的研究大添異彩。馬什的《1600—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只對收入恒慕義的名人傳記詞典中的官員進行分析研究，此書現在已被李國祁的統計性調查《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擅遞現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補和修改。后者根據地方志補充的資料描述了官員的出身地和社會背景以及州府官員們的傳略。關于買辦，有郝延平出色的專著《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關于商人，有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有關近代企業資金積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的《中國近代煤礦企業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生問題》、汪敬虞的《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和由東京教育大學編輯的《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貝爾熱的《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一書敘述共和革命時期上海的近代商業的社會背景。鮑威爾的《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對軍事發展提供了總的看法，這看法由于有王爾敏編的《淮軍志》（這是一部研究征募軍官團的有用的著作）和劉鳳翰的《新建陸軍》而變得更加完整了。至今還沒有這類論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軍隊的專著。新知識分子一直是許多人研究的題目，著名的有汪一駒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年》、蘭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許多傳記性研究也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關于西化和中國的條約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女權運動和婦女狀況的著作有吉波倫的《秋瑾》。

有兩本關于當時工人的狀況和斗爭的扎實的研究：汪敬虞和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斗爭資料》和趙親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對于不該被忽視的手工業工人階層的介紹，有樊百川主要論及經濟方面的《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和彭澤益的《19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農村社會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謙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經談到他們的兩個文集）對理解土地組織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其研究范圍僅限于江蘇南部、直隸和滿洲地區。由東京教育大學編的文集《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包括對湖南和四川農村狀況的分析。然而山東是景甦和羅崙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這部內容最豐富和最有創見的專著的主題。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農業生產的檔案。邁爾斯的《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一書事實上涉及清帝國時期的情況極少。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是論述19世紀農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

令人費解的是，對民眾運動的研究反而比對農民處境的研究下的工夫要大得多。關于這期間主要運動的專著，可看第十章的腳注。由謝諾編輯的論文集《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內容稍有不同）專門論述了秘密會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書目。科思嘉也娃的《1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扎實地研究了義和團以后的農民騷亂的總的情況。楊慶堃的統計分析是一項開拓性的著作，這項工作應該進行下去（此文名《19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等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一書）。小韋克曼的《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歷史上民眾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頁）一文指出了當前這一課題的史學研究上的動向。

我們對不同社會集團的理解，特別是對它們的變化及其銜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這反映于對辛亥革命時紳士和資產階級各自作用的意見分歧上，這個情況特別在張朋園、市古宙三和貝爾熱的文章（載于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中可以看出。在地區性研究方面有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特別是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們闡述了改良和政治運動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統治階層內的作用。巴斯蒂在《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一書中說明了教育改革的社會影響。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會分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的產生不僅取決于經濟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還取決于文化的標準。

（陳書梅 譯）

# 參考書目

[1]A Ying（Ch'ien Hsing-ts'un），comp.Ya-p’ien chan-cheng wen-hsueh chi（Literary writings concerning the Opium War）.2 vols.Peking：Ku-chi，1957

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

[2]Alder，G，J.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95：a study in imperial policy.London：Longmans，1963

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

[3]Amagai Kenzaburō.Chūgoku tochi monjo no kenkyū（Studies on Chinese documents on land）.Tokyo.Keisō Shobō，1966

天海謙三郎：《中國土地文書研究》

[4]Amano Motonosuke.Shina nōgyō keizai ron（On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2 vols.Tokyo：Kaizōsha，1940—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論》

[5]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 no sho mondai（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e）.2 vols.Tokyo：Gihōdō.1952—3

天野元之助：《中國的農業問題》

[6]Anon.Chi-shih（Journal of events），originally written in sinicized Arabic；extant fragments，P’ang Shih-ch’ien，trans.，in HMCI，3.237—40

佚名：《紀事》，龐士謙譯

[7]Anon.‘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armies’.Journal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5（1894）255—9

佚名：《中國和日本的軍隊》

[8]Armengaud，Captain（Jean Louis）.Lang-Son：journal des opérations qui ont précédé et suivi la prise de cette citadelle.Paris：R.Chapelot et Cie，1901

愛爾明加：《諒山戰役前后紀實》

[9]Ayers，William.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威廉·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

[10]Bales，W.L.TsoTsungt’ang：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7

貝爾斯：《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人和政治家》

[11]Banno，Masataka.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坂野正高：《1885—1861年的中國和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

[12]Banno Masataka.Furansu ryūgaku jidai no Ba Ken-chū-gaikō oyobi gaikōkan seido ni tsuite no futatsu no ikensh（Ma Chien-chung during his days of study in France—two proposals regarding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foreign service system）.Kokkagakkai zasshi，84.5 and 6（1971）257—93

坂野正高：《留法時期的馬建忠——對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兩份意見書》

[13]Barnett，Suzanne WilsonW.ei Yuan and Westerners.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Ch’ing-shih wen-t’i，2.4（1970）1—20

巴尼特：《魏源與西方人：關于〈海國圖志〉源流考》

[14]Bastid，Marianne.Aspects de la réforme de l’enseignement en Chine au début de ⅨⅩ e siècle，d’a près des écrits de Zhang Jian.Paris and The Hague：Mouton，1971

瑪麗安·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

[15]Bawden，C.R.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New York：Praeger，1968

鮑登：《蒙古近代史》

[16]Bays，Daniel H.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8

丹尼爾·貝斯：《1895—1909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爭執問題》

[17]Bell，Mark.China，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f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tung；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etc.，2 vols.Simla：Government Central Branch Press，1884

貝爾：《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

[18]Bellew，Henry Walter.Kashmir and Kashgar：a narrative of the journey of the embassy to Kashgar in 1873—1874.London：Trübner，1875

貝柳：《克什米爾和喀什噶爾：1873—1874年喀什噶爾旅行記》

[19]Bennett，Adrian A.Research guide to the Chiao-hui hsin-pao（The church News），1868—1874.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

貝內特編：《1868—1874年〈教會新報〉研究指南》

[20]Bennett，Adrian A.Research guide to the Wan-kuo kung-pao（The globe magazine），1874—1883.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6

貝內特編：《1874—1883年〈萬國公報〉研究指南》

[21]Bennett，Adrian A.and Liu，Kwang-Ching.‘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Idiom：Young J.Allen and the early Chiao hui hsin pao，1868—70’，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pp.159—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貝內特、劉廣京：《林樂知和初期的〈教會新報〉（1868—1870年）》

[22]Bergère，Marie-Claire.‘La Révolution de 1911 jugée par les historiens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themes et controverses’，Revue Historique，468（Oct.— Dec.1963）403—36

貝爾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

[23]Bergère，Marie-Claire.La 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Paris：Mouton，1968

貝爾熱：《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辛亥革命》

[24]Bergère，Marie-Claire.‘The role of the bourgeoisie’，in CIR.229—95

貝爾熱：《資產階級的作用》

[25]Bernal，Martin.‘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1906—1907’，in CIR，97—142

伯納爾：《1906—1907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26]Bernal，Martin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

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

[27]Biggerstaff，Knight.‘The Ch’ung-hou mission to France，1870—1’.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8.3（Oct.1935）633—47

畢乃德：《1870—1871年崇厚出使法國》

[28]Biggerstaff，Knight.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

[29]Blackburn Chamber of Commerce.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burnChamber of Commerce，1896—7.Blackburn：North East Lancashire Press，1898

布萊克本商會：《1896—1897年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報告書》

[30]Blacker，Carmen.The Japanese enlightenment：a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Fukuzawa Yukich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4

布萊克：《福澤諭吉著作研究》

[31]Blythe，Wilfred.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historical study.London，Kuala-Lumpur，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布萊恩：《中國秘密會社對馬來亞影響的歷史研究》

[32]Boorman，Howard L.and Howard，Richard C.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4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71.Vol.5 index，1979

包華德：《中華民國人物傳記辭典》

[33]Borokh，Lilia.‘Notes on the early role of secret societies in Sun Yat-sens republican movement’，in PMSS，135—44

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

[34]Brassey，T.A.，ed.The naval annual，1895.Portsmouth：J.Griffin，1895

布拉塞編：《海軍年鑒，1895年》

[3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arious issues.London：various dates

《英國議會文獻集》

[36]Britton，Roswell S.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33

布里頓：《1800—1912年的中國定期報刊》

[37]Buck，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3 vols.Shahghai：Commercial Press，1937

巴克：《中國土地利用的統計學》

[38]Bujac，E.Précis de quelques campagnes contemporaines：vol.2 La Guerre sino-japonaise.Paris：Henri Charles-Lavauzelle，1896

布雅克：《略論當代的幾個戰役》卷2，《論中日戰爭》

[39]Cady，John F.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l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

[40]Cameron，Meribeth E.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191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卡梅倫：《1898—1912年中國的改革運動》

[41]Carlson，Ellsworth C.The Kai ping mines，1877—1912：a case study of early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2nd ed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卡爾遜：《1877—1912年的開平煤礦》

[42]Cavendish.A.E.J.‘The armed strength（？）of China’，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42（June 1898）705—23

卡文迪什：《中國的武裝力量（？）》

[43]Ch’ai Te-Keng et al.eds.Hsin-hal ko-ming（The 1911 Revolution）.8 vols.Shanghai：Jen-min 1957；also cited as HHKM

柴德賡等編：《辛亥革命》

[44]Chmbre de Commerce de Lyone.d.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1895—1897.Lyon：A.Rey t Cie，1898

里昂商會編：《1895—1897年里昂的中國商業考察團》

[45]Chan，Wellington K.K.‘Ma Ju-lung：from rebel to turncoat in the Yunnan rebellion’，Papers on China，20（1966）86—118

陳錦江：《馬如龍從云南之亂的叛亂者變成了變節者》

[46]Chan，Wellington，K.K.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陳錦江：《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47]Chang Ch’i-yun et al.eds.Ch’ing-shih（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8 vols.Taipei：Kuo-fang yen-chiu yuan，1961

張其昀等編：《清史》

[48]Chang ChienT.’ung-chou hsing-pan shih-yeh chih li-shih：Ta-sheng shach’ang（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es established at T’ung-chou：The Dah Sun Cotton Spinning Mill）.Nan-t’ung，19 10

張謇：《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大生紡廠》

[49]Chang Chien.Chang Chi-tzu chiu lu（Nine records of Chang Chien）.Chang Hsiao-jo，ed.80 chüan.Shanghai：Chung-hua，1931；Taipei：Wen-hai，1965

張謇：《張季子九錄》（張孝若編）

[50]Chang ChienL.iu-hsi-ts’ao-t’ang jih-chi（Diary from the cottage west of the willow）.Original edn：15 tse’in Shanghai，Jenmin，1962；and 4 t'se in Taipei，Wen-hai，1967.2nd edn complete：12 t'se in Taipei，Wen-hai，1969

張謇：《柳西草堂日記》

[51]Chang Chih-tung.Chang Wen-hsiang kung chi（The papers of Chang Chihtung）.Hsu T’ung-hsin，ed.150 chüan.Peking，1919—21

張之洞：《張文襄公集》（許同莘編）

[52]Chang Chih-tung.Chang Wen-hsiang kung ch’uan-chi（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ang Chih-tung's papers）.120 ts'e.Peiping：Wen-hua chai，1928；also cited as CWHK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

[53]Chang Chih-tung.Chang Wen-hsiang kung ch’üan-chi（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ang Chih-tung's papers）.Wang Shu-nan，ed.228 chüan.Peiping 1937.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3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王樹枬編）

[54]Chang Chih-tung.Ch’üan-hsueh p’ien（Exhortation to study）.1898 preface；Kuang-hsu period edn.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6

張之洞：《勸學篇》

[55]Chang Ching-lu.Chung-kuo chin-tai ch’u-pan shih-liao ch’u-pien（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first collection）.Shanghai：Ch’ün-lien，1954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

[56]Chang Ching-lu.Chung-kuo chin-tai ch’u-pan shih-liao pu-pien（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supplementry collection）.Shanghai：Chung-hua，1957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編》

[57]Chang，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張仲禮：《中國的紳士》

[58]Chang，Chung-li.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

[59]Chang，Hao.‘The antiforeignist role of Wo-jen，1804—1871’，Papers on China，14（1960）1—29

張灝：《倭仁的排外作用，1804—1971年》

[60]Chang，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轉變，1809—1907年》

[61]Chang Hsiao-jo.Nan-t’ung Chang Chi-chih hsien-sheng chuan-chi（A biography of Mr Chang Chien of Nan-t’ung）.Shanghai：Chung-hua，1930.Taipei reproduction，Wen-hsing，1965

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62]Chang Kuo-hui.Chung-kuo chin-tai mei-k’uang ch’i-yeh chung ti kuan shang kuan-hsi yii tzu-pen-chu-i fa-sheng wen-t’i（The rela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in modern Chinese coal-mining enterpris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birth of capitalism）Li-shih yen-chiu，1964.3，pp.117—144

張國輝：《中國近代煤礦企業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生問題》

[63]Chang，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2 vols.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71—2

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64]Chang Ming-san，trans.Jih-pen wen-hsueh tui Chung-kuo ti yinghsiang（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n China）.Shanghai：Hsin shen pao k’an，1944.See Sanetō Keishu，Nihon bunka no Shina e no eikyō（q.v.）

張銘三譯：《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載1944年《新申報刊》，見實藤惠秀《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65]Chang Nan and Wang Jen-chih.Hsin-hai ko-ming ch’ien shih-nien chien shihlun hsuan-chi（Selections from opinions expressed in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2 series（chüan），each in 2 vols.Peking：San-lien，1960，1963

張機、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66]Chang P’ei-lunC.hien-yü chi（Memorials of Chang P’ei-lun）.6 chüan，1918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7

張佩綸：《澗于集》

[67]Chang，Peng.‘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merchant groups in China，1842—1911’，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dissertation.Seattle，1958

張鵬（音）：《1842—1911年中國地方商人集團的分布》

[68]Chang，P’eng-yuan.‘The constitutionalists’，in CIR，143—83

張朋園：《立憲派》

[69]Chang P’eng-yuanL.i-hsien-p'ai yü hsin-hai ko-ming（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Taipei：Commercial Press for IMH，Academia Sinica，1969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70]Chang，P’eng-yuan.‘A typological hypothesis on the elit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9.1 and 2（1972—3）32—8

張朋園：《關于辛亥革命中社會精英的一個類型學假設》

[71]Chang Po-fang，comp.Ch’ing-tai ko-ti chiang-chiin tu-t’ung ta-ch’en teng nienpiao，1796—1911（Chronological tables of Manchu generals-in-chief，lieutenants-general，imperial agents etc.，in various areas under the Ch’ing，1796—1911）.Peking：Chung hua，1965

章伯鋒：《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72]Chang Po-hsi et al.Tsou-ting hsueh-t’ang chang-ch’eng（Regulations concerning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approved by the throne）.5 ts’e.Nanking，1904.Wuchang：Hu-pei hsueh-Wu ch’u，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72

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

[73]Chang T’ing chü.‘Wu-hsu cheng-pien shih-ch’i wan-ku-p’ai chih ching-chi ssu-hsiang（The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reactionary faction during the reform of 1898）.Chungk-uo ching-chi，4.6（1936）141—7

張廷舉：《戊戌政變時期頑固派之經濟思想》

[74]Chang Yü-chao.Ch’ien-t’ingw en-chi（Chang Yü-chao's writtings）.8 chüan.Soochow：Ch’a-shih mu-chien chai，1882

張裕釗：《溓亭文集》

[75]Chang Yü-fa.Ch’ing-chi ti li-hsien t’uan-t’i（Constitutionalist groups of the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1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

[76]Chang Yü-fa.Ch’ing-chi ti ko-ming t’uan-t’i（Revolutionary group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5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

[77]Chang Yueh et al.eds.Shan-tung chün-hsing chi-lueh（Brief record of military campaigns in Shantung）.22 chuan each with two or three parts.c.1885.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70

張曜等編：《山東軍興紀略》

[78]Chao Ch’in.‘Hsin-hai ko-ming ch’ien-hou ti Chung-kuo kung-jen yun-tung’（The Chinese workers’movemen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1911 Revolution）.Li-shih yen-chiu，1959.2，pp.1—16

趙親：《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工人運動》

[79]Chao Chun-fu.‘Ch’ing-mo tung-san-sheng kai-chih ti pei-ching’（Background of the late Ch’ing re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three Manchurian provinces）.C YCT，5（June 1976）313—35

趙中孚：《清末東三省改制的背景》

[80]Cbao Erh-hsun.Ch’ing-shih kao（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536 chüan.Peiping：Ch’ing-shih kuan，1928.Shanghai reproduction，Lien-ho shutien，1942.See Chang Ch’i-Yun et al.

趙爾巽：《清史稿》

[81]Chao Feng-t’ien.Wan-Ch’ing wu-shih-nien ching-chi ssu-hsiang shih（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 of the Ch’ing period）.Peiping：Yenching University，1939

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

[82]Chao，Kang.‘The growth of a moder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competition with handicrafts’，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q.v.）

趙岡：《近代棉紡織業的成長及其與手工業的競爭》

[83]Chao Lieh-wen.Neng-ching-chü jih-chi（Chao Lieh-wen's[holograph]diary）.Taipei：Hsueh-sheng，original photolithograph，1964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

[84]Chen，Chi-yun.‘Liang Ch’i-ch’ao's“missionary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Papers on China，16（1962）66—125

陳啟云：《梁啟超的“教會教育”：教會對改革者影響的一個實例》

[85]Ch’en Chen and Yao Lo.Chung-kuo chin-tai kung-yeh 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industry in China）.4 collections（chi）totalling 6 vols.Peking：San-1ien，1957—61

陳真、姚洛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86]Ch’en Chih.Yung-shu（Commonplace writings）.1897，preface 1896.n.p

陳熾：《庸書》

[87]Ch’en Ch’ing chih.Chungk-uo chiao-yü shih（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Taipei：Commercial Press，1966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

[88]Ch’en Ch’iu.Ching shih po-i（Broad suggestions on statecraft）.n.p，1893

陳虬：《經世博議》

[89]Ch’en Ch’iu.‘Wuh-su cheng-pien-shih fan pien-fa jen-wu chih cheng-chih ssuhsiang（’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opponents of reform at the time of the coup d’état of 1898）.Yen-ching hsueh-pao，25（1939）59—106

陳鍪：《戊戌政變時反變法人物之政治思想》

[90]Ch’en Fu-kuang.Yu-Ch’ing i-tai chih Chung-O kuan-hsi（Sino-Russ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Kunming：National Yunnan University，1947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

[91]Ch’en，GideonT.so Tsung-t’ang：pione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en mill in China.Peiping：Yenching University，1938；New York reproduction，Paragon，1961

陳其田：《左宗棠：促進中國船政和羊毛紡織業發展的先驅》

[92]Ch’en Hsu-lu and Lao Shao-hua.‘Ch’ing-mo ti hsin-chün yü hsin-hai koming’（The late Ch’ing New Army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in HHWS.1.147—65

陳旭麓、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

[93]Ch’en，Jerome.‘Rebels between rebellions—secret societies in the novel P’eng kung an’.JAS，39.4（Aug.1970）807—22

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

[94]Ch’en.Jerome.Yuan Shih-k’ai，1859—1916.2nd ed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陳志讓：《袁世凱，1859—1916年》

[95]Ch’en Ku-t’ing.‘Sun Chung-shan hsien-sheng yü Jih-pen ch’aoyeh p’eng-jen ti kuan- hsi’（Mr Sun Yat-sen and his Japanese friends in and out of the government），in Chung-Jih wen-hualun-chi（Collected essay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pp.1—19.Taipei：Chung-kuo wen-hua hsueh-yuan，1967

陳固亭：《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朋人的關系》

[96]Ch’en Lun-chiung.Hai-kuo wen-chien lu（Heard and seen in maritime countries），2 tse’，1793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Hsueh-sheng，1975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97]Ch’en Ta-tuan.‘Investiture of Liu-ch’iu kings in the Ch’ing period’，in CWO，135—64

陳大端（音）：《清代對琉球諸王的冊封儀式》

[98]Ch’en T’ien-hua.Meng hui-t’ou（Wake up！）.c.1904，in Ch’en T’ien-hua chi（Collected writings of Ch’en T’ien-hua），pp.51—90.Shanghai：Chung-kuo wen-hua fu-wu she，1946

陳天華：《猛回頭》

[99]Ch’en T’ien-hua.‘Ching-shih chung’（Alarm to arouse the age）.in 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ni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 hui，comp.Koming chih ch’ang-tao yü faichan（The initial guid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Chung-kuo T’ung-meng hui（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Vol.6，pp.143—71.6 vols.Taipei：Cheng-chung，1965

陳天華：《警世鐘》

[100]Ch’en Tse-hsien.‘Shih-chiu shih-chi sheng-hsing ti ch’-yuern Hua-kung chih’（The flourishing Chinese contract labour syste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i-shih yen-chiu 1963.1，pp.161—179

陳澤憲：《19世紀盛行的契約華工制》

[101]Cheng Ch’ang-kan.Chung-Jih chia-w uc han-cheng（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 she 1957

鄭昌淦：《中日甲午戰爭》

[102]Cheng Fu-kuang.Huo-lun-ch’uan t’u-shuo（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steamship）.1840.Reprinted in Wei Yuan，Hai-kuo t’u-chih（q.v.，1852 or later edn），chuan 85

鄭復光：《火輪船圖說》

[103]Cheng Kuan-ying.I-yen（Easy words）.Shanghai：Chung-hua yin-wu chü，c.1881

鄭觀應：《易言》

[104]Cheng Kuan-ying.Sheng-shih wei-yen tseng-ting hsin-pien（Warnings to a prosperous age，rev.edn），1892.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910 reprint，Taipei：Hsueh-sheng，1965

鄭觀應：《盛世危言增訂新編》

[105]Cheng Kuan-ying.Shengs-hihw ei-yen hou-pien（Warnings to a prosperous age：a sequel）.15 chüan.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910 edn，Taipei：Tat’ung，1968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

[106]Cheng，Shelly Hsien.‘The T’ung-meng-hui：its organization，leadership，and finances，1905—1912’.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dissertation.Seattle，1962

鄭冼秀蘭（音）：《1905—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財政狀況》

[107]Cheng，Yu-kwei.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DC，1956

鄭玉貴（音）：《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

[108]Ch’eng Yen-sheng，ed.Chung-kuo nei-luanw ai-huo li-shih ts’ung-shu（A historical series on China's internal disorder and external trouble）.98 works in 17 vols.Shanghai：Shen-chou kuo-kuang she，1936

程演生：《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109]Chesneaux，Jean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Paris：Mouton，1962.English translatio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謝諾：《1919—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

[110]Chesneaux，Jean，ed.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aux Ⅹ Ⅸe et ⅩⅩe siècles.Paris：Maspero，1970

謝諾：《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

[ll1]Chesneaux，Jean，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also cited as PMSS

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

[112]Chesneaux，Jean.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 s，1840—1949.Paris：Seuil，1976

謝諾：《1840—1949年中國的農民運動》

[113]Chi，Madeleine.‘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 loan：a case study of the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MAS，7.1（1973）85—106

馬德琳·齊：《滬杭甬鐵路貸款：恢復利權運動的事例研究》

[114]Ch’i Ping-feng.Ch’ing-mo ko-ming yü chün-hsien ti lun-cheng（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6

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

[115]Ch’i Ssu-ho et al.eds.Ya-p’ien chan-cheng（The Opium War）.6 vols.Shanghai：Shen-chou kuo-kuang she，1954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

[116]Chiang Chung-yuanC.hiang Chung-lieh kung i-chi（The papers of the late Chiang Chung-yuan）.1873.Taipei reproduction，Hua-wen，1968

江忠源：《江忠烈公遺集》

[117]Chiang，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a Chinese autobiogra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Taipei reproduction.World Book Co.，1963

蔣夢麟：《蔣夢麟自傳》

[118]Chiang-su sheng hsing-cheng kung-shu shih-yeh ssu ed.Chiangsu sheng shih-yeh hsing-cheng pao-kao shu（Report on Kiangsu province's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10 pien Soochow：Kiang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1914

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司編：《江蘇省實業行政報告書》

[119]Chiao，C.M.and Buck，J.L.‘Th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of rural popula -tion groups 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2.2（March 1928）219—35

喬啟明、巴克：《中國農村人口集團的組成和增長》

[120]Chiao-t’ung t’ieh-tao pu chiao-t’ung shih pien-tsuan wei-yuan hui，comp.Chiao-t’ung ship（Histo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37 vols.Nanking：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1930—7.Microfilm and a‘grand table of contents’published in 1970 are available at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Washington，DC

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交通史》

[121]Chiao-yii tsa-chih（‘The Chinese Educational Review’）.Shanghai，etc.：Commercial Press，1909—48

《教育雜志》

[122]Chien Po-tsan et al.eds.I-ho t’uan（The Boxers）.4 vols.Shanghai：Shenchou kuo-kuang she，1951

翦伯贊等編：《義和團》

[123]Chien Po-tsan et al.eds.Wu-hsu pien-fa（The reform of 1898）.4 vols.Shanghai：Shen-chou kuo-kuang she，1953；also cited as WHPF

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

[124]Ch’ien Shih-fu，comp.Ch’ing chi hsin-she chih-kuan nen-piao（Chronological table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office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Peking：Chung-hua，1961

錢實甫：《清季新設職官年表》

[125]Chih-hsin pao（‘The reformer’）.Thrice-monthly.Macao，1897—1900

《知新報》

[126]Chih-hsueh hui，comp.Chih-hsueh ts’ung-shu ch’u-chi（Works of substantial learning，first series）.30 works in 38 ts’e.Wuchang：Chih-hsueh hui，1897

質學會編：《質學叢書初集》

[127]Chin-liang.Chin-shih jen-wu chih（Personalities of recent times）.Shanghai，1934；Taipei：Kuo-min，1955

金梁：《近世人物志》

[128]Chin T’ien-chu.Ch’ing-chen shih-i（Resolving suspicions regarding Islam）.1738 preface.Chinkiang reprint：Ch’ing-then ssu，1876

金天柱：《清真釋疑》

[129]Chin Ying-lin.Ch’ih-hua t’ang wen-ch’ao（Essays written at the Ch’ih-hua t’ang）.12 chi an，n.P.，1851

金應麟：《豸華堂文鈔》

[130]Ch’in Han-ts’ai.Tso Wen-hsiang kung tsai hsi-pei（Tso Tsung-t’ang in the north-west）.Chungking，1945.3rd reprint，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47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

[131]Ch’in-ting ta-Ch’ing hui-tienn（Imperially approved Ch’ing dynasty compendium of institutions；also translated as‘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Ch’ing dynasty’）.Kuang-hsu edn.100 chüan.Peking，1899

《欽定大清會典》

[132]China：consular reports.Microfilm for 1844—1906.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See US National Arohlvsie，Catalogue o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中國：領事館報告》，見《國會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133]China correspondence.Various issues and dates.See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中國通訊》，見《英國議會文獻集》條

[134]China：dispatches.Microfilm for 1844—1906.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See US National Archives，Catalogue o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中國：急件》，見《國會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135]China Inspectorate-General of Custoin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 etc.of the ports open to commerce...，1882—1891.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1893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年》

[136]China.Inspectorate-General of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Commerce...，1902—1911.2 vols.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1913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02—1911年》

[137]China.Inspectorate-General of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commerce...，1922—1931.Shanghai：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33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22—1931年》

[138]Chin aI.nspectorate-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906.Shanghai：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1907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貿易報告冊》

[139]Chine，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s consuls.Various issues.Paris：various dates

《中國：法國領事政治通訊》

[140]Ching Mei-chiu.Tsui-an（Record of a‘crime’）.Peking：Kuo-feng Jih-pao she，1924.For Japanese trans.，see Otaka Iwao and Hatano Tarō

景梅九：《罪案》，日譯本由大高巖、波多野太郎譯

[141]Ching Su and Lo LunC.h’ing-tai Shan-tung ching-ying ti-chu ti she-hui hsing-chih（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rial landlords in Shantung during the Ch’ing period）.Tsinan：Shantung jen-min ch’u-pan she，1959.English trans.by Endymion Wilkinson，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se studies from Shando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景甦、羅崙：《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本書有威爾金森的英譯本

[142]Ch’ing Kuang-hsu ch’ao Chung-Fa chiao-she shih-t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Sino-French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Kuanghsu period）.22 chüan.Peiping：Palace Museum，1933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

[143]Ch’ing Kuang-hsu ch’ao Chung-Jih chiao-she shih 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rg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Kuang-hsu period，1875—1908）.88 chüan.Peiping：Palace Museum，1932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144]Ch’ing-shih pien-tsuan wei-yuan hui，comp.Ch’ing-shih（History of the Ch’ing dynasty）.8 vols.Taipei：Kuo-fang yen-chiu yuan，1961—2

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史》

[145]Ch’ing-tai ch’ou-pan i-w us hih-mo（Complete record of the management of barbarian affairs）.80 chüan for the late Tao-kuang period（1836—50）；80 chüan for the Hsien-feng period（1851—61）；100 chüan for the T’ung-chih period（1862—74）.Peiping：Palace Museum photolithograph，1930；also cited as IWSM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146]Choe Ching-young The rule of the Taew ön’gun，1864—1873：Restoration in Yi Kore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趙清洋（音）：《1864—1873年朝鮮大院君的統治》

[147]Chou，Josephine Nailene.‘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the case of Sinkiang，1759—1911’.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dissertation.Seattle，1976

約瑟芬·奈蘭·周：《1759—1911年新疆的邊疆研究及行政變動》

[148]Chou Shan-P’ei.Hsin-hai Ssu-ch’uan cheng-lu ch’inl-i chi（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Szechwan railway in 1911）.Chungking：Jenmin，1957

周善培：《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

[149]Chou Sheng-ch’uanC.hou Wu-chuang kung i-shu（Writings of the late Chou Sheng-ch’uan）.Nanking，1905.Taipei reproduction，Ch’eng-wen，1969：also cited as CWCK

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

[150]Chou Shu-chen.Chou Chih-an hsien-sheng pieh-chuan（An unofficial biography of Chou Hsueh-hsi）.Peiping：1948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6

周叔楨：《周止庵先生別傳》

[151]Chow，Yung-teh.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New York：Atherton Press，1966

周榮德：《中國的社會流動性》

[152]Chu Ho-chung.‘Ou-chou T’ung-meng hui chi-shih’（True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in Europe）.KMWH.2（1953）251—70

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

[153]Chu，Samuel C.‘Chang Chien and the founding of Dah Sun’.Ch’ing-hua hsueh-pao，NS，2.1（1960）301—317

朱昌峻：《張謇和大生紗廠的建立》

[154]Chu，Samuel C.‘Liu Ming-ch’ua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JAS，23.1（Nov.1963）37—53

朱昌峻：《劉銘傳和臺灣現代化》

[155]Chu，Samuel C.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 Chien.1853—192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朱昌峻：《近代中國的改革者張謇：1853—1926年》

[156]Chu Shou-p’eng，comp.Tung-hua hsu-lu（The Tung-hua records，cont.）.64 ts’e.Shanghai：Chi-ch’eng，1904

朱壽朋編：《東華續錄》（1904年）

[157]Chu Shou-p’eng，comp.Tung-hua hsu-lu（Tung-hua records，continued[through the Kuang-hsu period]）.220 chuan.Shanghai：T’u-shu chich’eng，1909.Also entitled Kuang-hsu ch’ao tung-hua lu.Peking reproduction，Chung-hua，19 58

朱壽朋編：《東華續錄》（1909年）

[158]Chu Wen-ch’ang（Wen-Djang Chu）.‘T’an yu-kuan hsi-pei hui-luan ti liangko wen-t’i’（Two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Muslim rebellion in the northwest）.Ch’ing-hua hsueh-pao.NS，5.1（1965）

朱文長：《談有關西北回亂的兩個問題》

[159]Chu，Wen-Djang.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1862—1878.The Hague and Paris：Mouton，1966

朱文長：《1862—1878年中國西北的回民叛亂》

[160]Chüan Han-sheng.Han-Yeh-P’ing kung-ssu shih-lueh（A brief history of the Hanyehping Co.）.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2

全漢升：《漢冶萍公司史略》

[161]Ch’üan Tsu-wang，ed.Sung Yuan hsueh-an.See Huang Tsunghsi

全祖望編：《宋元學案》，見黃宗羲條

[162]Chuang Chi-fa.Ching-shih ta.hsueh-tang（[The predecessor of]Peking University）.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College of Letters，1970

莊吉發：《京師大學堂》

[163]Chūgoku（China）.Tokyo：Chūgoku no Kai，1968—72

《中國》

[164]Chun，Hae-jong.‘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in CWO，90—111

全海宗：《清代和朝鮮的藩屬關系》

[165]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ni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hui，comp.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nien wen-hsien（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compiled at its fiftieth anniversary）.Series 1 in 16 vols.，including Ko-ming yuan-yuan（Early sources of revolution），2 vols.；Lieh-ch’iang ch’in-lueh（Aggression of the powers），4 vols.；Ch’ing-t’ing chih kai-ko yü fan-tung（Reform and reaction at the Ch’ing court），2 vols.；Ko-ming chih ch’ang-tao yü fa-chan（The leade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8 vols.Series 2 in 5 vols.，including Wu-ch’ang shou-i（The initiation of the righteous rising at Wuchang），1 vol.；K’ai-kuo kuei-mu（Arrangements at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1 vol.；Ko-sheng kuang-fu（Restoration of the provinces），3 vols.Taipei：Cheng-chung，1961—6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輯共16卷，計《革命遠源》2卷，《列強侵略》4卷，《清廷之改革與反動》2卷，《革命之倡導與發展》8卷；第二輯共5卷，計《武昌首義》1卷，《開國規模》1卷，《各省光復》3卷

[166]Chung-kuo jen-m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 ch’üan-kuo wei-yuan-hui wenshih tzu-liao yen-chiu wei-yuan-hui ed.Hsin-hai ko-ming hui-i lu（Reminiscen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6 vols.Peking：Chung-hua，1961—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

[167]Chung-kuo jen-m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 Hu-pei sheng wei-yuan hui.ed.Hsin-hai shou-i hui-i lu（Reminiscences of the righteous beginnings of the 1911 Revolution）.Wuhan：Jenmin，195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

[168]Chung-kuo jen-min ta-hsueh Chung-kuo li-shih chiao-yen-sbih，ed.Chungkuo tzu-pen-chu-i meng-ya wen-t’i t’ao-lun chi（Collected papers on the problem of the incipiency of capitalism in China）.3 vols.Peking：San-lien.1957—60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

[169]Chung-kuo jen-min yin-hang Shang-hai-shih fen-hang（Shanghai branc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Bank）.ed.Shang-hai ch’ien-chuang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hanghai native banks）.Shanghai：Jen-min.1960，secondprinting.1961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

[170]Chung-kuo k’o-hsueh yuan Chi-lin-sheng fen-yuan li-shih yen-chiu-so et al.eds.Chin-tai tung-pei jen-min ko-ming yun-tung shih（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north-east in modern times）.Ch’ang-ch’un：Jen-min，1960；Tokyo reproduction，Daian，1964

中國科學院吉林省分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近代東北人民革命運動史》

[171]Chung-kuo k’o-hsueh 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et al.eds.Yang-wu yun-tung（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8 vols.Shanghai：Jen-min，1961；also cited as YWYT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洋務運動》

[172]Chung-kuo k’o-hsueh yuan ching-chi yen-chiu-so et al.eds.Pei-ching Juifu-hsiang（The Jui-fu-hsiang firm of Peking）.Peking：San-lien，1959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北京瑞蚨祥》

[173]Chung-kuo k’o-hsueh yuan Shan-tung fen-yuan li-shih yen-chiu-so ed.I-hot’uan yun-tung liu-shih chou-nien chi-nien lun-wen chi（Articles commemorating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oxer movement）.Peking：Chung-hua.1961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174]Chug-kuo k’o-hsueh yuan Shang-hai ching-chi yen-chiu-so.Nan yang hsiung-ti yen-ts’ao kung-ssu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Co.）.Shanghai：Jen-min，1958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史料》

[175]Chung-kuo Kuo-min-tang chung-yang wei-yuan-hui tang-shih shih-liao pientsuan wei-yuan-hui comp.Ko-ming wen-hsien（Documents of the revolution）.Collections（chi）1—60，each chi usually in one vol.but may include subdivisions.Taipei：Chung-yang wen-wu，1953—72；cited as KMWH，according to the consecutive（tsung）page numbers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

[176]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shih chi-ka’n（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Quarterly.Nanking：Academia Sinica，1933—9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

[177]Chung-kuo shih-hsueh hui Chi-nan fen-hui，comp.Shah-tung chin-tai shih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modem history of Shantung）.2 vols.Tsinan：Jenmin，1957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山東近代史資料》

[178]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comp.Hai-fang tang（Archives on coastal defence）.Hardback，9 vols；paperback，17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5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

[179]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K’uang-wu tang（Archives on mining affairs）.8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檔》

[180]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ed.Chung-Fa Yueh-nan chiao-she tang（Archives on Sino-French negotiations over Vietnam）.7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法越南交涉檔》

[181]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comp.Chung-Mei kuan-hsi shih-liao（Historical document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05—74）.3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系史料》

[182]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 chiu-so，comp.Chin-tai Chungkuo tui Hsi-fang chi lieh-ch’iang.jen-shih tzu-liao hui-pien（Compendium of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and of the various powers）.2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

[183]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ed.Ch’ing chi Chung-Jih-Han kuan-hsi shih-liao（Documents on Sino-Japanese-Korean relations，1864—1911）.11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

[184]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m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Aug.1969—；also cited as CYC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85]Clyde，Paul H.，comp.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 1839—1939.Durhams：Duke University Press，1940

克萊德編：《美國對中國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檔案和公共檔案》

[186]Cohen，Paul A.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 foreignism，1860—18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保羅·科恩：《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1870年》

[187]Cohen，Paul A.‘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JAS，26.4（Aug.1967）559—74

科恩：《王韜和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

[188]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

[189]Cohen，Paul A.‘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Christian”reformers’，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q.v.），pp.197—225

科恩：《19世紀中國的“基督徒”改革家》

[190]Cohen，Paul A.and Schrecker，John E.，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科恩等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

[191]Comber，Leon F.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1900.Locust Valley，NY：J.J.Augustin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59

庫默：《1800—1900年馬來亞的三合會概述》

[192]Conroy，Hilary.The Japaneses seizure of Korea，1868—1910：a study of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0

康羅伊：《1868—1910年期間日本對朝鮮的占領》

[193]Cordier，Henri.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3 vols.Paris：F.Alcan.1901—2

考爾迭：《中國與西方列強關系史》

[194]Davidson，James W.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history，people，resources，and commercial prospects.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1903.Taipei reproduction，Bank of Taiwan，1972

戴維遜：《臺灣（福摩薩）島的過去與現在》

[195]DeBary.William Theodore.Chan，Wing-tsit and Watson，Burton，eds.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資料集》

[196]Des Forges，Roger V.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戴福士：《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

[197]Drake，Fred W.China charts the world：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弗雷德·德雷克：《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198]DuBoulay，N.W.H.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1894—1995.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96

杜布雷：《中日甲午戰爭梗概》

[199]Dutt，Vidya Prakash，‘The first week of revolution：the Wu-chang uprising’，in CIR，383—416

維第亞·杜特：《武昌首義的第一周》

[200]Eastman Lloyd E.‘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S，24.4（Aug.1965）595—611

伊斯特門：《19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

[201]Eastman，Lloyd E.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1880—188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伊斯特門：《1880—1885年中國在中法爭執中所追求的政策》

[202]Eastman，Lloyd E.‘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JAS，27（Aug.1968）695—710

伊斯特門：《中日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改良主義》

[203]Efimov，C.V.I storiko-bibliogra f icheskii obzor istochnikov i literatury po novoi istorii Kitaia（Historical-bibliographical review of the sources concern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3 vols.Leningrad：Izd-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1965—72

葉菲莫夫：《中國近代史資料文獻書目述評》

[204]Elisseeff，Vadime.‘The middle empire，a distant empire，an empire without neighbors’.Diogenes，42（Summer 1963）60—4

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國，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無遠勿屆的帝國》

[205]Elvin，Mark.‘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in CCTW.239—62

馬克·埃爾文：《1905—1914年的上海行政》

[206]Elvin，Mark and Skinner，G.William，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also cited as CCTW

埃爾文、施堅雅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

[207]Esherick，Joseph W.‘1911：a review’.Modern China，2.2（April 1976）141—84

周錫瑞：《評1911年》

[208]Esherick，Joseph W.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

[209]Etō Shinkichi.‘Nihonjin no Chūgoku-kan：Takasugi Shinsaku ra no baai’（Japanese views of China：the cases of Takasugi Shinsaku and others），in Niida Noboru Hakushi tsuitō rombunshū（Essays to commemorate Dr Niida Noboru），vol.3：Nihon hō to Aria（Japanese law and Asia），pp.51—71.Tokyo：Keisō Shobō，1970

衛藤沈吉：《日本人的中國觀：高杉晉作等人的事例》

[210]Etō Shinkichi，ed.Sanjū-sannen no yume（Thirty-three years’dream：Miyazaki Torazō's memoirs）.Tokyo：Heibonsha，1967.See also Miyazaki Ryūsuke and Onogawa Hidemi，eds.Miyazaki Tōten zenshū

衛藤沈吉編：《三十三年落花夢》

[211]Fairbank，John K.‘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HJAS，20（1957）480—511

費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

[212]Fairbank，John K.，ed.The Chinesew ori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also ci-ted as CWO

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

[213]Fairbank，John 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費正清編：《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214]Fairbank，John K.Bruner，Katherine Frost and Matheson.Elizabeth Mac-Leod，eds.The 1.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

[215]Fairbank，John K.Reischauer.Edwin O.and Craig，Albert M.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

費正清等：《東亞的近代化改革》

[216]Fairbank，John K.and Teng，Ssu-yü.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費正清、鄧嗣禹：《清代行政研究三種》

[217]Fan Pai-ch’uan.‘Chung-kuo shou-kung-yeh tsai wai-kuo tzu-pen-chu-i ch’inju hou ti tsao-yü ho ming-yun’（The fate of Chinese handicraft industry after the incursion of foreign capitalism）.Li-shih yen-chiu，1962.3，pp.88—115

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的遭遇和命運》

[218]Fass，Josef.‘Revolutionary activity in the province Hup-ei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 of 1911’.ArchivOrientǎlni，28（1960）127—49

約瑟夫·法斯：《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

[219]Fass，Josef.‘The role of the New Style Army 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Archiv Orientǎlni’，30（1962）183—191

法斯：《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

[220]Fei Hsing-chienC.hin-tai ming-jen hsiao-chuan（Biographical notes on famous men of modern times）.Shanghai：1916；Taipei：Wen- hai，1966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

[221]Feng Kuei-fenC.hao-pin-lu k’ang-i（Straightforward words from the Lodge of Early Chou Studies）.2 ohüan.Wu-hsien，Kiangsu：the Feng family，1884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222]Feng Tzu-yu.‘Chi Chung-kuo T’ung-meng hui’（An account of the China Revolutionary Alliance）.KMWH，2（1953）145—57

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

[223]FEQ：FarEastern Quarterly.See JAS

《遠東季刊》，見《亞洲研究雜志》

[224]Feuerwerker，Albert.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與官辦企業》

[225]Feuerwerker，Albert，ed.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8

費維愷編：《共產黨中國的歷史學》

[226]Feuerwerker，Albert.‘Handicraft and manufactured cotton textiles in China.1871—191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30.2（June 1970）338—78

費維愷：《1871—1910年中國手工業的和機制的棉紡織業》

[227]Feuerwerker，Albert.‘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Chee Hsin Cement Company’.in AMCH，304—41

費維愷：《20世紀的中國企業：啟新洋灰公司》

[228]Feuerwerker，Albert.Rebll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5

費維愷：《19世紀中國的叛亂》

[229]Feuerwerker，Albert，Murphey，Rhoads and Wright，Mary C.，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also cited as AMCH

費維愷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

[230]Fields，Lanny Bruce.Tso Tsung-t’ang and the Muslims：statecraft in northwest China.1868—1880.Kingston，Ontario；The Limestone Press，1978

拉尼·菲爾茲：《左宗棠與回民：1868—1880年在中國西北實行的經世之道》

[231]Fincher，John.‘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in CIR，185—226

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

[232]Fleming.Peter.The siege at Peking.New York：Harper，1959

弗萊明：《北京被圍記》

[233]Fletcher，Joseph.‘Central Asian Sufism and Ma Ming-hsin's New Teaching’，in Chieh-hsien Ch’en，ed.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East Asian Altaistic Conference，75—96.Taipei，Dec.1971

弗萊徹：《中亞的蘇菲教派和馬明心的新教》

[234]FO 17.China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1815—1905.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17號：中國政治通訊，1815—1905年》

[235]FO 228.China Consular Correspondence，1834—1930.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228號：領事館通訊，1834—1930年》

[236]FO 233.Chirese Secretary's Office，Legation File.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233號：中國處，公使館檔案》

[237]FO 371.Political Correspondence，1906—32.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371號：政治通訊，1906—1932年》

[238]FO 405.Confidential Prints on China，1848—1954.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405號：中國問題秘密文件》

[239]FO 682.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Legation File，1839—1939.London：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第682號：中國處，公使館檔案，1839—1939年》

[240]Folsom，Kenneth E.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弗爾索姆：《晚清時期的幕府制》

[24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6—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國對外關系，1866年— 》

[242]Franke，Wolfgang.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傅吾康：《中國科舉制的改革與廢除》

[243]Frechtling，Louis E.‘Anglo-Russian rivalry in eastern Turkestan，1863—1881’.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26.3（1939）471—89

弗萊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東突厥斯坦的抗衡》

[244]Friedman，Edward.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弗里德曼：《中國革命黨》

[245]Fu Tsung-mou.Ch’ing-tai chün-chi-ch’u tsu-chih chi chih-chang chih yenchiu（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period）.Taipei：Chia-hsin，1967

傅宗懋：《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

[246]Fukuda Shōzō.Kakyō keizai ron（On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Tokyo：Ganshōdō Shoten，1939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

[247]Fukushima Yasumasa，comp.Rimpō heibi ryaku（Military preparedness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2nd edn.5 vols.Tokyo：Rikugun Bunko，1882

福島安正編：《鄰邦兵備略》

[248]Fung，Edmund S.K.The Kung-chin hui：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society.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11.2（1973）193—206

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

[249]Fung，Edmund S.K.‘The T’ung-meng-hui Central China Bureau and the Wuchang uprising’.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7.2（1974）477—96

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

[250]Fung，Edmund S.K.‘Li Yuan-hung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Monumenta Serica，31（1974—5）151—71

馮兆基：《黎元洪和辛亥革命》

[251]Fung，Edmund S.K.‘Military subvers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MAS，9.1（1975）103—23

馮兆基：《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

[252]Fung，Edmund S.K.‘Post-1949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1911 revolution’.Modern China，4.2（April 1978）181—214

馮兆基：《1949年后中國的辛亥革命歷史學》

[253]Furth，Charlotte，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 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弗思編：《論民國時期中國保守主義的選擇》

[254]Gasster，Michael.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he birth of modernChinese radic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現代中國激進主義的誕生》

[255]Gerschenkron，Alexander.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亞歷山大·格耳申克龍：《從歷史角度看經濟的落后性》

[256]Gipoulon，Catherine.Qiu Jin，femme et révolutionnaire en Chine au Ⅹ Ⅸeme siècle.Paris：Editions des femmes，1976

凱瑟琳·吉波倫：《秋瑾》

[257]Godley，Michael R.‘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JAS，34.2（Feb.1975）361—85

戈德利：《晚清對東南亞華人的眷顧》

[258]Gordon，Charles George.Papers，British Museum

查爾斯·戈登：《戈登文集》

[259]Gordon，Leonard H.D.，ed.Taiwan：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倫納德·戈登編：《臺灣：中國地方史之研究》

[260]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Report on the native cloths in use in the Amoy consular district.FO，Miscellaneous series，1886，no.19

英國外交部：《廈門領事區關于土布使用的報告》

[261]Grimm，Tilemann.‘Shu-yua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stic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na’.Research Conference on Urban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1968

蒂爾曼·格里姆：《傳統中國城市研究中的書院》

[262]Grimm，Tilemann.‘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 in Kwangtung’，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475—9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格里姆：《廣東的書院和城市制度》

[263]Hake，Alfred E.Events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London：W.H.Allen，1891

哈克：《太平軍叛亂中的事件》

[264]Hamilton，Gary G.‘Merchants and modernization：changing views of Chinese commerce’.Paper delivered at the California Regional Seminar in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December 1975

漢密爾頓：《商人和現代化：對中國商業看法的變化》

[265]Hao Yen-p’ing.‘Yu shou-chiu tao ko-hsin’（From conservatism to refom）.Ta-lu tsa-chih 20.7（April 1960）26—27

郝延平：《由守舊到革新》

[266]Hao，Yen-p’ing.‘The abor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1895—1900）’.Papers on China，15（1961）91—114

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產的合作，1895—1900年》

[267]Hao，Yen-p’ing.‘A study of the Ch’ing-liu tang：the disinterested scholar-official group，1875—1884’.Papers on China，16（1962）40—65

郝延平：《清流黨（1875—1884年）研究》

[268]Hao，Yen-P’ing.‘Cheng Kuan-ying：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JAS，29.1（Nov.1969）15—22

郝延平：《改良派買辦鄭觀應》

[269]Hao，Yen-p’ing.‘A“new class”in China's treaty ports：the rise of the comprador-merehants’.Business History Review，44.4（Winter 1970）446—59

郝延平：《中國商埠的“新階級”買辦商人的興起》

[270]Hao，Yen-p’ing.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

[271]Hart，Robert.‘Notes on Chinese matter’，in Frederick W.Williams，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285—98.New York：C.Scribner and Sons，1912

赫德：《有關中國問題的札記》

[272]Hart，Robe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London：Chapman and Hall，1901

赫德：《關于中國問題論文集》

[273]Hart，Robert.Letters 1868—1907，see Fairbank，John K.et.al.eds.

《赫德1868—1907年的書信集》，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

[274]Hatano，Yoshihiro.‘The new armies’，in CIR，365—82

波多野善大：《新軍》

[275]Hayes，Carlton J.H.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1871—1970.New York：Harper，1941

海斯：《1871—1970年實利主義的一代》

[276]Hedtke，C.H.‘Reluctant revolutionaries：Szechwan and the Ch’ing collapse，1898—191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h.D.dissertation.Berkeley.1968

赫德特克：《四川與清朝的覆亡，1898—1911年》

[277]Heng-feng sha-ch’ang ti fa-sheng fa-chan yü kai-tsao（The origin，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eng-feng Spinning Mill）.Shanghai：Jenmin，1958

《恒豐紗廠的發生發展與改造》

[278]Ho Ch’ang-ling.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120 chüan.1873 edn.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72

賀長齡：《皇期經世文編》

[279]Ho Ch’i and Hu Li-yuan.Hsin-cheng chen-ch’üa n（The true interpretation of new policies）.Hong Kong，1895.Reprinted in 6 ts’e by Chung-kuo paokuan，1900

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

[280]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中國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

[281]Ho，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

[282]Ho Ping-ti.Chung-kuo hui-kuan shih-lun（A historical survey of‘Landsmannschaften’in China）.Taipei：Hsueh-sheng，1966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283]Holcombe，Chester.China's past and future.London：Morgan and Scott，1904

何天爵：《中國的過去和將來》

[284]Hou，Chi-ming.‘Economic dualism：the case of China，1840—193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3.3（1965）277—97

侯繼明：《經濟的兩重性：中國的實例，1840—1937年》

〔285]Hou，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9—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侯繼明：《1849—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

[286]Howard，Richard C.‘K’ang Yu-wei（1858—1927）：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his early thought’，in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eds.Confucian personalities，pp.294—31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理查德·霍華德：《康有為的書香門第和他的早期思想》

[287]Howard，Richard C.‘Japan's role in the reform program of K’ang Yu-wei’，in Jung-Pang Lo，ed.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q.v.），pp.288—302

霍華德：《日本在康有為改革綱領中的作用》

[288]Hozumi Yatsuka.Kokumin kyōiku：aikokushin（National education：the spirit of patriotism）.1897.6th edn.Tokyo，1912

穗積八束：《國民教育：愛國心》

[289]Hsi Pao-kan，comp.Fo-shan chung-ihsiang-chih（Gazetteer of Foshan）.20 chüan Canton，1923

洗寶榦編：《佛山忠義鄉志》

[290]Hsi Yü-fu et al.comp.Huang-ch’ao cheng-tien lei-tsuan（Classified compendium on the governmental documents of the Ch’ing dynasty）.500 chüan.Shanghai：T’u-shu chi-ch’eng，1903；Taipei reproduction，Ch’eng-wen，1969

席裕福等編：《皇朝政典類纂》

[291]Hsia-erh kuan-chen（‘The Chinese serial’or‘A serial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news’）.Normally monthly.Hong Kong：c.1853—8

《遐邇貫珍》

[292]Hsia Hsieh.Chung-hsi chi-shih（A record of Sino-Western affairs）.1865edn.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2

夏燮：《中西紀事》

[293]Hsiang-hsueh pao（Bulletin of Hunan learning）.Changsha：Chiaoc-hing shuyuan.1896—7

《湘學報》

[294]Hsiang-kang Hua-tzu jih-pao（Chinese Mail of Hong Kong，a daily），1864—1940；also cited as HTJP

《香港華字日報》

[295]Hsiao I-shan Ch’ing-tai t’ung-shih（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g period）.Rev.edn.5vols.Taipei：Commercial Press，1962—3

蕭一山：《清代通史》

[296]Hstao，Kung-chuan.‘Weng T’ung-ho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Ch’ing-hua hsueh-pao，NS 1.2（April 1957）111—245

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變法》

[297]Hsiao，Kung-chuan.‘K’ang Yu-wei and Confucianism’.Monumenta Senica.18（1958）88—212

蕭公權：《康有為與儒教》

[298]Hsiao，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60

蕭公權：《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

[299]Hsiao，Kung-chuan.‘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K’ang Yuwei：an attempt at a new synthesis’.Monumenta Serica.21（1962）129—93

蕭公權：《康有為的哲學思想》

[300]Hsiao，Kung-chuan.‘The case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Ka’ng Yu-wei's Plan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Monumenta Serica，24（1965）1—83

蕭公權：《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

[301]Hsiao，Kung-chuan.‘In and out of utopia：K’ang Yu-wei's social thought’.The Chung Chi Journal，7.1（Nov.1967）1—18；7.2（May 1968）101—49；8.1（Nov.1968）1—52

蕭公權：《康有為的社會思想》

[302]Hsiao，Kung-chuan.‘Economic modernization：K’ang Yu-wei's idea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onumenta Serica，27（1968）1—90

蕭公權：《經濟現代化：從歷史角度看康有為的思想》

[303]Hsiao，Kung-chuan.‘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Ka’ng Yu-wei's proposals and their historical meaning’.Ch’ing-hua hsueh-pao，NS，8.1 and 2（1970）1—35

蕭公權：《康有為的行政現代化倡議及其歷史意義》

[304]Hsiao，Kung-chuanA.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1858—1927.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

蕭公權：《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

[305]Hsiao，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蕭亮林（音）：《中國外貿統計，1864—1949年》

[306]Hsiao Ling-yü.Ying-chi-li chi（On England），in HFHC，ts’e 77

蕭令裕：《英吉利記》

[307]Hsiao Ling-yü.Yueh-tung shih-po lun（On foreign trade and shipping in Kwangtung），in HFHC，ts’e 75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

[308]Hsieh Ch’ing-kao and Yang Ping-nan Hai-lu（Records of the seas）.in HFHC，ts’e 55

謝清高、楊炳南：《海錄》

[309]Hsieh Kuo-chen.‘Chin-tai shu-yuan hsueh-hsiao chih-tu pien-ch’ien k’ao’（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academy and school in the modern period），in Hu Shih et al.eds.Chang- Chü-sheng ch’i-shih sheng-jih chi-nien lun-wenchi（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Chang Yuan-chi's seventieth birthday），281—322.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7

謝國楨：《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310]Hsieh Kuo-chenM.ing Ch’ing chih chi tang-she yun-tung k’ao（A study of parties and societ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Ming to Ch’ing）.Taipei：Commercial Press，1967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311]Hsieh，Pao-chao.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25

謝保兆（音）：《1644—1911年的中國政府》

[312]Hsieh，Winston.‘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Kwangtung’.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Cambridge，Mass.，1969

謝文孫：《辛亥革命在廣東》

[313]Hsieh，Winston.‘Triads，salt smugglers and local uprisings：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Waichow Revolution of 1911’，in PMSS，145—64

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

[314]Hsieh，Winston.‘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the marketing hierarchy in the Canton delta，1911’，in CCT W，119—141

謝文孫：《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

[315]Hsieh，Winston.Chinese historiograp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5

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

[316]Hsin-min ts’ung-pao（The new people miscellany）.Yokohama and Tokyo，1902—7

《新民叢報》

[317]Hsiu-hsiang hsiao-shuo（Illustrated stories）.Bi-monthly.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03—6

《繡像小說》

[318]Hsu Ch’ang-chih，comp.P’o-hsieh chi（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exposing heterodoxy）.1640 preface.1855 edn（a Japanese blockprint）

徐昌治：《破邪集》

[319]Hsu Chi-yü.Ying huan chih-lueh（A brief survey of the maritime circuit）.10 chüan.Foochow，1850 edn

徐繼畬：《瀛環志略》

[320]Hsu Chi-yü Sung-k’an hsien-sheng ch’aün-chi（Complete works of Hsu Chiyü）.10 chüan.1915 Preface，n.p.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

[321]Hsu I-sheng.Chung- kuo chin-taiwai-chai shih t’ung-chi tzu-liao 1853—1927（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loan，1853—1927）.Peking：Chung-hua.1962.

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

[322]Hsu，Immanuel C.Y.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1880年》

[323]Hsu，Immanuel C.Y.‘Gordon in China，1880’.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23.2（May 1964）147—66

徐中約：《1880年戈登在中國》

[324]Hsu，Immanuel C.Y.‘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frontier defense’.HJAS，25（1965）212—28

徐中約：《1874年中國的海防與邊防政策的大論戰》

[325]Hsu，Immanuel C.Y.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Oxford：Clarendon，1965

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1881年》

[326]Hsu，Immanuel C.Y.‘The late Ch’ing reconquest of Sinkiang：a reappraisal of tso Tsung-t’ang's role’.Central Asiatic Journal，12.1（1968）50—63

徐中約：《對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評價》

[327]Hsu，Immanuel 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徐中約：《近代中國的興起》

[328]Hsu JunH.su Yü-chaii tzu-hsu nien-p’u（Hsu Jun's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Privately printed by the Hsu family of Hsiangshan，c.1927；Taipei reproduction，Shih-huo ch’upan she，1977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

[329]Hsu，Kai-yu.Chou En-lai：China's gray eminenc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8；Anchor Books edn，1969

許芥昱：《周恩來》

[330]Hsueh，Chün-tu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61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

[331]Hsueh，Chün-tu.‘Sun Yat-sen，Yang Ch’ü-yun，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movement in China’.JAS，19.3（May 1960）307—18

薛君度：《孫中山、楊衢云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

[332]Hsueh Fu-ch’eng.Yung-an ch’üan-chi（Complete works of Hsueh Fuch’eng），including Wen-pien（Collection of essays），Jih-chi（Diary），Waipien（Additional essays），Ch’ou-yang ch’u-i（Preliminary proposals concerning Western affairs）and Hai-wai wen-pien（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overseas）.Shanghai：Tsui-liu t’ang，1897

薛福成：《庸盫全集》

[333]Hsueh Fu-ch’eng.‘Ch’ou-yang ch’u-i’（Preliminary proposals concerning Western affairs），in WHPF，1.151—61

薛福成：《籌洋芻議》

[334]Hsueh-pu tsung-wu-ssu，comp.Chiao-yü t’ung-chi t’u-piao（Statistical charts and tables on education）.Peking：Ministry of Education，1907

學部總務司：《教育統計圖表》

[335]‘Hsueh-Wu kang-yao’（Guidelines for educational affairs），in Chang Po-hsi，et al.，Nanking 1904 edn，ts’e 1

《學務綱要》

[336]Hu Han-min.‘Hu Han- min tzu-chuan’（Autobiography of Hu Han-min），in KMWH，3（1953）373—442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

[337]Hu Han-min.‘Min-pao chih liu ta chu-i’（The six great‘isms’of the Minpao）.Min-pao，3（April 1906）1—22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

[338]Hu-nan chin-pai-nien ta-shih chi-shu（A chronicle of major events in Hunan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Changsha：Jen- min，1959

《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

[339]Hu-nan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Hunan）.Quarterly.Changsha：Jen-min，1958

《湖南歷史資料》

[340]Hup-ei sheng che-hsueh she-hui k’o-hsueh hsueh-hui lien- ho hui，ed.Hsinhai ko-ming wu-shih chou-nien lun-wen chi（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2 vols.Peking：Chung-hua，1962；also cited as HHWS

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

[341]Hu Sheng-wu and Chin Ch’ung-chi.Lun Ch’ing-mo ti li-hsien yun-tung（On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h’ing）.Shanghai：Jenmin，1959

胡繩武、金沖及：《論清末的立憲運動》

[342]Huang Chang-chien.Wu-hsu pien-fa shih yen-chiu（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Taip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1970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

[343]Huang Chia-mu.Chia-wu chan-ch’ien chih T’ai-wan mei-wu（Coalmining in Taiwan prior to the war of 1894）.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1

黃家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

[344]Huang Chiam-u.‘Chung-kuo tien-hsien ti ch’uang-chien（’The first installation of telegraphs in China）.Ta-lu tsa-chih.36.6 and 7（combined issue，April 1968）171—87

黃家謨：《中國電線的創建》

[345]Huang Chia-mu et al.eds.Chung-Mei kuan-hsi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05—1874）.3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8.

黃家謨等編：《中美關系史料》

[346]Huang Chia-mu.Tien hsi hui-min cheng-ch’üan ti lien-Yingw ai-chiao（The diplomacy of the Muslim regime in western Yunnan towards a British alliance）.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6

黃家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347]Huang Chün-tsai.Chin-hu ch’i mo（Seven works of Huang Chün-tsai）.Shanghai：Sao-yeh shan-fang，1929

黃鈞宰：《金壺七墨》

[348]Huang En-t’ung.Fu-i chi-lueh（Brief account of the pacification of barbarians）.Unpublished handwritten copy，1865 preface.Taip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

黃恩彤：《撫夷紀略》

[349]Huang Fu-ch’ing.Ch’ing-mo liuJ-ih hsueh-sheng（Late Ch’ing students in Japan）.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5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

[350]Huang，Philip C.Liang Ch’i-ch’ao and modern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351]Huang，Philip C.，ed.‘A symposium on the 1911 Revolution’.ModernChin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2（April 1976）139—226；see Esherick，Joseph W.

黃宗智編：《辛亥革命論叢》

[352]Huang Tsun-hsien.Jih-pen kuo-chih（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tate）.40 chüan edn.Che-chiang shu-chü，1898.Shanghai：T’u-shu chi-ch’eng yin-shu chü，1898；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74

黃遵憲：《日本國志》

[353]Huang Tsung-hsi.Ming-i tai-fang lu（A plan for the prince）.Woodblock edn printed between 1737 and 1743.A more available edn is in Hsueh Fengch’ang ed.Li-chou i-chu hui-k’an（Collected reprints of writings left by Huang Tsung-hsi），ts’e 12 of the total of 20 ts’e.Shanghai：Shih-chung shuchü，1910，1925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又載薛鳳昌編《梨洲遺著匯刊》

[354]Huang Tsung-hsi.Sung Yuan hsueh-an（Records of Sung and Yuan scholars）.Ch’üan Tsu-wang，ed.100 chuan.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3.Taipei reproduction，Kuang-wen，1971

黃宗羲：《宋元學案》（全祖望編）

[355]Hummel，Arthur W.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2 vols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Taipei reproduction，Ch’eng-wen，1967

恒慕義：《清代名人傳》

[356]Hunt.Michael H.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邁克爾·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357]Ichiko Chūzō.‘Bakumatsu Nihonjin no Taihei Tengoku ni kansuru chishiki’（Japanese knowledge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 in late Tokugawa times），in Kaikoku Hyakunen Kinen Bunka Jigyōkai，ed.Meiji bunkashi ronshū（Essays in Meiji cultural history），pp.453—495.Tokyo：Kengensha.1952

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

[358]Ichiko，Chūzō.‘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in CIR，297—313

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

[359]Ichiko Chūzō.Kindai Chūgoku no seiji to shakai（Politics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Tokyo University Press，1971

市古宙三：《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

[360]Ichimata Masao.‘Yamaza Enjirō-Mei ji jidai ni okeru tairiku seisaku no jikkōsha’（Yamaza Enjirō：a practitioner of the Japanese policy on the Asian continent in the Meiji era）.Kokusaihō gaikō zasshi 72.3（Oct.1973）249—98

市又正雄：《山座圓次郎——明治時期日本的亞洲大陸政策的執行者》

[361]Ikei，Masaru.‘Japan'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JAS，25.2（Feb.1966）213—227

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

[362]Inoue Kaoru Kō Denki Hensankai，eds.Seigai Inoue kō den（Biography of Inoue Kaoru）.Tokyo：Naigai Shoseki Kabushiki Kaisha，1933—4

井上馨侯傳記編纂會編：《世外井上公傳》

[363]Inoue Masaji.Kyojin Arao Sei（Kiyoshi）（Grand old Arao Sei）.Tokyo：Tōa Dōbunkai，1936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

[364]Iriye，Akira.‘The ideology of Japanese imperialism：imperial Japan and China’，in Grant K.Goodman，ed.Imperial Japan and Asia：a reassessment，pp.32—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East Asian Institute，1967

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帝國和中國》

[365]Ishikawa，Shigeru.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perspective.Tokyo：Kinokuniya，1967

石川滋：《亞洲人眼光中的經濟發展》

[366]Ishimoda Shō‘Kōtoku Shūsui to Chugoku’（Kōtoku Shūlsui and China），in Takeuchi Yoshimi，ed.Ajia shugi（Asianism），vol.9：Gendai Nihon shisō taikei，pp.384—410.Tokyo：Chikuma 1963

石母田正：《幸德秋水與中國》

[367]Jamieson，George.‘Tenure of land in China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S，23.6（1889）59—117

賈米森：《中國的土地占有和農村的人口狀況》

[368]Jamieson，George.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no.415.London：HM Stationery Office，1897

賈米森：《中華帝國財政收支報告》

[369]Jane，Frederick T.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London：W.Thacker，1904

杰恩：《日本帝國的海軍》

[370]Jansen，Marius B.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

[371]Jansen，Marius B.‘Japanese views of China during the Meiji period’，in AMCH，163—89

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

[372]Jansen，Marius B.Japan and China：from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

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爭到和平的時期》

[373]Japan.Imperial General Staff.History of the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Major Jikemura and The Revd.Arthur Lloyd，trans.vol.1.Tokyo：Kinkodo Publishing Co.，1904

日本帝國參謀本部：《日中戰爭》（英譯本）

[374]Johnson，William R.‘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Yunnan and Kweichow’.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dissertation.Seattle，1962

威廉·約翰遜：《辛亥革命在云貴》

[375]Jones，Susan Mann.‘Finance in Ningpo：the“ch’ien-chuang”，1780—188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q.v.），pp.47—77

瓊斯：《寧波的金融：1780—1880年的錢莊》

[376]Jones，Susan Mann.‘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in CCTW，73—96

瓊斯：《上海的寧波幫和金融勢力》

[377]Kaigun Gunreibu，comp.Nijūshichi-hachinen kaisen shi（A history of the 1894—5 naval operations）.3 vols.Tokyo：Naval Ministry，1905

海軍軍令部編：《二十七八年（1894—1895）海戰史》

[378]Kaikoku Hyakunen Kinen Bunka Jigyōkai，ed.Sakoku jidai Nihonjin no kaigai chishiki（Japanese knowledge of the outside world during the era of seclusion）.Tokyo：Kengensha，1953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

[379]Kajima，Morinosuke.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vol.1，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Tokyo：Kajim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eace，1976

鹿島守之助（音）：《1894—1922年日本的外交》卷1，《中日戰爭》

[380]Kamachi，Noriko.‘Huang Tsun-hsien（1848—1905）：his response to Meiji Japan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Cambridge，Mass.，1972

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應》

[381]Kan Hou-tz’u，ed.Pei-yang kung-tu lei-tsuan hsu-pien（Categorized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rade for the Northern Ports，continued）.Tientsin，c.1910

甘厚慈編：《北洋公牘類纂續編》

[382]K’ang Yu-wei.Hsin-hsueh wei-ching k’ao（An inquiry into the classics forged during the Hsin period）.8 ts’e，1891.Various later edns，including 2 ts’e punctuated edn.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6；Peking：Ku-chi，1956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

[383]K’ang Yu-wei.K’ung-tzu kai-chih k’ao（A study of Confucius as institutional reformer）.21 chüan.Shanghai：Ta-t’ung i-shu chü 1897；Peking：Wan-mu ts’ao-t’ang，1922—3；Taipei reproduction of the Peking edn，Ta-t’ung，1968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

[384]K’ang Yu-wei.O Pi-te pien-cheng chi（An account of the reform of Peter of Russia），in K’ang Yu-wei，Nan-hai hsien-sheng ch’i shang-shu chi（An account of the seventh memorial of Mr K’ang yu-wei），appendix.Shanghai：T at’ung i-shu chü，1898

康有為：《俄彼得變政記》

[385]K’ang Yu-wei.Jih-pen Ming-chih pien-cheng k’ao[chi]（A study[account]of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Meiji Japan）.16 chüan.Copy by hand in K’ang Yu-wei i-kao（Copies of writings left by K’ang Yu-wei），microfilms made in 1947 from the K’ang family collection in Peking；avaliable at East Asian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of War，Revolution and Peace or Far Eastern Libra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康有為：《日本明治變政考〔記〕》

[386]Kayano Chōch（iNagatomo）.Chūka minkoku kakumei hikyū（Private sources for the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Tokyo：Teikoku Chihō Gyōsei Gakkai，1940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秘籍》

[387]Kiernan，V.G.‘Kashgar and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Asia，1868—1878’.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11.3（1955）317—20

基爾南：《喀什噶爾和中亞的政治，1868—1878年》

[388]Kim，C.I.Eugene and Kim，Han-Kyo.Korea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1876—191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C.I.尤金·金、金漢奎（音）：《1876—1910年朝鮮和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

[389]Kim，K.H.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arly moderinzation：a bibliogra pbical surve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4

K.H.金：《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書目概覽》

[390]Kim，K.H.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worid order：Korea，Japan，and the Chinese empire，1860—188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K.H.金：《1860—1882年的朝鮮、日本和中華帝國》

[391]Kimura Kō.Mori Sensei den（Biography of Mr Mori）.Tokyo：Kinkōdō，1899

木村匡：《森有禮先生傳》

[392]King，H.E.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as recently reconstructed.Washington，DC：US Bureau of Education Bulletin，no 15，1911

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

[393]King，Frank H.H.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弗蘭克·金：《1845—1895年中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

[394]Ko-chih hui-pien（‘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Shanghai：1876—78 and 1880—2（monthly）；1890—2（quarterly）

《格致匯編》

[395]Ko Shih-chün，comp.Huang-ch’ao ching-shih-wen hsu-pien（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120 chüan.Shanghai：T’ushu chi-ch’eng，1888

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

[396]Kōino Michihiro.‘Shindai Santōshō no kansei riku jō kōtsūro’（Official overland communication routes in Shantung in the Ch’ing dynasty）.Shirin，33.3（May 1950）317—36

河野通博：《清代山東省的官辦陸上交通路線》

[397]Konoe Atsumaro.KonoeAtsumaro nikki（Diary of Konoe Atsumaro）.Tokyo：Kajima Kenkyūjō Shuppankai，1968—9

近衛篤麿：《近衛篤麿日記》

[398]Kostiaeva，Aleksandra Sergeevna.Narodnye dvizheniia v Kitae v，1901—1911 gg.（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a，1901—1911）.Moscow：Nauka，1970

科斯嘉耶娃：《1901—1911年中國的民眾運動》

[399]Kōtoku Shūsui.Teikokushugi（Imperialism）.Tokyo：Iwanami，1966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

[400]Krasnyi arkhiv，istoricheskii zhurnal 1922—1941（Red archives，historical journal 1922—1941）.Moscow：Izd-vo Vsesoiuznoi knizhnoi palaty，1960

《紅色檔案，1922—1941年歷史紀事》

[401]Ku-kung hsien-ts’un Chün-chi tang（Ch’ing Grand Council archives in thePalace Museum）.c.4000 boxes.Taipei：Palace Museum，unpublished

《故宮現存軍機檔》（臺北）

[402]Kuan T’ien-p’ei.Ch’ou-hai ch’u-chi（First collection of papers relating to preparation for maritime defence）.4 chüan.c.1841 preface

關天培：《籌海初集》

[403]Kubota Bunji.‘Shimmatsu Shisen no daidenko，Chūgoku kisei jinushi-sei tenkai no ichimen’（Wealthy tenant farmers in Szechwan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n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asitic landlord systern in China）.in Tōkyō Kyōiku Daigaku Tōyōshigaku Kenkyūtshitsu et al.eds.Kindai Chūgoku nōson shakaishi kenkyū（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society in modern China），247—96.Tokyo：Daian，1967

久保田文次：《清末四川的大佃戶——中國寄生地主發展的一面》

[404]Kuhn，Philip A.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菲利普·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

[405]Kuhn，Philip A.‘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7—29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庫恩：《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

[406]Kuksa p’yǒn-ch’an wiwǒnhoe，ed.Susinsa kirok（Records of diplomatic envoys）.Seoul：National History Compilation Commission，195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修信使記錄》

[407]Kung ChunC.hung-kuo hsin-kung-yeh fa-chan-shih ta-kang（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s modern industrial development）.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83

龔駿：《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

[408]Kung-chung-tang Kuang-hsu ch’ao tsou-che（Secret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Kuang-hsu period，1875—1908）.26 vols.Taipei：Palace Museum，1973—1975

《宮中檔光緒朝奏折》

[409]Kuo-li Tai-wan shih-fan，ta-hsueh l 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Taipei 1973— ；also cited as SFLS

《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

[410]Kuo，Sung-p’ing.‘Chinese reaction to foreign encroachmen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its immediate aftermath’.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New York，1953

郭頌平（音）：《中國對外國人蠶食的反應：專論中日甲午戰爭及其后果》

[411]Kuo Sung-tao.Kuo shih-lang tsou-shu（Kuo Sung-tao's memorials）.12 chüan.1892.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郭嵩燾：《郭侍郎奏疏》

[412]Kuo Sung-tao.Yang-chih shu-w uwen-chi（Collection of essays of Kuo Sungtao）.28 chiian.1892.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

[413]Kuo T’ing-i.T’ai-wan shih-shih kai-shuo（A general account of Taiwan history）.Taipei：Cheng-chung，1954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

[414]Kuo T’ing-i.Chin-tai Chung-kuo shih-shih jih-chih（Chronology of event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2 vols.Taipei：Chengchung，196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

[415]Kuo T’ing-i（Ting-yee Kuo）et al.Kuo Sung-tao hsien-sheng nien-p’u（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uo Sung-tao）.2 vo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1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

[416]Kuo，Ting-yee，comp.and Morley，James，ed.Sino-Japanese relations，1862—1927：a checklis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郭廷以編纂，詹姆斯·莫利編輯：《1862—1927年的中日關系：中國外交部檔案一覽》

[417]Kupper，Samuel Y.‘Revolution in China：Kiangsi province，1905—1913’.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73

塞繆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

[418]Kuropatkin，A.N.Kashgaria：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country，its military strength，industries and trade.Walter E.Gowan，trans.Calcutta：Thacker，Spink&Co.，1882

庫洛珀特金：《從歷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

[419]Kuznets，Simon.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spread.New Haven：Yale Uuiversity Press，1966

西蒙·庫茲尼茨：《近代經濟的發展：速度、結構和范圍》

[420]Kuzuu Yoshihisa et al.eds.Tōa senkaku shishi kiden（Stories and biographies of pioneer East Asian idealists）.3 vols.Tokyo：Kokuryūkai Shuppanbu，1935—6.Hara Shobō reproduction，1966

葛生能久等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

[421]La Faye，Jaques de（pseud.）Histoire de l’amiral Courbet.Paris：Bloud et Barral，1891

拉費伊（筆名）：《孤拔將軍傳》

[422]Lamprey，J.‘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Army.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11.46（1867）403—433

藍普雷：《中國的軍事體系》

[423]Langer，William L.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1902.2nd edn.New York：Knopf，1951，1965

威廉·蘭格：《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1902年》

[424]Lattimore，Owen et al.Pivot of Asia：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Boston；Little，Brown 1950

歐文·拉鐵摩爾等：《亞洲的樞紐：中國的新疆和亞洲腹地邊疆與俄國》

[425]Lecomte，Ferdinand.Lang-Son：combats，retraite et négociations.Paris：Henri Charles-Lavauzelle，1895

黎貢德：《中法諒山戰役：戰斗、后撤和談判》

[426]Lee[Li]，En-han.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1904—1911：a study of the Chinese railway-rights recovery movement.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7

李恩涵：《1904—1911年中國爭取自辦鐵路的行動》

[427]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羅

伯特·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

[428]Lee，Ta-ling.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05—1912：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T’ung-meng hui.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0

李大陵：《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歷史記錄》

[429]Legge，James.trans.The Chinese classics.8 vols.Oxford：Clarendon，1893—5；Hong Kong reproduct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李雅各英譯七經》

[430]Lei Hai-tsung.‘Ku-tai Chung-kuo ti wai-chiao’（Diplomacy in ancient China）.She-hui k’o-hsueh（Peiping：Tsing Hua University），3.1（1941）1—12

雷海宗：《古代中國的外交》

[431]Lensen，George A.，ed.Korea and Manchuria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1895—1904：the observations of Sir Ernest Satow，British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Japan（1895—1900）and China（1900—1906）.Tallahassee：Diplomatic Press，1966

喬治·倫森編：《1895—1904年處于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

[432]Lensen，George A.The Russo-Chinese War.Tallahassee：Diplomatic Press，1967

倫森編：《俄中戰爭》

[433]Leonard，Jane K.‘Chinese overlordship and Western penetration in maritime Asia：a late Ch’ing re-appraisal of Chinese maritime relations’.MAS，6.2（1972）151—74

倫納德：《中華民國與西方對亞洲海岸的侵入》

[434]Levenson，Joseph R.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C 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約瑟夫·列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

[435]Levenson，Joseph R.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the problem.of monarchical deca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列文森：《儒家的中國及其現代的命運》

[436]Lewis，Charlton M.‘The reform movement in Hunan（1896—1898）’.Pa-pers on China，15（1961）62—90

查爾頓·劉易斯：《1896—1898年湖南的維新運動》

[437]Lewis，Charlton M.‘The opening of Hunan：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province，1895—190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h.D.dissertation.Berkeley，1965

劉易斯：《1895—1907年湖南的維新與革命》

[438]Lewis，Charlton M.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unan province，1891—190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

[439]Li Che-houK.’ang Yu-wei T’an Ssu-t’ung ssu-hsiang yen-chiu（A study of the thought of K’ang Yu-wei and T’an Ssu-t’ung）.Shanghai：Jen-min，1958

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

[440]Li Chien-nung.Chung-kuo chin-pai-nien cheng-chih shih（A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2 vol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47；Taipei reprint，Commercial Press，1957，1974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441]Li Chien-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Ssuy-ü Teng and Jeremy Ingalls，trans.and eds.Princeton：Van Nostrand，1956

李劍農：《1840—1928年中國政治史》（鄧嗣禹、英格爾斯編譯）

[442]Li En-han.Wan-Ch’ing ti shou-hui k’uang-ch’üan yun-tung（The movement to recover mining right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3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443]Li Enh-anT.seng Chi-tse ti wai-chiao（Tseng Chi-tse's diplomacy）.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6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

[444]Li En-han.‘The Chekiang gentry-merchants vs.the Peking court officials：China's struggle for recovery of the British Soochow- Hangchow- Ningpo railway concession，1905—1911’.CYCT，3.1（1972）223—68

李恩涵：《浙江紳商與北京朝廷官員關于1905—1911年收回英國蘇杭甬路權的斗爭》

[445]Li Hung-chang.Li Wen-chung kung ch’uan-chi（Complete papers of Li Hung-chang）.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1 photo reprint of Nanking 1905 edn；Taipei，Wen-hai reproduction，1962；also cited as LWCK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

[446]Li Hung Chang.Li Wen-chung kung i-chi（Writings of the late Li Hungchang），in Li Kuo-chieh，comp.Ho-fei Li-shih san-shih i-chi（Writings left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Lis of Ho-fei）.1905.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6

李鴻章：《李文忠公遺集》

[447]Li Hung-chang.Li Wen-chung Kung p’eng-liao han-kao（Li Hungchang's letters to friends and colleagues），in Li Hung-chang，Li Wen-chung kung ch’uan-chi（q.v.）.20 chüan.Nanking，1905；Shanghai reproduction，Commercial Press，1921

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448]Li Hung-chang chih Pan Ting-hsin shu-cha（Li Hung-chang's letters to P’an Ting-hsin）.Nien Tzu-min，comp.Peking：Chunghua，1960

李鴻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年子敏編）

[449]Li Kuo-ch’i.Chung-kuo tsao-ch’i ti t’ieh-lu ching-ying（China's early railway enterprise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1

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450]Li Kuo-ch’i.Chang Chih-tung ti wai-chiao cheng-ts’e（Chang Chih-tung's foreign policy proposal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0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

[451]Li Kuo-ch’i.Chou T’ien-sheng and Hsu Hung-i Ch’ing-tai.ch -tseng tifang-kuan jen-shih shan-ti hsien-hsiang chih lianghua fen-hsi（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areers of prefects and magistrates in the Ch’ing dynasty）.3 vols.Taipei：National Science Council，1975

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

[452]Li Pao-chiaK.uan-ch’ang hsien-hsing chi（An exposé of officialdom）.Shanghai：Shih-chieh fan-hua pao，1903；Ya-tung 1927.Peking reprint，Jern-min wen-hsueh ch’u-pan-she 1957，1963

李寶嘉：《官場現形記》

[453]Li P’ei-chi.‘T’ung-meng hui yü pang-hui ti kuan-hsi tsa-i’（Random reminiscences regarding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s relations with the secret societies），in Chung-kuo jen-m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 ch’üan-kuo weiyuan-hui wen-shih tzu-liao yen-chiu wei-yuan-hui，ed.Hsin-hai ko-ming huii lu（q.v.），vol.6，pp.83—86

李培基：《同盟會與幫會的關系雜憶》

[454]Li，Sanp-ao.‘Letters to the editor in John Fryer's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1876—1892：an analysis’.CYCT，4.2（Dec.1974）729—77

李三寶：《致傅蘭雅的〈格致匯編〉（1876—1892年）編者的書信：一個分析》

[455]Li Shih-yueh.Hsin-hai ko-ming shih-ch’i Liang-Hu ti-ch’ü ti ko-ming yuntung（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Hunan-Hupei area during the era of the 1911 Revolution）.Peking：San-lien.1957

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

[456]Li Shih-yueh.Chang Chien ho li-hsien-p’ai（Chang Chien and the constitutionalists）.Peking：Chung-hua，1962

李時岳：《張謇和立憲派》

[457]Li Shih-yueh.Fan-yang-chiao yun-tung（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Peking：San-lien，1962

李時岳：《反洋教運動》

[458]Li Shou-k’ung.Chung-kuo chin-tai shih（China's modem history）.Taipei：Hsueh-sheng，1968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

[459]Li Shu-ch’ang.Cho-tsun-yuan ts’ung-kao（Li Shu-ch’ang's writings）.Shanghai，1893黎庶昌：《拙尊園叢稿》

[460]Li Tsung-hsi.K’ai-hsien Li shang-shu cheng-shu（Li Tsunghsi's political papers）.8 chüan.Wuchang，1885

李宗羲：《開縣李尚書政書》

[461]Li Tsung-t’ung and Liu Feng-han.Li Hung-tsao hsien-shong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Li Hung-tsao）.2 vols.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hui，1969

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

[462]Li Tz’u-ming.Yueh-man-t’ang j ih-chi（Li Tz’u-ming's diary）.51 tse’.Peking：Che-chiang kung-hui，1922；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3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463]Li Wen-chih，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 shih tzuliao ti-i chi，1840—1911（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1 st collection，1840—1911）.Peking：San-lien，1957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年》

[464]Li Wen-hai.‘Hsin-hai ko-ming yü hui-tang’（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in HHWS，1.166—87

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

[465]Li Yu-ning and Chang Yü-fa，comps.Chin-tai Chung-kuo nü-ch’üan yuntung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2 vols.Taipei：Chuan-chi wen-hsueh she，1975

李又寧、張五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466]Li Yun-lin.Hsi ch’ui shih-lueh（Brief record of events on the western frontier）.Fascimile reproduction of a handwritten copy of the Kuang-hsu period.Taipei：Ch’eng-wen，1968

李云麟：《西陲事略》

[467]Liang Ch’i-ch’ao.Hsi-hsueh shu-mu-piao（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learning），in Chih-hsueh hui，comp.Chih-hsueh ts’ung-shu ch’u-chi（q.v.），ts’e 9—10梁啟超：《西學書目表》

[468]Liang Ch’i-ch’ao.Yin-ping-shih wen-chi（Collected essays of the Icedrinker's Studio）.80 ts’e.Shanghai：Chung-hua，1926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

[469]Liang Ch’i-ch’ao.Yin-ping-shih ho-chi（Collected works and essays from the Ice-drinker's Studio）.40 vols.，including Wen-chi（Essays），vols.1—16.Shanghai：Chung-hua，193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

[470]Liang Ch’i-ch’ao.‘Nan-hai K’ang hsien-sheng chuan’（A biography of K’ang Yu-wei），in Liang Ch’i-ch’ao，Yin-pin-g shih ho-chi，Wen-chi（q.v.），3.57—89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

[471]Liang Ch’i-ch’ao.Intellectual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Ch’ing-tai hsuehshu kai-lun）.trans.Immanuel C.Y.Hsu.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有徐中約英譯本）

[472]Liang，Chia-pin.‘Li Hung-chang yü Chung-Jih chia-wu chan-cheng’（Li Hung-chang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Ta-lu tsa-chih，51.4 and 5（Oct.and Nov.1975）155—86，227—54

梁嘉彬：《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戰爭》

[473]Liang Chin-tung.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New York：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St John's University，1962

梁敬錞：《辛亥革命》

[474]Liew，K.S.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

[475]Lin Ming-te.Yuan Shih-k’ai yü Ch’ao-hsien（Yuan Shih-k’ai and Korea）.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0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

[476]Lin Neng-shih.Ch’ing-chi Hu-nan ti hsin-cheng yun-tung（The movement for new policies in late Ch’ing Hunan）.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College of Letters，1972

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運動》

[477]Lin Tung-ch’en（Lin Tō-shin）.Taiwan bōeki shi（Histo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in Taiwan）.Taipei：Nihon Kaikokusha，1932

林東辰：《臺灣貿易史》

[478]Liu Ch’ang-yu.Liu Wu-sheng kung i-shu（Papers of the late Liu Ch’angyu）.28 chiian.Nanking，1891；Taipei reproduction，Ch’eng-wen.1968

劉長佑：《劉武慎公遺書》

[479]Liu Chin-tsao，ed.Ch’ing-ch’ao hsu weh-hsien t’ung-k’ao（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h’ing dynasty，continued）.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5；Taipei reproduction，Hsin-hsing，1965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

[480]Liu Feng-han.‘Chia-wu chan-cheng shuang-fang ping-li ti fen-hsi’（An analysis of the strength of both belligerents during the war of 1894）.Chung-kuo i-chou，829（14 March，1966）13—16；830（21 March，1966）11—14

劉鳳翰：《甲午戰爭雙方兵力的分析》

[481]Liu Feng-hanH.sin-chien lu-chün（The Newly Created Army[under Yuan Shih-k’ai，1895—1900]）.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7

劉鳳翰：《新建陸軍》

[482]Liu Feng-hanW.u-wei chün（The Wu-wei Army[under Jung-lu and Yuan Shih-k’ai，1899—1901]）.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8

劉鳳翰：《武衛軍》

[483]Liu，Kwang-Ching.‘Two steamship companies in China，1862—1877’.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Cambridge，Mass.，1956

劉廣京：《在中國的兩個輪船公司》

[484]Liu，Kwang-Ching.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劉廣京：《1862—1874年英美輪船業在中國的爭奪》

[485]Liu，Kwang-Ching.‘British-Chinese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73—1885’，in C.D.Cowan，e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pp.49—78.London；Allen & Unwin，1964

劉廣京：《英國和中國輪船在華的競爭，1873—1885年》

[486]Liu，Kwang-Ching.‘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in AMCH，68—104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1870—1875年一個政策的形成》

[487]Liu，Kwang-Ching.‘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eds.China in crisis，I.I.93—178.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劉廣京：《19世紀的中國舊制度的崩潰和西方的影響》

[488]Liu Kwang-Ching.‘Cheng kuan-ying I-yen：Kuang-hsu ch’u-nien chih pienfa ssu-hsiang’（Cheng Kuan-ying's I-yen：reform proposals of the early Kuang-hsu period）.Ch’ing-hua hsueh-pao，NS，8.1—2（1970）373—425

劉廣京：《鄭觀應〈易言〉：光緒初年之變法思想）

[489]Liu，Kwang-Ching.‘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1823—1866’.HAS，30（1970）5—45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

[490]Liu，kwang-Ching.‘The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a reappraisal’.Ch’ingh-ua hsueh-pao，NS，10.2（July 1974）176—207（in Chinese），207—23（in English）

劉廣京：《對清末地方權限的再估價》

[491]Liu Ming-ch’uan.Liu Chuang-su kung tsou-i（Liu Ming-ch’uan's memorials）.6 chuan.1906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Wen- hai，1968，also cited as LCSK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

[492]Liu O（Liu T’ieh-yun）.Lao-ts’an yu-chi（The travels of Lao-ts’an）.20 chuan.Shanghai，1906 preface，Ya-tung；3rdedn，1928.Hong Kong：Commercial Press，1965.English trans.by，H.Y.Yang and G.M.Taylor：Mr.Derelict，London：Allen and Unwin，1948.See under Liu T’ieh-yun for the Harold Shaddick trans.

劉鶚（劉鐵云）：《老殘游記》（有H.Y.楊和G.M.泰勒譯的英譯本）

[493]Liu Po-chi.Kuang-tung shu-yuan chih-tu yen-ko（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local academies in Kwangtung）.Changsha：Commercial Press，1939；Taipei edn，Chung-hua ts’ung-shu wei-yuan-hui，1958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

[494]Liu，Tac-hung and Yeh，Kung-chia.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1933—1959年的國民收入和經濟發展》

[495]Liu T’ieh-yunT.he travels of Lao Ts’an.Harold Shaddick，tra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See Liu O

劉鐵云：《老殘游記》（沙迪克英譯）

[496]Liu Yen.Chung-kuo wai-chiao shih（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Enlarged edn by Li Fang-ch’en.Taipei：San-min shu-chü 1962

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

[497]Lo Cheng-chün.Tso Wen-hsiang kung m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so Tsung-t’ang）.10 chüan.Hsiang-yin.1897；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7

羅正鈞：《左文襄公年譜》

[498]Lo Erh-kang.Hsiang chün hsin-chih（A new history of the Hunan Army）.Changsha：Commercial Press，1939

羅爾綱：《湘軍新志》

[499]Lo Erh-kang.Lü-ying ping-chih（A treatise on the Green Standard Army）.Chungking：Commercial Press，1945

羅爾綱：《綠營兵志》

[500]Lo，Hui-min.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apers relative to China and her neighhouring countries，1840—1914，with an additional list，1915—1937.The Hague：Mouton.1969

羅惠民：《英國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補，1915—1937年）

[501]Lo，Jung-pang，ed.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

羅榮邦編：《康有為：傳記及論叢》

[502]Lu HsunT.he true story of AhQ.Gladys Yang and Hsien-i Yang，trans.5th edn.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72

魯迅：《阿Q正傳》（格拉迪斯·楊、楊憲益英譯）

[503]Lu Pao-ch’ien.‘Wo-jen lun’（On Wo-jen）.CYCT.2（June 1971）257—70

陸寶千：《倭仁論》

[504]Lü Shih-ch’iang.Chung-kuo kuan-shen fan-chiao ti yuan-yin，1860—1874（Causes behind the Chinese gentry-officials’hostility towards Christianity.1860—1874）.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6

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

[505]Lü Shih-ch’iang.Ting Jih-ch’ang yii tzu-ch’iang yun-tung（Ting Jih-ch’ang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Taipei：IMH，197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

[506]Lü Shih-ch’iang.‘Wan-Ch’ing Chung-kuo chih-shih fen-tzu tui Chi-tu-chiaotsai Hua ch’uan-chiao mu-ti ti i-chü，1860—1898’（Chinese intellectual's suspicion and fear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s aim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1860—1898）.SFLS，3（Feb.1975）147—158

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1860—1898年》

[507]Lust.John.Secret societies，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PMSS.165—200

約翰·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

[508]Lyon，Chambre de Commerce de，ed.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 1895—1897.Lyon：A.Rey.1898

里昂商會編：《1895—1897年里昂訪華商業調查團》

[509]Ma Chien-chung.Shih-k’o-chai chi-yen（Ma Chien-chung's essays and discourses）.1896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馬建忠：《通可齋記言》

[510]Ma Hsiso-shih.Hsi-pei hui-tsu ko-ming chien-shih（Brief history of the Muslim people's revolution in the north-west）.Shanghai：Tung-fang shushe，1951

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

[511]Ma Te-hsinT.a-hua tsung-kuei（Destiny of the universe）.1865 preface.Peking reprint，Ch’ing-chen shu-pao she，1923

馬德新：《大化總歸》

[512]MacKinnon，Stephen R.Liang Shih-i and the communications clique，JAS，29.3（May 1970）581—602

斯蒂芬·麥金農：《梁士詒和交通系》

[513]MacKinnon，Stephen R.Yuan Shih-k’ai in Tientsin and Peking：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his pow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D.dissertation.Davis，1971

麥金農：《袁世凱在天津和北京：他的力量的源泉與組織》

[514]MacKinnon，Stephen R.‘The Peiyang Army，Yuan Shih-kai，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JAS，32.2（May 1973）405—423

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與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

[515]MacMurray，John V.A.，comp.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2 vo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for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21

約翰·麥克默里編：《1894—1919年與中國締結的和與中國有關的條約和協定》

[516]Maeda Katsutarō‘Shindai no Kanton ni okeru nōmin tōsō no kiban’（Basis of peasants'struggle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h’ing period）.Tōyō gakuhō，51.4（March 1969）1—38

前田勝太郎：《清代廣東農民斗爭的基礎》

[517]Man-hua（T’ang Tseng-pi）.‘Tung-meng-hui shih-tai Min-pao shih-mo chi’（A history of the Min-pao in the era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KMWH，2（1953）218—38

曼華（湯增璧）：《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

[518]Mancall，Mark and Jidkoff，Georges.‘The Hung Hu-tzu of Northeast China’，in PMSS，125—34

曼考爾、吉德科夫：《中國東北的紅胡子》

[519]Manchester，WilliamT.he arms of Krupp.1587—1968.Boston：Little，Brown；1968

威廉·曼徹斯特：《克虜伯武器：1587—1968年》

[520]Mantetsu ChōsabuC.hū-Shi no minsengyō（The junk trade of Central China）.Tokyo：Hakubunkan，1943

滿鐵調查部：《華中的民船業》

[521]Marsh，Robert M The mandarins：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1600—1900.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1961

羅伯特·馬什：《1600—196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

[522]Martin，W.A.P.（Ting Wei-liang）.Wan-kuo kung-fa（Public law of all nations；translation of Henry Wheaton's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4 ts’e.Peking：Ch’ung-shih kuan，1864

丁韙良譯：《萬國公法》

[523]Maruyama，Masao.‘Patterns of individuation and the case of Japan：a conceptual scheme’，in Marius B.Jansen，ed.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489—53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丸山真男：《個體化的模式和日本的實例》

[524]Masui Tsuneo.Taihei tengoku（The Heavenly Kingdom of Great Peace）.Tokyo：Iwanami，1951

增井經夫：《太平天國》

[525]McCormack，Gavan.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and the Manchurian ide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加萬·麥科馬克：《張作霖在東北，1911—1928年》

[526]McAleavy，Henry.Black flags in Vietnam：the story of a Chinese intervention.London：Allen and Unwin，1968；New York edn，Macmillan，1968

亨利·麥卡利維：《黑旗軍在越南》

[527]Meijer，Marinus J.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n China.Batavia：De Unie，1950

馬里納斯·邁杰爾：《中國近代刑法介紹》

[528]Meng Yun-sheng（pseud.）Shang-hsin jen-yü（Wounded to the soul）.Shanghai：Ching-shih shu-hui，1906

夢蕓生（筆名）：《傷心人語》

[529]Metzger，Thomas A.‘State and commerce in imperial China’.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6（1970）23—46

托馬斯·梅茨格：《中華帝國的政府和商業》

[530]Mi Ju-ch’eng comp.Chung-kuo chin-tai t’ieh-lu shih tzu-liao，1863—1911（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railways in modern China，1863—1911）.3 vols.Peking：Chung-hua，1963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年》

[531]Michie，Peter S.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mory Upton.New York：D.Appleton，1885

彼得·米契耶：《厄普頓的生平和書信》

[532]Min-pao（The people）.Tokyo.1905—10

《民報》

[533]Ministère des Colonies.Les archives.Paris

法國殖民部檔案

[534]Ministry of Industries，National Agriculrural Research Bureau，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Crop reporting in China.1934.Nanking：Ministry of Industries，Aug.1936

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業經濟科：《農情報告匯編，1934年》

[535]Mitchell.Peter M.‘The limits of reformism：Wei Yuan's reaction to Western intrusion’.MAS，6.2（1972）175—204

彼得·米切爾：《改革主義的極限：魏源對西方入侵的反應》

[536]Mitrano.Thomas.‘The Chinese bankruptcy law of 1906—1907：a case history’.Monumenta Serica，30（1972—3）259—337

托馬斯·米特拉諾：《1906—1907年中國的破產法》

[537]Miyashita Tadao.Chūgoku heisei no tokushu kenkyū；kindai Chūgoku ginryō seido no kenkyū（A monographic study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system；a study of the silver tael system of modern China）.Tokyo：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1952

宮下忠雄：《近代中國銀兩制度的研究》

[538]Miyazaki Ryūsuke and Onogawa Hidemi，eds.Miyazaki Tōten zenshū（The complete works of Miyazaki Tōten）.5 vols.Tokyo：Heibonsha，1971—6.See also Eto Shinkichi，ed.Sanjū-soanen no Yume.

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富崎滔天全集》

[539]Mo Pei ed.Chiang-Che t’ieh-lu feng-ch’ao（The storm over the Kiangsu-Chekiang railway）.Shanghai，1907.Photocopy from Kuomintang Party Historical Commission，Taipei，1968

墨悲編：《江浙鐵路風潮》

[540]Modern Chinese society，ananalytical bibliography.（1）Publications in Westen languages，1644—1972，ed.G.William Skinner；（2）Publications in Chinese，1644—1969，ed.G.William Skinner and Winston Hsieh；（3）Publications in Japanese，1644—1971，ed.G.William Skinner and Shigeaki Tomita.3 vol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一、西方篇，1644—1972年，施堅雅編；二、中文篇，1644—1969年，施堅雅、謝文孫合編；三、日文篇，1644—1971年，施堅雅、富田重亮編

[541]Morgan，W.P.Triad societies in Hong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ess，1969 W.P.

摩根：《香港的三合會》

[542]Morley，James，ed.Japan's foreign policy.1868—1941：a research guid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詹姆斯·莫利編：《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

[543]Morrison，Esther.‘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 bureaucracy’.Radcliffe College，Ph.D.dissertation.Cambridge，Mass.，1959

埃絲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現代化》

[544]Morse，H.B.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08

馬士：《中華帝國的貿易和行政》

[545]Morse，H.B.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 vols.London，New York（etc.）：Longmans，Green and Co.，1910—18；Taipei reproduction，Wen-hsing，1966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546]Mou An-shih.Yang-wu yun-tung（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Shanghai：Jen-min.1956；6th printing，1961

牟安世：《洋務運動》

[547]Munholland，J.Kim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France and Sun Yat-sen，1900—1908’.JAS，32.1（Nov.1972）77—95

金·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1908年》

[548]Muramatsu Yūji.‘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the late Ch’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BSO AS，29.3（1966）566—99

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制度的研究》

[549]Muramatsu Yūji.Kindai Kōnan no sosan：Chūgoku jinushi seido no kenkyū（Landlord bursaries in Kiangnan in modern times：studies of landlordism in China）.Tokyo University Press，1970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550]Myers，Ramon H.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拉蒙·邁爾斯：《1890—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

[551]Myers，Ramon H.‘Taiwan under Ch’ing imperial rule，1684—1895：the traditional economy’.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5.2（D ec.1972）373—411

邁爾斯：《1684—1895年清帝國治下的臺灣傳統經濟》

[552]Naba Toshisada.Chūka shisō（Sinocentrism），in Iwanami kōza：Tōyō shichō（The Iwanami series on oriental trends of thought）.Series 17.Tokyo：Iwanami，1936

那波利貞：《中華思想》

[553]Nagai Kazumi.‘Iwayuru Shinkoku ryūgakusei torishimari kisoku jiken no seikaku：Shimmatsu ryūgakusei no ichi dōkō’（The nature of the so-called incident involving Ch’ing regulations for controlling overseas students：a movement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owards the end of Ch’ing）.Shinshū Daigaku kiyō，2（July 1952）11—34

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清末留學生的一個運動》

[554]Nagai Kazumi.‘Kyoga gakuseigun o megutte’（Concerning the student army to resist Russia）.Shinshū Daigaku kiyō，4（Sept.1954）57—83

永井算己：《關于拒俄學生軍》

[555]Nagai Kazumi.‘Kō-Setsu roji to Shimmatsu no minshū’（The Kiangsu-Chekiang railway and the people in late Ch’ing）.Shinshū Daigaku kiyō，7（1957）1—25

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眾》

[556]Nakada Yoshinobu.‘Dōchi nenkan no Sen-Kan no Kairan ni tsuite’（A study of the Muslim Rebellion in Shensi and Kansu during the T’ung-chih period）.Kindai Chūgoku kenkyū，3（1959）69—159

中田吉信：《同治年間的陜甘回亂》

[557]Nakajima Masao，ed.Taishi kaiko roku（Memoirs concerning China）.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3

中島正郎編：《中國回憶錄》

[558]Nakajima Masao；ed.Zoku Taishi kaiko roku（Memoirs concerning China，supplement）.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41

中島正郎編：《續中國回憶錄》

[559]Nakamura Tadashi.‘Shimmatsu seiji to kauryō shihon：Sei Senkai no yakuwari o megutte’（Late Ch’ing politics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with reference to Sheng Hsuan-huai's role），in Tōkyō Kyōiku Daigaku Bungakubu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ed.Chūgoku kindaika no shakai kōzō（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pp.21—44.Tokyo：Tōkyō Kyōiku Daigaku，1960

中村義：《清末政治和官僚資本：盛宣懷所起的作用》

[560]Nan-k’ai ta-hsueh Ching-chi hsi.Ching-chi yen-chiu so.Ch’i-hsin yang-hui kung-ssu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Chee Hsin Cement Co.）.Peking：San-lien，1963

南開大學經濟系經濟研究所：《啟新洋灰公司史料》

[561]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Nankai index numbers，1936.Tientsin：Nankai University，1936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936年南開指數》

[562]Narochnitskii，A.L.Kolonial’naia politika kapitalisticheskikh derzhav na dal’nem vostoke，1860—1895（The colonial policies of the capitalist powers in the Far East，1860—1895）.Moscow：Izd-vo Akademii nauk CCCP，1956

納羅契尼茨基：《1860—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

[563]Negishi Tadashi.Shinkoku shōgyō sōran（General survey of commerce of the Ch’ing dynasty）.5 vols.Tokyo：Maruzen for Tōa Dōbunkai，1906—8

根岸佶：《清國商業綜覽》

[564]Nieh Tseng Chi-fen.Ch’ung-te lao-jen pa-shih tzu-ting nien-p’u（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of Nieh Tseng Chi-fen at age eighty）.Shanghai：The Nieh family，1933

聶曾紀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

[565]Nihon Shiseki Kyōkai，comp.Kawaji Toshiakira monjo（Kawaji Toshiakira documents）.8 vols.Tokyo：Nihon Shiseki Kyōkai，1932—4，new edn，1967—8.See Otsuka Takematsu

日本史籍協會編：《川路圣謨文書》

[566]Nish，I.H.‘Japan's indecision during the Boxer disturbances’.JAS，20.3（May 1961）449—461

伊恩·尼什：《日本在義和團之亂時舉棋不定的態度》

[567]Nish，Ian 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1894—1907.London：Athlone，1966

尼什：《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568]Nisshin Bōeki Kenkyūjo.Shinkoku tsūshō sōran（General survey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Ch’ing dynasty）.3 vols.Tokyo：Maruzen（vols.1—2）and Okura Shoten（vol.3），1892

日清貿易研究所：《清國通商綜覽》

[569]Nisshin sensō jikki（Actual record of the Japan-Ch’ing war）.Issued every ten days.Tokyo：Hakubunkan，Aug.1894—Jan.1896

《日清戰爭實記》

[570]North-China Herald.Shanghai，1850— ；also cited as NCH

《北華捷報》

[571]Nozawa Yutaka.‘Nihon ni okeru Son Bun kankei bunken mokuroku’（A list of bibliographical items concerning Sun Yat-sen found in Japan）.Shisō，1957.6（June）79—93

野澤豐：《在日本發現的有關孫中山的文獻目錄》

[572]Nung-kung-shang pu，comp.Nung-kung-shang pu hsien-hsing chang-cheng（Current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Industry and Commerce）.13 ts’e.Peking，1908

農工商部編：《農工商部現行章程》

[573]Nung-kung-shang pu t’ung-chi ch’u，comp.Nung-kung-shang pu t’ung-chi piao（Statistical tabl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Industry and Commerce）.Peking：ti-i-tz’u（1st issue），6 ts’e，1909；ti-ertz’u（2nd issue），5 ts’e，1910

農工商部統計處編：《農工商部統計表》，第一次（1909年）、第二次（1910年）

[574]Onogawa，Hidemi.Shimmatsu seiji shisō kenkyū（Studies in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late Ch’ing）.Kyoto University，1960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

[575]Otaka Iwao and Hatano Tarō，trans.Ryūnichi kaiko—Chūgoku anakisuto no hansei（Recollections of a sojurn in Japan—half a life of a Chinese anarchist）.Tokyo：Heibonsha，1966.See Ching Mei-chiu，Tsui-an

大高巖、波多野太郎譯：《留日回顧——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半生》（見景梅九：《罪案》）

[576]Otsuka Takematsu，ed.Kawaji Toshiakira monjo（Kawaji Toshiakira docu-ments），vol.8.Tokyo：Nihon Shiseki Kyōkai，1934

大塚武松編：《川路圣謨文書》

[577]Pal Shou-i，ed.Hui-min ch’i-i（The Muslim uprisings）.4 vols.Shanghai：Shen-chou kuo-kuang she，1952；also cited as HMCI

白壽彝編：《回民起義》

[578]Pao Shih-ch’en.An-Wu ssu-chung（Four collections regarding peaceful government of Kiangsu）.36 chuan.Soochow，1851；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包世臣：《安吳四種》

[579]Pao Tsun-p’eng.Chung-kuo hai-chün shih（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vy）.Taipei：Naval Publication Office，195 1；Chung-hua ts’ung-shu，1970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

[580]Pao Tsun-p’eng.‘Ch’ing-chi hai-chün ching-fei k’ao-shih’（The truth about late Ch’ing naval funds）Chung-kuo li-shih hsueh-hui shih-hsueh chi-k’an，1（1969）17—55

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

[581]Papers on China.annual，Vols.1—24（1947—71）.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中國論文集》

[582]Pearl，Cyril.Morrison of Peking.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67

西里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

[583]Pei-chuan-chi pu（Supplement to collected epigraphs），Min Erh-ch’ang comp.Peiping：Yenching University，1923

閔爾昌編：《碑傳集補》

[584]Pei-yang hai-chün chang-ch’eng（Regulations of the Pei-yang Navy）.1 ts’e Tientsin，1888，reprinted in YWYT，3.195—262

《北洋海軍章程》

[585]Pelcovits，Nathan A.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8

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外交部》

[586]P’eng Hsin-wei.Chung-kuo huo-pi shih（History of Chinese curency）.3rd edn.Shanghai：Jen-min，1965.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

[587]P’eng Tse-chou（Hō Taku-shū）.Meiji shoki Nik-Kan-Shin kankei no kenkyū（Studies on Japanese-Korean-Ch’ing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Meiji period）.Tokyo：Hanawa Shobō，1969

彭澤周：《明治初期日—朝—清關系的研究》

[588]P’eng Tse-chou（Hō Taku-shū）.Chūgoku no kindaika to Meiji Ishi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Kyōto：Dōbōsha，1976

彭澤周：《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

[589]P’eng Tse-chou（Hō Taku-shū）.‘Kō Yū-i no hempō undō to Meiji Ishin’（K’ang Yu-wei's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Jimbun gakuhō，30（1970）149—93

彭澤周：《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和明治維新》

[590]P’eng Tse-chou（Hō Taku-shū）.‘Ryō Kei-chō no Meiji Ishin kan to Chūgoku henkakuron’（Liang Ch’i-ch’ao's view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his arguments for reform in China），in Sakata Yoshio and Yoshida Mitsukuni，eds.Sekaishi no naka no Meiji Ishin；gaikokujin no shikaku kara（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world history：as seen by foreigners），pp.61—114.Kyoto University，1973

彭澤周：《梁啟超的明治維新觀與他的變法論》，收于坂田吉雄、吉田光邦編《明治維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外國人的看法》

[591]P’eng Tse-i，comp.Chung-kuo chin-tai shou-kung-yeh shih tzul-iao，1840—1949（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1840—1949）.4 vols.Peking：San-lien，1957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

[592]P’eng Tse-i‘Shih-chiu shih-chi hou-ch’i Chung-kuo ch’eng-shih shou-kungyeh shang-yeh hang-hui ti ch’ung-ch’ien ho tsoyung’（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hinese handicraft and trade association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functions）.Li-shih yen-chiu 1965.1，pp.71—102

彭澤益：《19世紀后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

[593]Perkings，Dwight H.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德懷特·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

[594]Perkins，Dwight H.，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595]P’i Hsi-jui.‘Shih-fu-t’ang wei-k’an jih-chi’（P’i Hsi-jui's hitherto unpublished diary）.Hu-nan li-shih tzu-liao，4（1958）65—126

皮錫瑞：《師復堂未刊日記》

[596]Piassetsky，P.Russian travellers in Mongolia and China.J.Gordon-Cummings，trans.London：Chapman & Hall，1884

皮亞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國的俄國旅行家》

[597]Powell，Ralph L.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 wer.1895—191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拉爾夫·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

[598]Prejevalsky，M.Mongolia，the Tangut country，and the solitude of northen Tibet：being a narrative of three years’travel in eastern high Asia.E.Delmar Morgan，trans.2 vols.London：Sampsons，Low，Marston，Searle & Rivington，1876

普列杰瓦爾斯基：《蒙古、唐古特和北藏》

[599]Presseisen，Ernst.Before aggression：Europeans prepare the Japanes army.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5

厄恩斯特·普列賽森：《侵略中國之前歐洲人培訓的日本軍隊》

[600]Price，Don C.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唐·普雷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

[601]Pu-hsiao sheng（pseud.）.Liu-tung wai-shih（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10 ts’e，published in 5 series.Shanghai：Min-ch’üan ch’upan pu，1924—5

不肖生（筆名）：《留東外史》

[602]Purcell，Victor.The Boxer upris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維克多·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

[603]Puyraimond，Guy.‘The Ko-lo-hui and the anti-foreign incidents of 1891’，in PMSS，113—24

蓋伊·普賴蒙德：《哥老會和1891年的排外事件》

[604]Rankin，Mary Backus.‘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ekiang：a study in the tenacity of tradition’，in CIR，319—61

瑪麗·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

[605]Rankin，Mary Backus.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606]Rawlinson，Sir Henry Creswicke.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a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 of Central Asia.2nd edn.London：J.Murray，1875

亨利·羅林森：《英國和俄國在東方：關于中亞政治狀況和地理狀況的報告》

[607]Rawlinson，John L.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1895年》

[608]Remer，Charles Frederick.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33

查爾斯·雷默：《外國在華的投資》

[609]Repor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gold-exchange standard into China.US Senate document，No.128，58th Congress，3rd sess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4

《關于金本位制傳入中國的報告》（美國參議院第128號文件）

[610]Report on the native cloth in use in the Amoy consular district.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London：1886，No.19

《廈門領事區關于土布使用的報告》（英國外交部檔案，雜項，1886年第19號）

[611]Rhoads，Edward J.M.‘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1895—1911’，in CCTW，97—117

愛德華·羅茲：《1895—1911年的廣州商會》

[612]Rhoads，Edward J.M.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

[613]（Rikugun）Sambōhombu，comp.Meiji nijūshichi-bachinen Nisshin senshi（A history of the 1894—5 Japan-Ch’ing War）.9 vols.Tokyo：Ministry of War，1904—7

（陸軍）參謀本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

[614]Rinji Taiwan Kyūkan Chōsaka（iTemporary commission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for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customs），ed.Shinkoku gyōseihō（Administrative laws of the Ch’ing dynasty）：5 vols.，Taipei，1905—11；7 vols.，Tokyo and Kobe，1910—4，Tokyo：Daian，1965—7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清國行政法》

[615]Robinson，Ronald，Gallagher.John and Denny，Alice.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offcial mind of imperialism.London：Macmillan，1961.American edn：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climax of imperialis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1

羅納德·魯賓遜等：《非洲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

[616]Rosenbaum，Arthur L.‘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JAS，34.3（May 1975）689—715

阿瑟·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的米騷亂》

[617]Rossabi，Morris.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莫里斯·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亞洲腹地》

[618]Rubinchak，Leonid S.，comp.and trans.A digest of Krasnyi Arkhiv：a historical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rchive Department of the U.S.S.R.Louise M.Boutella and Gordon W.Tgayer，eds.106 vols.Cleveland Public Library，1947—55

魯賓恰克編譯，鮑特拉、特加耶編：《紅色檔案摘要：蘇聯中央檔案部歷史記事》

[619]Saeki Tomi.Shindai ensei no kenkyū（A study of the Ch’ing salt administration）.Kyoto：Tōyōshi Kenkyūkai，1956

佐伯富：《清代鹽政的研究》

[620]Saguchi Tōru，Jūhachi-jūkyūseiki Higashi Torukisutan shakaishi kenkyū（A 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Tokyo：Yoshikawa Kōbunkan，1963

佐口透：《18—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

[621]Sakai，Robert K.‘The Ryūkyū（Liu-ch’iu）Islands as fief of Satsuma’，in CWO，112—134

境健次郎：《作為薩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島》

[622]Sanetō Keishū.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kō（Draft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Chūka Gakkai，1939；rev.edn，1970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

[623]Sanetō Keishū.Nihon bunka no Shina e no eikyō（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on China）.Tokyo：Keisetsu Shoin，1940

實藤惠秀：《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

[624]Sanetō Keishū.Meiji Nisshi bunka kōshō（Cultural inter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Tokyo：Kōfūkan，1943

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

[625]Sanetō Keishū.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Kuroshio Shuppan，1960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

[626]Sasaki Masaya.‘Elkō shōnin no kenkyū’（A study of the Ying-k’ou merchants）.Kindai Chūgoku，kenkyū，1（1958）213—67

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

[627]Sauvage，Lieutenant.La Guerre sino-japonaise 1894—1895.Paris：Librairie Militaire de L.Baudoin，1897

索瓦熱海軍少校：《中日甲午戰爭》

[628]Scalapino，R A.and Schiffrin，H.‘Early 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un Yat-sen versus Liang Ch’i-ch’ao’.JAS，18.3（May 1959）321—42

斯卡爾皮諾、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對抗》

[629]Scalapino，Robert A.‘Prelude to Marxism：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in Japan.1900—1910’，inAMCH，190—215

斯卡爾皮諾：《馬克思主義的序幕：1900—1910年中國的留日學生運動》

[630]Schiffrin，Harold.‘Sun Yat-sen's land policy’.JAS，26.4（Aug.1957）549—64

哈羅德·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

[631]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 and the orig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

[632]Schiffrin.Harold Z.‘The enigma of Sun Yat-sen’，in CIR，443—474

希夫林：《孫中山之謎》

[633]Schrecker，John.‘The Pao-kuo hui：a reform society of 1898’.Papers on China.14（1960）50—64

約翰·施雷克：《1898年的維新團體保國會》

[634]Schrecker，John E.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施雷克：《德國帝國主義在山東》

[635]Schwartz，Ben 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施瓦茨：《嚴復與西方》

[636]Scott，James G.‘The Chinese brave’.Asiatic Quarterly Review，1（1886）222—45

詹姆斯·斯科特：《中國的兵勇》

〔637]Seki Masaaki.‘The 1911 Revolution in Fengtien province’.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MA dissert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68

關正昭（音）：《辛亥革命在奉天》

[638]Shah Hua-P’u.‘Shen-Kan chieh-yii lu’（Legends of the Shensi-Kansu calamity），in HMCI，4.303—16

單化普：《陜甘劫余錄》

[639]Shang-wu yin-shu kuan（Commercial Press），comp.Ta Ch’ing Hsuan-t’ung hsin fa-ling（New statutes and decrees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Hsuant’ung period）.32 ts’e.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10—1

商務印書館編：《大清宣統新法令》

[640]Shang-wu yin-shu kuan（Commercial Press），comp.Ta-Ch’ing Kuang-hsu hsin fa-ling（New statutes and decrees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the Kuanghsu period）.20 ts’e.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10—11

商務印書館編：《大清光緒新法令》

[641]Shao Hsun-cheng.Chung-Fa Yueh-nan kuan-hsi shih-mo（A complete ac-count of Sino-French relations concerning Vietnam[until 1885]）.Peiping：Tsing Hua University，1935

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642]Shao Hsun-cheng et al.eds.Chung-Fa chan-cheng（The Sino-French War）.7 vols.Shanghai：Hsin-chih-shih，1955；Jen-min，1957

邵循正等編：《中法戰爭》

[643]Shao Hsun-cheng et al.eds.Chung-Jih chan-cheng（The Sino-Japanese War）.7 vols.Shanghai：Hsin-chih-shih，1956；also cited as CICC

邵循正等編：《中日戰爭》

[644]Shao Hsun-cheng.‘Yang-wu yun-tung ho tzu-pen-chu-i fa-chan ti kuan-hsi wen-t，i’（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Affairs mov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in’Pei-ching-shih li-shih hsueh-hui ti-i ti-erh-chieh nien-hui lun-wen hsuan-chi（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annual meetings of the Peking Historical Association）.Peking：Pei-ching ch’u-pan-she，1964

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

[645]Shek，Richard H.‘Some Western influences on T’an Ssu-t’ung's thought’，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q.v.），pp.194—203

理查德·薛：《譚嗣同思想中的若干西方影響》

[646]Shen Chia-pen et al.eds.Ho-ting hsing hsing-lü（Currentcode as revised and approved）.2 ts’e Peking：Fa-lü kuan，1909—10

沈家本等編：《核定現行刑律》

[647]Shen T’ung-sheng et al.eds.Kuang-hsu cheng-yao（Important policies of the Kuang-hsu reign）.34 chüan Shanghai：Nan-yang kuan shu chü，1909.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9

沈桐生等編：《光緒政要》

[648]Shen Yun-lung.‘Chang-wo wan-Ch’ing cheng-ping chih I-k’uang’（Prince Ch’ing：wielder of political power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h’ing period），in Shen Yun-lung，Hsien-tai cheng-chih jen-wu shu-p’ing（A critical review of som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ersonalities），2.2.70—80.2 vols.with subdivisions.Taipei：Wen-hai，1966

沈云龍：《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

[649]Sheng Hsuan-huai.Sheng shang-shu Yü-chaii ts’un-kao ch’u-k’an（Collected papers of ministry president Sheng Hsuan-huai，1st issue）.Lü Ching-tuan，ed.101 chüan.Shanghai，1939

盛宣懷：《盛尚書愚齋存稿初刊》（呂景端編）

[650]Sheng Hsuanh-uai.Sheng Hsuan-huaiwei-k’an hsin-kao（Unpublished letters of Sheng Hsuan-huai）.Modern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Cen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ed.Peking：Hsin-hua shutien，1960

盛宣懷：《盛宣懷未刊信稿》

[651]Sheng K’ang，comp.Huang-ch’ao ching-shih-w enh su-pien（Collection of Ch’ing dynasty writings on statecraft，continued）.120 chüan.Wu-chin，Kiangsu：Sheng-shih ssu-pu lou.1897

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

[652]Sheng Lang-hsi.Chung-kuo shu-yuan chih-tu（The academy system in China）.Shanghai：Chung-hua，1934

盛郎西：《中國書院制度》

[653]Sheridan，James E.Chinese warlord：thecareer of Feng Yü-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詹姆斯·謝里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

[654]Shih-liao hsun-k’an（Historical materials published thrice-monthly）.40 vols.Peiping：Palace Museum 1930—1

《史料旬刊》

[655]Shih-wu pao（‘The Chinese progress’）.Thrice-monthly.Shanghai，1896—8

《時務報》

[656]Shimada Kenji.Chūgokukakumei no senkusha tachi（Forerunne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okyo：Chikuma，1965

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

[657]Shimada Kenji.Shingai kakumei no shisō（The thought behi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Tokyo：Chikuma.1968

島田虔次：《辛亥革命的思想》

[658]Shimada Masao.‘Shimmatsu ni okeru min shōritsu sōan no hensan ni tsuite’（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rafts for 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h’ing period）.Horitsu ronsō 34.6（1962）119—49

島田正郎：《關于清末民法與商法草案的編纂》

[659]Shiraishi Hiroo.‘Shimmatsu Konan no nōson shakai—ōso kankō to kōso keiko’（Rural Hunan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the practice of ya-tsu and the tendency towards rent resistance），in Tokyo Kyōiku Daigaku 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ed.Kindai Chūgoku Kindaika no shakai kozō（q.v.），pp.1—19

白石博男：《清末湖南的農村社會——押租慣例與抗租傾向》

[660]Shisō（Thought）.Monthly.Tokyo，1921—

《思想》

[661]Shu Hsin-ch’eng.Chin-tai Chung-kuo chiao-yü shih tzu-eiao（Materials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3 vols.Peking：Jen-min chiao-yü ch’u-pan she，1962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

[662]Simon，G-Eugène.La Cité chinoise.Paris，Nouvelle revue，1885

西蒙：《中國的城市》

[663]Sincere Co.Hsien-shih kung-ssu erh-shih-wu chou-nien chi-nien ts’e（The Sincere Co.：twenty-fifth anniversary）.Hong Kong：1924—5

《先施公司廿五周年紀念冊》

[664]Skachkov，P.E..ed.Bibliografiia Kitaia（Bibliography on China）.Moscow：Izd-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60

斯卡契科夫編：《中國書目》

[665]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JAS，24.1（Nov.1964）3—43；part 1.JAS，24.2（Feb.1965）195—228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上、下篇）

[666]Skinner，G.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施堅雅：《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

[667]Smith，Henry D.Ⅱ.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

[668]Smith，Richard J.‘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1850—186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8.2（1974）122—61

理查德·史密斯：《19世紀中葉中國的兵制》

[669]Smith，Richard J.‘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military talents：Chinese tradition and late Ch’ing practice’.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5（1975）113—38

理查德·史密斯：《雇傭外國軍人：中國的傳統和晚清的實踐》

[670]Smith，Richard J.‘Foreign training and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the case of Feng-huang-shan，1864—1873’.MAS，10.2（1976）195—223

理查德·史密斯：《外國人在鳳凰山的訓練和中國的自強》

[671]Smith，Richard J.‘Reflection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military aspects’.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6（1976）11—23

理查德·史密斯：《中國和日本軍事方面現代化的比較研究》

[672]Smith，Richard J.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New York：KTO Press，1978

理查德·史密斯：《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

[673]Smith，Thomas C.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prise，1868—188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2nd printing，1965

托馬斯·史密斯：《1868—1880年日本的政府企業，其政局變化和工業發展》

[674]Snow，Edgar.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1938.Grove Press rev.edn，1968

斯諾：《西行漫記》

[675]‘Son Bun to Nihon：Tokushu’（Sun Yat-sen and Japan，a special collection of articles）.Chūgoku（China，a monthly），Tokyo，36（Nov.1966）1—30

《中國月刊》（1966年11月）刊載：《孫中山和日本特集》

[676]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1903— ，also cited as SCMP

《華南晨報》

[677]Spector.Stanley.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ress，1964

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鴻章和淮軍》

[678]Speidel，William M.‘Liu Ming-ch’uan in Taiwan，1884—1891’.Yal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New Haven.1967

威廉·斯派特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

[679]Speidel，William M.‘The administrative and fiscal reforms of Liu Mingch’uan in Taiwan，1884—1891：foundation for self-strengthening’.JAS，35.3（May 1976）441—59

斯派特爾：《1884—1891年劉銘傳在臺灣的行政和財政改革》

[680]Spence，Jonathan.‘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q.v.），pp.143—73

喬納森·斯賓士：《清代吸食鴉片概況》

[681]Stanley，Charles J.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查爾斯·斯坦利：《清季的財政改革者胡光墉》

[682]Su Yü.I-chiao ts’ung-pien（Collection of writings for upholding sacred teachings）.Wuchang 1898 edn.Taipei reproduction，T’ai-lien kuo-feng ch’u-pan she，1970

蘇輿：《翼教叢編》

[683]Su Yun-feng.‘Wai-kuo chuan-chia hsueh-che tsai Hu-pei’（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Hupei）.Chung-kuo ween-hua fu-hsing yueh-k’an，8.4（April 1975）51—64

蘇云峰：《外國專家學者在湖北》

[684]Su Yun-feng.Chang Chih-tung yü Hu-pei chiao-yü kai-ko（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Hupei）.Taipei：IMH Academia Sinica.1976

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685]Sun，E-tu Zen.‘The 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 loan of 1908’.FEQ，10.2（1950）136—150

孫任以都：《1908年的滬杭甬鐵路貸款》

[686]Sun，E-tu Zen.‘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t mission of 1905—1906’.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24.3（Sept.1952）251—68

孫任以都：《1905—1906年的中國憲政考察使團》

[687]Sun，E-tu Zen.Chinese railways and British interests，1898—1911.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54

孫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

[688]Sun，E-tu Zen.‘Mining Labor in the Ch’ing Period’.in AMCH.45—67

孫任以都：《清代礦工》

[689]Sun Po-ch’un（Son Haku-jun）.‘Kajuku，Dōbun Shoin，MinpōshaN.ihon ni ikiru ichi Chūgokujin no kaisō’（Family tutorial，Dōbun Shoin，the People's Tribunt：the 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resident in Japan）.Chūgoku（Tokyo）30（May 1966）24—33

孫伯醇：《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在日華人的回憶》

[690]Sun Po-ch’un（Son Haku-jun）.‘Ryūgakusei：gakkō kyōiku，bempatsu no koto’（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school education，queues）.Chūgoku，（Tokyo）31（June 1966）28—33

孫伯醇：《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

[691]Sun Wen（Sun Yat-sen）.Kuo-fu ch’üan-chi（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national father）.6 vols.Taipei Kuomintang Party History Commission，distributed by Chung-yang wen-wu，1950；rev.edn，1957，1961

孫文：《國父全集》

[692]Sun Wen（Sun Yat-sen）.‘Tzu-chuan’（Autobiography），in Sun Wen，Kuo-fu ch’üan-chi（q.v.），1957 edn，vol.1，pp.31—49

孫文：《自傳》

[693]Sun Yü-t’ang，Comp.Chungk-uo chin-tai kung-yeh shih tzu-liao.li-i chi，1840—1895 nien（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1st collection，1840—1895）.2 vols.Peking：K’o-hsueh，1957.See Wang Ching-yü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年》

[694]Sung-shih（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496 chüan，Ssu-pu pei-yao edn.Shanghai：Chung- hua，1934；Taipei reproduction，Chung-hua，1965

《宋史》（《四部備要》版）

[695]Sung Yü-jen.Ts’ai-feng chi（Miscellaneous notes on world customs），in Chih-hsueh hui，comp.Chih-hsue ts’ung-shu ch’u-chi（q.v.），ts’el

宋育仁：《采風集》，載《質學叢書初集》

[696]Sutton，Donald 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Yunnan Army，1909—1925’.University of Cambridge，Ph.D.dissertation.1970

唐納德·薩頓：《1909—1928年滇軍的興衰》

[697]Suzuki Tomoo.‘Shimmatzu gensoron no tenkai一“Sokaku”no kenky u’（The development of rent reduction theories in the late-Ch’ing period—a study of‘Inquiry into rents’），in Tōkyō Kyōiku Daigaku 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ed.Kindai Chūgoku nōson shakai shih kenkyū（q.v.）

鈴木智夫：《晚清減租論之展開——〈租覈〉的研究》

[698]Ta-Ch’ing li-ch’ao shih-lu（Veritable records of successive reigns of the Ch’ing dynasty）.Totalling 4，485 chüan.but with new chüan sequence under each reign.Mukden：Man-chou-kuo kuo-wu-yuan 1937—8；Taipei facsimile reproduction in 94 volumes，Hua-lien and Hua-wen，1964.Also cited as CSL，followed by the title of the reign referred to

《大清律朝實錄》

[699]Tai Chi-t’ao.Jih-pen-lun（On Japan）.Shanghai：Min-chih shu-chü，1928；Taipei reprint，Chung yang wen-wu，1954

戴季陶：《日本論》

[700]Takahashi Masao.ed.Nihon kindaika to Kyūshū：Kyūshū bunka ronshū（Kyūshū and Japanese modernization：essays on Kyūshū culture）.Tokyo：Heibonsha.1972

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九州文化論集》

[701]Takeuchi Yoshimi.‘Asahi no koto，Takeyamasan no koto.Chūgoku o shirutameni’（The Asahi newspaper，Mr Takeyama，and how to know China）.Chūgoku，16（March 1965）34—6

竹內好：《朝日報、竹山先生和對中國的了解》

[702]Takeuchi Zensaku.‘Meiji makki ni okeru Chu-Nichi kakumei undō no kōryū’（Interflow i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late Meiji years）.Chūgoku，kenkyū，5（Sept.1948）74—95

竹內善作：《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

[703]Tamada，Noriko（Noriko Kamachi）.‘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Papers on China，21（1968）184—229

玉田典子（蒲地典子）：《宋教仁和辛亥革命》

[704]T’an，Chester C.The Boxer catastroph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

譚春霖：《拳亂》

[705]T’an Ssu-t’ung.Jen-hsueh（On humanity）.Yokohama，c.1899.In T’an Ssut’ung.T’an Ssu-t’ung ch’üan chi（q.v.），pp.3—90.Also in Chang Li-chai ed.T’an Liu-yang ch’uan-chi（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an Ssu-t’ung），pt 5.Taipei：Wen-hai，1962

譚嗣同：《仁學》

[706]T’an Ssu-t’ung.T’an Ssu-t’ung chüan-chi（The complete works of T’an Ssut’ung）.Peking：San-lien.1954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

[707]T’ang ChenW.ei-yen（Warnings）.4 chüan.Shanghai，1890；also available in Chih-hsueh hui，Chih-hsueh ts’ung-shu ch’u-chi（q.v.）.ts’e 1—2

湯震：《危言》

[708]T’ang Chih-chünW.u-hsu pien-fa shih lun-ts’ung（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Hankow：Jenmin，1957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

[709]T’ang Chih-chünW.u-hsu pien-fa jen-wu chuan-kao（Draft biographie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reform of 1898）.Peking：Chung-hua，1961

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

[710]T’ang I.Yu-ts’unw en（Essays of T’ang I）.6 chüan.Changsha，1847

湯彝：《袖村文》

[711]T’ang Ts’ai-chih.‘T’ang Ts’ai-ch’ang ho shih-wu hsueh-t’ang’（T’ang Ts’aich’ang and the School of Current Affairs）.Hun-an li-shih tzu-liao，3（1958）98—108

唐才質：《唐才常和時務學堂》

[712]Tao，L.S.（T’ao Lung-sheng）.‘Shen Chia-pe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w’.She-hut k’o-hsueh lun-ts’ung，Taipei，25（Sept.1966）275—90

陶龍生：《沈家本與中國法律的現代化》

[713]T’ao Ch’eng-chang.‘Che-an chi-lüeh’（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volts in Chekiang），HHKM，3.3—111陶成章：《浙案紀略》

[714]T’ao Chü-yinP.ei-yang chün-fa t’ung-chih shih-ch’i shih-hua（Historical anecdotes on the period of the Peiyang warlords）.7 vols.Peking：San-lien，1957—61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715]T’ao Hsu.Tsuho（Inquiry into rents）.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1927 edn in Suzuki Tomoo，‘Shimmatsu gensoron no tenkai—“Sokaku”no kenkyū’（q.v.），appendix

陶煦：《租覈》

[716]Tarui Tōkichi.Daitō gappōron（A proposal for a unified eastern state）.Original edn，1893.Tokyo：Daitōjuku Shuppanbu，1963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

[717]Teng，Ssu-yii and Fairbank.John 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年文獻概覽》

[718]Teraki Tokuko.‘Shimmatsu Minkoku shonen no chihō jichi’（Local selfgovernment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Ochanomizu shigaku，5（1962）14—30

寺木德子：《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

[719]T’ien Ju-k’ang.‘Yuk-uan Tu Wen-hsiu tui-wai kuan-hsi ti chi-ko wen-t’i’（A few problems regarding Tu Wen-hsiu's foreign relations）.Li-shih yen-chiu，1963.4.pp.141—150

田汝康：《有關杜文秀對外關系的幾個問題》

[720]Tikhvinskii，Sergei Leonidovich.Dvizhenie za reformy v Kitae v kontseⅩⅨ veka i Kan Iu-vei（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K’ang Yu-wei）.Moscow：Izd-vo vostochnoi literatury，1959

齊赫文斯基：《19世紀末中國維新運動與康有為》

[721]Tikhvinskii，Sergei Leonidovich，ed.Man’chzhurskoe vladycheslvo v Kitae（Manchu dominion in China）.Moscow：Nauka.1966

齊赫文斯基：《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

[722]Ting Jih-ch’ang.Fu-Wu kung-tu（Official papers of the governor of Kiangsu）.50 chüan.1877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Hua-wen，1968

丁日昌：《撫吳公牘》

[723]Ting Jih-ch’ang.‘Ting Chung-ch’eng cheng-shu’（Political papers of Governor Ting）.Manuscript copy，36 chüan.New Haven，Conn.：Sterling Library，Yale University

丁日昌：《丁中丞政書》

[724]Ting Pao-chenT.ing Wen-ch’eng kung i-chi（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Ting Pao-chen）.27 chüan.Peking，1893；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7

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

[725]Ting Wen-chiang.Liang Jen-kung hsien-sheng nien-p’u ch’ang-pien ch’ukao（The first draft of a documentar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r Liang Ch’i-ch’ao）.3 vols.Taipei：Shih-chieh，1959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726]Tōa Dōbun Shoinc.omp.Shina keizai zensho（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hina's economy）.12 vols.Osaka and Tokyo，1907—8

東亞同文書院編：《中國經濟全書》

[727]Tokyo Kyōiku Daigaku 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ed.Chūgoku kindaika no shakai kōzō（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Tokyo：Tōkyō Kyōiku Daigaku，1960.Daian reproduction，1966

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

[728]Tōkyō Kyōiku Daigaku Tōyōshigaku Kenkyūshitsu，ed.Kindai Chūgoku nōson shakai shi kenkyū（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rural social history）.Tokyo：Daian，1967

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

[729]Trotter，Captain.‘Some remarks on the army of Li Hung-chang and the garrisons of the forts on the Yang-tzu-chiang’.War Office.33/4（1880）127—30.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特洛特：《記李鴻章的軍隊及長江防務》（英國陸軍部檔案33/34號）

[730]Ts’ai-cheng pu ch’üan-pi ssuP.i-chih hui-pien（Compendium of documents on the monetary system）.4 vols.Peking：Ministry of Finance，1919

財政部泉幣司：《幣制匯編》

[731]Ts’ai-cheng shuo-ming shu（Reports on the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20 vols.Peking：Ching-chi hsueh-hui，1915

《財政說明書》

[732]Ts’en Ch’un-hsuan Lo-chai man-pi（Ts’en Ch’un-hsuan's autobiographical notes）.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ung-ho yueh-k’an（Peiping）4.5（May 1943）11—32.Taipei reproduction in book form together with a biography of Ts’en by Wu Hsiang-hsiang，Wen-hsing.1962

岑春煊：《樂齋漫筆》（臺北復印本附吳相湘所作的傳記）

[733]Tseng Chi-tse.Tseng Hui-min kung shih-hsijih-chi（Diary of Tseng Chitse's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Shanghai，1893；also in HFHC’ts’e 78

曾紀澤：《曾惠敏公使西日記》

[734]Tseng Chi-tse.Tseng Hui-min kung i-chi（Collected papers of the late Tseng Chi-tse）.Shanghai：The Kiangnan Arsenal，1893；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 1966.This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includes Tseng Hui-min kung wen-chi，5 chuan，also found in Tseng Hui-min kung i-chi，Sao-yeh shah-fang edn，Shanghai 1932

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

[735]Tseng Chi-tse.Tseng Hui-min kung shou-hsieh jih-chi（Tseng Chi-tse's holograph diary）.Taipei：Hsueh-sheng，1965

曾紀澤：《曾惠敏公手寫日記》

[736]Tseng Kuo-fan.Tseng Wen-cheng kung（Kuo-fan）ch’üan-chi（Complete collection of Tseng Kuo-fan's papers）.Amplified verslion，1876 et seq.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40 vols.1974；also cited as TWCKCC曾國藩：《曾文正公（國藩）全集》

[737]Tseng Kuo-fan.Tseng Wen-cheng kung shu-cha（Tseng Kuo-fan's letters）.33 chüan.Changsha：Ch’uan-chung shu-chü，1876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

[738]Tseng Kuo-fan.Tseng Wen-cheng kung shou-hsieh jih-chi（Tseng Kuo-fan's holograph diary）.6 vols.Taipei：Hsueh-sheng，1965

曾國藩：《曾文正公手寫日記》

[739]Tseng Lien.Ku-an chi（Collected writings of Tseng Lien）.18 chüan.Tsengshih Hui-fu-t’ang，1911

曾廉：《蠡爪庵集》

[740]Tseng Wen-wu.Chung-kuo ching-ying Hsi-yü shih（History of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6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

[741]Tsiang，T.F.‘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70—1894’.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7（1933）1—106

蔣廷黻：《1870—1894年中日外交關系》

[742]Tsien，Tsuen-hsuin.‘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FEQ，13.3（May 1954）305—27

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

[743]Tso Tsung-t’ang.Tso Wen-hsiang kung ch’üan-chi（Complete collection of Tso Tsung-t’ang's papers）.Changsha，1890 et seq.Taipei，Wen-hai reproduction，1964；also cited as TWHK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

[744]Tso Tsung-t’ang.Tso Wen-hsiang kung chia-shu（Tso Tsung-t’ang's letters to his family）.c，1920.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72

左宗棠：《左文襄公家書》

[745]Tsou Jung.The revolutionary army：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8.Introd.and trans.with nn.by John Lust.Paris：Mouton，1968

鄒容：《革命軍》（約翰·勒斯特英譯并注釋）

[746]Ts’un-ts’ui hsueh-she，comp.Chung-kuo chin-tai she-hui ching-chi shih lun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China's modem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2 vols.Hong Kong：Ch’ung-wen，1971

存粹學社編：《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論集》

[747]Ts’un-ts’ui hsueh-she，comp.Chung-kuo chin san-pai-nien she-hui ching-chi shih lun-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last 300 years）.2 vols.Hong Kong：Ch’ung-wen，1972

存粹學社編：《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經濟史論集》

[748]Tsunoda，Ryusaku，DeBary，William Theodore and Keene，Donald，eds.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編：《日本傳統的源泉》

[749]Tung-a chü-shih（pseud.）.‘Ch’in-luan chien-wen chi’（Diary of what I saw and heard during the Shensi calamity），in Ma Hsiao-shih，Hsi-pei hui-tsu ko-ming chien-shih（q.v.），pp.85—150

東阿居士：《秦難見聞記》

[750]Tung-fang tsa-chih（The eastern miscellany）.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04—48；also cited as TFTC

《東方雜志》

[751]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61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外交文件》

[752]US National Archives.Catalogue o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Washington，DC：National Archives，Records Service，1974

美國國家檔案館：《國家檔案館縮微膠卷目錄》

[753]Upton，Emory.The armies of Asia and Europe.New York：D.Appleton，1878；Greenwood Press reproduction，1968

埃默里·厄普頓：《亞洲和歐洲的軍隊》

[754]Vagts，Alfred.Defense and diplomacy：the soldier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King's Crown，1956

艾爾弗雷德·瓦格茨：《國防和外交》

[755]Van Gulik，R.H.‘Kakkaron：a Japanese echo of the Opium War.Monumenta Serica.’4（1939）478—545

范吉利克：《日本對鴉片戰爭的反響》

[756]Vladimir（pseud.for Zenone Volpicelli）.The China-Japan War cornpiled from Japanese，Chinese，and foreign sources.London：S.Low，Marston & Co.，1896

伏拉的米耳（沃爾皮西利）：《中日戰爭》

[757]Wakeman，Frederic，Jr.‘The price of autonomy：intellectuals in Ming and Ch’ing politics’.Daedalus.101.2（Spring 1972）35—70

小韋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識分子》

[758]Wakeman，Frederic，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小韋克曼等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759]Wakeman，Frederick，Jr.‘Rebellion and revolution：the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JAS，36.2（Feb.1977）201—37

小韋克曼：《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歷史上民眾運動的研究》

[760]Waley，Arthur.The Opium War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Allen & Unwin，1958

阿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

[761]Wallach，Richard.‘The war in the East’.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21.4（1895）691—739

理查德·瓦拉：《東方的戰爭》

[762]Wang Ch’ao-tsung，comp.Ha -wai fan-i lu（Collected writings on barbarians beyond the seas）.2 ts’e.Peking：Sou-liu-hsuan，1844

王朝宗編：《海外番夷錄》

[763]Wang Chia-chien.Wei Yuan tui Hsi-fang ti jen-shih chi ch’i hai-fang ssuhsiang（Wei Yuan's knowledge of the West and his ideas regarding maritime defence）.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College of Letters，1964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

[764]Wang Chia-chien.‘Hai-kuo t’u-chih tui-yü Jih-pen ti ying-hsiang’（The influence of the Hai-kuo t’u-chih in Japan），in Ta-lu tsa-chih.32.8（April 1966）242—9

王家儉：《〈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

[765]Wang Chia-chien.‘Ch’ing-chi ti hai-fang lun’（Opinions favouring coastal defence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Shih-ta hsueh-pao 12（June 1967）1—40

王家儉：《清季的海防論》

[766]Wang Chia-chienW.ei Yuan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ei Yuan）.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7

王家儉：《魏源年譜》

[767]Wang Chia-chien.‘Ch’ing-chi ti hai-chün ya-men’（The Navy Yamen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Chung-kuo li-shih hsueh-hui shih-hsueh chi-k’an，5（1973）1—32

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

[768]Wang Chia-chien.‘Wen-hsiang tui-yü shih-chü ti jen-shih chi ch’i tzuch’iang ssu-hsiang’（Wen-hsiang's knowledge of world affairs and his ideasregarding self-strengthening）.SFLS，1（1973）219—39

王家儉：《文祥對于世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

[769]Wang Chia-chien.‘Pei-yang wu-pei hsueh-t’ang ti ch’uang-she chi ch’i yinghsiang’（The Peiyang Military Academy：its creation and influence）.SFLS，4（April 1976）317—43

王家儉：《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

[770]，Wang Chiac-hien.‘Lü-shun chien-kang shih-mo’（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rt Arthur naval base：a complete account）.CYCT，5（June 1976）223—62

王家儉：《旅順建港始末》

[771]Wang Ching-yü，comp.Chung-kuo chin-tai kung-yeh shih tzu-liao，t -erh chi，1895—1914 nien（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2nd collection 1895—1914）.2 vols.Peking：K’o-hsuch.1957

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1895—1914年》

[772]Wang Ching-yü and Nieh Pao-chang.‘Kuan-yü Chung-kuo ti-i-tai ch’an-yeh kung-jen ti tou-cheng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struggle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 workers）.Ching-chi yen-chiu.1962.3，pp.43—51

汪敬虞、聶寶璋：《關于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斗爭資料》

[773]Wang Ching-yü.‘Shih-chiu shih-chi wai-kuo ch’in Hua ch’i-yeh chung ti Hua-shang fu-ku huo-tung’（Investment by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foreign firms which invaded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i-shih yen-chiu 1965.4.pp.39—74

汪敬虞：《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

[774]Wang Erh-minC.h’ing-chi ping-kung yeh ti hsing-ch’i（The rise of the armaments industry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ea，1963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775]Wang Erh-min.‘Ch’i-ying wai-chiao’（The diplomacy of Ch’i-ying）.Ta-lu tsa-chih，30.9 and 10（May and June 1965）281—7，330—3

王爾敏：《耆英外交》

[776]Wang Erh-min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 shih-lun（Historical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thought）.Taipei：Hun-shih ch’u-pan she，1977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777]Wang Er-hmin.‘Shang-chan kuan-nien yü chung-shang ssu-hsiang’（The idea of trade as a weapon and the greater importance attached to commerce）.CYCT，5（June 1966）1—91

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

[778]Wang Erh-min.Hua -chün chih（History of the Anhwei Army）.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7

王爾敏：《淮軍志》

[779]Wang Erh-min.‘Lien-chün ti ch’i-Yuan chi ch’i i-i’（The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trained Green Standard contingents）.Ta-lu tsa-chih，34.6 and 7（March and April 1967）172—5.216—3

王爾敏：《練軍的起源及其意義》

[780]Wang Erh-min.Wan-Ch’ing cheng-chih ssu-hsiang shih-lun（Historical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Hsueh-sheng，1969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

[781]Wang Erh-min.‘Ch’ing-tai yung-ying chih-tu’（The‘Brave Battalion'system of the Ch’ing dynasty）.CYCT.4.1（May 1973）1—52

王爾敏：《清代勇營制度》

[782]Wang Hsi-ch’i，comp.Hsiao-fang-hu chai yü-ti ts’ung-ch’ao（Geographical series of Hsiao-fang-hu studio）.In 3 series totalling 84 ts’e.Shanghai：I-shu t’ang，1877—97；also cited as HFHC

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783]Wang Hsien-ch’ien，P’an I-fu et al.Shih-erh ch’ao tung-hua lu（Tung-hua records of twelve reigns）.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edns for Ch’ing reigns up to and including K’uang-hsu.Tainan：Ta-tung，1968

王先謙、潘頤福等編：《十二朝東華錄》

[784]Wang Hsin-chung.Chung-Jih chia wu chan-cheng chih wai-chiao pei-ching（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Peiping：Tsing Hua University.1937

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785]Wang Hsiu-ch’u.Yang-chou shih-jih chi（An account of ten days in Yangchou）in Shen Yun-lung，Ming-Ch’ing shih-liao hui-pien（Compendium ofMing-Ch’ing historical sources），series 2，Vol.5.Taipei reproduction，Wenbai.1967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786]Wang Hung-chih.Tso Tsung-t’ang p’ing hsi-pei hui-luan liang-hsiang chih，ch’ou-hua yü chuan-yun yen-chiu（A study of the planning and transmission of food and funds in Tso Tsung-t’ang's suppression of Muslim Rebellion in the north-west）.Taipei.Cheng-chung，1973

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亂糧餉之籌劃與轉運研究》

[787]Wang I-sun.‘Hsinh-ai ko-ming shih-ch’i tzu-ch’an chieh-chi yü nung-min ti kuan-hsi wen-t’i’（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easants during the era of the 1911 Revolution），in HHWS，115—46

汪詒蓀：《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

[788]Wang K’ai-yunH.siang-ch’i lou wen-chi（Collection of essays of Wang K’aiyun）.Taipei：Hsin-hsing，1956

王闿運：《湘綺樓文集》

[789]Wang Ping-hsieh.Wu-tzu-ch’i shih wen-chi（Wang Ping-hsich's essays）.Tientsin：Kuang-j en t’ang，1885；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

[790]Wang Shu-huai.Wai-jen yu Wu-hsu pien-fa（Foreigners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5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

[791]Wang Shu-huai.Hsien-T’ung Yun-nan hui-min shih-pien（Muslim revolts in Yunnan during the Hsien-feng and T’ung-chih reigns）.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68

王樹槐：《咸同云南回民事變》

[792]Wang Ta-hai.Hai-tao i-chih（Little-known account of the seas and islands），in Wang Ch’ao-tsung，comp.Hai-wai fan-i lu（q.v.），ts’e 2

王大海：《海島逸志》

[793]Wang T’ao.T’ao-yuan ch’ih-tu（Waug T’ao's letters）.8 chüan.HongK ong：privately issued，1876；Taipei reproduction，Ta-t’ung，1968

王韜：《韜園尺牘》

[794]Wang T’ao.T’ao-yuanw 　enl-u wei-pien（Additional essays of Wang T’ao）.10 chuan.Hong Kong：T’ao-yuan（Wang's residence），1883；chüan 11—12 subsequently added，n.d.

王韜：《韜園文錄外編》

[795]Wang T’ao.ed.Ko-chih shu-yuan k’o-i（Assigned writings of students of the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13 ts’e.Shanghai：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Reading Room，1886—93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

[796]Wang T’ien-chiang.‘Shih-chiu shih-chi hsia-pan-chi Chung-kuo ti pi-mi huishe’（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Li-shih yen-chiu.1963.2，pp.83—100

王天獎：《19世紀下半紀中國的秘密會社》

[797]Wang T’ien-chiang.‘T’ai-p’ien-tian-kuo ko-ming hou Su Che Wan sap sheng ti t’u-ti kuan-hsi’（The agrarian relations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Kiangsu，Chekiang and Anhwei after the Taiping Revolution）.Hsin chien-she.1963.8.pp.46—54

王天獎：《太平天國革命后蘇浙皖三省的土地關系》

[798]Wang Wen-t’ai Hung-mao-fan Ying-Chi-Li k’ao-Lueh（Short account of the red-haird Enghlish barbarians），in Wang Ch’ao-tsung.comp.Ha -wai fan-i Lu（q.v.），ts’e 2

汪文泰：《紅毛蕃英吉利考略》

[799]Wang，Y.C.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lifornia Press.1966

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1949》

[800]Wang，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業鍵：《1750—1911年中華帝國的土地和租稅》

[801]Wang Yen-hsi and Wang Shum-in.comps.Huang-ch’ao Tao-Hsien-T’ung-Kuang tsou-i（Memorials of the Tao-kuang，Hsien-feng，T’ung-chih and Kuang-hsu periods of the Ch’ing dynasty）.64 chüan.Shanghai：Chiu-ching chai，1902.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王延熙、王樹敏編：《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802]Wang Yen-wei and Wang Liang，comps.Ch’ing-chiw ai-chiao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1875—1911）.218＋1 chuan for the Kuang-hsu period（1875—1908）and 24 chüan for the Hsuan-t’ung period（1908—11）.Peiping：Wang Hsi-yin，1932—5；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3

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

[803]Wang Yu-ling.‘Shang-pu chih tse-jen’（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Shang-wu kuan-pao（The commercial gazette），7（19061）—4

王有齡：《商部之責任》

[804]Wehrle，Edmund S.Britain，China，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6

埃德蒙·韋爾利：《1891—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

[805]Wei Chien-yu.Chung-kuo chin-taai huo-op-i shhih.i- pa i-ssu-ic-hiui-chiu（History of currency in modern China，1814—1919）.Shanghai：Ch’ün-lien，1955；Taipei：Wen-hai，1974

魏建酞：《中國近代貨幣史，1814—1919》

[806]Wei Yuan.Shengw uc-hi（Chronicle of the sacred dynasty's military campaigns）.Ku-wei t’ang 1842 edn.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7

魏源：《圣武記》

[807]Wei Yuan.Hai-kuo t’u-chih（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100 chüan.Shanghai：Wen-hsien ko，1898 edn.Taipei reproduction of 1847 edn.Ch’eng-wen，1966

魏源：《海國圖志》

[808]Wen Kung-chih.Tsui-chin san-shih-nien Chung-kuo chün-shih shih（Histor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2 vols.Shanghai：T’aiping-yang shu-tien，1930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

[809]Weng Tu’ng-ho.Weng T’ung-ho jih-chi p’al-yin-pen（A typeset edition of the diary of Weng Tu’ng-ho）.5 vols.Taipei：Ch’eng-wen，1970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

[810]Wickberg，Edgar B.‘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and tenure in Taiwan’in Leonard H.D.Gordon，ed.Taiwan：studies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q.v.），pp.78—92

埃德加·威克伯克：《19世紀后期臺灣的土地租賃》

[811]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812]Wilson.George M.‘Politics and the people：Liang Ch’i-ch’ao's view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 Meiji Japan before 1890’.Papers on Japan.1（1961）189—226

喬治·威爾遜：《梁啟超對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憲政運動的看法》

[813]Wilson，George M.Radicalnationalist in Japan：Kita Ikki，1883—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

[814]Wilson，James Harrison.China：travels and investigations in the‘Middle Kingdom’.New York：D.Appleton，1887；2nd edn，1894

詹姆斯·哈里森·威爾遜：《中國旅行考察記》

[815]Wing On Co.Hsiang-kang Yung-an yu-hsien kung-ssu erhshih-wu chounien chi-nien lu（The Wing On Co.Ltd.of Hong Kong：twenty-fifth anniversary）.Hong Kong，1932

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廿五周年紀念錄》

[816]Witte.Sergei Iul’evich.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Abraham Yarmolinsky，trans.and ed.New York：H.Fertig reproduction of 1921 edn，1967

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亞莫林斯基編譯（英譯本）

[817]Wodehouse，H.E.‘Mr.Wade on China’.The China Reriew，1.1（July-Aug.1872）38—44.and 1.2（Sept.O-ct.1872）118—24 H.E.沃德豪斯：《威妥瑪論中國》

[818]Wong，Young-tsu，‘Popular unrest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iangsu，’[Kiangsu].Modern China.3.3（July 1977）321—44

汪榮祖：《江蘇省的民眾騷亂與辛亥革命》

[819]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芮瑪麗：《同治中興》

[820]Wright，Mary C.‘The adaptability of Ch’ing diplomacy：the case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Korea’.JAS，17.3（May 1958）363—81

芮瑪麗：《清代外交的適應性：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經過》

[821]Wright，Mary C.，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also cited as C1R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

[822]Wright，Mary C.‘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in CIR，1—63

芮瑪麗：《導言：新興的變革潮流》，載以上著作

[823]Wright.Stanley 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Wm Mullan，for the Queen's University，1950

斯坦利·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

[824]Wu Hsiang.hsiang.Oti ch’in-lueh Chung-kuo shih（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imperialist aggression in China）.Taipei：Kuoli pien-i kuan.1954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

[825]Wu Hsiang-hsiang.Wan-Ch’ing kung-t’ing shih-chi（True account of palace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 Ch’ing）.Taipei：Cheng chung，1961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

[826]Wu Hsiang-hsiang.Chin-tai shih-shih lun-ts’ung（Studies in modern historical events）.Taipei：Wen-hsing，1964

吳相湘：《近代史事論叢》

[827]Wu.Silas H.L.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吳秀良：《中國的通訊聯絡與皇帝的控制：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進》

[828]Wu T’ien-jen.Huang Kung-tu hsien-sheng chuan-kao（A draft biography of Huang Tsun-hsien），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2

吳天任：《黃公度先生傳稿》

[829]Wu Wo-yao（Wu Chien-jen.or Yen-jen）.Erh-shih-nien mu-tu chih kuai hsien-chuang（Bizarre phenomena eyewitnessed over twenty years）.8 chüan.Shanghai：Hsin-hsiao-shuo shu-tien，1916.Reprints include Shang-hai wenhua ch’u-pan-she，1957.Also Shih-Shun Liu.tran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4；New York edn，St John's University，1974

吳沃堯（吳趼人、吳繭人或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有劉師舜英譯本

[830]Wu，Yü-chang.The Revolution of 1911：a great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China.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2

吳玉章：《辛亥革命》

[831]Wu Yun.Liang-lei-hsuan ch’ih-tu（Wu Yun's letters）.12 chüan.1884.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吳云：《兩罍軒尺牘》

[832]Yamagata，Aritomo.‘The Japanese army’.in Shigenobu Ōkuma，ed.Fifty years ofn 　ewJ apan，1.194—217.2 vols.London：Smith，Elder & Co.，1909

山縣有朋：《日本的軍隊》

[833]Yang，C[Yang Tuan-liu]and Bau.H.B.[Hou Hou-p’ei]et al.Stat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last sixty-five years.Nanking：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Academia Sinica，1931

楊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

[834]Yang，C.K.‘Some preliminary patterns of mass a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 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4—21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楊慶堃：《19世紀中國民眾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

[835]Yang Hung-lieh.Chung-kuo fa-lü fa-ta shih（Chinese law：the history of its full development）.2 vol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0，1933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

[836]Yang，Lien-sheng.‘Histor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CWO，20—33

楊聯陞：《關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

[837]Yang，Lien-sheng.‘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urban merchant in traditional China’.Ch’ing-hua hsueh-pao，NS，8.1—2（1970）186—209

楊聯陞：《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的控制》

[838]Yang，Martin C.（Yang Mou-ch’un）.Chinese social structure：a historical study.Taipei：Eurasia，1969

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

[839]Yang Tuan-liu.Ch’ing-tai huo-pi chin-jung shih kao（Draft history of mon-ey and money markets in the Ch’ing period）.Peking：San-lien.1962

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

[840]Yang Yu-chiung.Chin-tai Chung-kuo li-fa shih（History of legislation in modern China）.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6；rev，edn，Taipei，1966

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

[841]Yano Jin’ichi.Shinchō masshi kenkyū（Studies in late Ch’ing history）.Osaka：Yamato Shoin，1944

矢野仁一：《清朝末年史研究》

[842]Yao Hsi-kuang.Tung-fang ping-shih chi-lueh（Brief account of war in the East）.5 chüan，1897.Reprinted in CJCC，1.1—108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

[843]Yao Jun comp.Ta-Ch’ing lü-li hsing-an hui-tsuan chi-ch’eng（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 Ch’ing statutes and sub-statutes，together with a conspectus of penal cases）.Rev.and enlarged by Hu Chang.20 chuan.1865.Taipei reproduction of 1873—74 edn，Wen-hai，1964

姚潤編：《大清律例刑案匯纂集成》

[844]Yao Ying.Tung-ming wen hou-chi（Supplement to Yao Ying's collected essays）.14 chuan，n.p，1867

姚瑩：《東溟文后集》

[845]Yeh Chung-chinY.ing-chi-li-kuo i-ch’ing chi-lueh（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barbarians），in HFHC，ts’e 77

葉鐘進：《英吉利國夷情紀略》

[846]Yen Chung-p’ing et al.comps.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t’ung-chi tzu-liao hsuan-chi（Selected statistics o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Peking：K’o-hsueh，1955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847]Yen Chung-p’ing.Chung-kuo mien-fang-chih shih-kao，1289—1937（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tton industry，1289—1937）.Rev.edn.，Peking：K’ohsueh，1955；3rd printing，1963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

[848]Yen Fu.T’ien-yen lun（On evolution；a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by Thomas Henry Huxley）.Tientsin，1897—8.In Vol.1 of Yen Fu，Yen-iming-chu ts’ung-k’an（A collection of famous works translated by Yen Fu）.8 vols.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1

嚴復譯：《天演論》

[849]Yen Fu.Yen Chi-tao shih-wen ch’ao（Yen Fu's poems and essays）.6 ts’e.Shanghai：Kuo-hua，1922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

[850]Yin Keng-yun et al.Yü-chün chi-lueh（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Honan Army）.12 chüan with sub-divisions.1872 preface.Taipei reproduction.Wenhai.1968

尹耕云等編：《豫軍紀略》

[851]Yoshida，Tadashi.‘Sakuma Shōzan as an advocate of“Eastern morality，Western science”’，in Princeton Papers in East Asian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1 Ja pan（1972），pp.33—56

吉田正：《提倡“東方道德，西方科學”的佐久間象山》

[852]Young，Ernest P.‘Ch’en T’ien-hua（1875—1905）：a Chinese nationalist’.Papers on China，13（1959）113—62

歐內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

[853]Young，Ernest P.‘The reformer as a conspirator：Liang Ch’i-ch’ao 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AMCH，239—267

歐內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

[854]Young，Ernest P.‘Yuan Shih-k’ai's rise to the presidency’，in CIR，419—42

歐內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

[855]Young，Ernest P.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t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歐內斯特·楊：《袁世凱總統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

[856]Young，L.K.British policy in China，1895—1902.Oxford：Clarendon，1970 L.K.楊：《1895—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

[857]Yu，George T.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the Kuomintang：1912—19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于之喬：《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1924年的國民黨》

[858]Yü En-te.Chung-kuo chin yen fa-ling pien-ch’ien shih（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ti-opium statutes and decrees in China）.Shanghai：CH，1934

余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

[859]Yü P.K.（Ping-chiian），Li，Yu-ning and Chang.Yü-fa，comps.Ch’ing-chi koming yun-tung ch’i-k’an hsu-mu hsuan-chi（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a guide to Chinese periodicals）.Washington 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1970

余秉權、李又寧、張玉法編：《清季革命運動期刊敘目選輯》

[860]Yuan，Tsing.‘Yakub Beg（1820—1877）and the Moslem Rebellion in Chinese Turkestan’.Central Asiatic Journal，6（1961）134—67

袁清：《阿古柏與回民叛亂》

# 附：參考書目中著作及報刊簡寫表

AMCH：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國近代史考察》

BPP：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英國議會文獻集》

CCTW：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

CIR：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

CJCC：Chung-Jih chang-cheng

《中日戰爭》

CSL：Ta-Ch’ing li-ch’ao shih-lu

《大清歷朝實錄》

CWCK：Chou Wu-chuang kung i-sh u

《周武壯公遺書》

CWHK：Chang Wen-hsiang kung ch’uan-chi

《張文襄公全集》

CWO：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

CYCT：Ch’ung- 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c 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HFHC：Hsiao-fan-hu chai yü-ti ts’ung-ch’ao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HHKM：Hsin-hai ko-ming

《辛亥革命》

HHWS：Hsi-hai ko-ming wu-shih chou-nien lun-wen chi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

HJA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HMCI：Hui-min ch’i-i

《回民起義》

HTJP：Hsiang-kang Hua-tzu jih-pao

《香港華字日報》

IMH：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WSM：Ch’ing-tai ch’ou-pan i-wu shih-mo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

JA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雜志》

KMWH：Ko-ming wen-hsien

《革命文獻》

LCSK：Liu Chuang-su kung tsou-i

《劉壯肅公奏議》

LWCK：Li Wen-chung kung ch’uan-chi

《李文忠公全集》

MAS：Modern Asian Studies

《近代亞洲研究》

NCH：North-China Herald

《北華捷報》

PMSS：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

《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

SCM 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華南晨報》

SFLS：Kuo-li Tan-wan shih-fan ta-hsueh li-shih hsueh-pao

《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

TFTC：Tung-fang tsa-chip

《東方雜志》

TWCKCC：Tseng Wen-cheng kung chuan-chi

《曾文正公全集》

TWHK：Tso Wen-hsiang kung chüan-chi

《左文襄公全集》

WCSL：Ch’ingc-hi wai-chiao shih-liao

《清季外交史料》

WHPF：Wu-hsu pien-fa

《戊戌變法》

YWYT：Yang-wu yun-tung

《洋務運動》